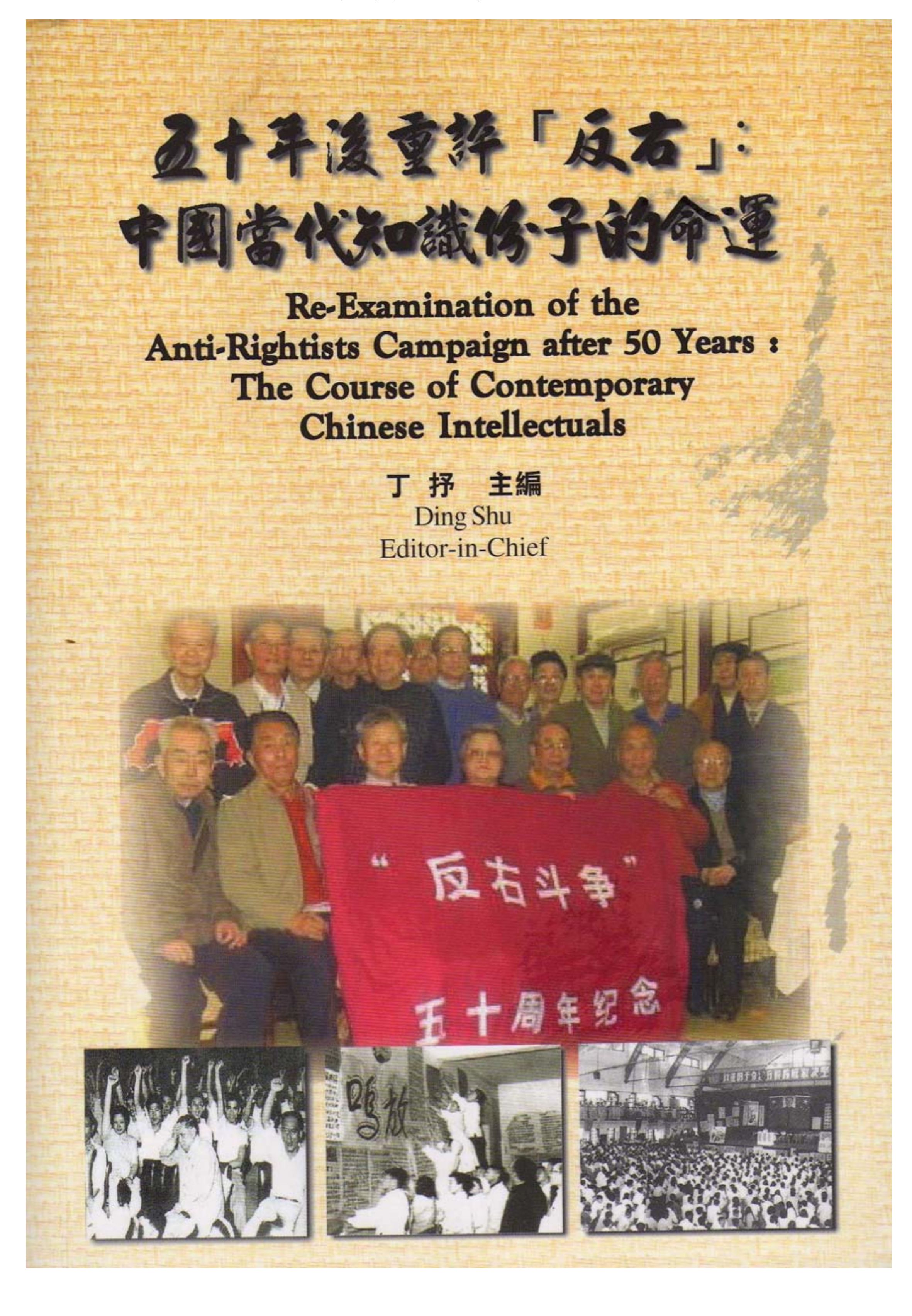
五十年后重评「反右」


五十年後重評「反右」：
中國當代知識份子的命運
Re-Examination of the
Anti-Rightists Campaign after 50 Years :
The Cour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Intellectuals
丁 抒 主編
Ding Shu
Editor-in-Chief
"反右斗争"
五十周年纪念

目 录

五十年后重评「反右」

「反右运动」前前后后

国际风云下的一九五七

「反右」和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反右」和大陆民间思潮的承传

一个人的遭遇和一个历史时代

史料学和「一九五七年学」

「一九五七年学」方法谈 魏紫丹

本书作者简介

《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新版说明　宋永毅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决定出版一套新版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嘱我写这个出版说明。提笔之际，我首先感到由香港《开放》杂志社、美国博大出版社等民间出版机构协助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对我们已经身置于其中的二十一世纪有一种自然而然的"顾名思义"之理：因为"二十一世纪"应当是一个最为"开放"的"博大"兼容的新世纪。如果说"邪恶帝国"在欧洲的彻底垮台的二十世纪和电视、电台、计算机科技的崛起所带来的信息渗透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以开放的互联网对全球的覆盖为标志的二十一世纪，是一定会崩坍所剩不多的那几个专制堡垒的。追求自由和民主，要求一个开放的社会，这已经为历史证明是人类的天性。这里便是一个有趣的例证。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过风云一时的"四大民主"，在这样一种被扭曲了的民主形式下，群众可以以大字报的形式变相地发泄对中共官僚阶层的不满。文革刚一结束，邓小平便迫不及待地从宪法中取消了有关"四大民主"的条款，因为他们惧怕这种开放的形式，哪怕只是一种囚笼中的"民主"。历史又似乎在顽强地重复，今天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中国"里的民意—数以千万计的"电子大字报"，无论是对贪官污吏的揭露还是对公民权利的维护，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当年"四大民主"下的纸质大字报，而且正独立地影响着中国的民主进程。然而，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套传统的印刷出版物。是否在这一新的开放的世纪里，传统的信息传播手段就不那么重要了呢？这显然是一管之见。二十一世纪的开放性还高度地体现在它的博大兼容的多元性上。如同电视没有消灭电台，飞机没有取代汽车一样，传统的书籍在以互联网为旗帜的二十一世纪中仍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一套严肃的、以其思想和学术深度区别于一般通俗政治文化读物的丛书，不仅为海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传播信息的平台，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力。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曾经把它的指导方针归结为这样四句话："突破信息封锁，推动民主变革，促进族群和解，建立宪政民主"。我想，这大概也是这套新丛书的出版宗旨吧。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

于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

「57 右派」已成为极高的荣誉　　林培瑞 / Perry Link

欢迎大家，尤其是远道来的朋友，来参加今天的会。宋永毅先生让我说几句「开场白」，颇有班门弄斧之感。我没有在场很多朋友对「反右运动」的切身经历，与其说什么「开场白」，我倒不如提两个问题，抛砖引玉。

中国文化中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觉得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从这一次会议的论文和发言题目来看，好像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我也有。但究竟为什么？「关键」的感觉从哪里来？

反右以前，中国已经经历过土改，镇反，肃反，都是血淋淋的事情，够残酷的了。反右以后还更可怕。文革受迫害的人数要比反右多好几倍。最可怕的数字当然是「大跃进」的大饥荒的；那三年的死亡率至少要比反右多一百倍。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

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

刘宾雁先生生前曾经告诉过我，他划右派以前很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语言，被划成右派以后，虽然不能接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心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我可能真的有什么问题；毛泽东不可能不对。」在这一点上，我想宾雁先生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划了右派以后，宾雁去跟中国的最穷的老百姓一块住了几年，经过了一个在一辈子里有决定性的转折，这也能算「语言变化」：他发现中国社会上有「两种真理」。宣传部的官方真理在报纸上从上往下一层一层地传达下来；同时有另一种真理，是由老百姓的艰难生活长出来的，从下往上。两种「真理」之间似乎毫无关

系。两者之间，宾雁决定要接受后者。

我个人觉得这种「语言分野」是一个关键和要命的问题。以前，在土改，镇反，和肃反的时候，虽然残酷，但理想语言还是有「能够信」的可能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能对自己说「我是为了理想……」。但以后，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

我以为这个深刻的变化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犬儒主义」：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等等。这个浪潮的出现当然跟后来邓江胡时代的「不讲政治，只向钱看」的政策有关。但是 1957 以后的「语言分野」和「两种真理」的作用显然是关键。

帽子的变化：从「反党」到「反华」

今天想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从 57 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帽子」的变化是什么？当时「右派」的正式罪名叫「反党反社会主义」。把这个模式带到今天来看，非常有趣。今天的中南海不提「反党」两个字，这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公开承认真的能有人反党。同时也不提「反社会主义」了，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社会主义。太子党捞鱼的经济池子里，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野蛮的资本主义，要是现在埋怨别人反对「社会主义」免不了带来一点自嘲的味道。

中南海现在不喜欢你，说你「反」什么呢？有时候还用「反动」两个字，但更有趣的是说你「反华」。把原来的「反党」扩大到「反华」 ，又是为什么呢？显然是为了刺激中国人的民族情绪，共产党把自己说成民族尊严的代表。在国际上，只要是对中国政府有批评的人，那就自然属于「反华人士」。国内的中国人，虽然是公民，一旦跟「不怀好意的国际势力」挂钩，那也算染上了「反华色彩」。今天与会的中国朋友，在中南海看来，恐怕已经有点「反华」了吧？

我对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是因为我自己也被戴上了「反华」的帽子。林培瑞花了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是中国人，这都不要紧。在中共的语言里，林也是「反华」的。

我们这个会议的目标之一应该是对中南海，乃至全世界，说清楚：对不起，我们不反华，而且我们要求进一步地问：在最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上，到底是谁

在副其实地反华？到底是谁害了中国？

谁带来了世界破纪录的大饥荒？谁制造了「两种真理」？谁把说假话，造假货，卖假药，自欺欺人的犬儒主义带给了中国人？这些都是老百姓一手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责任在中南海？

到底谁反华：毛泽东反华还是刘宾雁反华？丁子霖反华还是杀他的儿子的人反华？是中国民主党反华还是中国太子党反华？是罗干反华还是在座的几位在出国开这个会以前必须跟国安警察「谈话」的人反华？到底谁代表中国文明的利益？

在我看来，「右派」早不是个帽子，不是贬义辞，而是极高的荣誉。

欢迎大家！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前 言　　丁抒

1957 年夏季，由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大规模镇压言论自由的政治运动。运动采取卑鄙的诱骗方式，宣称「言者无罪」，号召知识分子「大鸣大放」，而后将其定为「右派分子」，使百万人沦为「专政对象」家破人亡。这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也是一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国科学院科学史专家许良英指出，当代中国有四大灾难：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而综观四次大灾难，后面三次都与第一次反右有因果关系。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反右运动是关键。

对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曾这样作总结：

「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 1956 年，我看实际是在 1957 年。」1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 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2

「1957 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3

这个「胜仗」使毛泽东获得了历代统治者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得以按照他的意志去改造中国。用他的话说，在中国这「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反右之后，他送给中国人民的第一件作品，便是「大跃进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三千余万人死于饥馑，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他的第二件作品就是那号称「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

当年被毛泽东点名而成为「右派分子」的诗人流沙河说：「如果 1957 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若敢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41957 年被毛泽东点名而成为「极右分子」的李慎之先生也认为，反右派运动直接孕育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失败则导致了 1959 年初的反右倾斗争，和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如原上海文汇报社长徐铸成所说：「从那次『阳谋』后，知识分子从此闭口不言，真是万马齐喑了。这大概是『杀鸡儆猴』的战略部署吧。这次『阳谋』的如愿以偿，为以后的『史无前例』作了准备。」5

2007 年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6 月 29 至 30 日，由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和 21 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纪念反右运动 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杉矶举行。本书即该会议的论文专集。由于各种原因无法与会的一些学者提交的论文也收入在内。此外，编者还采用了已经故去的李慎之和刘宾雁先生的两篇文章。

在本书编辑的过程中，丛书主编宋永毅先生为本书的中英文署名和分类标题等撰写花了不少的心血，张成觉先生参与了全书的校对工作，仅在此一并致谢。

注 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651 页。

2 1959.7.31 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1996) 第 182 页。

3 1959.8.11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296 页。

4 《曾经沧海身犹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5 徐铸成《阳谋亲历记》，《中国之春》（纽约）1987 年 12 月号第 30 页。

当代中国大灾难的开端：反右运动

——纪念反右 50 周年　　许良英

一、当代中国四大灾难

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共内战之后，中国人民渴望一个安居乐业的和平建设时期。可是，在毛泽东独揽大权的「人民共和国」，人民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内战结束后不到一年，就参加了朝鲜战争。随后在国内每年都开展一次甚至两次整人的政治运动。如 1951 年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52 年「三反、五反」运动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 年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4 年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 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肃反运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毛泽东一手制造的冤案，波及 2,000 多人。我因 1952 年介绍胡风朋友方然入党而受到历时一年的批判和停职审查。

1956 年是难得的平静的一年。这要归功于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所作的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恶果的揭露，震撼了所有由共产党专政的国家，毛泽东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但一年后他即疯狂反扑，发动了以打击知识分子为主要目标的反右运动（即反右派斗争），把当时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 11%（55 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属于「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不止 55 万人，而是一百万人左右。由于反右运动后期，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那些已划为「右派」的，改划成「地主」或「坏分子」，他们以后的遭遇比右派还要惨。他们的总人数估计约 50 万人。在一次运动中把全国 20%的知识分子定为「敌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不仅如此，由于反右运动前后毛泽东使尽阴谋诡计，「反右」胜利后又冲昏头脑，自诩为暴君秦始皇，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一百倍。于是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

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三年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四千万人，造成了又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为医治由「大跃进」所引发的三年大饥荒，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向逢迎毛泽东并被指定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说了一句「三年困难」是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由此认定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经过四年的精心策划，于1966年发动了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以「除四旧」、打杀中学校长开始的十年浩劫，是中华民族最荒唐而血腥的大灾难，最后也葬送了毛泽东的神话。

承袭毛泽东衣钵的邓小平，对直接伤害他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完全否定，但对他自己负执行总责的反右运动（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却断言「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并于1981年9月作过如此危言：目前形势比1957年还严重，知识分子要向我们夺权！显然他是想再搞一次反右运动，可惜力不从心，只能每隔一年搞一次冷冷清清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或「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1989年4月，因反自由化不力而被他罢黜的胡耀邦含冤去世，几十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悼念，称胡耀邦为「中国魂」，招致邓小平忌恨，扬言要以「流血」来镇压。结果就是六·四大屠杀。这是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所创造的第四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纵观四次大灾难，后面三次与第一次反右灾难都有因果关系，因此，要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反右运动史应该是关键。

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运动？

在毛泽东心目中，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妨碍他统治的祸患，但国家建设又离不开知识，于是建国伊始就发动改造知识分子运动，要把他们改造成驯服工具。对那些他认为不完全驯服的人，就飨以铁拳。反右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其根源在于毛泽东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对于这个问题，王来棣2003年的论文〈一贯敌视知识分子的毛泽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此处介绍两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史实。

在国共合作时期的1925年，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发表论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把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一部分定为「极端的反革命派」，大部分定为「半反革命派」。此文同时在三个刊物上刊出，并出过单行本。

1951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此文是开篇，但文字删去近半，上述这些话全不见了，却又加上原文所没有的「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公然伪造历史的铁证，以前未引起学界注意，连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也未发现。

1957 年 7 月 7 日，毛泽东沉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上海接见三十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壮着胆问毛泽东：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回答：「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这个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勇敢的旗手」的鲁迅，在 1957 年必然也会成为右派，并且还要坐牢！

三、毛泽东是怎样发动反右运动的？

这个问题，在 1977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找到基本答案。请听：

「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们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处贴标语，还不晓得他们想干什么。他们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

为了引蚂蚁出洞（以后改称「引蛇出洞」），毛泽东于 1956 年 4 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双百」）方针。一个月后，我还听到中宣部长陆定一向知识界的报告。他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我都信以为真，并深受鼓舞，以为中国的思想自由、学术繁荣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

可是毛泽东 1957 年 1 月的这篇讲话中，向党内高级干部泄露了天机：

「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

「百家」中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九十九家，原来都必须臣服于马克思主义的「统治」，这算什么「争鸣」？所谓争鸣，要不是滑稽双簧的闹剧，就是冒出洞来遭诛灭。

为了巧设诱敌深入的圈套，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历时四小时的讲话，给人一个假象：经历肃反运动后，靠工资生活的工作人员，都是自己人，可以享有人民的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鸣放。随后又召开了历时八天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召开了五次各界知识分子的座谈会，并对全体作了一次长篇讲话，反复重申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精神。最后提出共产党准备整风，恳切地希望党外人士提批评意见，即所谓「整风鸣放」。

3 月 17 日，毛泽东启程去杭州。路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时，他都召集当地干部讲话，交代鸣放政策的底细。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了显示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诚意」，毛泽东于 4 月 30 日又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抛出不少诱人的钓饵，如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但附和这一意见的人，40 天后统统被打成右派。

经毛泽东和全党组织「诚恳」的动员，并在「言者无罪」的保证下，鸣放开始了。党报天天整版刊载对共产党的批评意见。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向党内中层以上干部打招呼，通报 4 个月前向高级干部部署的计划，用一个障人耳目的题目〈事情正在起变化〉，说即将可以「聚而歼之」了。他自欺欺人地斥责「右派猖狂进攻」，并估计：「右派大约占 1%、3%、5%到 10%，依情况而不同。」

6 月 8 日，反右斗争终于出笼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假惺惺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这对于沉浸于由「双百」方针产生黄金时代的幻想之中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无法容忍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公开反对反右运动，于是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受全院批判的右派，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回老家当了二十年农民。

四、反右运动的恶果

反右运动，策划准备了五个月，正式演出了十个月。正式定为右派的 55 万人，占当时知识分子总数的 11%，超额完成了毛泽东估计的 10%的指标。实际上当时被

划为右派的大约比此数多一倍，只因为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的右派改称为「坏分子」或「地主」。

由于共产党的株连政策，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全家和所有亲属都连带遭殃。我的妻子就被开除党籍，控制使用；弟弟也被划为右派；一个哥哥被撤销公职；高中毕业的侄儿不准考大学。以此类推，反右运动受害者至少五百万。

为了处置右派，毛泽东创立了劳动教养制度，不经法律程序，可以随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无限期关押，并强迫劳动。大饥荒年代，各地劳教所都有人饿死。例如 1960 年甘肃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 2,400 名右派饿死了 1,300 人。

除了对右派及其亲属进行非人的精神摧残和人身摧残以外，反右运动另一个恶果是，摧毁了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道德准则，毒害了全国人民。精于权术诡计的毛泽东，用信誓旦旦的许诺和甜言蜜语引诱「鸣放」，即所谓引蛇（或蚂蚁）出洞，然后聚而歼之。他得意地称为「阳谋」，实际上是最卑鄙阴险的阴谋。他为自己的胜利而陶醉，得意忘形，毫无顾忌地兜出自己丑恶的暴君心态。他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甚至炫耀自己比秦始皇还凶残一百倍。不仅如此，他还公然挑战人类的良心，说什么对待资产阶级，良心还是少些好。这无异于供认，他策划的反右运动，就是昧着良心干的阴谋。在他的怂恿和威逼利诱下，背信弃义成为时尚，说假话受奖，说真话遭罪。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良心被鄙弃，人性遭践踏，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罕见的精神浩劫。

反右运动所导致的不讲诚信，好说假话、空话、大话的风气，造成随后「大跃进」中的神话：「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几十万斤的「卫星田」；「三年实现共产主义」。这类自欺欺人的谎言，「文革」中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因此可以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是反右运动的恶果。

五、关于二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

1986 年 11 月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的这个设想是方励之首先提出来的。他想与我、刘宾雁三人共同发起。1986 年 11 月 14 日方励之夫妇和刘宾雁来我家聚会，讨论此事。我与方、刘都有将近十年的交往。

至于钱伟长，刘宾雁并不熟悉，而我在 1953 年就认识，方励之对他也很熟悉。我们三人在讨论邀请名单时就有他的名字。参加会议的通知是我邮寄给他的。想

不到他出卖了我们。作为奖赏，邓小平赐给他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官位。

这里不妨顺便说明一下，1987 年 1 月随着胡耀邦被迫下台，方励之、刘宾雁都被开除党籍，我为何得以幸免。

1986 年 12 月，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认为是受了方励之的影响。12 月 30 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训话，严厉批评胡耀邦反对自由化和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反右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三人立即开除出党。赵紫阳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方、刘、王三人受公开批判时，官方都为各人印发了言论摘编。《刘宾雁言论摘编》中最后一篇竟是〈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全文。要刘宾雁对这个会负主要责任，实在冤枉。因为这件事是方励之创意的，通知也由他执笔；三人名字的排序又以我在先；而刘宾雁已在中途宣布退出。在邓小平宣布开除方、刘、王三人党籍后，还准备再开除十人，王震在中央党校宣布了。这十人中，我首当其冲。大概由于赵紫阳发了善心，我们得以暂时幸免。 （2007 年 5 月 11 日）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从 1957 到 2007　　　　邵燕祥

整整五十年前，1957 年《中国青年报》的新年社论，是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的点子：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历数 1927、1937、1947 中国历史的进程，直到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 1957，号召在中共「八大」路线指引下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篇社论对当时一心跟着共产党想要建设一个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青年读者，带来欢欣鼓舞的力量。

然而，不但数以千百万计的读者，而且社论的执笔者，连同创意者胡耀邦大

概都没有想到，在刚刚迎来的这一年，毛泽东以他后来自解的「阳谋」，实施了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策略大转变，清洗了大批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等各领域的所谓头面人物，兼及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至不问政治的其它平民，或撤职降级，或监督劳动，或收容「劳（动）教（养）」，以至在嗣后判刑加刑。「戴帽子」人数超过五六十万，涉及亲属面达数百万。当时的党内文件和公开宣传，还有后来若干年的历史教科书，都称这一次运动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获得了伟大胜利，云云。

早在 1947 年秋的内战中，中共转入反攻不久，毛泽东 11 月 30 日致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就曾提出「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也就是巩固列宁所指的「不与别人分享」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当时，该是出于某种实际的考虑，斯大林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非共产党，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不过，毛泽东终于在十年后的反右派斗争中，达到了把原先的民主党派彻底驯化的目的。

对于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反右派斗争其实也并非突如其来。1949 年后，一方面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所有场合强调和实行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再教育，配合对外的朝鲜战争（「抗美援朝」），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高校和各级机关团体学校，发动与「审干」相结合的「忠诚老实学习」（很像美国麦卡锡搞的「忠诚宣誓」），认定知识分子群在阶级出身、本人成份（经济）、学历职业（文化）、党派归属（政治）、社会关系（国内外亲友的家产和政治面目）种种原罪，做「包下来」以后的第一次筛选，也便于在追查、批判和组织处理后控制使用。不是呼唤「为国（国家，民族，社会）所用」的人才，而是招揽「为我（共产党和毛泽东）所用」的奴才(彭真 1958 年公然号召「做党的驯服工具是共产党员的最大志愿」，据说此语首发权属刘少奇；这实际上从对党内扩大为对全民的要求)，不肯驯服为奴的，即使贤才也不能用，至少不能重用，有机会就打下去。有些人才能够在夹缝中存活下来，并有所作为，是靠一些良知未泯、人性未泯乃至常识未泯的干部的保护，这些干部在历次运动中难免都蒙「右倾」之名，有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就也被打成右派，少数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而在 1957 年，则是在不断「反对右倾」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战果的。

中共有关决议认定毛泽东晚年的左倾路线乃自 1957 年始。当年确是他踌躇满

志之时。其实从 1953 年斯大林逝世，毛就大大加快了革命的步伐。他抛掉四年前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抛掉他曾信誓旦旦的关于要有一个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承诺，同年底就公布「（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到 1956 年初即已宣布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通过敲锣打鼓的「高级（农业合作）化」，把土改后农民所有的土地收归「公」有，把个体手工业者的作坊、担子收归「公」有，通过敲锣打鼓的「公私合营」，把工商业者的工厂企业收归「合营」，这样大规模的经济剥夺，不费一兵一卒，不战而胜，而被剥夺者的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家们不但像已打倒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一样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而且还到处发出一片感恩戴德的颂圣之声。于是，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阵地没有攻克，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盘踞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思想各界了。毛泽东把他们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他认为受其影响的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看作威胁其政权的敌对势力，是一旦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入侵时「里通外国」的内应，更是当前可能呼应「波匈事件」，利用国内党政干部的官僚主义等缺点错误「闹事」危及政权的主导力量。因此，必须防患于未然，「我们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为变被动为主动，一方面，要让党政干部「整风」，整掉一些容易授人以柄的缺点错误，增长执政和应变能力，就不怕工农群众「打扁担」，更不怕「秀才造反」；另一方面，则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中，欲抑先扬，利用知识分子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误读，突出号召「鸣」「放」，「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箭双雕乃至一石三鸟之计：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锻炼基层干部党员，一也；如果矛头向上，哪怕指向高层，也可敲打他的同僚（后来针对毛本人的意见出来，这才打住，并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言），二也；而在「鸣放」期间，鼓动群众「畅所欲言」，以期把隐患引发出来，造成分隔在不同单位的「小匈牙利事件」，各个击破，三也。毛泽东运筹帷幄，重点在第三的这一预防性战役大获全胜，促成这一局面的，自然也有前两项中的各级干部，他们乐得因势利导，让上了钩提意见的群众承担全部灾难性后果。这一次毛泽东「发动群众」推翻了他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所谓的章罗同盟实指民主同盟），而未竟之功就有待于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了。

这一套形同诱捕的战略战术，在毛泽东是驾轻就熟的。1940 年代在延安「整

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当中，就这么干过。而制造恐怖气氛，利用群众的恐惧和从众心理，围剿猎物，则在 1955 年的反胡风和「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一再试验成功。于是在 1957 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中，便以空前的规模，上自全国人大和政协会场，下至穷乡僻壤的民办小学，都以「群众运动」方式「揪」出右派分子来。而所有这些施为，其前提都是「不受法律的约束」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且不说当时几乎无法可依),「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以党治国原则（对基层党组织或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党，基层有权处置)，到处可见以批判斗争会甚至是「帮助会」形式出现的「私设公堂」,「逼，供，信」成为通例,「隔离反省」，勒令「检查交代」，则是以办公室或宿舍替代公检法部门的看守所、预审处了。

到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时，全党全国已经形成一套对知识分子进行集体迫害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机制。一年多前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改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处境和工作生活条件做出某些许诺，其后也有部分付诸实现，但不到一年后就遭到毛泽东指责，说对知识分子不敢讲改造了，就是说「右」了。周恩来和决策层中有识之士包括一些高级将帅，看待知识分子，也是从使人尽其才用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点出发，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干部也许还不无惺惺相惜之意，但他们不能违拗毛的意志。于是出现了全党动员对付知识分子的局面，不但反右派斗争后期后不得按过去运动常规搞一下「甄别」，而且在处理右派分子时猛下狠手，首用「戴帽子」办法加强政治定位、人身管制和精神威慑，并发明「劳动教养」新规，将半数左右的落难者等同刑事犯一般监禁劳改，许多人因此家破人亡。

毛泽东在一派得胜还朝的气氛中，「乘风破浪」，把这一大兵团作战的群众运动方式施之于经济生产生活领域，发动破坏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大跃进」包括所谓大炼钢铁，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公共食堂化，造成全国普遍的大饥荒和生活资料严重匮乏，导致两三千万至三四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在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资料情况下的保守估计）。

1962 年初中共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一次承担责任的简单表态，随后在同年夏秋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以重提阶级斗争的「基本路线」发动反击，为三四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伏线铺垫，就不必多说了。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在此前后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文革结束后，有过力求取信于民，争取民族和解的意愿，虽然这在决策意识中更多地是为了重新取得执政合法性基础，但并不排除许多经过文革灾难有所反省的干部，突破了这一狭隘功利性的边界，为恢复历史的真相，并在实践中追求并检验真理的天真愿望。胡耀邦就属于这样的领导人之一。他在那一代觉悟到历史不可欺、人民不可欺的共产党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对于他们来说，我是后来者。同样经历了 1949 年后的历次运动，论觉悟我也是「后觉者」。我在 1982 年初的一篇《代自传》中，才写了这样一段话：

「谈到二十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于个人的遭遇，而不扪心自问：对于当时已肇其端的，不仅给首当其冲的几十万『右派分子』，而且给五百万知识分子、亿万劳动群众、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一九五七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我就没有一份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这篇东西在《文学报》发表的当时，就有人向我直率指出，谁要你承担这份责任？你承担得起吗？一个普通党员，又沦于右派深渊的边缘，不用说你不了解必要的信息，也没有必要的觉悟，就是你想建言，谁听你的？在党内没有民主的情况下，你若真有所见，发为议论，那不是更要增添你的右派罪行吗？你承担哪家的责任！是不是把自己放到一个不适当的位置上了？

这无异一瓢理性的冷水。然而，我没有听到谁应该承担历史责任，耳边只有所谓「反右派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老生常谈，文革也渐成讳莫如深的禁区。一直到世纪末，杨宪益夫人、英籍翻译家戴乃迭逝世时，杨宪益之妹杨敏如教授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到了戴乃迭文革期间的牢狱之灾和丧子之痛，最后说了一句话：「我要替我的国家向你说一声『对不起』!」看到这里我忍不住两行老泪。这句话是应该由杨敏如来说的吗？我虽也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到冲击，但我是不幸中的幸者，比起已死的人，我活了下来，比起破家的人，我尚有枝可依，我能不能代替一直不做声的中国共产党，向所有 1949 年后的无辜死难者说一声「对不起」!？但我深知，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授权，让我来履行这一个道歉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我这不又是没有「摆好自己位置」的严重越权吗？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默默地向自己的良心念叨，然而，对于受迫害的死者和他们的

亲人后代，这有什么意义？我一个个体的再深重的负疚之情，与一个以千百万人的名义行使生杀予夺之权的群体应有的历史忏悔比起来，又有多大的份量？

前不久报导了北京法院的一个判例，即某富人雇凶杀人已处死刑。他生前欠款数百万元的债务，经债权人起诉其遗属后，法院判决，既然死刑犯的妻子和儿子继承了他的遗产，依法就应该继承他的「遗债」，其生前所欠由他的遗产继承者偿还。在这里，情理法也是统一的。

根据这一常识以下的原则，其普遍的适用性不言而喻。国民党在 1947 年在台湾制造了「二・二八」事件，欠下台湾人民一笔血债。半个世纪之后，台湾当局为那次事件有关的死难者平反昭雪，发放了抚恤金。已经在野的国民党负责人马英九也向死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和道歉。这表明了台湾政权的延续性，其执事者在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面前的明智选择，至少他们懂得如鲁迅所说「背上的死尸」有多么沉，更不愿再为千古骂名的前人背黑锅，且避免以赖账者的形象面世，总之这是应该得到肯定评价的。

这是海峡那边的事情。在海峡这边，如上所述，即以毛泽东当政的 1949 至 1976 这个时段来说，对中国人民首先是大陆人民也欠了债，数额的大小和时限的长短都是不容忽视的。

刘少奇是为毛泽东树立个人权威，推行极左路线的得力助手之一。但到了 1962 年初，面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饿死成千万人的惨酷局面，他开始惧怕历史的谴责，对毛说：「饿死人是要上书的。」而毛则行若无事，他说「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刘少奇并因这一碰撞而失宠。

毛泽东在回顾平生时，把他亲自发动的文革，跟夺取全国政权并列为自己的不朽贡献。他在反右派前后著作和讲话的文字定稿，大部都已收入《毛选》第五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有关言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组成部分。时至今日，这都有待历史的检验和评判。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中共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这里，长期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宣布「彻底否定文革」之后，「为尊者讳」，文革以至反右派等历史事件，全都变成所谓敏感问题不许重提了。据说新闻出版方面的禁令三令五申，连文化学术界提出「如果鲁迅活着」的话题，都被有关部门指为挑拨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巴金建立

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不但在九十年代的巴金书中开了天窗，到新世纪巴金身后的悼念文字里，依然遭到删除和封杀。可见，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包括文革时期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歪曲历史的思路和操作经验，是何等积重难返。

这就是说，曾经对人民欠债的历史，连同当时的若干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绝如缕地影响到今天。这里固然有人的意志的因素，但不能不看到体制一经由一代以至两代人确立以后，它就会在惯性的轨道上运行不止，直到渗透于体制中人的思想、感情、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

就如毛泽东，他以申、韩为师，至少是在权术层面取法历代帝王，于现代则以《联共党史》为必读教材，承认自己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他不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要在专政架构下做他自称「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自己在 1950 年的「五·一」口号中添加了「毛泽东万岁」，他欣然接受胡乔木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三个定语歌颂中国共产党，因为歌颂党就是歌颂他。由于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机制，他自命绝对正确，一贯正确，谁有一点疑似不同意见的表示，谁就是反对他。他甚至不能容忍多年战友的苦苦「诤谏」。这还侈谈什么党内民主，更谈什么人民民主？他不可能实行他所号召的「自我批评」，他怎么可能承认自己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他一意孤行，不让人讲话，听不得批评，更绝不认错。因此只能用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让别人甚至是批评他的人去作他的错误的替罪羊。他只能在积欠人民的旧债上加上新债，而他从不会有任何欠债感。他在饿殍满地的大饥荒时没有欠债感，他在全国大折腾民不聊生时没有欠债感，相反的，他认定自己是革命的代表和真理的化身，领导全国「从胜利走向胜利」，执政后又给亿万人民恩赐了「莺歌燕舞」，理应接受全民的膜拜。「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党内党外，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他是唯一的核心，至尊至上。

今年，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周年。有不少反右的受害者，提出索赔的要求。据说他们写给各级党委政府乃至中共中央的信函没有得到答复，这是本来可以预见的。所谓索赔，主要指当年扣发的工资，还有「改正」后安排不当以致晚年生活困难等。有的已成燃眉之急，按说都是应该及时解决的。但为什么说一时不会有象样的结果呢？因为这一索赔看似经济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需要偿还的是经济债，更是政治债。而毛泽东时代以来，众所周知的政治债，决不限于「反右」一案，在这之前，在这之后，积欠太多太多。现在的问题所在，不系于国库的支

付能力，而系于当局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历史上的负面经验，如何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由此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一是绕不开，躲不过，二是事不宜迟，早搞比晚搞代价小）达到清醒的共识，才谈得到实事求是地负责任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与平反冤假错案，好不容易发轫的对历史的再认识，从上而下又从下而上，使人们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这一努力不幸中断，如今要重新启动，却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了。如在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出版重版重印过的《庐山会议真相》（李锐着），据闻在新世纪竟登上了禁印的书目，一本书的遭遇传达了不止是一本书的信息。历次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受害者都不能违抗自然规律而必然老去，但历史债会因当事人和见证人的逐渐消逝而一笔钩销么？

如果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与时俱进，那就不可能有历史的进步。由于种种局限而不能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维和实践，那就不但不能清理旧债，搞不好还要欠下新债。从 1980 年邓小平做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许诺，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一而再地失去机遇，一而再地推迟延期，应该看到，历史留下的时限已经不多了。(2007 年 1 月 1 日)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杜光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年了。作为曾经经历那个胆战心惊的岁月，最终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者，我对这个运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二十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获得了批判这个违法运动的权利，也背负着总结这个惨痛教训的义务。特别是当我想起那些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里被过度劳动和饥饿夺去了生命的成千上万不幸难友时，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们这些有幸生存下来的人，有责任承受着他们的嘱托，在为他们讨回公道的同时，对这个剥夺了他们和我们的青春和壮志的罪恶行径，作出应有的评判和谴责。为了历史的公正，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

民族的前途，为了安慰殉难者的在天之灵，我们应当从这场劫难中提取应有的教训，把这场深重的灾难转化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在这个号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们却无法对反右运动进行正常的必要的反思和评论。我们不得不面对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不许开会、不许发表文章的禁令，以致广大民众不能从广泛深入的反思和讨论中获取有价值的教益。这种违反民众要求、违背民族利益、违宪违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责任来批判与总结反右运动。本文拟从民主革命的角度，对反右运动做一些简略的回顾与透视。

（一）

要对反右运动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把反右运动和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呼求不断突破封建专制主义，并且不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摧残的历史。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展现出一条民主与专制的矛盾与消长的曲线。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相比，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现代的民主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只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在两者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主义经常处于劣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里，这个迹象尤其明显。

中国共产党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一直标榜新民主主义，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1949 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在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依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各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具有合法的地位。在政治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政府机构里，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占有了相当的比例：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里，有三位非党人士；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有两位非党人士；十六位政务委员中，有九位非党人士；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和两位副院长中的一位副院长，都是非党人士；最高人民检察署的两位副署长中，也有一位非党人士；在政务院的二十二个部里，有十个部的正部长是非党人士。这是比较符合

于当时的现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格局。2

但是，中国的民主主义社会建立才不过四年，毛泽东便在 1953 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里宣布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在按照这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改组的政府机构里，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都清一色由共产党员担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反胡风等等方式，树立起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政治报告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3 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

这一发展完全离开了毛泽东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违背了他向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毛泽东在 1945 年曾经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4 他在同年 9 月 27 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5 可是，1953 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却把这个承诺完全弃之不顾。

通过这一系列变革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经济上垄断生产数据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四垄断」的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却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切特征。看来，通过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国，不是从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而是从民主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中国进入了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

经过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经不复存在，这个阶级留在政府机构里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为了点缀过于单调的一党专政而设置的摆设。工人阶级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由于没有生产数据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权为共产党所垄断，甚至它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也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后两位领导人李立三和赖若愚，都是因为强调工会的独立性而被免职的。至于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农民阶级，他们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只欢喜了两三年，便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由于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他们连处置粮食的自由权利都丧失了。农民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表示抗争，但无力回天，到 1956 年底，全国农村入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 96.3%。6 农民阶级正在沿着初级社、高级社（后来还有公社化）的道路，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沦落成为雇农（公社化后则成为农奴）。

这样，中国社会在反右运动以前的阶级图谱上，占有显著位置的就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了。

一个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代表着社会的民主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因而就成了传播民主思想和兴办实业的先锋。在解放战争时期，在贪贿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鼓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共产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这是很合乎情理的。建国之初，尽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调整、镇反肃反等措施，曾经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自我尊严和文明理念；一系列批判运动，从批《武训传》到批俞平伯，更是挫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赖。但是，他们的多数仍然相信并且希望党和政府会选择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对民主自由的前途还是满怀期待。这就使他们同那个强大的统治集团及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因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以专制特权和高度垄断为特征的新专制主义制度。如果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话，那么，民主自由都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求民主自由，绝不会构成对现有制度的威胁。封建专制

制度则不然，民主自由本来就是反封建反专制的利器，它同专制制度的互不相容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新专制制度一旦确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怀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阶层处于对立的地位。

另一个阶级或阶层是占据统治地位、并且体现着封建专制力量的强势集团，它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占有了几乎是所有的社会资源，领导着强大的军队，还拥有雄厚的意识形态储备。它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民主自由相标榜相号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后，却不等这个制度完善巩固便急急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历史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必然会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为了维护这个被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体制，他们警惕地注视着知识分子的动向。因为这个既承袭了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阶层，是当时唯一有能量有条件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社会力量。只有迫使这个阶层完全臣服于自己，才能巩固、完善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和扩大作为这个制度体现者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即铲除了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完成了经济领域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很需要继之以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即铲除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完成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化极权化。

由此可见，在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完成经济基础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这两大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已经势不可免。一个要求民主自由，一个执意加强专制统治，使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成为继续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由于实力悬殊，加上专制集团早就布阵以待，而知识分子却堕入圈套而不自知。这场冲突的胜负，在开始发生以前，就已经判然分明了。

知识分子必须独力面对专制制度的格局，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到了九十年代，社会孕育了中产阶层之后，才出现了改变这种格局的前景。

（三）

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促成了两个社会力量的对决。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又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根据薄一波的判断，「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7 国内情况也很值得注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8 在这些国内外政治地震的震波冲击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对于这个包藏祸心的方针和理论，善良的人民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向，认真地学习讨论，构想着文化繁荣和政治宽松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欢欣鼓舞地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一个春暖花开的解冻时期，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寻民主自由的触角。锺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现行制度的专制本质，或呼唤着民主自由。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则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施放的政治气球。这篇文章在对知识分子的前景表示了谨慎的乐观的同时，还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心态：「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9 但总的说来，在国内外新形势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力量虽然还是顾虑重重，却已经蓄势待发；而处心积虑要打击、压服知识分子的统治者，也早已谋划布局，张网以待。需要的是一个足以引起变化的触媒。这个触媒就是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即由《人民日报》在5月1日公布于众。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报刊媒体、大会小会，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要求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这才出现了大鸣大放和所谓「右派进攻」的局

面。

这次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却是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使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行动，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的机制，还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执政的权力机构一出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或主观主义，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而在强化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便得以畅行无阻。它们的政治基础就是专制制度。因此，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势必触及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在 6 月初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愈反愈多。」10 这是很中肯的分析。因此，这个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提出整风的原由是因为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因而影响了新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巩固；但彻底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却又必须革除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体制。正是这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使帮助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它最终难以避免由整风转为反右的结局。

对于这个整风运动，有人认为是引蛇出洞的诱饵，因为毛泽东在发布整风指示的三个月以前，就说过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1 这一类话，明显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共产党真的是要整风的可能。因为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 15 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2 但是，我宁愿相信前一种看法。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整风，目的在于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就像延安整风是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确立他个人的绝对权威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整风，则是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响他的专制统治的「消极因素」，巩固一党专政，巩固他的个人独裁。但这个问题一旦提出，势必激起对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的批判，而这是他难以容忍的。所以，整风实际上只是开了一个头，有些地区和单位

甚至还没有开始便转入反右派了。而在反右运动结束后，整风运动也就不了了之，最多只是走走过场，草草收兵。所谓的整风运动，不但欺骗了知识分子，而且也耍弄了广大党员。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更正确地说，是促进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整风运动既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也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说它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是因为许多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经过再三动员才提出来的。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到会的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及刘少奇、朱德等人。会上毛泽东向党外人士说明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13 在毛泽东亲自示范的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奉命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动员与会者大胆发言，帮助党整风。中共中央统战部在 5 月初到 6 月初的一个月里，连续召开了 38 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13 次，有 70 余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25 次，发言者有 108 人。14 由于建国以来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三大改造等运动中都曾因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作祟而使许多人受到伤害，不但这些人自己有一肚子冤气，甚至连他们的亲属好友也为之不平。所以，在连续的动员鼓励之下，许多座谈会开得热烈而紧张。人们在会上倾诉了自己或亲友的委屈，揭露了某些单位滥用权力、迫害无辜的违法行径，还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类似失误的建议。这些发言既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也表现了对执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问题之多，范围之广，不但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没有整风运动和「帮助党整风」的大发动，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整风完全是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是毛泽东亲自设计、亲自指挥的一场歼灭知识分子的大战。这一点将在下面另作探讨。

（四）

对于大多数「右派分子」来说，被卷进这场民主运动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自觉地、有意识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专制政体的言论较少。在后来被划为右派

分子的知识分子中，比较自觉地主张改革政治体制，倡导民主自由的只有两个群体：一是感知自己的政治力量，因而敢于冲击专制政体的民主党派；二是意识到自己投身于一场民主运动，因而公然宣扬民主自由、批判现行体制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期间最为活跃的群体，构成了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他在 6 月 10 日起草的《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里，就指出：「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15 因此，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群体。

在几个民主党派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它的成员多为教授、专家一类的大知识分子，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很深，看不惯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所以，他们在鸣放期间提出的意见，往往涉及专制政体的本质，而为毛泽东所无法容忍。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由曾昭抡等起草、后来被批为「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都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尝试。至于章伯钧在 6 月 6 日召开的民盟 6 教授会议，主要只是对鸣放的形势作了一些分析，认为民主党派应该在这次运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毛泽东却作出了完全不同的估计。他在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形容他们「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16 这与其说是章伯钧的估计，不如说是毛泽东强加于他的估计。在同一篇社论里，毛泽东还指责「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说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的一些人「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17 毛泽东如此荒唐地把民盟的改革建言歪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危言耸听，就是为了挑起人民群众对民主党派的不满，借此彻底清除以民盟为据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威胁，消解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宣传。这一手狠毒

的招式果然十分有效。不但民盟从此一蹶不振，其它民主党派、甚至整体知识分子阶层都俯首帖耳，噤若寒蝉，再也无人敢于鼓吹民主自由，对专制体制说三道四，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

青年学生是另一个意识到自己投身于民主运动的社会群体，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北大学生，从 5 月 19 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很快便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他们不无理由地把 5 月 19 日开始的二十多天的「四大」热潮，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钱理群在《面对血写的文字：初读林昭》里指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突出地展现了五十年前的那一场为「反右运动」所淹没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特质。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数以千计，内容遍及当时人们关心的有关国内国际的所有问题。其中既有感性的热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静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题，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呼求。5 月 19 日最先出现的是一张大幅标语，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接着是一张要求设置「民主园地」的小字报和沈泽宜、张元勋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这首长诗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长诗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到第二天，张贴的大字报已有一百六十多张。在运动日益高涨的这些日子里，民主自由是最强烈的呼声。有的大字报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刘奇第）中文系王国乡在大字报里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18 生物系蒋兴仁则认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19 学生自办的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并表示期待着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物理系女生燕遯符在大字报〈怎么办？〉里，一开篇便宣告：作为五四的继承人，光荣的北大学生「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

理的旗帜战斗。」她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上、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谭天荣在他的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20 体现了运动的最强音。

很多大字报在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都明确地指出：不民主的制度是产生「三害」的根源。物理系岑超南的大字报说：「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要真正整风，首先要把不民主的制度一扫空！」叶于泩也说：「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产生的温床。」21 蒋兴仁更是直指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22

在这些呼唤民主自由的大字报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国乡和燕遯符的大字报里分别提到「斗争」和「战斗」这样的字眼，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这场从「帮助党整风」出发的群众运动，已经超出一般的提出批评建议的范围，而成了一场为民主自由而战的斗争。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大字报像《广场》发刊词那样，把民主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争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只是一个虚幻的招牌，它掩盖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而民主自由，却是反封建反专制的武器。争取民主自由的口号不可能针对社会主义，只能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北大学生的「五·一九民主运动」的主题和主流的反封建反专制的特征，足以表明它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不但北大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体现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而且全国被鼓励和推动起来的帮助党整风提出的批评建议，一般也都带有民主主义色彩。从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镇反、统购统销、工业化、合作化、反胡风，到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人事制度、统战政策、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等等各种问题的批判，无不牵涉到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当然，就五十余万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的主流来说，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提出的批评建议，无一不是希望共产党正视当政以来的种种错误，希望在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专制体制以极权独裁为特征，它容不得任何力量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所以，在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下出现的那些批评建议，都被视为对执政党的权威的藐视，和对专制制度的侵害。它并不反党，却企图削弱一党专政的专制体制；它不反对社会主义，因

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它反对的只是假社会主义之名而行专制主义之实的社会制度。这就使大鸣大放、「右派进攻」带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性质，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是中国人民对经由「社会主义改造」而建立起来的专制制度的第一波冲击。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号令，一时风云变色。报刊上随之出现了大量对那些善意批评建议的挞伐。直到 10 月中旬，毛泽东认为已经到了可以收网的时候了，于是由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个文件所提出的六条标准，几乎涵盖了政治生活的全部领域。只要你对这些问题有所不满，有所反应，都可以从这六条中找出相应的条款，把你划成右派分子。

（五）

作为新专制体制确立后的第一波民主革命高潮，五十年前的「右派进攻」具有一个最为独特的历史现象：民主力量面对的是一个「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专制暴君。他仗恃着高度集权的政党和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从诱使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始，通过整风运动，一步一步地把知识分子推向鸣放的高潮，然后「聚而歼之」，把足以威胁专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场专制统治者为了扑灭民主革命而有意挑动起来的民主革命。这个奇特的历史记录，构成了五十年前的那一次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特征。

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讲话和他所写的文件、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起意设局、一手操控这场群众运动的。从设置圈套和陷阱，到疯狂反扑，严厉处治，每一步都表现出他的阴险狠毒的用心。

在 1957 年 1 月里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先后作了两次讲话。在 1 月 18 日的讲话里，他说：一些教授有各种怪议论，「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他并且别有用心地点拨：他们现在出来，「是不是想复辟？」他把人们鸣放要求民主，比喻为「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主张让那些要大民主的「坏人」「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暴露和孤立他们自己。」在 1 月 27 日的讲话里，他告诫与会的领导人：「对民主人士，我

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23 这两次讲话，赤裸裸地表现出毛泽东的用心歹毒的图谋。它充分说明，反右运动不是先有右派进攻，他们才起而反击，而是早就设下圈套，诱使知识分子自投罗网。

5 月 4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要各地党组织「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24

5 月 15 日，他为党内干部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25

5 月 16 日，他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示各地党组织对「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26

6 月 6 日，他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要各地「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27

6 月 7 日，他从报上发现了一个反击右派的借口。据吴冷西回忆：「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毛泽东告诉吴冷西，要抓住这个机会，「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他连社论的题目都想好了：〈这是为什么？〉28

6 月 8 日，在《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的同一天，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提出「注意各民主党派中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要组织每个党派自己开座谈会」。「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29

6 月 10 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他指出：北京已经开始反击右派，「各地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开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30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导。」「其它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31

6 月 29 日，他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增加了北京「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 400 人左右，全国大约有 4000 人左右」等内容。32

7 月 1 日，他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民盟。除前面引述的指责民盟「反共反社会主义」，「呼风唤雨，推涛作浪」等内容外，还点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他在这篇社论里还给右派下了明确的定义:「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33

7 月 9 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内容有二：1、「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应当增加在报上批判的人数；2、北京的社会科学家已经向右派举行反攻，各地应当回应，在自然科学家中也应组织反击。34

7 月 9 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继续鼓吹「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给右派一点小鞋穿是必要的」。35

7 月 17—21 日，26—30 日，毛泽东在青岛先后两次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写出《1957 年夏季的形势》，经过 11 次修改，于 8 月 3 日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文章一开头就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强调反右运动「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说:「单有 1956 年在经济

战线上（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36

8 月 1 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除了还要增加登报批判的人数等内容外，特别提出：「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37

9 月 12 日、15 日，先后审阅修改《人民日报》的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和〈这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38

在 10 月 9 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上，13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都大谈反右派的政策和策略。39

从这个日程可以看出，反右运动这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镇压知识分子的政治大迫害，完全是毛泽东一手策划、直接牵引着的。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对民主与法制的蔑视，在这个政治运动中得到充分的演练。他是推动反右运动、镇压民主革命的罪魁祸首。这个大独裁者为了剷除民主力量，竟调动了他所掌控的全部政治资源，挑起了一场民主革命的高潮，把全国人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最终扑灭了这场民主革命。这是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的最大特色。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像这样的历史现象，过去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六）

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考察，民主革命所必须面对的，毕竟不是个人，而是违背理性、违反人道的专制制度。在反右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专制主义特征，并不因反右运动的结束而终止，它一直延续到五十年后的今天。因此，探讨反右期间的专制主义特点，对于正确认识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任务，仍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反右运动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以党代法。整个反右过程，都是通过党内文件来推进的。1954 年 9 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心目中，仿佛根本就不存在。在那部由共产党主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第八十七条里，明明白白地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40 可

是，宪法通过还不到三年，就遭到共产党自己的粗暴践踏。凡是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的公民，无不遭到没顶之灾。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我国古代，法律是用来管治百姓、维护统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工具。从《尚书·尧典》记载的「象以典刑」，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无不如此。西方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倡导自由，宏扬个性，珍视人权，保护私有财产。与此相应的法律，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主旨。我国早年仿效西方，制定宪法，从 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始，就已经初具现代宪法的规模。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一方面继承了民国以来的宪法的民主传统，同时又学习苏联，以序言的方式，规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并且把一些没有明确内涵，理论上模糊不清，因而可以随便解释、任意利用的概念，如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等写入宪法。这就使现行宪法带有两面性：既有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文，也有巩固专制制度的内容。长期以来，执政者往往以后者来否定前者，或者干脆撇开宪法和法律，用党内文件来宣布政策，推进运动。反右运动就是这样做的。

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是民主主义的核心与灵魂，从中国民主革命的萌芽时期开始，就是宪法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早在 1908 年即光绪 34 年 8 月初一颁发的《宪法大纲》，就列有「臣民于法律范围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中华民国成立后，历次宪法都有类似条文。如 1911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 1914 年的《中华民国约法》都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1913 年的《天坛宪法草案》和 1923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是：「中华民国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刊行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集会、结社的自由则另立一条。1931 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和 1934 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提法分别是「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是另立一条。41195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条文，正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宪政原则的继承。没有这一条，宪法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以违宪违法的党内文件来指导运动，正是对人民自由权利的公然蹂躏。这是以党代法、以党治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另一个特征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这是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一贯手法。在

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从秦始皇借口「为妖言以乱黔首」，坑埋四百余名儒生 42，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可谓史不绝书。但 1949 年以后却有了新的特色。那就是「以革命的名义」，而革命又是一个看似明确、实际上非常模糊的概念。所谓「反人民」、「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都没有确定性的内涵，但凭统治者的好恶，便可以随心所欲地给人定罪作结论。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里，没有一条具有明确的量和质的标准。结果，凡是对三反五反、院系调整、合作化、工商业合营、统购统销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或是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都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对思想改造、肃反镇反、反胡风、批判胡适俞平伯及人事制度、干部政策有看法的，则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至于主张教授治校、党委退出学校，坚持司法独立、无罪推定，以至批评各级党组织领导人、包括基层党支部书记的，都被加上反对党的领导的罪名；有些人提出党和群众有距离，某些党员脱离群众，盛气凌人，群众对党员敬而远之，或认为农民生活苦，城乡生活有差距，那就成了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破坏团结；还有就是对「一面倒」的政策略有微词，或对 1945 年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拆运机器表示不满，或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那就是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分裂；如果有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国是，发发牢骚，或商量怎样写大字报，最后往往就成为反革命小集团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以言定罪、以文定罪，当然不是从反右运动开始的，它是战争时期党领导一切的传统遗存的发展和扩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次运动都有许多因言或因文获罪的实例。反右运动期间，在座谈会或学习会上的发言，和发表出来的文章、小说，既是批判专制主义、宣扬民主自由的主要形式，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也是很多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打入社会最底层的主要依据。文化大革命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文网渐宽，加上有胡耀邦、赵紫阳这样一些具有民主意识的人当政，使八十年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为自由宽松的年代，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大发扬的年代。但由于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民主自由的观念仍然遭到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不时还有「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类帽子飞来。1989 年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后，一方面是专制主义的统治日益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的民主主义潜流也在不断积聚。近几年来，文网更密，网站、报刊被封闭，书籍、文章遭查禁的消息，时有所闻。

是以言定罪、以文定罪，还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依然是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矛盾和斗争的焦点。

以党代法、以文定罪，都是专制主义制度在反右运动中展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是镇压民主革命的主要手段。在总结反右运动的教训的时候，毫无疑问，依法治国、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都应当成为现阶段继续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

（七）

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力量同新专制主义政权的第一次对决。它采取了反右运动的形式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但两种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则属不可避免。1953 年，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张揭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放弃了继续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采取了反对以至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方针。而就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来说，放弃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消灭还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只能向封建专制主义倒退，这个倒退过程，即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过程，首先是在经济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在此之后，必然要在政治上镇压足以威胁专制政权的社会力量，剥夺他们宣传民主自由的权利和条件。反右运动就是从政治上巩固专制制度、扑灭对抗势力的具体形式。毛泽东 1957 年 11 月 7 日在莫斯科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曾得意洋洋地说：「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认为是在 1956 年，我看实际上是在 1957 年。1956 年改变了所有制，这是比较容易的。1957 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43 他在这里坦露心迹，认为反右运动比改变所有制的「三大改造」还艰巨，还重要。因为他深知，对付知识分子要比对付资本家和农民困难得多。只有彻底压服知识分子，扑灭在中国宣传和实行民主自由的条件，他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新专制主义制度才能江山永固。果然，反右运动之后，知识分子成了惊弓之鸟，噤若寒蝉。毛泽东这才转而对付党内威胁他的独裁统治的力量，于是便有了庐山会议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逝世和粉碎四人帮，为中国民主革命带来转机。首先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突破人民公社的农奴制，实行包产到户。这种从求生本能出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行动，为改革打开了大门，为民主革命的继续开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从小岗村发轫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国家对生产数据所有制的垄断；民有

经济和个体经济有如雨后春笋，沛然丛生，动摇了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成为继续民主革命的重要形式。但是，占据着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却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正是依靠着政治的特权，他们才得以借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捞取不法不义之财。这样，民主革命就不得不面临双重的改革任务：经济上继续向垄断领域进军，把垄断企业推入市场，根除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大力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理念，促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民主革命——改革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使中国能更快地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二十多年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西单墙等民主论坛，《苦恋》及其它「伤痕文学」，1986 年的学生民主运动，《河殇》，1989 年天安门的民主高潮，都是民主革命力求突破新专制主义的尝试。统治者则利用了文武两手——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坦克机枪，进行了无理的批判和残酷的镇压。

五十年前由知识分子掀起的民主运动，被反右运动所摧毁，造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达二十年的沉寂。由粉碎「四人帮」带来民主运动的十年高涨，被血洗长街的野蛮暴行所镇压，到现在已经十八年了。我们略加对比就可以发现，反右运动彻底压制了人民的民主要求，民主革命销声匿迹达二十年之久；而八九镇压不过十多年，便出现了民主革命的新形势：一方面，经济领域的民主革命——经济体制改革仍在继续，全球化现代化的洪流不可阻挡地把中国推向民主革命；另一方面，人们在思想意识领域打破了个人迷信的禁锢，有可能进行独立的自由的思考，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条件。这种状况，同反右运动后的那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没有理由悲观。

目前，中国的民主革命正面临着文化上反封建、政治上反专制、经济上反垄断的严重任务。在一百多年民主革命的历史中，最惨痛的教训，无过于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封建主义的忽视。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斗争的目标放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上，却没有把反封建的任务提上日程。后来提出了反封建，只把它看作是政治上打倒国民党专制政权，经济上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却放松了对文化意识形态的封建主义的警惕和斗争。结果在取得政权不过几年之后，便出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导致几千万人死于非命，社会道德大滑坡。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经济迅速发展而政治专制极权，文化畸形繁荣而了无创新。这一切都是专制主义复辟的恶果。只有把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进

行到底，中华民族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我国现阶段的民主革命主要依托三种具体形式：改革，维权运动，启蒙运动。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地突破垄断领域，民有经济开始艰难地曲折地向垄断领域进军。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特别是加强监督机制，开放舆论监督，推行政治民主，转换政府职能等，已经成了公众关心的普遍呼声和热门议题。由占地、拆迁、下岗等引起的维权运动，由于一些律师和公众人物的介入，正在由感性向理性发展，成为合情合理合法、有理有利有节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新形式。至于启蒙运动，虽然新闻检查制度空前严酷，舆论导向挖空心思地进行控制，但由于互联网的发达，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迅速而广泛，从而创造出民主启蒙的空前未有的大好条件。传播历史和现状的事实真相，各抒己见地探讨真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将有力地促进民主革命的开展。

简短的结语

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精神和意义，上承五四运动和 1949 年取得初步胜利的民主革命，下接八十年代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动的高涨，甚至可以延续到现阶段已初现端倪的民主革命高潮。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是要继续和发扬、发展五十年前争取自由民主、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当然，由于专制势力的强大，民主革命的发展将是十分困难、十分曲折的，我们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我们是历史主义者，深信历史将按照它自己的规律阔步前进，民主革命必将在中国彻底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我们有理由深信不疑。(2007 年 4 月 11 日完稿，5 月 19 日改定。)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48 页、1076 页，人民出版社 1953 年 2 月直排版。

2 见于《人民政协文件》，新华书店 1950 年 7 月发行。

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年 6 月)

第 14 页。

4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3 页。

5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 27 页。

6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第 258、265、279 页。

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631 页、575 页。

8 同上，第 569 页。

9 1957 年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

10 1957 年 6 月 8 日〈光明日报〉。

11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8、334、335 页。

12 同上，第 327 页。

13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 117 页。

14 同上，第 130 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503 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7 页。

17 同上，第 435 页。

18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 95、119、150 页。

19 《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 年 8 月）第 175 页。

20 《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第 20、263、264、52 页。

21 同上，第 209 页、142 页。

22 《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 年 8 月）第 108 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3、334、337、355 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456 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24-425 页。

2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478 页。

27 同上，第 491 页、492 页。
28 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第 39、40 页。
29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1 页、432 页。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502 页、503 页。
31 同上，第 508 页。
32 同上，第 528 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5 页、438 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537-538 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51 页。
36 同上，第 456、461 页。
3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557 页。
38 同上，第 576 页、579 页。
39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66-468、480-493 页。
40 戴学正等《中外宪法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第 29 页。
41 同上，第 103、107、121、112、129、144、151 页。
42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 1 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 258 页。
4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651 页。

审视反右五十年　　　郭罗基

从 1957 年往前看五十年，1907 年的事似乎非常遥远。从现在往前看五十年，1957 年的事，似乎并不遥远，因为从那时到现在，茫茫世事一线牵。

1957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大悲剧，那就是共产党发动的整风运动转向了反右运动，当时作为「右派分子」遭到政治上打击的直接受害

者达五十五万多人；株连所及，超过百万。更为严重的是事后，从此中国历史走入歧路，祸害众生数十年。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前事之果、后事之因。

1957年的大悲剧的发生，是以1953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原因；向社会主义过渡又是以1949年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为原因。1957年的大悲剧的收场，引出1958年的大跃进为结果；大跃进的失败，又引出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为结果。因果的链条一环扣一环，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关键的一环。

祸起总路线

按当时的说法，反右运动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引起的。所以，考察反右运动的由来，必须追溯到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所谓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生产数据所有制的革命，改造农业、手工业的个体所有制和工商业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始于1953年。这一年，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利瓦伊汉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调查报告时，毛即席发言，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

「过渡时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当然应是从他讲话的时候开始。后来他却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过渡时期」就开始了。2 即便如此，至少还应当用六年到十一年的时间，「逐步过渡」。实际上，三年就「全部过渡完」。按照毛泽东自定的标准也「走得太快」了！

毛泽东说：「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3 结果快马加鞭，三年到头，完全脱离实际。毛泽东用的还是老办法：农村包围城市。1955年，反对「小脚女人」，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掀起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他说，就是为了造成「乡下压城市」的形势。第二年，「乡下」的形势逼

迫城市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当时的中国，是十足的农业社会。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主观社会主义，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说，缺乏民主、文盲众多，与此相应的农业社会主义，又只能是「封建社会主义」。

毛泽东提出一条总路线，强制推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的。开国以后的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没有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制度是「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违反宪法，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擅自宣布：「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非但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

中共八大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即转向经济建设，人们是高兴的。但一年以后，毛泽东推翻中共八大的决议，代之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4 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结果不是历史的前进而是倒退，倒退到控制经济、控制政治、控制思想的专制主义。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5「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二十世纪中叶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出现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反对社会主义「不够格」，反对将「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从主观、客观条件来说反对的是主观社会主义，从生产力水平来说反对的是农业社会主义，从上层建筑来说反对的是封建社会主义。1957 年反对封建社会主义的言论，以林希翎在北京大学的演说为代表。6

民主反党主

社会制度的改变，从新民主主义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性质的改变，从人民民主国家改变为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由共产党说了算。说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是共产党当家作主。党主代替了民主。

从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程序来说，又是由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1953 年 6 月，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事关党的总路线的提出，中共中央竟没有一个正式文件，只有毛泽东的一次讲话、两次批示。1954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批准了这条总路线。这是在宣传和执行了将近一年之后，对既成事实不得不加以追认。

194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中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宣告成立。7 问题在于，毛泽东本人的设想改变了，而坚持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尤其是刘少奇），却被指责为「右倾」。作为「右倾」而遭到批判的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8，实际上都是毛泽东自己原来的主张。

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自然历史过程，而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够强制推行，因为它是共产党一党专权，一党专权又便于一人独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的不是民主联合政府，而是党主专权政府，民主党派成了「花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政不过是客卿。

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是不合法的，不但违反了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原则，也违反了共产党自己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到现行宪法。

1949 年产生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

1954 年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序言中有两处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处是说中国人民「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另一处是说我国人民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些都是叙述事实，不是法律规定。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种条文虽然没有可操作性，但具有否定性的价值。既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就不是属于任何政党；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应在违宪之列。

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实行的是凌驾于国家权力机构之上的「党的专权」。从宪法条文来说，共产党的一党专权是违宪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

力属于人民」这一总纲。

共产党一党专权，不仅违反宪法，也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一党专权的共产党不是《共产党宣言》的共产党。《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而在一党专权下的各级首长，正是毋须授权、不用选举、无法撤换的「天然首长」。

1957 年的「大鸣大放」中，作为「反党」思潮，正是反对党主，反对党天下，反对一党专权。这方面的言论以储安平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为代表。91957 年的「反党」思潮，正是站在四十年代主张民主联合政府的共产党的立场上，反对五十年代实行党主专权政府的共产党。这正是帮助党整风，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就算是真正的反党，也不能成为镇压的理由。民主社会里，没有一个政党是不可以反对的。反党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些，都是公民的常识。「反党」之所以成为罪名，只能说明中国不是民主社会，也说明共产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类似于家天下的党天下，就像专制皇权那样，是一个人莫予毒的强权统治集团。

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1957 年的问题是个甚么问题呢？」他的回答是：「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10 所谓「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主观社会主义；所谓「反对党的领导」，是反对党的专权。主观社会主义和一党专权，按照「党的领导」制定的宪法，也是不合法的。1957 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呼唤和促成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转变。可惜，共产党丧失了拯救自己的机会。

邓小平一再讲，反击是必要的，错在扩大化。邓小平不说正确不正确，却说必要不必要，这就走题了。即使认为「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也只能以思潮来反击思潮，那就是进行平等的辩论。事实上不是反击思潮，而是迫害人身。而且是共产党运用僭越了的国家政权的力量，由党委定案，将五十五万多人搞成「敌我矛盾」，并采取降职、降薪、撤职、开除、劳动教养等等的惩罚措施。用一句话来回答，1957 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以非法的手段维护非法的存在。

错在整风 不思改革

1957 年的事情，人们往往以为错在整风转为反右，我却认为根本是错在整风。1956 年以后的形势，根据客观上提出的任务，正确的决策不是整风，而是改革。

选择整风，走向反右，势不可免。

1956 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问题，引起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动荡。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苏联和东欧各国所进行的探索是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虽然刚刚建立，因为它是追随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病，已经充分暴露。在国际上，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势所趋。面临同样的形势，中国不思改革，却迷恋整风。

中国之所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出现突发性的社会矛盾，就是因为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间上提早了，规格上走样了，建立了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是出于人民的愿望，而是共产党的意志。这种社会主义一旦建立，也不可能立即取消。所以缓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出路就在于改革主观社会主义，以及改革将主观社会主义强加于人民的共产党集权制。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在「大鸣大放」中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其实质就是改革主观社会主义、改革共产党集权制。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直接发出了改革的呼吁。11

共产党为什么提出整风？因为他们把社会矛盾的产生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对国内问题的认识与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是相关的。由斯大林问题引起的大论战，国际上的主流意见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出了毛病，代表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却认为「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认为是制度问题，所以就要改革制度；认为是「思想状况」，所以就来搞整风。而且还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完全拒绝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而「思想状况」又是外来的，不是共产党自身产生的。毛泽东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12 中共领导人以为只要整掉资产阶级传播到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万事大吉了。

在中共的领导人中，只有周恩来注意到了制度问题。他认为，严重的官僚主义来自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原因是缺乏民主、忽视民主，缺乏民主、忽视民主的根源是集权的制度。所以他指出：「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强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

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就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131956 年 5 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体制会议，检查中央集权过多的现象，提出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但是，周恩来的语调过于温和，呼声过于微弱，事实上在共产党内根本不起作用；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集权，也丝毫不能触动共产党的集权。

在改革和整风之间作选择，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思维定势在起作用。经过延安整风以后，整风似乎成了传家宝，每临大事说整风。1950 年，为了渡过财政经济的困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一次全党整风。1951 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艺界开展了一场以改造思想为内容的整风。1952 年的「三反」运动，开始时也是叫做整风。从 1956 年的「多事之秋」到 1957 年的「不平常的春天」，国内外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毛泽东祭出整风的法宝，以为整风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还说「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

有因必有果。同一原因可以引出不同的结果，并非注定只能出现一种结果。以主观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集权制为原因，可以导致改革，也可以导致整风。因果性不等于必然性。但必然性一定会在历史上顽强地表现自己。改革就是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可以在 1957 年不选择改革，但二十多年后不得不选择改革，只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选择改革，就是修补和挽救主观社会主义，削弱以至放弃一党专权。选择整风，则是相反，正是坚持和维护主观社会主义，保卫和巩固一党专权。反右也是一样，整风和反右的目的是一脉相通的，从整风到反右是顺理成章的，当时只有进行改革才能避免反右的历史大悲剧。一党专权的正式名称叫做「党的领导」。整风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实际上是加强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而又要消除由于垄断权力所产生的弊病，难矣哉！以加强「党的领导」来整顿党自身的运动，不过是饮鸩止渴而已。

转向反右 策划「阳谋」

进行整风，结果走向反右。毛泽东说是「阳谋」。「阳谋」之说不可信，有人就说是「阴谋」。「阴谋」之说也是肤浅的。毛泽东不是预先按照「阳谋」来设计

整风和反右，而是在整风中见风转舵，转向反右，才策划「阳谋」。

毛泽东的本意不是以整风来「引蛇出洞」，他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以整风来证实他的创造性理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树立样板。

毛泽东的得意之作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吹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系统阐述。六月十九日公开发表，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整风就是以「鸣放」为手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有眼光的。他说：「人们还不能断定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讲话究竟是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开端，还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14 这就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开端」，也可以是「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事实上，「鸣放」先是「自由主义的开端」，后来又转为「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

为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正反两用？本来 1954 年宪法已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自由。」还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的自由。因为事实上宪法不起作用，所以才需要提出一个党的方针。以党的方针代替宪法的规定，表明党的权威高于宪法的权威。党的方针的执行，当然必须体现党的意志。毛泽东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既然有权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也有权束手不让大家讲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像放风筝，看起来风筝可以在空中自由飘荡，它的牵线的另一端掌握在党的手中，可上可下，可放可收。

1957 年 1 月 7 日，陈其通（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长）、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他们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责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界的形势表示忧虑和反感。九家省级报纸纷纷转载，表示支持。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指示中央办公厅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印发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省市委书记讨论。他批评陈其通等人是教条主义，「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5 他还一再说，党的高级干部中，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少数，不赞成的是多数。以《人民日报》为首的党报，对于贯彻双百方针按兵不动；倒是《文汇报》、《新民晚报》、《光

明日报》等非党报纸热烈响应。毛泽东在外地说，回去要责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闻讯，赶紧在四月十日发表一篇社论，题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王若水起草），指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同意的。……『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批评陈其通等人就是代表这种倾向。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大为赞赏。当天，他找《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邓拓等谈话，指名让王若水参加。毛在表扬王若水的同时，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在五十多天里没有发表反驳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并严厉批评：「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16

毛泽东大力推动「鸣放」；「鸣放」的结果，却始料所不及。「鸣放」中触犯了他设置的前提，前提是加强「党的领导」，「鸣放」中却追究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矛头指向「党天下」。于是，「鸣放」从「自由主义的开端」变成「诱人陷入罗网的方法」，从反对教条主义变成「引蛇出洞」。

根据利瓦伊汉、胡耀邦等人公开表示的看法，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发生在五月中，标志是毛泽东写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原题为《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标明，这篇文章写作的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实际上经多次修改，直到六月十二日才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真正起转折作用的是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个文件，一方面表示对善意的批评采取欢迎态度，同时又说整风中已经出现反共的苗头。一方面肯定基本上是诚恳的批评占百分之九十，又说：「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要放手让他们发表，暂时（几个星期内）不予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研究反驳的问题」。17

「阳谋」，是从这时开始的；不是按照「阳谋」将整风转向反右，而是决定了转向反右才产生「阳谋」。放手让反动言论发表以后怎么办？「阳谋」还是不具体的。如何反驳，过一个时期再研究，而且「帽子」也没有定型，只是泛称「右翼分子」。直到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毛泽东起草），才作出决定，不是反驳而是反击，反击的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左右。六月八日，抓住战机提前出击，《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打

响了反击右派分子的第一枪。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反右运动以资产阶级右派作为斗争的对象。毛泽东说：「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8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产阶级是人民。即使资产阶级右派也仍然是人民中的一个派别。1957 年却把右派当作反动派，把人民内部的一个派别当作敌我矛盾。本来左派和右派都是群体性的政治倾向。右派而落实为「分子」，「右派分子」就成了一顶「帽子」、一个标签、一种身份。一旦戴了这顶「帽子」、贴上这个标签、具有这种身份，不但是敌我矛盾，而且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并列，成为永世的罪人。

整风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右却将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矛盾，比起苏联和东欧来有过之无不及。毛泽东提出的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抽象来说，似乎很有道理；实行起来，总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论「敌」、判「敌」、制「敌」。一党专权的体制不变，造成的结果与斯大林主义没有区别。斯大林也可以断然说：「我在肃反中消灭的都是敌人。」「正确处理」的主体是人，而且是有权处理矛盾的人，这一理论的前提是人治。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在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得到有效贯彻。

整风转向也不是第一次了，1942 年的延安整风就是如此。开始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运动，继而转向「审干运动」，最后成了「抢救运动」（即肃反运动）。整风总是从整思想转到整人。这与共产党、毛泽东的民主观有关。毛泽东认为，「发扬民主」就是「让人讲话」、「让群众讲话」。既然是「让人讲话」，同样也可以不让人讲话。整风就是从让人讲话转向不让人讲话。「让人讲话」当然是让人讲愿意听的话，但讲话的人总是要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这就是「发扬民主」的内在矛盾。不让人讲话，积怨日久，难免爆发。一旦让人讲话，不可能都是愿意听的话，所以「让人讲话」之后势必不让人讲话。只有实行以宪法为保障的民主制度，才能彻底改变从让人讲话到不让人讲话的转向。人人有权讲话，不需要当权者开恩；当权者无权不让人讲话，而是必须恭恭敬敬地听人讲话。

1957 年从反「左」到反右的转向，不仅是策略性的，而且是战略性的。从此，

口号不断地反右，脚步不断地向「左」，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极左。毛泽东一再在正当反「左」的时候强扭为反右。他本人就有「左」的偏爱。

毛泽东是反左倾上台的。但他自己又成为左倾和极左的代表人物，值得深长思之。这说明，左倾是共产党的痼疾，只要气候适宜，立即旧病复发。同时也说明，共产党所立足的中国的这块黄土地，具有滋生左倾的社会历史根源。反「左」以及铲除它的社会历史根源，是全民的长期的艰巨任务。

事与愿违 三种转向

看起来毛泽东在那里指挥一切、决定一切，实际上，许多时候，许多事情，都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行为的动机和实践的结果常常是背反的。他也是「本来要走进这个房间，结果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成了历史的玩偶。1957 年，毛泽东发生了三种转向。

从 1956 年 11 月到 1957 年 5 月上半月，毛泽东公开谈到整风的目的都是针对共产党自身，以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为借用力量，来解决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干部中的国民党作风。他也谈到蚂蚁出洞了，要防止匈牙利事件等等，但这不是在共产党的整风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提出进行一次新的整风运动，是 1956 年 11 月 15 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大发议论，讲什么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有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大民主，也有波匈事件式的大民主，「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甚至是小小民主。毛泽东的民主概念是极其混乱的。民主分成两种：大民主和小民主；大民主又分成两种：资产阶级大民主和无产阶级大民主。小民主是否也可以分成两种？没有说。大民主和小民主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也没有说。却说两种大民主是互相反对的。姑且按毛泽东的原意，大民主和小民主是两条平行线，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57 年 3 月 12 日，在有一百六十多名党外人士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并第一次提出「党外人士可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19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一路南下，风尘仆仆，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连日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谈到整风的目的是：

「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20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在全国各地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论述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与此同时，民主党派各自召开全国性会议，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由于全国范围出现了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热潮，中共中央认为整风的局面客观上已经出现，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这两个报告（指毛泽东二月二十七日和三月十二日的两次讲话）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

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以后，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开展批评的指示》（毛泽东起草）。这一文件值得注意的是：

一，欢迎党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强调它的积极意义。

二，对于不正确的批评，或批评中的有些不正确的观点，当然应予反批评。但是，「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

三，与民主党派已达成协议，不要在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是要对共产党形成社会压力。

四，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21

在一个时期中，中共中央统战部千方百计动员党外人士投入「鸣放」。有人不愿参加座谈会，或参加了不发言，还打电话、登门拜访，好言相劝。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击右派的信号后，整风完全变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本来说党外人士的批评对共产党「极为有益」，现在却说那是向党「猖狂进攻」。本来说要对共产党的整风形成「社会压力」，现在却说要「组织力量反击」。他还写道：「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22 本来说对付「匈牙利事件」是大民主，共产党的整风是小民主。现在大民主、小民主两条线并成一条线了。如果现在的指示是正确的，那么以前的指示就有问题了。毛泽东说，没有问题，那是「阳谋」，为了「引蛇出洞」。这表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他又是一贯正确的了。毛泽东有两个没有料到：第一，没有料到党外人士在「鸣放」中的批评如此尖锐；第二，

没有料到党内干部对「鸣放」的抵触如此强烈。「阳谋」之说正是一箭双雕，在反击党外人士的同时安抚党内干部。目的是为了掩饰前后的自相矛盾，对急转弯作一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一时颇为得计，但从此共产党失信于民，丧尽道义。某些批评毛泽东的人们，以为事情都是按照「阳谋」（应读作阴谋）进行的，把他的事与愿违当作心想事成了，反而抬高了毛泽东。

从党内整风到全民反右的转向，又引发另外两种转向。

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真心诚意，还是虚心假意？仅仅从主观意图来说，他是真心诚意的。但是，他的真心诚意是整下不整上，或借用储安平的语言来说，是只整「小和尚」不整「老和尚」。相反，通过整风正是为了加强自下而上的集权，「增加党的威信」（也就是「老和尚」的威信）。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中，提出十多个问题，限在十五天内书面报告中央。其中列出：「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等等，都是矛头指向「你们」，丝毫没有涉及他自己所代表的共产党集权体制。23

毛泽东之所以痛恨官僚主义，因为它也会腐蚀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败坏威信。但「鸣放」中出现了矛头对着「老和尚」，质疑共产党的集权体制，这就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图。于是，他就要团结全党，一致对外，又从整「小和尚」转为保「小和尚」。本来，他对党外人士批评「小和尚」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说那都是「反党」。「党」是一个集合概念。反右以后，本单位的负责人，甚至某些党员都成了「党」，反对（实际上或许是正当的批评）他就是「反党」。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人吸取了反右运动的教训，死保本单位的负责人，又成了「保皇派」。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的意图中还有隐秘的成分，也像后来的「炮打司令部」一样，他想利用整风来解决共产党上层的分歧。这一次的目标不是刘少奇，而是周恩来。正是要联合刘少奇来反对周恩来。他就撤换周恩来的总理职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没有表示同意。24

毛泽东为什么以周恩来为目标？因为周恩来是「反冒进」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写道：「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

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加快。」25 毛泽东处于亢奋之中，只管抒发他的浪漫情怀。但从事实际工作的务实的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人却陷入了财政透支、原材料紧缺的困境，不得不提出「反冒进」。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就是反对他。

1956 年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指出：急躁冒进已经成了「严重的问题」，「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要求计划「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毛泽东看了大为震怒，在当天的报纸上批道：「尖锐地针对我」。

李志绥最先指出：「毛开始时是想藉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26 他可能是在中南海里面听到的私下议论，没有什么论证。

毛泽东怎样煽动党外人士来攻周恩来？

王若水认为：「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27

「皇帝」是指谁？王若水认为是指周恩来。这句话如果由别人讲出来，「皇帝」可能是指毛泽东；由毛泽东讲出来，决不会是指他自己。谁来「拉下马」？如果向共产党员发出号召，可能是针对共产党的「皇帝」；毛泽东是寄希望于党外「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那就不是把共产党的「皇帝」拉下马了。毛泽东讲话一贯是皮里阳秋的。他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他本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事实上他是高贵者，但他决不会自认为最愚蠢。他又是以卑贱者的代言人的身分来反对别的高贵者。他指挥「炮打司令部」，在别人看来，司令部里的总司令就是他，他却站在司令部之外来炮打。「敢把皇帝拉下马」与「炮打司令部」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还可以补充一个事实。《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公布的前一天，1957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会议，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还邀请一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座谈整风。据会议的参加者周培源先生告

诉我，毛泽东特别强调，各方面批评意见最多的是高等教育部、教育部、卫生部等部门，提出的问题最多，矛盾最突出，应该攻一下，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一连说三个「攻」字，可见心情之急切。虽说是共产党的整风，毛泽东却号召大家去「攻」政府部门，下一步火就会烧到国务院，烧到周恩来。

毛泽东的玄机，人们参不透。储安平批评「老和尚」的发言还将「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提。「鸣放」中没有人批评「反冒进」，反而附和、支持「反冒进」。五月十六日的统战部座谈会上，陈叔通的发言中说，希望中央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方面大？他的意思显然是冒进所造成的损失大。张奚若批评共产党的「四大偏差」，头两条偏差就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马寅初在五月十一、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讨论经济建设。他的结论是：「必须根据财力、物力的可能放慢一步」。

毛泽东不得不作出妥协。整风转为反右以后，毛泽东的目标对准周恩来的意图，转为团结党内的异议者，枪口对外，一致反右。

反右后续 通向文革

反右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就来收拾「反冒进」的人们了。

本来是团结「反冒进」的人们共同对付右派，右派被搞臭了，毛泽东又将「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挂上钩。

毛泽东说：「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28 这是说「反冒进」影响了右派，又说右派影响了「反冒进」。薄一波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在 1958 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针对周恩来等人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不但如此，「毛主席认为，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反冒进的人说 1956 年是『冒进』，右派攻击 1956 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29 左挂右挂，横挂竖挂，反正要把「反冒进」的人们与右派捆绑在一起。

早在 1957 年十月，反右运动的高潮刚过，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即开始批评「反冒进」，说他们是「促退委员会」。当年年底，毛在杭州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到 1958 年一月的南宁会议，批判「反冒进」到达了高潮。

会上印发了二十二个供批判的参考文件，居然包括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毛在会上多次讲话和听取汇报时的插话，都是集中批评「反冒进」的。会上气氛紧张。30 三月份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反冒进」的问题又讲了两次。直到1958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在周恩来、陈云、李先念再次作了检讨后，历时半年多之久的反对「反冒进」的浪潮才告平息。尔后不许再提「反冒进」，只能提「反保守」。政治局中，「反冒进」的人们是多数，最后，多数人屈服于毛泽东一个人。强迫多数人屈服的一个人，和甘愿屈服于一个人的多数人，对于事件的结果负有共同的责任。从此，在中共领导集团中，党内生活极不正常，毛泽东独断朝纲，定夺乾坤，这是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条件。

反对「反冒进」，就是回归冒进，而且是更大规模的冒进，成了大跃进。毛泽东认为，以「跃进」代替「冒进」，这就彻底战胜了「反冒进」。他在给中央和各省市委负责人的一封信中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即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31

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十五年后苏联赶上美国。毛泽东起而响应，十五年后中国赶上英国。从莫斯科又带回来一股跃进风。

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也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性。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既没有目标，也没有达到目标的途径，不过是一个宣传鼓动的口号。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推行经济建设的大跃进运动，追求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又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追求生产关系的飞跃发展。进入社会主义才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统帅二者的总路线，就成了神圣的「三面红旗」。

高举「三面红旗」，全民走向狂热。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各行各业都奔腾起来了。报纸上报道，粮食亩产万斤至十几万斤，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钢产量当年翻一番。到处刮浮夸风，看起来大跃进中人民群众意气风发，实质上还是「官大，权大，胆大」的体制病的发作。高

指针、高速度破坏了经济的综合平衡，从生产到生活出现全面紧张。

大跃进的任务的提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大跃进的偏差得不到抵制，也是反右的后遗症。人们怕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敢提意见了。下面迎合「上意」，上面煽动「下情」，上下交互作用，一片荒唐，畅行无阻。反右运动中，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毛泽东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于是，大跃进中外行们就大显身手了，而内行们居然也闻风起舞。著名农学家殷宏章（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说，他亲眼看到了亩产万斤水稻「卫星」上天的经过。32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说：「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 30%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 1/5 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 2000 多斤或 3000 多斤，而是 2000 多斤的 20 多倍。」33 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文章就相信粮食可以高产了，甚至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权倾一方的陶铸更是大胆，他居然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那就是说粮食增产是无限的，何止几万、十几万斤！只有一位不懂科学、不管经济的彭大将军，挺身而出，说破谎言。34 中国毕竟还有一个半个刚正不阿的人。

1959 年 7 月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大跃进的「左」的，毛泽东提出十九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但毛泽东自己纠「左」是可以的，别人来纠他的「左」就不行了。及至彭德怀提出万言书，认为大跃进「有失有得，得不偿失」，批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就对彭德怀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会议的形势由此急转直下，从纠「左」又转为反右。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上庐山的时候公文包里带的是反「左」的材料。毛泽东讲话后，赶紧打电话回去，要秘书们急送反右的材料。最后，彭德怀以及他的支持者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集团」。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被重点批判和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党员、干部多达三百多万人。大跃进的偏差变本加厉，反右运动的遗风愈益严重。1959 年底、1960 年初，大跃进即难以为继，接着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粮食减产，要恢复到 1957 年的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35 工业在 1961 年下降了百分之四十。36 违反客观规律的大跃进，得到的惩罚是

大倒退。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农村中发生大饥荒，饿死的人达数千万之众。

经济上的危机又带来政治上的危机。1962 年一月，在北京举行由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让各级干部「出气」。人们在检查各种错误时，还提出：谁为这些错误负责？彭真在一月十八日的会上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彭真还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37 彭真虽然点到毛，还是小心翼翼的。为了安抚干部的不满情绪，毛不得不作一些象征性的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究竟中央犯的是什么错误？毛直接负责的又是什么？他没有说。毛泽东是决不下「罪己诏」的。作了几句敷衍的自我检讨，于是就长篇大论地教导别人如何正确对待错误。38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我们咽下了一口气，现在总算出了这口气。注意，她说的是「我们」。她是代替毛泽东讲了心里话，也透露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动机。七千人大会出了毛泽东的气，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出七千人大会的气。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认为：「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针对毛泽东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公式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方还可以这样讲。」毛泽东立即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刘少奇反驳道：「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彭真也认为：「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这些人在怀疑大跃进了。特别是刘少奇谈到「庐山会议是个关键。会议的下半段否定了上半段。」39 所以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就是将来为彭德怀翻案的「中

国的赫鲁晓夫」。

林彪在会上独树一帜，大唱赞歌。他说成绩很大很大，缺点很小很小。「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党的创造」。困难之所以产生，「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毛泽东对他的发言带头鼓掌。这时，毛已经下定联合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决心。

但七千人大会上，形势对毛不利，他只好隐忍不发，暗藏杀机。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卡博·巴卢库时终于说出来了：「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在「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401970 年 12 月 18 日，正在访问中国的斯诺问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决定搞掉刘少奇的？他就说是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彭德怀案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他对彭德怀本人也讲过：可能真理在你一边。但如果彭德怀的案一翻，大跃进就站不住了；大跃进的案一翻，反对「反冒进」又站不住了。一路翻过去，反右运动以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站不住了。毛泽东的半生功业将付东流。他自己也很心虚，所以他向胡乔木交待，《毛泽东选集》只编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为止。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导火线，就是从防止彭德怀翻案到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57 年以后，毛泽东总是制造一个新的错误来掩盖一个老的错误，在悬崖上冒险攀登，至文化大革命而达于登峰造极，终于跌落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毛泽东的自我评估是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拥护的不少、反对的不多，后一件事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做了一件事？因为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正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文化大革命，其中决定性的一步就是反右。所以，无论做了多少事，最后都归结为文化大革命这一件事。这一件事，使中国人民遭受一场浩劫，也使毛泽东本人身败名裂。

1969 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在政治报告中就说:毛泽东 1957 年的伟大著作「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被说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源头。1957

年反右运动所确立的「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是对「革命」概念的滥用。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不是再一次革命，而是和平的转变。1957 年的革命，后来就演化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全面专政」。从反右到文革，都是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的问题，结果远离了思想和文化，成为对人身的压服和强制，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等荡然无存。这种「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个案性的「文字狱」还有所不同，而是群体性的压制；「革命」的高潮，就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类似贱民的「臭老九」，驱使有知识的人去接受无知识的人的「再教育」。

邓小平说：「总起来说，1957 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411957 年以前是正确的？不见得。至少，1953 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毛的领导就不正确了。没有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前提，就不会发生「反社会主义思潮」，也就没有必要反右派。邓小平忘记了自己的另一个论断。他一再强调 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如果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那么，反右以后引起的「错误越来越多」也是必要的；如果 1957 年以后的「错误越来越多」必须否定，那就不能不否定引起「错误越来越多」的反右派斗争。

邓式改革 走向死亡

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政治上的最高权力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通过抓「四人帮」，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华国锋手中。第二次，通过党内斗争，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最高权力转移到邓小平手中。

华国锋是毛的忠实继承人，继续延伸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堵塞了中国前进的道路。在民意的支持下，邓小平夺取最高权力，将其赶下了台。

人们都要求改革。不改革是不行了，但改什么？怎样改？很不一致。改革的光谱，从右到左，七彩纷呈。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一派，主张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回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陈云认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样板。教育部长蒋南翔则大力推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经验，要求「在『十七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从「十七年」继续前进不还是文化大革命吗？另一派认为，改革是为了走向现代化，但坚持用共产党传统的压制人民的方式来进行改革。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还有一派认为，不但改革的目标是现代化，改革的进行也必须采取现代的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须实行民主化。这一派的主要力量是在中下层，上层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坚定的代表——胡耀邦。

邓小平自称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的口号是「既反左又反右」，左右逢源。确实，他是中间派、动摇派、不彻底的改革派。不幸，他代表了改革的主流派，还被加冕为改革的「总设计师」。

1957 年镇压右派、反对改革的邓小平，在 1978 年到 1980 年之间的许多讲话，按照 1957 年的标准，都是右派言论。历史强迫他扮演了一个反对自己的角色，不得不执行右派的遗嘱。邓小平追随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的罪错负有政治、法律和道义的责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应当受到追究的。他却摇身一变，又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共产党常常自豪地说「党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因为共产党不允许别人来纠正它的错误。所以，纠正反对改革的错误还是只能由反对改革的人来担当。但是，反对改革的人究竟能否彻底纠正反对改革的错误？

1979 年 1 月到 3 月，在胡耀邦的主持下，集中了一批共产党内的理论精英，召开了一个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是一次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会议。会上，多数人主张对 1949 年后三十年的历史作一番彻底的清理，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先天不足。如果不进行改革，又是后天失调，死路一条。还有人认为，说社会主义是「早产儿」也不够资格。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诞生的，中国的资本主义母体还没有充分成长。因此，应当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重头再来。但中国是一个口号治国的国家，将社会主义改为新民主主义，城头换旗，震动太大。为照顾现实，可以保留社会主义的口号，重新解释。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走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处在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过渡时期。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改革。改革的目标是三方面：

经济上补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课；

政治上民主化、法制化；

思想文化上自由化、多样化。

3 月 30 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一篇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否定了前一阶段讨论的基调。「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四个「凡是」（李洪林语），成为整人的四条棍子。邓小平本来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极为赞赏，还要胡耀邦组织人马写一篇大文章，论述民主问题，准备在「五·四」六十周年时发表。但他的思想说变就变，除了外在的刺激（魏京生大字报），也是出于他的本性。邓小平对改革的态度是一步三摇。1980 年他又摇过来了。

邓小平行进在改革之路上，不但是摇摆的，而且是跛足的，只改经济不改政治。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曾指出：「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这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还说「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有关。这比过去只承认官僚主义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大有进步了。当时理论界大造反封建的舆论，推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的诊断没有错，但处方开错了。既然「特有的官僚主义」是从制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当然就必须彻底改革制度，邓小平下的药却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反对个人过分集权」，一切归结为「问题都在于『过分』」。42 他不反对共产党的集权和领袖人物的集权，只反对过分。什么叫「过分」？没有客观的标准，还是由他说了算！

不到半年，邓小平又大步后退。1980 年 12 月 25 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重提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43 有些人跟着起哄，指责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之源」。客观上的原因是波兰出现了团结工会，胡乔木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分析团结工会出现的条件，并建议在中国防止团结工会的出现，特别要割断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联系。所以邓小平又把针对知识分子的「反自由化」的老式武器搬出来了。从此，「反自由化」的波涛起伏，从文艺、理论、新闻等战线一直延伸到政治战线，两任力主改革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被反下了台。1989 年邓小平居然调动军队来「反自由化」，「六四」北京街头的枪声，向全世界宣告：改革的「总设计师」变脸为屠夫，镇压要求改革和反对腐败的人民。

1953 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始了乌托邦试验。1957 年，历史提出了改革社会主义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却将改革思潮、改革势力打入十八层地狱。这才真正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你不接受我的社会主义，我就把你打成「右派分子」；

你反对我的专权，我就把你搞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就是邪恶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邪恶的道路，弹指五十年，至今不回头。非但自己不悔改，还要强迫别人遗忘，反右、文革都不能讨论、不能研究、不能发表著作。

因共产党拒绝改革，中国人民度过了二十多年苦难的历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绝境，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改革了。1957 年进行改革是顺应人民的愿望；1978 年进行改革就是挽救党了。为了维护一党专权而兴起了改革，同样，又因不愿触动一党专权而扼杀了改革。1989 年，结束了改革的一个周期，邓式改革已经死亡。

历史的启示

1957 年名曰「反右」或「反右派」的运动，并没有揭示历史事件的实质。

任何社会都有左派和右派，左派可以反对右派，右派也可以反对左派，彼此是平等的。只有在中国，右派成为一种罪名，左派可以为右派定罪，而且还可以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镇压右派。「反右派」、「反右运动」这些名称正是不民主的产物，必须推翻。

1953 年斯大林逝世，苏联解冻。要求摆脱苏联控制的东欧，出现了自由化。自由化运动在波兰和匈牙利遭到血腥镇压。1957 年中国的「大鸣大放」同样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之际出现的自由化。反右运动也是对自由化的镇压，只是镇压的方式与波兰、匈牙利有所不同。因此，所谓的「反右运动」，应当正名为「反自由化运动」；1957 年的历史事件的实质是自由化和反自由化的较量。

毛泽东逝世后，斯大林现象重演。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又一次自由化。同样也遭到反自由化运动的批判、压制和打击，最后走向与五十年代波兰、匈牙利事件相同的结局——血腥镇压。这一回，邓小平取代毛泽东，唱了主角。邓小平自称「反自由化最坚决」。本来，五十年代邓小平操办的反右运动就是反自由化运动，八十年代的反自由化运动无非是变相的反右运动。有些五十年代的右派分子，八十年代又成为自由化分子，三十年沧桑只是换了一顶「帽子」。

自由化是改革的前奏和伴奏，反自由化就是反改革。邓小平扮演了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他既要改革，又要反自由化，结果改革荒腔走板，大失其形。

审视 1957 年以来的五十年，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不改革走向动乱。

第二，不彻底的改革走向腐败。

第三，自然的结论就是：不但要坚持改革，而且必须是彻底的、全面的改革，才能杀出腐败的重围，寻求生路。

本来是不需要改革的，因为走错了路。历史的行程，好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即使发现走错了路，也不能立即掉头，只能寻找出口绕到正确的方向上来。改革就是从错误中选择正确的方向。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往没有成功的先例，但不等于未来没有成功的希望。苏联和东欧还是在两大阵营对立的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改革，没有出路，所以失败了。现在，中国和越南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外部条件大不相同了。成败的关键端在内部的决策。

中国改革的目标，依然是 1957 年提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有某些成效，就因为他在反自由化的同时偷用了一些自由化的理论，悄悄地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变成「四不像」了。邓小平为了坚持反击「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必要的，还把「四不像」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大的假冒伪劣商品。连社会主义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能造假？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假冒伪劣商品才会层出不穷。

2007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物权法。可见，当年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违反了宪法，所谓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违反了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当然，法律不能追溯，但人民可以追问：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科书应当改写了。

社会主义已经变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却是一成不变。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的主要障碍也在于一党专权。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配套的。中国只要市场经济，不要民主政治，结果市场经济被扭曲。改革的攻坚战应当突破一党专权这个最后的顽固堡垒，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从一党专权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不是没有办法，而是没有决心。首先必须是共产党愿意放弃一党专权，才能讨论转型的办法。共产党会自愿放弃吗？很难。只有人民发出强烈的呼声、显示巨大的力量，迫使共产党不得不放弃。

中国的改革已经一再错失良机，但还可以「作一次最后的斗争」。也仅仅是最后的斗争了，如果最后的斗争成为最后的失败，历史必将扫除一切障碍，重新开辟一条新路。

注 释

1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1、82 页。

2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9 页。

3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315 页。

4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78 页。

5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25 页。

6 见《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 94-95，197-199 页。

7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 页。

8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82 页。

9 见《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 116-117 页。

10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07 页。

11　见《历史的漩涡—— 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第 74-87，180-189 页。

12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76 页。

13 《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7 页。

14 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一九九〇年第六期；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371 页。

15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49 页。

16 胡绩伟《从「书生办报」到「死人办报」》，《星岛日报》2000 年 12 月 14-21 日。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二卷第 36 页；《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 128 页。

18 《1957 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56 页。

19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10 页。

20 《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84-285 页。

21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96-297 页。题目改为《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

22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32 页。

23 《限期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92-293 页。

24 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王若水没有提供消息的来源。他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我相信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

25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3 页。

2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 195 页。

27 王若水《王道乎？霸道乎？》，www.wangruoshui.net 毛泽东的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12 页。

28 《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的说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6 页。

2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45 页。

3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37 页。

31 《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 142 页。

32 殷宏章《科学研究要奋起直追》，《人民日报》1958 年 6 月 19 日。

33 钱学森《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中国青年报》1958 年 4 月 29 日。

34 彭德怀罢官后，被软禁在北京西郊的挂甲屯。那是在北京大学承泽园旁边的一个小院。一天，我从门口经过，看见院子里有一片小麦，好奇，问门口的警卫人员：「彭老总的院子里怎么会有麦地？」他说：「彭老总不服气呀!」我更好奇了：「这麦地和服气不服气有什么关系呀？」「彭老总丈量了一块地，不多不少，正好一分。用上小麦良种，多施肥，多浇水，看看到底能打多少粮食。不是说亩产万斤吗？嘿嘿……」

35 陈云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 1350 页。

36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提供的数据。见《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 1336 页。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1059 页;《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 1334 页。

38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 296 页。

39《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421 页;《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第三卷第 1334-1346 页。

40 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 1469 页。

41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58-259 页。

42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287-294 页。

43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8 页。

纪念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五十周年　　陈奉孝

「五・一九」是一场自发的争民主自由的运动

说「五・一九」是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从它的起始和全过程来分析和认定。

首先,运动是由当时北大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一张大字报引起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很简单:开全国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是谁?谁选的?紧接着第二张大字报是哲学系学生龙英华贴出的,内容是号召成立自由论坛。第三张大字报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陈奉孝、张景中、杨路、张世林贴出的,题目是自由论坛成立宣言,内容提出了四项主张:一.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制度,改为政治课选修,三.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四.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天晚上,中文系的同学沈泽宜、张元勋联名贴出了一

首长诗「是时候了!」。这首诗充满激情，号召人们是时候了，去参加战斗，向「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发起猛攻！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北大掀起了十二级巨浪。第二天上万张大字报一下就贴满了整个北大校园，北大沸腾了！紧接着出现了谭天荣的数张大字报，从哲学的角度批判教条主义。刘奇弟同学贴出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刘奇弟是敢于挑战毛泽东要求为胡风平反的第一人。蒋兴仁同学贴出大字报「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号召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张锡锟同学贴出大字报「三害根源」，指出「三害」的根源在于制度，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叶于泩贴出的大字报「我看民主」，指出「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王书瑶同学贴出大字报「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到的教训」，内容有「……，六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党员占 1.6%，而决定国家大事的人又占 1.6%中的极少数）。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弄，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我所爱的六亿人民应该及早起来，结束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真正自己当家作主，真正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类似的大字报还有许多许多。以上大字报的内容与文革后不少理论家（包括邓小平）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主张的内容相比，早了整整三十至五十年！西语系的同学在贺永增、周铎等人的带领下，自发的召开了控诉会，控诉五五年肃反运动的扩大化，与会的同学听后无不声泪俱下。另外，到北大演讲的人大学生林希翎在她的第一次演讲中就公开指出「给胡风加上反革命的罪名是很荒谬的。胡风是对中央提意见书，怎能说这个意见书就是反革命的纲领呢？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她还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已经过时。公然讲出「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这些大字报的出现，事先并没有任何人进行组织和策划，而是长期被压抑的心声的迸发。

不仅如此，北大的右派同学为了打破当局的封锁，还通过到各个大学去演讲的方式或通过同学关系用邮寄的方式将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的信息传递出去。西语系的黄继忠老师就亲自带领二十多名同学到清华大学去演讲，介绍北大同学帮助共产党整风运动的情况。谭天荣、沈泽宜、刘奇弟、杨路等同学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去演讲，介绍北大同学争取民主自由斗争的情况。

出现这么多的「不同声音」后，不少人意识到需要成立一个组织，把这些「不同的声音」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这样更有力量，更能争取更多同学的支持，更能引起当局的重视。于是，便由谭天荣、陈奉孝、张景中、杨路、王国乡、龙英华六人倡议成立了「百花学社」，再由陈奉孝、王国乡等人联络中文系的张元勋、沈泽宜、崔德甫、张志华等人，组织创办了刊物《广场》，作为「百花学社」的言论阵地。主编张元勋在《广场》的发刊词里这样写道：「……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的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我们的广场期待着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从以上对「五·一九」运动全过程的记述和分析来看，将这场运动定性为继承「五·四」的一场自发的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应是没有异议的。众所周知，北大同学这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被毛泽东领导的反右运动残酷的镇压了下去。仅北大就有七百五十多名师生被打成右派，八百一十多名师生被打成「中右」，几百名师生被送到劳改营和劳教营遭受残酷的折磨（这其中主要是学生）。黄中奇、顾文选、张锡锟、林昭等同学和任大熊、沈元老师被残酷地杀害，刘奇弟、贺永增、敖乃松等多名同学被残酷折磨死在了劳改劳教队里。北大学生的这次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下去，但争取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总有一天，它会开花结果的。

西单民主墙和「六·四」是「五·一九」争民主自由运动的继续和深化

「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被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残酷的镇压了下去。几十万右派分子被关进了劳教、劳改营，受株连者达数百万，众多家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众多右派分子身受二十多年的折磨，死在了劳改、劳教营中，

更有黄宗奇、顾文选、张锡锟、林昭等同学和任大熊、沈元老师惨造杀害！圣女林昭在监狱里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和诗篇，记下了中国监狱的残暴和黑暗，中国从此进入了最黑暗最残暴的年代！但是，民主自由的种子已经播下，总有一天它会发芽开花结果的。一九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和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正是「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继续深化和发展。当时仅仅是作为一名中学生水平的魏京生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第一个大胆地提出了「要警惕邓小平的个人独裁」并提出中国不仅需要实行四个现代化，更需要实行「政治民主化」这一惊世之言，不能不使人感到震撼和敬佩！与五七年的右派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北大是中国的思想库。中国近百年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无不发源于北大。起源于北大学生王丹等人组织的「沙龙」，要求中共开放党禁、报禁，实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正是继承了「五・一九」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主张，最后发展成了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共当局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出动几十万军队用坦克和机枪血腥镇压了这次数百万人参加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东方的中国这次运动虽然暂时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却促使苏联和东欧人民认清了共产党统治的残暴本质，从而促成了苏联东欧共产统治政权的瓦解，正所谓东方开花，西方结果！中共当局至今一提到「六・四」仍然吓得颤颤惊惊，使得今天中共无论哪个领导人再也不敢公开出面否定「六・四」！使得今天中共无论那一个领导人也不敢否定「六・四」民主运动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如果当年中共接收了同学们提出的「反腐败、反官倒」的主张，何至于发展到今天中共官员无官不贪的程度！从五七年的争取民主自由的「五・一九」运动，七九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到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这三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在中国当代史上发出的灿烂光芒将继续照亮中国走向未来的道路！

中国争取民主自由运动的现状和未来

中国历次的民主运动无一不是由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带头的。为了防止象「六・四」这样的大规模民主运动的再次爆发，邓小平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一方面给知识分子大幅度提高工资，将知识分子的嘴堵住，另一方

面对各种媒体严加控制，采取文化法西斯主义，不允许不同声音的发出。与此同时，对青年学生全面掩盖历史，不让青年学生知道当年「五•一九」、西单民主墙、「六•四」民主运动的真象，并且引导大学生下海经商。今天打开电视，除了广告，全是一些娱乐节目，再就是一些歪曲历史歌颂封建帝王的历史剧，向人们宣传歌颂封建专制主义，引导青年学生去追求享乐。八十年代大学生那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的热情消退了，那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激烈辩论的场面不见了。面对中共官员腐败的大规模蔓延，人民群众感到无奈。中共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目的是为了一个「钱」字，老百姓手中无权，于是制假贩假、坑蒙拐骗、偷盗抢劫、卖淫嫖娼等现象在整个社会迅速蔓延开来。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成了一个没有道德信仰物欲横流的社会。整个社会风气被大大小小的中共贪官带坏了。人们除了相信一个「钱」字，什么也不相信了！

但是，面对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中共政权大规模腐败沉默的同时，大批下岗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维权运动却迅速蔓延开来，社会各种矛盾在激化。少数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也在大力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新闻自由、开放党禁和司法独立。尽管这种声音受到严密的监控和打压，但仍然能够绕过报刊杂志，通过互联网，从夹缝中发出声来。现在大多数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了目前一切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在于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党权高于法律，党权高于宪法，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要想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就无从谈起，这给中国未来的变革打下了社会基础。现在中国每年有一百多万大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困境，这一情况必然会传递到今后各大学中间去，尤其是象北大这样思想活跃的大学。只要失业的大学生、在校的大学生和失业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的维权运动结合起来，再次爆发象「六•四」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完全有可能的。

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需要三股力量的结合，即国内的争民主维权运动、共产党内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高层人士和国际上的呼吁和支持。这其中国内争民主维权运动将是主要的力量，这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良知未泯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身上。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号召扩大党内民主的呼声又起。胡锦涛智囊团成员之一俞可平先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已经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共上层也认识到，政治民主化这条路，在中国

迟早是要走的。不过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他们目前还迈不开步子，今后的几年在这个问题上很可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

目前执政的共产党的腐败已成了无法治愈的癌症，各种社会矛盾在积累和逐渐深化，中国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前夜，「五·一九」撒下的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再次燃烧起来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一切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人士和共产党内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开明人士到了该做出自己正确选择的时候了。(二〇〇七年一月)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1957：中国当代史大逆转　　刘宾雁

1957 年反右派运动，我曾称之为中国当代史中的一大逆转。这并非说那以前就是一个黄金时代，恰好相反。最晚从 1953 年起，那场四年前才取得胜利的革命，已经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但 1956 到 57 年还是出现了一个转机，那是二十世纪下一半历史给与的第一个转机，不幸被我们错失了。但随之而来的灾难，也曾经提供另一些转机，比如 1953 年便已开始、1959 年由彭德怀推向高峰的党内反对毛泽东农业路线的斗争，和伴随大饥荒而来的 1959 至 62 年反对毛泽东错误的社会思潮和农村的包产到户运动，可惜又一一失败了。还要等上二十几年，那便是 1979 年开始的改革了。但 1979 至 87 年和 1989 年，我们又错过了两次机会，从而出现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全民族、全方位的大倒退。

1953 年斯大林之死，为社会主义国家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1956 年爆发了布达佩斯起义。1968 年布拉格之春，由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袖杜布切克发动，全党决定把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变为人道主义社会主义。1980 到 81 年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几近推翻了共产党政府。虽都一一失败，却无不是苏联武装镇压（波兰则是由于为避免苏联的镇压而实行戒严，解散团结工会）的结果。但是倘若类似事态发生在中国，苏联就绝对无力干涉了，二十世纪的历史便将会

是另一个样子，而中国也就对人类做出一大贡献了。然而中国却失败得更惨、倒退得更远，这能怪谁呢？只能算到自己的帐上。

难道还不该做一点自省吗？我曾写过「苦难之树，必定会结出幸福之果」，此言谬矣。我们还活着，就见证了相反的事实：苦难也会繁殖出更多、更大的苦难。那就看它是在哪块地上生长出来的了。荒谬绝伦创下历史记录的 1955 年的反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不是就引向反右派运动，而后者又引向文化大革命吗？「六·四」之变把中国和民主的距离拉得更远，也有目共睹了。然而这一切又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知识分子欠缺探求真理的深入思索

反右派运动，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历史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报复。二十余年来连篇累牍的批判知识分子之软弱的文章，忽视了一个巨大的事实，那就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为毛泽东暴政的强大后盾。对于我本人的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五?四运动」后三十年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的启蒙上未尽到责任，难辞其咎。只有胡风一人坚持作家必须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直面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因而站到了同毛泽东那个把作家和人民变为党的工具的路线的反对方面。而毛泽东一声令下，同代作家、批评家、文艺理论家竟一拥而上，对那位伟大思想家和他的同道落井下石！「五?四」后前三十年文学的贫弱和 1949 年后三十年精神、思想和文学的沙漠化，甚而至于 1989 年天安门运动之葬身血泊，究其原因，无不是由于知识分子未能真正把自己的心放在苦难的劳苦大众身上，同时，也欠缺刻骨椎心地探求真理和穷其究竟地深入思索的精神和习惯。而正是这两点，使胡风以难以想象的顽强坚持其立场，并因而陷于孤立。

1957 年春季会有那么多人轻信毛泽东，就和我们的文化基因中欠缺思考的习惯有关。1956 年两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于是毛亲手所写，其中对斯大林的极力维护和对苏共否定斯大林的不满，曾令我极为反感。但是两个月后听到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却又立即欢欣若狂，心花怒放！既然前一些话言犹在耳，有甚么理由相信毛泽东会在两个月内（而且是在布达佩斯起义之后）翻然悔悟，真心要听取异议、纠正他的那条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的路线呢？

不仅是太天真，也太不善于思索了。

毛泽东有比斯大林高明之处。他对自己的政敌一个不杀，也很少逮捕，甚至还要把「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实，毛泽东及其同伙刻意营造的那种特殊环境里长年的贱民地位与非人的生活条件，是对「右派」的慢性枪决。事实证明，这种「慢性枪决」并不比斯大林处置政敌的手段更人道；对于最终仍然死于非命的许多右派分子来说反而要痛得多，对于统治者却更为有利。毛泽东说过「右派是很好的反面教员。」一百余万名「反面教员」散布在全国各地，朝夕出没于数以亿计的人们面前，无疑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无言的警告：哪一个胆敢对中共稍发异议，便必定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而那个下场是令人不寒而栗的。

被剥夺一切而又身败名裂却苟且生存下来的那些右派分子，时时刻刻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向人们昭示着：在中国做人，切不可诚实坦率，切不可过问政治，切不可有自己的是非、善恶感，切不可违抗当权者的意旨，切不可对任何人寄予同情与信任！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将把这些戒条牢记心间，并传给自己的子女。

毛泽东的打击是双向的。他在清除异己时，也就清除了党内真正有良心、有智慧、忠于革命理想的党员。中共党内早已存在的左倾势力，以及中共执政后为追逐个人利益而涌入入党内的新党员则纠集在一起。这些人政治投机，唯命是从，不问是非，打击异己时不择手段，对人民疾苦无动于衷。反右派运动使这些人如鱼得水，逐渐在中共内取得主导地位，使这个党的法西斯成份大大加强。

中国的年轻人或外国人恐怕很难理解，被称为右派的人当年所揭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都是事实，所提出的主张也能证明是远见卓识。那么，为甚么除极少数人外，所有右派分子都认了罪，顺从地接受了长达二十余年悲苦的贱民命运呢？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1957 年那场为时虽然很短的「鸣放」浪潮（不到一个月），是 1949 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言论自由。那些对中共的批评和这种难得的自由气氛，曾在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一种希望，广大工人和学生甚至以行动——罢工、罢课和请愿示威等来呼应知识分子对中共的批评。1957 年五月下旬我在上海，那一个城市便有三十余家工厂的工人到中共市委请愿。然而毛泽东一旦发动反击，全国宣传机器一旦以一个调子鼓噪起来，特别是全国各地工人群众在党委和官办工会操纵下纷纷举行大规集会「声讨」右派分子，一时

间便形成铺天盖地的浪潮，似乎全国人民都和中共站到了一起，而昨天还被视为真理而受到热烈欢迎的种种勇敢的真知灼见，立刻成为「射向党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因大胆为民代言而被视作英雄的人物，顷刻间便成了「一小撮敌人」和「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宣传机器的鼓噪和周围的人（包括昨日的知己甚至今日的亲人）的敌意，造成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立感，使右派们知道，党既看中了你，一个不可更改的结论便已在那裹等着你；况且「态度」非常重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只能招来更坏的厄运。假使你已成家，就还要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妻子儿女少受一点牵累的问题。这样，你便不能不逐渐软下来，直至在一份结论上签字，接受一个政治死刑的判决，从此便开始你漫长的暗无天日的贱民岁月。

各类「分子」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究竟 1957 年至 58 年中有多少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官方宣称为五十五万，但我从一位掌握当年内部机密文件的人士处获悉，实际数字比这高。此外还有不算右派、但「实际上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中右分子」。仅四川省的「中右分子」就有六万多。至于大量不算右派、实际上被作为右派处理的人，如「疑似分子」、「烂言分子」、「右言分子」、以及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它帽子的，就难以统计了。

况且，当年还有属于依政策不得打成右派的社会集团，如中学生、工人或农民。中共没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只说他们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全国几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也是「按敌我矛盾处理」的。他们在随后二十余年中的境遇，也与右派分子无异。

若将在「反右斗争」期间被中共当局定成各类「分子」的人数汇总，当在一百五十万与二百万之间。

在中国城市裹，几乎没有哪个家庭其亲属与友人中没有甚么人是右派的。我和我的朋友们常常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小的聚会中往往就有几个人是 1957 年的「难友」。一个家庭中夫妇同是右派，或兄弟姊妹中有二、三人都被定为右派者，也屡见不鲜。我在香港和美国每作一次演讲，听众中自动上来向我自报身世的右派，总不下数人。而这种演讲，我三年多来在美国三十几个州已做了不下二百余场。

贱民岁月廿二年

没有哪个右派分子当时会料到厄运会延续那么久。所有被他打倒的敌人中，毛泽东似乎特别钟情于右派。1962 年，当毛泽东因他发动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导致三千万人饿死，以致不得不同意对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时，党内出现了也应为右派平反的呼声。安徽省作为试点，甚至已经给不少人平了反；北京各机关也开始进行。毛泽东赶忙出来制止，说：「对于 1957 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的问题。」于是全国立即刹车。一些已被本单位领导列入平反议程，遵命写了要求平反的材料的右派分子，则一概被视作「妄图为自己翻案」的死不悔改的右派，处境更加恶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许许多多右派分子，包括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又一次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但是，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一些人忽然发现，原来 1957 年的右派分子便是今日造反派的先驱；而当年主持反右派运动、把这些人打成右派的人，正是今日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对象——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越发证明了右派是冤枉的。而中共党组织这时又已停止活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一度出现了为一些右派平反的机会。不过，这种苗头很快就被压了下去。

到七十年代末期，侥幸没有在劳动中冻饿而死，未在屈辱与绝望中含恨自尽的右派分子，大约没有一个对于自己的右派问题有一天会翻案再抱甚么希望了。因而，当 1978 年底风传中共中央准备给 1957 年的右派平反时，很多人不肯信以为真。中共中央五十五号文件不过是给 1957 年右派中「结论做错的」少数人「改正」结论，并不含有任何大规模平反的意图。显然是经过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的极大努力，并经过邓小平的默许，这个文件在实行中才一变而为给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全部平反——承认划错，恢复当年的级别、薪金，共产党员则恢复党藉。

二十二年中间，从基层到中央，很多当权者是靠 1957 年后卖力推行左倾路线爬上去的。因而，给右派平反遇到极大阻力就不足奇了。毛泽东的「宦官」汪东兴首先反对，拿出毛泽东 1962 年的讲话——「1957 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邓小平随即回答：「不是给右派平反，不过是给结论做错了的人改正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平反，却称做「改正」的来由。大势所趋，即使那些当年在反右运动中大显身手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同意给这些人平反。不过，他们仍然竭力阻止给平反了的右派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恢复其原有地位。五十五号文件本来规定平反后右派应回到原先的单位中工作，但由于遭到党内强力反对，不出两个月，这一条就被改为「就地安置」了。所谓「就地」，对于许多右派说来便是留在当年他们戴着右派帽子被发配去劳动改造的农场或农村，或坐牢期满后就业的劳改工厂或农场，可能会给一份领干部工资的差事，也就是到所在县的县城文化馆当一个干事或中、小学做一名教员。江苏省的新华日报社和黑龙江省的哈尔滨日报社竟不许一个右派编辑、记者回归本单位。原因很简单，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的打手们已飞黄腾达，占据要津，允许右派回到本处工作，则等于使自己的活动的罪证每天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况且那些右派在能力和品德上一般都比打手们高出一筹，甚至当年就是后者的领导人，一旦归来，怎么安排他们的地位呢？

且说那些右派，除极少数人外，二十二年来不是被剥夺了全部工资，也是降了几级，绝大多数人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胡耀邦曾提出要给他们补发工资，主管财政的李先念一口回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由于许多右派与海外华侨有亲属关系，大约在 1980 年，宋庆龄（孙中山夫人）代表海外华侨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你们若真的没有钱，我可以建议华侨在海外募捐，用以补发右派的工资如何？我本人也可从我的财产中拿出钱来，如何？」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再次考虑这个问题，连续提出过几个方案，但结果都因遭到抵制而搁置。

邓小平对「反右」无忏悔之心

这不仅单是一个对政治受害者给不给予经济补偿的问题，它反映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中许多人对反右派运动负有罪责而无忏悔之心。邓小平本人的态度就是一种代表。尽管他同意给绝大多数右派「改正」，但仍顽固地认定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是「必要的」，因为确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那场运动的问题无非是「扩大化」，即打击人过多而已。为了给这种论点提供依据，甚至不得不留下几个当年的重要人物（民主党派的首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不予「改正」。又明知理亏，不得不派人去安抚那些人（都已故去）的家属，私下承认这些人也属无辜，但请他们「顾全大局」，即为了党的政治需要而任死者继续将右派帽

子戴下去。

邓小平是反右派运动期间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比毛泽东本人还积极地主张扩大打击面，因而自知罪责重大。从中央到基层，这种「用右派分子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大有人在。那些一贯左倾的老党员和1957年后靠整人起家的干部，自然也是以左倾路线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右派在他们眼中便给终是异类。

1981年党和军方保守派发动的第一次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以过去的「右派」作家白桦为首要打击对象。1987年的第三次「反自由化」运动，最先开除的三名知识分子就有两名是1957年的右派（王若望、刘宾雁），一位是反右派运动中被开除党籍的人（方励之）。这绝不是偶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甚至一度决定把1981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发展为第二次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运动，只因阻力太大、后果不堪设想才作罢。

历史不会被遗忘

反右派运动给中国造成的伤痛与灾难是至深至巨的。它葬送了中国一度出现的走向民主化道路的机会。它使中国丧失了埋葬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另辟蹊径的历史良机，走上一条邪路，不仅失去了二十年宝贵时间，并且为以后的中国留下了永远无法治愈或很难愈合的创伤；一个历史上空前庞大、贪婪的官僚集团章鱼般附着在中国的肌体之上吮吸着人民的鲜血；又因权力之集中而无能，法纪之阙如和传统道德之败坏，而使社会失去了对于邪恶的任何有效的制约机制。遂使种种罪恶现象洪水般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开来。

这四十余年来中国历史的惟一尚可称道之处，便是中国人作为人的觉醒。他们再不那么愚昧可欺。虽然中共当权者正在以加倍努力阻止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其手段之一便是使人们忘掉历史，历史是不会被遗忘的，毛泽东所缔造的那个制度终将被埋葬。

——本文原为《贱民岁月廿二年》，写于1991年。本书编辑有所删节。

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　　　吴国光

1956 年 9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落成不久的北京政协礼堂开幕。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报告全文约 45,000 字，其中仅四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1 一年多之后，1958 年 5 月，八大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还是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告。这次的报告，篇幅是上次的一半，大约 22,500 字。但是，在这短短的篇幅内，报告二十三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2

与此相应的，还有更为重要的变化。八大一次会议认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中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用八大一次会议政治决议的话来说，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 而中共的主要任务，就理应转变为集中解决这一矛盾。但是，时隔一年多之后的八大二次会议，却转而聚焦于阶级斗争。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他甚至说，「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4

刘少奇和整个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前踞后恭？中共对于中国主要矛盾的判断，为什么在短短的一年多一些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南辕北辙的突然转弯？从 1956 年秋季的八大一次会议，到 1958 年春季的八大二次会议，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中国政治出现如此鲜明、急剧的变化？

八大两次会议之间，是 1957 年；1957 年的中国最为重要的事件，是反右运动。换句话说，反右运动发生在八大两次会议之间，而八大的这两次会议则明显地代表了中国政治的转向。那么，理解反右运动，就有必要把它放到这一历史发展背景中来考察。本文所做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即把反右运动还置到中共八大的两次会议之间的历史脉络之中，研究反右运动与八大两次会议不同调门之间的关系。在以下的正文中，我们将详细研究 1956 年和 1957 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分析毛泽东怎样从他自己所说的「心情压抑」转为斗志高昂，并如何达成以他自己的意志来压倒党内另外的意见，从而主导中共路线和中国政治的目的。在这个

过程中，反右当然是关键的一环。不过，这一环与此前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反冒进」、群众「闹事」及所谓整风，是环环相扣的。在这绵密、紧凑、短促而多变的1956 年到 1957 年的政治过程中，我们看到，毛自始至终着眼于掌握中共决策和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要以他的意志改造中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发现，祸及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只是毛泽东要夺回他在 1956 年失去的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而展开的一场政治斗争。通过反右，他达成了目的，于是有了与八大一次会议调门截然不同的八大二次会议。

现在，让我们进入本文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梳理和分析八大一次会议经由反右运动到八大二次会议之间的发展脉络。

1956：毛泽东「心情压抑」

1956 年，毛泽东与他亲手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入「七年之痒」。用毛自己的话来说，这一年，他的心情受到压抑，整个一年心情不舒畅。5

为什么呢？因为反急躁冒进。这是毛后来挑明了的他感觉受到压抑的根本原因。6 本来，1955 年 12 月，毛为计划于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确定了反对右倾保守、加快经济建设的方针。12 月 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包括了党政军各部门和省市负责人一百二十多人的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毛说，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7 毛强调，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毛还说：可以设想，如果不加快建设，农业和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8 官方记载显示，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要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部门展开这个斗争。9

多种数据证明，在毛的心目中，这时正在勾画一幅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为 1955 年实现的所谓三大改造、特别是所谓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实现所激励，毛雄心满怀地认为经济高速发展将是接下来的题中应有之义。按照杜润生的说法，「取得 1956 年合作化的胜利，毛主席认为农业已经过关了，原来

是小农经济扯工业的后腿，现在是工业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腿了，因此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工业，搞起了『促进』运动。」「毛泽东预测，所有制改变以后，一定有一个生产力的大发展。」10 毛信心十足地告诉他的同志，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11——也就是不比打仗更难的意思。 1955 年底，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时候，毛在序言和按语中多次强调，要批判各个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毛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发展。」12 此前，毛还准备了《农业十七条》并将之发展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认为，「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因此，就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这样，「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31956 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以《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作标题，提出多快好省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实现更高的发展速度」，把「潜在能力发掘起来」，「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为富强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毛《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为思想主线，社论批评「我们领导者中间有些人思想落后于实际」，「安心于一种落后的发展速度」，「犯了右倾的保守主义的错误」。社论要求采取「使广大群众振奋起来」的领导方法，批评了「按常规走路，拖拖沓沓，害怕困难，看不见新鲜事物，看不见新问题，看不见先进经验」的「保守主义的领导方法」。14

为自己这样的毛式多快好省的思路所激励，毛把苏联的那一套经济建设方式看作是「紧箍咒」。借着苏共二十大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毛强调要走中国自己的不同于苏联的加快建设的路子。他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51956 年 3 月，在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强调：「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

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6 在这个背景下，四月间毛的著名讲话《论十大关系》，应该看作是毛试图总结他的经济建设思路的一种努力。这篇讲话开宗明义即强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7 虽然这篇讲话比较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实际，但是，毛的落脚点还是在于「鼓劲」，强调要「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18

从这些讲话中，我们看不到毛有什么心情压抑。相反，这时的毛雄心万丈，准备在经济建设上大显身手，准备创造出不同于苏联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问题是，好景不长，毛很快就遇到了挫折。在毛的冒进路线主导下，1956 年开年不久，中国经济即呈现「全面紧张」的局面，表现为各个行业盲目发展、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职工总数增长过快、生产秩序混乱、资金供应紧缺、货币发行量剧增等现象。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提出要反对急躁冒进。这种主张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 月 10 日，刘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既要反保守、也要反冒进的方针，并通过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传达全国。191956 年下半年，因此成为反冒进的半年。这个时候，毛落了下风。在这种状态下，毛不是不善于采取守势。我们知道，毛对这篇社论「很不满意」。20 但是，他当时仅仅表态「不看了」。21 无疑，他憋了一肚子气。直到 1958 年 1 月，也就是在反右之后，只有当毛重新夺得了主导权之后，在南宁会议上，他不仅公开了自己对这篇社论的不满，而且采取了激烈的反击行动，「把这篇社论当作靶子，系统地批，严厉地批，一段一段地批」。22

9 月份，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正是刘少奇等人的主张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而毛当初所确定的八大要「反对右倾保守」的基调，已经不见踪影了。刘等人对于八大一次会议的这种主导力量，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建设方式上，而且表现到政治路线和权力架构上。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整个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冻」潮流的影响下，中共八大党章取消了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强化了党员权利和党内民主的因素。在政治路线的确定上，尽管毛对八大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提出异议，但是整个中共领导层对此似乎并没有认真对待。在权力架构上，毛退居二线，而且下一步更有仅作

「荣誉主席」的安排。从 1935 年遵义会议之后，二十年来，毛的威望、地位、权力和影响，在中共内部乃至中国政治中，总是在不断增长，现在却第一次出现了衰退。

当然，退居二线是毛主动提出的，从党章中取消「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也得到了毛的同意。中共的官方人士和桂冠学者，以此论证当时毛和他的政治局同志如刘少奇等之间并没有权力斗争。23 但是，主动提出，可以是一种试探；而刘少奇们当仁不让，毛的心中如何滋味，恐怕即使是官方人士和桂冠学者们也并不知道的。毛本人倒是透露了一点想法。1956 年 11 月 15 日，八届二中全会上，毛在讲话中说到：「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24 显然，毛在担心自己的权力地位。如果毛对八大一次会议的看法，也像中共官方史学那样，认为是什么「伟大胜利」，他怎么会说整个 1956 年自己心情压抑、不舒畅呢？

1957（上）：从「闹事」到整风

这就来到了多事的 1957 年。毛不怕多事。毛在这一年的政治运程，与 1956 年形成鲜明对比。1956 年，以六月份为转折点，毛是开高走低，从豪情万丈到心情压抑；1957 年，也是以六月份为分界线，他却开低走高，反手重新取得了中共决策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毛是怎样做到呢？本文发现了两个转折：一个是从「闹事」到「鸣放」的转折，一个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通过这两个转折，毛实现了他的胜利。本节讨论前一个转折，下一节分析后一个转折。

1）「闹事」：

1957 年开初，形势对毛、乃至对整个中共并不有利。1956 年冬季到 1957 年春季这大约半年的时间里，据中共官方文件透露，「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它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共有一万多起罢工和一万多起罢课。25 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在 1 月 18 日至 27 日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此有一番议论。他说，好多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中出现了「不要共产党」、「社会主义不好」等怪议论。毛把这些现象和苏共二十大挂起钩来，并且认为可能出现相当严重的局面。他说：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要从最坏的可能设想，准备出「匈

牙利事件」，要注意继续暴露出来的各种思想。26 按照毛这些讲法，显然是把这些所谓「闹事」看成敌对事态。他当时也确实谈到了「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意味着把这些事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根据邓力群的回忆，毛在那个时候开始强调，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矛盾并没有完全消灭。27

不过，事情的蹊跷在于，毛泽东随后所确定的对待所谓「闹事」的公开口径与处理方式，却与这种看到「蚂蚁出洞」、强调阶级斗争的判断很不一致。二月间，毛提出了他的所谓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2 月 27 日，也就是省委书记会议之后整整一个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其中第九节专门讨论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这里，毛的判断与一个月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现在，毛认为，发生闹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因此，相应的对策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一个月前，他忧心忡忡地设想「最坏的可能」和在中国出匈牙利事件；现在，他却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28 毛为什么忽然变得这样开明了呢？也许，同一篇讲话接下来的一节，透露了某种消息。那里，毛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坏事变好事」的说法，提到因为这些坏事而「无权将变为有权」29——当然，明里是就国际形势而言，没有说这也适用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在民众「闹事」的同时，毛也试图「闹事」，开始寻找机会发泄自己 1956 年的那种压抑心情。也是在一月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在十八日会议开幕讲话时，第一次在党的高级干部范围内公开表达了他对于「反冒进」的不满。当然，这时他的表达还是相当温和、委婉的。毛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右倾，这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30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这同一个会议上，头里，毛在那里对于「反冒进」发他的牢骚，后头，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于毛并不给予多少理会，而是继续讲他们的「反冒进」思路，并按照这一思路布置经济工作。也是在 1 月 18 日的会上，紧接着毛的讲话之后，陈云作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试图总结 1956 年财政经济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教训，大谈「经济稳定」和「比例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了财

政收支、银行信贷、物资供需三大平衡的思想。31 陈云强调「适当压缩基本建设的投资」等措施。根据中共官方史学家的看法，这些措施对于 1957 年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32 在此之前，1 月 8、9、10 日，连续三个晚上，毛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了小范围的会议，座谈 1956 年的经济工作，陈云在发言中大体陈述了他 1 月 18 日讲话的基本内容。331 月 10 日，陈云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该小组被赋予「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权力和职责。34

上述情况，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从 1 月 27 日到 2 月 27 日，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他对于「闹事」的看法和对策？其次，毛泽东对于 1956 年「反冒进」的不满，已经在公开场合有明确的表达，为什么他的政治局同事们并不重视？目前所能看到的历史材料，还不足以完全回答这两个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问题，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可以联系起来考察的。根据并不充足的相关历史材料，本文对此提出三点推测：

第一，陈云对于 1956 年经济工作的看法和相应的经验总结，在中央领导层中有相当普遍的共识；另一方面，毛的看法则与这些共识很有距离，他的权威因此被领导层的共识所压倒。也是在毛召开的颐年堂会议上，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等四人，在各自的发言中，一致认为 1956 年「冒了」。陈云讲话即前述意思，李富春使用了「冲昏头脑」的话，薄一波列举了 1956 年经济生活中的十个问题，李先念则从财政的角度认为 1956 年「冒了」三十到三十五亿。35 毛对这四人的发言作了详细笔记，还把薄一波的看法总结为「薄十条」，36 说明他无法轻忽这些财经重臣的看法。必须指出，这距离中共八大一次会议结束才刚刚三个来月，毛对于中共中央的高层政治生活比较不那么具有权威。毛在经济问题上的发言，在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这一段期间，显然比较不受他的同志们的重视。这就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尽管毛对「反冒进」不以为然，陈云他们还是照样讲话，并且被赋予统管全国经济的重大权力。

第二，既然陈云们可以在毛有牢骚的情况下照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反过来，陈云们有表达机会和领导权力，也并不表示毛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相反，毛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在颐年堂座谈之后，他于 1 月 18 日反而公开了自己对于反冒进的不满。按照毛的思维方式，在居于少数的时候，他会认为自己是在「反潮流」，「真理在少数人手中」；而按照他的行事逻辑，有这么多的领导人

反对他的观点，正说明问题严重，必须采取非常手段来解决问题。事实上，历史资料说明，毛一直坚持认为这些财经事务领导人是右倾保守的，虽然他在 1957 年 1 月并不直接表达这个看法。直到 1958 年 1 月，也就是经过了以反右为轴心的一系列政治事态发展之后，到了毛已经掌握政治主导权的南宁会议上，毛才对他们算旧帐。他说，1955 年 12 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会上，周恩来受到严厉批评，以至打算辞职。37 陈云则此后基本赋闲。毛还在会上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38 南宁会议之后的 1958 年 2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的批评继续加码，说所有那些主张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39 这里，毛直接用「右派」作为基本的政治坐标，来把他对于 1956 年反冒进的反攻倒算合法化，来在政治上压倒他的政治局同事。一年以前，1957 年春季，也就是反右运动之前，有同样看法的毛，也同样试图表达了，但却不能这样痛快地表达，也不可能因此改变中央的经济工作方针和经济工作权力架构，更不可能是自己的看法占据至高的政治优势。在劣势的情况下，如果毛因此会思考通过什么手段，才能取得对薄一波们说这个话的优势地位，恐怕也是一个所谓政治家很正常的反应吧？

第三，利用群众「闹事」所表达的不满，打击一下这些「当权派」的「官僚主义」，恐怕就成为毛的一种战略选择了。按照他的政治思维，毛从「闹事」中发现了「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按照他的权力思维，毛要利用一下这些「阶级斗争的新问题」来为实现自己的政治和权力目的服务。可以推测，当毛柳暗花明地思考到这里时，他豁然发现，群众「闹事」不仅不可怕，而且可以「坏事变好事」了。怎样把它变成好事呢？毛有他的「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即整风。「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这个话，是毛在 1956 年 11 月八届二中全会期间讲的。40 而那次全会，正是反冒进的高峰。可以想象，毛从他感到压抑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如何改变这种压抑状态，也就是思考如何掌握政治主导权了。1956 年冬天，他已经有了初步的思路，就是重施延安整风的故伎；而到 1957 年初，他的战略战术随着「闹事」等事态的发展而逐渐在头脑中清晰了，这就是：借助社会压力，实行党内整风。

2）整风：

毛马上行动了起来。1957 年 3 月，毛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始布置整风，针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张「放」。41 然后，毛就「南巡」了，到了南京、上海等地，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在当地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时，毛把他自己在一月份看作风雨将至、「蚂蚁出洞」的那些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统统「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并豪迈地发问：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谁怕批评？42 对毛和他的听众来说，答案当然是毫无争议的。

四月底，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43 原定 1958 年进行整风，1957 年仅是进行准备并在适当范围试行。44 但是，毛已经迫不及待。在 4 月 27 日党内发布整风指示之前，4 月 19 日，毛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在十五天内用电报报告：「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45 把那些忠心耿耿维护他的共产党政权、因而敌视乃至镇压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罢工罢课等行动的官僚们，放到这样的问题下质问，毛的意图，对于我们已经了解他早些时候对于所谓「闹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判断的后来者来说，一下子就变得十分清楚了：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这是毛的一贯手法。「鬼」总是那些人，就是党内并不亦步亦趋跟随毛的人；「钟馗」很多，这一次是「闹事」的民众。

但是，「闹事」闹过之后，不能继续鼓励。这是一位不好使唤的钟馗，难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弄于股掌，指挥如意。为了更好地达到「打鬼」的目的，毛还要请新的「钟馗」。5 月 4 日，毛再次替中央起草指示，要求各地党委「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指示说，「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毛强调，「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46 于是，轰轰烈烈的鸣放运动开始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毛又提出了一个甚为敏感的问题。他提出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并且首先是面对所谓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提出的。4 月 30 日，毛对陈叔通、黄炎培谈了这个想法，并「嘱我们（即陈、黄—引者注）透露消息」。47 这个消

息产生了复杂的政治效应。陈、黄等人，马上诚惶诚恐，要求毛留任；相比之下，党内那些早就同意毛退居二线、也赞成毛卸任国家主席、甚至赞成毛在适当的时候卸任党的主席的政治局同事们，在毛看来，是更加体恤毛呢，还是有些不够意思呢？社会上有传言，说党中央开始分裂，毛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48 当然，毛后来确实辞去了国家主席，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一举动及其效应，不是产生了一些微妙的政治后果吗？第一，这就为整风注入了有关高层权力斗争的想象；第二，造成了毛是开明的、而另有领导人是官僚主义后台的印象，而那些领导人甚至要逼迫毛下台！就是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劝进表态，不是也有助于让人在对比中看出那些刚刚在八大取得治国大权的中共领导人的一些问题吗？整风鸣放的矛头应该指向哪里，难道毛没有给出暗示和指引吗？

1957（下）：从整风到反右

不过，对于那类寄希望于开明伟大的毛而针对党内「有人」的所谓群众好意，毛却认为是「完全造谣」。49 利用归利用，阶级斗争归阶级斗争。由于存在阶级斗争，毛很快就觉察到，整风中大鸣大放的矛头所向，并不只是针对他认为是官僚主义的现象及其权力代表，更不仅是针对「小和尚」，而往往会针对「老和尚」，针对毛本人，针对毛所领导的这个党和毛所创建的这套制度。50 有的批评意见明确说，「三害」（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51　就是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一些知识分子也有另外的看法。在决定展开对于所谓右派的反击的时候，毛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特意提到了右派分子的这种看法:「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52

就是否害怕批评而言，毛其实是纸老虎。从 5 月 4 日毛替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算起，党外人士发表意见不过十天而已，毛就已经受不了了。5 月 15 日，毛起草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党外人士中发现了「右派猖狂进攻」。可是，这篇文章当时秘而不宣。53 因为毛认为「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所以，在做出「右派猖狂进攻」这样一个判断的同时，毛依然在 5 月 16 日指示全党，「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54 大约是根据这一指

示，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官员，在五月底，还三番五次动员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发表鸣放意见。55 动员成功的结果，就是那篇以批评「党天下」而名留青史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最迟，到 6 月 6 日，也就是反右运动正式开始的隔天之前，毛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最后一个要求「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56 为了下一步的辉煌战果，毛要中共党员干部、也要自己「硬着头皮顶住」。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候，毛还没有忘记「一鷄两吃」地利用「右派进攻」的「剩余价值」，即通过这样的「整风」来「揭露」党员干部的「缺点错误」。57

另一方面，在「诱敌深入」的同时，毛也耐不住要送出一些「歼敌」的信号。5 月 25 日，在接见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毛在简短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而「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58 在短短一百多字之中，毛已经鲜明地把他的所谓辨别香花与毒草的两条根本标准突出了出来。30 日，毛要求胡乔木转载一篇批判章乃器的文章，但特意提出「何时转载适宜」的问题。59《人民日报》是 6 月 8 日转载这篇文章的，也就是毛指示中共各地党委「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那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那一天，反右运动正式登台的那一天。

与 1956 年 6 月毛对《人民日报》有关反冒进的社论送审稿采取「不看了」的消极态度相比较，1957 年 6 月的毛异常亢奋。继六月八日《这是为什么》的《人民日报社论》之后，6 月 10 日，毛亲自部署「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撰写的「编辑部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6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不平常的春天》，这也是经过毛亲自修改的；7 月 1 日，毛再次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毛就出巡了，而且打算在长江三峡游泳。607 月 9 日，毛从外地通知中央，「反攻应当扩大」。61

显然，自从开始整风，毛就增加了对于中央决策权的掌控；而反右一旦展开，毛就完全掌握了主导权，很有高枕无忧的感觉了。到十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即八大开过整整一年之后，毛即修正了八大的路线，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62 而在上一次中央全会上，即 1956 年 11 月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还附和八大对于社会矛盾的判断，说「国内

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虽然那时他也强调「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动」。63

在三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毛还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即「一种慢一点、差一点，一种快一点、好一点」。64 毛的主张，只能是「快一点、好一点」的那一种。那么，有人主张「慢一点、差一点」的方法吗？是什么人在主张这种方法呢？当然不是右派分子。事实上，1957 年早些时候，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毛也含蓄地但是颇为理论化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强调，经济建设方面存在着客观规律和主观认识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将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即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65 当然，毛不会认为自己属于「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谁是这些人呢？当然也不是右派分子，因为他们已经属于敌人，而在那个时候，毛还认为那「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同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一些人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等到七、八年之后，在毛的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那些「比较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人，就成为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概括地说，通过反右，毛在两个层面上夺回了对于中国政治的主导权。第一层，关乎如何界定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如何确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方位，判断中国的根本问题，从而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第二层，关乎如何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就是采取什么样的道路、方法和步骤来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两层背后，就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从来不是空洞的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它首先就体现为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力。在掌握了这样的影响力之后，毛对于他的政治局同事的权威，就今非昔比了。按照薄一波多年之后转述的「同志」们的看法，从南宁会议前后开始，「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薄一波认为，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或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66 如前所述，毛把反冒进和右派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反冒进与所谓右派进攻是互相关联的，前者为后者铺路。这样，在 1957 年夏季及此后，那些一年之前还在积极地反冒进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显示自己与右派并没有政治上的关联，就不得不特别拉高反右的调子。也如薄一波所回忆，这「表现在去年（1957 年——引者注）6 月 23

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67

这里，一个可能引起兴趣的问题是：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蓄意「引导」所谓右派「向党进攻」而造成，还是整风失控所引起的？按照毛的「引蛇出洞」的说法，按照常见的对于反右运动的分析，似乎应该是前者；而本文提出的先有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再有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的看法，特别是强调这两个转折的着眼点都在于毛从他的那些经济现实主义派的党内领导同志手里争夺政治权力的论点，则似乎容易导向后一种结论。但是，实际上，本文对此没有定见。这首先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史料来回答这个问题。从现有的数据看，应该说，前一种看法可以得到较多历史数据的支持。毛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由来已久。整风伊始，毛就说过，「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 68 其中，可以看得出已经有了对知识界下手的打算。到了判定「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候，毛更明确地写道，「共产党整风告一段落之后，我们将建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实行整风」，「现在是党外人士帮助我们整风，过一会我们帮助党外人士整风」，69 显然要转过头来对付党外人士了。整风对于毛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1957 年 6 月，毛强调过，整风是「天下第一大事」。70 这可以帮助说明，毛在构思、部署和发动整风之际，应该是有所谓「一盘棋」在胸的。在这个意义上，本文倾向于认为，第二个转折，即从整风到反右的转折，是毛在决定第一个转折（即从「闹事」到整风的转折）的时候有所前瞻并有所预谋的。因此，反右可以说是一个阴谋连环套，「阴谋后的阴谋」，「阴谋中的阴谋」，阴阴为阳，是为「阳谋」。

不过，本文并不愿意把这种看法推到某种比较极端的程度，认为毛自始至终成竹在胸、操纵全局、指挥如意、节节推进。诚如赫鲁晓夫所言，「毛泽东简直就是隐藏自己思想和意图的大师。」71 换句话说，毛从来都是一个阴谋家、战略家、权术高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能够未卜先知。相反，毛总是随时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战略，同时保持他的目标不变。正是因为这样，毛在 1957 年制造了两次转折，得以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闹事」不危及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政治利益的时候，借助群众尤其是「民主人士」的批评来打击和压制党内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而在这种批评质疑中共地位、制度和毛本人的时候，又反过来强调

阶级斗争，以此压倒中共八大集体确立的政治路线而代之以自己的政治路线。从「闹事」到整风，借助钟馗可以打鬼；从整风到反右，借鬼也可以打击钟馗。形势历经转折，毛的目的只有一个：夺回权力；知识分子和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两败俱伤（当然，这一次，后者比前者伤得轻多了；真正的两败俱伤要等到七、八年之后），而唯有毛取得了胜利。

1957-1958：从反右到「大跃进」

一旦毛的政治主张通过反右而占据了中共的主导地位，毛就要实施自己的主张了。必须指出的是，毛这时的主张，固然强调阶级斗争，但是并不因此排斥经济建设。如前所述，只是毛有自己那一套经济建设的主张和路数就是了。结果是，毛一旦取得政治胜利，我们就可以嗅到大跃进的气味了。因此，1958 年，从政治上说，是从反右运动取得所谓胜利的时候就开始了。

1957 年 10 月起，八届三中全会起，毛在自从反冒进之后的一年多不怎么谈经济问题之后，又开始大谈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问题了。10 月 9 日，毛在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争取丰收的报告上批道：「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72 九月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在 1955 年底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本人则在十月中再次亲自修改这份文件，并要求很快把《纲要》在报上公布。731958 年 1 月，毛召集南宁会议，大肆批评反冒进，并在这之后，亲自统揽了经济工作的大权。74 这等于说，毛泽东不仅从二线杀了一个回马枪，再次站到「一线」，而且在「一线」特意选择了经济工作的领导权——这项两年之后他自己承认「我就不大懂」的领域。75 然后，就是「大跃进」了。在「大跃进」高潮中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其政治结论和政治意义，就是本文开头所说的那种内容了。按照毛自己的总结，是个马鞍型，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低潮就是反冒进。76 换句话说，反冒进和反冒进过程中举行的八大一次会议，使毛的权力进入低潮；而整风、反右则改变了这种状态，把毛再次送上了专制权力的高峰。

结论：动态的历史，政治的枢纽

经过以上对于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分析之后，可以说本文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从「闹事」到整风、从整风到反右，有两次转折：毛先是企图利用

知识分子特别是民主党派来反对党的官僚，用所谓「整风」打一下刘少奇们；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一战略并不奏效，相反，知识分子的矛头对准了整个党国制度，包括毛本人。于是，毛就反过来，对知识分子痛下杀手，用这个血淋林的镇压凸现所谓阶级斗争的激烈、残酷、你死我活，同样胜利占据了中共路线和权力主导的制高点。对第二个转折，过往的研究都清楚地看到了，但第一个转折则往往被忽略了。由于这种忽略，鸣放运动的出现就显得突兀而缺少逻辑，或者容易被理解为毛和中共有其开明、民主的一面，只是在「民主」触及到制度根本的时候才被迫还击，或者被完全看作毛所自诩的「引蛇出洞」，好像一切都在毛的掌握之中。而从上文的叙述和分析中我们看到，「引蛇出洞」仅仅是 5 月 15 日到 6 月 8 日之间毛的战略，并不能完全解释此前毛为什么发动鸣放运动。只有看到第一个转折，事情的脉络才变得比较清晰一些了。可以说，看到了这两个转折，在历史层面，才能够较为清楚地展现历史的动态，而在概念层面，也才能较为清楚地看到中共极权制度下专制权力运作和专制制度运行相互作用的深刻图景。

本文的第二个发现，也展现了历史的动态，那就是：毛泽东并不是从来不要搞经济建设。恰恰相反，毛在五十年代中期热衷于所谓「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鼓吹提早实现现代化，「十五年赶上英国」。但是，毛并不尊重经济规律，更不懂得现代化建设。这就导致了毛与他的那些试图了解经济规律、学习如何搞现代化建设的同志们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表现为对于国家决策和治理权力的争夺。毛的许多听起来很具有进步性的看法，比如对于官僚主义的反感、对于苏联经验的不满、对于所谓群众首创精神的尊重，其实都是和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了维护和推展他的经济冒进主义而提出来的，因此并不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反过来，他的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经济规律的党内不同意见持有者们，比如陈云，也不过是在与毛的对比中比较具有接近实际、阶级真理的质量，而放到另外的历史和制度环境下也就不一定具备这种质量了。

毛的完全放弃经济建设、一心专注阶级斗争，是经过了本文所研究的历史阶段之后又一个回合的斗争和起伏才形成的。那就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以及此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度主导政局的那段故事了。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但是，历史有时候惊人的相似，历史更总是有其千里灰线的联系和脉络。1958 年起的「大跃进」，可以说是 1956 年毛泽东经济冒进的放

大；而一九六零年代初的形势，则很像八大一次会议前后的情景。至于「文化大革命」，则就是反右运动的转胎和其登峰造极的发展了。比如说，1957 年的时候，大学生们还主要是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年轻人，毛不想使用；但经过鸣放运动，毛也领教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不好使唤，于是「文革」伊始毛改为发动青年学生大鸣大放。又比如说，中共经济务实派的领导人，仍然是斗争的目标所在，不过，从反右到文革，毛已经把他们从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看成为敌我矛盾了。还比如说，从反右到「文革」，知识分子都一同遭殃，因为他们与经济务实派领导人一样，对毛来说，同是在政治主张和政治权力上的两个心腹大敌。可以说，毛生活在两个「权力场」之中，一方面面对所谓阶级敌人，包括所谓「右派」，另一方面则面对党内的潜在的对于自己主张和权力的挑战者，即五十年代的所谓「右倾保守分子」和六十年代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在毛这里都是交织在一起的。而对毛来说，只有掌握无人能够质疑和挑战的权力，才能取得所有这些斗争的胜利。为了这样的胜利，毛权谋百出。不过，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眼光，并不难发现，毛亦不过「技止此耳」。甚至包括毛在「文革」中使用的政治伎俩，乃至一些细节，也有很深的脱胎于反右伎俩的痕迹，包括「出巡」时机的掌握、安排在长江游泳等等，都如出一辙。可以说，从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反右运动不仅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时代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毛时代的中国的基本政治走向。在这个意义上，反右运动是理解毛时代中国政治的枢纽事件。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释

1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 38—117。

2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页 285—325。

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340—355。引文见页341。

4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页288。

5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载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北京：三联书店，2006，页24。

6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24。根据邓力群的回忆，1957年，毛在杭州，对周恩来、彭真和胡乔木讲了这个话。

7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18；石仲泉、沈正乐、杨先材、韩钢主编，《中共八大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页117。

8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18；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117。

9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4。

10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页75-6。

11 毛泽东1955年十一月十七日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转引自张家敏，《建国以来，1949-1997》，香港：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页198。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页487、485。

13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一月二十五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23。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页1-10。引文见页6、10、9。

15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14-5、24。

16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9。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页82。

1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104。

19 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页4—5。

20 此处引语来自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 23。

2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页 538。

22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 23。

23 例见，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石仲泉等，《中共八大史》。

24 转引自叶永烈，《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香港：天地图书，1995，页 58。

25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1957 年三月二十五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 154-63。引文见页 154。

26 姜华宣、张蔚萍、肖苏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6）》（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 265。

27 邓力群，〈我所知道的党的八大的一些历史事实〉，页 27。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351-2。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354。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页 363。

3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 1-11。

32 姜华宣等，《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6）》（增订本），页 265。

3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上卷，页 541。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页 360-1。小组的其它四名成员是：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

3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页 541。

36 同上。

3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39。

3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555。

39 《陈云年谱》（中卷），页 410。

40 姜华宣、张蔚萍、肖苏主编，《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1921-2006）》（增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页 263。

41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三月十二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378-95。
42 毛三月十九日、二十日分别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相关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03-5。
4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页 222-6。
4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22，注 2。
4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32-3。
4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55-6。
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58。
4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93。
4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93。
50 「小和尚「和「老和尚「是储安平〈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中的用语。见下文。
51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12。
5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03。
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75-6，注 1。
5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78。
55 穆欣，《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北京：东方产社，2006，页 38。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91-2。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78。
5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88。
5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89。
60 〈关于拟在三峡游泳给中央的电报〉（1957 年七月七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35。这次游泳未能实现，因为「根据试水情况，中央常委没有同意「（注 2）。
61 〈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1957 年七月九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37-8。
6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95。

6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245。
6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94。
6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357。
6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53。
67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45。
6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55-6。
6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75。
70 〈关于注意阅读整风消息的批语〉（1957 年五月十四日），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468。
71 《赫鲁晓夫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页 659。
7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599。
7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页 604。
74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页 226。
75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页 167。
7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 641。

从八大的悬案看整风到反右的「转向」　　齐 戈

对于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研究者甚多，对于整风到反右的具体过程，出入不大。但对「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始终让人疑惑不解，众说纷纭。事情过去五十年了，这个突然转向的原因何在？还是不得要领。阴谋也好，阳谋也罢，只要我们就事论事，这个争论多半没有什么结果。不过，当我们把「反右」运动置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置于中共八大修改党章报告的反对个人崇拜，并由此将党章中删除涉及毛泽东思想的相关部分，以及紧接其后的匈牙利事件，八届二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背景中，这个从整风到「反右」的所谓阳谋，反倒更加真实地显现在我们面前。而对这个背景的解读，就不得不从胡绳所说的八大的一桩悬案说起。

所谓八大的这桩悬案，是指毛泽东在八大之后不久，出尔反尔，否定八大政治决议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如此天大的事情，自己参与修改达21次并亲自定稿的决议，伟大领袖竟能以如此理由来否定，无赖嘴脸可见一斑。对党内尚且如此，对党外那些民主人士无论如何对付都在情理之中。这件事发生在八大之后、八届二中全会之前，时间大约在56年的10月左右。

中国共产党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并把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作为今后党的主要任务。为了避免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八大」决定加强党内民主，反对个人迷信和专断。并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为契机，在党内提倡集体领导，淡化具有个人崇拜色彩的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共产国际也好，之后的苏联老大哥也好（包括斯大林），从来就是不予理睬。在中共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文件的交往中，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一般都不会出现，即使是毛本人批发的文件也是如此。对此，胡乔木解释说：「这与苏联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不感兴趣有关。」1 因此，在八大通过的党章里删除了与毛泽东思想有关的章节，可以把它解释为考虑到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加强集体领导等等。总之，只要在面子上说得过去，既无伤大雅，又得到实际效用，应该是相安无事的。

问题是，毛泽东是信奉「不搞一个主义，即使当上了领袖，在其活着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2 的人。在延安整风花了多大的力气才树起的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这八大一开，这个权威就不提了？在七大时为什么要提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有这个需要。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提毛泽东思想，很难在全党形成思想上的统一。」3 那么现在就没有这个需要了？没有毛泽东思想全党的思想也能统一了？因此在八大讨论时，一些代表对此有些议论，刘少奇这样解释道：「毛主席对全党的领导是在七大上确立的，现在即使我们不谈它(意指毛泽东思想)，每个人也都清楚。」4

事情真如刘少奇讲的那样？其实不然。在1956年7月《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以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话题。这股「逆流」对毛泽东本人的冲击不可低估，并成为紧接

其后相关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虽然他在公开场合对斯大林问题不得不敷衍几句，在背后他讲得更多的则是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这把刀子不能丢」之类的东西。而新华社编辑的内部参考，却大量登载了中国社会各界的种种议论。人们不仅为赫鲁晓夫揭露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感到震惊和不解，而且已经有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党内有没有个人崇拜？天津市干部提出，「今后歌颂领袖时应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词句，应考虑改变一下」。5 广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说，「苏共能够这样暴露缺点，才是发挥民主精神。」「我们过去有时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是不够恰当的，带有封建色彩，也是个人崇拜，忘记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力量!」

对于与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互动的国内动态，毛泽东的恼怒可想而知，但他却能深藏不露，装出一副胜似闲庭信步坦荡来。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双百方针竟由毛泽东认可正式出台了！对于双百方针，国内多以正面的评价为主；国外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恰好相反，始终是把双百方针与反右运动看作是个互动的整体，而并不太关注整风与反右的关系。在毛泽东公开场合大讲双百方针之时，他背后却是念念不忘斯大林主义这把刀子。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突然冒出一句：「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6 就是一个明证。这次讲话的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与他提倡双百方针是同一时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三刀可见一斑。由此可知，八大通过修改党章删去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的部分，无论毛泽东表面上怎么讲，同意也罢，赞成也好，都不过是违心之论。不但「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的说法可以说明这点，紧接其后的这桩「悬案」更能证明这点。

胡绳在《谈党的「八大悬案」》一文中写到：「党的八大时发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会通过一个政治决议案。可是过不久，毛主席说不行，是错误的，他不能接受。说当时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八大政治决议案哪里错了呢？既然这是不对的，那对的又如何呢？胡绳说：「在决议上主要矛盾提了三点。毛主席似乎主要攻最后一点，为什么不攻前面两点？可以说是攻其要害，因为第三点带点理论性。……所以毛主席在这时候有些想法，和起草决议的人处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呢？都是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但在这个前提下，毛主席还有点保留，就是阶级、阶级斗争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所以后来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在决议中没看到。」7 作为理论家，胡绳把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理解，情理之中。但真是理论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还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这段话，有必要多说几句，因为这句话后来浓缩、演变成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阶级斗争」。讲阶级斗争，就要讲无产阶级专政，于是这就成了一对概念，一个范畴。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事实上也在提醒诸位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什么？是暴力，是国家机器。懂得这一点，就懂得了毛泽东理论之争背后的实质。那么，阶级斗争在我们政治生活中是理论问题吗？不是。从庐山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其间政治运动无数，哪一次不是讲的「阶级斗争」？从党外到党内，从地主、资本家到知识分子，最后干脆整到农民头上。农民算什么资产阶级？算！算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了这根资本主义的尾巴，当然就能割到农民那里去。当年那些农民已经讨口要饭了，也能称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潜台词就是要专政！

所以，阶级斗争在我们那个年代里，没有什么理论的含义，不过是根打人的棍子、暴力镇压的武器。就如同延安整风时期，所谓教条主义一样，就是拿来制服张闻天等人的棍子。只不过阶级斗争这个棍子，比教条主义这根棍子更血腥！打遍中国无敌手，一直打到继续革命那里去。有阶级斗争作先锋，有无产阶级专政为后盾，这天下岂有不服之理？而这根棍子，恰好是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八大在党章中删去与毛泽东思想相关章节这个背景下，最能维护毛泽东皇权政治的法宝。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对八大政治报告的态度，但要把八大的政治决议反掉，凭「他是被迫签字，临时匆忙签的字」这个理由，确实是拿不出手的无赖说法，不过毛泽东自有他的办法。事情也很凑巧，东欧的政治反抗加剧了，这无疑给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大批八大政治决议提供了依据。二中全会是 56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距离八届一中全会不过 42 天。11 月 14 日，毛泽东作临时发言就明明白白地说了：「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

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这才是他推行双百方针、整风的大鸣大放背后的真实。显然，这才符合毛泽东本人一贯的政治本色；而所谓双百方针、帮助中共整风，对热衷于一党专制的毛泽东来说，却是一个反常、一个真正的 180 度的大转弯。与此同时，毛泽东通过八届二中全会公报发出另一个信号：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这就是 57 年整风运动的由来。对于「整风」这个概念，党外人士未必明白就里，而对党内人士来说，岂有不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的道理？这个「整风」的厉害，刘少奇清楚，周恩来也清楚，毛泽东就是靠延安整风，整倒了党内反对派，成就了以他为核心的大一统。其斗争之残酷、血腥，不是过来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毛泽东整风提议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这对党内的诸君来说，没有哪个不清楚。

整风运动有没有针对党内政敌的动机？当然是有的。不过，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以及党内体制的原因，党内的各派力量，尚不足以撼动毛泽东。因此，即使毛泽东对党内摆出一副攻击的姿态，不过是敲山震虎，提个醒、吓唬吓唬而已。即使要整，也是少数、个别的，尤其是那些对一党专制毫无感觉，也没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那些愣头青。如此一来，那些跟着反个人崇拜转的、甚至想借此出徐州的人来说，不说是心惊肉跳，至少也知难而退了。毛一提出要搞整风运动，对党内的威慑足矣；对党内而言，提出整风之日，就是整风结束之时。既然如此，这个整风为什么还要搞下去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沛公不在党内，而是在党外的民主党派。

对于整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重要的只有一条：即整风是关门还是开门。毛主张要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而刘少奇则主张在党内关起门来整风；除此之外，在研究从整风——反右运动的大量文献和资料里，面上的东西歧见并不多。而这个「歧见」，恰好是说明整风是假，反右是真的关键所在，也是证明从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是个伪命题的关键所在。在众多的研究中，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所谓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还有章乃器、黄绍竑、龙云、费孝通、浦熙修等人的诸多「反党」言论，如轮流坐庄这类「野心」激怒了毛；还有人考证说，正是因为罗隆基讽刺毛泽东是「小

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的时候，毛内心深埋的屈辱感再度勾发。并把这当成毛泽东从整风突然 180 度转向而「反右」。还说从此不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走入深渊，连带着数亿中国人开始几十年的灾难。如此说来，这个罗隆基才是一言而兴亡天下的活神仙，比毛泽东的一句顶一万句还厉害？无稽之谈！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国内的反个人崇拜、直接针对毛本人的激烈言词，天天都由新华社的《内部参考》送到毛的桌子上。前面提到的那些言论，比罗隆基偏激者有的是。毛泽东听到的多得很，岂在乎罗隆基的一句话？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是要不要党外人士介入整风，而这才是问题的要害。试想，如果没有邀请党外人士来帮助整风，没有党外人士提意见，哪里还有反右不反右的问题。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还真是花费了一番心计；正是因为这条暗藏杀机的意见，才可能把那些与中共整风本无任何关系的党外人士联系起来；党外人士，自然也包括民主党派。

对于民主党派，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无论如何都是了解的。尤其是对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样的头面人物，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不会不知道。要他们来帮助中共整风，无疑是自找麻烦。但毛泽东偏要这样做，以至他不惜和党内高层产生分歧。毛泽东的动机何在？在反右运动没有开始之前，这姑且算是谜，但反右运动开始后，毛的动机昭然若揭。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政治理念，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毛泽东心里当然是清清楚楚的。这与他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为党和国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体制和模式。这就是在个人崇拜的旗号下，意识形态上的严格管理和舆论一律，政治体制上的一元化领导和人治」8 的政治理念分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对党内，与毛泽东思想不一致他都不能容，何况你党外？能容你一时，也不过是策略罢了，要修理诸位，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况且，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打造好了「阶级斗争」的金棍子，至于何时下手，那就看他如何造势了。而眼前，反个人崇拜的国际背景，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强调集体领导，政治决议讲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就会无动于衷？那好，我就让你们来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还心有余悸，那就请你们来帮助党整风。其实，象章伯钧、罗隆基这种政治思想的人，要么他不说，要说，不外就是民主法制、反对一党专制、外行领导内行那一套。对于让他们彻底臣服、成为政治花瓶的目标来说，这正是毛泽东希望

听到的。

除此之外，请党外人士来帮助共产党整风，则是毛泽东整人惯用的一个狠毒的伎俩，这就是借力打力、挑起群众斗群众。我们现在看到的多是在高层对整风的鸣放，其实更多的则是基层对各级党的领导的鸣放；提得最多的是对基层党组织的官僚作风、外行领导内行这类的问题。而这些恰好是基层干部最不愿意听到、最反感的。当毛泽东一说要反右，基层干部在整风时的那口恶气当然就撒在右派们的身上。要不然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是如何被整治下来的？而且被整得那样的血腥、那样的恶劣、那样的悲惨？在这个意义上讲，整风同时也是他发动基层干部参与整治民主党派的一个手段；这种因提意见在基层形成的对立，使基层干部自觉地成为了一党专制的当然打手。这种伎俩，毛泽东在党内屡试不爽，一直用到文革的各派群众组织之间。而在反右时，他利用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而挑起党内与党外人际之间的矛盾，并利用这个矛盾围剿知识界却被人们忽视了。

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他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样写到：「近年来，经过了狂风暴雨般的运动，受到了多次社会主义胜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分子原本已起了变化。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而著名翻译家傅雷在听了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 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9 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两千年的皇权政治，封建文化在他们的内心刻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痕迹。看了好些年的脸色，思想改造整得一个个灰头土脸，今天几句好话，就如天籁之音，一个个已不能自己。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对此回忆说：「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

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如果说傅雷是一介不懂政治的书生，章伯钧可是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摸爬滚打过的政治家。看来他们都不是毛的对手，他们哪里知道，在 56 年 11 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党内讲了：「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 一边大讲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暗藏杀机、磨刀霍霍；一方面大讲双百方针、讲人民内部矛盾、请你们帮助整风，一脸的春风和煦；你说他那句话是真的？凡是读过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讲话的人，没有人会认为从整风到反右有个突然转向的问题；读过 56 年 4 月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1 月《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一系列讲话，诸如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七开、斯大林这把刀子不能丢等等，更没有人会提出所谓从整风到反右是阴谋还是「阳谋」和突然转向这样的命题。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这根棍子把张闻天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将下来，而在他得到整个中国后，本以为有了这个毛泽东思想，自己又在 50 年五一节的口号里把毛主席万岁添进去，这尊神应该安然无恙。哪知天有不测风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反个人崇拜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就不得不把维护他在延安整风时争得的个人崇拜地位提到日程上来。对八大政治报告反对的真实动机，就是要为维护他的神圣地位死死抓住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那个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根棍子，在中国横冲直撞二十年，是他历来克敌制胜的法宝。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哪里还有松手的道理？在八大之后不久，更是不顾一切地捏在他的手上，并在八大二次会议再次确认后，成为中国皇权政治最大的家法。

综上所述，从整风到反右根本没有突然转向的问题。要说突然转向，这个一言堂主从双百方针到整风的这段时间才是——从舆论一律的专制主义，摇身一变成了虚怀若谷的民主战士，这才是天大的怪事、包藏祸心的表演而已。整风的大鸣大放，就是为修理民主党派制造一个口实。之所以要制造这个口实，是在双百方针后，民主党派不是没有、而是不敢上当，继续默默地接受中共无视共同纲领，从联合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一党专制的政治现实。从 54 宪法的出笼，到民主党派被赶出政府，到那个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的边缘化，一切都从侧面证实了：早在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就曾在致斯大林的一个电报中如此描绘他

的建国方案：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而民主党派该如何远离政治权利中心，除了把他们从政府赶到人大，把他们虚拟化——即所谓的政治花瓶，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大计。而整风的大鸣大放，不过是双百方针的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最终的目的就是制造一个口实，而且这个口实一定是民主党派自己说出来的。终于，他们都上当了！

这不由得使人想起匈牙利事件。当中共看到在东欧受威胁的不但是苏联对卫星国的操纵、而且是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时，其态度就是坚决镇压。当时应邀到莫斯科和苏共协商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苏联领导集团举棋不定时坚决要求苏联出兵。而毛泽东也同意出兵镇压，但他要求苏联再给匈牙利的所谓「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而这个时间点正是八大之后不到一个月。匈牙利事件的血迹未干，他居然能在国内提倡双百方针，号召帮助中共整风？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说转向，这才是他突然转向——从镇压、改造的暴力专政转到双百方针、大鸣大放的开明政治；但，这不过是个表演而已。其实，在这点上，他和处理匈牙利事件的策略一样：「再给「反革命」一点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再一网打尽。」要不然他在 57 年 5 月 15 号已经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并在党内高层秘密传达，5 月 21 日，利瓦伊汉还生拉死拽将章伯钧「请」到统战部去「帮助党整风」？明明是诱人进入白虎堂，还倒打一扒说人家是闯入军机重地，图谋不轨。这真算得是天下最不讲道理的道理了！

在此之前，通过镇反、土改这些充满暴力的威慑，再有思想改造、院系调整，中国知识分子不光是在精神上被摧毁，就连安身立命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这堆毛还能依附哪张皮上呢？当然只能寄人篱下，依附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张皮上去了。什么「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统统都成了屁话，活命是真，思想是假；吃饭是真，学问是假。章伯钧先生做官去了，罗隆基先生做官去了，成员们也纷纷吃上了官饭。据说，罗隆基先生说起政治来口若悬河，一套一套的，他怎么就不明白吃人嘴软的道理呢？吃饭还是自由，这是个问题，57 年反右时，多数成员都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谁管饭谁就是老板，院系调整后，毛泽东在给他们开饭，当然毛就是真正的老板。更何况，你自己的章程里就明明白白的写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章伯钧、罗隆基先生们已在不知不觉中由老板成了

掌柜，这些民主党派早就在懵懵懂懂中名存实亡了。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按照他报告斯大林的建国目标，把这些民主党派通通修理成名副其实、不敢多说半句的政治花瓶。这大概就是他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真正嘴脸吧！

对于政权来说，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打江山坐江山要靠两杆子，一是枪杆子，二是笔杆子。在建国以后，毛泽东对笔杆子的重视胜过枪杆子，所谓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舆论的控制，其力度可谓前无古人。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叫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政治战略的转移，即他一定要把他所谓统一战线的盟友们，从政治权利中赶得远远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东方专制政治游戏的铁律，习惯民主制的西方人岂能明白？院系调整完成了对知识界的包围，57 年就成了向知识界决战的最后时刻。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整个知识界必须向他俯首称臣。而之前的双百方针、大鸣大放，都不过是暴风雪前的一缕亮光，而我国的知识分子却把这当成了春的消息。

总之，中国知识界从此被置身于精神的蚕室任其阉割，独立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已不复存在。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已经高度统一在中共的旗帜下，这就是储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整风运动之初，这些民主人士在帮助党整风的引诱下，终于说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这类的言论，这看似犯了毛的大忌，坏了一言堂的规矩，其实这恰好是毛泽东最希望听到的。有了这个口实，毛泽东就可以说事情正在起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于是就反右，就讲阶级斗争，一点民主的希望都不能留给你。从此，中国更是中共说了算，而中共则是毛泽东说了算。中国向后退了一大步，而毛泽东却向一个更大的神坛迈了一大步。这哪里是什么从整风到反右的突然转向呢？从双百方针到整风的大鸣大放，不过是为中国知识界向他俯首称臣做的一场民主秀，这才是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史上一次最令人吃惊的突然转向。而整风到反右反而不是什么突然转向，而是他一以贯之的皇权专制的根本立场，是他「党天下」政治理念的必然结果。因此，反右转向之说不过是个假象，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他需要一个口实，于是就邀请诸位一起来制造这个个口实；而整风的大鸣大放，则是触发一场将知识界炸得粉碎的大爆炸的引信。而这一切，都是他定自己为一尊，容不得人的皇权政治、现代造神运动的必然。至于整风对党内的意义，他在八届二中全会就已经达到了，之后所谓和风细雨的整风，对党内不外是敲敲打打而已，免得他们再生出窥视毛泽东权位的二心来。

而民主党派被诱帮助整风，结果误入白虎堂，被修理成货真价实的政治花瓶，成就了毛泽东一党专制的大业，这才是从整风到反右的「阳谋」的真相。

（本文提到的八届二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是不同时间召开的两次会议。八届二中全会 1956 年 11 月 10～15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涉及埃及问题、波兰问题、匈牙利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和应记取的教训。八大二次会议 1958 年 5 月 5～23 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同时也否定了八大的政治决议。）

注 释

1 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 329 页。

2 王明《中共五十年》（东方出版社，2004）第 16 页。

3 胡乔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373 页。

4 《打倒刘少奇－——反革命刘少奇的一生》，北京第四人民医院井冈山战斗队，1967 年 5 月。

5 《内部参考》1956 年 2 月 28 日第 37 号，第 293-295 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42 页。

7 胡绳：《谈党的「八大悬案」，《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8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

9 《傅雷家书》增补本（三联书店，1994）第 158 页。

「引蛇出洞」考

李慎之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957 年，中国的大逆转

1957 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大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从表面上看，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同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多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开展，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 1956 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 1958 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6 月 8 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会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干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

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 4 月 30 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 5 月 15 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通讯，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是从《内部参考》和《参考消息》上能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性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他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善于筹划远略的雄才。

《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共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将近半年以前的既定决策。这个决策才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才是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的转折点。

1957 年 1 月的决策才是中国命运的大转折的转折点

这里指的是 1957 年 1 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 日、27 日两次讲话，共两万字，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对付的理论了。这两万字中，可圈可点可摘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这一段比较最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它与以后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错的可以弥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

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凡听到或看到的无不毛骨悚然。连毛主席也第一次发明了一个词，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中国的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认他以为」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能有这样的阴暗面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两点评议：「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当时，新华社副社长陈适五就跟我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说毛主席「一则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错误公开了。中共和苏共历史上争论的是非也可以公开了。中共受苏共的委屈可以一抒愤懑了。现在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可以压在中共头上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毛主席现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说毛主席「一则以惧」，是指过去历来被认为完全正确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竟是如此阴森可怖。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怀疑与指责呢？可以说，从此以后毛主席心里就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赫鲁晓夫成了「万恶之源」。这块心病越往后越清楚。

毛主席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力主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并且以此思想指导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同时，看来也确实在探索一条比苏联较为宽松的道路。这一点，其实在苏共二十大开始以前就着手了。毛主席在 1956 年 1 月初召集了三十四个部门的负责人汇报情况研究问题，最后在 4 月 25 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按当时人们的「觉悟」来看，可以说是充满了新意，可是并未公开发表。现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发表的是 1975 年 7 月邓小平为了要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而由众位秀才根据 1965 年底的整理稿再作修正后，请毛主席审阅批示「同意」后的定稿，然而邓小平随即下台，讲话竟延至 1976 年 12 月 26 日才得以发表，其时距毛主席逝世已三个多月了。当

时的政治气氛与二十年前可称截然相反，因此文字也已与当初大不相同。不过仍然可以看得出许多十分宽松的提法，例如「你对发展重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这样的话，现在的正式文本上还保存得有一些。我自己手头上还有一个听了第一次传达的记录，里面很有一些在反右派以后绝对听不到的话，抄不胜抄，就举几条作为例子吧：

「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

「人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要有纪律性，也要有无纪律；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

「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

「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以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

「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对犯错误的人要看他是否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不要学习斯大林，斯大林对犯错误的人不让改正，这是不好的。」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出后不久，就听到胡乔木讲述毛主席心情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这话，我们听了都很感动，看来情况大致也确实如此。

1956 年 9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这是七大以后十一年才开的大会。中间经过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又碰上了苏共二十大这样的懊恼事，全党与全国人民理所当然地希望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但是他却并没有做什么大报告，只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据说还是田家英起草的，其中的两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一直是耐人寻味而又捉摸不透的。

但是，大致可以肯定，毛主席对八大是不会高兴的，当时国际舆论的大背景是反对个人崇拜的。不论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实际思想如何，也都不能不反对个人崇拜，不能不把在七大提出的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对此，重视权位的毛主席看来是难以满意的，却又处于完全无法反对的状态。

此中滋味，外人无法妄测，但是有一点却可以看出来，即对于从法理上说是八大最权威、最重要的文件的大会决议，他不甚关心，更不赞成。对于其中最重要的结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竟视而不见，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提出异议。2

这年十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其中波兰因为党的第一把手奥哈布自动让步而完成了和平过渡。匈牙利则酿成了武力改变政权的暴乱。据每天列席中央常委会会议的吴冷西回忆，为对付波匈事件而讨论如何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时候，毛主席又发展出了赫鲁晓夫「丢了两把刀子」的思想，说得最完全的还是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关于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了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规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3

毛主席以统帅的身份坐镇中央抓右派

1957 年 6 月 8 日一声令下，全国形势就一变而为到处抓右派。毛主席一改三个月以前的到处游说，而以统帅的身份坐镇中央，指挥若定。《人民日报》社论与党内指示一篇接一篇，要求深挖党内右派、文艺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司法界的右派……。有人比作「十二道金牌」，有人比作「五日一小批，十日一大批」，战斗一年，挖出了 55 万右派分子，比毛主席最初估计的四千人多了百倍还不至。许多运动初期的积极分子，到后来竟也一样成为右派分子。毛主席真是铁面无私。其实，反右派斗争一开始就可以说是大获全胜。用毛主席自己的话说「基本群众在我们手里，军队在我们手里」，几个知识分子岂止不是对手，而且一上来就只有求饶的份儿，可是毛主席不依不饶，非要他们「缴械投降」不可。可怜他们根本

没有什么「械」又如何「缴」，只好搜索枯肠，挖自己的反动思想，这就是聂绀弩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的由来。许多自杀的右派分子就大多是实在熬不过这一番折磨而不得不「自绝于人民」的。我在自己成为右派以前还听到传达说，章伯钧「叩头如捣蒜」。其实，章伯钧的头脑要比许多人清醒得多，他在储安平被批斗以后，还说过「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是要成为历史人物」。无奈他是处在一个完全封闭的体系之中，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也只好「缴械投降」了。毛主席的江山真是铁打的江山。反右派斗争开始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就给它作了结论：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 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数据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是敌人……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在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4

瓮中捉鳖，虽胜不武！但是毛主席不管这一套，他的自我感觉又回复到两年以前了。党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在反右运动中不知是由于谁的发明创造，又加上了「绝对」两个字。「绝对领导」的说法从此风行了二十多年。他现在又是无可争议的、万众膜拜的伟大领袖了。年初他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结束」，到年中他就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程度更激烈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一切都按他的神机妙算进行。他的一个信念是：阶级斗争的胜利还可以大大促进人民战天斗地的积极性，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从此而来的。他现在可以来对付一年半以前针对他本人的、反「冒进」的倾向了。1958 年元旦刚过就发出通知，1 月 11 日就开始在南宁开会，着重批判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毛主席说它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5

有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打底，南宁会议当然是势如破竹。毛主席批评「这三

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被批评的其它中央领导同志 I 主要是周恩来）连检讨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真是好一派「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的气象。

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提高了毛主席的雄心壮志，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给毛主席平添了猜疑恐惧，不但直接导致了反右倾的斗争，而且促使他到处搜索「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终于在 1966 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都是中国历史的下一章了。

从反右派开始，开始了二十年的极左路线

总之，从 1957 年的反右派开始，中国开始了二十年的极左路线。一直到毛主席在 1976 年逝世才大体结束。

大跃进的出现是同反右派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毛主席到底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加了什么东西呢？恐怕还是只有「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个新名词，所以林彪才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被毛主席认为「一万年都会有」的「人民内部矛盾」曾经牵动过许多人的心（其中不少人后来「堕落」为右派分子），甚至许多外国人的心。……所谓「两党制」、「两院制」、「文官制度」、「同人办报」、「司法独立」、「无罪推定论」……这些「最臭的臭屁」、「最毒的毒草」，实际上都是在对毛主席无限信任的前提下放出来的。中国人民中最有头脑、最有理想的一部分，也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志士仁人」，内心想的是：革命政权可以改变为法治政权了，中国从此可以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长治久安的道路了。其中有的人甚至天真到希望毛主席可以利用他的威望与经验带领赫鲁晓夫、铁托、哥穆尔卡……走上一条正常化、民主化的道路，使马克思的理想进一步实现。但是这些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毛主席在 1957 年 7 月 1 日给《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的明明白白：

「本报及一切党报，在 5 月 8 日至 6 月 7 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螭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

使人民看得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是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6

反右斗争是怎么回事，已载入历史。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第三个里程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增加了哪些新东西呢？「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毋宁说是强化了阶级斗争。1959 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以后，人们的普遍感慨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是山连山。」唯一有点新意的是，通过提出「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发明了不以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划阶级，而以思想划阶级的理论。到后来实际上以附和还是不附和毛泽东思想作划阶级的标准，前者就是无产阶级，后者就是资产阶级。……这一点可以算是毛主席区别于「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地方。

阶级斗争。原来，自从苏联在三十年代在城市消灭资本主义，在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社会上就只有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庄员、劳动知识分子三个社会集团，在理论上已不能再说还有阶级斗争了。但是对斯大林的反对还是层出不穷（作为中国人，实在无法判断是真的「反对」还是只是斯大林自以为的「反对」）。一旦定罪，往往处于极刑。毛主席则别立新意，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对立的，因此可以成为敌对分子。当然批判、斗争都是必要的，但是他一再声明这些人「不是特务」，因此「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就是我们经历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际的人唯一能捉摸出来的特点了。然而这一点，照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说，起源于延安时代，也算不得有多么新鲜。基于这样的理论，右派分子虽然是人民的敌人，戴上帽子即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或者如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但是在原则上倒是没有被枪毙的。这点真是要感谢毛主席的如天之仁。……

1956 年，毛主席也曾跟着赫鲁晓夫批评过斯大林「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仍然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的错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是看来他后来也没有逃脱斯大林立下的榜样。至于斯大林与毛主席关于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两国实际的破坏性影响到底孰大孰小，那只好由后人去细细比较研究了。应当说，在一个民主和法制国家里，司法独立的国家里，本来就用不着什么「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的理论。它纯粹是多此一举，无益而有害。

说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是极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不是他本人的观点，恰恰相反，在他看来，他晚年的理论与实践毋宁是他毕生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直线发展。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使听到的人毛骨悚然。人们一方面庆幸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还没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方面还庆幸苏共给中共以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敲起了警钟，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祸害了。但是，反右派运动改变了这一切。从 1957 年的 6 月 8 日开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名义下，中国的阶级斗争绵延二十年不绝，一批又一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直到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主席刘少奇都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身份被迫害至死，毛主席声言可以避免的「全国性的、长期的、严重的错误」竟成为事实。到他离开人世，亦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受文革直接间接伤害的人竟上了「亿」。

毛泽东制造无数人间悲剧，究其原因只是对一个「权」字的迷恋

这个「大逆转」已成为历史的事实，是 1978 年以来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共同承认的事实。也许，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运动还推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它打击了赫鲁晓夫开始的对斯大林的批判，也阻碍甚至扭转了他开始的改革。毛主席还以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以及他超英赶美的豪言壮语刺激了苏共二十一大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结果当然不可能成功，又反而引起了毛主席的讪笑，《九评》的最后一篇就是批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的。

但是，在毛主席心目中，他是不会承认有这样的逆转的。反右以后，他的心气越来越高，他的平生大愿逐步实现，而且处于大发展，大跃进之中。从三面红旗到三个世界，从不断革命到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也许只有到生命终了的时候，他老人家才感觉到有点不大对劲，这一方面表现在他对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估计越来越长上（从几十年到几百年）；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最后讲话上：「我平生干了两件事……一件事赞成的不少，反对的不多；一件事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只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意识到造成这样变化的关键就在他 1957 年的「引蛇出洞」上。

回头来看，毛主席的悲剧在许多前现代国家其实并不少见。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权力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无限膨胀，只有「死而后已」。这实在是「理出固然，

势所必至」。即使在当今的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也还有，只是没有中国、苏联这样的大国，因此造成的灾祸至少在规模上总还比不上毛主席而已。据胡乔木说，毛主席曾「认为自己就是中国的斯大林」。7 毛主席晚年的命运也确实最近似于斯大林，他们都曾领导过亿万人民，受到过亿万人民的爱戴，他们统治下都不乏聪明智慧的人材而且后者都曾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都曾对他们「进尽忠言」。但是他们自认为、甚至被认为天才盖世，然而却甚至不能理解比较自由的环境中一个普通公民的常识，而一概打击之为毒草，为牛鬼蛇神，为人民公敌，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抛开他自己好象洞若观火的空话大话，其实只是对一个「权」字迷恋上。至少在延安整风确立了毛主席一贯正确地位以后，尤其在 1945 年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以后，他的权威和威权就是绝对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了。有不少事实足以证明他对权力的敏感：1948 年，吴晗到平山请毛主席对他写的《朱元璋传》提意见，毛主席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公认的朱元璋残酷暴虐的一面说成是为巩固其权力之所必需。1957 年，毛主席在自己的卧室里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没有积极组织鸣放为「死人办报」。同时又说「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这些都证明了毛主席确实是像林彪所说的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自己知道这个权得来不易，因此抓住了就决不放手。如果也有松懈的时候，那是有意的，为的是好更牢牢地抓回来。其结果，不但害了国家、社会、人民，也害了自己，当然在他这样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那已经是「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刚结束，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传入中国以后不久，后来被定为「右派报纸」的上海《文汇报》就急忙组织人翻译了久居苏联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 • 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在报上连载发表，一时反应强烈。据吴冷西传达，它也引起了「中央」的兴趣，「大家」特别注意她引用的英国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使人腐化。」遗憾的是，他老人家自己最终也没能逃脱阿克顿的论断。

在阿克顿的故乡与许多国家中，专制统治的毒害经过反复的反思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无奈我们中国离这个标准还太远，至于毛主席本人虽然总是说「权力是人民的」，但是实际上他就是「人民」。至于别的想法，与其说他不可能懂，还不如说他不愿意懂。连刘邦都能听得进去的「天下可以马上得

之，不可以马上治之」这样披肝沥胆的忠言，他都视之为右派的「猖狂进攻」。他的理论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刀枪不入的体系。譬如「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理论，唯一可以讲得通的就是如有些右派分子以为的那样，它是由革命政权转变为民主政权的标志。然而这却正好是毛主席反对的。要真正理解和解决毛主席的问题，必须跳出他那自我循环的理论，但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这个历史的逆转一直逆转了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中国又开始要走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莫说社会风气的衰败和人民道德水平的下降都已不是 1957 年可比，尤其可惜的是：我们永远失去了中国上百年来用血汗和泪水培育起来的一批明达之士。这个损失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弥补上。

文章写到这里，应该可以结束了，但是遗憾的是，「引蛇出洞」这四个字，我竟至今还没有找到出处。我的印象是：反右开始以后不久这个说法就已流行了，而且好象并没有什么忌讳。有人说这话是毛主席自己说的，所以大家才敢说。事实上省委书记一级人物同类说法倒不难找到，不过这就算不得「第一手材料」了。看来只有等将来档案解密以后，未来的史家再去努力，义山诗不云乎：「武皇内传分明在，莫谓人间总不知」。

（节引自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55 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75 页。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21 页。

4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61－462 页。

5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 49 页。

6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36 页。

7 《胡乔木文集第二卷》第 147 页。

论「阳谋」　　　丁抒

反右是「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

「中国新闻社」是什么机构？据说它和「新华通讯社」一样，也是中共的喉舌。中国新闻社编的《共和国五十年大事记》是最新版本的中共对五十年来重大事件的评述。其中关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仅有以下简单的文字：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后，一场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进攻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58 年夏末，反右派斗争结束。1959～1964，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份右派分子的帽子。1

这里，一场举世空前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被轻描淡写地表述为一场正义的「反击……的斗争」。而且，右派「罪人」似乎很快就获得赦免，一风吹了。

国内学界也有人认为：1957 年毛泽东发起整风运动是为了保持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可惜「一个正确的命题，最终却带来了一个不幸的结果。」2 而这个不幸结果是鸣放者过激言论造成的。别有用心的家伙使得毛泽东犯了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片面地强调批评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五月中旬以后，中央原定的整风方针开始动摇，逐渐地转向了反右方针，此后的座谈会已经背离了最初的旨意，成为引蛇出洞的一个重要手段。」3 他们说：在鸣放「过程中，有极少数人确实乘机活动，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从开始进行反右派的斗争。从此，整风运动受到很大冲击难以进行下去。」4

其实这不过是对中共中央 198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诠释。该决议对反右运动作的结论是：「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5 这些学者不过是在为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注而已。他们认为，所谓「阳谋」论，因为与中共中央《决议》「根本对立」，所以是对毛泽东反右运动的「露骨歪曲」。6

毛泽东从未实行「双百方针」

1956 年四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首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同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在总结会议时说：「文艺上百花齐放，科学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7 这条被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口号由宣传部长陆定一于 5 月 26 日在中南海郑重其事地向科学界、理论界、文艺界人士宣布。陆定一还宣布说中共「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8

但是，这「双百方针」从未真正实行过。毛泽东的确说过「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9 但是，对于执政七年间，他掀起的一系列批判运动，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到对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学家尚钺的批判等等，都是粗暴的干涉，他从未承认干涉错了，从未表示要纠正。

就在提出「双百」方针之后，毛泽东并没有改弦更张。对各种学术思想的干涉没停止过一天，其粗暴未减一分。这里有两个例子。

1956 年 11 月，上海文化界在报刊讨论「为甚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电影工作者最清楚。据《边寨烽火》、《芦笙恋歌》等电影的剧本作者、军队作家彭荆风回忆，当时问题的症结在于领导干部审查作品：「写电影剧本要层层送审，我们的剧本在云南军内外从下到上，要经过十余道关卡，那些来自大小官员的意见，有的如『圣旨』全是命令式的，不改就将犯罪；有的如『天书』般玄妙，苦思良久也难解其中奥妙……」10

因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托中宣部分管电影工作的锺惦棐写一篇文章参加讨论，锺写了一篇《电影的锣鼓》，以《文艺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他写道：电影事业管理局掌管一切，连剧本的稿费、导演的酬金等，通通要呈请它批准。演员、导演「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艺术创作必须保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管的人越多，对电影的成长阻碍也越大」。11

可是，毛泽东却认为这是他们要脱离党的领导的证据，实属离经叛道。在三

月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说,「锺惦棐的文章也是毒草,是机会主义之花。」12 三个月后毛发动反右,锺惦斐和彭荆风都成了右派。

诗人流沙河是第二个例子。1957 年一月号的四川地方杂志《星星》诗刊上,刊登了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草木篇》,结果很快就招来有组织的围攻。批判者一口咬定诗中「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的藤是指共产党员和积极份子,所以是「对人类历史上最民主最先进制度的诬蔑」;诗中托物咏怀,说梅花「把自己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被指为有「变天思想」、盼望国民党回来复辟。四川省文联的党委领导甚至说:「对这种反动腐朽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未尝不可!」13 对这种粗暴的批判,毛泽东大加支持,说:「《星星》的〈草木篇〉是应该批评的,如不批评真是让毒草长起来了。」14 于是流沙河成了全国批判围剿的「反动作家」。数月后,毛泽东为流沙河定性:「大树是有根的。流沙河就是大地主的儿子。这是新式肃反。」15《星星》诗刊编辑部连他在内四个人,统统被扣上「右派」帽子,分头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政治领域也是一样。四月间在杭州发动鸣放时,浙江省委曾问毛泽东:「最高国策、最高领袖可以不可以批评。」毛回答说:「不能答不能批评」,但接着就举例说:「(农业)合作化能不能批评?要批评可以登一篇,然后来一个反驳。一驳就臭了。他反对合作化就有证据,等于照了相。这不是诱敌深入,而是他自己钻进来的。」16

最高领袖制定的最高国策不能批评,谁批评谁就是反党、反革命。凡是在鸣放中对农业合作化发表了不同意见的,通通是右派分子。这就是毛泽东的「百家争鸣」!

反右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曾说:「反右派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形式上没有被废除,但实际上停止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百家争鸣实察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17 反右前和反右后的几十年里,毛泽东都在坚持「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却独独在 1957 年前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热心推销「百家争鸣」,玄机何在?

五七年的「鸣放」与「双百」方针不相干

1957 年五月初至六月初遍及全国的「鸣放」,与文艺、学术毫不相干。这是

因为从 1957 年初开始，毛泽东已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的「鸣」、「放」二字抽出，谓之「鸣放」，并引向政治，将「百家争鸣」的「鸣」演变成「不平则鸣」的「鸣」，将「百花齐放」的「放」换成了「放言」论政的「放」：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18——这里的「言论自由」显然与科学、艺术无关，他鼓动「再放」的，显然不是文艺学术上的「花」，而是政治上的「鸣放」。

「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19——这也与文艺、学术无涉。

毛泽东一提到「百家争鸣」就与政治、与批评共产党联系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方针，是应该坚持下去，应该『放』，不是『收』。」「让人家说话的时候，会说出一些不好听的话来。百花齐放，会放出一些很不好看的花。有些什么罢工、罢课、请愿、游行示威……」20「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21

所以，当党外人士、《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试探地问他「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时，毛直截了当地回答：「你的意见很对、很好」22

那时，毛只要提及「双百」，指的必定是「鸣放」。那「鸣放」只涉政治，与文艺、学术毫不相干，仅限于党外人士对中共的「鸣放」，中共不对民主党派「鸣放」。「花」也罢，「草」也罢，毛泽东似乎诚心诚意地「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

毛泽东的引导终于成功。人们忘记了「双百」，只记得「鸣放」二字了。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变成了「大鸣大放」，以致形成了从五月中旬开始，为时仅不到一个月的短暂的对共产党「鸣鼓而攻之」、「大放厥词」的「鸣放」局面。

可是，半年后，毛泽东却完全不认帐了。他说：

「鸣放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去年五月在这里讲百花齐放……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就不涉及政治。后头右派他需要涉及政治，就是甚么问题都叫鸣放，叫做鸣放时期，而且要大鸣大放……」23「我们说

鸣放，右派说大鸣大放，我们说鸣放是指学术上的，他们要用于政治。」24

他不仅将「涉及政治」强加于「右派」头上，而且后来将上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删去「鸣放是我们发明的」这句关键的话 25，干脆就否认了「鸣放」是他一手策动的结果。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来就是打击目标

在「鸣放运动」中被邀请批评共产党、请其帮助共产党克服「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主要是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说是「开门整风」，工厂工人、农村农民却不受邀请。从「帮助党整风」而言就说不通。为什么这样安排？为什么毛泽东对工人、农民的批评不感兴趣？

毛泽东认为：「国内有四个阶级，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26 那「第二个剥削阶级」，恰恰正是毛泽东邀请鸣放的对象。

在 1957 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说：「出这么一点钱买了这么一个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共约八百万人）。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27〖该讲话收进《毛泽东选集》时，删去了「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28〗

四月间，他又说：「民主党派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要给他事做。……今天他们爬在我们身上吃饭，端我们的饭碗，就要做我们的事。这些人骂你，你把他安（置）好了就好了。」29

当然，毛泽东也有「礼贤下士」的时候。为解除学者们的疑虑，他于四月十一日将北京大学冯友兰等十来名教授请到中南海他的住处，说：「我感觉你们这些当教授的被搞苦了。……我们现在要整风。我们党对整教条主义是有经验的，你们有甚么意见尽管说出来，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30 他还对冯友兰说：「好好地争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31 冯友兰对毛泽东在上述党内会议上讲过的话一无所知，不知道被毛泽东邀请鸣放的对象正是他要剥夺其政治资本的对象，批评某些共产党员「处处以救世者自居，自命为万能的造物者」32，以致被北京

大学党委定成了「内控右派」。

党内多数不赞成「鸣放」式整风

同发动文化革命前夕暗中策划的做法虽不完全一样，毛泽东将「不涉及政治」的「双百」方针移植到政治层面，不厌其烦地发动党外人士对共产党「鸣放」，也是异常现象。「鸣放」式整风，是毛泽东的发明。在很大程度上，毛是在唱独角戏。中共大多数干部只是消极应付。他们消极，不是因为沉溺在「三害」中不自知，而是看出了此次整风「情况不正常」、对毛的用意有所戒备。

1956 年二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各共产党国家造成反个人崇拜的大气候。感觉受威胁的毛泽东力图巩固「毛主席万岁」的地位，竭力抵抗对斯大林的批判浪潮。1956 年四月间，他先后与苏共主席团成员米高扬、苏联驻华大使谈话时都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十月二十三日，他又接见苏联大使，明确表示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做法「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十一月三十日，他再次接见苏联驻华大使，说：「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33 十二月，他在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中特别加上了一段为「斯大林主义」辩护的文字：「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34

但是，对毛泽东个人专断有所警惕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却抓住苏联老大哥批判斯大林的时机，在九月的中共「八大」上，借反个人崇拜的东风，强调集体领导，以「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35。在新党章中删去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的「学习毛泽东思想」也被删。

那个「毛泽东思想」，显然就是毛泽东的思想。1953 年，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批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36 可是后来他又觉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使人以为二者是不同的东西，于是在 1954 年批发文件通知全党：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37 所以要改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38 可见毛幷不认为「毛泽东思想」有别人的份，不是后来邓小平所解释的中共领导

人大家（包括邓小平）的思想。

修改党章，毛泽东不好启齿反对。他不得不将这苦果吞下，违心地表态说日后适当时不再担任党的主席。刘、邓信以为真，在新党章里加了一条：「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39

毛对「八大」的不满马上就流露了出来。在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他装出半打趣的样子说：「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40 不过，由于大家都认为请毛担任名誉主席是遥远的事，对此未作具体安排，时间一长，此事似乎被遗忘了。

党内高级同僚对毛搞「开门整风」、策动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真实用意可能不十分明白。消极应付的多，积极配合的少。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对毛泽东策动鸣放的异常做法却有所戒备。按副总编辑胡绩伟的说法：

「（邓拓）比我们更有远见，更了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阴谋」有预见的人物之一。」41

由于中共中央对人民日报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毛泽东的讲话未经公开发表不得引用，人民日报没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邓拓有理由对毛泽东的讲话不作宣传，并警告部属「不要锣鼓一响就出来」。邓拓的上级、代表毛泽东领导人民日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也支持邓拓按中央的规定办，对党内会议和毛泽东的内部讲话不作宣传。

对此毛泽东甚为愤怒，1957 年四月十日，他将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胡绩伟等人召到自己的卧室里训话。他躺在床上，「像训斥孙子似地」（胡绩伟语）训斥他们：「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多半是同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他又骂邓拓「占着茅坑不拉屎」，「我看你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同时，还斥责几位副总编辑「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42

从此，人民日报编辑李庄向邓拓请示，是否刊登记者采访的人民鸣放、批评共产党的文章时，邓说：「登，登，一字不改都登。把记者都派出去，这一段就写这种稿子。」从来没见过人民日报发表「反动言论」的李庄「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

发生了。」43

四月上海局杭州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石西民曾向毛汇报，说：「有人说这是钓大鱼，是诱敌深入。」毛回答：「天下（哪）有这回事，不是诱敌深入。」44 就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责骂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要整一整。」「开了许多会议，不发消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对党内多数不热心鼓动鸣放的局面，他十分不满：「一定要放。怕放是道理没有讲通，或没有说服。」「一家独鸣了多少年，让他乱一下子看看。」「我不是鼓励人民闹事，搞闹事促进会。」「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我就没有群众基础。」45

二三月间毛泽东曾几次批评陈其通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对推行「双百」方针表示忧虑、疑惑的文章。而在杭州会议上，陈其通幷不在场。他此时说的「陈其通代表百分之九十党内同志」明显是气话，而且是针对中央高层多数同志的。

许多党内同志虽不笼统反对整风，对毛鼓动「鸣放」式整风的做法却有保留。毛泽东四月间在杭州会议上曾说：「党内高级干部对『放』思想不同的占百分之九十。」46 这话传到下面变了样，成了「党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鸣放。」

五月二十七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主持鸣放座谈会，物理教员何玉骐在会上说：「党中央百分之九十的人不同意放，你就是其中一个。」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报送毛泽东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也说：「北京大学有个学生写了篇大字报，说中共党内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赞成鸣放。」此时反右即将开始，毛便批示说：「完全造谣」47。不过，直到 1958 年初，他仍然对去年策动「鸣放」时党内不紧跟一事耿耿于怀、怒气未消。冷嘲热讽：「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哪个（鸣放）放得开？」48

毛泽东说一万人里九千个不拥护他或许是夸大，但若说一万人里九千个不赞成他策动党外「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做法，却大致不错。「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赞成鸣放」就离事实不远，谈何「完全造谣」！

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的深层动机

1956年10月波兰、匈牙利的人民起义告诉毛泽东，知识分子鼓动工农造反，推翻一个昨日还貌似强大的共产党政权转眼之间被推翻是可能的。要不是中共施加压力，催迫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出兵镇压匈牙利人民，处死纳吉，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已不复存在。他总结的教训是杀人杀得不够多。11月15日中共召开八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49

从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到1957年1月，占据毛的头脑的主要是政权巩固与否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说的一段话可以为他的思想作一注解：「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分子，他们是剥削者……是个动摇的阶级。……去年右派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打下去，中国出了纳吉，右派登台，这些人一股风都上来了。打倒共产党，他们都干……」50

毛泽东在1957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和四月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对此讲得很明白：

「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51

「准备出大事，我们从延安来，准备再回延安。过去没有看过梅兰芳的戏，现在看了七年，第八年准备回延安。无非是打原子弹，打世界大战，犯错误，出匈牙利事件。」52

「小资产阶级专政，把你搞下来他专政，想搞匈牙利的，要整一、二十年。各省要开群众大会、演讲会、辩论会，展开争论，看谁胜利。小会他神气大，大会他没办法。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它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让大家鉴别香臭。社会发生分化，我们争取大家，大家认为臭，他就被孤立了。」53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动。中国也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现在赫鲁晓夫改变了〖丁注：称赞赫氏由批判斯大林到镇压匈牙利人民暴动的改变〗，蚂蚁也缩回去了。」54

「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55

「批评不过两种，对的，补我们的短处，错的，越错越好，上台一讲就揭露

了。梁漱溟、彭一湖、黄炎培也叫过，以后又检讨。章乃器批评我们统战部，放手让他们批评，一批评反倒把他们孤立了。」56

「不要怕闹，闹的越大越长越好。……全国大闹不可能。哪里有脓包，有细菌，总是要爆发的。大省五万，中省三万，小省一万。准备闹事，年终结账。」57

「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我们要放，要硬着头皮，让他们攻！攻一年。谁让我们有教条主义，攻掉就好，攻得过火，就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共产党要让骂一下子，让他们骂几个月。……有人说放长线钓大鱼，也有一些道理。」「不管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不对（的批评）可以不听，对的要接受。反对肃反、反对合作化的文章，可以驳一驳。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58

那「脓包」、「细菌」，就是后来的「右派分子」。「五万」、「三万」、「一万」是他当时设想的各省的右派数目，后来各省所抓的右派数果然与此不相上下。不过不是「年终结账」，而是六月就结账了。甚至连谁是右派，毛泽东也已经有了点谱。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文学讲习所所长丁玲和《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无端被肃，成「丁陈反党集团」。萧军、丁玲就是他心里已认定的右派。在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他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59 反右时他们的确都成了举国声讨的「大右派」。

毛泽东要的是给共产党当表决机器的民主花瓶，要的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该举手时举手的附庸，「不举手就没有饭吃。」既然「要把它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就不可能真心征求他们的批评，更不可能恳请他们帮助共产党跳出兴而覆亡的「周期率」了。

不过，毛泽东是个好演员。三月二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对党外人士谈吐温和地说：

「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当然没有事，言者无罪嘛！」

「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利的。」

「宪法是应该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言论出版。」

「蒋介石他讲了很多东西……我就赞成出全集。」60

他将全国文化界、知识界知名人士请到北京，听取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录音，听他说：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希望党外朋友帮助。」

「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61

人们解除了戒心。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派车去剧作家吴祖光家出席鸣放座谈会时，妻子新凤霞怕他因言贾祸而阻拦，吴告诉妻子：「这回是共产党要大家提意见的，为了改进工作，又是毛主席让提的。」上海电影女演员吴茵到北京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她深信毛要倾听人民声音的诚意，对还打算看看风向的伙伴说：「怕什么？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写，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62

吴祖光、吴茵哪里知道，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就跟他们「结账」了。两人都成了右派。由于毛泽东指示，「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之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63]知名度尚不够高的吴茵便被送到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吴祖光则去了北大荒。

五月间全党接受「引蛇出洞」术

从四月下旬开始，各种鸣放座谈会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级机关举行。但在五月十五日，绝大多数人还没有鸣放时，毛就已经写下给全党高级干部看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文中，他解释道：「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灭掉它。」他的策略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其「诱」的对象就是右派知识分子。「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64

当时的副总理薄一波称《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为「反右派的信号」65。当时的中共统战部部长利瓦伊汉也说：「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66

第二天，毛泽东又起草了一个名为《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的党内文件，要各级干部继续鼓励人民鸣放。毛指示全党：对「带有反共情绪的人」「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67 据薄一波回忆，「从五月中旬到六月初，中央接连发出指示，中央政治局和书

记处多次开会，制定反击右派斗争的策略；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右派进一步暴露……『愈嚣张愈好』。」68 当然，这些「绝密文件」连「级别较低的党员干部都不知道」（薄一波语），一般老百姓当然更不知底细了。

应当指出，这时鸣放其实还刚刚开始，「反共分子」尚未来得及「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这里有张时间表：

5 月 17 日：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在北京航空学院出现

5 月 19 日：北京大学学生贴出首份大字报

5 月 21 日：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5 月 22 日：龙云发表「反苏谬论」

5 月 22 日：罗隆基提议设立「平反委员会」

5 月 23 日：林希翎演说抨击中共的封建社会主义

5 月 24 日：清华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要求开辟民主墙

5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向北大同学学习》

5 月 30 日：葛佩琦鸣放发言，「杀共产党人」字样见报

6 月 1 日： 储安平抨击中共「党天下」

这些中共事后用以证明反右之必要的「罪恶活动」，全是在毛泽东写下「反右派的信号」后，在不知中共幕后部署的情况下，为中共反复邀请而「放」出来的。

「反右派的信号」至迟是在 5 月 18 日发出的。那天晚上，主持《文艺学习》杂志编务的黄秋耘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中聊天。邵正鼓励他「大胆地放」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了电话。听了电话，邵「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沈」，放下话筒对黄说道：「唔，转了！」并嘱咐道：「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69

周扬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意识形态的主管，邵荃麟则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我们虽没有毛给周扬下达指令的史料，却完全可以推断：若无从毛处或其它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或暗示，周扬绝无斗胆破坏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向其下属邵荃麟布置。

戴晴认为：「五月上中旬，相当一批亲随已经窥知了毛泽东的意图。党内文章一下达，高级干部们心里都有了数。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于是东施效颦，也残忍地玩弄起那些『不可一世的高级知识分子』来。」学界却有人认为中共高层不知道毛

泽东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为毛还没有将〈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他们：「〈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在五月中旬并没有下达党内。……直至6月11日，毛泽东才在这篇文章的清样稿上写下了印发中央一级和省市一级负责同志的批语。」70 至于〈事情正在起变化〉中所说的「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71 他轻描淡写地说，毛泽东并未改变整风决策，此时的毛泽东不过「有了反击右派的思想准备」72 而已！因此戴晴的论断「背离了最基本的事实。」

然而「最基本的事实」是，在5月25日，这篇文章已经放在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的桌子上了。73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点是：

「有些人的反动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的不够……在一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它资产阶级观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74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指示各省市委书记：「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你们要赶快回去收集右派们的言论，否则时间晚了，就收集不到了。」75

起初对「鸣放」消极应付的各级党委书记们得到「引蛇出洞」的玄机后，一下子放了心，也一下子积极起来。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就是在5月21日给全校作报告鼓励大鸣大放的。党委书记们大会小会引导「鸣放」，甚至软硬兼施、压迫群众参加鸣放。「谁不参加鸣放，谁就是对党不关心、不爱护，不爱社会主义……」这是当时各单位压迫群众鸣放时最常用的词语。他们唯恐鸣放会开得不够热烈、鸣放的内容不够广泛、对共产党的批评不够激烈，参加鸣放的人的「类别」不够多样性；也就是说，唯恐「秋后算帐」时材料不够充足。

5月29、30日连续两天，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把清华大学党委、团委、各系的负责人召去，布置继续鸣放：「让他们出大字报，引蛇出洞，将来我们出他们的大字报……」76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施平的回忆也可为此作注：「反右正式开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多次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动员鸣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负

责同志找了清华、北大、师大和北农大四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去谈话……说：你们……要用各种办法，制造适当气氛，引蛇出洞，让他们把毒都吐出来……党委书记要示弱……让他们敢于尽情鸣放，无所顾忌。……时间不多了，很快就要发动全面反击，反击开始后就没有人鸣放了。」77

明明是全党接受了毛泽东的「引蛇出洞」，却有人断言：「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以了肯定和支持。」78 好象发明「引蛇出洞」战术的是邓小平、彭真等人，毛泽东只不过「给以了肯定和支持」而已！

为耍「阳谋」毛泽东不惜出尔反尔

由于毛泽东说过要检查肃反的偏差，反右开始后，他又下指示说：「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属于「在这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79]所以，凡对以往运动鸣了几句不平的人，都是右派。

4 月 30 日毛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请到天安门城楼开座谈会时，曾蓄意迎合那些人士的心理，说：「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成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职权）应当集中在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80

几个月后，他却转了一百八十度，说：「章伯钧、罗隆基等……他们要取消学校党委制，要同共产党轮流坐庄。」81 凡鸣放时对学校党委制发了一点议论的人统统成了右派。毛泽东从未打算「改一下」学校党委制，更未赞成过教授治校。

四月间发动鸣放运动时，毛泽东曾说：「我看每省办两个报纸比较好，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82 毫无疑问，毛泽东说的是假话。问题是他为什么说假话？如果发起整风运动只是为了跳出执政党覆亡的「周期率」，「重新锻造党，使它从根本上摆脱周期率的支配」，他完全没有必要口是心非，迎合那班「资产阶级右派」，讲什么「教授治校」、「党外办报」。「诱敌深入」也罢，「引蛇出洞」也罢，「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也罢，若不是为了策动「鸣放」，毛泽东将保持一贯坚持党委治校、一贯坚持报刊垄断、一贯坚持新华社独家新闻的记录，绝不会把出尔反

尔、言而无信的嘴脸暴露于中国人民面前的。

「鸣放」期间，八十四岁的江苏古文家冒广生赴京省亲访旧，外交部长陈毅闻知，前往探望。交谈间，冒氏谈了若干看法：「既曰争鸣，又曰百家，那就人各异鸣……不能只允许肯定，亦不能不允许否定。希望党内外人站在一条战线上，把坏的风气移去，好的风声树起来。这才叫做整风，不是整人。」83 陈毅以为冒的意见值得写下，并推荐给人民日报。

6 月 6 日，冒文发表，毛泽东让周恩来安排将冒广生及其子冒舒諲接到中南海相见。

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毛：老先生讲的好啊！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的，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

冒：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

毛：「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送冒广生出门时，毛问：老先生有何临别赠言？

冒答：我记得佛经上说过，一头雄狮也不免为身上几只虱子所苦。虱子虽小，害莫大焉，请务必提防！

毛表情严肃，右手搭在胸口说：讲得好哇！我一定牢记在心上。84

可是两天后，空前的灾难即落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头上，连冒老的儿子冒舒諲也没逃脱。

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毛泽东得意地阐述他的战略道：「蛇不让它出来怎么能捉它？我们要让那些王八蛋出台唱戏，在报纸上放屁，……然后……一斗一捉。城里捉，乡里斗，好辨事。」85

什么是「阳谋」？这就是。

注 释

1 转引自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华夏文摘》(www.cnd.org)。

2 同上，引言。

3 同上，第 134 页。

4 《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第 132 页。

5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修订）》（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第 23 页。

6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引言。

7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学习资料（1949～1956）》（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275 页。

8 1957 年 6 月 13 日《人民日报》。

9 1956 年 5 月 2 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总结讲话，《共和国走过的路》第 250 页。

10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第 148 页。

11 锺惦斐《电影的锣鼓》（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第 53 至 57 页。

12 1957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笔者保存的 1967 年 7 月某机关刊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23 页。

13 1957 年 5 月 16 日上海《文汇报》。

14 1957 年 3 月 6 日毛泽东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笔者保存的 1967 年 7 月某机关刊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23 页。

15 1957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北京：编者不明，1967）第 194 页。

16 1957 年 4 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北京大学，1967）〖但未标明编印者〗第 126 页。

17 1986 年 5 月 9 日《人民日报》。

18 1957 年 3 月，毛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的讲话，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第 194 页。

19 1957 年 3 月 17 日毛泽东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北京：编者不明，1967）第 142 至 143 页。

20 1957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在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二省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上，第 159 页。

21 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第 195 页。

22 同上，第 197 页。

23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63 页。
24 1958 年 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93 页。
25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485 页。
26 1958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110 至 111 页。
27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5 页。
28 这段话收进《五卷》时改成了「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7 页。
29 1957 年 4 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北京大学，1967）〖但未标明编印者〗第 121 页。
30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第 91 页。
31 《炎黄春秋》（北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一九九六年第一期第 21 页。
32 1957 年 12 月 25 日《北京大学学报》，转引自《探索》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陈一苇《冯友兰的道路》。
33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21～1967）》（北京：首都《史学革命》编辑部，1968）第 148、152 页。
3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283 页。
35 1956 年 9 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36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九九一年第六期，《八大党章未写「毛泽东思想」的原委》。
37 1954 年 12 月 5 日中共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中共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38 同上。
3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 834 页。
40 《中共党史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 36 页。

41 一九九三年九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42　同上。
43　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第 199 页。
44 1957 年 4 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见 1967 年 9 月北京大学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第 114 页。
45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44 至 46 页。
46 1957 年 4 月毛泽东在杭州对加强思想工作的指示，《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北京大学，1967）〖但未标明编印者〗第 124 页。
4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403 页。
48 1958 年 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84 页。「鸣放」二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4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13 页。
50 1958 年 4 月 6 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111 页。
51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7 页。
52 同上，第 8 页。
53 同上，第 9 页。
54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3 页。此文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改成了「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4 页。
55　1957 年 1 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数据（1957-1961）》第 13 页。
56 1957 年 1 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总结，《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22 页。这段话收进《五卷》时改成了「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见《毛泽东选集》（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355 页。
57 1957 年 1 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数据（1957-1961）》第 9 页。
58 1957 年 4 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42 至 43 页。
59 1957 年 1 月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插话（汇集），《学习数据（1957-1961）》第 10 页。
60 1957.3.2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结束语，《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 27、30 页。
61 《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 225 页。
62 《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第 12 页。
63 1957 年 7 月 18 日毛泽东在青岛会议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49.9～1957.12）》（北京：编者不明，1967）第 194 页。
64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424 至 428 页。
6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589 页。
66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 835 页。
6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第 478 页。
68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610 至 614 页。
69 《风雨年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0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 197 页。
71 《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五卷第 425 页。
72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 197 页。
73 1997 年 6 月当时的清华大学团委书记阮铭与本文作者的谈话。阮铭参加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后，5 月 25 日回校当天，在校党委办公室见到了放在办公室的《事情正在起变化》。

7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14至615页。

75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Thinkers Publishing Limited, 2006）第149-150页。

76 参加彭真召集的谈话的阮铭与本文作者的谈话。

77 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第202页。

78 同上。

79 1957.6.10「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503页。

80 《学习资料（1957～1961)》（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47页。

81 1958年1月28、30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同上，第138页。

82 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47页。

83 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

84　冒舒諲《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1986年香港《百姓》半月刊第128期第42-44页。

85 1958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汉口会议上的讲话，《学习资料（续一)》（北京：清华大学，1967）第115页。

驳「反右必要」说　　张成觉

1957年反右至今五十年了，仍未彻底平反。作为当年最年轻的右派之一，我今虽年近古稀却仍是心潮难平。因为中共依然坚持「反右是必要的」，拒不认错。国内外若干学者则有意无意为毛的罪行洗刷辩解，其中竟包括当年的受害者，其有关论著中甚至弥漫着一种「右派原罪感」。对此，不能不坦陈其非，以正视听。

「猖狂进攻」纯属乌有

首先必须指出，「反右必要」说赖以建基的「右派猖狂进攻」，就是个天大的谎言，属于贼喊捉贼的伎俩。

如所周知，反右的首个动员令是毛起草的「5.15」指示，即〈事情正在起变化〉，最初只发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等数人阅读；公开的第一枪是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此前三个半月的2月21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号召鸣放。中共资深历史学家黎澍多年后回顾称：

「这个讲话广泛传达以后，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几个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学工作者中间果然起了鼓舞作用。他们被邀请在一些座谈会上发言。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这种场合，发言者也还是心存顾虑。毛本人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人们怕『钓鱼』。这篇文章是反击右派进攻的信号。既然直到此时人们还说怕『钓鱼』，可见直到反右派斗争开始时，也并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进攻需要「打退」。」1

至于所谓三大右派言论，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储安平的「党天下」，分别发表于毛「5.15」指示之后的5.21，5.22和6.1。故朱正先生引述毛6月8日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时，曾分析说：「这个文件实际上是两项内容组成的，就逻辑的先后来说，第一是「组织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第二才是「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2毛使用「反击」字样，是为了掩盖其「引蛇出洞」的卑鄙伎俩，好像是「右派猖狂进攻」在先，他完全处于不得已才被迫「后发制人」。他玩弄的这种花招必须揭穿。

所以，只能说是毛居心叵测地以「帮助党整风」为名，诱使各界人士发泄不满，然后罗织构陷，将大批敢言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打入十八层地狱。如果按毛的说法右派进攻有罪，那么毛引人犯罪在先，属教唆犯；但实际上右派所言均无违宪，并非犯法，毛则公然践踏人权，侵犯公民言论、思想自由，扼杀人性，犯了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

其次谈谈著名学者朱正先生颇具代表性的一些论点。朱先生1957年被列另册而依然奋斗不息，研究鲁迅斐然有成，其散文随笔更称大家，为笔者所敬重。于此提名论辩，实非得已。

《李慎之文集》中有一段说：「几年前出版的、颇得好评的朱正的《一九五七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就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没有料到右派分子如此猖狂，他才不得不反击。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我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写〈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实际上是对朱正的反驳。」

对此，朱先生不仅在其上述著作的增订本（香港版易名为《反右派斗争始末》）〈后记〉中作了答辩，其后在题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的发言（以下简称〈发言〉）中，重申其论点并有所发展。3 他将 57 年反右归结为：一「是中共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了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二「是中共和一同致力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其它政治势力，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主要代表的民主党派的矛盾积累到了极点时候的猛烈爆发」。应当说，这两点都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与知识分子矛盾未到「极点」

我们不妨看看毛 57 年 1 月的两次讲话，是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期间讲的。第一次是 1 月 18 日，结尾说：「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4

且不论国际，就国内而言，他列举的思想动向有这么几项，依次为：评级中党内有些干部「闹级别」；有些干部认为农业合作化没有希望，连身为农业部长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廖鲁言，也讲「自己泄了气」；「好些地方学生闹事」；一些教授「也有各种怪议论」。

仅凭毛讲话中所举的论据，根本得不出「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结语。这大概因为他有意淡化了一些事例。据有关资料称：

由于「三大改造」的超高速完成而造成的急剧社会大变动，以及在经济建设上「大冒进」所造成的各方面的紧张，引发了一些城市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各地农村则发生农民闹退社、分社、哄抢集体物资、殴打干部、进京上访告状等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6 年下半年至 1957 年春，全国罢工请愿事件达几十起，参加者共万余人；几十个城市的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游行示威，参加人数有一万多人；而各地农村的「退社」风潮，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仅广东省退社的农民达十三万户，二百多个合作社垮台。

……

广东省某县发生群众示威时，县公安局出动武装警察镇压，当场开枪打死五人，打伤九人。5

其实，对于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上述事件所涉及的总人数极为有限，平均每起参加者也不过二三十人；而且就其性质而言，均属中共「与无产阶级大众发生的矛盾冲突」，尽管个别相当激烈，但俱与知识分子无关。

回到毛的讲话，他所谈的四种动向中，与知识分子有关的只有一种。其所谓「怪议论」包括：「不要共产党」，「共产党领导不了他」，「社会主义不好」，如此等等。虽然这里面已蕴含某些教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味，但显然不能据此而称「中共和知识分子的矛盾积累到了极点」，更无法断言不足四个月后，即5月15日他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初稿时，此一矛盾就「猛烈爆发」。

矛盾主因在于中共

诚然，中共和知识分子确有矛盾，根子在知识分子崇尚民主自由，中共则实行极权统治，彼此的价值观迥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正如〈发言〉中所述，它得天下前制定的政策，即「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已将其视为异己。付诸实行的结果，不可避免地造成知识分子的不满以至反感。邵燕祥先生为《反右派斗争始末》所写的序言中概括称：

「在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忠诚老实学习』和肃反运动中，以及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观点、学术观点、阶级出身、个人成分以至社会关系、经济来源的审查，更早在解放区的整风、审干，都已出现了简单粗暴的做法。」

可见，两者之间的关系早有问题。而中共坐天下之后，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更使双方逐渐「形成某种紧张关系」。

作为反右的历史渊源之一，〈发言〉中特别提到了因反胡风而起的肃反运动。尽管反胡风属中共建政后「以言定罪」的首宗恶例，令知识分子不寒而栗，但毕竟该案涉及者不过千余人，影响面远小于肃反。后者殃及的无辜几达一百四十万！其中知识分子当不在少数。

其实，邵先生所讲的「解放区的整风、审干」里，有个「抢救运动」专门「抓

特务」，等于后来的肃反。其手段之恐怖可谓令人发指，当年延安的知识分子鲜有幸免者，著名作家韦君宜直到晚年还对此耿耿于怀，其《思痛录》可见一斑。那是远非「简单粗暴」四字所能形容的。连毛也不得不为此在延安的干部大会上向广大受害者鞠躬致歉。不料事隔十年余，竟在六亿神州（当年的「解放区」人口约九千万）重现此种苛政，岂能使一众知识分子悉数噤声毫无怨言？

也正因此，毛 57 年 2 月 27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讲 12 个问题中肃反问题居于第二。他提出要全面检查一次，「有错必纠」。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即源自此。而又由于罗成了大右派，上述检查后来胎死腹中。不管怎样，中共与知识分子的矛盾因肃反而有所加剧。含冤受屈的知识分子无非想讨一个「说法」，需要诉苦，出一口气，如此而已。毛却视之为猖狂进攻，大逆不道。但并无迹象证明其间的对立「到了」「猛烈爆发」的程度。

事实上，反右之前知识分子早成惊弓之鸟，敢于在公开场合发表上述「怪议论」者，可谓少之又少。毛所列举的应属私下交谈的闲话，被中共特务刺探得来或遭告密者泄露。因为尽人皆知，此类议论已超出「怪话」范围，被当局视为「反动」，故必三缄其口。当然，腹诽肯定是有的，但决不轻率发言。一句话，如果没有毛这样仇视知识分子而又狡诈凶残的暴君，就不会发生 57 年反右派斗争这场罪恶的政治运动。只说中共和知识分子的矛盾导致反右，不谈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提毛所起的决定性的主导作用，那无异于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对于作为受害一方的几十万罹祸知识分子而言，是有失公允又极不公正的。

民主党派规规矩矩

至于说到中共和民主党派的矛盾，那也是早已有之。并不见得在反右前夕特别激化「到了极点」从而导致「猛烈爆发」。说到底，无非是毛设下圈套「请君入瓮」，使以民盟为代表的昔日反蒋盟友中计上当，然后提前「引爆」，令那批中南海新朝的「国士」大部份一下坠入无底深渊，从此不见天日，再也无法充当他认为「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和地位挑战」的对手。换句话说，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在中共，反右之发生同样基于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毛宣布整风之前民主党派的情况。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规

规矩矩。排在首位的民革基本上是内战中的败军之将，当然有自知之明，安于其「政治花瓶」的角色，不会乱说乱动。事实上，它的一名中央副主席王昆仑和一名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朱蕴山，都是中共秘密党员，它也乱动不起来。比较活跃的民盟虽有一定政治影响，两位中央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也较有政治经验，并且有较强抱负，但两人素有嫌隙，产生内耗。更何况其实权人物胡愈之（章怡和在所著《最后的贵族》中称之为「民盟的主心骨」）是中共秘密党员，其它如杨明轩、楚图南等民盟首脑人物亦然，它实际上被牢牢地掌控于中共手中，焉能挑战毛王朝的统治？

抛弃盟友早有图谋

不过尽管如此，中共对这些民主党派并不掉以轻心，而是从来就视之为反蒋的同路人，只可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掌权）。有关这点，〈发言〉中引述了 1947 年 10 月 27 日中共中央的一份指示，其中说:「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6

这份文件是周恩来起草的，毛审阅时加写了以下一段：

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一个月后的 11 月 30 日，在毛致斯大林的电报中更明白宣示，所谓「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就是指民主党派。该电报称：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7

上述两份文件都是在陕北的山沟中发出的。前此的 10 月 10 日公布了毛起草的「双十宣言」，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称解放军已大举反攻，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宣布中共的八项基本政策。其首项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预计，要到 51 年 6 月才能取胜。实际上三大战役是一年后

才打响，可见正当国共双方内战犹酣之际，毛即已蓄谋一俟夺得天下就过桥抽板，马上抛弃民盟等共过患难的盟友，只是由于未获斯大林首肯而将此计划暂时搁置，过了将近十年才终于付诸实施。

发动整风针对刘周

〈发言〉中谈到作为反右前奏曲的整风，据 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称，其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一些党员的特权思想，从而改善执政党的形象，改善党与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界的关系」。其实还有一个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毛要跟党内那些「反冒进」的领导人算账。

所谓「反冒进」，事缘不懂经济的毛从 1955 年 8 月起，大讲「反右倾」、「反保守」。在其鞭策下，1956 年的工业经济指标急升，全国出现一窝蜂的「大干快上」，导致国民经济严重失调，造成资金、物资、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紧张。5 月 11 日周恩来挺身而出，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冒进」，此举受到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集体支持。6 月中旬，刘率中央政治局作出「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决议，并授意中宣部起草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送毛审查时毛认为是针对自己的，写了「不看了」三个字。6 月 20 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毛更为恼火，但隐而未发。这是由于其时正值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反对个人迷信」，「尊重集体领导」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居于主流。加上国内外政局动荡对毛的压力，他只好暂时按捺自己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

其后的中共「八大」，也是在这种对毛不利的政治气候下召开的。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关于阶级斗争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关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的方针，都是毛所不满意的。只是因为形格势禁，他一时间屈服于中央的集体意志，也举手同意了。这是 1945 年「七大」以来，也可以说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之后绝无仅有的一次。

当年 12 月，即「八大」闭幕后仅两个月，他就在一次会议上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常委说：

「大家拥护『八大』，不拥护我。」8

有论者指出：

毛泽东是个人意志十分倔强、固执的人，他从不认输，也从不服输。「反冒进」及中共「八大」对他的「左」倾思想的抵制，他是不满意的，对「八大」在主要的内容上没有体现他的「左」倾路线是耿耿于怀的。「八大」会议虽然吸收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主要思想，但在经济建设的路线上却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超高速的「左」倾思想，而主张「稳步发展」。这不但意味着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不正确，也使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受到压制，对此，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毛泽东必然要反击。毛泽东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不会有任何的让步和妥协。毛泽东所要做的，仅是找寻适当的时机。9

显然，此论甚是。可见，提出整风之际，毛的矛头主要指向党内最高层的刘、周等人。而这也说明，其时中共与民主党派的矛盾并非「到了极点」，接踵而至的反右斗争更不能说是矛盾的「激烈爆发」。

违宪反右不可避免？

《反右派斗争始末》的〈结束语〉第四条归结称：

综合当时国内外诸因素来考虑，反右派斗争的发生都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是不是存在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不搞反右派斗争行不行？抽象地来探讨，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这就是说，共产党的第一大党的地位，执政党的地位，虽然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但是却不再享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在它还有力量维护自己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的时候，是决不会接受这种要求的。换句话说，社会还不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历史仅仅提出能够解决的任务。

这段话令人无法苟同。试问：一定要搞57年那样的违宪的非法斗争吗？「不可避免的」要用对敌斗争的方式吗？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不等于说反右有理，毛完全是对的？

反右之外岂无选择

再者，除了发动反右之外，毛真的别无选择吗？以储安平的建议而论，安排非党人士当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又有何不可？这不过是恢复1954年以前的

做法罢了，对中共何损之有？事实上，1959 年不是重新让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了吗？1949 年 10 月她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六名副主席之一，位列刘少奇、朱德之后，过了 10 年，排名还在中共元老董必武之前。尽管如此，中共的权力不是依然不受制约吗？

按照中国的国情，当然可以说 57 年「社会还不要求解决（一党专政）这个问题」，或者说「历史」还没有「提出」这个尚未能解决的「任务」。但是岂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当年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提出」这个「任务」便是有罪？！便该戴上右派帽子受辱，而且永世不得翻身？！

即使是进行冷静的学术研究或深刻的历史反思，也不应为毛的恶行洗刷，使之能够假「历史」之名逃脱其罪责！在这里，「对事不对人」是不行的，「宜粗不宜细」也是不对的。倒不妨借用毛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理应讲「认真」，把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否则，不仅已故的反右斗争受害者死不瞑目，健在者亦意气难平；而我们的国家民族也可能重蹈覆辙，再走弯路，用文革语言叫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即又一次经受「左」祸！这绝非危言耸听，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来，极左路线的回潮不是屡见不鲜吗？李慎之先生称之为「皇权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不仍然根深蒂固吗？

「善良愿望」何曾有过

〈结束语〉第五条，引述了赫鲁晓夫的话：

「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对此，作者认定：

这当然只是一种怀着敌意的情绪化的评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他抹杀了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

我觉得尽管不能否认赫鲁晓夫对毛「怀有敌意」，上述那段话却不应视之为「情绪化」而全盘否定。因为一方面「国内一些研究者也有类似的说法」，这是下文紧接着承认的事实。可见未必是赫鲁晓夫个人「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某些中外论者，一针见血地点中了问题

的要害！何况赫氏处于「旁观者清」的客观地位，所以理应对他的那段话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而不宜大笔一挥轻易「抹杀」。

至于说到毛「消除弊端的愿望」，似乎需要做认真具体的分析。正如〈结束语〉第一条中所谈，毛要除的三害是有底线的。例如党外人士有职无权，是毛实行「一党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万不可作为宗派主义整掉。「外行领导内行」也如此。打天下的老红军、土八路，纵使大字不识才干全无，也必须占据要职，尸位素餐亦在所不计。如此看来，毛之所谓善良愿望，往往既未必「善」，也不一定「良」。

引蛇出洞早有预谋

然而作者对毛的善心确信不疑，就前述李慎之先生所提有关问题，他说：

我为河南本《结束语》增写了第五条，就是回答这个意见的。李先生去世后，我发表了《君子和而不同》纪念李先生，其中说：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李先生的这种看法，是基于他对毛的基本评价。就这一点来说，他当然是对的，我也完全赞同他的这个评价。一个讲诚信的政治家，刚刚信誓旦旦地宣布「言者无罪」，怎么能够一下子改口说「『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呢？根据他自己说过的「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人们岂不是有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他原先的动机究竟有多少善意吗？不过我以为这同他有时也想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并不是不相容的。

对于最后这句话，我是不以为然的。以毛的性格为人来说，他一贯充满「虎气」，极为固执，十分自信，自我感觉良好。他历来自以为高大完美，根本不屑于理会别人的看法。他是绝不会想到如何「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的，从来不会，永远不会。他对自己如此，对中共整体也如此。

毛不在乎「党的形象」

如所周知，中共最为人诟病的是极权统治压制民主，但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段著名的话说：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

在 1956 年 11 月 25 日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

我们共产党是被人家骂了三十五年的，无非是骂共产党「穷凶极恶」、「共产

共妻」、「惨无人道」那一套。加一个达赖，再加一个什么人，有什么要紧。再骂三十五年，还只有七十年。一个人怕挨骂，我看不好。

他所列举的对中共的那些恶评，除「共妻」这一条就当时而言或有夸大，但对毛及其曾经宠信的高岗，以及军方一批高级将领如肖华、黄永胜等并无冤枉。而早期中共高层互换异性伴侣更不稀奇，现时大陆高干婚外情尤已泛滥成风。至于其余各项更系事实。但毛绝无悔意，甚至变本加厉。为了巩固其权力与地位，他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兼且洋洋自得。

回到引蛇出洞这个话题。李慎之先生的观点是，1957 年 1 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表明他决心开展反右派斗争。〈结束语〉也认同称：

（这个）讲话中，就已经出现了后来反右派斗争一些辩论的题目`一些政策和策略。例如，他讲了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的怪议论，涉及共产党能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成绩是不是基本的，对肃反运动的估计，对统购统销的估计，对合作化的估计。毛还谈到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唱对台戏的问题，以为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里的一些提法后来都出现在反右派斗争之中。

接着说，

更早像在几个月之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也就讲过要足够估计成绩等等问题。但是这些都仅仅说明他的思想中有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因素，却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在计划开展这场斗争了。

一心制造「小匈牙利」

这里作者似乎忽略了一点：八届二中全会是 56 年 11 月召开的，那时刚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在会上「没有从积极的方面，如怎样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改善人民的生活，改进共产党的领导来考虑避免类似事件在中国出现，而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来『吸取教训』。」强调「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其弦外之音是否定「八大」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决议。有论者指出，「毛泽东的计划是，制造一个中国的『匈牙利事件』，然后以此为口实，全面改变『八大』的政治路线。」10

对此，毛自己也供认不讳。他在57年6月8日的党内指示，即《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文件中，明白宣示发动整风运动的目的，是「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

由此可见，把毛确定「引蛇出洞」策略的时间定在57年1月，即李慎之先生等研究者所说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期间，无疑是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

「剥的方法」早有三种

〈发言〉则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认为毛是5月间才下决心：先「引蛇出洞」然后开展反右派斗争。为此引述了毛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七・一」社论，即〈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称：

「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做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

作者分析说：

5月8日到6月7日是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开始到工商界座谈会结束的这两个会议之间，正是在这期间，毛具体部署反右派斗争。引蛇出洞或者说诱敌深入就是战役的第一阶段。

作者以此否定李先生的结论。这层意思在〈结束语〉第五条中有如下表述：

就在这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在谈到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时候，毛说，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剥的方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可见这时他还没有想到可以采用更加爽快的第三个办法，即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可以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在1957年初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都想到了反右派（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可是不能说，这时他已经具体想到了要开展一场如同后来实际进行的那样的反右派斗争。所以，把他确定「引蛇出洞」策略的时间定在此时，似乎是稍早了一点。

《发言》将毛1月间只提了两种「剥的方法」，当作「颇有说服力的证据」，以证明毛未决定「引蛇出洞」。其实大谬不然。因为毛在此之前采用的「剥的方法」，

其实已有三种，另一种他没有说，就是「批倒批臭」，例如 1953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相当于后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对梁漱溟毫不留情的面对面的批判。这种方法岂只把对手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连其人格尊严也为之荡然无存，扫地以尽！其实质是一个「压」字。

「给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也属于「批倒批臭」一类方法，不过压得更厉害，更为严酷无情，被「剥」者入了另册，成为贱民，属专政对象之列。

这里，「戴上帽子」是组织处理手段，「引蛇出洞」是斗争策略问题。两者固有联系，更有区别。组织处理手段没想好，不等于反右斗争策略没确定。事实上，正如该书所指出的，连「右派分子」这名目也不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可见，上面所引的毛的那段话不足为据。

动机多种有主有次

〈发言〉还对前引的李慎之先生的批评再次答辩（本书〈后记〉已作过回应），认为：

在他决定整风的多种动机之中，我提出毛一开始确实也包含想要消除那些太刺眼的弊端，改善一个执政党的形象的愿望。这里可以举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毛 5 月 16 日在一个批示中写的一段话：

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毛即使布置反右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太简单。

这个答辩不见得有多少说服力。因为毛决定开展整风的动机，仅在〈发言〉中就先后列举了好几个：

56 年 11 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提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

57 年 4 月 27 日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宣称，整风目的是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特权思想，从而改善党的形象，改善党群关系。还有一个没有宣布的目标，就是毛要跟「反冒进」的刘周算账。

同年 10 月 9 日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说资产阶级进攻，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作者据此评论称，「整风，反右其实是一回事。要说差别，不过是时间先后的两个阶段而已。」

显然，这多种动机中，以「避免在中国也出现匈牙利事件」为主，跟刘周等算帐为辅，改善形象又在其次。实际上，〈发言〉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与反右派斗争之共同点亦含此意，即毛发动这两场运动，「最根本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强他本人的权力和地位，打击有可能向他的权力和地位挑战的对手」。57 年整风把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被毛纳入其内）作为打击对象。如此，66 年文革毛将靶子换成党内走资派，即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求言背后实藏祸心

从毛所供认的「反右派就是整风」，作者进一步推论称：

既然说反右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那么开展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当然早就在毛的成算之中。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当初毛表示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多提些意见，究竟是真心诚意的求言呢？还是引蛇出洞或者说钓鱼的一种手段，阴谋或阳谋？

人们知道毛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敌视是一贯的。从延安整风，思想改造到肃反，开展一场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就说这一回的整风运动，他已经明说就是思想改造，这事实上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或准备阶段。是知识分子不知底蕴，以自己最好的愿望去解释整风指示的文字，误入白虎节堂，自投罗网。

这两段话真的有点扑簌迷离。毛的初衷到底是善是恶？若「当然可以认为在决定整风之时即有钓鱼之意」，便是毛早有图谋设下圈套。倘「是知识分子不知底蕴误入白虎节堂」，那便属于咎由自取，与人无尤，毛其实是真心求言，并无恶意。似乎是模棱两可，语焉不详。

不过，要是再看作者两处自称举出「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毛并非早就蓄谋要反右派，甚至在 57 年 5 月 16 日「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仍然提出了消除一些弊端的要求」，可以明白作者还是倾向于肯定毛「原先的动机」确含「善意」。用李慎之先生转述的话，便是「认为毛本来是好心好意地号召鸣放」。

对此，笔者想借用李先生的话：「这是我完全不能同意的。」其实作者恐怕也未必完全说服了自己，其行文前后颇有矛盾，前已胪列，兹不重复。

如此矫枉焉能反正

但对于作者所举毛 5 月 16 日批示，不能不再说几句。因为其中所指的「错误方向」，正好是「党天下」的真实写照。党员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盛气凌人」，「有特权」，「摆架子」，「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都是毛供认不讳的。执政党的形象，党员的形象如此丑恶，尽管他平素毫不在乎外人的评论，但辖下子民怨声载道，他听了总不能完全无动于衷，所以挥笔写下批语，要求「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他用了「方向」这个词，可见事非寻常。在中共的词典里，「方向路线错误」属于顶级，次为「方向路线性错误」，均远超于一般错误。而且，「方向」置于「路线」之前，足见此类「甚普遍」的弊端在毛心目中的位置。

然而，能够由此认定这个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是「列宁加秦始皇」）的暴君，「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甚至「即使布置反右派斗争的时候」，「也想作一点改善形象的努力」吗？

否。

因为虽然中共执政只有七年，上述弊端已成「方向」，积重难返。但其根子正如储安平所言在于「党天下」这个思想。毛发动反右派斗争，将储列为「位列三甲」的首要标靶，等于给「有特权」「摆架子」的广大党员，首先是那些身居要职的党内高干打气撑腰，试问他们看了毛的上述批示后，有谁会真正「紧跟照办」，切实贯彻执行呢？光凭这官样文章里寥寥几句话，就可以把那「错误方向」「完全扳过来」，岂非痴人说梦？相信连毛也知道他这些话只是说说罢了，并没有「动真格」之意。

可以借用毛所言，「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毛不过是装腔作势要消除弊端，

改善形象，改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他心里很清楚，这些「弊端」啊，「形象」啊，「关系」啊，对他的最高权力和地位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无需认真对待。「如果不看到这一方面，就未免把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尤其是像毛这么复杂的首脑人物，用林彪的话叫做「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岂能「书生气十足」地仅凭他短短数句批语，就作出善恶判断？

毛划右派何曾「克制」

〈结束语〉第七条说，「当年使用『右派分子』这顶帽子其实是颇为吝惜颇为克制的」，根据是「划右派仅仅限于知识分子之内」，工农不划。这里面「吝惜」用词不当，「克制」更说得显然不对。

据《现代汉语词典》，「吝惜」意为过分爱惜，舍不得拿出（自己的东西和力量）。用于给人戴帽子的毛，语法上搭配欠佳。至于说「克制」，就更非事实。据57年7月29日下发的中共文件，毛打算划右派四千人。8月18日他估计全国右派约10万人。最终结果是55万多人。可见他简直随心所欲地把人打成右派，绝不手软。试问何来「克制」之有？帽子一戴即成贱民，等于政治生命完结，沦入十八层地狱。从这个意义上，毛疯狂抓右派，即是草菅人命。岂能以「克制」美化之？

强词夺理乃毛惯伎

〈结束语〉第八条称，「以言治罪」并非自反右始。但毛谓右派「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这是强词夺理，典型的毛式霸王兼无赖作风。本条在引毛这段话后写道：「当然，发言也是一种行为，这样解释起来，言与行之间相对的区别也不承认了。右派分子也只能这样想才能够说服自己。」如此评论未免太「费厄泼赖」了。

毫无疑问，毛精通中国语言，正因此，其似是而非的诡辩不可胜数。诸如「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之类均是。出尔反尔也是他的惯技。有一个事例，反右之前的4月10日，毛曾召见邓拓等《人民日报》负责人，痛斥邓是「死人办报」，没有报导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此乃其「引蛇出洞」的重要举措），并几次批评该报不应出八版，浪费纸张。胡乔木回话说出

八版是请示过他的。毛竟诡辩称：如果是那样，那是我说了昏话，我的很多话你们都听不进去，这件事就听进去了。11 窥斑可以见豹，毛之蛮不讲理诿过于人凸显无遗。

如果毛仅是诿过于下属，则当事人最多丢掉乌纱帽。如邓拓反右后调职，改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但右派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毛竟悍然加罪于几十万响应其号召的言者。为了自圆其说，他以不容反驳的九五之尊身份，振振有词地恣意玩弄文字游戏，混淆黑白，指鹿为马，是可忍，孰不可忍？

总之，右派无罪，罪在毛泽东！(2007-6-4 改稿)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注 释

1 黎澍《论历史的创造及其它》（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171 页。

2 《反右派斗争始末》（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2004）第 189 页。

3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香港：田园书屋，2007 年 3 月）。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339 页。

5 冯治军《刘少奇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1998）第 275-276 页。

6 《中共中央文件选辑》第十六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第 573 页。

7 《毛泽东 1947 年 11 月 30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8 《刘少奇和他的事业》（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第 436 页。

9 冯治军《刘少奇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1998）第 294 页。

10 同上。

11 王若水《智慧的痛苦》（香港：三联书店，1989）第 325 页。

「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　　叶永烈

《人民日报》质问：这是为什么?

过去的2006年是中国「文革」四十周年祭，而2007年则是中国「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祭。

提起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马上就会使人记起卢郁文这名字。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知道卢郁文为何许人，而在1957年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运动」，就是从「卢郁文事件」作为突破口开始的。

1957年6月8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反右派运动」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地位发表了石破天惊的重要社论，以质问的口气作为题目：〈这是为什么?〉！

社论一开头，就提到了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社论写道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因为5月25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讨论怎样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发表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意见，就有人写了匿名信恐吓他，这封信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在共产党整风运动中，竟发生这样的事件，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每个人都应该想想：

这究竟是为什么?

社论在提出「为什么」之后，对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剖示。社论首先对所谓「无耻之尤」加以批驳2：

卢郁文在5月25日的发言中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一是告诉人们不要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二是说国务院

开会时应该有事先准备好的文件，以便讨论，免得像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一样每天争吵，议而不决，不能说就是形式主义，就是不让大家讨论；三是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如果有些人和党员之间有了墙和沟，应该「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四是说共产党人对某些批评可以辩驳，这种辩驳不能认为是报复打击；五是对党外人士如何实现有职有权的问题提供了一些具体意见。我们和许多读者一样不能不问：发表这样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意见，为什么就是「为虎作伥」、「无耻之尤」?为什么要「及早回头」，否则就「不会饶恕你」?

社论借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加以发挥，点出了主题，亦即开展一场「反右派运动」3：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可是他们忘记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以前的中国，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

在各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中，有少数右派分子像卢郁文所说，还想利用辱骂，威胁，「装出『公正』的态度来箝制人们」的言论，甚至采取写恐吓信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 1957 年那场「阳谋」中，毛泽东运用「诱敌深入」的战略，简直是熟练极了。

毛泽东早已布好「口袋」，眼看着大批「右派」进入了「口袋」，他在思索着选择什么时机下令发起总攻击。

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为突破口，一声令下，发起总攻击，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便席卷中国!

「右派」们骂卢郁文是「小丑」「小人」

「右派」们看了《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大骂卢郁文。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史良 12 日晚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揭露了章伯钧在 6 月 8 日当天关于《人民日报》社论谈话 4：

「记得上星期六晚间(6 月 8 日)，伯钧来找我谈话……伯钧说：『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掮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评。』」

章伯钧的这一段话，鲜明地反映出他对于《人民日报》六月八日社论的态度。

反映最强烈的，莫过于谭惕吾。她在卢郁文宣布收到匿名信之际，就当场与之争论。她看了《人民日报》6 月 8 日的社论，当然非常反感。

据一位自称「深受过谭惕吾的毒害」的青年、当时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生刘则智，在题为〈揭露右派分子谭惕吾毒害青年的罪行〉的发言中揭发道 5：

「当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后，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到了谭家，一进门就看见谭惕吾怒气满面，手里拿着《人民日报》骂着说『什么《人民日报》呀，简直是混帐，乱登消息，党报真是岂有此理。』吃午饭时，她忽然把饭碗一摔，骂道：『卢郁文这个王八旦整到我头上来了。』又说：『什么匿名信，一定是卢郁文自己写的。』饭后，她给黄绍竑打电话，也大骂卢郁文，她在电话里说：『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

后来，谭惕吾在压力之下不得不作了这样的「交代」6：

「6 月 14 日我到刘斐家里去，对刘斐说：『党怎么把我的名字和卢郁文的名字并列起来?显出卢郁文是正确的，我是不正确的』，我批评了卢郁文很多不是，我说：『党怎么相信卢郁文而不相信我? 』我还说：『中国历史上，只有朝代衰落的时候，才相信小人，现在党才执政八年，正是兴盛时候，为什么就相信小人?工厂里的工人都表示拥护卢郁文，这给河南人民心里产生什么影响?什么人不好做旗子，为什么要用卢郁文做旗子? 』」

〈这是为什么？〉的内幕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怎样写出来的？毛泽东究竟是怎么策划的？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个谜。吴冷西的回忆录《忆毛主席》终于解开了这个谜。

吴冷西是在关键时刻——〈这是为什么？〉发表的前一天，即 1957 年 6 月 7 日，应毛泽东之约，在胡乔木的陪同下，一起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吴冷西说，那次谈话，除了毛泽东、胡乔木和他之外，「没有其它人参加这次谈话。」

吴冷西回忆说 7：

1957 年 6 月 7 日，胡乔木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找我谈话，要我先到他的住处，然后一起去见毛主席。

这是一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我们从乔木同志住处出来，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这是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地方，后来拆除了），来到勤政殿（这是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地方，后来也完全拆除了）后面的一个小旁门，进去便是毛主席的住所——菊香书屋。

这是一个不很大的四合院。毛主席通常习惯在北房工作和睡觉，虽然他的大书房在东厢房。这高大的北房是五开间，那里简直也是一个书房，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也常在这里。

我们进去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他似乎醒来不久，斜躺在两张单人床合拼成的大床上，已看过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木板床上，那里堆满近期看过或者要看的书，有古籍（大都夹著书签），也有新书（有些翻开的）。他手里正拿着文汇报，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主席见我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我们在靠床前的椅子上坐下……

吴冷西回忆道，他刚坐下，毛泽东就跟他说起了「卢郁文事件」8：

我们刚坐下来，毛主席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说他收到匿名信，对他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

接着，毛泽东向吴冷西说明了为什么要抓住「卢郁文事件」做文章。毛泽东显然极具战略眼光，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选择了「卢郁文事件」作为突破点的。毛泽东以为抓住「卢郁文事件」有两大好处：第一，卢郁文是非中共人士；第二，

那信是匿名的。

吴冷西这样回忆 9：

毛主席说，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们广泛地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寻常。

毛泽东在跟吴冷西谈话时，《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其实已经写好。毛泽东手里拿着《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向吴冷西解释了社论的题目〈这是为什么？〉的含义 10：

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

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已经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

毛主席说，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

吴冷西还记得，临走时，毛泽东又在社论上改了几个字，嘱咐胡乔木在翌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并嘱咐吴冷西，在当晚就由新华社发出电讯，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清楚表明，《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是由毛泽东亲自改定，发表的时间也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在一年多之后，毛泽东在另一次讲话的时候，又谈到了「卢郁文事件」，足见毛泽东对于他选择「卢郁文事件」作为「反右派斗争」的突破口，以为是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得意之笔」。

那是 1958 年 8 月 25 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滩游泳场休息室，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那时，毛泽东刚下海游泳回来，穿着睡衣就主持开会。出席会议的除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之外，还有彭德怀、王尚荣(总参作战部部长)、叶飞(福州军区政委)，胡乔木和吴冷西也参加了。

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高谈阔论。吴冷西回忆说 11：

毛主席说，凡事要抓住时机。去年开始反击右派是抓住了卢郁文事件，批判《文汇报》是抓住了《新民报》作了自我批评。这次炮打金门，就是抓住美军登陆黎巴嫩。

九年之后，历史重演，惊人的相似：1966 年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公开发动的一天。发动「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卢郁文事件」，大做文章；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则抓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做文章，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对于〈这是为什么？〉起草者的考证

如今，很多文章断定〈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其中有尚定着〈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二十年〉12：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又如，章立凡在〈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 1957〉中也写道 13：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

笔者以为，〈这是为什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并由毛泽东亲笔改定，这是无疑的。但是，吴冷西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确认〈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笔者曾经致电吴冷西秘书，希望他能够代向吴冷西询问，吴冷西未予明确答复。

笔者查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卷，都未见收入〈这是为什么〉。另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也只这么一句 14：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这就是说，中共当局关于毛泽东的三部权威性的书——《毛泽东选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毛泽东传（1949-1976）》，均未提及〈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

倘若〈这是为什么？〉不是毛泽东起草，最有可能的起草者当然是胡乔木。笔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15 的作者，曾经查阅过《胡乔木文集》等诸多胡乔木著作，也未见收入此文。

由胡乔木起草的 1957 年《人民日报》「反右派运动」的社论共七篇，即：〈为什么要整风〉（5 月 2 日）、〈是不是立场问题？〉（6 月 14 日）、〈不平常的春天〉（6 月 22 日）、〈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 月 8 日）、〈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 月 10 日）、〈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7 月 18 日）、〈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 月 23 日）。

会不会是陈伯达起草呢？笔者也是《陈伯达传》16 的作者，曾经多次采访陈伯达本人。陈伯达当时忙于为毛泽东整理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没有可能为《人民日报》起草社论。

1957 年 6 月 8 日当天，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 17：

陈伯达同志：

此件请参酌。如果文件今晚搞不完，明日下午二时交我也可以。

毛泽东

六月八日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的「此件」，是指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三稿写给毛泽东的意见信。毛泽东所提到的「文件」，则是陈伯达正在为毛泽东作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四稿。陈伯达当时在开夜车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当然也就无暇起草《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的作者究竟是谁？尚待查证。

当然，笔者并不排斥〈这是为什么？〉是毛泽东起草的这样的推测，但是必须言之有据——依照原始文件案进行证实。

卢郁文其人

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前，卢郁文此人虽说并不广为人知，却也颇有来历。

1949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不得不派出「和平商谈代表团」和中共谈判。

这年3月24日，南京政府公布了代表团名单，内中便有卢郁文其人：

首席代表：张治中

代表：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28日又补刘斐)

秘书长：卢郁文

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容

除此之外，卢郁文的身世鲜为人知。由于卢郁文先生已经故世，我在1989年曾通过民革中央希望采访卢郁文亲属。民革中央告知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在广西桂林的通讯处。这样，我多次与卢存学先生通信，询问有关卢郁文的生平。后来，卢存学先生又从桂林迁往广西北海。2005年9月，我前往北海采访，得以与卢存学先生畅谈。

卢存学先生向我详细地讲述了父亲卢郁文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归纳如下18：

卢郁文，原名卢光润，字玉温，后来据「玉温」谐音改名郁文。1900年12月10日，出生于直隶（今河北）昌黎（原卢龙县木井镇卢柏各庄）的大户人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堂英语系。1925年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自费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讲师，民国大学教授，河北法商学院经济系主任、教授，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粮食部参事。抗战胜利后，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长到北平参加和谈。后留居北平。同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此后，任政务院参事，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他还担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8年10月6日因突发性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

在卢存学先生所讲述的父亲卢郁文漫长一生之中，在我看来，有几个人生关键点值得细叙。从这几个关键点可以看出，卢郁文的「左派人士」的面目是如何形成的，这也正是卢郁文在1957年5月25日说出那番「左派」言论的原因。

我沿着卢郁文的人生轨迹寻找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时，注意到他与杨秀峰的亲密友谊。

杨秀峰原名杨秀林，年长卢郁文三岁，河北迁安县人，1929年赴法留学，1930

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卢郁文便结识杨秀峰——当时叫杨秀林，成为挚友。杨秀峰与卢郁文先后赴法国、英国留学。杨秀峰是公费生，卢郁文是自费生（他当时向朋友借了一笔钱前往英国）。卢郁文在伦敦陷入经济困境时，杨秀峰省下钱汇往英国，接济卢郁文，由此可见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友谊。解放后，卢郁文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曾把自传寄给杨秀峰，杨秀峰给予热情的鼓励。

我又沿着卢郁文的人生轨迹，寻找他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找到了关键人物张治中。

卢郁文在 1944 年奉派前往新疆，担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兼田赋粮食管理处处长、新疆银行董事长。当时新疆的省主席为吴忠信。不久，吴忠信卸任，由张治中继任。卢郁文与张治中在新疆共事一年多，结下深厚友情。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卢郁文要求返回南京工作。临行，张治中修书一封，让卢郁文带到南京面呈蒋介石。张治中在致蒋介石的亲笔信中，称赞卢郁文「此人品学兼优，堪以重任」。就这样，卢郁文在南京拜谒蒋介石之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正因为这样，1949 年南京政府组成和平谈判代表团的时候，张治中被蒋介石任命为团长，而张治中则推荐了卢郁文为代表团秘书长。在卢存学家中，我见到许多张治中致卢郁文的亲笔信，在卢郁文的日记中也不断写及张治中，他与张治中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谈判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卢郁文与周恩来有了许多接触。

值得提到的是，在和平谈判期间，毛泽东约见了卢郁文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员李蒸。

那是 1949 年 4 月 11 日清早，应毛泽东之约，卢郁文和李蒸乘轿车从北平市内前往郊外香山的双清别墅。当时，毛泽东住在那里。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二位都是大学教授，我才是中学教员。」卢郁文跟毛泽东一见面，就领教了毛泽东的风趣。卢郁文说：「毛先生起床这么早哇！」毛泽东的回答出乎卢郁文的意外：「我还没有睡觉呢！」卢郁文这才知道，毛泽东通宵工作，尚未休息。那天上午，毛泽东就和平谈判问题，与卢郁文谈了三小时。毛泽东还请卢郁文和李蒸吃中饭，毛泽东夫人江青作陪。有了这次长时间的直接交谈，卢郁文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这也是导致在1957年毛泽东选择卢郁文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的原因之一。

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和谈破裂之后，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在周恩来的力劝之下，留在了北平。作为代表团的秘书长的卢郁文，也就从国民党官员变成了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以周恩来为总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成立之后，卢郁文出任政务院秘书长助理。这时，卢郁文两度写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劝他暂时不要入党。周恩来对卢郁文说，你在党外比入党起的作用更大。

据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在2007年2月27日告诉笔者，当局要给卢郁文安排秘书和司机的时候，卢郁文强调说，我的秘书、司机必须是中共党员！最使卢存学感到不可理解的是，每当他给父亲卢郁文写信，卢郁文总是把信给秘书过目。在卢存学得知此事之后，对父亲说：「我给你的信是家信，为什么要给你的秘书看？」这时，卢郁文说了一句「名言」：「我是『无话不可对党言』!」

正因为这样，在1957年，卢郁文会以「左派分子」的面目出现，发表了那么一番谈话。卢郁文驳斥「右派分子」说，他自己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从卢郁文的角度看来，确实如此，因为他已经是在组织上没有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当然会「同共产党员相处得很融洽」。

「左派」父亲与「右派」儿子

在与卢郁文之子卢存学长谈中，我注意到一个强烈的反差：卢郁文在1957年成为「反右英雄」，而他的儿子卢存学却成了「右派分子」!

这一强烈反差，在1949年正好相反：那时候，卢郁文是国民党高官，他的儿子卢存学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卢存学原本在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上学。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卢存学与在南京的父亲卢郁文失去了联系。当时，卢存学受共产党的影响，在1949年3月10日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一分团一大队一中队的成员，住在北平东四。

1949年3月31日，卢郁文作为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的秘书长，飞往北平，下榻于六国饭店。坐落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由英国人在1900年建造的，

在当年是北平屈指可数的高级宾馆。4 月 1 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抵达北平的新闻，卢存学欣喜地得知久别的父亲卢郁文是代表团成员，也来到北平。不过，父子分属于对立的政治营垒，不能随便来往。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驻地，戒备森严。

卢郁文也挂念儿子。他通过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找到了卢存学。4 月 3 日，中共代表团通知卢存学，可以前往六国饭店探望父亲卢郁文。

从东四到东交民巷没多远。卢存学一身戎装，步行来到六国饭店，正值吃中饭的时候。卢郁文带着卢存学来到餐厅，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差不多都在那里。卢郁文向代表团成员们介绍了自己的儿子。当代表团成员们见到穿着军装的卢存学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胸卡，都非常惊讶。团长张治中笑道：「来呀，进步的儿子跟反动的老子打一架!」

在 1949 年，儿子代表「进步」，老子代表「反动」，而到了 1957 年则颠倒过来，老子代表「左派」，儿子成了「右派」。

那时候，卢郁文在国务院任职，住在北京手帕胡同，而卢存学则在桂林的《桂林日报》担任副刊编辑。

当卢存学从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读到社论〈这是为什么？〉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篇重要社论是以他的父亲卢郁文收到匿名信为由头写的。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卢郁文成为中国的新闻人物，争议人物：「工农兵」以及「左派」们表示支持卢郁文，谴责那封匿名信，而「右派分子」们则称卢郁文为「小丑」。

卢存学担心父亲的安全，就向报社领导请了假，前往北京探望父亲卢郁文。到了北京，父亲卢郁文告诉他，家中都平安，而且家附近似乎有便衣警卫在巡逻，以防不测。

在北京的那些日子里，卢郁文问起儿子对于「反右派运动」的看法。卢存学说，那只是上层的事，反的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跟他这样当年参加南下工作团的热心青年无关。卢郁文听罢，批评儿子的「觉悟太低」!

卢郁文问起儿子在报社里的情况，卢存学说起自己跟报社领导关系不好。总编辑年纪跟他相仿，常常盛气凌人，他受不了。副总编辑待人还不错，但是水平太低。卢郁文一听，非常焦急。卢郁文特地抽出时间，把儿子拉到北京中山公园，在一个僻静的小山坡上跟卢存学长谈。卢郁文尖锐地批评儿子有骄傲自大的情绪，

发展下去非常危险。卢郁文告诫儿子：「领导不管水平高低，他代表党。你对他不满，就是反党！因为你不可能直接反对党中央。在中央的反右派斗争中，凡是对党员提意见的，甚至对拥护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都被视为反党。你回去要赶快认错检讨。」

卢郁文深为儿子的命运担忧。1957 年 8 月 6 日，当卢存学要回桂林的时候，卢郁文写了这样一首诗送他，表达了对儿子的一片深情：

念儿将去苦日短，

盼儿来时何日长。

千里迢迢思送别，

一心伴儿到漓江。

卢存学从北京回到桂林，这才明白父亲对于「反右派运动」形势的估计是何等的准确。卢存学说，一进报社，「编辑部的同事们见到我时面部肌肉一概绷紧，特别是两位领导，决不在我面前露一丝笑容」。尽管报社里人人都知道卢存学的父亲卢郁文是「反右英雄」，可是仍无法挽救卢存学覆灭的命运。1958 年 4 月 16 日，「右派分子」的帽子，果然戴到了卢存学的头上。

卢存学说，父亲卢郁文得知他成为「右派分子」，马上向组织上汇报：「我的儿子堕落为可耻的右派！」

卢存学说，那时候父亲卢郁文不断给他写信，进行教育，其中有不少「警句」：

「你说你从心里没有反党，我相信，但谁能证明？左派的心和右派的心挖出来都是血淋淋的一块肉。」

「要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减之罪也是何患无辞的。」

「你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了吗？主观主义自以为是还不当右派吗？」

卢郁文最令人难忘的对儿子所说的「名言」是：

「要像追女朋友那样接近党员、进步分子；要用实际行动的大笔把过去的污点一挥抹掉！」

卢存学成为「右派分子」之后，降级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省下两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去北京的往返车费。好不容易回趟家，在家中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他连家中的水果都不敢吃！

直到 1960 年国庆节，卢存学终于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即便如此，他仍

是「摘帽右派」。他仍不断受到折磨。1961 年在「向党交心」中再度中了「阳谋」的圈套，甚至被关进看守所……

从 1964 年起，卢郁文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当「文革」风暴席卷中国的时候，卢存学又挨批斗。不过，卢郁文由于被列为「保护对象」，所以未受红卫兵的冲击，只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中被取消公家配备的轿车、电话。

1968 年 10 月 6 日，六十八岁的卢郁文刚刚吃过晚饭，突发心肌梗塞，当即去世。经全国政协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批准为卢郁文举行追悼会，《人民日报》也为卢郁文的去世发了消息。在「文革」岁月，卢郁文病逝能够受到这样的礼遇，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文革」的劫难，卢存学先生颇为感叹。他说：

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怎么会有这样适合迷信、野蛮、疯狂、残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长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根源的吗？

卢存学先生还指出：

中国人因可怜而丑陋，因丑陋而更加可怜，应该到头了！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和辨别。

追踪匿名信的来龙去脉

「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是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关于卢郁文收到的匿名信，当时很多人猜测纯系子虚乌有，是卢郁文「制造」出来的。诚如谭惕吾所言：「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

三十年后，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也写道：「卢郁文，民主人士，在鸣放阶段几次提醒，向党提意见要实事求是，不应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后来据称为此接到谩骂威胁的匿名信，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卢郁文收到的那封匿名信，是否真有其事？笔者曾致函询问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承他于 1996 年 3 月 5 日复函：

关于匿名信的真伪问题：

1957年夏，我由于担心父亲的安全，特地从桂林回京探亲，曾询及匿名信之事，父亲说，那信是从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发来的(我已不记得是保定还是石家庄)。

我还看了一批父亲没有来得及上送的信，其中大多数是表示同情和安慰的，也有个别持不同意见的。

无论如何不至于如谭惕吾、章伯钧说的是自己写的。况且，父亲说匿名信上缴之后，有关方面已在我家(西单手帕胡同)附近采取了保护措施。

从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复函中可以看出，卢郁文当时确实收到了匿名信，而这匿名信并不是他「自己写的」。

不过，我经过采访表明，卢存学先生所回忆的「那信是从北京以外的河北省某地发来的(我已不记得是保定还是石家庄)」是不确切的。

那封匿名信的信封上所盖的邮戳，清楚地印着「北京海淀」。

海淀，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北京大学就在海淀，我在北京大学读了六年书。海淀还是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的所在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构成了海淀的「知识分子三角地」，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集中在那里。写匿名信的人，理所当然是非常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正因为这样，那封匿名信从北京海淀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寄出，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这封匿名信既然成了「反右派运动」的导火线，上了《人民日报》社论，公安部列为头等要案查办。公安人员判定，写匿名信的人，就在海淀。虽说也有可能是写信者住在北京别的地方甚至其它城市，为了迷惑破案者，特地跑到北京海淀寄信。不过，公安人员以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把侦查的重点，放在了北京海淀。

对于破案有利的一面是那封匿名信用的是真实的笔迹。通常，很多匿名信是以左手书写，或者用印刷体书写，以求隐蔽作案者真实的笔迹。那封匿名信既然用的是真实的笔迹，那么通过核对笔迹，就可以破案。

然而，对于破案也有着极其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北京海淀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浩如烟海。公安人员首先从这一地区的「右派分子」着手，核对笔迹。在他们看来，匿名信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右派分子」，只有「右派分子」才会那样痛恨「左派分子」卢郁文。

不过，在海淀，即便是「右派分子」，也数量众多。光是北京大学，就有五百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

除了「右派分子」之外，那些历史上有过问题或者表露出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人，也在公安人员的怀疑名单之中。

公安人员暗中调阅文件案，核对笔迹。

然而，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一直未能破案，这使人们更加相信谭惕吾所作的判断：「我百分之百保证匿名信是卢郁文自己写的。」

就在将近三年之际——1960 年 3 月，我正在北京上大学。一天，学校里忽然传达紧急案情：有人竟敢冒充周恩来总理笔迹，以国务院名义，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二十万人民币!公安部门印发了那伪造笔迹的影印件，发动群众辨认。

那是 1960 年 3 月 18 日下午 5 时 40 分，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西交民巷的中国人民银行传达室进来一个自称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人，递上一个浅棕色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用毛笔书写：「速送（限下午五点四十分前送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信封是国务院用封，信封内是一份批件，内容是：「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并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像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人民币十五万至二十万元，可否请批示。」周总理的批示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二十万元。」旁注有：「为了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①要市场流通旧票。②拾元票每捆要包装好一些。七时以前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当晚七时，银行发行局的三名干部把装有二十万元现款的两个麻袋送到民族饭店，交给了等候的「赵全一」。

为了迅速侦破此案，公安部门大量印发了那封信影印件，发动北京各单位辨认笔迹。

只花了半个月——4 月 3 日，作案者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被捕。

就在破获王倬案件之后不久，那个三年未破的匿名信案件也被公安部门侦破了。

2006 年 12 月 8 日，我采访了匿名信案件的见证人之一宋兆麟先生。他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五五级的团支部书记。

据宋兆麟先生回忆，当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是五年制，在 1960 年 7 月末，他们

已经毕业，正处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的时候。突然，年级的党支部书记穆舜英找到他，要他执行一项紧急任务：赶紧到「校卫队」（注：「校卫队」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保卫部门）去，公安人员在那里等他。公安部门要逮捕他的同班又同宿舍的同学杨秉功。由于公安人员不认识杨秉功，党支部书记穆舜英要他为公安人员指认杨秉功。

当时，宋兆麟非常震惊，因为他跟杨秉功同窗五年，从未觉得杨秉功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不过，党支部书记这么指示，作为团支部书记的他只得服从、照办。

宋兆麟来到了北京大学「校卫队」，公安人员向他出示了逮捕杨秉功的逮捕证。于是，宋兆麟带领公安人员来到文史楼附近的一座平房，他知道杨秉功常在那里看书。

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杨秉功面前，并出示了逮捕证，杨秉功起初楞了一下，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他没有问为什么要逮捕他，这表明他明白逮捕他的原因。他只是默默地听从公安人员的吩咐，从平房前往宿舍，收拾好行李，跟随公安人员走了……

据杨秉功的同学马文宽告诉笔者，杨秉功被捕之后，历史系 1955 级全体同学紧急集合，校方负责人向同学们宣布了杨秉功因在 1957 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而被捕。当时，同学们非常震惊，谁都没想到那封轰动全国的匿名信，会出自同学杨秉功之手。

不久，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本校历史系学生杨秉功在 1957 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而被捕。当时，北京大学出现「反标」（即「反革命标语」）事件，陆平以杨秉功为例，说「杨秉功虽然隐藏了三年，最终还是被侦破」，陆平借此警告「反标」的作案者，尽早向组织坦白。

杨秉功被捕的消息，当时没有见诸于媒体。正因为这样，直到 1997 年，戴晴在《储安平与党天下》一书中才会对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作那样的推测：「笔者至今倾向于这是一场类似国会纵火案式的小把戏。」

据北京大学历史系 1957 级的王曾瑜回忆，1960 年夏，五五级一位杨秉功师兄，在未名湖贴出一张匿名小字报，说是广西饿死人，于是在分配前夕被捕。当传达时，消息闭塞的我根本不相信会有饿死人的事，还真以为这个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呢。

杨秉功是在调查少数民族历史时去了广西，得知广西饿死人的情况。那张「匿名小字报」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发现笔迹与1957年写给卢郁文的匿名信相同。

据宋兆麟告诉笔者，杨秉功并不是「右派分子」。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中，尽管他们班级中出了三个「右派分子」，但是杨秉功没有什么「右派」言论。在「反右派运动」中，杨秉功也跟同学们一样参加了对班级里的「右派分子」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杨秉功居然是那封匿名信的作者，这完全出乎同学们的意料。

宋兆麟记得，杨秉功是河南人，家庭困难，当时申请了助学金。

杨秉功的另一位同学告诉笔者，杨秉功富有正义感。杨秉功是历史系学生，知道当年卢郁文是国民党政府的「红人」，投诚共产党之后，又成为民主人士中的「红人」。杨秉功看不惯卢郁文的为人，所以才会以匿名信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卢郁文的不满。至于杨秉功的匿名信居然会上了《人民日报》社论，居然会被毛泽东看中作为「反右派运动」的突破口，这是年轻的杨秉功始料不及的。

杨秉功的这位同学对笔者说，杨秉功给卢郁文写了匿名信，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完全可以的。杨秉功没有在信中署名，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不民主所造成的，「高压政策」迫使杨秉功只能以匿名信表达自己的意见。杨秉功写给卢郁文的信，即便个别词句有点情绪化，那也不能作为「反革命罪证」来逮捕他。杨秉功因此入狱多年，是「以言定罪」、「高压政治」的体现。

杨秉功的这位同学回忆，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时候，满头白发的杨秉功出现在同学会上。杨秉功经历了种种苦难，在出狱之后，终于有了幸福的家庭，而且他也当上了县政协委员。

笔者经过多方打听，终于拨通了杨秉功的电话。他一听我的名字，就称我为「老校友」。他的语气是那么的平静、平淡19：「1957年，我只二十五岁，年轻人一个，血气方刚。如今半个世纪过去，老校友，不必旧事重提了吧。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现在，我算是有碗饭吃，生活还算过得去。」(2007年4月15日改定于上海「沉思斋」)

——2007年6月30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1957 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2　1957 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3　1957 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
4　1957 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5　《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1957 年编印。
6　《揭露批判右派分子谭惕吾反动言行大会发言汇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1957 年编印。
7　吴冷西，《忆毛主席》，一五五至一五六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8　吴冷西，《忆毛主席》，三九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9　吴冷西，《忆毛主席》，四〇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10 吴冷西，《忆毛主席》，四〇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11 吴冷西，《忆毛主席》，七六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12 尚定，《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 20 年》，一九九页，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
13 章立凡，《风雨沉舟记——章乃器在 1957》，《黄河》，一九九七年第六期。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七〇五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
15 叶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笔》，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初版，广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二月增补再版。
16 叶永烈，《陈伯达传》（上、下卷），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1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1956.1-1957.12），四九九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18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二日，采访卢存学于广西北海。
19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九日，电话采访杨秉功。

评析右派三大理论　　　叶永烈

毛泽东曾这样说：「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是很拥护的。」1

毛泽东所提到的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被称为右派的「三大理论」，即「右三论」，受到最猛烈的批判。

其实，这右派的「三大理论」，是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再三「动员」，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才终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发言。在他们发言之后，这才发觉，进入了毛泽东的「伏击圈」。

也正因为「右三论」被毛泽东指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最具代表性言论，所以即便在后来给「右派分子」们平反的时候，「右三论」的提出者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未予「改正」。也就是说，直至今日，在中共眼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依然是「右派分子」，原因是他们在 1957 年提出了「右三论」。

这「右三论」究竟是怎样提出的呢？

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

1957 年 5 月 21 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进入了第八次会议。

章伯钧发话了。由于章伯钧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报》社社长，在民主人士中，举足轻重，所以他的发言很引人注目。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一次座谈会上，章伯钧讲过几句无关痛痒的话。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谈会，他这才说了一些有分量的话。

章伯钧这一回的发言，提出了关于「政治设计院」的设想。

章伯钧先是说：「今天，我谈个人的意见。近二十天来，全国各地都在谈论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看来是正常的。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民主精神，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接着，

章伯钧谈及了「政治设计院」。

以下是《人民日报》所载章伯钧发言的原文，标题是《现在工业上有设计院，可是政治上没有设计院》。章伯钧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2

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设计院」的来历。

这段话，不论是从头至尾，或者是从尾至头，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指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而不是别的什么。他的「政治设计」的含义，无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设」，先交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四个「政治设计院」讨论，因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章伯钧在发言中，批评了国务院。他说：

「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章伯钧的这段话，是希望把国务院也作为「政治设计院」。他作为交通部长，常常出席国务院会议。在他看来，国务院开会，应是「政治设计」会议，即让部长们都参予设计，而不是「拿出成品」。

章伯钧这一段话，后来被列为「著名右派观点」。

罗隆基建议成立「平反委员会」

就在章伯钧提出「政治设计院」的翌日，5 月 22 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第九次座谈会上,中国民主同盟的另一位副主席罗隆基发言了。

罗隆基提出应该成立「平反委员会」，后来又成了「著名右派观点」。

罗隆基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

1955 年 5 月，胡风在北京家中被捕，罪名是「反革命」。紧接着，一场声势

浩大的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席卷中国大陆。罗隆基对此摇头，他曾对朋友说：「胡风会是反革命？我不相信!」

罗隆基对于「肃反」、「三反」、「五反」中的过左行为，也颇有微词。

既然中共开展整风运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次又一次召开座谈会，竭诚地欢迎民主人士提意见。罗隆基有话在肚子里，搁不住，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即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以纠正以往运动中的冤案。

以下是 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关于罗隆基发言的报导：

「他谈到顾虑与保证问题，他说：为了鼓励大家『鸣』『放』，并保证『鸣』『放』得好，我觉得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可以成立一个有共产党、民主党派的成员和其它方面人士参加的委员会，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励受委屈的人士向这个委员会申诉。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指示过，由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成立一个机构来检查肃反偏差。他拥护这主张。他说，成立这么一个委员会有三大好处：

一、可以鼓励有意见的人向委员会申诉。地方上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希望有说话的地方，并且希望『条条道路通北京』，认为有意见传到北京，就是『上情下达』。因此，有了这个委员会，就可以使有委屈的人不至于没地方申诉。

二、可以更好地做好平反工作。王昆仑先生说，现在有人以为今天的『鸣』『放』是三部曲：放、收、整。其实这不外是经验主义者错误的主观主义设想出来的公式。过去许多大运动造成一些隔阂。过去的运动都有平反工作。不过，过去的平反工作往往是：人民代表大会把意见转给地方，地方又将意见转给有关单位领导的组织去处理。这样就很难做到『有错必纠』了。如果成立了这么一个委员会，那就可以将平反的机构和『三反』、『五反』、『肃反』的机构分开来。过去的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今天平反有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那就更有利于做平反工作。

三、在『鸣』『放』中，就有人有顾虑。谁也不敢保证，对『放』与『鸣』绝对不会有人打击报复。有了这个委员会，受到打击报复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员会控诉。这样，有报复思想的人就害怕，真的受到报复的人也有路可走。

这样的委员会，中央有，地方也应该有，而且中央可以领导地方的这样的委员会；

全国有这么样的有系统的机构，一定能够保证『鸣』『放』得好。我这个仅是建议，很不成熟，不知道是否妥当。」3

储安平向「老和尚」提意见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三次。

已近尾声，中共中央统战部查对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单，发觉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尚未发言。于是，中共中央统战部打电话给储安平，请他务必在六月一日所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一次发言。

储安平从命，在 6 月 1 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颇为直率的发言。他是事先写好发言稿，照着稿子念的。那发言的题目就够惊人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

《光明日报》那时是「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社长为章伯钧，总编辑便是储安平。

储安平其实是在 1957 年 4 月 1 日才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在他作那番发言时，他上任不过整整两个月。

储安平作为民主人士，怎么会忽然在 1957 年的大鸣大放中，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呢?

《光明日报》在当时虽说是一张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但是历任总编辑都是中共党员：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都是中共党员。

内中胡愈之，向来有「党外布尔什维克」之称。他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胡愈之在 1986 年去世之后，这才公开了他的身份：「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不过，胡愈之是中共特别党员，对外不公开身份，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从事社会活动。也正因为这样，最初由胡愈之负责创办《光明日报》，可以说是最佳人选。

胡愈之在担任《光明日报》总编后，由于他又担任了出版总署署长，工作太忙，所以一年后由邵宗汉继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光明日报》第三任总编辑，亦即储安平的前任常芝青，也是中共党员。不过，他的中共党员身份是公开的。1957 年 3 月 10 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

人士时，忽然问起《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常芝青当即据实回答：「是。」 紧接着，毛泽东说道：「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

毛泽东一言定音。于是,《光明日报》社赶紧物色民主人士担任总编辑。储安平成了最佳人选。储安平有着办《观察》周刊的丰富经验，又是身兼两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就在毛泽东说了那句之后的第二十天，储安平走马上任《光明日报》总编辑。

储安平后来在交代中,曾这么说及自己为什么会在6月1日的座谈会上发言：

「解放以后，一般说来，我很少在外面说话。鸣放开展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应当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来，言辞最为尖锐的一个。

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他的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够「惊人」的。

储安平正儿八经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了：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4

储安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天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5

储安平的发言，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他刚讲毕，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便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Very good!」(很好！很好！)

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也详细加以报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重要新闻由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储安平的发言。

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

吴晗首先批判「右三论」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钦定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此「反右派运动」正式开始。社论发表之后，尽管毛泽东接连以中共中央名义对党内发布「反右派」指示，但是他自己绝不公开出面批判「右派」，连中共中央负责人也很少出面讲话。

毛泽东深谋远虑。

他采取的「反右派」策略，第一步棋先是以「工人说话了」打头阵，造成一种热烈的群众运动的气氛。

第二步棋是发动各民主党派中的左派人士对「右派分子」发起猛攻。

这样，「反右派运动」最初是在民主人士中展开：左派民主人士批判「右派」民主人士。

翻开 1957 年 6 月 8 日之后的《人民日报》，满版满版的是左派民主人士头面人物对于「反右派运动」的拥护发言，以及对于「右派」们的揭发和批判：

在「反右派」之初，并不知道谁是「右派」，也没有划分「右派」的明确的标准——虽说中共各级组织已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内部定下左中右名单，但那毕竟只是内部掌握，并不公布于众。

所以，最初的反击火力，只是集中谴责「匿名信事件」和批判葛佩琦——因为葛佩琦的言论太明显了，谁都以为葛佩琦必定是「右派」。

第一个把反击的火力指向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三大「右帅」的，第一个提出「右三论」概念的，是吴晗。

那时，吴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员。

吴晗似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因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革」中第一个遭到炮击。姚文元抨击他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然而，他在 1957 年却冲锋在「反右派」的第一线。

其实，这并不矛盾：他在 1957 年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此后他写《海瑞罢官》也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看了《海瑞罢官》曾热烈地鼓掌。只是风云变幻，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选择了他曾赞赏过的《海瑞罢官》开刀，称此剧的「要害」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吴晗也就在「文革」

中含冤西去……

当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翌日，吴晗就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国人民大学支部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意见，完全不同意。因为他们的意见是离开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方向的。我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于不正确的意见，应该展开反批评。一切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都是错误的。」6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对吴晗的以上谈话，加了大字标题发表：吴晗表示应该批判章伯钧等人的意见。

也就在这一天，吴晗接见《人民日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谈话。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迅即发表吴晗的谈话，题为：《吴晗谈话批驳章伯钧罗隆基》《人民日报》还为吴晗谈话加了四行黑体副题：

「章伯钧主张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是否不同意宪法?」

「罗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机构，就是不信任党的领导」

「储安平『党天下』的论调是恶毒的诬蔑」

吴晗一下子就抓住了三大「右帅」的要害——三大「右派」理论。他分别「右三论」进行批判。

吴晗首先批驳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宪法序言中讲到我国的统一战线由共产党领导。政协章程也说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也都承认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作用。所谓领导，应该是政治上、思想上重大问题的领导。如果离开这种领导，另搞一个政治设计院，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不同意宪法精神和政协章程，不满意共产党的领导呢?」

接着，吴晗批判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这个意见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他对党领导的『三反』、『五反』、『肃反』等机构是不信任的。一个是他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一个最高权力的立法机关，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这样一个协商机关，下降或者改变为司法行政机关，这和这两个机关的性质是不符合的。」

吴晗非常尖锐地批判了储安平的「党天下」：

「储安平作了一个很引人注意的发言，这个发言的目的是离开党的领导，反

对社会主义方向。他提出了『党天下』的名词。在国民党统治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那时候的『党天下』就是『蒋家天下陈家党』，这怎么能和今天的人民的天下同日而语呢?这是一种恶毒的诬蔑。」7

可以说，在最初的反击中，吴晗的批判是最有「水平」的。

当然，吴晗的谈话可能跟他写《海端罢官》最初是胡乔木授意的一样，极可能是中共方面授意的。只是吴晗从未谈及这一幕后的情形，所以也就不得而知了。

由于吴晗指明了「反右派运动」的斗争方向和斗争目标，即批判「右三论」以及提出者「右三帅」，全国的「反右派运动」就集中批判「右三论」，批判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

重温「右三论」，怀念「右三帅」

「右三论」的提出，其实各有各的背景。

「政治设计院」一词，并非章伯钧的发明，最初倒是毛泽东讲的！章伯钧只不过借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罢了。

大约正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虽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政治设计院」本身。

1957 年 10 月 13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所作的题为《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讲话中，这么说及：

「这个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是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不是章伯钧的那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的。」8

这段话清楚表明，毛泽东并不反对「政治设计院」本身，而是以为政治要由「中共中央这个政治设计院设计出来」，绝不能由别的「政治设计院」来设计。

章伯钧主张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作为「政治设计院」，无非是向中共要求一点点政治民主而已。这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其实都是处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过是「见面握握手、开会拍拍手、选举举举手」的所在。即便是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成为「政治设计院」，中共何忧之有？然而，毛泽东却连这么一点点的民主也不允许，给予痛斥。

罗隆基所建议的「平反委员会」，则是说出了真话，超越了历史。

二十一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中，有一段话专门论述平反问题：

「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当年作为「反革命集团」的胡风一案，得到了彻底平反。

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胡风问题的见解完全正确。

历史证明了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建议完全正确。

可是，在当年，罗隆基善意的建议，却遭到了恶意的批判。关于「平反委员会」本身，也成了一桩需要平反的历史冤案！

看来，罗隆基的「错误」，只是超越了时代！

时至今日，仍需要一个「平反委员会」，为「平反委员会」的提出者罗隆基平反，为千千万万当年蒙冤的「右派分子」们彻底平反。

至于储安平在发言中所说的「小和尚」、「老和尚」，这比喻并不的储安平「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罢了。这诚如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也只是对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而已。

1957 年 4 月 30 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毛泽东说罢，引起一番大笑声。

储安平正是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找到了发言的话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因为毛泽东「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嘛！

储安平并没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类的「幽默语言」，只有毛泽东说得，别人却是万万说不得的！

至于「党天下」一词，则是储安平的老师——罗隆基首创。当年，罗隆基用「党天下」来抨击「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蒋介石、国民党。储安平在 1957 年则用「党天下」抨击同样是「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毛泽东、共产党。

在毛泽东看来，「右三论」之中，最尖锐、最根本、最核心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提到「右三论」时，把储安平的「党天下」放在首位。

透过「右三论」也可以看出三位「右帅」的不同性格和作风：

章伯钧委婉而不露锋芒，所以他的「政治设计院」巧妙地借毛泽东的话加以延伸而提出了政治民主的诉求；

罗隆基则直率而富有正义感，所以他的「平反委员会」不遮不掩讲出了真话；

储安平勇敢而锋芒毕露，所以他的「党天下」直刺毛泽东的心窝。

在「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祭，重温「右三论」，怀念「右三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07 年 9 月 22 日于上海「沉思斋」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92 页。

2 1957 年 5 月 22 日《人民日报》。

3 1957 年 5 月 23 日《人民日报》。

4 1957 年 6 月 2 日《人民日报》。

5 同上。

6 1957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报》。

7 1957 年 6 月 11 日《人民日报》。

8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 493 至 494 页。

「反右派斗争」镇压和扼杀了「五七民主运动」　姚监复

1956-1957 年中国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政治思想斗争，而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残酷地镇压和无情扼杀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五七民主运动」。这场「五七民主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

的民主传统，具有正义性、科学性和历史进步性，符合国情民意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具有非正义性、历史反动性和破坏性。因此，「反右派斗争」只是在这场政治斗争的后期，统治者反击和镇压知识分子的手段，不能代表和反映运动的本质和方向，建议用「五七民主运动」概括表述这场重要的历史事件。

五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反右派斗争」，曾被西方人称为「苦果——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的起义」，我建议这场政治斗争应正名为：「五七民主运动」。

1926年毛泽东开始的「阳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死敌」

在1926年2月1日《中国农民》杂志上，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认定「反动派知识阶级」为「大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乃极端的反革命派，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中产阶级右翼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和学生，一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一定要成为我们的敌人。」因此，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反右派斗争又要引蛇出洞，聚而歼之。是阴谋，但也是阳谋。因为，1926年就将知识分子定为「敌人」的文章公之于世。不过，这也有阴谋，因为，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悄悄地删去了。

在1953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认定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消灭资产阶级。邓小平1957年9月23日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多数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所以，为方便起见，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1这样，为了方便起见，党的总书记、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就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一起批斗，作为敌我矛盾。

从历史上看，二十年代毛泽东认定高级知识分子是反革命，就必然要反右派。三十年代反AB团，反社会民主党，小学毕业就是社民党，也是反右派斗争。四十年代整风、抢救运动，杀王实味是反右派斗争。五十年代，思想改造，批《武训传》、《清宫秘史》，批俞平伯、胡适，从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到整风反右、反右倾，

都是不断的反右派斗争。六十年代「四清」、社教和文革初期刘邓要在高校抓1%的右派，仍然是反右派斗争。七十年代文革中的斗批改、清队、抓「516」仍然是反右派斗争，八十年代的「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反右派斗争，从九十年代到今天仍在批「六·四」民运分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是一场延续了六十年的、二十年代「知识分子是革命死敌」的毛泽东反右派斗争的思维模式。

更早一些1922年12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拒绝同中国国内外的反革命力量结盟。应当利用中国知识分子的动荡情绪，以便从中找到一些最有价值的坚定的革命分子，来组织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2 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指出：「工农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罢工绝对自由。」3 党的任务是「利用」知识分子，言论自由只给工农，这是1922年的方针，反右派源远流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险滩恶流。知识分子的出路何在？知识分子工农化，即游民化、流民化、流氓化。何方说：通过整风，知识分子工农化，我们也变成了流氓。因此，反右派斗争不仅伤害了上百万右派分子，而且使全党全社会在政治上、道德上堕落、沉沦了。

反右派斗争是一场伟大的爱国的「五七民主运动」

1957年的政治斗争，从统治者看是反右派，从争取民主、自由、人权的被统治者看，是一场意义比「五·四」伟大的「五七民主运动」。当年历史的先知提出的精辟见解，深度和广度远超过现在大陆政改的现实与方案。以当年《人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的一部分右派言论为来源，可归纳为：

1.「政治设计院论」：「应该发挥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这些政治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学习美国两党制。」「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政府官吏。对共产党之施政方针，保留随时加以研究讨论、并请求人民代表大会加以更改和否定之自由。」4

2.「平反委员会」论：「肃反运动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肃反是集反宪法之大成。」「成立平反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的偏差，鼓励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除共产党外，也应该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5

3.「党天下论」:「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共产党就是党天下，这是根本制度问题。不仅是以党代政，而且是有党无政。」「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一切特权，实行教授治校。」「法院和公安机关不能归党领导。」「党系统经费由党费开支。」「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6

4.「取消马列主义论」: 「建议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宪法和法律不能加入『主义』、『革命』、『反主义』、『反革命』等字眼。」「列宁那套否定民主、党专独裁、阶级斗争的残暴政策的苏联经验，欠人性、无道德的非民主的主义政治不能用于二十世纪的现在与将来。」7

5.「党是剥削集团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产数据，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党内高级干部中，一个特权层已经形成。他们已完全脱离了党组织与群众的监督，成为新的贵族。」「共产党在中国的实践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独裁政府，集中地表现在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上。」8

6.「军队公有论」:「取消党卫军和御林军，军队归各个党派公有。裁减军备。」「国家军队和警察属于全体人民服从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指挥。军队警察成员在服役期间停止一切党派关系或活动。」9

7.「毛泽东帝王思想论」: 「毛主席，不如华盛顿，与德国俾斯麦、日本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养上热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不宁，察而不周，喜功好大，难以制天。搞俄式清算斗争，天天忙于镇压肃反，已不成为国家政治。」「毛主席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是帝王思想的变相复活。」「斯大林已遭受后辈共产党人的鞭尸，我相信中国鞭尸的历史要重演。」「秦始皇与你相比，只能是一个无名小卒了，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愿神弃神权，重返人间，神弃神皮，重新作人。」10

8.「无产阶级专政有问题论」:「斯大林错误、匈牙利事件证明无产阶级这个政治制度有问题。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如何监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必将越反越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为的盗窃国家政权的一个新名词。」「是奴隶社会和中世纪教会统治的复辟。」「历史会使这种做法遗臭万年的。「美国的民主制度要比无产阶级专政来得好，因为专政就是独裁，用强力的独裁政治来治理国家，不

是长久之计。」11

9.「不民主的社会主义论」：「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不民主的。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在比欧洲中古时代还要黑暗。」12

10.「以『党主』代『民主』论」:「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替。宪法规定人民有选举权，人民代表已由党内定。人民不认识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宪法定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反对以『党主』代『民主』，把民主权给予人民。」「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圣经，一手杖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13

11.「学术思想窒息论」:「学术界由于教条主义的统治，学术思想、自由的思想遭到窒息而死的命运。没有生命，没有生气。 教师变成了留声机，科研机构变成了衙门，学者变成了鹦鹉。」「国民党统治下，『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14

12.「党文化无效论」:「为党宣传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讨厌，有何收效？」「如果党一定要这样领导古典戏曲，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中国戏剧反映忠奸功罪，离不开帝王将相，也有呼帝王万岁，表征实情实事。要以为这是封建余毒，那么主席、总理、部长、总司令、元帅，以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皆是封建余毒。党的领导干部，根本不明艺术，一律以马列教条、社会主义的结合，吓唬他人，似乎拉屎撒尿都要结合社会主义，才拉撒得正确。」15

13.「盲目学习苏联论」:「我们的财经政策，不少盲目搬用苏联成例，盲目行事，并未遵循什么客观经济规律。」「教的不是我们从前的科学，只是斯大林的语录，替大人物做注解说明，作为一门科学似乎不像。」「中国共产党以苏联为领导，学习苏联经验，弄到党内外缺乏民主、自由，动辄镇压、肃反，实在太危险。」「共产党昏迷沉醉，死投于苏联怀抱，必有亡国灭种之一日。」「苏联一定要变，中国也不能让许多小斯大林统治下去。」16

14.「新闻没有自由论」:「新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报纸上全是枯燥和教条的东西。」「新闻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剥夺了。中宣部应该开放绿灯。」「报纸成了布告牌、留声机和翻版书。」「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和谐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17

15.「反对专制论」:「我们反对共产党人专制集权，我们要求祖国文化独立自主，反对他民族文化的奴役。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平等，要有人身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宪法明文规定死了由某党领导，万一将来这个党蜕化变质怎么办？由谁领导应该由人民按选举结果决定。」「从毛泽东反胡风，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伪马克思主义者。党中央、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个人崇拜吗？」「任何时代，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当人民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斯大林破坏法制，进行独裁，疯狂的屠杀，原因在于共产党对国家极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才使斯大林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来说，共产党和法西斯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通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18

从 1957 年政治斗争中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言论，摘出这些不完整的内容，站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反对民主和争取民主的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从统治者角度看，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斯大林主义、反毛泽东的右派反动言论，因此「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五十年后，也只承认「扩大化」，大部分右派可摘帽、改正。

从被统治者角度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继「五・四」、「一二・九」运动之后的深度、广度、力度创历史水平的、伟大的「五七爱国民主运动」，应当从性质上为这场政治斗争平反。

从国外学者角度看，认为是：苦果——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

从 100 万反右运动受害者看,1957 年内心里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被定为敌我矛盾是冤案，应平反，赔偿。有一些受害者经过五十年反思，自己认为现在才从思想上成为真正的右派分子，不需要共产党平反。

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力、经济力和社会力

中国政治在「国」与「家」之间缺少中间组织。在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中，根据 1957 年和 1989 年两场民主运动的教训，建议在重视政治力、经济力、文化力的同时，注重社会力的加强。台湾萧新煌教授在介绍台湾民主化进程的新兴社会运动作用时，强调了社会力，这个总结值得注意。他介绍的台湾 17 种新兴社会运动是：

1．消费者运动；2．反污染自力救济者抗议运动；3．生态保育运动；4．妇女运动；5．原住民人权运动；6．学生运动；7．新的教会抗议运动；8．劳工运动；9．农民运动；10．教师人权运动；11．残障及福利弱势团体的抗议运动；12．老兵福利自救运动；13．政治受害者人权运动；14．外省人返乡运动；15．台湾人返乡运动；16．反核运动；17．客家权益运动。19

这十七种社会运动的特点是：以国家（执政党）为抗争主要对象，改变民间社会在国家控制中的地位；有强烈的政治与经济「受害意识」；多有组织化趋势；八十年代后几年很快进入集结阶段。

中国的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作艰苦的努力，包括政治力、经济力和社会力的加强，发挥民间社会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合法政治环境开辟的新的政治空间的作用。

结束语

枣树根系生出幼芽的生物力，可以冲破压实的路面，沙漠中的胡杨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朽了，地下根系仍然维系着沙堆，保护生态环境。希望以枣树、胡杨精神，继承 1957 年的民主运动的精神，为中国的人权、民主、自由、法制而不懈斗争，为十分贫困、十分勇敢又十分善良；十分可爱又十分可怜的中国农民、公民多做实事好事！祝在座和不在座的朋友们健康、幸福、平安、事业成功！　（2007 年 6 月 23 日）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1957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

2　郭恒钰、基科连科编《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一卷》（台北东大公司，1997）第91页。

3　同上，第128页。

4　转引自丁抒《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2006年修订本）》（香港，开放杂志社，2007）第171、249、186页；原载1967年5月22日、7月23日《人民日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第217期。

5　同注4，第120、121页，原载《右派论点选辑》（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1957年第97页）1957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6　同注4，第171、173、185、179、184页，原载1957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57年6月25日《光明日报》；《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32页，《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294页，1957年6月12日《人民日报》。

7　同注4，第186页，原载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217期，《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第68页。

8　同注4，第177、270、175页，原载1957年8月2日《人民日报》，《刘宾雁自传》（台北：时报公司，1989）第99页，新华社《内部参考》1957年2267期。

9　同注4，第185、186页，原载《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32页，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第217期。

10 同注4，第188、160、169、163、164页，原载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清华大学校刊《新清华》217期，《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10、11、36、82页，《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28-30页，《首都高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1957）第298页，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0年第7期。

11 同注4，第173、174、160、203页，原载1957年6月8日、7月3日《人民日报》，《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303页，《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33-35页。

12 同注4，原载《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12-14页。云

南大学段教授与丁抒谈张若名遗言。

13 同注 4，第 160－161 页 67，原载《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37-38 页，1957 年 6 月 10 日《沈阳日报》。

14 同注 4，第 154 页，204-205 页，原载《批判右派分子沈志远吴承禧在经济科学方面的反动言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第 13 页，《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北京：光明出版社，1957）第 58 页。

15 同注 4，第 150、149、150 页；原载《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第 46 页；《戏剧报》（编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 年第 11 期第 5-7 页；《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第 47-48 页。

16 同注 4，第 208、208、139、139、136 页；原载：1957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右派言论选辑》（北京大学，1957）第 139、140 页；《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第 11-12 页第 104 页，1957 年 6 月 20 日《人民日报》

17 同注 4，第 146、146、147 页 160 页：原载：1957 年 8 月 25 日《人民日报》；《新闻界反右派斗争资料汇编》（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数据室，1757）第 74 页，124、93 页；《中国往何处去》（香港：成文出版社，1979）第 37-38 页。

18 同注 4，第 165、166、166、167、130、173 页。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大事记（1951-1987）》第 90 页；李梧龄《气血年华》（香港：博思出版公司，2002）第 39 页，《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第 107 页，新华社《内部参考》第 2223 期第 10 页，《右派言论选辑》（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教育委员会编，1957）第 22 页，1957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

19 萧新煌《台湾新兴社会运动与民间社会的兴起》（台北《中华民国，民主化》张京育主编，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社，1992 年，第 89-119 页。

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　　丁抒

全国总共抓了多少右派，连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不甚清楚。毛泽东直到 1959 年 8 月还认为是三十多万。当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纠正他说「现有四十五万」

时，他似乎有些得意：

「好多？四十五万？哈哈，队伍不少。」[1]

从此以后，中共便采用「四十五万」[2]这个数字，一直没有费神去统计全国的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

直到 1978 年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右派改正」工作，才发现被改正的右派总数超过了五十万。有人说：「这怎么办？太多了。」胡耀邦答道：「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怎么不嫌多？」最后，被「改正」者共计「五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七人」。[3]

此后，官方出版物都将此数当成右派总数，似乎反右运动仅抓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其实右派数比这要多。这里有必要论证一下。

百分之五的指标是所谓「控制数」，实际上毛泽东根本没打算用它框住自己。六月十日，毛泽东发出《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比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4]在七月青岛会议上他甚至说：「民主党派打它百分之二十（右派），也还有百分之八十（不是）。」[5]

于是「民主党派」立即加紧清理自己的门户。譬如天津市的民盟成员 15%是右派，计有 117 名。[6]陕西省民盟成员 10%被划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计 223 位。其省委委员、候补委员 20%被扣上了帽子。[7]

指针既然可以放宽，各级党组织纷纷超额完成任务。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江隆基将全校总人数的 6.5%打成了右派，北京市委还是认为他右倾，「反右不力」，于九月间将他调走，派铁道部副部长陆平去主事。陆平一去，就在学校大饭厅作报告，说他手头有一张尚未划右派的学生的名单，这些人是否划右派，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可是才过了三天，学生们还没来得及表现，近二百人左右的补充名单就公布了。最后确定右派约八百名，近全校人数的 10%，其中一百四十多名「极右派」被开除，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蒋南翔后来说：「清华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 18%（可能记得不确切）。」[8]该校师生共有右派 571（教职员 222 人，学生 349 人），也超过了 5%。[9]

北京地质学院五千多学生 9%是右派；一千余名教师，右派占了 12%。[10]中

国人民大学六千多学生，仅第一批右派就有四百多名。全部右派也在 10%左右。

吉林省各高等院校，反右刚开始还不到一个月时，讲师以上的教员就已有 7%至 15%被定为右派。[11]年底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报告说：「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 8.5%。」[12]太少了，所以 1958 年又补充了一批。

各大学的右派人数均在数百名上下。

譬如武汉大学右派有 430 名。530 位教师，14%是右派；三千三百多学生，右派几达 10%。中文系一共不到二百学生，右派有 56 名。其中四年级学生 37 人，35 个是「右派」或「中右」。[13]

上海交通大学三百多名，华东师范大学 285 五名。其中中文系一年级揪了二十余人，超过百分之十。[14]福建师范大学共三千多师生，右派抓了四百多个。中文系四年级一班共 36 人，右派有 31 个。[15]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韦君宜回忆：

「（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踩线』的还不算。但是，这也不足为奇，当时全国哪个单位不是如此？」[16]

后人也许会奇怪，哪里会有那么多学生出来攻击共产党？果真有那么多学生参加了「右派大合唱」？这里有个例子：清华大学一个学生拥护党，积极写大字报批判右派学生。不幸他的大字报里有「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你的看法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话，足证他与被批判的右派学生观点相同。结果他也成右派，与被他批判者殊途同归。

清华学生张德寰曾接济过几位经济困难的同学，给了几件旧衣服及几十斤粮票。那些同学成了右派，连带着把他划为右派，判处三年徒刑。[17]

鸣放时，北大学生时荣章曾打电话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泽东汇报北大的运动。获准后，以他为首的十个同学，外加班主任黄继忠老师，于 5 月 27(或 28)日到中南海，对称为毛主席「办公室主任」的人鸣放了一通。十天后反右，这十一名荣幸到中南海去鸣放的小人物一个也没逃脱。黄继忠和时荣章一对师生成了河北清河劳改农场的难友。时荣章班上 24 名学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18]

5 月下旬，兰州大学学生选出有十二名成员的赴京请愿代表团，到北京去请愿。火车到达西安被阻。在从北京赶去的高教部副部长刘皑风劝说下，全体返回兰州。这十二名成员除了一名因「揭发」他人而「将功赎罪」未定为右派外，全

戴上了帽子。不仅学生代表入网，连受校党委委托陪同代表团赴京的副校长陈时伟教授也被「揪出来」，被送到了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19]

所谓「工商界人士」即交出产业后成为「公私合营」工厂或商店的「私方代表」的原资本家，被打成右派的很多。人民日报曾宣布：「全国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声势浩大，大大小小的章乃器揪了出来。」[20]如广州市工商界，1956 年时有一万零四百多资本家，右派一千二百多名成为右派，超过 5%。[21]

结果就全国而论，右派总数超过了 5%的指标。当时全国被称作「国家干部」的人数是 953 万，「五十五万多」占其 5.8%。

各地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差异很大。上海郊区川沙县，仅 26 万人，右派有 439 名。同样是 26 万人的陕西西乡县，右派仅 58 名。又如同样是 15 万人口，上海郊区宝山县右派为 236 人，贵州贵定县仅 75 名。[22]川沙、宝山文化相对发达，文化人相对较多是原因之一。

湖南、河南、安徽、河北、湖北、四川、山东等省右派的比例较高，其中一些县份右派比例特别高。这就不是由于文化人相对较多之故了。那些地方紧跟毛泽东，也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最积极，饿死人比例也最高的省份。

譬如湖南省，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周惠参加七月青岛会议时，发觉毛泽东对湖南揪出的右派太少表示不满，只好回湖南加紧抓右派。结果湖南省的右派按人口比例计算的话，在全国名列前茅。

胡耀邦老家浏阳县，561 个右派；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县，683 名。[23]毛泽东的外婆家湘乡县，673 名。中共副主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县，1,027 名右派。全省第一。[24]

河南省，23 万人的延津县，532 名右派，「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17.7%。」[25]27 万人的西峡县，645 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16%。[26]35 万人的伊川县，433 名。[27]49 万人的息县，533 名。[28]49 万人的西平县∶517 名，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12%。[29]汝南县有右派 544 名。[30]商城县 464 名右派。[31]80 万人口的南阳县，右派数达 1,164 名。[32]在全国两千多县首屈一指。

按人口计算，安徽省右派的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灵璧县有 674 名右派。80 万人的霍邱县，737 名。[33]76 万人的濉溪县，903 名。[34]28 万人的全椒县，445 名；休宁县 17 万人，339 名。[35]祁门县 10 万人，241 名。[36]

河北武清县，右派抓了 632 个。[37]

湖北，49 万人的江陵县，429 名右派。[38]70 万人的襄阳县 852 名；77 万人的随县 741 名。[39]

四川省新津县 131 人划为右派，为参加运动的人数的 7%。仁寿县，「错划右派分子 462 人，占参加运动人数的 7.3%。」［40］

山东庆云县 19 万人，右派划了 114 名。人口 52 万的昌邑县，右派有 389 名。[41]

在同一个省内，右派人数相差很大。如江苏省东台县，人口 78 万，右派 100 人。而人口仅 45 万的江宁县，右派却有 638 个。[42]

共产党组织严密，无远弗届，不存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黑龙江省嘉荫县隔黑龙江与苏联相望，全县仅六千余人，没有一辆汽车，知识分子屈指可数，右派却仍有 15 名。按人口比例计，比安徽还高。

官方各出版物都将「五十五万多」当成右派的总数。其实这「五十五万多」仅是右派中被「改正」了的人数。还有「不到一万名」不予平反的右派[43]不在此列。而且那「五十五万多」右派都是上了「国家干部」花名册的人，「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不拿国家工资的右派。」[44]

当时大专院校近五百所，学生右派应在五万甚至十万以上。其中究竟有多少不在那「五十五万」之内已难考证。但可以肯定「五十五万」右派之说不确。

十几万落网的小学教师中一多半是乡村教师。其中有些是所谓「民办教师」，即从农村生产合作社领取工资、不属「国家干部」的教师。「五十五万」里没有他们。

因种种原因不宜公开的「内控右派」也不在「五十五万」的统计数内。除前述北京大学马寅初、冯友兰外，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葛庭燧、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等。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董希文画了大型油画「开国大典」后，毛泽东曾把他请去中南海做客，不好将他定为右派，所以也是「内控右派」。

大学生若是「内控右派」，还可分配工作。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班学生靳景儒到了太原重型机械厂。厂里一看他档案里写着「内控右派」，便叫他住工棚，后来

又说他是「坏分子」。他跑回塘沽家中，从此无正经职业。他的同班学生杨白桦也是「内控右派」，分配到沈阳拖拉机厂。他知道自己是另册中人，干脆回广西农村老家种田去了。

「五十五万」也不包括当作右派处理，但未列入右派花名册的人。

「新凤霞是在 1957 年被剧院戴上右派帽子……到七十年代据查她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戴帽的材料，完全是少数几个剧院领导的蓄意迫害……」[45]

由此可知，新凤霞的名字并不在右派花名册里，「五十五万」里也就不包括她。

到处都有名字不在右派花名册里，却按右派处置的人。

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曾受总工程师特别器重。总工程师成右派后，不仅拒绝揭发总工程师，反而给他通了信。这一来，他也成了右派。二十多年间，不能升级、涨工资，也不能结婚。到了五十岁出头，当局才发现，他的档案里根本没有他是右派的记录。

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报》文艺组的编辑记者全成了右派，包括组长张锲。但是，拉粪车、扛麻包，改造了十五年之后回到蚌埠，军管会依例查看张锲的档案，却发现并无上级核准他为右派的批件。因此张锲不算右派，十五年右派是白白当了。[46]

有一位青年军官，年方二十余岁，从部队转业到一所小学担任党支部书记，适逢鸣放结束，反右开始。上级派下五个右派的「指标」。他只抓出四名，再也找不出第五个。为了完成党的任务，祇好把自己的名字添上。上级照例批准，于是他被开除党籍、送劳改农场。妻子离婚，儿子亦随之改姓。在农场改造了二十年之后，右派们均获「改正」回了城，惟独他无人过问。原来上级右派籍册里没他的名字，「五十五万」里不包括他，故不在平反之列。[47]

1979 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右派都被平反，教师李树槐却无人过问。他申诉后被告知：当初上级并未批准定他为右派。「你不是右派，我怎么给你改正？」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此不了了之!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班学生阎桂勋被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分配到黑龙江一所学校教书。不久北大来通知说阎是右派，于是改以打扫厕所、下矿山、到北大荒农场。直到 1999 年北京大学才承认，阎的右派案「没有经过党委审批」，无效……[48]

右派改正时，当年曾在北大荒农场853分场「右派队」接受「劳动教养」的原《大众电影》杂志主编方诗见改正没他的份，找领导问话。领导说：「没有你的档案，你不是右派。」

显然，张锲、李树槐、阎桂勋、方诗都不在「五十五万」里。

不属国家干部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内控右派」，再加上「未经正式批准」的右派，全国至少有五万。这样，当初被按右派处理的总数就是六十万而不是「五十五万多」了。

不在「五十五万多」之内的还有「中右分子」。

「中右」也是正式的右派帽子。自然，这也出自伟大领袖的指示。毛泽东说：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49]

于是在右派之外，又抓了几十万「中右分子」。

譬如1958年4月，城市的反右运动进入尾声时，河北徐水县二千余名中小学教师被集中到孤庄营村鸣放、辩论。除150人定为右派外，还有46人定为「中右分子」。[50]

什么人算「中右」？没有标准。譬如四川西充县规定，凡「有右派情绪的」就是「中右分子」。［51］

说起来「中右」不同于右派，但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实际上按敌我矛盾处理。」[52]如河北遂平县，「划右派分子562人……划不上右派而定为『中右』的501人……凡是右派和中右者，大多被开除公职，遣送回家，由生产队监督劳动改造。」[53]

被打成「中右分子」者，所受处置各不相同。除少数受的处分稍轻，如云南女作家季康（赵继康，《五朵金花》、《摩雅傣》等电影的剧作者）被宽大、仅下放农村劳动外，大多数受到与右派一样的处置。如中共浙江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销职务，工资降三级。齐齐哈尔解放军第十一军医学校一位教员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转业到边远的小县城北安。1949年渡江战役时登上第一船，获特等功勋章的新华社记者、军队作家寒风，留党察看两年，下放云南。《文艺报》副主编陈企霞的妻子郑重被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划为中右，内控使用」，送福建古田县的一个水电站工地。

河南信阳步兵学校把少尉助理员徐先国等「中右分子」送到北大荒农场。哈尔滨空军第一航校的「中右」和右派一起，都送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不加区别。

北京大学的「中右」和被定为「右倾」而处理的人数为八百左右。右派应届毕业生不能毕业，「中右」们也领不到毕业证书，只能算是「肄业」。已经印制好的毕业证书捆成一堆，成了废物。[54]

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 32 人，9 个右派之外，又揪出 7 个人，分别定为「中右分子」和给予党内处分。[55]加起来恰好是半数。

由于主持湖南反右运动的省委书记周惠说「新湖南报就是个『小匈牙利』，抓右派不受比例限制，有多少抓多少」，一百四十多人的报社，除 54 个右派外，还有二十多「中右分子」。合计超过半数。[56]

一般说来，「中右」比右派少。譬如河北唐县，151 名右派，37 名「中右」[57]，江苏溧阳县 171 名右派，33 名「中右」；安徽庐江县，515 名右派，98 名「中右」。[58]

不少地方的「中右」虽少于右派，绝对数目并不小。如甘肃武威县二百多右派，157 名「中右」。[59]广西大新县，124 名右派，100 名「中右」；宁明县右派 145 个，「中右」有 100 名。环江县「中右」为右派数的三分之二。[60]安徽濉溪县有「中右分子」419 名。江苏省宜兴县，右派 208 名，「中右」169 名。[61]

有些地方，「中右」数与右派不相上下。如吉林省伊通县，100 名右派，97 名「中右」。[62]黑龙江省拜泉县，137 名右派，「中右」130 个。[63]

也有一些地方，特别在某些省，「中右」比右派多。如黑龙江省肇东县「共划右派 193 人，中右份子 336 人。」爱辉县 20 名右派，73 名「中右」，为右派的三倍半。[64]

内蒙古巴林左旗，25 名右派，35 名「中右分子」。[65]

云南省镇雄县，右派 52 名，「中右」140 人；腾冲县，右派 101 人，「中右」156 人。[66]

中国第一大省四川，「中右分子」有六万余人，比右派还多。[67]

据本文作者抽样统计，全国「中右」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总数的三分之二，近四十万人。

此外还有「右言分子」（「有右派言论者」之简称），或干脆就叫「右派言论」。

如「广西上林县有 127 人被划为「右言分子」。江西武宁县，「右言分子」比右派还多 40%。[68]

还有「疑似右派」。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说：

「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69]

中共中央下达文件的本意是说，对疑似者暂先不按右派处置，但结果适得其反。既有「疑似分子」一说，各地便索性将之另划一类，叫「疑似右派」。如安徽泗县将 117 人划成了「疑似右派」。[70]既属「分子」，又「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之间」，所受处分自然也应界乎二者之间。总之，也是贱民，与右派处境无异。

此外还有各地创造的「分子」。譬如四川郫县唐昌镇揪出了 31 个「烂言分子」。[71]黑龙江省拜泉县，25 人被定为「党的落后分子」。[72]这都是不包括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的。

「右言分子」、「疑似右派」、「烂言分子」，全国的总数应在十万以上。这些也都不在那「五十五万多」之内。

所以，右派六十万、中右分子四十万、加上右言分子和「疑似右派」等，右派总数共约一百十万。

实际总数还不止于此。当年还有成千上万的「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它帽子」的人！

譬如云南省腾冲县，「因右派问题划为地富反坏分子 33 人。」陕西西乡县，3 人「因『右派言行』定为反革命、坏分子而被开除公职。」[73]

安徽和县一千五百多中小学教师集中鸣放、反右，成果巨大。右派 338 名，已占教师的 20%，可是还有 481 个不能放过，又定为「反革命分子」。一场反右，半数以上教师成了运动的祭品！[74]

广西上林县 1,070 名教师中，除右派外，还抓了 158 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云南通海县一千三百多教师集中鸣放、反右后，除了右派，还揪了 164 名「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和「坏分子」。[75]

浙江《东海》杂志编辑部总共才 13 个人，除了 7 个右派和 1 名「中右」，还有一个「坏分子」。[76]

「坏分子」定义含糊，形形色色。有的大学生，有「右派言论」，刚好借图书馆的书丢失，逾期未还，当局便宣布他是偷书的「坏份子」，抓走了。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舒展（笔名）无论怎么挨斗，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最后学校将他以「坏分子」的名义送到劳改农场，从此再也没人知道其下落。[77]

全国因「右派言论」而被扣上「反革命」、「坏份子」帽子者，应当不下数万。

还有许多「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的人。既无帽子，也就不在当局统计数之内。譬如河南西平县，355 人「因『右派言行』被错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未戴帽而受到各种处分。」[78]

《文艺报》专职评论员竹可羽，未定为右派，但被流放到怀安县农村改造，蛰居了三十多年。浙江嘉兴县的中学教师姚辛有右派言论，但念他是转业军人，不定右派，仅开除教职发送农村。安徽有一位乡村小学教师，因「右派言论」被批斗、开除后，送回原籍青阳县农村「监督劳动」。[79]

当时北京郊区土城收容所是右派等候发配劳改农场时的集中地。清华大学一位学生，「因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子的身份进了土城。」[80]

北京幼儿师范学校女学生胡慧芝的父亲因「历史反革命」罪入狱。她给父亲写的信和日记中同情父亲的话被一位学生干部偷看，报告上去，就够定为右派了。但她才十七岁，不够戴帽子的年龄，便给了她一个「反右期间有错误言论，不宜当教师」的结论，发配到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算是「支援边疆」。二十年后，她父亲平反回北京了，但她却回不了。她无反可平，因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观察》编辑部去请求记者为她申诉时，痛苦地说：「我真希望自己是个右派！」[81]

江苏省高淳县，「因鸣放（言论）受到各种处理」的有 62 人。江宁县有 244 人「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它帽子」。[82]

广西，上林县有 57 人「因右派言论受到各种处分」。[83]

河南，商城县有 406 人「因右问题受处理」。[84]

云南省腾冲县，「因右派问题划为地富反坏分子 33 人。」[85]

安徽省除右派外，还划定了「四种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分子」，「疑似右派分子」以及「因右派言论受处分」的分子。霍邱县的「四种人」

有 483 名。灵壁县，「有 977 人被错定为四种人。」[86]

安徽亳县，一百多人「因『右派思想』及其问题而失去工作」，八人「因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失去工作」。[87]

全国因「右派言论」、「右派思想」、「右派问题」受到各种处置的人，总数至少十万。

一百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1957 至 58 年间，一百八十万人被派发了一顶帽子，「未戴帽而受处分」者还不在内。

不论帽子有无，个个都是贱民。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1959.8.11 毛泽东的讲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第 296 页。

2　1959.8.24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 475 页。

3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第 13、17 页。

4　文聿《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第 199 页。

5　1957.7.17 下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的插话。

6　《天津民盟四十年》（天津︰民盟天津市委员会，1991）第 8 页。

7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历史沿革（1942 年——2002 年）》。

8　一九六六年九月蒋南翔《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

9　《清华大学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第 723 页。

10 该校右派学生吴弘达与本书作者在美国的谈话。吴平反后访问母校，得到此数字。

11 从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60 页。

12 1957.12.25 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的报告。

13 吴贻谷主编《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八章，《在曲折中前进(1957—1965)》。

14 1957.8.17 人民日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大事记（1951-1987）》第 101 页；2000.7.29 世界日报（纽约），龚济民《愧对同窗悔恨终生》。

15 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右派学生林学政《阳谋》，《从大陆看大陆》第 122 页。

16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八年第二期第 27 页。

17 据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僖说：「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新观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郭本余《一位工程师的命运》。

18 一九九一年黄继忠与本书作者在美国的谈话。

19 一九九一年兰州大学学生何之明与本书作者在美国的谈话。

20 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

21 伊凡《广州工商界万人争鸣记》，《鸣放回忆》（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第 33、38 页。

22 《宝山县志》（1992 年版）第 38、135 页；《贵定县志》（1995 年版）第 36、959 页。

23 《浏阳县志》（1994 年版）第 39、106 页；《湘潭县志》（1995 年版）第 136 页。

24 《湘乡县志》（1993 年版）第 38、107 页；《宁乡县志》（1995 年版）第 127 页。

25 《延津县志》（1991 年版）第 129 页。

26 《西峡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 384、116 页。

27 《伊川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第 36 页。

28 《息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 36、75 页。

29 《西平县志》（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第 305 页。

30 《汝南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第 44 页。

31 《商城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35 页。

32 《南阳县志》（1990 年版）第 39 页。

33 《灵璧县志》（1991 年版）第 12 页；《霍邱县志》（一九九二年版）第 496 页。

34 《濉溪县志》（1989 年版）第 482 页。

35 《全椒县志》（一九八八年版）第 21 页；《休宁县志》（一九九〇年版）。

36 《祁门县志》（一九九〇年版）第 33、86 页。

37 《武清县志》（1991 年版）第 727 页。

38 《江陵县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第 27、106 页。

39 《襄阳县志》（1989 年版）第 22 页；《随县志》。

40 《新津县志》（1989 年版）第 31 页；《仁寿县志》（1990 年版）第 366 页。

41 《庆云县志》（1983 年版）第 408、434 页；《昌邑县志》（1987 年版）第 22、92 页。

42 《东台市志》（1994 年版）第 36、149 页；《江宁县志》（1989 年版）第 33 页。

43 金春明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第 27 页。

44 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第 17 页。

45 吴祖光《「二流堂」奇冤大案》，1991 年 3 月 19 日，北京。

46 《新华文摘》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 134 页。

47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团结报》。

48 《炎黄春秋》（北京）二〇〇〇年第九期第 48 页。

49 1958.1.3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的第一次讲话，《学习数据（1957～1961）》（清华大学，1967）第 121 页。

50 《徐水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第 491 页。

51 《西充县志》（重庆出版社，1993）第 149 页。

52 廖盖隆《党史探索》（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238 页。

53《遂平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 136 页。

54 高望之《北京大学与民主运动》，一九八八年五月哥伦比亚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史」会议论文。

55 《炎黄春秋》（北京）一九九八年第五期第 16、20 页。

56 刘皓宇《悼李长恭》、《恶梦》，刘皓宇、罗印文编《1957：新湖南报人》。

57 《唐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第 32、348 页。

58 《庐江县志》（1993 年版）第 22、130 页；《溧阳县志》（1992 年版）第 34、159 页。

59 《武威市志》（1998 年版）第 121 页。

60 《宁明县志》（1988 年版）第 129 页；《炎黄春秋》一九九八年第四期第 26 页。

61 《濉溪县志》（1989 年版）第 482 页；《宜兴县志》（1990 年版）。

62 《伊通县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第 172、173 页。

63 《拜泉县志》（1988 年版）第 334，538 页。

64 《肇东县志》（1995 年版）第 23 页；《爱辉县志》（1989 年版）。

65 《巴林右旗志》（一九九〇年版）

66 《镇雄县志》（1987 年版）第 326 页；《腾冲县志》（1995 年版）第 36 页。

67 《当代中国的四川（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599 页：「改正和安置错划右派五万余人，『中右分子』六万余人。」第 705 页：划右派 44,621 人。

68 《上林县志》（1989 年版）第 384 页；《武宁县志》（1990 年版）。

69 《中共党史参考数据（八）》（北京：人民出版社）第 669 页。

70 《泗县志》（1990 年版）。

71 《唐昌镇镇志》（1983 年版）第 29、32 页。

72 《拜泉县志》（1988 年版）第 334，538 页。

73 《腾冲县志》（1995 年版）第 36 页；《西乡县志》（1991 年版）第 221 页。

74 《巢湖地区简志》（1996 年版）第 13 页。

75 《上林县志》（1989 年版）第 383 页；《通海县志》（1992 年版）版第 19 页。

76 1997 年 3 月，郑秉谦《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77 《鸣放回忆》（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第 120 页。

78 《西平县志》（1990 年版）第 309 页。

79 朱效池《法官轶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第 148 页。

80 从维熙《走向混沌：反右回忆录，劳改队纪事》（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第 152 页。

81 华培明《一桩二十六年沉冤提出的问题》，原载于《新观察》。

82 《高淳县志》（1988 年版）第 35 页；《江宁县志》（1989 年版）第 45 页。

83 《上林县志》（1989 年版）第 384 页。

84 《商城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第 35 页。

85 《腾冲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 36 页。

86 《霍邱县志》（1992 年版）第 496 页;《灵壁县志》（1991 年版）第 12 页。

87 《亳州市志》（合肥：黄山书社，1994）第 318 页。

自由主义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退潮

——一九五七年和我　　　方励之

北戴河的自由元素和权力之鞭

1956 年 8 月底，我从北大毕业，随即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它属于中国核武发展项目。

报到之前，有一个多星期的假期。一想到学生生活就此结束，这已是最后一个暑假，因此，决定去玩一番。于是，我和同学李清润相约一起去山海关，秦皇岛和北戴河。向虞富春教授借了 15 块钱，就上路了。李淑娴那时已开始工作，而且在我们之前她已去过北戴河，故未参加我们的旅游。

15 块钱的预算，不容我们有从容的吃、住、行。在四天的旅程中，一夜在秦皇岛的一个小学教室里借住，一夜在北戴河的海滨浴场的更衣室里偷住，一夜在火车上。累极了，但兴奋至极。因为，二十岁的我，还是第一次登上天下第一关，站在长城的起点。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秦皇岛外，远远的渔帆点点，正在暗蓝发紫的海的波涛上起伏前行。这时候，真想作诗，如果能够比普希金的〈致大海〉作得更好的话。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这是你最后一次在我的眼前
滚动着蔚蓝色的波涛，
和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普希金写〈致大海〉时，也才二十五岁。为什么就是「最后一次」？至少，

不完全适合我当时的心境。不管它。

按历史记载，差不多同时，毛泽东也来过北戴河。可能他也被大海感动了，也想作诗，结果他填了一阙词。其中有一句「秦皇岛外打渔船」，证明他也看到了渔船，说不定他同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批船，因为，那时的渔船真的不多。不同于我们的是，渔船和大海没有使他想到自由的元素。他想起的是因霸业成功而踌躇满志的曹操。他的词中有一句「魏武挥鞭」，可见，他得意的是有了一条曹操那样的王权之鞭。

不到一年，权力之鞭果真抽向了自由的元素。这致命的一击，使那一次面对大海真成了我的最后一次。直到22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再一次面对海洋。

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不少物理系的学生喜欢诗和音乐。普希金、席勒、海涅，裴多菲…像拉普拉斯、马克士威、波尔兹曼…一样被熟知。每天晚饭后，北大广播台播放半小时的音乐，其曲目皆由物理系、数学系同学选择和提供。当时，我们常常被告诫，海涅的「夜莺」、圣桑的「天鹅之死」、贝多芬和席勒的「欢乐颂」等等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非共产主义的。不过，并不真懂，自由主义同共产主义到底有多少冲突？海涅不还是马克思的朋友吗？海涅的一些抒情诗，不还是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吗？

第一次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感到不适，来自列宁。

周末沙龙：量子力学---- 海森堡，列宁

1957年春夏，我每星期六去北大。因为当时李淑娴在物理系工作。她担任苏联专家的翻译。1956年秋后，根据中苏合作协议，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北大，授课及研究。每个专家都配有一两个翻译协助工作，口译和笔译。这些专家的水平，大约相当于北大的讲师或副教授。但是他们的待遇则大大超过中国的正教授。仅就他们占据的办公室而言，也比中国教授的办公室大为排场。

每星期六晚上，李淑娴的专家的办公室，就由我们占据。那时候，我们似乎都有用不完的精力。虽然相爱至深，但不想结婚，我们的原则是立业之后才有权成家。甚至，星期六晚上的卿卿我我，也觉得是浪费光阴。于是，我们常约倪皖荪（同班同学）或其它朋友一起活动。倪是另一个苏联专家的翻译。因此，每星

期六我来北大时，常是几个人一起讨论问题，谈谈一周以来的读书或研究的心得。我们的一个的「雄心」是，以这个周末沙龙为凝结核，慢慢地吸收更多的人来参加，说不定会发展成一个学术集团。这样，从 1957 年春天开始，几乎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在北大放言高论一番。论题主要是物理的，哲学的，也有政治的。

大部分的议论早已淡忘了，但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有一次我们讨论海森堡(W. Heisenberg)的一篇科学哲学文章，当他论及有关量子力学解释的争论时，曾说，「苏联布洛欣采夫(Bloshinzev)对量子力学的‘新’解释只不过是为了适应列宁对马赫的政治批判而已」(大意)。对列宁如此出言不逊，使我们为之一震！在当时的中国，列宁属先知至圣，绝对找不到任何的中文出版物，会使用海森堡那样的语言对列宁说三道四。

然而，物理学的论证又使我们不能不去认真思考海森堡的的论断。我们在大学所用的一本教科书，正是布洛欣采夫写的《量子力学教程》。布洛欣采夫一书的第一版是采用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即波尔和海森堡的解释。四十年代末，苏联发动了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是批判对象之一。布洛欣采夫在第二版书中转而批判哥本哈根解释。他自己也声称，他提出「量子力学新解释」就是要批判并取代那些「资产阶级的量子力学学派」。虽然，布洛欣采夫的「新解释」还不算李森科式的伪科学。但是，显然地，「新解释」是动机于政治而不是物理。尽管如此，布洛欣采夫并没有用非物理的语言来讨论物理。还是可以接受的。列宁的文字则不同了。请看：

既然……不是明确地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也就不是偶然地而是必然地一直滚到「终极原理」和「第一推动」中去，因为，他们使自己失去了防止超出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客观标准。如果，时间和空间只是概念，那么，创造它们的人类就有权利超出它们的界限。资产阶级教授们就有权利由于保卫这种超越的合法性，由于直接或间接地拥护中世纪的「荒诞事情」而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据说列宁是以「逻辑严密」著称。但是，什么逻辑能把「从反动政府领取薪金」作为否定「超出时空界限」的一个物理理由呢？显然不符合物理学的常识。海森堡的评论并没有完全动摇列宁在我信仰中的地位。但是，第一次迫使我看到，在科学与非科学二者之间，我无疑应当选择前者，不论那些非逻辑的著作曾有过

怎样的神圣光环。

所以，即使没有任何其它的影响，我们的周末沙龙的后果多半是使参加者从追随科学开始，渐渐地偏离共产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有些史家认为，如果毛泽东在 1957 年不发动‘反右派斗争’，不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就不会造成后来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冲突。这不完全正确。因为，知识分子，至少像我们读书小组这类青年人，之所以偏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由于赛先生的引领。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一个「反右」政治运动相矛盾，而且与共产主义意识型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兼容的。所以，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

「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

是「阳谋」吗？

1957 年 3 月，科学院党委向北京各研究所的党员传达了毛泽东的两个新的讲话。我也去听了。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并恳请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的各种错误。特别是针对三害，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敬请批评 。运动简称为「鸣放」。

据毛泽东自己后来的解释，他号召「鸣放」是一个「阳谋」，即一个圈套，其目的是引诱对现实心怀不满的人批评共产党，然后聚而剪除之，从而巩固共产党天下。这种解释似乎暗示毛泽东在事前一切都有神机妙算，似乎他早已料定，他准备加以剪除的那些人一定会及时地中计「鸣放」，然后他可以用「反右派」运动及时地整治这些社会主义的敌人。

在我看来，「阳谋」说只是部分正确。一个证据是，毛泽东早在 5 月 15 日就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即已开始从「鸣放」转入镇压。如果他是一切都有预谋的，那么，这意味着，在 5 月 15 日，他认为，那些该中计者大多数已中了计，是收网的时候了。可是，直到 5 月 15 日，大学里还没有一张大字报，学生的大鸣大放还没有开始，「右派」的一个主力军——大学生——还没有出场呢！这至少证明，毛泽东没有估计到，大量「思想好」的学生也会投入「鸣放」，参加批评共产党的行列。按他的估计，在共产党领导的大学里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是他的政权的受益者，故而是支持者。

应当说，他的估计并不全错。当时，我及我认识的同龄北大人，极少自觉地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持对立政治立场。不同的只是对当局的支持程度，有的狂热，有的温和。所谓「落后分子」，也多不是由于有政治异见。正因此，当大学之外的「鸣放」已令毛泽东感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时候，大学生却尚无动静。

至于我所在的核反应堆小组，因为数值计算正紧，更少介入「鸣放」。向科学进军已经够忙了，何谈「鸣放」。而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自然科学来说，了无新意。自由争辩对发展学术之必要，无需毛泽东用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向自然科学家去废话，三百年前的伽利略时代的历史，就有结论了。

我们仍日日浸沉在计算中，没有「鸣放」，只有算盘声。

三月，四月，五月上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感不到阴谋，也感不到阳谋。

〈是时候了〉

5 月 18 日，星期六，我仍照例去北大。我们仍照例在李淑娴的专家办公室里，照例的约会，照例的阔论高谈。

校园里，同平时的周末一样，如镜的未名湖、智慧的花神庙、沉默的锺亭，净洁而且宁静。

5 月 19 日，潘多拉盒子打开了。

历史系的学生首先发难，用斗大字的大字报质问：「团代表是怎么产生的？」（二十九年后， 1986 年，科大上街游行学生的质问，如出一辙。）

接着，第二天，星期一，在北大学生往来最多的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一张醒目的大字报。是一首诗(又是从诗开始)。题目是〈是时候了〉

青年人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写在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背地里愤慨、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酸甜苦辣都兜出来见一见天光。

………

作者是两个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沈泽宜，张元勋。旋即，各色各样的大字

报从原本宁静的各个角落潮水般地涌出。学生的鸣放真正开始了。

1989 年春天，沈泽宜到北京天文台来找我。虽然他为这首诗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岁月。曾被流放西北。头发业已斑白。但是，一当谈起〈是时候了〉，他的眼神依旧放出炯炯的光彩。他在为我背诵这首诗时，似乎依然是 32 年前的那种激情。的确，它是一首值得骄傲的诗，它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大冲撞的第一响。

很清楚，〈是时候了〉所渴望的，不多也不少，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海涅式的自由，

「一棵树长到了我的坟墓之上，
年轻的夜莺在她枝头歌唱；
它歌唱如此纯洁的爱情（自由）啊，
就是在梦中，我也听得如诉衷肠。」

北大学生最有名的右派杂志——《广场》，只出过一期，首篇即是《自由主义者宣言》。海涅虽是马恩的好友，但他从不认同马恩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终于感到了，也看到了，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者宣言与共产主义者宣言是水火难容的。

死结——三害根源

北大大饭厅一带的冲撞目标，一开始就不是指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具体三害，而是指向了一个根本：三害的根源在那里？三害的社会根源在那里？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在那里？

这可能是毛泽东和中共当局没有料想到的，但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既然承认有三害存在，那么，就应有根源。这个问题是〈是时候了〉之后，学生大字报的一个主旋律。不幸，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个问题是不准也不能讨论的。因为，研究三害的根源，不可避免地要评定现行社会制度的优劣。然而，十月革命以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至少，不论如何评定，结论都必须是：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不幸，教育使学生习惯于对任何事都要寻根求源。三害根源自不例外。没有

任何问题可以在它被研究之前就规定它的答案，否则只是预设，不是论证。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拥护，也不能为预设所替代。所以，从学生一上场，他们与当局的冲突就是原则性的：是崇尚自由思考和科学的论证，还是对威权的迷信和崇拜？

显然，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死结。

因此，在大学里，三害根源一问，把「鸣放」的发动者逼到了料想不到的困境。虽然，青年知识分子当初的动机，绝非有意想给鸣放发动者制造困境，更不想争夺领导权。相反，对民主党派要求的「有职有权」等等，在学生中极少共鸣和呼应。学生呼喊的不是「权力」，而是天赋的自由「权利」。当时认同民主党派的学生很少，可能比同情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托派）的学生还少。民主党派，从来只是收容所式的政治花瓶。学生大字报中，对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的意见，大多集中于肃反和胡风问题。这与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直接有关。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社会上是严禁流传的。然而，在北大，苏共《真理报》和西方报刊的报导都看得到，不同的中文翻译版本在学生中间流传，并用小字报贴了出来。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知道报告的内容。斯大林，也曾是这一代人心目中的伟人。1953 年，当他的死讯传来时，不少同学落下了泪，是真的泪。难道他竟然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名滥杀无辜的暴君？事实俱在。使我们不能不重新思考肃反，思考胡风问题，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事业。（李和我去过布达佩斯，几位经历过匈牙利事件的物理教授与我们同龄。他们指着 1956 年留在建筑物上的弹痕，谈到他们当年对斯大林，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幻灭，竟然同万里之外的我们一样。）

权力之鞭与自由元素之间的和平相处期，就此结束。一场冲突势不可免了。

内疚与给党中央的信

「北大出事了」的消息，第二天就传到近代物理所。不过，我们的研究工作并未受到影响。随后，每天都从北大传来越来越令人坐不住的消息。但那一个星期里，我还是照例坚持到周末，即 5 月 25 日星期六，才去北大。

那天，李淑娴、倪皖荪和我谈论的主题，是大字报。我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

在学生时代又都担任过青年团的职务。所以，原则上说，我们属于「鸣放」所批评的对象，即大字报批评的对象，而不是「鸣放」参与者。确实，我们没有任何写大字报的冲动。然而，大字报引起我们的深思。大字报中批评的问题，我们也有过，的确也在大学里伤害过人，包括我们的同学。作为共产党员的我们，是否也对三害负有责任？

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在我们在大学的那几年，没有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但由于青年团工作的一个最高原则是「作党的助手」，所以，我们回想起，我们同样因此而伤害过一些同学。比如，1955 年初，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访华，要北大的学生去飞机场欢迎，本来是件小事。但因毛泽东、周恩来等所有中共领导人也都在机场，一个简单的欢迎式，就成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要求我们在挑选欢迎者时，按阶级斗争观念处理。结果，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由于被认为「不可靠」而不准参加。这些同学受到严重的岐视和伤害。更严重的伤害发生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虽然学生里并没有反革命分子，但在为时一个月的运动中，一些「思想落后」的同学遭到猛烈的无道理的批判。这些批判会的组织和主持，我们都参与过。我们感到内疚。

因而，深感应当改进共产党青年团的工作，以使那样的伤害不再会发生。为此，倪皖荪动议，我们联名给党中央写一封信，提出我们自己对改进共产党及青年团的工作的看法。李淑娴和我，都同意了。

6 月 2 日，星期日，我再去北大时，倪皖荪已拟好了信的大纲，很长，3 张 8 开纸。其中讨论了共产党的各种缺点和错误，包括理论上的教条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作风上的宗派主义等等。经过一下午的讨论，大纲被改定。并分工由倪写主要部分，李写有关青年团部分。我本也很有兴趣写一部分，但核反应堆的工作太忙，不容抽身。

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的日子

时间又过了一个星期。6 月 8 日，又是周末，我又去北大。

天已变了。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起草了〈组织力量反

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份党内文件。一场「反击右派分子」的阶级斗争，正式开场。

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发动过的阶级斗争，虽然名目极为繁多，但其斗争的基本过程和方式却大同小异，可以用一个通用的程序来操作。这个程序中有以下几个关键的子程序。

1， 确定斗争对象。按规定，阶级敌人的数目一定是「一小撮」，即不超过百分之五。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一个任务就是保证达到这个数字，误差越小越好。李淑娴后来被定为右派，而我得以幸免，全赖于误差范围太小，两个人不能同时挤进。

2， 构造罪名。按规定，凡右派分子(××运动时，则用××分子)的罪名，都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任务是构造罪名，使之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北大曾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北大理发店不讲究质量，学生的发式都被理成了「狗啃式」。后来，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也被划为右派。因为，大字报暗示，社会主义是用「狗啃」学生的头，反动至极。

3， 揪出暗藏的集团。按规定，××分子必定是组成各种反党小集团，有纲领、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运动领导者的任务是把右派分子(或××分子)组建成一个个的反党小集团，再加以批判。虽然，有些被组织在一个反党小集团中的人，甚至原来根本没有见过面。

跟着，就是大小的批判斗争会。那也有标准的程序。无论被斗争的人多么虔诚地认罪，与会的人也一定要高喊「不老实！快交待!」同时也要一致地举起手，就如，在电视里看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表决时一致举起手一样。

成千上万的天真无邪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就这样被卷入阶级斗争的压榨机，成了「右派分子」。许多人，经受不住这种对灵魂的凌辱，自杀。

直到 1957 年 8 月，倪皖荪，李淑娴和我，还平安无事，虽然我们要给党中央写信的事，当局是知道的。然而，到 6 月 8 日，我们的信还没有写完，也就没有寄出。党员向党中央写信，是不违背党章的。我们的信的内容也从未用大字报公开过。因此，我们的行为似无一丝越轨。所以，从不认为有错。

9 月，北大的反右已近尾声，「不老实!」 的口号声渐渐稀少了。一场运动看来已快过去。

然而，人生就是不能完全避免偶然。

也在 9 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反右运动」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陪苏共中央访问者来北大。邓彭二人「偶然」顺便看了北大的大字报，出乎他们的意料，惊叹：「北大右派的质量很高」。于是，他们立即破格优惠北大，必须再追加右派分子，数目可以不受百分之五的限制。

这样，北大的运动进入第二次高潮，再次搜寻适合充当右派者，右派分子数目增加到了百分之七。我们准备写信的事，就在这场新搜索中落网。这封信，很容易在阶级斗争的程序上通过。我们的信是写给党中央的，所以是反党；我们的信有大纲，所以是有纲领的；我们 5 月以来每周讨论一次，所以是有计划的；我们是三个人，三人为众，所以是有组织的。这一案例，很快成为北大的一个新典型。在北大，印发了我们的信的提纲，严加批判。倪皖荪，李淑娴均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个二类，一个六类。王竹溪先生在物理系讨论李淑娴问题时说：李不够右派，还差一个 delta（数学上的小量，但不为零）。但是，马克思的《数学笔记》中没有 delta，只有零除零。

我在近代物理研究所也遭批判。对着我喊的「不老实!」，也听过几次，但终归没有正式被定为右派。得以幸免的原因之一是，当时我不属北大管辖，而属于中国科学院。邓小平没有来科学院，也就没有优惠给科学院额外的百分点。原定的百分之五的定额，业已满员。「右派分子」的帽子全已分发完毕，已经没有给我准备的名额和帽子了。另一说是，当时的科学院副秘书长杜润生，把我从右派分子的名单中划掉。果如此，当在此谢之。

全员覆没之后

一封并未寄出的信的所有参与者，就此全员覆没。倪皖荪后来被开除出北大，送去劳动教养，二十二年后，才再回到大学执教。

李淑娴则留在北大作为反面教员——贱民的‘优雅’称号。

我则于 1957 年 12 月被逐出核反应堆研究组，下放河北省赞皇县，劳动改造。

覆没的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

杨德勋，我中学好友，也是北大同届，从中文系毕业后到中央戏曲研究院工作。致力于戏曲理论。不时地给我送来一些戏票。从洋歌剧「茶花女」到川剧「打

面缸」，都有。后来，不来送了。右派。

施于力，北大同届，中文系，以朗诵《致大海》对抗我们物理系的诗歌朗诵队。大胜。获北大首届朗诵赛冠军。其父为托派。1957 后，没有声音了。右派。1966 年自杀。

朱津栋，物理系朗诵队的指挥。毕业后到大连医学院任教，并研究物理医学。不幸，因酷爱艺术，认识一位原胡风分子。右派。

侯德彭，我大学做物理实验的搭档，毕业后，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职。他们似也有一个沙龙，也都是年轻人。我也去过两次，听到其中有人公开声称，不信马克思，而信康德，云云。后来，沙龙不能去了。《人民日报》上登了侯的名子，中宣部的首批右派。1967 的武斗年代，侯被派到广西邕江捞尸。

……

不能尽数。

有的人，从此音信杳然。

不完全统计，1956 年从北大物理系毕业的一百人中，至少二十人是正式的右派分子（即类别小于、等于 6 的右派）。中文系也类似。「类外而内控」如我者，就算是很「幸运」的了。

终结

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潮流，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我们也被卷进这个潮流里来了。共产主义夹杂在十九世纪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兴起。到俄国的革命，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它被很多知识分子接受，可以说是一个主流。从西学东渐到西潮东渐，我们这一代人东方的青年赶上了这个东渐潮流的尾端。

从此—1957，共产主义思潮，在中国，和在全世界一样，走过了它的历史峰值。

再见吧，自由的元素。

我将长久地、长久地倾听

你黄昏时分的轰响，

你悲哀的喧响……

1990 年 2 月，北京

附记：

1986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五。我前一天晚上刚从意大利回到北京，并准备于当天下午离京去上海、宁波，再回合肥上课。在北京暂短逗留的半天里，我和李淑娴去许良英家。开会。只有四个人，许良英、刘宾雁、李淑娴和我。论题是：反右运动快三十年了，我们能做些什么？一致的意见是，在 1987 年春举办一次「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大家讨论了会议的议题以及有关组织的方法。最后，要我根据这些意见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在南行的旅途上，我写了初稿。到合肥后，迅即寄给了许。他们修改后，就散发给了可能的参加者。这就是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中共中央收集在批判刘宾雁材料中的黑「通知」。全文如下：

「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

______先生：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难以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们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1. 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资料；
2. 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
3. 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
4. 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
5. 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
6. 反右之后「左」 派及右派的运动轨迹；

7. 反右与今天的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您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1987 年 2 月 3-5 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待定）

费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来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收到通知后，请您于 198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回信，告知您是否能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中关村 812 楼 704 许良英。

发起人

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1986 年 11 月

在许良英家的筹备会上，没有讨论我们几个发起人应当讲什么。许、刘两位都是出了名的右派，做为当事人，或做为见证人，他们都不乏讲题。按当局的规定的级别，右派分子（非学生）共分六类，一类最大，六类最小。学生右派分子分四类。许和刘都是第二类右派。李淑娴是第六类。我则是类外，没有右派的正式名衔，而是「内控」，不及他们三个。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好讲题。反正还有两个月时间可以慢慢去想呢！

事情发展就是快。「通知」发出不到一个星期，1986 年 11 月 30 日，科技大学学生贴出第一张小字报，质问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由谁定的。12 月 5 日，学生上街游行。随后触发了全国 29 个城市中的 156 所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不过，科大的局势很快稳住了，三天之后，学生上课，教师授课，逐渐回归正常。12 月 9 日，管惟炎校长要我就科大局势的稳定与胡启立（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通过一次电话，向他澄清一些有关科大的不实报导。胡没有说什么话，至少没有我记得住的重要「指示」。 大概是风暴之前的无言和沉默。根据经验可以预感，运—动—要—来—了…。

果然，两天后，李淑娴从北京打电话来，许良英告诉她，《人民日报》社领导要求刘宾雁退出「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随后，李淑娴不断打电话来，催我赶快回京。我的课程——近代物理——于 12 月 31 日上午结束。赶到北京，正好

是 1987 年元旦。第二天，1 月 2 日，中共中央下达 1987 年第一号文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式启幕。随后两个星期，报纸上的头版新闻是：1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科大，免去管惟炎科大校长职务，撤销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1 月 14 日，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开除王若望党籍；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公报，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1 月 19 日，中共安徽省纪委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1 月 25 日，中共《人民日报》机关纪委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许良英漏网，据说是邓小平一时说不出许良英的名字。就此，「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也成为标准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事件之一被记入中共的文件。

虽然「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夭折了。我还是记下了我在 1957 的片断经历，以备不时之需。这就是正文的来源。所以，上述的「通知」（1986 年）应是正文（1990 年）的一个前言。 2004 年 9 月，Tucson

方注：前文分别写于 1990 年和 2004 年，未发表。现只作了少许技术性改动。供《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会议参考。 2007 年 2 月 12 日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

——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　程映虹

五十年前，1956 和 1957 年的「非斯大林化」标志着冷战时期全球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严重危机，期间发生了很多重要事件。赫鲁晓夫在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上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并引发了一场政治地震，在很多国家最终导致对共产党体制的挑战，特别表现在 1956 年底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其它东欧国家虽然基本上未发生由政治抗议引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但党内辩论和异议知识分子的声音还是非常普遍，同时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亚洲，中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在 1957 年春天的「整风运动」中，此外也发生了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在北越，知识分子直接向党国体制挑战，在 1956 年秋发起了「《人文》、《佳

品》」(这是两份当时有影响的异议刊物的名称)运动，同时北越义安河农民发动了反抗越共「土改」和整个农村政策的武装暴动，在城市也有工人和学生的骚乱。

值得注意的是，1956 年 11 月，当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镇压了匈牙利革命之后，整个苏联东欧的政治气氛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在中国，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政府，这不但给苏联造成了压力，而且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了东欧党内改革派发出自己的声音。「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北越政府镇压了义安河的农民暴动，用取缔报刊和发起批判压制了知识分子的异议；但到了 1957 年春，随着中共对知识分子批评的宽容和鼓励，越共的「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势头，越南知识分子也恢复了对党的批评；直到 1957 年初秋，越共尾随中共发起了大规模「反右斗争」，结束了所谓的「自由化」。在东欧，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一些党内改革派势力最后一击，「匈牙利事件」后残存的改革派人士最终在 1958 年初被清除，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危机至此告终。

迄今为止有关「反右」的研究基本上是以中国国内政治为主要背景，对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只稍有涉及。笔者在本文中选择了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放到国际共运的大环境中观察，着重分析 1956 年至 1957 年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共的「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之决策，不仅服务于国内政治目的，而且与中共的国际目标有重大关系；「双百方针」的提出，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也是中共在国际共运阵营里崭露头角、争夺领导地位的举措。如此看来，对「反右」运动之前的风风雨雨，应当有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充分认识「反右」运动的由来和毛主义的实质。

一、「莫斯科中心论」和「中国联系」

在叙述和分析这场「非斯大林化」或自由化运动时，人们常常遵循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模式（笔者称之为「莫斯科中心论」)。这个模式置苏共－－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为中心，把其它国家放在边缘。在这个模式的叙述中，这些边缘国家最初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反应是震惊和困惑，但很快一些国家的党内外人士就利用这个机会发出那些通常不被允许的改革之声，由此出现了一场自由化

运动。

考虑到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以及一些最重要事件的先后顺序,「莫斯科中心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有必要注意这个模式的一些盲点。「莫斯科中心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和低估了那些并非起源于莫斯科的政治变化，这常常导致对一些复杂历史事件和对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理解的简单化。

「莫斯科中心论」还有一个重大缺陷，它强调在这场自由化运动中国际范围内受到挑战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却忽视了「毛泽东模式」实际上同样受到了挑战。在中国和北越，「土改」、「镇反」、「整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对文学艺术创作的严酷控制，这些相似的政策与其说是「斯大林模式」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发明创造。这些做法通过思想、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渠道至少对北越的共产党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6 年到 1957 年期间，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不但在中国「右派」的言论中，而且也在北越知识分子中受到了挑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今天回顾 20 世纪的国际共运史时很多人以为：「斯大林模式」(以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和党内清洗等为代表的建立极权主义体制的道路)在 50 年代中期受到了清算；而毛主义(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用「不断革命」来巩固和发展极权体制)的被批判始于七十年代末，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引导着人们开始否定毛主义，但毛主义关于「民主革命」和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很多政策还是「符合实际」的。这也就是所谓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之区别，也是其个人功过「三七开」的主要根据。然而，回顾 1956 年到 1957 年的历史，在国际共运阵营清算「斯大林模式」的同时，这个被「七分肯定」的毛主义实际上也受到了批判和挑战，尽管在程度和影响上与苏联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还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至少有理由对国际共运史上对毛主义的批判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题重新考虑。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中共与一些东欧党和北越党的关系——或者简单地说是「中国联系」——出发，考察共产党国家在 50 年代中期由「非斯大林化」引发的自由化，并强调「中国模式」或毛主义在这场政治巨变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被「莫斯科中心论」所忽视或低估的问题，即使是在信息自由的西方学术界也是如此。1

「中国联系」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可以包含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共的「土改」、「镇反」、「整风」，以及经过「延安整风」形成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这些对北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北越在 1956 年到 1957 年间的「自由化」实际上不是反斯大林主义，而是针对这些毛主义的产物。但毛主义的这个侧面在东欧国家基本上未产生重要影响。第二方面是中共当时的「双百方针」、从 1956 年初到「反右」前宽松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些政策也是毛主义或「中国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组成部分，客观上是对此前的很多政策的修正，具有明显的解冻或自由化倾向，在实践中不但鼓励了中国知识分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启发、鼓励了东欧和北越党内的改革派和异议知识分子的活动。东欧把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个方面借用来作为对抗斯大林主义和苏共强权的意识形态武器；而在北越，异议知识分子则用毛主义和「中共模式」的这后一方面来对抗其前一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继续发挥着影响，直到中共发动「反右」运动为止。「中国联系」的第三个方面是毛主义和「中共模式」对其他国家共产党处理危机的方式之影响，包括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的国外应用以及对自由化运动最终的镇压。中共的「反右」给了东欧和北越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以最后和最致命的一击，从而宣告了斯大林死后共产党阵营内自由化运动的终结。

应该指出，毛主义或「中国模式」的这三个方面在具体政策倾向上虽然有重大甚至原则性差别，但在两个根本点上是相互联系且完全一致的。其一，在国内它们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这个目标，不同的仅仅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途径。中共建政之初，还处于体制上的摸索阶段，尤其是在处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上更是如此，因此在一定阶段内表现出了灵活性。那也是毛泽东掌权的 26 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控制上表现出灵活性的时期。其二，在国际上，它们都服务于在国际共运中推广「中国模式」和树立毛主义的地位这个总方针。在斯大林去世并受到批判、苏共领导地位受到「二十大」正反面影响的冲击的形势下，中共企图提出对其他共产党国家有吸引力的政策，通过推广自己的模式来扩大它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甚至和苏共平起平坐，这一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本文讨论的「中国联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中共和东欧(一定程度上苏联也包括在内)从 1955 年到 1958 年初的关系;其二是中共和越共在相同历史时

段内的关系。从这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联系」之后，不但可以看到一个「莫斯科中心论」无法解释的共产党国家政治变化的源头，而且有助于加深认识那个阶段的历史演变，甚至引导我们把分析的时间范围进一步扩展，比如，有必要将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之前和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之后的诸多事件也纳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和越南知识分子的抗争实际上是一种不同于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政治抗议模式：波匈是有工人和市民大规模参与的政治暴力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政权更替成为公开诉求，知识分子最终被边缘化；而中越始终以知识分子的抗争为主，争取言论自由始终是主要诉求。

二、中共「双百」方针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及中共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东欧事务中产生重大影响始于它在解决 1956 年 10 月和 11 月的东欧政治危机中。2 当时，莫斯科决定动用武力镇压波兰工人运动，中共反对这个决定，认为波兰问题主要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抵制了苏联所说的「西方阴谋论」；然而，在匈牙利问题上，当苏联徘徊于镇压和放手之间时，中共先是持相似于对波兰问题的立场，但不久又变为催促苏联出兵镇压。近些年披露的中方材料证明，从 1956 年 10 月下旬到 11 月初，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中共积极参与了东欧问题的处理。

1. 中共在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的立场和参与过程

1956 年 10 月，当瓦迪斯拉夫・哥穆尔卡在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当选为波兰党的领导人之后，莫斯科认为他对苏联的态度暧昧，波兰局势可能失控，于是决定镇压。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 10 月 19 日会见毛泽东，通报了苏联的立场。毛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反对苏联干预波兰。毛于 20 日和 21 日两次召见尤金，通报了中方立场，凸显出北京的强硬。苏联方面于是邀请中共派高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当面协商解决东欧危机的方案，中共立即派刘少奇和邓小平于 23 日赴苏。中共领导人到达苏联后，一直与苏共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甚至列席了 24 日和 26 日苏共主席团会议。10 月 29 日和 30 日是波匈事件的关键时刻。29 日晚苏共领导人会见刘邓，说明波、匈局势大变，两国政府已要求苏联驻扎在这两国的军队立即撤出。刘邓说，波、匈问题虽然是由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引起的，

但目前局面下苏军不宜立即撤回。这时中共代表团接到了毛泽东电话，毛主张苏联立即撤军，刘少奇马上改变主张，向苏方转达了毛的意见。次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了苏联派往匈牙利的副总理米高扬从现场发回的报告。报告称，随着苏军撤出，匈牙利已发生反革命杀人事件，匈政府和保安部队已瓦解。与此同时，中共也接到了驻匈牙利使馆和其它派出机构的相似报告。经过一天的讨论后，刘电告毛，认为匈牙利事件的「性质」已变，力主苏军镇压，得到毛的同意。不过毛说，最好再给反革命几天时间，让他们充分暴露，这是典型的毛方式。得到毛的同意后，中共代表团紧急约见苏共领导人，刘要苏联不要「放弃」匈牙利，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地要苏联军队返回布达佩斯，镇压「反革命」，夺回政权。但赫鲁晓夫说，苏联已错过了干预匈牙利的时机，现在苏军再返回布达佩斯，会被国际上看作是对外国的军事占领，所以苏联领导人决定不加干预。听到苏联领导人的这一决定，中方没有坚持。但 11 月 1 日早晨，赫鲁晓夫前往飞机场，与即将启程返回北京的中共代表团举行紧急会谈，告知他们苏联又改变了方针，命令苏军开回布达佩斯(实际上在和中共代表团会面时，苏军坦克前晚已经开进了匈牙利首都)。3

中共方面的材料披露了苏共领导层在匈牙利危机中的动摇和犹豫，这可以在赫鲁晓夫自己的回忆中找到左证。他说：「我不记得究竟有多少次我们在匈牙利问题上是『一举粉碎叛乱』还是抽身离开之间举棋不定。」4 究竟中共在促使苏联下决心镇压上起了多大的作用，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但根据上面所引的中方材料，至少苏共领导人做决定时对中共的态度是非常重视的。至少可以说，中共对匈牙利事件在最后关头的强硬态度促成了苏联领导人下决心。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苏联镇压，这是共产党阵营中最早对镇压表态的党报之一。1957 年 1 月中旬，当匈牙利局势还很不稳定、面临巨大国际压力时，周恩来访问了布达佩斯，给了依靠苏联坦克建立的新政权极大的支持。

以上情况可以在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很多出版物中看到，海外研究者对此也不陌生。然而，中共在匈牙利问题上最后关头的强硬立场和后来对镇压的全力支持，其实只是中共当时对「非斯大林化」问题的立场的一个侧面。中共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批判，反对苏联企图出兵波兰，以及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的「性质」转变之前要求苏联撤兵，这些都说明中共在波匈问题或者更广泛的苏联东欧关系上有更复杂的立场。

2.「非斯大林化」给中共带来了在国际共运阵营中崭露头角的机会

如果扩展视野，把「非斯大林化」的整个过程都包括进来，特别是考察一些不太被重视的历史材料，那就会发现中共立场和影响的另一面。如果用正统斯大林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并把动机搁置一边，那么中共的一些政策无疑具有自由化倾向，在东欧国家的改革派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中从 1955 年起就引起了共鸣，其影响早于苏共「二十大」。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共继续允许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的政策，也仍然影响着东欧国家，直到「反右」运动开始。

有证据表明，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开始了。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人由马林科夫为首发起了自称为「新路程」(New Course)的改革。在国内政策上，「新路程」主张适度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放松对主要日用消费品的价格控制，在政治生活上缓和政治镇压和恐怖，在对外政策上修正斯大林时期受到损害的与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为斯大林时期各国党内一些受迫害和排斥的领导人恢复名誉和地位，尤其是恢复铁托的名誉(铁托于 1948 年被苏联操纵的「共产党情报局」开除，铁托被宣布为叛徒)，赫鲁晓夫并于 1955 年 5 月访问了南斯拉夫。与后来苏共「二十大」造成的政治风暴相比，苏共的这些政策不过是和煦的微风，但它们确实起到了「解冻」被斯大林主义僵硬了的政治土壤的作用。

东欧党内的改革派也开始把这些政策引入本国的经济政策和党内生活中。为了从莫斯科的控制下得到更多的自治，一些东欧国家领导人转向北京寻求意识形态支持。它们的理由是，中国正处于同它们类似的发展阶段(从「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而苏联早已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更高阶段。

例如，东德是较早受苏联「新路程」政策影响的国家，东德党在 1955 年 11 月的全会上通过了按照「中国模式」对剩余的大型私人企业国有化的方案，对原业主提供相当于其资产 50％的赎买金，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而非全盘没收，允许原业主参与国有化后的管理(至少在原则上如此)，这些都是中共革命有别于俄国模式之处。5 东德党对中共比较温和的国有化模式的兴趣还表现在对中共模式的介绍上。1956 年 6 月 13 日，东德党报 Neu Zeit（《新时代报》）翻译并发表了中华全国工商联主席发表于《人民中国》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我们资本家欢迎社会主义」，作为对东德私营企业主读者对「中国模式」的问题之

响应。该年 9 月，东德党刊 Einheit（《团结》）翻译并发表了一篇中文文章，题目是「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阶段」。同月，东德党总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应邀列席了中共「八大」，他回国后介绍中国情况时强调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6

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党改革派领导人对中共的一些政策提法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例如，匈牙利原总理伊姆雷·纳吉对中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7 十分推崇。纳吉原来在斯大林时期受打击被下狱，「新路程」时期被平反和起用，1953 年底担任总理，但不久又被党内以拉科西为首的斯大林主义者构陷，于 1955 年 3 月下台。下台后，纳吉感觉到政治气候会发生变化，于 1955 年底 1956 年初撰写了「为新路程辩护」的长篇文章，向党上书 8。在这份匈牙利改革派共产党人的政治宣言中，对外政策这一章的标题是「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其主旨就是用中共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匈牙利的民族主权和从莫斯科的统治下独立的要求辩护，纳吉特别指出，它们的应用「必须被扩展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9

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斯大林主义受到公开批判，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中共也积极地在东欧扩展影响。中共对自己的一些政策在东欧的反响以及苏联和东欧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心中有数的，对东欧国家斯大林主义领导人在「解冻」和苏共「二十大」后的困境也非常注意。为了扩大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影响，中共十分注意发展与东欧那些改革派人物的关系。

当时匈牙利外交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雅诺什·拉凡伊(Janos Radvanyi)与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馆和大使郝德清的关系非常密切。据拉凡伊回忆，中共大使馆在匈牙利的党和政府机构内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情报网，通过这个情报网，郝德清不但得知纳吉的上书，而且通过在匈牙利党中央秘书处的关系得到了一份复制件。当苏联大使馆还在遵循过去的模式邀请「斯达哈诺夫工作者」(斯大林体制下的劳动模范)作客时，中共大使馆却对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记者的兴趣更大，常常在大使馆用中国菜招待这些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匈牙利政府不信任的。郝本人和大使馆的其它高级人员以及新华社驻匈记者，常常外出考察匈牙利社会。当「裴多菲俱乐部」开始活动时，中共大使馆就通过自己的交换学生掌握其活动。可以说，中共对匈牙利政治局势演变的了解是很细致的，这在初期为中共了解匈

牙利「非斯大林化」的进展提供了途径，在后期则为其判断匈牙利事件「性质」的转变提供了材料。10 匈牙利事件之后，当匈领导人再次访问中国时，毛泽东曾告诉他们，他当时每天都听取从中国大使馆和新华社发来的详细报告，这些报告帮助了中国领导人对匈牙利局势的转变作了正确而及时的判断。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为此获得嘉奖，大使郝德清后来也官运亨通。

1956 年 10 月 30 日，苏联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苏联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中有过错误。这是苏联公开表示软弱和退让，其内部已决定不干预匈牙利危机。当时，毛泽东也主张苏联撤兵。11 月 1 日中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响应苏共声明的文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 1956 年 10 月 30 日宣言的声明」。该声明提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又是以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团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种口吻表明，中共意识到这是历史给予它的向苏共领导权挑战的良机，所以它抓住机会在这一时刻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匈牙利知识分子正是从《人民日报》的这种表态中，判断中共站在他们一边。

然而，形势瞬息万变，几乎就在中共发表 11 月 1 日的这项声明的同时或稍早，中共对匈牙利局势的判断已经改变(其间只差一到两天)，苏共也决定出兵镇压。因此，《人民日报》刚唱玩「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的高调，两天后就发表社论，坚决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显然，对视一党专政为生命线的中共而言，崇高的「五项原则」其实不过是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

3.「双百」方针如何在国际共运中为中共赢得声望

1956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引起了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强烈兴趣，促进了这些国家思想文化领域里的自由化。该年 9 月，中共召开「八大」，所有东欧国家共产党都派出代表团列席，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密切接触，发展关系，介绍「中国模式」。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是改革派领导人雅诺什·卡达尔。他和纳吉一样，在斯大林时期被迫害，1954 年恢复名誉并进入党的领导层，是苏共「二十大」后匈牙利乃至整个东欧阵营的政治明星。中共领导人对卡达尔非常感兴趣，毛、

刘、周、邓等都会见了他并长时间谈话。10 月 1 日，卡达尔再次带领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参加北京的中共建政十周年庆祝活动。中共驻匈牙利大使郝德清抓住这个机会扩展中共在匈牙利的影响，他向匈牙利各界人士广泛散发了中共「八大」的材料，在匈牙利电台和报刊上介绍中共的方针，使得许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认为，「双百方针」是中共诚心诚意实行的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路线。

11 月初，当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时，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还误认为中共仍然站在他们一边。11 月 2 日匈牙利知识分子的刊物 Irodalmi Ujsag(《文学报》)还写道:「西方和东方都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我们事业的信念，其它一些大国如中国和印度也是这样。」11 当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后，很多匈牙利知识分子根据他们过去对中共的印象，纷纷前往中共大使馆寻求庇护，但被中共大使馆拒绝。

虽然中共在最后关头全力支持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但在国内政策上,「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但未收回「双百」方针，而且毛泽东还在 1957 年 2 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和政府之间有可能产生一定的非对抗性矛盾，表示出对民众当中的异议的某种容忍。1957 年 4 月，中共甚至大力号召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中共在国内的这种放松控制和容忍自由化的政策，当时在一些东欧国家有相当的影响。

今天中国的不少研究者认为，1957 年初春毛已决定「引蛇出洞」了。但那时东欧的知识分子和党内改革派对此毫无所知，对他们来说，中共在「匈牙利事件」后坚持「双百」方针、承认人民内部矛盾、鼓励知识分子批评党和政府，无疑是保护了「非斯大林化」的成果。所以，波匈事件后，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派把中共看成是「非斯大林化」的「圣地麦加」12，中国成了暗夜中一座令他们向往的灯塔。

在东德，改革派领导人卡尔·施德万(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保罗·万德尔(书记处主管教育的书记)和容格·库辛斯基(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等人，纷纷称赞中共通过区分「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寻求和谐并鼓励对政府的批评。施德万说，中共真正懂得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苏共「二十大」的方针。万德尔认为，中国是唯一的「把党和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作头等大事的社会主义国家。库辛斯基公开号召在东德实行「双百

方针」，说「让百花齐放，让它们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因为每一朵花都用它们无数不同的色、香、形装点这个世界。这是对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的真正进步的态度。」13 这些人的言行给东德党内保守派和斯大林主义分子造成了很大压力。总书记乌布利希原来对「中国模式」很推崇，「匈牙利事件」后他转向保守。1957 年 2 月，针对党内要求实行「双百方针」的呼声，乌布利希回应说：」我们的主要问题不是让百花都放，而是有选择地允许那些正确的去放，栽培真正新的、有益的花，而对那些在鲜花的外表掩藏下的毒草绝不姑息。」14

在「波兰事件」中，苏联没有出兵，而是与改革派领导人达成妥协。改革派领导人哥穆尔卡在匈牙利事件后担任总书记，他企图在斯大林主义和改革之间保持一定的中间立场。1957 年 5 月他在党的全会上说，波兰党怀着「深刻的同情」注视着中国的政策。他称赞中共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应用新的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矛盾」和「让百花齐放」，这些是「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中至今为止没有尝试过的」，因而是对「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5 一个星期后，波兰党的一份刊物发表的一篇呼吁移植「中国的百花」的文章表示：「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式――在我国也存在。如果我们要通过说服和讨论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同官僚机构作坚决斗争，改善国家机器，对政治和阶级盟友采用更灵活的政策。」16

4. 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对中共「双百」方针和「反右」的态度

自从中国提出「双百」方针后，莫斯科就抱有怀疑、批评甚至焦虑，尤其是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当中共决定公布「双百方针」时，陆定一受派遣前往苏联大使馆向苏方通报。这是根据中苏两党的约定，彼此有重要决定时尽量事先通知对方（尽管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并未事先向中方通报）。据随行的陆定一秘书于光远回忆，苏联大使尤金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后，找出列宁的一篇文章，意在用列宁当年对言论自由的禁止反对中共对公开批评的容忍。离开苏联使馆后，陆定一对于光远叹息道：「他们的教条主义真是根深蒂固!」17

波匈事件后，中共对自由化政策的坚持更加深了莫斯科的不安。1957 年 4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据参与会谈和接待的俄文翻译李越然回忆，伏罗希洛夫至少两次对毛泽东提出了对「双百」方针的不满，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竟然被允许登载报纸上。他引了「匈牙

利事件」作为自由化泛滥的后果来警告毛。毛的回答是：请放心，中国不是匈牙利，中共不想做「温室里的花朵」；如果反党分子想借机推翻共产党，他们只会落到暴露自己的下场。18

赫鲁晓夫下台后所写的回忆录里提到了苏联领导人对中共自由化政策和报刊上大张旗鼓地宣传「双百方针」的反感。他说，中国人「很会提出一些动听的说法」，他们「很会掌握提出正确口号的时机」。回忆中共的方针在苏联所造成的影响时，他写道：「我们自己的宣传干部问我应该怎样对中共的方针作出响应。『我们的读者正在报纸上看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新运动』，他们说，『这个百花运动已经潜入到苏联社会中了。』我们于是指示自己的报刊编辑和宣传干部不再报导这方面的内容，也不加评论。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的内部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我们避免对这个方针作直接的批评，但我们也不表示支持……任何农民都知道什么样的花应该栽培，什么样的东西必须铲除。一些作物能结果，但味道苦涩，对健康有害无益，而另外一些则会疯长以至于窒息那些邻近作物的根茎。」19

赫鲁晓夫当时已经由于「非斯大林化」而陷入了麻烦，他当然不想为任何进一步的自由化政策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虽然他理解，毛不过是为了让那些坏分子暴露自己而「引诱人们说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而已。赫鲁晓夫也拒绝了毛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尽管这个观点已在东欧国家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1957 年 6 月 2 日，当中国正处于「反右」前夜时，赫鲁晓夫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当问到他对北京提出的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人民和领袖之间存在矛盾」的看法时，赫鲁晓夫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任何这一类的矛盾」。20

1956 年匈牙利曾受到中共很大的影响，匈牙利事件后上台的党的新领导层对中共「反右「前的路线和口号仍然心有余悸。1957 年 5 月，就在中共极力鼓动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的时候，匈牙利党的刊物发表文章，总结历史教训，警告那些眼睛看着中国、心里想着在匈牙利实行「双百方针」的人。文章说：「近几个月中国－－尤其是在文学、科学和艺术界－－广泛开展的『让每朵花都开放』运动正在匈牙利引起越来越大的兴趣……当这个运动刚刚开始时，曾经受到它导致思想自由化和压制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知识分子非常了解，他知

道他们的大多数是忠于社会主义的，所以他为‘百花’的口号辩护……在经历了过去的那场悲剧之后（指半年前的匈牙利革命——本文作者注），我们现在也许最好是对在匈牙利实行中国的方法保持警惕」。21

莫斯科对中国政策的警告、反对和禁止传播的背后有两个担心。其一是本国和东欧的政治稳定；其二是中共借机在国际共运中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尤其是在莫斯科的政治威信受到「非斯大林化」和波匈事件损害的时候。周恩来在 1957 年初访问莫斯科时，在「双百方针」问题上受到很大压力，他利用在莫斯科大学接受名誉学位的机会公开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说：「为了推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我们中国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当然，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发展和丰富社会主义文化，而决不是为了取消或者削弱社会主义文化，列宁从来也没有放松过对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尖锐批判。」22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苏联及东欧共产党保守势力的这种忧虑很快就释然了。1957 年 6 月初，毛终于发起了「反右」运动，苏联及东欧国家的保守派松了一口气。东德党刊 Neues Deutschland（《新德意志报》）的记者于 7 月 12 日从北京发回报道说：「这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右派』……现在那些过去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都暴露无遗了」。半年后，乌布利希在东德党内发起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运动，清除了支持自由化的领导人施德万、万德尔、佛雷德·奥森纳(政治局成员、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和其它一些同情者，很多鼓吹在东德实行「百花」方针的知识分子也遭到清算。

三、「中国影响」在北越

与对东欧的影响相比，中共对越南的影响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里，能看到的材料也丰富得多。如果说中共对东欧国家的影响始于斯大林死后，而且受到苏联影响的限制，那么中共和越共之间历史上的关系要密切得多，甚至可以追述到 20 年代。

1．中共和北越共产党的紧密关系

胡志明和其它越南共产主义者曾经在「第三国际」指导下加入过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以中国为掩护。在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留在中国广西。抗战结束后，

很多加入中共的越南共产党人和军人回到越南北部，开展了抗法斗争。1949 年中共革命的胜利为越南革命提供了直接支持，中共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顾问和物资，中共革命的模式对越共也有深刻影响。1951 年 3 月的越共第二次代表大会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列作为党的指导方针，毛的像片也与马恩列斯并列；「中国模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被确定为越南当时和未来的革命目标，「民族统一战线」也被称为动员各种力量——尤其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实现革命目标的主要手段。此外，历史上越南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典籍一直是越南知识分子学习的对象，使用中文的能力(后来和使用法文的能力并立)是衡量一个知识分子文化教养的标志。因此，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可以从中文材料中了解外部尤其是北方邻国的情况。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北越的「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与中共的关联远比与苏共的关联密切。东欧国家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照搬「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例如过度强调重工业，缺乏日用品和农产品，斯大林时期党内清洗留下的案件和积怨，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最重要的是莫斯科的太上皇地位。这些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国际共运史研究中都是人尽皆知的。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在批判「斯大林模式」给东欧国家带来种种严重问题的同时，对自己的模式在北越所造成的问题从来讳莫如深。在中共正式公布或间接透露的有关中越关系的文件资料中，充斥着中共如何在军事、经济、外交和人员上对北越的援助，但闭口不谈北越在 50 年代上半期如何照搬中共的「土改」、「思想改造」（「延安整风」）以及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这三大政策，给北越社会带来严重破坏的情况。

2. 中共农村政策在北越的影响

北越在 1946 年到 1953 年的抗法战争期间，对其控制区的地主富农基本上是实行「减租减息」，同时没收法国地主和依附法国殖民当局的越南地主的土地，这是中共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翻版。早在 1949 年，中共就开始催促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实行「土改」，但胡志明和其它一些越共领导人以越南情况和中国不一样为由拖延抵制。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导人因此认为胡志明态度消极，不愿意按照中共模式实行彻底的「土改」，在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上表现暧昧。刘少奇在 1963 年一次反修正主义的内部报告中，以「老子党」自居，指名道姓地说，胡志明「这位同志历来右倾。我们建议搞土改，他不搞……后来把他搞到莫斯科去，我跟斯大

林一说，斯大林把他臭骂一顿。他才下决心搞土改」。刘少奇提到的胡志明的那次莫斯科之行发生在 1949 年 7 月。

从 1953 年开始，随着对法战争的节节胜利，北越党认为全面胜利在望，于是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开展了「土地改革」。当时北越党关于「土改」的宣传提纲中特别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革命在抗战时期(即民族革命)一直坚持了「减租减息」，而现在北越也还处于相同的历史阶段(仍在和法国殖民军作战)，为什么却要实行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才实行的「土改呢」？越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中国当时由延安和重庆两个政权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者代表地主利益；而北越的情况不是这样，除了法国殖民者就是在西贡的保大傀儡政权，所以实行「土改」是有条件的。换言之，在北越，无人保护地主的利益，所以即使在「民族革命」时期也可以将他们打倒。

中共的顾问参加和指导了北越很多地方的「土改」，介绍了中共「土改」中「斗地主」的经验，比如在农村里划分阶级路线、用各种手段煽动对「地富」的仇恨、甚至用地痞和流氓充当打手等。越共干部在参加「土改」前都必须专门学习中共的「土改」政策和经验。直接领导这次「土改」的长征从 1941 年起就担任总书记，在越共领导人中地位仅次于胡志明。他受中共影响很深，不但把「土改」看成是在越南照搬「中国模式」的最重要部分，而且看成是他个人对北越革命最大的贡献，甚至有时把派往地方的「土改」工作队称为「我的」干部。

在全面「土改」之前，北越劳动党于 1953 年春节先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恐怖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土改」铺平道路。这场运动以北越党中央的一道命令开始，名义上是打击那些没有按照规定交纳农业和商业税的富户，但实际上几乎波及全体农民。运动开始后，干部组成工作组，带着棍棒、绳索和武器下乡，对那些没有完成上交税收的农民严刑逼问，强迫他们交代逃税的后台和同伙，以及逃税的政治目的。使用的刑法包括在头颈上吊石块，用绳索拴住手或脚吊起来等等。这场运动很快就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卷进去成为受害者。后来运动失控了，逃税与否已不再受到关注，揪出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成了主要口号。在很多地方，工作组和党的干部都只在幕后操纵，甚至原先被依靠的「贫苦农民」也遭到排斥，前台则由乡村的破落户和痞子主导。恐怖笼罩了越北农村，很多党员干部由于其家庭背景和对运动的抵制也成为牺牲品，甚至一个回乡探亲的北越

政府部长也被当作逃税户而关押，结果夫妇双双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当时有数万人被关押，直到 1956 年北越党被迫「纠错」时才被释放。

越北农村的这场恐怖延续了两个星期，有研究者认为，平均每个村有 4 到 5 人死亡。1953 年 2 月底胡志明发表了讲话，对两个星期来农村运动的失控表示遗憾，向农民道歉，但并未否定整个运动。「群众的义愤」和「群众自发的行动」被党用来为恐怖和暴力辩护，「群众永远是正确的」、「群众可以自己领导自己」等口号也被用来在原则上肯定这场运动。这些实际上都是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观点。党取得对农村基层的控制权后，收集了那些抵制运动、参加运动不力或企图保护自己在农村的亲戚的党员干部名单，然后把他们全部送进「再教育营」，直到 1956 年夏天才在「纠错」运动中和那些被捕者一起释放。这场「反逃税」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是，在北越农村造成了恐怖气氛和对党的绝对服从，为几个月后「土改」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

北越的「土改」从 1953 年底国会通过「土地改革法」开始，到 1956 年底结束。在这场「土改」中，大量中农和富农被划为「地主」而受到打击，甚至被送上「人民法庭」乃至枪决。同时，越共还对「土改」对象的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不允许这些家属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导致大批妇女儿童在家中饿死。这实际上是党的「消灭地富」政策的组成部分。在党内，很多反对这种「土改」政策的原「老区」的党员干部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惩处甚至杀害。

3. 北越的「整风」和「思想改造运动」

「整风」的越南文发音为 Chinh Huan。北越「整风」的历史背景和中共的「延安整风」类似，都是对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不信任，要从改造人性入手建立高度统一的极权政党。很多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北越共产党人回国后，把他们在中共那里学到的经验介绍过去。这场针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干部的「整风」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毛泽东「延安整风」的翻版。按照台湾学者陈永发对 50 年代早期中共思想改造政策的简明概括，「中共的思想改造主要籍由两个方式：一是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土地革命，一是成立各种学习班或办理各种政治学习」。这两个方式在北越的「思想改造」运动中都被采用。

从 1946 年到 1950 年代初，越共普遍采用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思想改造」的主要方式。从 1951 年开始，「整风」运动在越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延续

了几年。这两场运动波及北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甚至那些在武装和地下斗争中证明了自己对党的政治忠诚的知识分子，也被强迫送进与外界隔离的学习班和特殊学校，经受系统的强化的思想改造，被迫向党坦白一切。很多人不堪忍受压力和折磨而自杀，所以后来连剃须刀都被没收，在电力紧张的情况下，「思想改造学习班」的灯火昼夜通明，对被改造者严加监视。从 1953 年到 1956 年，大批北越知识分子被安排参加「土改」工作队，参加了农村人口「成分」调查、政策宣传和撰写通讯报导等工作，要求他们在此过程中既改造农村，也改造自己。

很多中国读者都知道，有一个叫洪水(原名是阮山)的北越共产党人，参加过中共的长征和「延安整风」，曾任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他 1948 年回到北越，以少将军衔担任第四军区司令。他根据参加「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期间「整军」的经验写了小册子，建议越共实行「三整」(整党、整干、整军)。由于洪水主张毛式「自力更生」，在军事方针和争取中共援助上与胡志明、武元甲等北越党、军领导人有矛盾，洪水后来回到了中国，他的「整风」建议没有马上在北越实行。但 1951 年以后，越共在中共顾问的参与下还是发起了「整风」运动。洪水的建议说明，中共的「延安整风」模式在北越党政干部中早就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接受这种模式的土壤。

中共对越共的影响不仅表现为北越的「整风」中大量使用了中共的「整风」文献，而且「延安整风」(以及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采用的很多具体做法也有其越南版本。例如「硬戴帽子」，即不管受审查者如何否认，他必须承认他从未犯过的罪行，丝毫没有自我辩护的机会；还有「车轮战」，即连续多个昼夜对受审查者进行盘根究底的逼问，涉及到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直到受审者心理崩溃。北越「整风」中的另一个常用手段是「连环套」式的追究「反革命」动机。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教师被怀疑为「反革命」，于是他的学生对他使用了这种方法，将他定为「反革命」。其过程是：你给了某学生一个他不应得的高分，我们就此认为：一，你以此在我们之间制造矛盾；二，有了这种矛盾学生就相互争吵；三，他们从此就不再进步；四，他们甚至会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不如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学校；五，他们会进而认为今不如昔，现在的整个制度不如法国殖民时期；六，所以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成绩，你就达到了为殖民统治者服务的目的；七，可以得出结论，你就是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走狗。23

在中共的「思想改造」中，认「罪」者常常在公开场合痛哭流涕表示自己的悔「罪」；在北越，这种方式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悔罪和施加压力的手段。在「思想改造」会议上，听取「悔罪」者认罪的人常常集体痛哭流涕，表示他们没有听从「胡伯伯」和「毛伯伯」的教导，让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集体到一个还拒绝认「罪」的人那里，在他的门口大声哭泣，用这种方法逼他就范。这种方法在很多地方，尤其是集中了未成年「思想改造」对象的学校里，造成精神失常。

需要说明的是，在国际共运中，北越只不过是受中共「延安整风」模式影响的一个事例。马来亚共产党在 60 年代也曾多次发动「整风」，让党员轮流去「学习班」，由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介绍「整风」经验。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被作为马共的「整风」文献，每个人都要「活学活用，敢于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自己的肮脏卑鄙思想挖出来消毒，让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24 马共内部在 60 年代末还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情形，因此大批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被杀害。25 马共 1989 年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时，大量受害者的家属前往马共营区追寻亲人下落，马共不得不专门发出文件，为这些受害者「平反」，追认其为「烈士」，并给每个受害者家属 800 美元的赔偿。

4．北越对知识分子的管理控制

和中国一样，北越共产党的革命吸引了大量怀抱民族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艺术家，他们在民族主义革命中非常活跃。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很难找到第三条道路的话，越南知识分子更是如此，因为越南除了法国殖民当局就是保大傀儡政权，而中国毕竟还有一个独立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政权在与共产党争夺知识分子，还有大量的城市供独立知识分子活动。因此，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越南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除了北越共产党以外没有别的政治势力可以选择，在活动范围上除了前往北越根据地以外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让他们作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而生存。这些参加抵抗法国殖民主义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抵抗知识分子」，很多人长期在森林中生活，与「越盟」（越共在抗法时期的名称）的干部战士一样落下了一身疾病。

如果说中共在革命中曾面临如何改造大量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在北越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其实对以毛主义为模式建立的北越政权有反感，甚至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民族主义的两难处境中他们往往选择

了前往北方、加入革命。北越 50 年代中期「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潘魁 26 曾对这种两难处境和无可奈何的选择有过一个比喻。他招待客人喝咖啡时，由于「越盟」控制的越南北部地区没有可以直接融于咖啡的白糖，潘魁就让客人嚼一些土产粗糖。他说：「这些土产粗糖代表爱国主义，它可以冲淡咖啡的苦味，而这种苦味就象党的领导。有了这种土产粗糖，我们就可以在忍受咖啡苦味的同时欣赏它的芬芳，因为这种芬芳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尊严。」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把自己比作越共的「小老婆」，其含意是，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永远不会「明媒正娶」，改变你的「身份」。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人由于忍受不了「越盟」的控制和改造，于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离开越南北方的「越盟」控制区，回到了越南南方。

为了控制和改造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北越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所有参加反法民族主义斗争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归北越军队的总政治部管辖(北越政府一直到 1955 年二月才建立起文化部)，接受军事纪律的制裁。北越军队总政治部完全是仿照中共军队的模式建立的，很多越共军队政治干部在中共军队中受过训练，受党的委派监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工作。在总政治部下有一个军队文艺工作处负责具体事务。北越也有模仿中共的文化艺术工作者联盟(文联)，但其权威无法和军队总政治部对文艺的控制相比。当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甚至就住在军营里，受军事纪律的约束，外出要象士兵一样向上级申请离营证，社交对象也要由军队党组织批准。

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统一党的文艺方针，明确知识分子必须遵循党的路线、为党的政策服务一样，北越也把知识分子和文化艺术创作严格限制在为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范围。北越党的主席胡志明提出了「文化抗战化、抗战文化化」的口号，把文化完全看作是抗战的一条战线。北越党的总书记长征在 1948 年 7 月的第二届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和越南文化」的报告。他明确指出，西方文化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腐朽倾向在北越革命中是不允许的，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这个报告后来成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北越党也有一个类似于中共文艺领导人周扬的角色，即中央委员、诗人素友(To Huu)，他在 1949 年就提出，必须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清除旧社会的全部遗迹，要让艺术与政治结合，让作品的政治内容决定艺术形式，文艺工作者必须用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创作。在越共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文艺家都首当其冲。

5．北越知识分子的异议思潮

和中国一样，正是在这些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共产党体制下最初的异议思潮。法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使越南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在西方形成的现代自由主义和民主人权的观念，就像世界近代史上很多非西方民族从殖民统治下了解并接受这些思想一样。而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儒家人文主义和精英文化的熏陶，使他们难以接受共产党革命中的暴力和粗俗。越南知识分子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历史非常熟悉。越共也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比中共在抗战结束前后对美国制度的赞美有过之无不及。抗日战争结束前,胡志明和武元甲等人不但热情接待空降到越北游击区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表示未来的越南要和美国建立亲密关系，而且多次向美国国务院发电报，表示越共的运动完全是民族民主性质的。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的「越南独立宣言」中，第一段就完全引用了「美国独立宣言」的第二段，即那些「不言而喻」的基本人权(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以及人民主权)，并称这些是「不朽的原则」。胡志明还引用了「法国人权宣言」中的一段。《越南独立宣言》的主要部分列举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如何公然无视这些普世性原则，践踏越南的人权和民族权利。如果把这些段落与「美国独立宣言」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在结构上几乎是对称的，语言上也十分相近。不但如此,「越南独立宣言」的结尾和「美国独立宣言」也几乎完全相同。胡志明和「越盟」如此做的政治目的是向美国表示，越共的革命是受自由、民主、人权的意识形态的鼓舞，并非共产党革命，从而希望美国能支持他们在日本战败后防止法国殖民统治卷土重来。

据 Kim N. B. Ninh 的研究，北越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早在 40 年代末就开始了，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凸显出来。27 北越共产党 1954 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独立，结束了武装斗争，进入城市，并建立了国家政权。城市生活助长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情绪。28 恰逢「非斯大林化」浪潮在各共产党国家蔓延，北越知识分子从 1955 年 2 月开始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时，军队中大约 30 名作家和艺术家联名向中央委员会上书，要求废除军队总政治部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这份上书的内容包括:「一，把对艺术和文学的领导权还给艺术家和文学家；二，在

军队组织范围内建立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三，废除现存的对文艺工作的军事化管理。」29 领导这场上书运动的是年轻诗人和小说家陈寅。参加上书的有诗人黄琴(当时是越军总政治部文艺部的营级干部)、音乐家子朴等。在上书的同时，陈寅带领大约 20 名文艺家面见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 3 项保障艺术创作自由的要求。阮志清拒绝了这次请愿，当面斥责这些人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袭。这些知识分子本来以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经历已经使党相信自己的忠诚，这次请愿的失败使他们大受挫折，为以后向党发出更激烈的挑战埋下了伏笔。

陈寅所领导的上书和请愿是共产党国家中斯大林死后文艺领域「解冻」呼声的一部分。这种呼声政治上要求放松对文学艺术家的控制，艺术上要求解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即只准从正面表现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统治)的束缚，是知识界自由化运动的先声。一些北越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研究者认为：陈寅的活动与中国的「胡风事件」30 有关；当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提出挑战时，陈寅正由越军总政治部派往中国，撰写反映「奠边府大捷」31 的剧本，他在中国期间无疑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艺界人士中议论纷纷的胡风观点有相当了解。和大多数参加革命的越南年轻知识分子一样，陈寅是在对日抗战结束时参加革命并开始创作活动的，1948 年入党。在 40 年代下半期，他就表现出反对官方文艺政策——即胡风所反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塑造模式化英雄人物的倾向。陈寅 1951 年参加过「整风」，是北越文化界中最早的一批接受中共「整风」方法的人，他对毛主义的一套和中共文化艺术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在北越文艺界同侪中有「中国大师」之称。陈寅和胡风在文艺思想和对官方文艺权威的态度方面非常相似，可以说是在相同的政治控制和文艺政策下一对孪生的异议分子。在他 1954 年前往中国时，越共按惯例由总政治部派一位政工干部伴随陈寅，对他的创作活动横加干预，陈寅不久就与这位干部发生了冲突。回国后在发起向阮志清请愿的同时，他发表了长篇小说「前仆后继」，表现奠边府战役中普通战士的形像。他没有按照官方教条把战士的形像拔高，而是尽量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与此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篇文章，严厉批评和讽刺了越共文艺界权威人物、越共中央委员素友新出版的一本诗集。官方认为素友的这本书贯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艺创作的样板。而陈寅在他的文章中不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直接提出质疑，而且提出了「百家」的概念。他批判党的文艺机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

下规定写什么和怎么写：「为什么没有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有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32

「百家争鸣」作为学术研究上的指导方针，是毛泽东1953年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陈伯达的要求，就郭沫若和范文澜之间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争论所写的题词。这个说法不久就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后来又成了「双百」政策的一部分。陈寅关于「百家争鸣」的提法是否与他在中国的经历有关？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越南知识分子，他有可能知道「百家争鸣」的典故。但更可能的是，他不久前在中国时对这个原则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受到鼓舞。

陈寅的上述言行可以看成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越南知识分子的大胆发泄。研究越南1950到1960年代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Ninh指出：「很明显，中国进行的对胡风集团的猛烈批判提高了越南党的警觉。」33 随着中共开展反胡风运动, 1955年5月，陈寅被北越共产党「劝告」退党。1956年初，他又被送进「土改」工作队强化「思想改造」。不久，胡风被中共逮捕，1956年2月越共也逮捕了陈寅。一个参与决定逮捕陈寅的越共高级干部认为：「中国有一个胡风，我们很可能也有一个」。34 在北越1956年9月30日出版的《人文》杂志上，刊登了一幅讽刺党的文艺界领导在越南抓「胡风」的政治漫画。这幅漫画的画面上，越共管理文艺工作的领导人之一怀青左手拿着胡风的书，右手把拿着反映「奠边府大捷」作品的陈寅当胸抓住。漫画里有这样的文字说明：怀青说，「同志们，这就是胡风本人!」陈寅说，「亲爱的同志和领导，我发誓我的名字叫陈寅。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查我的出生证明。」35

6.「非斯大林化」和「双百」方针在北越引起的反响

陈寅被捕后不久，苏共在1956年2月举行了「二十大」，4月派遣米高扬去北京和河内通报「非斯大林化」的新政策。苏共的变化给越共带来了震动，它不得不重新考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米高扬访问河内后，越共以逮捕陈寅的决定未经高层批准为由将他释放(陈寅曾经在狱中自杀未遂)。5月，中共宣布实行「双百方针」，这立即激起了北越知识分子的共鸣。著名哲学家、新建的越南国立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德草立即安排人翻译了陆定一的讲话，准备在北越发表。陈德草在

法国获得学位，用法文出版过研究现象学的著作，在西方哲学界很有影响。他于50年代初放弃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回到越南，参加了越共领导的反法斗争。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缩短与参加过武装斗争的越共成员的距离，陈德草曾故意不用蚊帐睡在森林里，让蚊虫叮咬，患上了疟疾，这是很多游击队员的常见病，几乎成了参加革命的标志。36

据 Bernard B. Fall 的研究，北越党最初力图限制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双百方针」造成的影响，但北越知识分子对「非斯大林化」和「双百方针」的热烈响应不久就冲破了上层的限制，引发了 1956 年夏秋的异议浪潮。37 在自由化运动的初期，北越知识分子主要是讨论创作自由以及党对文艺的领导，但也涉及其它问题。8 月 1 日到 18 日，越共被迫让文艺工作者举行了「第一届越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北越原有中国模式的「文联」，但从未开过代表大会)，议题是学习苏共「二十大」文件和中共的新文化政策，结果会议通过了要求党中央修改文艺政策的五项要求，包括立即翻译中共有关「百花齐放」政策的文件。38 1956 年 7 月底 8 月初，河内市议会举行会议时，与会代表也对越共各方面的政策（从食品短缺到税收）提出了严厉批评。

在国际国内形势下，越共被迫就 40 年代末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作总结和反省，于 1956 年 8 月底宣布采用新知识分子政策。这些新政策是：「一，最广泛地团结和动员知识分子的力量，完成新时期的革命任务；二，根据知识分子的能力使用他们并信任他们；三，在国家能够承担的基础上，保证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给予他们应得的报酬；四，继续帮助旧知识分子了解革命思想，训练新知识分子，不断地扩展他们的知识，扩充他们的队伍。39 在主要内容甚至措辞上，越共的这些政策与同期中共的政策惊人地相似。周恩来在 1956 年 1 月所作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前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信任，而是如何合理地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如何向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如何在国家经济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保障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周恩来的报告在北越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中有相当影响。越共中央党校的编译机构 1956 年 11 月翻译了周恩来报告以及稍后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报告，供内部传阅。由于很多越南知识分子都能直接阅读中文，所以中共文献在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实际流传要早于越南文本的出版。40

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越共派人前往中国考察「百花齐放」问题。到了 1956 年秋天，随着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激化，共产党国家的异议浪潮不断高涨，越共中央开始全面修正政治经济政策。越共中央于 9 月初召开了「十中全会」，由于争论激烈，会议一直开到 10 月底。党中央于 10 月 29 日发表全会公报，承认在「土地改革」和其它方面犯了严重错误，绝大多数在「镇压逃税」运动和「土改」中被捕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农民被平反和释放。越共总书记长征成为替罪羊，引咎辞职，由主席胡志明代理总书记。直接主持「土改」的政治局委员黎范龙被贬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胡越杭则被贬为普通党员。越南通讯社 1959 年 10 月 29 日的报导披露了越共在「土改」中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包括依靠坏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选择斗争对象，「大量贫农和雇农受到打击，许多中农受损害，富农几乎全被划为地主」。越南党报《人民报》1956 年 11 月 1 日的报导中也提到，「土改」中「很多地区用刑讯逼供，用伪造的文件将无辜党员干部和群众送进监狱」。不久黎笋从越南南方的党组织调到北方担任党的总书记。这一调动表明，北越党组织的错误已严重到要由向来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南方党组织来帮助纠正的地步。此后，在黎笋的领导下，越共开始逐步摆脱中共的影响。41

「十中全会」之后，越共随即开展了针对「土改」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所犯错误的「纠错」运动。河内电台 10 月 30 日广播说，「十中全会」后，党的首要任务是民主化和改善人民生活，而过去一直列于首位的民族统一此时移到了第三位。42 越共还召开了干部会议(又称「七百人大会」)，传达中央全会精神。会上由军事领导人武元甲作报告，解释中央的新政策。武元甲被认为和中共关系不深，与从中国回来的洪水在学习中国经验上有矛盾，在领导「奠边府战役」中曾经不理会中共的军事顾问，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则比较开明温和。北越党选择他在这个时刻作报告显然是一种姿态。此外，越共主管文艺的素友和阮庭氏公开承认，犯了压制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的错误，主持审查和逮捕陈寅的怀青发表文章说，他把陈寅定为「反革命」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当时的北越驻华大使黄文欢曾回国参加 1956 年 9 月到 10 月的全会，并在会上被提拔进政治局。当他回到北京后，周恩来非常关心越共党的「纠错」和「整风」，专门召见他询问北越「土改」中的错误是否与中共顾问团有关。黄文欢回答说，中国经验都是好的，错误是越南人自己犯的。这很明显是政治套话。43 周恩

来如此关心越共的「纠错」，显然是因为中共对北越党揭露出来的问题深感震动。

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对北越 1957 年的「纠错」运动作极其有限的介绍。例如，周新城主编的《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一书中有关「土改」的一段，在肯定了「土改」中「贫困农民通过向地主阶级展开暴风骤雨般的斗争」分到土地的成就时也说：「到 1956 年夏季，越共发现土改中在镇压敌人、整顿组织、划阶级成分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即扩大了打击面，错划了一些人为地主、富农，把在革命战争时期以‘白皮红心’面目参加革命的人，错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开始纠偏，到 1957 年底结束。负责土改工作的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引咎辞职。」44 这段文字对越共搬用「中国模式」造成的「错误」之程度和后果介绍得极其有限，不但回避了中共对越南「土改」中「错误」的责任问题，而且对当时共产党国家中自由化运动和反斯大林主义的大背景促使越共「纠偏」这一点只字不提。

7.北越知识分子自由化的高潮：「《人文》、《佳品》」运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北越知识分子从 1956 年 8 月到 11 月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这个自由化运动主要是由一批突然涌现出来的出版物组成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人文》和《佳品》。《人文》是一份公开的政治性周刊，其刊名意指「人文主义」，但也包含中国儒家在文学和哲学的陶冶中修养人性的意思(法国对北越知识分子深有研究的 Boudarel 认为，这个刊名显示了胡风的影响)。从 1956 年 9 月到 11 月，这份杂志一共只出版了 5 期，但刊登了大量尖锐的文章。《佳品》45 则是具政治倾向的文学刊物。除了这两份最重要的刊物外，还有《百花》、《新地》46、《说真话》、《创造》、《新河内》、《新时代》、《祖国》等。这些刊物都是民办的，在报刊亭里出售，对官方报刊的销路造成强烈冲击。民办的明德出版社因出版《人文》和《新地》等刊物而令人瞩目。当政府机关通过压缩纸张的分配来限制其销路时，编辑部门号召读者捐款来解决问题。这些刊物或者直接发起政治讨论，或者用文艺作品的形式发表政见，其内容从党对文艺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到官僚体制，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的甚至指出了「党国体制」的合法性。

这些刊物发起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反响，甚至扩展到了河内人民代表大会和越南「祖国阵线」(越共的统一战线组织)的会议上。据 Boudarel 的研究，北越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体制的尖锐批判超过了当时的中国，更超过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北

越知识分子的目标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自由与民主，法制和人权，以及在思想和研究的所有领域开放言论自由。47 他们还借苏共「二十大」反个人崇拜的机会，对北越党在人民中灌输的对「胡伯伯」（胡志明）的带有家族长老温情色彩的个人崇拜提出挑战。

例如，《人文》主编潘魁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用伊索寓言的笔调影射胡志明是越南农家放置槟榔的石灰罐，这种石灰罐时间一长内部的石灰就越积越多，容积变得越来越狭长，直到无法使用，但却因使用年久而常被农家供奉起来。胡志明体型瘦长、年高，而且被崇拜，就像是这样一个老而无用的石灰罐。潘魁还说，不久前对陈寅的批判中，陈寅的一个罪名是在其作品中用了大写的「他」，这个用法长期在北越只可以用来称呼「胡主席」。潘魁写道：「当我听到这个指控时，我觉得仿佛是在皇家宫廷里」。1956 年 10 月，当北越自由化运动达到高潮时，潘魁正率领越南文化代表团在中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由于中共对鲁迅的推崇，鲁迅在北越也享有很高声誉。在北越自由化运动中，「鲁迅精神」成为异议知识分子向专制文化政策挑战的工具。在「《人文》、《佳品》」运动的高潮，选择这个运动的领袖人物前往中国去纪念追求知识分子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鲁迅，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而有可能是越共向知识分子作出的妥协。潘魁在《人文》上发表文章谈创作自由，举了一系列事例，包括一年前写纪念鲁迅文章时受到过来自权力机构的对文学艺术活动的蛮横干预。潘魁在文章中质问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怎么创作？我怎么可能保持我的个性？」48 很明显，当时在北越，纪念鲁迅并不是一件应景的事，而是有实际政治内容的，与当时知识分子与党的矛盾有关系，并和知识分子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人物有关联。

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来自中国的影响。中共的「双百」方针和 1956 年对知识分子的新政策鼓励了北越知识分子，帮助他们突破了北越党的控制。越共理论家和领导人搬用马克思、列宁的语录来论证越南历史也有那么几个「社会发展阶段」， 很多越南历史学家对此感到十分厌烦，毛的「百家争鸣」说法正好给他们提供了理论武器。越南著名的历史和人类学者陶维英说：「在有关越南历史和国家形成的辩论中，很多研究者不敢提出那些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意见的新观点。谁敢越雷池一步就会遭到离经叛道的指控，就只能闭嘴。在很多研究和讨论领域，很多人只有一个恐惧，那就是在无

意中偏离了正统教条和官方思想规定的现成的路径。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工作成了马戏团里需要高度技巧的走钢丝。」他大声疾呼：「我们必须采用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领域的政策：『百家争鸣』!」49 这些刊物和参与讨论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他们背后有中国的自由化在撑腰。Ninh 指出：「事实上，《人文》对中国和东欧的发展亦步亦趋，在越南响应中国的百花运动和波匈的自由化……《人文》的作者们意识到他们是一个更广泛的国际性运动的一部分。」50 此外，仅仅从一些刊物的名称(如《百花》、《新地》等)上也能看出中国的影子。

其实，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受到最严厉批判的恰恰是越共从中共那里移植或借鉴来的东西，而不是离越南实际较远的斯大林主义。这与赫鲁晓夫推动下出现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国家批判苏联模式如出一辙。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通过「延安整风」建立起来的、由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的、经周扬等人贯彻推行的中共文艺路线，其北越的翻版在 1955 年到 1956 年受到了挑战。北越知识分子提出，文艺要摆脱党的控制而独立，文艺家要有创作自由，他们和党之间应该是平等的。陈寅在 1955 年 2 月向党请愿时便提出：「一个作家责任感的最高表现」是对真实的尊重和信念，它「超越一切指示和理论」；作家必须服从真实，而不能「为了政治需要而扭曲它」。51 潘魁则用直白的语言说：「文学为政治服务，政治领导文学和艺术，这已经变得天经地义了。但我们必须要问：如果政治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能仅仅依靠口号、旗帜、传单和命令而没有文学和艺术吗？要诚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政治必须拍拍文艺的肩膀，说『我和你联系是需要你，需要你的艺术』。只要政治这么说了，文艺就会同意。但被政治所需要的文艺的功能只是文艺的一个部分。政治（连这一部分也）不能领导，文学和艺术必须要求自己的自由。因此，我想政治没有理由不接受一个（政治和文艺）『双赢』的结果」。52

越共从中国照搬的以「思想改造」为主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另一个在「《人文》、《佳品》」运动中被批判的重点。很多越南知识分子对「思想改造」深恶痛绝，他们敏感地认识到，在这种「改造」的背后其实就是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目的是把知识分子「搞臭」，这是毛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土改」中对「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的纵容出于同一根源。越南历史学家陶维安强调说，这种「改造」的实际结果是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甚至使他们耻于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著名

律师阮孟墙说：「当发现党对他们完全不信任时，参加抵抗斗争的知识分子……感到痛苦和失望，尽管他们为党作出了无数牺牲。是他们索取过多吗？他们提出要当部长或者大使吗？没有。完全没有……他们的大多数只不过要求根据他们的才能服务于人民，捍卫他们的荣誉和思想自由，他们相信这是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尊严最本质的东西。」很多自由化的参加者还对蔑视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和才能的「外行领导内行」(这实际上是极权主义统治的表现，对它的批判也是中国「右派」言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做法大张鞑伐。有一首诗这样说：「喜欢说大话的领导人，虽然对文艺一窍不通，他却一直在说教和批评。鹦鹉学舍地背诵从书本上看到的他自己还没有弄懂的字句，他的心就像干木头，他的说教闻上去就像烧焦的米饭。当被问倒时，他拍着胸脯，挥舞着党的文件，一心只想把人吓倒」。

在「《人文》、《佳品》」运动中，异议刊物还大量揭露从 1953 年春到 1956 年的「土改」中对所谓「阶级敌人」滥施暴力、折磨和杀戮的情形。北越的知识分子指出，甚至在 1956 年 9 月越共已被迫承认「土改」中的错误、发起了「纠错」运动并大量「平反」和释放被捕者时，各地「土改」中的既得利益者和有血债者仍然利用他们在「土改」中获得的权力，以暴力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对被「平反」和返乡者施加报复。例如，1957 年 3 月 14 日出版的那期《新地》杂志详细报导了一个案例：一个村庄的前村长在「土改」中被划为恶霸地主而遭逮捕，但在「纠错」运动中被重新划分成分，改定为中农并被释放；就在他返乡途中，曾把他定为「地主」的新村长却纠结手下人将他处死。

1956 年 11 月 5 日的《人文》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在土改中，非法逮捕和关押、剥夺财产，对地主(以及被错划为地主的普通农民)住宅的隔离(这造成了很多无辜儿童被活活饿死)，所有这些都不是党的领导有失误所能解释的，而是因为完全没有法制。」53 造成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党的专制和暴力摧毁了农村的秩序，建立了以「土改」工作队为代表的绝对权力。一个参加过「土改」的知识分子发表文章说，他当时被派下去报导农民的苦难和地主的残忍，但他看到的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回忆道：自己所属的「土改工作队」队长进入一个村庄后没几天，就组织大会用枪毙一个「地主」来提高农民的「革命精神」，还要求工作队员通过与农民结婚来「提高思想觉悟」。这位知识分子表示：「我对这种行为表示怀疑，但我一声都不敢哼。他（队长）动一动指头就可以把

我送进监狱!」54

越南哲学家陈德草尖锐地指出，在「土改」中，整个省和区一级的政权结构都被重新改造了，其目的是把「整个农民阶级痞子化」。55 根据「土改」的教训，陈德草强调，「自由的本质是个人自由」以及「自由的内容」必须由「自由的形式」来保障这个自由主义的原则。他的观点对共产党所主张的自由首先是集体的和社会的自由、以及实质的自由重于形式的自由构成了直接的挑战」 。他说：「自由的形式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在原文中用的是斜体，以示强调）……个人为共同体服务，但共同体必须建立在个人之上，在人民的法律范围内存在的个人自由的形式使得个人能够为建设共同体作出贡献。」56

在有关「土改」问题的讨论中，产生了对个人自由(权利)和法制的呼声，而实现它们的首要条件则是确保言论自由。《人文》杂志的最后两期曾为言论、集社和迁徙自由大声疾呼。当时河内还有很多殖民地时期或在法国受过专业训练的律师，他们从法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总结了「土改」的教训，甚至追究政府的责任。阮孟墙是当时的一位著名律师，他在 1956 年 10 月对越南国民大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设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调查「土改」中的「过火」行为；对干部的工作建立制度性的监察；把非官方的群众组织真正建成表达人民意见的渠道；实现建立在出版和新闻自由之上的言论自由。他强调说，在越南，政治权威至高无上，凌驾于经济和文化生活之上，这是导致「土改」中灾难性错误的主要原因。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长征和农业部长等党的领导人虽然承认了错误，但没有触及制度性的根源。他说，作为律师，在这样一个党政结构中，他无法判断什么样的个人能够为这样大的错误承担「责任」。

参加自由化运动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非常广泛，但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就长期坚持民族独立立场的老知识分子。第二类是比较年轻的的一代，他们的主要政治经历是参加「越盟」或越共领导的抗法斗争，包括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上文提到的陈德草、阮孟墙、陶维安和陈寅等人，就是这两类人的代表。此外，还有很多知识分子站了出来。邓范努是著名生物学家，他曾经在战争年代帮助越共就地取材制造抗生素，以克服森林生活中的种种传染病。女诗人刘氏燕(笔名翠安)是越南著名作家，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者，她在 30 年代编辑了两份很有影响的妇女杂志，出版过爱情小说《魂》。长友则是 40 年代初把

心理分析学引进越南的学者，他一直支持「越盟」的抗法斗争，尽管他反对它的很多具体政策。在年轻人中，文高是青年作曲家，北越国歌的词作者和谱曲者。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值得一提的是阮友灯。他是越共政府青年部副部长，在越共政治活动中非常活跃。当胡志明 1945 年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著名的「越南独立宣言」时，他是广场上群众集会的发动和组织者，并以此成名。他也是陈寅 1955 年 2 月请愿的参加者和关键人物，后来一直利用自己的地位、影响和关系，推动着自由化，保护知识分子，与素友、怀青等文艺界的党棍发生过尖锐的冲突。在一些被越共按照中共模式封为「民主人士」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中，出版家陈少宝具有代表性。他主持的明德出版社出版了《人道》、《佳品》和《新地》等刊物，为异议分子提供了阵地。

四、中越两国当局知识分子政策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当「斯大林模式」在东欧受到公开批判时，以「土改」、「镇反」、「思想改造」(「整风」)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毛主义模式，也在中国和北越受到挑战。当然，在严格意义上，毛主义的这些政策都可以在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并非毛主义的独创。例如，列宁早就主张，文艺是党的一条战线；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也把大量农民划为富农并消灭。尽管如此，这一整套政策毕竟是毛主义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主要特色，而且系统地构成了毛主义的精华。在中共能够有效施加影响的北越，毛主义就是越共的精神武器。正因为如此，当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向斯大林主义发起全面挑战时，北越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由化浪潮直接指向毛主义，而非斯大林主义。对国际共运的这段历史需要重新评价，它不但涉及到对北越 1955 年到 1957 年「自由化」运动的认识，也涉及到对毛主义的历史考察。需要指出的是，越南知识分子争取政治自由的努力与其中国同行的命运息息相关，而越、中两国当局应对这一挑战的举措也基本上同步同调，因此，1956 年到 1957 年间中、越两国当局的知识分子政策呈现出有趣的马鞍型同步演变。

1．1956 年北越镇压义安河的农民暴动却允许知识分子继续「鸣放」

就在北越知识分子向党挑战的同时，1956 年 11 月，北越农民向「土改」和

党在农村的组织发起了暴力反抗。这次农民暴动发生在义安河，那里是胡志明的老家，1930 年到 1931 年在这个地区发生的「义安－河静」暴动造就了越南的「苏维埃」运动。在这个越共的老区，「群众基础」似乎应该比较好。然而，恰恰就在这个地区，越共推行的「土改」政策极大地伤害了自己在农村的权力基础，令农民积怨甚深。1956 年 10 月底，越共中央全会承认，在「土改」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这个消息传到农村后，农民并未因为党认错了而感恩戴德；相反，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 11 月 5 日发起了武装暴动，大约有两万多农民参加。越共被迫调动其军队中的精锐第 325 师，一个星期后才将农民暴动镇压下去，大约有 6 千农民被杀或被强迫迁移。当时，北越义安河农民对政府的反抗，在规模上或许仅次于「匈牙利事件」，但今天很多研究者对此知之甚少。

毫无疑问，这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威胁到了北越政权的基础，本来应该增加越共的恐惧，使它对任何异议更加敏感和不宽容，何况这次农民武装暴动正好与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同时发生。但在匈牙利革命和北越本国农民的暴动被镇压之后，北越党不但放松了对知识分子的压制，而且还允许他们继续「鸣放」。当时正是中共置苏联和东欧对「百花齐放」政策的批评和抵制于不顾，号召知识分子在单位里和报刊上广泛向党提意见的时候。考虑到中共和越共之间联系的紧密，北越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宽松政策或许很难说是偶然的。

2．当时越共对中共的政治依从

当时越共在国内政策上对中共意见的重视，可以从中共自己的出版物中找到充分证据。至今中国当局对历史上中共和越共之间的政治关系(此处指中共如何影响北越的内政，而不是指军事、经济和南北统一问题)透露甚少，但还有线索可循。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说：「日内瓦会议闭幕前夕，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中央要求中国对越南巩固和平、扩大土改、接管城市、恢复和发展经济等工作进一步提出意见，并派人协助。」57 显然，中共自己也承认，它参与了北越「土改」的决策和实行，所以北越「土改」中的「扩大化」无疑与照搬中共模式有关。

北越镇压农民暴动的枪声未息，越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请中共就下列问题提供意见：「一，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和意见；二，为实现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工作任务；三，越南目前的财政经济状况与今后经济工作的任务。」58 其中的第一项

「目前局势」的含义非常广泛，当时共产党国家面临的「局势」中最重要的是「非斯大林化」和镇压匈牙利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而越南国内最重要的「局势」当然就是农民暴动和知识分子的抗议。

1956 年 11 月 18 日到 21 日，周恩来访问了河内。在与越共政治局会谈关于越南国内的情况时，周恩来说：「土地改革的成绩要肯定，有错误是难免的，纠偏不能抛弃正确的东西，这样才不会使自己处于被动，使群众失去信心。」59

1957 年 4 月，中共突然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与此同步，北越当局也放松了控制，允许异议运动再次活跃起来。

3．北越当局 1956 年到 1957 年对自由化运动之对策的起起落落

北越的自由化经历了两个时期，或者说是一个马鞍形的过程：第一个时期从 1956 年 8 月到 11 月，随着匈牙利革命被镇压而中断；随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打压时期；自由化的第二个时期是从 1957 年春到夏秋之交，在北京维持「双百」方针和宽松的政治气氛的背景下，北越知识分子又被允许重新「鸣放」；最后，随着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北越共产党也彻底剿灭了自由化运动。

从 1956 年 8 月到 11 月，北越的自由化运动经历了所谓的「《人文》、《佳品》」时期。从 11 月初开始，紧接着苏联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越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反击知识分子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催促政府采取行动的所谓「群众来信」。越共《人民报》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第五天发表社论说：「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离间党和人民，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之间制造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动的思想。」经过约一个月的宣传，12 月 18 日，根据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内市政府停止了《人文》和《佳品》的出版，关闭了这两份杂志的出版单位明德出版社，没收了市面上的这些杂志，还要求过去购买这些杂志的人将它们交出。当时国际上很多人都认为，就像在东欧一样，北越的自由化就此告终。例如，英国的《经济学家》特约记者在 1957 年 1 月 5 日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的阴影下：胡志明的方式」的文章。该作者认为，《人文》、《佳品》是在「非斯大林化」的气氛中和在中共的鼓励下越共放出的试探性气球，看看知识分子想走多远，党能容忍多久。「现在看来，无论如何这个实验是结束了。」

但令人意外的是，1956 年 11 月到 12 月河内的政治风暴并未持续多久。两个月后的 1957 年初，《人民报》的反自由化运动就失去了势头。所有在前两个月中

受批判或牵连的知识分子都安然过关，除了个别人调动工作外，没有一个人被逮捕或开除公职，很多人只是作了自我批评。Ninh 指出：这些知识分子「继续保留党和政府内的职位，在某些人那里甚至是领导职位，例如在出版社和文联执行委员会中」。例如，陈寅和黄琴仍然在文联下属的出版社工作。1957 年 2 月，北越全国文联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中竟然出乎意料地没有提到「《人文》、《佳品》」事件，只是说要和「错误倾向作斗争」。就连被认为是党在文艺界代言人的诗人素友(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也在大会的报告中说，「在文化和艺术活动中，我们可以也应该有在共同基础上的不同的倾向，因为这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所有观点和艺术倾向都可以而且应该从讨论中表现出来」。60

1957 年 5 月，北越文联出版了一份新的周刊《文学》(Van)，作为新成立的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在这份刊物的旗帜下，那些《人文》和《佳品》的作者很快就聚集起来，重新发表对文联领导机构甚至党和政府挑战的文章，「那些在前一阶段对他们的批判看来丝毫没有起作用」。因此，1957 年上半年北越的文化气氛和 1956 年底明显不同，越共不但没有强化批判运动，惩罚那些在 1956 年夏秋向党挑战的知识分子，反而允许自由化的倾向恢复和发展。《文学》虽然时不时地受到《人民报》上的文章的质疑和批判，但没有形成一个有声有势的运动或迫使异议作者沉默。Hirohide Kurohara 在他关于北越 1957 年文化政策的研究中认为，当时北越党有两条「灵活」的路线:「一条是尊重作家和其它知识分子……不强迫他们从事政治学习或体力劳动」，而在 50 年代上半期则是必须人人过关的；另一条是「在贯彻党的政策时采用温和的方法，力图通过说服和耐心讨论和知识分子达成共识」，在贯彻这一路线时，「那些执行政策的党的干部受到警告，要他们不得粗暴行事。」61 这个被恢复的自由化运动持续了大半年。

1957 年 7 月 8 日，越共领袖胡志明途经北京前往北朝鲜、苏联和东欧，此刻正是中共全面展开「反击右派进攻」的时候。8 月底，胡途经北京回国。两次路经北京时，胡都与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在胡志明公开的政治日程表上，他与中共领导人谈的只是越南南、北方为和平统一举行自由普选的问题，但人们很难想象，中国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和北越知识分子的第二波自由化运动会被排除在会谈话题之外，也很难想象，中共领导人会对从「双百方针」到「反击右派」的转变及其中之谋略不作任何说明。胡志明的中文程度非常好 62，他在中国

期间，只要翻开中共的报纸，「反右」运动就会有声有色地在他面前展开，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策略很可能会让他心有所悟。

中共刚发动「反右」，1957 年 7 月和 8 月，越共理论刊物《学习》便开始发表文章，发动对《文学》的批判，声称它的内容「极大地偏离了现实，偏离了生活、偏离了革命的责任」，为「资本主义文学的观点」提供了讲台。待胡志明回到河内，北越的政治气氛立刻为之大变，北越党开始部署全面反扑，完成在 1957 年初没有充分展开的政治运动。9 月 16 日，胡志明回国两周后，他在北越《人民报》上用化名「陈力」发表文章(毛泽东也曾用《人民日报》评论员的名义在「反右」运动开始时发表过「这是为什么？」)，标题是「粉碎右派」。胡志明用典型的毛式语言说：「右派是毒草。让我们把他们连根拔除，化作肥料，改善我们稻田的土质。」63

国际学术界一些研究 50 年代北越文化政策的学者，也从共产党国家政治形势的整体演变角度，指出中共对北越转向「反右」的影响。比如 Kurihara 认为：「苏共的二十大和反斯大林曾经促成了《人文》和《佳品》，中国的百花齐放也起了相同的作用」；但到了 1957 年夏，他们都改变了政策，特别是「中国的『百花』运动已经变成了反右运动」。64

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和批判，1958 年 1 月 6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文学问题的决定」，要求把那些「颠覆分子」从文学组织中清除出去，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教育」。于是，《文学》周刊被取消。接踵而至的是一场大规模而持久的政治运动，当局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北越知识分子中的异议人士和异议思想。越共没有正式使用「右派」之类的政治整肃范畴，而是用「反革命」、「反党」、「右倾错误」等罪名整人。1958 年 2 月，首批 172 名参加了「《人文》、《佳品》」运动的知识分子被送进「再教育班」；3 月又有第二批 304 名知识分子被送去。这些人中大约 300 人是作家和艺术家，其它人则是教育、文化和出版机构的人士或干部。与中共一样，越共让那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陈德草 65、阮孟墙、陶维安、陈寅、黄琴等)在报纸上发表自我批判的文章，名义上是清除散布的「毒素」，实际是对那些「小」右派们起到震慑作用，显示党的威力。《文学》被停刊后，新出版了《文学研究》，由党的文艺「理论家」阮廷氏主编，1958 年 5 月出版的第 1 期就刊登了大量「自由化」分子的自我批判。

越共对这些「自由派」分子的处理，也仿照中共根据「右」的程度不同而「区别对待」的做法。例如，上文提到的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这三位被正式逮捕；其它人有的被开除出文联(如潘魁)，有的人其文联会员资格被停止三年(如陈寅)，有的被撤销行政职务(如诗人黄琴的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撤销)。1960 年越共当局对安排了所谓阮友灯、刘氏燕和陈少宝等人「特务案」的审判，在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他们是「法国间谍」，分别判处五年到十五年的徒刑。北越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潘魁被下放劳动，就在当局准备给他安一个罪名加以审判时去世，他在「祖国阵线」机关报担任编辑的儿子不久也去世，死因不明。一个为越南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奋斗了三代人的家庭就此悲剧性地告终。

除了集中打击「自由化」的带头人物，越共也全面整肃绝大多数知识分子。1958 年夏，越共发动了大规模的「下乡进厂」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在「《人文》、《佳品》」时期的「政治表现」如何，都必须去农村和工厂，在从事体力劳动的同时接受「思想改造」。近年在中国大陆对北越的「反右」运动也有一些有限的介绍。例如，有一本书提到：「1957 年，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开展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对在《人文报》和《佳品》杂志上发表『毒草』作品的人展开批判，把这批人定为『人文佳品』集团分子，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有的被开除公职、软禁，有的被劳动改造，有的被投入监狱，境况都很悲惨。越南实行革新（即改革开放，本文作者注）之后，打成『人文佳品』集团分子中的某些人的作品又重新发表，但和中共承认反右扩大化和为多数右派平反不同，无论对他们本人还是对整个运动，越共都一直维持当初的结论，没有任何平反决定。」66

结 论

共产党阵营从 1956 年到 1957 年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和自由化运动，应该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考察，包括那些在苏共「二十大」和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以外的导致政治变化的因素。共产党阵营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心——边缘」的政治结构。作为共产党体制的主要模式，斯大林主义当时固然是最有影响的，但这并不排除毛主义作为另一个模式的存在和影响。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在 50 年代中期的那场自由化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

在这个意义上讲，用「非斯大林化」来概括那场自由化运动，是有很大局限的。对于研究毛泽东和中共革命的人来说，有必要认识到，毛主义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破产前二十年，就在中国和越南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否定。换言之，共产党统治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或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毛主义的批判，自 195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不过，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是那场自由化运动的主流，也由于中国官方对历史记忆的压制、抹杀和对历史真相有选择的披露，加上中国知识分子对毛主义在其它国家的影响了解不够，才使得那段历史的这个侧面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了解。

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当时的内容，既包括「土改」、「镇反」、「思想改造」和对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的控制这些在历史上形成的和在自由化中受到批判的部分，也包括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些新政策，如「双百」方针、知识分子政策的暂时调整和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等。这两方面的政策彼此是密切关联的。它们代表了 50 年代中期国际共运发生巨大变化、苏共的老大党地位动摇时，毛泽东和中共在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内寻求一种不同于僵硬严酷的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尝试，当然在这种尝试的背后也有毛泽东企图充当共产党阵营「龙头老大」地位的雄心。这些政策在东欧和北越的知识分子中得到强烈共鸣，促进了自由化的发展。「匈牙利事件」后，中共不顾苏联和东欧国家共产党当局的反对，不但坚持「双百」方针，提出「在人民内部存在着非对抗性矛盾」，还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无论毛当时是否决定「引蛇出洞」，这些政策在客观上延续了「非斯大林化」和自由化，这在北越的案例中尤其明显。但最终这种对「自由化」的有意操控导致的是更悲剧化的结果：毛泽东对政治异议运动采取的「引蛇出洞」策略和一旦政策转变后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手段是极其阴险和彻底的。如果说在东欧国家，异议运动在匈牙利革命后遭到了压制，那么，在中国「反右」运动是力图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异议运动在社会各阶层中连根拔除。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阵营的第一次国际性危机并非结束于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而是中共的「反右」以及它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

从研究中共党史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在「反右」前采取的宽松的国内政策，不单纯是为了「引蛇出洞」，还有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沽名钓誉的策略性目的。中共运用国内政策为提升和巩固其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服务，始于波匈事件，终于「文

革」。可以说，国内政策大幅度变动与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相互配合，这既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二十年执政史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线索。

——为2007年6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3期。

注 释

1　例如，Richard Hudelson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Willie Thompson 的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 (Blackwell, 1998), Geoffery Swain 和 Nigek Swain 的 Eastern Astern Europe Since 1945 (Palgrave, 2003)，Ben Fowkes 的 The Rise and Fall of Communism in Eastern Astern Europe (St. Martin's, 1993)，都没有提到中共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对东欧国家的影响。越南在1956到1957年的「自由化」和中共对越南的影响，更是在「莫斯科中心论」的视野之外(除了少数专门研究北越1950年代的历史学家注意到这点)。一位研究者甚至说：「可以肯定没有哪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它（非斯大林化）的冲击，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深，它们的发展和东欧国家不同，较少受苏联的影响，对斯大林主义的记忆不那么深刻。」很明显，他把北越排除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之外，更不用说中共的影响了。见 Willie Thompson 的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1945，77页。

2　对这个问题的早期研究见 G. F. Hudson 的「China and the Communist 'Thaw'」, Epilogue for Roderick MacFarquhar's 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aeger, 1960)。最近的有关研究见陈兼的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3　以上叙述综合了中国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和官方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时任中共中央俄文翻译的师哲的回忆文章，载《百年潮》1997年第2期，第11至17页。陈兼的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第6章也有描绘。

4　《赫鲁晓夫回忆录》（The Thomas J. Watson J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6），第418页。

5　见 William Griffith ed.，Communism in Eastern Europe：Continuity，Change，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MIT Press, 1964), Vol.2，p.101。

6　出处同上。

7　这「五项原则」是中共在 1954 年与印度的一份联合公报中首次提出的，在 1955 年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上，周恩来又再次正式提出这些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它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中共的官方表达中，这五项原则常常伴随着一个定语「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这个定语严格说来是多余的，但是中共常常要强调，为的是打消亚非国家对中国输出革命的担心。至于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似乎并不是中共当初提出它们的主要目的。

8　他在 1956 年春上书匈牙利党中央，同时送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一份。

9　Imre Nagy，On Communism，(Praeger, 1958) p.23.

10 Janos Radvanyi,「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and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China Quarterly 43 (1970)，p.23.

11 出处同注 5，第 242 页。

12 出处同注 5，第 103 页。

13 出处同上。

14 出处同注 5，第 104 页。

15 S. Shneiderman, The Warsaw Heresy，(Horizon Press, 1959) p.56.

16 出处同注 2，第 304 页。

17 陈清泉，「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炎黄春秋》，2000 年 9 月，第 6 页。

18 李越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第 127 至 128 页。

19 出处同注 4，第 271 页。

20 出处同注 2，第 307 页。

21 出处同上，第 304 页。

22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第四部，第 108 页。

23 Hoang Van Chi，From Colonialism to Communism：A History of North Vietnam，p.119.

24 方山编着的《马泰边区风云录》(21 世纪出版社 2005)有一章的标题为「学习

与党校」，专门介绍了有关情况。

25 见马共总书记陈平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Media Masters 2005)第28和30章。

26 潘魁是越南德高望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在1883年是河内总督，在法国占领河内前自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性人物之一。潘魁本人早在1907年就是越南知识分子反法运动的领袖，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支持越共领导的反法民族主义革命，成了越共重要的统战对象，他的儿子也被任命为越共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机关报的编辑。

27 Kim N. B. Ninh，A World Transformed：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Revolutionary Vietnam 1945-1956，(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pp.121-161.

28 河内这个城市曾被认为是西方和殖民主义在北越的象征。陈寅进驻河内后，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拥有房产的女士产生了爱情，党和军队不允许这种关系的存在，而陈寅却不愿为了党籍和军籍牺牲爱情。陈寅的作家好友、国家戏剧小组组长黄坎(他也参加了陈寅发起的上书和请愿活动)也由于和一个类似身份的河内女子产生了感情而自发要求解除军籍。

29 Nhu Phong，「Intellectuals, Writers and Artists」， in P. J. Honey ed.，North Vietnam Today，p.81.有关中共革命模式对北越的影响，可参看William J. Duiker，「Seeds of the Dragon：The Influence of the Maoist Model in Vietnam」，in Arif Dirlik，ed.，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Humanity Books, 1997) pp.313-341.

30 胡风是中共在文艺界的老战士和理论家，他代表原来在国统区的共产党文艺工作者，从40年代下半期以来与周扬等代表的延安来的文艺界领导就有矛盾，中共建政后这种矛盾发展成为文艺界的正统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胡风于1954年7月上书中共中央，批评当时的文艺政策和文艺界的领导人，尤其是批判他们坚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希望能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争取自由。除了创作原则上的分歧，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的专横和官僚作风也深感不满。虽然胡风根本无意挑战党的领导地位，但他的行动确实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文艺家长期以来在创作自由问题上的积怨，是中共和曾经追随它的革命知识分子之间在建国

后发生的第一次分歧。中共文艺界领导人不久就发动了反击，毛泽东本人将胡风及其追随者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于 1955 年 5 月发起了「反胡风」运动。胡风于 6 月被捕，直到「文革」结束才被释放。

31 指 1954 年越共在中共支持下打败法国殖民军的关键战役。

32 George Boudarel，「Intellectual Dissidence in the 1950S：The Nhan-Van Giai-Pham Affair」，in The Vietnam Forum，Vol.13，p.158.

33 出处同注 27，也见于 George Boudarel 的文章，见注 26。

34 出处同注 27，第 140 页。

35 虽然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中国的胡风对北越的陈寅有相当的影响，但陈寅之子陈崇武(出生于 1963 年，越南改革开放后赴美留学，现居法国，是美术家)告诉笔者，认为他父亲在 1955 至 1957 年间的思想和言论主要是他自己思考的结果，和胡风没有很大关系，研究者们只是根据胡风与他父亲的活动在时间上的先后和观点上的类似而想当然地认为他父亲受到胡风的影响。陈崇武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没有任何研究者能提出确凿的证据证明，陈寅十分引用过胡风的观点。如果陈崇武的说法成立，笔者认为，既然陈寅和胡风在重大问题上不谋而合，恰恰说明毛主义的文艺路线在中国和北越同时受到了自发的挑战。文中提到的那幅漫画见 http://www.historycooperative.org/journals/jwh/15.4/cheng.html。

36 有关陈德草参加越共领导的革命以及后来的遭遇，见 Shawn Michele，「Vietnamese Marxism，Dissent，and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Memory：Tran Duc Thao，1946-199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1(2002).

37 Bernard B. Fall，The Two Vietnams--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nalysis (Westview Press, 1986) p.188.

38 P. J. Honey，「Ho Chi Minh and the Intellectuals」，in R. F. Wesley ed., Vietnam：Anatomy of a Conflict (Peacock Publishers, 1968)，p.160.

39 Robert F. Turner，Vietnamese Communism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p.152.

40 周恩来报告的越南文译稿到 1957 年 3 月才出版。

41 70 年代后期，正是在黎笋担任领导期间，中越两党正式分裂，以致于爆发中越战争。1985 年底，黎笋去世，曾按中共模式主持「土改」的长征担任了越共总

书记。长征在越南政治经济面临全面危机的情况下，主张模仿中共的改革开放，主持了越共「六大」,废弃了原来由时任政治局委员的老左派素友起草的政治报告。越共从此走上了「革新」道路。

42 Ang Cheng Guan，Vietnamese Communist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Second Indo-Chinese Conflict，(Jefferson, N.C.：McFarland & Company, 1997) p.36.

43 黄文欢，《我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 1987) 第 277 页。

44 周新城主编，《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9 页。

45 这个刊物又分为《春天的佳品》和《秋天的佳品》两份(即 Giai Pham Mua Xuam 和 Giai Pham Mua Thu。这两个刊名也可译为「春华秋实」。「佳品」还可译为「佳作」，但「佳品」已成习惯译名。

46 这是一份大学生刊物，意为为百花所准备的新鲜土壤。在这份刊物上首次出现了「党国体制」的概念。

47 出处同注 32，第 165 页。

48 出处同注 39，第 153 页。

49 出处同注 32，第 167 页。

50 出处同注 27，第 146 页。

51 出处同注 32，第 158 页。

52 出处同注 27，第 150 页。

53 Turner，The Vietnam Workers' Party：Liberalization and Peasant Revolt，(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155.

54 出处同注 27，第 125－126 页。

55 出处同注 23，第 111 页。

56 出处同注 27，第 152 页。

57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第一卷第 94 页。

58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四卷，第 138-139 页。

59 出处同上。

60 Nhu Phong，「Intellectuals，Writers and Artists」，The China Quarterly, No. 9 (Jan. - Mar.，1962)，p68.
61 Hirohide Kurihara，「Changes in the Literarily Policy of the Vietnamese Workers’Party，1956-1958」，in Takashi Shiraishi and Motoo Furata ed.，Indochina in the 1940s and 1950s，(Cornell Southeast Asia Program, Translation Series Vol 2, 1992) p.180.
62 1966 年 5 月他在杭州休养，正是「文革」初起之时，他曾听取毛泽东的建议，前往浙江大学看大字报。
63 出处同注 32，第 170 至 171 页。
64 出处同注 61，第 189 页。
65 陈德草发表这样的声明后得以保全生命，他于 1990 年代去世。
66 出处同注 44，第 11 至 12 页。

试探 1957 年 4 到 6 月间中国国际关系与整风转向之间的关联

张轶东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感到有幸参加这次「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国际研讨会。我也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中共曾经大力培养，而后又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留苏学生。我在《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一书已详述了自己的经历，在会上就无需重述了。在这次会议上我想着重探讨一下整风前后，即 1957 年 4 到 6 月间，中国国际关系中发生的一些突变事件，对于整风突然转向的影响。

我将分三点来提出我的一些疑点：

第一，1957 年 4 到 6 月间的中美关系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1957 年四月，台湾蒋介石先生曾派代表宋宜山来北京与周恩来秘密谈判。宋宜山在北京当然也看见了「大鸣大放」的景象并报告蒋介石

的。当存在着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时，毛泽东需要制造一种「开明」景象，是不可能发动反右派斗争的。但是即使在五月中旬，在台湾发生美军军官枪杀翻译刘自然事件引起台湾一度的反美浪潮后，蒋介石也宣称他坚持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面。台湾代表宋宜山也离开了中国大陆。毛泽东制造 「开明」气氛的必要也大大减少了。这当然是使整风转入反右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即使是台湾问题没有解决，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是一直想和美国拉上关系的，这也导致他们需要在国内保持一定的「开明」气氛。其实早在 1956 年中共八大开幕以前，中国就曾派一个艺术团去拉美国家访问，其真实目的是看是否会被美国邀请。但美方未予理睬。1957 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期间，我是中国青年代表团西欧北美组的组员之一。上级传达命令说，这次联欢节后将要邀请数十名美国青年访问中国。在与美国青年代表团联欢的前一天，中方参与人员开了一整天的「预备会议」，交代了「注意事项」(我因不知有这么一个「预备会议」而和一个苏联姑娘逛公园去了，因此未能成为「参与人员」)。联欢后的确有数十名美国青年应邀随同回国的中国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但是这次访问并没有导致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接触。中共的宣传机器总是吹嘘 1971 年的「乒乓外交」是毛泽东的一步高棋。其实「乒乓外交」并不是诞生于 1971 年的新发明。早在 1957 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作过这一类的尝试。可以设想：如果 1957 年的数十名美国青年访华会导致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直接接触，即使反右斗争已经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可能令其刹车，或至少限制其规模，不使其扩大化吧？

第二，1957 年 4 到 6 月间苏联发生的一件大事

1957 年 4 到 6 月间苏联发生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的整风反右有无影响？

1957 年 6 月底，即在中国整风转为反右之后不久，在前苏联发生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企图搞宫廷政变推翻赫鲁晓夫未遂的事件。这件事是惊天动地的。因为在这事件中，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这是政治局在那时的称谓）十二名委员中，有八名站在莫洛托夫一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彼洛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洛夫和布尔加宁。在赫鲁晓夫一方的只有四人：赫鲁晓夫、米高扬，另二人可能是苏斯洛夫和库西宁。当时赫鲁晓夫的情况

岌岌可危。幸亏国防部长朱可夫（但后来也因功高震主而被赫鲁晓夫排斥了）支持中央委员们涌进克里姆林宫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中央全会一开，形势大变，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洛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改组后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把那八个人都换下来了。要知道：即使是在建国后的中共历史上，也没有在同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内改组政治局并换掉其三分之二成员的事件呀？

在 1956 年底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提出在中共高级干部内有人「里通外国」，实际上是「里通苏共」。这个人或这些人到底是谁，至今没有点名。反正已不是高岗，因为这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也可能是彭德怀吧？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说是他。

问题在于：既然在中共中央内部有人「里通苏共」，那么在苏共中央内部是否有人「里通中共」呢？国与国，党与党（尤其是共产党）之间的「里通」本来就是常事。那末如果苏共中央有人「里通中共」，这个人可能是谁呢？我以为，这个人可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里门特·叶福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

我手上当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有两个最大的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四月份伏罗希洛夫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访华，兼有国家元首和议会主席的身份，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接待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职务上更对口的应当是当时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然而毛泽东却「独揽」了对于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刘少奇几乎没有露面。人人都知道，毛泽东是不喜欢搞繁文缛节的礼仪的，但这次接待伏罗希洛夫却热情得反常，在机场又是拥抱又是吻脸庞的，还陪他游山玩水。更鲜明的对比是：1956 年米高扬三次来华，毛泽东对他都很冷淡，并且一再批评苏共对斯大林的作法。在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八大致贺词时毛泽东故意不出席，气得米高扬当天便登上飞机回莫斯科了。

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相处了几乎二十天，难道两人之间只谈了什么抽烟对健康是否有益的话题，而没有谈论前苏共二十大和斯大林问题。越是没有他们之间关于这方面谈话的报导，越是有可能怀疑他们之间不仅谈了这个问题，而且谈得很深，观点一致。但是讳莫如深，决不能失秘。

关于伏罗希洛夫在前苏共中央 1957 年 6 月全会上站在莫洛托夫一方的问题，

当时全会决议没有点他的名，这是 「照顾」他刚从中国回来的原故。但是不久他就被迫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位子上「退休」，由米高扬取而代之。点伏罗希洛夫的名和披露苏共中央 1957 年 6 月全会的惊险过程，是在 1961 年 10 至 11 月的苏共 22 大上作出的，那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实际上已经公开，尚未开始公开论战而已。

苏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即政治局）当然是在 1956 年的二十大上产生的。但随着当时国际形势的波涛汹涌，在其内部的斗争始终是很激烈的。中共中央可能不经常注意着苏共中央的内部斗争，甚至物色「里通中共」的人吗？1956 年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一度好转。6 月份在铁托访苏前夕，苏联政府突然解除莫洛托夫的外长职务，改由谢彼洛夫担任（但后来证实谢彼洛夫也是莫洛托夫一方的）。当时我正在从苏联回国度假的路上，以为这不过是苏联政府调整外交政策的一项措施而已。不想我回到北京以后，在教育部召开的回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留学生管理司长（前我国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处长）许铁民对我们说：「莫洛托夫受处分了。」这是苏联没有对外发表的消息，我国一名司局级干部就知道了。这难道不说明中共中央始终注意着苏共中央的内部斗争吗？

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怀疑过中国政府曾经试图影响美国的总统大选。对于 1989 年的前苏联八·一九政变，也有人怀疑中共有牵连（在政变发生后几小时中国的电视就转播了）。至于毛泽东支持波尔布特在柬埔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第三次大恐怖和大屠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共中央曾试图影响苏共在二十大以后的走向，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我的第二个疑点是：中共的整风运动原定是在 1958 年进行。为什么伏罗希洛夫回国后，毛泽东立即提议，要求立即进行整风呢？这里面毛泽东似乎有一个大的「算盘」。他这个「算盘」的内容不得而知，但这个「算盘」是必然存在的。

这么说吧：假如在 1957 年苏共中央 6 月全会上，莫洛托夫一方获胜了，那就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死灰复燃了。中苏两党一致了，毛泽东的压力不大了。那时即使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他是否也会限制这个斗争的规模，而不使其扩大化呢？

第三，不能把整风前后的中共中央看成铁板一块

不把整风前后的中共中央看成是铁板一块，可能成为探索整风转为反右的关

键障碍。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势大变了。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下，毛泽东已经从至高无上的专制领袖下降为中共中央领导集团中的一员。有一次周恩来在看戏时甚至告诫观众在毛泽东来时不可鼓掌，鼓掌者下次看戏时不发给戏票。

从 1935 年的遵义会议到 1943 年延安整风结束，中共高层经过多次权力的再分配。毛泽东是通过这些权力的重新分配而取得最高权力的。但是那几次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没有立刻通过党的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固定下来。然而 1956 年中共八大后的权力重新分配则是另一回事了。我们都知道，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分成了两线。毛泽东退居二线，对党国大事保持最终发言权。而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则仍处于一线，处理日常事务，手中握有八大党章，包括第 37 条必要时可设中共中央名誉主席一人。这可是悬在毛泽东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呀！

因此我始终怀疑毛泽东在整风开始时有必要费很大的心机去对付那些并不是他的主要敌人，并且端着共产党的饭碗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而把他的主要敌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线放在一边。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毛泽东还不可能搞九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以一举摧毁「刘少奇司令部」。他得一方面为自己的「二线中央」网罗人才（林彪、康生、柯庆施和江青等），这需要时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整风削弱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线中央，再度突出他最高领袖的地位。

在这方面我有三点旁证。第一就是前述的为什么本来定于 1958 年才进行的整风运动，在五月间伏罗希洛夫访华回去后，毛泽东就要求立刻开始整风呢？

第二个旁证是整风的方式。刘少奇要求的整风方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毛泽东则要求「大鸣大放」。这显然是因为这两种方式对于两线中央带来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更使我感到关系重大的旁证是：如果全面观察一下整风期间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分子们提出的意见，直接不利于毛泽东的部分（如个人崇拜问题）所占比例不大，而有利于毛泽东，批评共产党的意见则更多。在这些意见中，反对向苏联「一边倒」的意见明显是对毛泽东有利的。即使是「各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的那种意见，也只能动摇中共的执政地位而动摇不了毛泽东中国精神领袖和最高领袖的地位，即利大于弊。

记得 1957 年 8 月间周恩来接见美国青年代表时，有一个美国青年向周恩来提到他听说在中共领导人之间有意见不一致的问题。周恩来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我都不知道的事，你也知道？」那个美国青年打圆场说：「我对你的回答感到很快活！」这其实是欲盖弥彰。政治家之间从来都是貌合神离的。不要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菊香书屋开会时，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对毛泽东说的都点头。他们不过是早已知道了毛泽东的为人和性格，不敢唱反调而已。

总之，我的思路是：在 1957 年 4 到 6 月间，中国的国际国内党内形势扑朔迷离，瞬息万变。整风开始后的走向变量很大。前途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毛泽东不可能在那时预定什么「阳谋」或「引蛇出洞」。直到 6 月末，尘埃落定，才确定了整风转向反右。

关于反右扩大化我还想补充一点，即扩大化不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意愿，而是当时中国社会生存斗争的反映：从建国以来，运动不断，产生了不少吃运动饭的人（我在自己的书中称这种人为「运动派」）。「运动派」们是靠被斗争者们而过活的。任何单位，揪出的「右派分子」越多，就腾出越多的好位置给「运动派」们。反右斗争怎能不扩大化呢？这是共产党的斗争理论和实践决定的。其实从 1930 年的富田事变起到 1967 年的清查「五·一六分子」，哪一个运动没有扩大化呢？

请原谅我的思路可能不够清晰，也缺乏原始证据。谨愿与到会诸位共同磋商。谢谢！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意识形态的兴衰与知识分子的起落　　　　陈彦

极权主义概念将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与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其它各种专制制度区分开来，指出这两种极权制度的四大基本特征，即一党专政（党即国家，国家即社会），国家垄断经济及一切资源，意识形态专政，警察恐怖。而从意识形

态的内容、号召力的强度、大众认同的持久性及其普适性等方面看，相对于纳粹主义，意识形态专政是共产主义制度更为本质的特征。1 本文尝试从意识形态专政概念入手，从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专政演变的轨迹出发，比较发生于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与 1980 年代爆发的「新启蒙」运动的历史定位并进而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一、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的内在紧张

利用国家机器将一种意识形态强加于社会，以一种意识形态体系统摄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个人生活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一大发明。从苏东共产主义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制度实践来看，可以将意识形态专政分为意识形态认同和意识形态恐怖两个方面。所谓意识形态认同乃是通过各种教育、宣传手段灌输意识形态教条，要求人们无条件地认同，将教条当作真理来信仰。共产主义不同于宗教，宗教诉诸于人们的非理性的心灵需求，共产主义则宣称自己是科学，要求人们通过「理性」思考来达到认同的目的。换句话说，意识形态认同不仅要求人们信从，还企图同时垄断理性思辨的通道。意识形态认同也同时具有一神教宗教的特征，最为突出者即无处不见的排他性。为了达到意识形态认同的目的，共产主义不仅垄断一切思想、文化资源，也动员专政力量割断民众同外界和传统的联系，封闭社会的横向与纵向的通道。

意识形态恐怖是意识形态专政的另一面向。无论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机器如何强大、其各种控制手段如何无孔不入，要将千千万万个独立的个体思维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管道全部纳入同一思想体系和同一运行轨道，却不是单靠思想教育和认同动员就可以实现的。对那些顽固不化者、不堪教育者、信仰不坚者，必须动用专政的手段，一方面强迫他们接受正统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惩戒其它可能的动摇者。事实上，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垄断一切专政手段以镇压一切可能的和潜在的敌人。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建立其上的制度手段正是这种镇压的预设。这种制度不仅需要镇压敌人以维护其极权的一统天下，而且还需要制造敌人以便维持镇压机器并进而证明极权制度的必要和合法。利用人们对乌托邦的向往，通过对教育、传播手段的垄断来灌输教条、驯化异端，改造洗脑，达到意识形态认同；又以意识形态认同之名，镇压反叛，消灭异己，威慑大众，达成意识形态恐怖。

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交叉并用，互为目的与手段，这即是意识形态专政。

在意识形态专政内部，认同与恐怖虽然互为补充，但二者也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意识形态专政的演变一方面决定于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同意识形态专政的这种内在紧张密不可分。意识形态认同的内在前提是意识形态应为颠扑不破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意识形态恐怖则实际上表明意识形态并非无坚不摧的思想利器，意识形态认同仅仅靠灌输教条是无法达到的。意识形态专政必须借助思想教化以外的暴力手段才能确立。整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制度实践表明中国的意识形态专政一直是认同与恐怖两手并用，二者互为表里，难以分割。但细观从 1949 年到改革开放的历史，也存在着一条由认同动员与恐怖专政并重而逐渐走向强化恐怖的极权主义演进的线索。

二、意识形态专政史上的 1957

从这条线索着眼，可以将 1949 年至今的中国历史分成四个阶段。

一、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 1957 年反右，是意识形态专政的确立阶段。

二、1957 年到 1976 年文革结束为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阶段。

三、1978 年至 1989 年六四屠杀为意识形态专政的衰变阶段。

四、1989 年之后中国则进入后意识形态阶段。

从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开始，为了建立意识形态专政，中共即采取灌输与恐怖两手政策。1951 年 5 月开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1 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2 年的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1955 年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等属于前者。建国伊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 年底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 到 52 年的三反、五反运动，1955 年肃反运动等则属于后者。1957 年以前，尽管中共镇压运动不断，但对知识分子而言，主要趋势仍然是以灌输意识形态教条为目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镇压是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的。反右表明中共意识形态专政的正式确立，是共产主义这一套思想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全面落实并取得统治地位的标志性历史事件。不少研究者看到，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大转折，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后走向大跃

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从意识形态专政的角度看，反右运动正是从意识形态认同向意识形态恐怖的转折。

反右中的「右派」，以解放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为旗帜。这一代知识分子，有曾经与共产党同为多元社会中的政治盟友，如章伯钧、罗隆基；有在建国前已对中共有着清醒认识的自由知识人，如储安平。对于建国之初的中共来说，保留并任用四九年以前的少数上层精英，有利于传达开明盛世的信息，有利于增强共产主义政权的道德感召力。从整个知识群体来看，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并不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但同情或认同共产党宣扬的平等、均富等左翼价值及独立、图强等民族主义理念，对共产党心存幻想；一种是对共产主义理想怀有真实信念，并企图以理想检验现实，进而希望按照共产主义乌托邦情怀改造一党专政下的社会现实。

三、反右再解读

在 1957 年作为反右斗争前奏的「鸣放运动」中，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鼓励与推动下，这些知识人敞开心扉，从各个方面分析中共建国之后的局势，针砭时政，指出了当时政治走向独裁，社会渐被窒息的危险转向。从目前对反右运动的评价来看，尤其是从共产党先有整风鸣放在前，批判镇压右派在后的这一时间顺序出发，存在两种看法：一种是著名的「阳谋论」。即毛泽东此前提出的双百方针，鸣放整风是反右斗争正式启动前的「阳谋」阶段。阳谋阶段也就是所谓「钓鱼」或「引蛇出洞」阶段，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反右斗争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对于这一分析的最好论据是毛泽东自己的话：「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2 从这一立论出发，当时的知识人之所以敢于对共产党提出批评建议，乃是因为未能抵抗住毛泽东「阳谋」的诱惑，上了共产党出尔反尔的当的原因。

第二种说法正好相反，即反右运动根本不是预先策划的具有战略先见的所谓「阳谋」或「引蛇出洞」。反右运动从鸣放开始到镇压结局，恰恰由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对于当时形势的错判。鸣放一旦启动，批评言论滚滚而来，毛泽东感到处于被动地位，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应变措施而实施的紧急镇压。这就是毛泽东

本人于 1957 年 5 月 15 日所说的「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种论点可以归纳为「镇压论」。这两种说法看上去似乎针锋相对，但实际均是从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的动机出发分析反右运动。

将反右运动带入意识形态专政的分析框架，我们看到，无论是事先设置圈套的「阳谋」，还是事后调兵反击的「镇压」，均是意识形态专政的两个层面的一体两面。「阳谋论」的预设是毛泽东一开始就认为无论是在教育界，文学艺术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还是民主党派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可能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而意识形态恐怖是唯一的手段。而「镇压论」的预设则是毛泽东在当时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充满信心，发动鸣放之后才发现共产主义并非如此得人心，建国之后强大的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也并非如此有效，共产主义政权因而也并非如此巩固。于是，镇压成为必须。

从这一视角切入，问题的关键点不是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的动机，而是反右运动的对象——知识分子这一阶层如何面对意识形态专政这一史无前例的极权主义国家形态。在目前各种反思反右运动的著述中，不乏对于共产党、毛泽东翻云覆雨、失信于民的控诉。对反右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以「诬陷」、「栽赃」为手段而罗织罪名的批判也屡见不鲜。最近郭罗基先生在《历史的旋涡》一书中总结「反右运动」整人术有「捕风捉影、强加于人、去头掐尾、本末倒置、穿凿附会、混淆黑白、偷梁换柱、向壁虚构、无限夸大、含血喷人、一棍打死等」各种手法，一应俱全。3

对于共产党在反右运动及其它类似运动中所使用的卑劣手段当然需要清理和反思，不过这类清理却不应该自我局限于受害者的视域。仅仅从共产党与知识人的关系上讲，从拥护还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的角度来讲，将众多的理念上认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人打成右派也许是一场「误会」，主观上讲他们也的确是「无辜」的。然而，从意识形态专政的角度讲，如果意识形态专政的目的是为了阉割独立精神，造就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隶的话，那么，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建议，无论多么善意，多么中肯，只要他们还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就只能表明他们仍然保持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建国后铺天盖地的共产主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丧失思想与判断的能力。从极权主义逻辑看来，知识人保持着思想能力与独立精神这一事实本身就是极权机器的失败，就是知识人的罪孽。换句话说，反右运动

的本质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一场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上当受骗，共产党翻脸不认人的卑鄙与冤枉互植的历史「悲剧」。反右运动的本质一方面是共产极权主义自我扩张并进而全面控制社会，禁锢思想的全能逻辑的必然归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国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驯化的伟大抗争。

从当时的右派言论来看，不少批评谏言是直指共产党的合法性的。如储安平指责「党天下」，章乃器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张百生、黄振旅甚至说共产党「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章伯钧建议将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改成四个政治设计院，黄心平更是直言共产党应与民主党派轮流执政。4

如果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这些建国前的政治精英的民主言论乃是「旧」社会、「旧」教育的残余的话，反右运动所体现出的共产党意识形态灌输的失败也体现于共产党建国后培养出来的一代新人如林昭、林希翎这一代大学生身上。著名右派人大学生林希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林希翎面对项目组的教诲与训斥，始终没有「悔过」，终于被送上劳改之路。从思想交锋的角度，林希翎被送入监狱的那一刻，则意味着极权思想自甘失败。她的生命的闪光是由于她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确立时期站出来捍卫了理想的纯正。她的不可驯服的事实，直抵中共意识形态教化的底线。5

从反思中共极权主义总体演变出发，纵观反右期间的右派言论，反右运动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大量的鸣放言论显示，1949 年以前，自由民主已经深入人心，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国人精英对民主建国、多党制度、言论自由已有共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由西方强行闯入中国而开启的中西汇通的近代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之久。经过几代中国知识精英的不懈努力，源于西方的现代价值实际上已经全面植根于中国文化。

第二，1949 年到 1957 年，中国言论、思想环境相对宽松。新建立的共产主义政权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暴露出其极权面目，另一方面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彻底取消旧有社会管道。原有的在多元环境下接受教育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所谓旧知识分子）仍然能够通过现存渠道将民主、自由理念传输给青年一代。这是北大、清华、人大等校园内大学生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参加「鸣放」，对当时体制提出质疑的知识社会学背景。

第三，反右前的「鸣放」虽是共产党发起，但知识人抓住时机，为自由、民

主、多元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和不屈的抗争。从总体上检示右派言论，受到共产主义乌托邦所诱惑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仍然保有敏锐的观察和深刻的洞见。不到十年的共产主义实践，应该说知识分子的整体已经感受到极权主义的真实。即使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公共空间窒息而无法交流与辩论的一党专政的背景下，知识人的判断力并没有因此而萎缩，独立精神仍然不灭。这一精神既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士人精神一脉相承，也是经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所结出的果实。49 年之后的中国虽然是共产主义依靠国家机器力量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统治的一统天下，但知识人的批判能力并没有因意识形态强制灌输系统的确立而丧失，也没有因为肃反以来的较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恐怖而受到根本伤害。这一代知识人并没有如专制者所预期的那样臣服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新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来说，对这些无法被意识形态俘获的具有独立思想能力的知识分子，从肉体上给予镇压于是成为必须。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右运动昭示了中国一代知识人对极权主义国家机器的全面抵制，宣判了以思想改造为主要手段的意识形态认同的失败，迫使毛泽东、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不得不从意识形态认同与意识形态恐怖两手并用转向以意识形态恐怖为主要手段。

四、1980 年代到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启蒙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反右运动隐藏着共产极权主义运行的双重轨迹。第一是所谓全控型国家逻辑，即国家政权将控制社会生活的全部作为自己存在的主旨。也就是说，一旦共产主义作为制度登上了某一个国家的历史舞台，它的全部目的就是将社会与人生的一切统统纳入自己的运行轨道。中共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每次运动既是全能国家对仍然存在的社会的野蛮吞噬，又一步一步将全控型国家推向顶峰。最近鲍彤先生就反右运动撰文指出：「反右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转折点。它为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后继续无法无天探明了道路。反右的受难者主要是知识分子，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受难者就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了。反右派斗争封了党外人士的嘴，到了反右倾斗争，就来封党内干部的嘴了。反右派以文字狱为主，文革公然提倡文攻武卫，到了天安门镇压，就是血淋淋的坦克加冲锋枪了。」6 这段文字无疑是对这一极权逻辑的极好阐释。

第二便是意识形态专政的轨迹。在中共建国之初，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发

散出乌托邦的理想光芒。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强化了新兴意识形态专政制度的恐怖向度，暴露了这一政权在思想领域施行专政的真实面目，因而开启了共产主义乌托邦幻灭的过程。对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反右镇压使得作为社会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殒落。反右之后，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知识分子不仅作为群体已不复存在，作为具有独立立场、批判意识的个体知识分子也几近绝迹。面对恐怖与认同的双重夹击，知识分子几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臣服，要么灭亡!

在论述列宁主义的思想来源时，法国苏联问题专家阿兰·贝桑松教授注意到一个知识阶层的悖论: 意识形态的在场是知识阶层得以降生的决定性条件之一，而意识形态一旦获得统治地位，也就意味着知识阶层的瓦解 7。飞鸟尽而良弓藏。按照这一分析，反右之后，中共意识形态专政正式确立，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于是结束。然而，到了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国极权主义演变的现实却奇迹般地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又一次重生的机遇。

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共产主义走向晚期，我们目睹的却是一个正好同知识分子随意识形态确立而瓦解的现象相反的历程：知识分子通过与意识形态决裂而凤凰涅盘烈火重生。八十年代是新一届领导人发起改革的年代，也是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启动一个重要的历史进程的时期。这一进程即是我所称之为的「意识形态解构」.8 这一进程由两大相互联系但又有质的区别的运动组成。首先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一运动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发起，旨在为文革后的改革提供一个较少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思想解放一旦启动，便迅速地超出了邓小平预设的界限，突破政治实用主义的羁绊。随着知识分子的全身心投入，在思想解放的名义下，诞生了稍晚被称为「新启蒙」的「民间」思想运动。新启蒙运动同官方推动的思想解放有着同源的动力基础：官方的思想解放需要突破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以恢复党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因此获得了解构意识形态的历史契机。但是随着启蒙的推进，知识人很快超越了工具性的范畴。知识界作为思想、理论更新的主体，经历了从改革派的同路人、同盟军到独立思想者的演化过程。突破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打破思想禁锢的枷锁，探求真理，拥抱自由是知识人最后走出极权主义政治逻辑的内因。

1978 年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知识分子重生的一个象征性历史事件。从毛主义回到元典马克思主义，中经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的辩论再到规模空前的「文化热」，

中国知识分子与党内改革派以回到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正统之名，一砖一瓦地拆除中共自建党之初开始建构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厦。他们试图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虚幻中走出来，重返中国真实的历史情境。

新启蒙运动的形成和推进标志着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共极权主义走向没落时代的新生。利用极权主义政权政策调整而生发出的讨论空间，知识分子获得了重生的条件；解构意识形态的共同目的使得知识分子群体重新聚集成为可能。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肇始于70年代末的这场思想运动，是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最为壮观的知识革命。不仅在推动中国人走出愚昧主义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影响深远的中国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引。

随着知识分子回归社会中心和走向思想独立，知识分子前行的路上无疑再次遇到了政权的力量。前者继续探索真理之路，而后者则回归到维护独占权力的极权统治逻辑。中国知识群体在二十世纪末年与中共政权的最后一次结盟最终以统治者的六四屠城而戛然而止，中国的知识阶层再一次被血腥剿灭。

五、1957与1980两次抗争的历史定位的异同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1957年的反右运动与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两件历史事件标志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之链上的两个历史转折点。1949年中共在全中国范围内的胜利，既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成功。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在内的当时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对共产党抱有期待。建国后大批海外华人精英归国也显现出当时的中共及其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仅仅从意识形态层面讲，中共49年的胜利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对于中国的知识人及众多的海外华侨，共产党在中国建立政权是民族主义加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混合体的胜利。然而，此时的共产主义所传达出的乌托邦幻象的向心力依然不可忽视。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这一幻象的最初冲击。按照中共官方的数字，全中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共有55万人之众，丁抒先生认为全国共划右派总数为一百二十万9。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处于极权化的过程中，一旦被划为右派，轻则撤职降级，重则流放他乡、劳动教养。当年的右派，为人歧视，受尽屈辱，一人落难，全家株连。苟且偷生者众，侥幸逃脱劫难者寡。中华民族的几代知识精英，

即使没有被一网打尽，经此一役，业已溃不成军。反右由诱导向共产党提意见，到围剿推动共产主义改良的知识分子，意图从精神与行政两方面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反右运动是中共从经济建设转向阶级斗争，最后走向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反右的结果，毫无疑问加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同反右加强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政相反，六四惨案对八九学运的镇压意味着意识形态统治的崩溃。八九学运发生于中共意识形态衰变的八十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由于中共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的意识形态暴力洗劫，共产主义理想光芒已经黯然失色。经过官方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民间新启蒙潮流的冲击，残存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大厦已经摇摇欲坠。正是由于自由、民主、人权等新思想、新观念的涌入，才使得青年学生走上街头，发起了呼唤民主、推动政改的八九民主壮举。反右由共产党全盘操控，八九则意味着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主导能力。八九学运虽不是共产党所发起，但学生的出发点仍然是推动共产党的政治改革。这一运动以六•四悲剧结束，结果不仅不是加强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而恰恰是给予了意识形态大厦最后的一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固然没有因为六•四而同柏林墙一起倒塌，但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幻象则从此寿终正寝。中国于是走上了一党专政加自由经济的垄断资本主义之路。

六、如何面对后意识形态的极权社会

纵观整个意识形态专政的历史，知识分子群体实际处于整个中华民族现代悲剧的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可以是特定意识形态的创制者、传播者，也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奴隶和祭品。共产主义将意识形态统治推至极端，既强化了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专政之中的特殊地位，又将对知识人的奴役作为向全社会强加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首选和象征。在意识形态专政的每一个转折点上，知识分子都起到了关键作用。1957 年反右时期悲壮的抗争，凸显了知识分子不甘屈服、追求自由的独立精神。此后，中国社会步入意识形态专政的巅峰时期，驯服乃至成为政权的帮凶一度曾是知识人维系生存的唯一可能。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借助极权主义萎缩的历史契机，重振雄风，为最后彻底推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统治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如果将 1957 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批判和 1980 年代以解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主旨的「新启蒙」

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史上知识分子奋起抗争、呼唤自由的两大高潮的话，两次高潮的不同结局却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课题。反右之后，以独立于国家政权并具有批判意识的社会良心作为定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社会已不复存在。1989 年以后，意识形态信仰系统解体，极权社会进入后意识形态时代。当今的中国，无孔不入的极权制度虽已失去了乌托邦的光环，但知识分子却又必须面对政治高压与物质诱惑的双重困境。如果说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的伟大历史运动中，知识分子曾经展现了勇气、智慧和力量的话，意识形态解体之后，知识分子群体是否仍然存在呢？八十年代之后，新启蒙思潮在中国仍然生机勃勃。民族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义等讨论此起彼伏。然而，既使是在九十年代，由西学向「国学」与「实学」的转轨，由激进向保守，由浪漫向现实的转向也已体现出中国知识界淡出公共领域的前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类似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的思潮辨析似已成为时代的绝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东西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消退之后，知识分子已无用武之地。欧美多数舆论虽然不认为历史从此终结，但知识分子退出时代的前台似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共识。有人总结，当代知识群体的隐退除了意识形态退潮这一大的历史背景及知识分工的日益细密所导致的知识人的专业化因素之外，决定性的原因是公民社会的壮大在很大意义上已经取代了当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10 反观中国，公民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业已形成，但独立于国家政权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仍处于襁褓之中。知识分子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难道就已消失于中国社会舞台？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释

1 关于中共极权主义的批判，参见拙文「试析中共极权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逻辑」当代中国研究 2001 年 第 1 期。

2 1957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

3 郭罗基，「历史的旋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 年 4 月

4 华民，「中国大逆转 ——反右运动史」，明镜出版社，1996年12月，第四章。
5 参见99年3月号「北京之春「拙文「从意识形态认同到意识形态恐怖——释读《不可驯服的林希翎》」。
6 见「新世纪」网站 http://www.ncn.org
7 Alain Besancon，法国科学院院士，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u léninisme，（列宁主义的思想起源）巴黎 Gallimard 出版社，117-119页
8 有关意识形态解构问题请参见拙著「中国之觉醒——文革后中国思想演变历程1976－2002」田园书屋出版，2006年8月
9 丁抒《阳谋》，香港开放杂志社2006年5月第310页。
10 参见 Didier Eribon,《D'une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 : Et de ses effets sur la gauche francaise》 Editions Léo Scheer 2007年3月

1957：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 朱正

一 「消失」的主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近现代才传入中国的西方符号。在中国承载这个符号的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上异于西方知识分子，在个体的养成和群体的结构上也异于西方知识分子。

在近现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西方教育制度的引入和逐渐普及，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成了拥有各种学历的文化人，成了术业有专攻、承担传播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

「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有两种理解。这个概念可能基于时间的界限，把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区分为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从群体功能延续的时间逻辑上讲，由古代而近代而现代，不会断续消失，除非出现了断裂。「现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也可以理解为类型的分别，有传统知识分子，也有现代知识分子。当然也有的个体，既现代又传统，比如鲁迅、胡适；也有的个体，既非现代也非传统，两个方向的异化交织，使之成为知识、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异

数，比如毛泽东。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后，这片大地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吗？

如果没有，本书的主题就失去了主体，那么，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如果有，有多少？他们都在哪里？

如果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的良知，那没有了良知，就都不应该算作知识分子了。这样看来，从失去良知起，这个知识分子的个体就已经「消失」了。

如果整个知识分子的群体、或者其中的某些类型，虽然把社会良知藏在心底，但是他们或者丧失了维护社会良知的勇气，或者失去了维护社会良知的机会和力量，那他们该不该被算作「消失」了呢？

二　「消失」的时间点：1957 年

把「1957」作为本文标题的一部分，只是为了指称的简洁，而不是强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消失」在 1957 年，这一年既不是「消失」的起点，也不是「消失」的终点。「消失」的程序在 1957 之前三十年就已经启动。「消失」的高潮在 1957 之后十年更加惨烈，「消失」的余绪三四十年后还在波动。

强调「1957」，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反右派斗争。

1956 年 2 月苏共「二十大」用「反对个人崇拜」批评斯大林；1956 年 4 月毛泽东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6 年 9 月中共「八大」召开，对于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欢迎的。以为这些预示了政治格局将有所变化，自己可以有一番作为了。民主同盟的领袖章伯钧对罗隆基说：「现在我们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可以大做特做。」1 他情绪高昂，就来考虑民主同盟和他的农工民主党(由第三党衍变而来)的发展组织、开展工作这些事情了。

这几个月里，在遥远的东欧发生的一些事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气候。

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感到兴奋，反应却还是颇为平静的。在受到苏联影响更大、更直接的东欧，反应要强烈得多。1956 年 6 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军队镇压示威群众，死七十四人，伤九百多人。10 月，由曾经被整肃的哥穆尔卡取代奥哈布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匈牙利的乱子闹得更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迫下台，最后是苏军出动了坦克车才把遍及全国的骚乱

镇压下去。

中国知识分子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使毛泽东十分反感。1957 年 1 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

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毛泽东的思虑中，可以说是有了一个「匈牙利情结」。他在考虑中国也出一场「匈牙利事件」的可能性。他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敌对阶级，「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他甚至作了这样极端的估计：「无非是出全国性的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北京来。我们无非再到延安去」。

话虽是这样说，但他心中想的，当然是力求避免出现「匈牙利事件」。采取什么对策来避免呢?他想到的一项对策，就是开展整风运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就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匈牙利之后几天召开的，波匈事件是会上的热门话题。就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这时，他所设想的整风运动是什么意思呢?在这篇讲话中，他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所以，教授还是怕无产阶级大民主的。」

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这一段话，就好懂了。有两种「大民主」：匈牙利事件那样的群众上街，以及不久之后右派分子的大鸣大放乱鸣乱放，是资产阶级的大民主；而整风运动，人人过关，发动学生来斗争教授，如同前几年行之有效的思想改造运动，或者几个月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想一想他说的「整风就是思想改造」这话，就不致对他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有什么误解了。由此也就可以知道：通常说的「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这话，未免有点隔膜。在毛的思虑之中，反右派斗争是整风运动的实质，或者说是整风运动既定的最后阶段。这里面说不上有什么转变，尤其不能说有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有些人之所以会认为是由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只是因为他们所说的整风运动并不是毛心中所想的、并且明确说了「就是思想改造」的整风运动，而

是他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那是以最大的好意去解释〈整风指示〉字面的含义。看到实际出现的情况同他所希望的并不相符，于是就以为是转变了。

发动整风就是为了避免「匈牙利事件」这意思，在毛泽东写的一份党内指示中说得更加明白：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还好，挤出脓包)，利益极大。

这一段话见于 1957 年 6 月 8 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2。这正是反右派斗争公开发动的日子。这个指示是被看作宣告反右派斗争开始的发令枪声的。它表明整风即反右，目标就是防止「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是带着他的「匈牙利情结」进入 1957 年的。在 1 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讲了他的一些具体的思考。

一年以前，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谈到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改造两个方面，而侧重点在改善安排。这时毛泽东的说法却不同了，他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谈到民主党派，毛泽东注意到了，「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不过，他又说，「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基于这样一种估计，重要的是，决不可以让他们变得「有本钱」。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对待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办法：

……我们把资本家包了下来，还给他们七年的定息。……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

所谓出钱买，是对资本家说的，就是给定息的意思。所谓安排点事做，是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说的，给安排点政府机关的职务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目的也是在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这时毛泽东还在想用捧的办法而不是压的办法。并不是压不下，半年之后的反右派斗争，就是改用压的办法来彻底剥夺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政治资本，在他，似乎更加得心应手。不过，至少在 1957 年 1 月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说要用压的办法。由此看来，似乎不能认为这时他已经在准备一场后来那种具体形式的反右派斗争。

1957 年 3 月，毛泽东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分别邀了到会的教育界干部、文艺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在同文艺界代表谈话的时候，周扬提出：秦兆阳用何直的名字写了一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有人批评他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很紧张。毛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时不能搞清楚，不能做结论，也用不着紧张，可以研究讨论。」3 在谈话中，毛还说到了假如鲁迅还在世会怎样的问题。他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 4，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5

3 月 12 日，毛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主题讲话。在讲话中，他分析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他说：「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这种人在五百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6

在这篇讲话中，毛提出了一个百家争鸣实质上即两家争鸣的论点。他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7

原来，他所提倡的百家争鸣，并不是知识分子所理解和希冀的那种不同学派的自由争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通过这种「争鸣」来克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最终达到一家独鸣的结果。

使毛泽东震怒的，是民主党派活跃起来了。1957 年 3 月，民盟开了全国工作

会议，章伯钧在会上提出：要重新估价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要大大发展组织，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组织发展到县一级。不久，民盟中央又成立四个临时研究组，分别研究高等学校党委制、科学体制、有职有权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四个问题。他们这样做，表明他们希望民盟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文教、科学这些主要是知识分子活动的领域中，有较多的发言权，起较大的作用。这些，就是毛泽东无法容忍的「党要扩大，政要平权」。那样的一场反右派斗争就是无可避免的了。

胡乔木为《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23 日）撰写的社论《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中，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引来了一大段话，其中宣称：「无产阶级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胡乔木对列宁这话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意思「是说不与任何人分掌政权的领导」8。读了这篇社论，那些已经被安排了各级领导职位的民主人士该不会再抱怨有职无权了吧。

其实，当年毛对民盟的积极性别有警觉。罗隆基在作检讨的时候说，他的这些活动，目的只在于「扩大民盟的影响，扩大民盟的组织，提高民盟的地位，能够在国事的决策上取得较多较大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我的妄想亦只此而已，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的阴谋。」9 这并不是为了乞求宽恕而作出的一种姿态。他真是这样想的。就大的倾向来说，几年以来，他久已习惯于这样的角色了，总是持一种十分合作的态度。这里可以举一个例。1956 年 6 月，就在陆定一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之后一个月，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这样谈到他对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他说：

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10

罗隆基苦心孤诣分辨两个不同时代的「百家争鸣」，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他在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就好比在一个管弦乐队中，他愿意在这个有

组织、有领导、有指挥的乐队里参加「争鸣」。

当年民盟做的许多事情，本意是想来帮点忙的，结果却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就说6月6日民盟六教授的集会，这是直接引爆反右派斗争的雷管，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当时在场的叶笃义回忆说：

6月初，局势继续发展，北京一些大学有学生闹事的迹象，声称要「驱逐校党委」，而校党委按照党内指示听之任之，不做一声，一些学校秩序大乱。出于对各大学的忧虑，6月6日民盟副主席章伯钧、史良在南河沿文化俱乐部邀集曾昭抡、吴景超、黄药眠、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等六教授，当时参加者还有胡愈之和我，了解各校情况，分析形势。由于我们当时不知道党内「引蛇出洞」的策略，误以为一些大学的党委已经瘫痪，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因此，拟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并决定次日就去北大。当晚史良因参加国务院会议，有机会见周总理。因此叫她就便与总理商定时间，通知六教授一同去见，当面请示机宜。规定史良在取得总理的同意后，立刻用电话通知我，再由我用电话通知他们六位。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到半夜，最后知道这个建议遭到总理拒绝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六、六、六教授」事件的全部经过。11

民盟这样活跃，毛泽东看在眼里，怒在心里。1957年6月8日，毛写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其中提出了他预防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办法：

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126月10日，毛又写了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的秘密文件，毛估计：

各党派中，民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钧、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秘密指示下达才几天，湖北省就制造了一个马哲民（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6月12日，汉阳县第一中学有几百学生因升学率问题罢课，上街游行。8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以《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为题的长篇通讯，将此事大加渲染。马

哲民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民盟湖北省委主任委员。说这次学生闹事是马哲民策动的，也就是民主同盟或曰章罗同盟策动的了。要把这件事情挂在民盟的账上，有一个困难，就是汉阳县一中并无一个民盟的人，民盟还没有来得及去发展组织。后来找到了这样一个线索：县文化馆的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是民盟盟员，又是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此人曾经按照中共汉阳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过汉阳一中中共支部洽商发展盟员的事，谈到过发展该校副校长王建国的意向。好了，这就够了。就凭这一点，《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就能够把这一次纯粹自发的学生闹事同民盟挂起钩来了。文章说这次学生闹事是：

在章罗联盟驻武汉的大员马哲民的策动下，以汉阳县民主党派联合小组长、民盟盟员杨焕尧和民盟发展对象、汉阳县一中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在汉阳县机关所在地蔡甸镇制造的一次他们自称的「小匈牙利事件」。13

杨、王二人，再加上一个被认为是王在校内的亲信锺毓文，三人不久即以反革命暴乱罪枪毙了。同案判徒刑的十人，送劳动教养的三人，还有几十人受了其它处罚。直到 1985 年，经过中共湖北省委复查，并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才为此案彻底平反。14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当年为了打击民主同盟，什么伤天害理的手段都使出来了。

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声色俱厉地质问：

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这一切岂不是做得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他们难道不懂得这个真理吗？

这篇社论宣告了反右派斗争的开始。

三　「消失」之前的声音

薄一波回顾整风反右，有一句话：「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15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当年划出的右派分子是五十五万多人。他们每一个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具体原因，可说是千差万别。并不一定真要本人有什么过失，有的仅仅是因为民盟盟员的身

份，有的是因为私怨，有的甚至只是因为要凑足数目，等等等等。因为这些就可以把一个人「打成」阶级敌人，也就足以表明这种政治体制可怕到什么程度了。不过也有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并没有这样大的冤枉，他们或者在整风鸣放的座谈会上，或者在大报小报乃至墙报黑板报上发表了触犯六条政治标准的言论。

这里，我们就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提出了些怎样的主张，这些主张又受到怎样的批判。

黄绍竑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的立法是落后于客观形势的需要的，刑法，民法，违警法，公务员惩戒法都尚未制定公布，经济方面的法规更不完备，五年计划快完成了，但是度量衡条例还没有制定。他说，公务员惩戒法和各机关的组织条例办事规则是与整风最有密切关系的法规，必须早日制定。16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在《我国重要法典何以迟迟还不颁布?》一文中说：我们过去在立法方面的努力实在跟不上实际的要求。例如，平常与人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及一般社会关系的调整最有密切关系的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等至今还没有颁布。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什么不是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及应如何处罚等等，以致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足资遵循，因此就发生一些无根据的控告和不应有的错捕、错押、错判的情况。这篇文章指出：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制造矛盾与不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那种以为「如果制定一套完密的法律，难免限制政府机关的应付事情的灵活性」的意见，这篇文章反驳说：政府机关那种无明确的法律限制的办事的「灵活性」有时颇足以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影响人民对政府的信仰。17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说：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18

这些意见，只不过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在当年却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在颁布

宪法前后，已经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法律，并不像有些人所说「完全无法可循」。19 二十多年之后，才有了不同的说法。1979 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说：「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的，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20

在刚才摘引过的黄绍竑的那次发言中，在表示尊重共产党的领导权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认为，由党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章乃器在《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个「以党代政」的问题。以为不少党员对国家机构的作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有些事情如果先让行政负责处理，党组织加以指导和支持，情况就会更好一些。21 谭惕吾在民革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谈到共产党领导国家的方式问题，直接向人民发号施令的问题。她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指示，是由于国务院单独发指示不起作用。她问：既然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为什么自己专政的机构不用，而要削弱其职权，另在政权之外来搞一套党的系统呢?她提出：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她把这以法治国的问题提得很高，尖锐地反问道：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22

为了批判这些意见，《人民日报》专门发了一篇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1957 年 7 月 10 日)，说这些意见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党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削弱党对于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是要使得我们的政府变为真正的官僚机关，使得党变为政府机关的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这篇社论还发誓要把这种发号施令的做法坚持下去：「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在党还存在的时候)还是这样。」

这问题后来也有了不同的讲法。1980 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批评了过去那种「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的做法，谈到他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重大改革，有一项是：

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23

涉及党对国家的领导，说得最刺激的是储安平的「党天下」。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

任感。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而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呢?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24

沈阳师范学院张百生、黄振旅合写的文章也谈到了党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的问题，说中国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文章还主张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25

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刘地生的文章认为，决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就是六亿人民的利益，更不能说一千二百万党员的利益应该超过六亿人民的利益。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这篇文章还主张，在学校里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26

这些，在当年，是最犯忌讳的言论。周恩来在一届四次全国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大段对此进行了批判，说「有些右派分子把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说成是什么『党天下』，这完全是恶意的诽谤。」这篇报告所批判的种种右派谬论中，还有一条「各党派轮流执政」。似乎不见有哪个右派头面人物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在我接触到的材料中，只见天津一个中学教师黄心平在座谈会上说了:「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竞选来轮流执政，由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就好得多。因为这样做，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27

一些人还提到共产党员的特权问题。张云川说，在工作上、待遇上、工资上，都表现了共产党员不是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而是相反，形成特权。28 当时毛泽东起草的一个党内指示也认为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他说:「党员评级、评薪、提拔和待遇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29 整风鸣放中，不少人都提

到了这个问题。前面引过的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把反对特权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联系了起来。文章说:「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他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

前面所引，如黄绍竑、谭惕吾、储安平这几位，都属于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他们的这些主张，不免是联系政治权利的分配来考虑的。像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那次发言中就直接提出了为什么国务院副总理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当然，他们的这种考虑，也不能认为单是为了个人利禄，像章伯钧就说过，他想「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是为作官，是为了实现我的政治主张」30。而当年在校大学生中划出的右派分子，正如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指出的，「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31 这里我们来看看这些年轻人发表了一些怎样的主张吧。

「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谭天荣)32

「前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偏差，它是一次根本的路线的错误……用纸包火总是十分危险的，斯大林的错误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的，党中央也该整风，难道掩饰错误、喜欢斯大林的威信对革命有好处吗？」(严仲强)33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宪法的彻底实现，切实保障民主自由人权，使社会主义制度臻至完善。」(陈爱文)

「肃反运动……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之下，在错误的领导思想和敌情的估计之下，绝大多数的斗争是错了，……肃反运动错误的根源，不在工作方式，而在于脱离群众、以宪法人权为儿戏的官僚主义；以搬运公式为满足的教条主义；以及不准阿 Q 革命的宗派主义。」(江文)34

「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龙英华)35

「法制不健全不严肃，民主权利没有严格可靠的保障，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温床。」(叶于泩)36

「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争取真正的人民民主自由。……我们要求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王国乡)37

「我就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林希翎)38

「由于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的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于个人，还是自称为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王书瑶)39

「斯大林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三害的根源是缺乏人民的民主和监督。」(岑超南)40

可引的还多，意思相近的就不引了。这些，就是当年遭到猛烈批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说了或者写了这些的，就成了右派分子。几十年之后来看，其中的一些已经变成了人们的共识，例如法学界的一些右派论点，已经被写入了法律条文之中。其它方面一些右派分子的主张，也在实际上被采纳了。这里可以再举一个例。在批判经济学家陈振汉的会上，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严中平说，陈振汉在十多年前就主张：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工厂，增加的结果，并不阻碍而是帮助民族资本的积累，说是因为外国资本输入或外国人在中国办工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严中平认为，这是陈振汉由来已久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41 今天已经没有必要来说这种批判究竟对不对了。1980 年邓小平在同外国记者谈话中说：「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补充。」42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以来，引进外资，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有目共睹的作用，已经代陈振汉作了答辩。

当年右派分子发表的主张，就其主流来说，都是为了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民主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些主张，如果不是横加批判，而是认真听取，采纳其中应该采纳的部分，那么，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社会道

德面貌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会发生，总之，这几十年的历史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写法了。

一场反右派斗争，就主要方向来说，反的就是这些东西。这也就不难判断这一场斗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必要的还是没有更好些了。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时候，可是就有人不愿意看这事情的主要方面，却去死死抓住当年个别人说的情绪化的、过头的话不放，来证明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好像他正在同右派分子辩论大是大非的当年的会场上一样。就情绪或者感情来说，可以说他是把反右派斗争持续到了他说这话的当时了。其实，他所引以为据的那些过于激动的情绪化的话语，例如葛佩琦的「杀共产党人」，就完全出自歪曲的、不实的新闻报导，当年葛佩琦本人就不承认，要求更正的。当葛佩琦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盖棺论定之后，当年栽诬他的杀气腾腾的话是不好再说了，是不是要从当年的反右报导中寻找出另外的右派言论来坐实这个论断呢?

四　右派斗争的总结

当犹太人被贴上黄色六角星，大灭绝就离他们不远了！

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消失」的加速度就更快了！

1957年的夏季，发生了一件当时没有几个人知道的小事，却很能反映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命运。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同三十六位知识界人士围桌闲话，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这时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之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意思显然是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你会不会把他打成右派分子？毛泽东回答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是作家鲁迅，那就会不断地写作；如果不再写了，他也就不再是作家鲁迅，而只是自然人周树人了。罗稷南问的，显然是那个像活着的时候那样，拿着一枝笔不断向黑暗势力挑战的鲁迅。毛泽东的回答也是明确的：如果是这样一个鲁迅，我得把他关在牢里。这将比右派分子受到的最严重的处分还要严重；如果他不再写文章了，也就是说鲁迅不再是鲁迅，而只是自然人周树人，当然不必关起来，按照毛在3月3日说的，甚至还可以安排他当文联主席哩（这时的文

联主席是郭沫若)。在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最受民众尊崇、最受共产党尊崇的一人，假如他活着，也难逃此厄，别的知识分子就不用说了。

有一种说法，这反右派斗争虽说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也有缺点，缺点就是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使这些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意见吧。说反右派斗争打击了一大批无辜者，这当然是事实。据薄一波提供的数字，「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43 这就给了人们一个印象，所谓扩大化，是将1扩大为100，即扩大了一百倍。扩到这么大，伤害了这么多人，当然不是好事情，也可以说是错误或者缺点吧。

如果仅仅着眼于误伤了多少人，那么，在反右派斗争之前，1951年的「三反」运动，1955年的肃反运动，岂不同样有严重的扩大化吗?「三反」运动中，把被打为贪污犯的人称为「老虎」，各个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在没有任何调查线索的情况下，都被要求编制「打虎预算」,「三反」运动即据这种毫无根据的「预算」，把一大批无辜者打成贪污犯(即老虎)，当年究竟打出了多少老虎，其中又打错了多少，我没有掌握具体数字，在印象中，错案率很高，这是可以断言的。肃反运动的情况是有数字的，前面已经说过，立案列入肃反对象的有一百四十余万人，肃错的一百三十余万人，错案率百分之九十四强。因此，可以说，三反也好，肃反也好，也无一不同反右派斗争一样，是严重的扩大化了。所以，扩大化并不是反右派斗争独有的缺点或者错误。那么，反右派斗争有什么不同于三反肃反这些运动的特点呢?显而易见的一点是，三反肃反在运动行将结束之际都有一个复查程序，一只老虎当他经过内查外调批斗逼供之后，仍然无法证实他有贪污行为或政治历史问题，他经过几个月到一年左右的折腾之后，也就解脱了。而反右派斗争的这个复查程序，直到22年之后的1979年才姗姗来迟，这样才有「多年受了委屈」一说。这还不是反右派斗争最重要的特色。更加重要的分别是：三反也好，肃反也好，不过是打击人而已，并没有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思想批判，更谈不上理论和路线的批判。而反右派斗争则不同，把一个人划为右派分子加以打击，通常是同批判他的思想、见解联系起来进行的。批判了些什么呢?反了些什么呢?前面

已经举出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意见。当把这些有助于促进国家法治和民主建设的意见当作反动言论加以批判之后，事实上就只能从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后退了一大步。要总结历史经验，就要从这个角度来总结，而不要只着眼于打击了多少人。

1951 年批判电影《武训传》，1953 年批判梁漱溟，1954 年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由此转为批判胡适，批判《文汇报》，由此又转为批判胡风，1955 年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升级为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这就揭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思想批判无休无止，批判的对象，由个人到几个人，再到小团体，株连开去，总有一天会要整到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的知识分子的头上，实质上，就是整到知识的头上，最终整到中华民族自己的头上。

还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反右派斗争中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说：「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4 这没有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生了这一场反右派斗争。在另一篇讲话里，他实际上说出了这个意思：「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45 对此，薄一波说得更加具体，他说：「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党的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动摇了八大路线的根基，从此开始了对八大路线的偏离，助长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46 大家都知道，八届三中全会正是总结反右派斗争的会议。

反右派斗争改变了中共八大的路线，进一步破坏了民主和法治，败坏了社会道德，从而为文化大革命准备好了舞台；还为它准备好了姚文元、关锋等等几个主要角色。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场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反右当中的「群众创造」：大字报、大辩论，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更是泛滥全国。当年右派分子攻击的集权、特权等等这些东西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文化大革命宣布要坚持、要保卫的那些论点，也正是反右派斗争宣布要坚持要保卫的论点。大体上说，反右派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彩排。要总结反右派斗争就要这样来总结。

在对 1957 年发生的这一事件作总结的时候，人们不应该只看上面说的这些令人心情无比沉重的事情。还应该看看当年右派分子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这些被钱理群称做「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的，这些以它的作者二十二年的受难为代价，有的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而留下的遗产，经过时间之流的淘洗，是更加光

彩夺目了。他们当年的愿望和要求，有一些已经实现，有一些将要实现。有一部分，此刻还不具备实现的条件，我相信日后迟早会要实现的，我有这个信心。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既是此前三十年共产党革命的果，又是此后五十年中国的状况、中国人的状况、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的因。

反右派斗争过去之后，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大跃进开始了。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知识分子在反右派斗争中得到了教训，这时已经噤若寒蝉，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当中的那些「新生事物」，像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等等等等，都没有遇到任何非议地搬演了出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有人会问，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那些史无前例、也但愿史无后例的社会不正常事件，就不会发生吗？这些事件令人痛心地发生了，就证明中国没有了现代知识分子吗？

人们也许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太重大的期望。寄厚望予某个群体、寄厚望予某个个人，正如同厚责某个群体、厚责某个个人一样，并不能真切地总结历史，也不能合理地展望未来。

「总结历史」也好，「展望未来」也罢，再算上「收拾而今现在眼目下」，说来说去，就两个字：制度，真正的人的制度。这制度，不仅仅是落实到文字的法律，也不仅是前赴后继的知识分子们针针见血的言论，而是时刻贯穿在每个群体每个个人的行为中的规则。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应该是，学习真正的制度、向群众普及真正的制度、做践行这个真制度的表率。

五　「消失」多年以后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1号文件，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提出受理要求改正的申请，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同年12月18日至22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推动了历史上遗留的

冤假错案的解决。在 1979 年里，这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据薄一波提供的数字，占原划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都得到了改正，被开除公职的恢复了公职，被开除党籍的恢复了党籍，大都回到原来的专业上工作了。有些人甚至担任了比反右以前更高的职务。像朱镕基，做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王蒙做到了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费孝通和钱伟长都做到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6 年 11 月，三个当年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联名发起开一个「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向一些人发出了邀请信。邀请信说：「1957 年的反右运动，即将满三十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我国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意。」费孝通收到邀请信之后，在 1987 年 1 月初举行的一次民盟的会议上要求民盟全体成员不要参与刘宾雁等发起的反右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要大家「汲取 1957 年的教训」，并把他收到的这封邀请信交给中共中央。

确实也有一些当年的右派分子「汲取」了「1957 年的教训」。1997 年邓小平逝世后，王蒙发表了一篇悼文。这篇题为《小平同志改变了我们的命运》的文章中说：

在 1988 年秋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上。在会议即将结束、通过会议文件时，有一位老中顾委委员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措辞提出了一些意见。小平同志即席讲话，他讲得特别明确，一再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我提出来的，而且我最坚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毫不含糊，寸步不让，他的政治敏感，政治判断力与政治上的坚持性顽强性，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应该说是凛然肃然的印象。47

王蒙这篇文章也会给他的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

1957 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结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批评的话语权，知识分子的「消失」从局部溃疡到全国，这，成了中华文化的解构和重组的一个阶段。

希望总大于沮丧。只要中国还有鲜活的人群在，只要这人群都希望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制度和规矩都会产生出来的。在这百年大计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

不仅仅要通过他们的言论，也要通过他们的行动，发挥出他们巨大的潜力。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释

1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十五号，第 168 页。

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第 285-286 页。

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57 页。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 1957 年 3 月 6 日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共汇集了 33 个问题。

5 同上书，第 253-254 页。

6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 268-269 页。

7 同上书，第 273 页。

8 《胡乔木文集》第一卷，第 572 页。

9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十八号，第 99 页。

10 《新华半月刊》1956 年第 13 号。

11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 100-101 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432-433 页。

13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十七号，第 156 页。

14 蔡公《「小匈牙利事件」真相》，载 1999 年 1 月 15 日《南方周末》第 10 版。

1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下卷，第 642 页。

16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十一号，第 31 页。

17 1957 年 5 月 9 日上海《新闻日报》。

18 1957 年 12 月 12 日、24 日《人民日报》。

19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十四号。

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189 页。

21 《章乃器文集》下卷，第 566-567 页。

22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13 号，第 85 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29、339 页。

24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十二号，第 23-24 页。

25 1957 年 6 月 10 日《沈阳日报》。

26 1957 年 6 月 22 日《人民日报》。

27 1957 年 5 月 27 日《天津日报》。

28 1957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

29 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632 页。

30 1957 年 7 月 4 日《人民日报》。

31 钱理群《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见《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 页。

32 牛汉邓九平主编《原上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第 46 页。

33 《原上草》第 76-81 页。

34 《原上草》第 104 页。

35 《原上草》第 131-132 页。

36 《原上草》第 141-142 页。

37 《原上草》第 149-150 页。

38 《原上草》第 153 页。

39 《原上草》204-207 页。

40 《原上草》第 209-211 页。

41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二十号，第 82 页。

4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 351 页。

4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41 页。

4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3-254 页。

4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253-254 页。

46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 654 页。

47 《王蒙文存》第 1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 9 月版，第 163 页。

中共反右运动「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　　高瑜

五十年前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一场反对人类文明的运动，那场运动的对象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知识、思想和科学的载体，这场运动的结果，是「消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这场运动制造的严重后果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旷日持久性；三是可传承的灾难性（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反右的传承)。我仅就毛泽东用这场运动消灭知识分子这个结果谈谈我的见解。

毛泽东要消灭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

我先引用画家陈丹青一段演讲：

「五·四」那一两代人，单是模样摆在那里，就使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联买到的两册抗战照片集，发布了陈公博、林柏生、丁默村、诸民谊押赴公堂，负罪临刑的照片。即便在丧尽颜面的时刻，他们一个个都还是书生文人的本色。他们丢了民族的脸，却是照片上没有丢书生相貌的脸。我斗胆以画家的立场对自己说：不论有罪无罪，一个人的相貌是无辜的。我们可能有资格看不起汉奸，却不见得有资格看不起他们的样子。其中还有一幅珍贵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你会说那种神色态度是强作镇定，装出来的，好的，咱们请今天哪位被双规被审判的大人物镜头前面装装看，看能装得出那样的斯文从容么？

我这是第一次看见周作人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叹他们周家人气质非凡。

到了 1979 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召开，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一个人模样给弄成那样子，还不如长得丑陋，犹不如法庭刑场上的汉奸们，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点最后的尊严。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艺家，倒也罢了，现在你看看，长期的侮辱已

经和他们的模样长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说句不敬的话：他们带着自己受尽侮辱的面相，还居然去参加文代会，本身就是再次确认侮辱。那样的会议，鲁迅会去吗？1

用今天的话评论陈丹青先生，应该称他是鲁迅先生最狂热的粉丝，他独独尊称鲁迅为「大先生」，他认为鲁迅若活着，是不会去参加 1979 年中共的文代会的。陈先生依据的是从来没有接受过共产党改造的鲁迅的品德和风骨。直到 2001 年因周海婴公之于众，我们才知道，1957 年 7 月 7 日毛泽东在上海与 38 名文化界人士座谈，翻译家罗稷南向毛提问：「如果鲁迅在世，他今天会怎么样？」毛回答：「要么在监狱里继续说，要么识大体，不作声。」1957 年的毛泽东对鲁迅都要封口，何况对其他人呢？鲁迅果能被封住口，那脊梁骨也就被打断了。

陈丹青用画家目光审视的不仅是毛政权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相貌，也是他们坍塌了、扭曲了的灵魂。毛泽东 1942 年在延安搞「抢救运动」、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次对知识分子残酷的迫害和改造，是 1942 年整风的直接结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独裁专制的开始。而 1957 年的反右，规模和手段都是 1942 年不能比的，这场运动从社会属性上讲就是要打垮和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他们独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会的力量，社会属性不再有了，知识分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作为右派的主体，是这样几部分人：

一、以「章罗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是中国具有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识分子，他们针对毛泽东建立的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提出批评，并提出多党制架构的设计。

二、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积累的大量的严峻问题，他们直接给毛泽东和中央写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评党的干部的特权。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他们接受苏共 20 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锺惦棐、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和著名文艺家，他们的知名度高，就党对文艺的领导，对文艺作品的封杀和党内宗派主义提出批评。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学家，他们学贯中西，就教育、科学和经济建设违反常识、违反规律提出意见。最经典的是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当时和未来中国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提拔了溜须拍马的」。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具有学历的标签，而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功能。

毛泽东摧毁知识分子的四种方法

「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与普世价值的尊严、理性、自主有一致性，毛泽东反右就是从摧毁中国这一文化传统入手，从而摧毁了全社会知识分子的灵魂。毛把整风中敢于或者被迫讲了真话的知识分子，统统加了「右派」这顶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的预演。我就从「右派」这顶帽子谈起。

一，「右派」帽子，相当犹太人身上的黄星。

毛泽东为了建立名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党专制，建国之后，在连续的政治运动中，已经人为制造出「地、富、反、坏」阶级和阶层，另外还有「胡风分子」、「高饶分子」。上文归纳的右派主体的五类人，按照思想的光谱，基本与右不沾边，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毛泽东统统给他们加了一顶「右派」帽子，在当时因东欧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范围涌动，中国更是高唱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进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内，无疑是置「右派」于死地。毛泽东在中国处于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抛出的帽子，相当法律裁决，轻而易举就把一、二百万人和家属，一个大到上千万人的群体续在「地、富、反、坏」的后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被剥夺公民权。

二，所有右派必须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公开检查，也就是公开认罪。同时要表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这是向毛泽东具结画押。这是毛泽东剥夺知识分子尊严最厉害的一手，尊严没有了，灵魂也就破碎了。

毛泽东根据右派的职务高低，给右派也定了六个级别，一类最大，六类最小。1980 年我曾经采访冰心的丈夫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这次采访成为我终生难忘的

一次采访，就因为吴先生讲的一句话：「我是第五类右派，是性质最轻的。」按照吴先生的级别至少是二类，定为五类明显是优待。讲到右派经历，吴先生忍不住流下泪水，但是他对被划为五类，是心存感激的。每当我想到毛氏运动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剥夺，我总会想起吴先生的这句话。

毛泽东正是根据每个人认罪的态度，又给右派定了五种处理方法。把最严重的送监狱，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夹边沟全国几十个右派改造基地，无异于肉体消灭的集中营。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担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严重后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饿死，已经越来越多见于史书，这是作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以他们九死一生的经历成为史家，对中国历史的一个贡献。还有的被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农村接受改造。最轻的在原单位降职、降薪，拿二十几元的生活费接受改造。

拒不检查的右派是极少数，其中一个是邓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统战部管理的五个大右派之一彭文应，这是今天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名字。彭文应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硕士，是共产党真诚的朋友，资助过周恩来和多名共产党人，因为参加共产党的活动，1949 年 5 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时，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曾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1957 年，身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拒写检查。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甚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着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奉命说服他认罪的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后一年，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2

1978 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获得改正，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陈仁炳.并列，成为不予改正的五大

右派。当年的「反右前台指挥」邓小平，报复的就是彭文应不认罪的态度。

王怡先生最近为我们提供了一名被称为中国的巴弗（圣经中的一个圣徒）的基督徒右派吴维尊。1987 年 5 月 28 日，吴维尊被监狱哄骗出狱，写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监日呈文》，声称 1981 年的减刑裁定是谎言，将他的「毫不悔改」说成「确已悔改」。文中说：「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从此吴维尊在监狱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个监狱外的服刑人员。直到死。他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3

右派分子最后的尊严，随着这些人生命的结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随着被摘帽，1978 年被改正，向党表示感恩戴德。

三，对右派实行「全民共讨之，全国共伐之」。反右是毛泽东实行大民主的试验，是文革的先声，是让中国人集体丧失人性的大动乱。

全国的人，包括右派家属子女，亲朋好友对待右派，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没有权利不对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诛笔伐，揭发检举，人人必须学会撒谎，制造谣言，必须学会大义灭亲、上纲上线。使得右派处于众叛亲离，人人喊打，无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惧受辱而自杀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为右派讲话，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光明日报一位老记者，是我的大学长，他当年被定为「中右」，他说，当时一听到班上一个左派的声音，心里就不停地哆嗦。

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惟一」的顾准的家庭变故，是颇具典型性的实例。读了朱学勤先生对顾准六弟陈敏之的采访《迟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泪水。顾准是 1957、1965 年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他的境遇更悲惨。我摘一些内容给大家：「1966 年，顾准被迫与妻子离婚，搬离家庭。次年回去取书籍衣物，久唤门不开，后来还是邻居帮助他把东西搬下了楼。不久，又被迫签具了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声明。从此，顾准蛰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馒头度日，再也没有迈进过家门。」

「顾准又是个孝子。从几个弟妹的童年时代起，顾准即肩负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担，几十年来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以说相依为命。1965 年，顾准处境

恶化，不得不将母亲迁至太原三妹处。1966 年，母亲随三妹一家迁来北京，住处与顾准相去不远。终因形势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终未能见面。不能见面的原因并不复杂。顾准妹夫当时正任部级官员，为避免对他有所影响，顾准和母亲只能回避。1972 年前后，母亲曾提出想见见顾准，年底，陈敏之赴京，也曾设想安排母子见面，亦未如愿。离京前，陈敏之与其妹只能达成这样的协定：将来母亲病危进医院，立即通知顾准，让母子在医院见面。1974 年 11 月初，顾准咯血不止，先于母亲住进了医院。11 月 16 日，经济所党内外群众经过讨论，一致同意给顾准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达病床，顾准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顾准走在了母亲前面，母子相见，终成泡影。

「1982 年前后，顾准子女获悉六叔陈敏之处保存有一份父亲的通信笔记，向他索要去传阅。这份笔记就是后来陈敏之整理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1984 年 2 月，大女儿寄来了一份「读者附记」。「附记」说：「我逐年追踪着父亲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后，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趟过来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着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个父亲，对于这样的父亲，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他的女儿还说：「真正严峻地摆在面前的，是需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悖论——为什么我们和父亲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却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4

今天强迫中国人和知识分子接受和奉行的准则仍旧距离科学还远，这就是 1957 年毛泽东为中国留下的遗产。

四，右派在改造中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这是毛泽东分化瓦解、个个击破惯用的手段，也是将知识分子改造成驯服工具的手段。

毛泽东善用人海战术，搞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几百万这是让毛泽东十分在意的数字，毛决不会掉以轻心。右派在改造中，无论在监狱，还是在劳改营，哪怕是在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在右派群体内，仍要比认罪、比检查、比揭发、比检举，让右派和右派厮杀，让右派改造右派。毛泽东用这种方法，打散，

进而消灭这支几百万人的庞大队伍，让你不能抱团，让你七零八落，让你饥人抢食。「食」是毛泽东诱惑灵魂的高招，那就是「摘帽」、「返城」「安排工作」、「提高待遇」。为右派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美其名曰：「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给出路。」毛讲的都是谎言，但是迷惑了右派中的绝大多数。这也是毛泽东搞历届整人运动惯用的方法。

李锐女儿李南央的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了她的母亲范元甄的一生，范的一生是蹉跎的一生，也是揭发别人的一生。她在所有政治运动中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好朋友，熟人。李锐致命的「攻击」毛主席的话，都是她揭发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李锐离婚，本来是要恢复党籍，降为局级使用的，就因范元甄的一封长篇检举信，将李锐置于死地。信最后传到邓小平那儿，邓说：「太恶劣，烧掉！」范元甄自己都认为邓是因她揭发的内容，而不是她的揭发行为，说「太恶劣了。」文革之后，因范揭发人太多，没有单位接受，拿着副部级工资，仍然在仇恨和咒骂中度日。令女儿南央吃惊的是，母亲揭发父亲，「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思想不一致，而是她胆小，为保自己出卖了丈夫。」对李南央的书，有一个评论：「范元甄是被党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而李锐是没有被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李锐自己有这样一个总结：「知识分子夫妇，去延安的，大多离了婚。而没有去延安的，大多白头偕老。」反右运动中，造成的离婚案到底有多少？数目会大得惊人。这就是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力量的体现。5

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威力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这体现在一些属于右派中的头面人物的身上。1986 年 11 月许良英、方励之、刘宾雁共同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是已经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事件。许良英先生纪念反右四十周年写的〈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详细记述了这个事件，值得我们很好的回味。许先生写道：

「我们发出大约四十封信，除费孝通、钱伟长外，都立即回复，而且都充满热情。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回信者有：化学家袁翰青，水利学家黄万里，电影评论家锺惦棐，杂文家曾彦修，翻译家刘尊棋，老报人徐铸成，文学家白桦、陈学昭、邵燕祥，数学家曾肯成，浙江所谓『沙杨反党集团』骨干孙章录和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有不少我们并没有邀请的右派，也主动来信要求参加会议。有一个原来不知其名的浙江右派，来信教训我，说反右问题中央已有结论，我们只能在此框框

内讨论。这种由右派转变的左派，我已见识不少，如丁玲、陈沂、陈涌等，想不到在浙江也冒出了一个。」

「12 月 20 日，刘宾雁通知我，说《人民日报》社领导要他不要参与这个会的活动，他只好照办，望我们谅解。12 月上旬开始，合肥、武汉、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相继出现学生上街要求民主的游行，当局归咎于方励之。听说就在这个时候，钱伟长通过民盟中央把我们寄给他的反右运动历史讨论会邀请信送交当局，并附了这样的意见：方励之是一个政治野心家，他自称是中国的瓦文萨；我的问题虽然没有完全解决（指尚未恢复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官职），但与他们是不同的。12 月 30 日上午，邓小平召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等人讲话，批评胡耀邦制止学潮不力。当他批评方励之的「自由化」言论时，赵紫阳插话，说方励之和刘宾雁、王若望要开纪念反右三十周年大会（把我误为王若望，把历史学术讨论会误为纪念大会），于是邓说，要把这三人立即开除出党，并说这次钱伟长表现很好，应予重用！不久钱伟长果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6

二十年前纪念反右的这段公案，也是「六·四」学潮的一个诱因，血上加血的历史记录，无论怎样的强权也难以抹去。

五十年前的反右运动和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军方的《解放军报》四月刊登采访报导，通过一位原军事科学院教官和一位武警部队政委的谈话，提出国家安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安全的新安全观。他们强调，西方敌对势力通过文化传播兜售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反动思想，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军队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捍卫国家文化主权。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上将熊光楷五月在《学习时报》发表〈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文中把「寻求非法扩散政治影响的组织或个人」列为对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并称「信息网络的滥用将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稳定」。

我认为中共当今奉行的仍然是背离世界主流文明的国家安全观。到底今天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是什么？早在七十年代，毛政权请来的一位左翼作家韩素音，已经为中国指出了。她说，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是环境和教育。三十几年之后，韩女士的预言成真。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几代知识分子本来是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被反右摧毁，使得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生的人在文化断裂中成长。文革已经无法重新再揪出更多的右派了，但是对老右派却是致命的摧残，很多人死于这个时期，包括枪毙了林昭。文革只能产生几百万红卫兵，红卫兵只能充当批判一切文明的打手。今天聊度余生的右派，都垂垂老矣，现在是红卫兵正在领导我们的国家。林昭的母校，我们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理科系，四年下来还要让学生必修五门政治课，「思修」——思想品德修养，「毛概」——毛泽东思想概论，「马哲」——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邓三」——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马政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文科系还要再加一门「时政」。中共 17 大之后会不会再增加一门「科谐」——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呢？背着这样的枷锁，我们怎么能优化我们的知识结构？

中国的高楼以世界不及的速度在拔地而起，中国模仿的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中国已经到世界各地开采、收购石油。世界在惊呼：「中国突然无处不在!」中国的军事装备已经向世界显示导弹摧毁卫星的能力。而我们付出的代价是 70％的江湖遭到四－－五类的中度和重度污染，鱼虾死绝，沿岸到处是癌症村，二分之一以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十五个海洋生态监控区中只有两、三个处于健康运行状态；生态系统退化加剧，土壤侵蚀 2004 年就达到了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早就世界第一，今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也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了。中国国民一半以上看不起病，政府九年义务教育不能完成。到底哪个是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我们有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和军队，但是我们没有世界一流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科学家，因为培养世界一流的老师都被反右扼杀了，现在能够恢复和提高中国人辨别善恶是非能力的社会力量还是太弱了。

物极必反。文革末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谱上成长出「四·五」一代，「六·四」出现了「八·九」一代，一二·九的垂垂老者仍然是呼吁中国民主的领袖。九十年代四十岁的王小波提出反对愚蠢和无趣。今天更年轻的刘军宁提出「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他呼吁「一切回到人的立场」。被反右运动摧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理性、自由和人性正在成长。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节选自百度陈丹青《2005 年 6 月 5 日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讲演》。

2　有关内容取自百度《大右派之一彭文应的坎坷一生》一文。

3　有关内容取自民主中国网王怡《1957 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一)》。

4　朱学勤《迟到的理解》见百度《二闲堂文库》。

5　李南央《有这样一个母亲》(香港：开放出版社)。

6　节选于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断回忆和思考——纪念反右 40 周年 》一文。

从罗隆基看中国自由派在 1957 年的命运　　陈奎德

一、罗隆基其人：他的典型象征意义

罗隆基是 1957 年反右运动毛泽东钦定的大右派，同时也是二十多年后，中共为 55 万右派中绝大多数「改正」后，「硕果仅存」不予改正的六名右派之首（六人为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林希翎)。无论就政治理论 ，还是政治活动而言，罗隆基都是中国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人权理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和行动的中坚，罗隆基在 1957 年的命运，在相当程度上象征了中国自由主义在反右运动中的命运。作为钦定右派，罗隆基的悲剧，就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悲剧。

罗隆基（1898—1965）字努生，人权理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一身而兼有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双重身份的人很少，罗隆基是其中突出者。他才华外露，个性鲜明，敢恨敢爱，不拘小节，是一位有棱有角、毁誉交加的人物。

早在五四时期，罗隆基就是走在游行前列的一名学生领袖。他的清华校友潘大逵这样介绍罗隆基:「他是清华的一个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为擅长，能写作，善辩论，得过清华国语演说比赛第一名。他颇有领导才能，是个才华横溢的政治家。」

1922 年 7 月，罗隆基与同班同学钱宗堡、闻一多、何浩若等人相伴赴美，在英美留学期间，他与闻一多等人发起组织过国家主义团体大江社。后来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从师于拉斯基（Harold J. Laski）教授。1928 年秋天，罗隆基从英国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同时兼任由胡适担任校长的吴淞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主任及教授。

当年，作为「新月」派的重要人物、胡适自由主义大旗下的火枪手之一，他一度从胡适手中接编过《新月》杂志，纵横笔墨，书生言政。在民盟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中，罗隆基起草了民盟一大纲领，并积极投入民盟反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坛上，罗隆基是被国共两党竭力拉拢争取的人物。1949 年之后，毛泽东也给了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诸种头衔。

1930 年 11 月 4 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的这两次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从而有时就丧失了理性的批判能力。当然，由于那时国民党是当下的、即在的、现实的压迫，自由派知识分子日日感同身受；而共产党在野，并未掌权，其统治的严酷尚未呈现，同时中共当时又高调赞美民主自由，自然就俘获了自由派知识界的主流情绪。

从思想理念方面的追溯，罗隆基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者（包括储安平、费孝通、潘光旦等），受到当时英国的费边社，特别是其政治学者拉斯基（Harold J. Laski）以及弗布（即 Webb）夫妇等的思想影响，属于自由主义左翼，染有社会民主主义甚至部分社会主义的色彩。

有鉴于上述两方面的因素，自由派营垒不少人其政治同情转向共产党，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渊源的。

四十年代抗战结束后，罗隆基异常活跃，参与创建民盟，出任民盟宣传部长，

已成一位专职政治活动家了。从 1943 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股声势颇大的自由主义运动，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热点问题，轰轰烈烈，不仅在公共传媒上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而且进入了实际的政治过程。前者自然是「观念人物」的汗马功劳，而后者则要归功于以民盟为首的「行动人物」的不懈努力。

从成立之初到抗战胜利的短短四年期间，民盟已经成长为遍布全国主要城市、拥有三千盟员，在知识界具有首位影响、实力仅次于国共的「第三大党」。鉴于当时暂时出现的和平气氛与力量均势，民盟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变成举足轻重的砝码。1945 年秋天召开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其神圣使命是「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1 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可视作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大宪章。

这一载入史册的自由主义大宪章，就是由罗隆基起草的。

在这部由罗隆基起草的纲领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构实际上是左翼自由主义，甚至是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发展到 40 年代，在国际上愈加汹涌。尤其是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给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战后的中国民主模式，应该也可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也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

尽管民盟的这一中间道路在学理上的依据并不充分，但它紧紧地抓住了中国当时两大主要社会问题：国家政治体制的不民主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并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能够在 1946 年初被国共两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证明它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需求和想象，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改革纲领。在这以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如以胡适为代表的《努力》和《独立评论》派）所关心的往往是都市知识分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对社会底层（尤其是农村）更关切的社会公正和经济平等问题漠然无视。这样，他们既不能响应民粹主义的政治挑战，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社会公正问题；也远远游离中国社会底层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罗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称的「免于匮乏的自由」。民盟的社会民主主义中间道路，则成

功地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结合，从而有效地响应了民粹主义提出的挑战，满足了社会底层的经济平等要求。

可惜的是，国共之间的分裂与内战，使得这一在中国知识界有相当共鸣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无法获得其实践的机会，中国也就从此与左翼自由主义的中间道路失之交臂。一旦战争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对话，自由主义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间。1947 年民盟被迫解散，象征着自由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毁灭性挫折。

梁实秋评价罗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即，比较倾向中共。在其早年友人中，罗隆基已经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作为他的朋友，梁实秋对他的变化也很不以为然。他曾直率地说：「我曾和罗隆基开玩笑，我说他是才高于学，学高于品。这话虽是有意挖苦他，其实也正是我的意见。」2

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罗隆基不是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基本问题。其实，在撰写人权理论文章时，他就早已指出国民党的「党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并有专门论文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诸多错误。但是，政治情感常常比理论更能左右一个人的政治实践。罗隆基就是最好的注脚。

二、罗隆基论人权

我们知道，胡适在二十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的中国发起过一场「人权运动」，而罗隆基，正是那场「人权论战」的主将。在中国自由主义者中，罗隆基作为政治活动 家是引人注目的，但人们却因此而常常忽略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树。实际上，他的理论贡献在其一生事业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这就是他建构的人权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在他之前和同时的中国自由派中，无人能出其右。

罗隆基在 1929 年 7 月 10 日出版的《新月》上发表〈论人权〉一文，充满自信的说：「我们目前要的人权是些什么？已到了我们回答这问题的时候了。」由此，他开列了三十五条他认为最重要的权利，全面阐明了他的人权主张。仅仅举其荦荦大者，就有：

国家的功用，是保障全体国民的人权。

国家的主权在全体国民。任何个人或团体未经国民直接或间接的许可，不得行使国家的威权。

法律是根据人权产生的。

未经全民直接或间接承认的法律不应有统治全民的威权，同时全民没有服从的义务。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因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对国家政治上一切权利，应有平等享受的机会。

不得有教条及政治信仰的限制。不得有社会阶级及男女的限制。

国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雇用人员，他们应向全国，不应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团体负责。国家官吏的雇用应采国民、直接或间接的选举法及采公开的竞争的考试方法。凡向全民负责的国家官吏，不经法定手续，任何个人及任何团体不得任意将其免职，更换，或惩罚。

（一）没有代议权，即没有担任赋税的义务；（二）议决预算决算。凡一切未经人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或承认的一切经济上的负担--赋税，公债，捐输，馈赠--均为违法，均为侵犯人权的举动。

国家财政应绝对公开。

凡国家对任何国民一切无相当酬报的强迫劳动，均为侵犯人权。

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以全民应受同样法律的统治。同时，法治的根本原则是一国之内，任何人或任何团体不得处超越法律的地位。凡有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处超越法律的地位，即为侵犯人权。

法治的根本原则是司法独立。司法独立的条件比较重要者有三：(一）行政长官绝对无解释法律及执行司法的职权；(二）司法官非有失职的证据，不得随意撤换或受惩罚。(三）司法官不得兼任他项官吏。违此三者，即侵犯司法独立，即侵犯人权的保障。

无论何人，不经司法上的法定手续，不受逮捕、检查、收押。不经国家正当法庭的判决，不受任何惩罚。

国家的海陆空军是全民所供养的，他们的责任在保护全民的权利，不在保护任何私人或任何团体的特别权利。

国家军队应对全民负责。非经人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无论任何文武官吏，对内对外，不得有动员及宣战的行动。

国家对国民有供给教育机会的责任。为达到发展个性，培养人格的目的，一

切教育机关不应供任何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的宣传机关。

国民应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3

如此等等。

罗隆基的人权观念及其明确申张的这些权利，大体上与国际公认的人权精神是协调统一的，虽然其中关于人权（human rights）与公民权（civil rights，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还需要作一些更细致的区分，但最基本的内容已经呈现出来了。重要的是，罗隆基的论文中已经蕴含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在今天看来，这或许是卑之无甚高论，并非石破天惊的主张。但是如果放在中国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时空背景下，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应当说，它是中国人权观念的时代先声。

罗隆基人权理论，除了上述正面的阐述外，还从反面作了重要界定。他左右开弓，右反国民党一党专制侵犯人权，左攻马克思主义中共革命扼杀人权。他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信条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权，因此，他除了在言论和行动上抗议国民党的人权侵犯外，还在 1930 年 3 月《新月》上撰写了〈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和在 1931 年 7 月《新月》上发表了〈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两篇长文，较为全面的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谬误，分析了中共领导的暴力革命对人权的危害。所有这一切，呈现了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眼光和见识，是对中国自由知识界的理论贡献。

三、反右实质：剿灭自由主义

在政治上铲除自由主义者及其组织，消灭潜在的政治对手，是毛的政治直觉。而罗隆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正是毛泽东的最典型的箭靶。因此，他早就在毛策划打击的名单中了。

根据苏联解体后的秘密档案，可以发现：实际上，差不多在反右十年之前，在中国取得政权之前的 1947 年，毛泽东就已暗露杀机，想要抛弃盟友，独霸山头了。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 1948 年 4 月 20 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

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它政党参加人民阵线。」4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 1947 年的 11 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中共还在向民盟等民主党派大灌蜜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在筹划抛弃民主党派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才把这事推迟。

虽然推迟了，但是毛仍顽固坚持其反自由主义的主张，其基本目标始终未变。不久之后，在 1949 年毛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他就已经敏感地把他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为美国人「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人，从而已经把他们打入怀疑和整肃的范畴中。在毛的词典中，「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者」（至于毛在延安发表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的所谓「自由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无关的）。毛的这一战略，一方面出于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于毛本人反智主义的内在本性。

因此，顺理成章，毛在进城后，很快就把自由派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敌手。

与此相对照，如前所述，罗隆基所属的自由主义左翼（以民盟为代表），当年基于其反蒋的历史情结和费边主义的思想渊源，他们把政治同情转向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是为中共出了力的。然而，1949 年之后，中共夺得天下，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一阔，脸就变」，昔日的盟友，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最后的致命一击发生在 1957 年。

四、一九五七：思想国有化与罗隆基命运

反右的发生，从共产党国家的脉络来看，自有其贯通性的极权统治的逻辑，那就是：由经济而政治，由物质而思想。

1956 年，合作化运动和工商业改造，完成了生产数据的国有化。在共产党统治的脉络里，顺理成章，接下来就是思想的国有化。 在中国，1957 年的反右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性标记，是思想国有化的完成礼。

于是，黑云压城。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以言治罪的文字狱——反右运动，在中国大陆降临。

我们来看看罗隆基在那一场劫难中的个人命运曲线。

1957 年 4 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言辞恳切听来推心置腹的反复邀请下，昔日的自由主义者们终于吐出了已经憋了几年的苦水。

5 月 22 日，中共统战部举行座谈会，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让大家申冤诉苦。而该委员会须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三方面组成。

这就是著名的「成立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它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一起被称为最著名的三大右派言论。

当时，6 月 8 日之前，人们看到的，是一片生气勃勃，议论丛生，同时也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的「政通人和」气象。执政当局虚怀纳谏，谦恭之态可掬……。

然而，顷刻之间，风云骤变，霹雳击地。1957 年 6 月 8 日，一场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反智狂涛，自北京兴起，扫荡全国。当局遽然变脸，以言治罪，以文下狱。整个中国变成一个精神裁判所，党、行政、立法各部头目统统成为司法官，裁决言论，裁决文字，裁决思想。事实上，其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座囚锢灵魂的大监狱。

六月二十一日，罗隆基从锡兰公差归国，他没能料到，等候他的，竟是这样一场最后置他于死地的暴风骤雨。

七月一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指控民盟和农工民主党「反共反社会主义」。而右派的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

联盟)」。

这是一纸混杂着谎言和怨毒的最高当局的终审宣判，没有律师，不容分辩。其中最荒诞的公开的指鹿为马，就是所谓「章罗联盟」。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但毛泽东发挥诗人想象力在圣旨中把它生育出来后，它就居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活蹦乱跳了几十年。国是至此，已惨不忍睹。

罗隆基对此的反应，是咆哮章门，并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这是最后展示罗氏个人性格的戏剧性镜头。

反右，其所以称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其原因在于，那是一场极其典型的以言论文字入罪的迫害，同时，它涉及人数竟达一百万之众！每人皆仅仅因几句话，几行字，就堕入地狱，毁灭一生，万劫不复。

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巨大规模的文字狱？世界各国上何曾有过如此巨大规模的言论罪？

人们曾见识过秦始皇悍然实施的焚书坑儒，人们曾见识过明代朱氏王朝以文字入罪，戕害士人，人们曾见识过有清一代的 160 多起文字狱，诛人计达千余人之众。人们也曾见识过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一纸圣谕，焚烧了基督教《圣经》，人们还曾见识过希特勒德国的「焚书坑犹」——1933 年德国冲锋队员焚烧「非德意志精神」书籍的冲天烈焰，以及此后灭绝 600 万犹太人的焚尸炉火….。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反智主义暴政如过江之鲫，罄竹难书。

然而，所有这一切，比起毛氏王朝来，小巫而已。

反右，作为共产中国「一言堂」的奠基礼，它使中国只剩了一支笔：「毛」笔；只剩了一种文体：毛文体；只剩了一种声音：中共中央电台那高亢单调的「毛式社论」。

五七年，国人智力萎缩，文明退化，使中国人在心智上蜕变成了婴儿

五七年，国人廉耻不张，伦理退化，使中国人在道德上蜕变成了痞子

其时，历来以傲气逼人我行我素著称的罗隆基，转眼之间，就坠入了十八层地狱，备极羞辱，受尽煎熬。然而，一系列对罗隆基的批斗会，却也显示出罗的独特的政治原色，显示出在上层「右派」中，恐怕只有他与储安平才确实是带有比较清晰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政治人物。翻阅那些揭发材料，抖掉其历史的尘埃，现在看来，不仅非罪，反而为功，为罗隆基毁誉交加的一生增添了夺目的正面色

彩。

无疑，罗隆基关于平反委员会的主张，反对政治迫害，强力伸张人权，凸现了他一生坚守的政治理念。更重要的是，考诸他 1949 年的政治轨迹，不难发现，他还是在中国试图催生真正政党政治的先驱。远在中共建政前夜，罗隆基带信给沈钧儒，要求沈「代表民盟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下几个条件：（一）不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协和外交；（二）民盟成员与中共党员彼此不要交叉；（三）民盟要有自己的政治纲领，据此与中共订立协议，如中共不接受，民盟可以退出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5

此外，当时公布的对罗的揭发材料还表明，储安平的「党天下」论，其实是沿用了当年罗隆基批评国民党的说词。罗直指国民党「『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继续不断地『党天下』」了。

更为原则性的一点，是在中共掌权后，对民盟盟章总纲里是否写入「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一语。罗隆基据理力争，坚持不写。依政治常识，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党的党纲注明接受另一个政党的领导。抗争未果后，他说：

「盟章有了这样一条，民盟的生命就结束了。」6

这是罗隆基强力声明、最富远见力的抗争之一。它攸关政党政治在中国存废的关键。这不是一个政党党纲里的某句宣言的可有可无的问题，而是关乎该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写进了这一句，则「党将不党」，犹如接受了「死亡之吻」，其命运就注定了：跨进坟墓，别无选择。

五十年了，在其根本的体制精神上，1957 年的阴云仍然笼罩着中国。

这就是反右二十多年后，当局为右派「改正」，但惟有以罗隆基为首的六位被拒绝改正的根本原因。 因为从其统治合法性而言，中共仍然需要抗拒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

然而，历史之神毕竟不是盲目的。就在当年反右之后的黯黯长夜的 1962 年，大英百科全书刊载了中国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条目，指出：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

虽然罗隆基晚年凄苦孤寂，郁郁而终。但是，一条永远的「未改正右派」的殊荣，一条大英百科全书简洁公正的历史结论，只此两条，自诩为自由主义左翼的罗隆基当可以死而瞑目了。而反右运动，则因罗隆基等上百万人的殉难，而被

历史钉到了反智主义以及文字狱的巨大耻辱柱上。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十六章，200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 梁实秋〈罗隆基论〉，载《世纪评论》2 卷 15 期。

3 罗隆基〈论人权〉，载《新月》，1929 年 7 月 10 日出版。

4 邱路《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见《百年潮》1998 年第 1 期。

5 章诒和〈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载《往事并不如烟》，时报出版社 2004 年。

6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牛津大学出版社。

从「一边倒」看毛与民主个人主义者 戴晴

表面上看，1949 年 8 月，以〈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发表为标志，而向世界公开的这一「完全倒向苏联，与以美帝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全面决裂」的外交政策，似乎缘于美苏冷战。而中国为求得老大哥的好感，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

我们今天已经知道，这一悲剧性地令世界对中国关闭了二十多年的国策，是在几乎全部外部因素，包括苏共斯大林，美国国务院，司徒大使本人，毛的幕僚如周恩来，以及当时他还客气地被称作「先生们」的国民政府反对派和民主党派人士，都切望新成立的人民中国应与美国及世界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深明大义」与「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以别人身上极为少见的执拗、偏狭，极力抗拒、「等待时机」、「引蛇出洞」而终于完成的。用他的话说，是「打扫干净屋子再迎接客人」；是「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这里的屋子，我们今天已

经知道，是他的无人再敢多嘴的一统天下（文革后迎接尼克松时候的茫茫大地）；牛魔王，可以说是即将成立的中央政府。而孙悟空，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美帝国主义是也」。

美帝如何钻得进来呢？须靠他的代理人：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这就是在今天，在我们回顾反「右」斗争五十年的时候，我要讲的题目：

从「一边倒」看毛与民主个人主义者

「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何许人也？我们今天读史已经知道，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以来，整整一批极为可贵地在艰难的战争环境成长起来、具有现代眼光与专业训练、从学理（而非仅仅实际利害）抵制专权并且一心报国的知识型人才。他们本以为，国家者，公器也。没想到外交政策是否「一边倒」，在毛心中，竟成了在将来共产党的一统天下，他们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

我们先谈「一边倒」。

当时，有可能左右中国未来格局的政治势力，大致有四个方面：苏联、美国、即将以武力拿下全部国土的中共、第三势力（不是邓演达的第三党，也不是国共开战前的第三方面，而是当时国民政府中的反蒋势力如李宗仁、国民党里边的反蒋势力如李济深，还有民盟及其它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等）。

当时的这四大势力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1949 年 1 月 18 日，斯大林特使米高扬，在毛泽东多次恳求访苏不准之后，来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肯定了苏联对中国和毛的全面支持。

2 月初，美国国务院〈重审并制定美国对华政策〉获得总统批准。档着重分析国民党失败和共产党成功的原因，明言美国必摆脱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并和中共打交道——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立即执行。

3 月上旬，在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制定了的自卫的底线：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要特别警惕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

3 月底，为与中共高层搭上线，司徒大使开始出面联络「第三势力」。如今已有史料证实的，有民革陈铭枢（许以美金二十亿）；民盟罗隆基（许以美金四十亿）；还有张东荪等既有见识、又具有斡旋资格的老朋友。事实上，从这时候直到四月

中，「燕京旧人」包括校长、总务长、教授们都在努力，期望正常的外交关系得以达成。

四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美国以大使不去广州表明对新政权的态度，并造成除苏联外所有国家都没有去的局面。虽然苏联大使如此行事，毛泽东那时其实收到了斯大林发来的电报：

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

共产党内部，也并不是人人都对与美国建交怀着如毛泽东那样超乎寻常的警惕。南京刚拿下，燕京大学肄业生（后来的共和国外长和副总理）黄华，即奉周恩来之命，顶着专门为他而设的头衔「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开始与「老校长」作非正式接触。对此，毛没有反对。作为谋略家，他也需要有人到第一线作试探。

当时，黄华的同班同学（同时也是司徒雷登校长事无巨细的助手和秘书）傅泾波正在大使身边。通过极为谨慎的接触，黄华终于与司徒见面，并于 5 月 10 日发回汇报。毛泽东亲自批阅回复，并对「黄华报告」的第三条（「敦促美国拿出实际行动来」）作了重点批示，强调：「任何外国不得干涉中国内政」（!）

5 月 13 日，带着毛主席的切告，黄华正式前往大使官邸（第一次是学生探访老校长）。会面时傅泾波在座。杨奎松在他的分析里说，「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如果考虑到外交其实是内政的外延，著者倾向认为，它对后来毛的绝对不许外人干涉的「内政」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当然这里所说的外人，已不仅仅指外国人。比如文化人梁漱溟就是国家农业政策制定的外人;经济工作也不是彭德怀份内的事。至于这「内」与「外」会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划定，只能听凭伟大领袖自己的直觉了。

会面中，黄忠实转达毛「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意向。对此，司徒书生气十足地解释，「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接着，双方谈到至关重要的 「干涉中国内政」问题。作为崇尚自由主义的司徒雷登，以大使身份表达的——我们后世读史现在已经清楚看出——是一句多

么要命的话：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

从五月中旬到五月底，对如何处置中美未来的关系，似乎有两根线在同时运作。温和的一根：傅泾波再见黄华，明确告诉他，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是存在着极大分歧的。形势紧迫，对于司徒雷登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望得到中共方面的信任和谅解。黄华也在得到批准后，主动约司徒（还有傅泾波）在外事处再度面谈（6 月 6 日），虽然对原先谈过的（也就是毛规定的）三原则，不敢有一丝松口。

司徒除了就国际法向他的学生解释，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的局面下，无所谓承认，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准则」 和「人类普世价值」在这次关键性的会见中再次被强调。第一次当大使的传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一点不具外交官常持的「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Practical Convenience），再次温和却十分明确地告诉黄华，承认与否，将视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些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转移（!!!）。

另一根强硬的线，基于毛泽东那一刻也没有放松的警惕。对美国人最关切的「中国会不会成为铁托或者半个铁托」，他没有兴趣——那是 20 多年以后「整苏修那个王八蛋」的时候才提上日程的。他此时正「耐下性子」，一边「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一边等待转机。」

六月上旬和中旬，似乎是，温和派占了上风。司徒在上海的学生都已经知道，老校长已经得到去北平的邀请（意味着与周甚至毛的会见）。军管当局甚至同意他乘坐他自己的那架飞机。这时候出现的一个相对「负面」的消息，在我们后世读史人看来，也是这一大趋势的铺垫：6 月 19 日，中共突然采取了自春天以来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公布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五天后(6 月 24 日)，毛泽东决定将此事件再度升级，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　特务外交〉——这些，都可以看做是为即将到来无可避免的建交打击对方、拔高自己。他似乎决定暂时「悠住」。因为，就在那天下午 6 时，毛泽东照例给胡乔木写信，请他写一篇纪念「七一」的社论。胡的那篇，并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那篇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在那时候，还没有觉得自己必须全部重写。

到了 6 月 30 日，毛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并决定对美

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这已经不仅动嘴，而是动手了：为「党的生日」造势。

但他还没有得到最后「撕破脸」的机会。

6月30日，应该动身北上的司徒，没有听从傅泾波的力促，先行动后请示，而是依例向国务院报告自己受到的邀请，请示能否成行。没有等到否定指示到达，毛在得知这「请示」之后即明白表示：「从即日起，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毛泽东等到了他掐断温和路线的机会：难道是我们在主动邀请你么？这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毛泽东以自己的面貌出场，「夺回对中国政治的主导权」。〈论人民民主专政〉当日发表，「一边倒」正式出台。

别再梦想什么铁托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将义无反顾地倒向苏联！至于什么「真正容纳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对不起了，用不着你们多嘴。我们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

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了。5日，就在他抵达珍珠港的当天，《美中关系白皮书》发表。一周后，8月12日，新华社（我们已经知道，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接下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撰五篇评论，「对白皮书进行透彻的分析与批判」。其态度之峻刻、用语之刻薄、行文之一泻千里，以及为受尽了委屈与蔑视的中国共产党人吐气伸冤之酣畅淋漓，不仅在政治，甚至从文化与文学层

面，奠定了几代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仇视、疏离与无知。

纵观中国外交史，似乎未见有人撰文论述，一个成熟的主权大国，应否由笔力雄健的元首，如此恣意地抒发郁闷于胸中怨与恨——完全不顾如此激扬文字，是否会给他国政府造成「蓄意激怒」的印象，而为以后的外交操作造成障碍，乃至悲剧性地改变历史走向。不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你美国是怎么对待我们中国人民的？但综观《美中关系白皮书》，其中虽然有对中共的不恭之处，但主要内容还是检讨他们自己错误的对华政策，并拿蒋介石问罪。作为主要靶的，老蒋反应相当平静，只例行公事地发表了一个语气平和的抗议声明；而本应对这样的检讨表示欢迎的共方，却是出人意料地激烈——太反常了。

我们知道，从 1941 到 1949，美国政府支持的，一直是毛最主要的敌人蒋介石（日本侵略者还在其次）。「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时候，对美国，他曾经抱有那么大的期望：主义可以放在一边；「共产党」三个字也可以不要——体现善意的援助依旧未到，希望再次落空。到了 1947 年，帝国主义凶相毕露，军事上前所未有地大力援蒋。结果如何？如今我自己抢回了江山！坐在金銮殿上的，已是我共产党政府！这回，想要用我对付苏联了，是么？

这累积了八年，累积于两场大战中的气，自不待言。但毛什么人？记在肚子里几十年的仇，爆发前一分钟你都察觉不出来。

有这样的想法垫底，他同意黄华前往接触，「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从黄华发回的报告里，他知道自己的戒心不是无的放矢：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开明的民主分子」参加——这难道不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南京市委当时就对司徒雷登这段话做了生动解说：「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

但「广泛吸收开明的民主分子参加政府」，本是 1946 年马歇尔特别使华，希望迫使蒋介石政府接受的条件。所针对的，是中国这个大国里边的专制独裁，无所谓国民党或者共产党。中共当时对此不但竭诚拥护，还作出若干相当大度举措，很有在野大党的气概，比如为青年党参会而让出自己名额。而台上的蒋介石，则以绝对的不合作，迫使美国政府换马。

应该说，毛泽东对美帝的警惕、对知识人坚持独立思考，从而对独裁者可能有构成制约与挑战的厌憎，并非始自黄华报告。有据可查的是，1947 年 10 月 27

日，在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时，毛泽东在周恩来起草的一份〈论及统战策略〉的中央文件就曾加写：

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

1947 年 11 月 6 日，民盟在国民党的压迫下正式宣告解散。就在周恩来、潘汉年竭尽全力，将重要的「盟友」救到香港的当口，毛泽东则确定「让所有的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决心搞一党制」。他在这年 11 月 30 日给斯大林发去的一封电报，是对「建国」后体制的通盘考虑。在汇报了战事进展后，毛这样提到如何对待抗战胜利后曾一同争民主、争自由的盟友：

随着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向不再存在。民盟成员中有同情我党的人士，然而他们的领导者大多数是动摇分子。正是他们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民主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取胜时，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除中国共产党以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样能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这年 12 月中央开会。毛泽东说：

中间派没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区，素无中间党派。以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许多党派并存，是不对的。

虽然未来的政府中实际只有共产党一家，但还可以叫做联合政府，故联合政府的提法并不取消。

到了 1948 年底（12 月 4 日），就在三大战役血肉横飞之际，一则不知从哪个渠道发回来的「谈话材料」（说是从一个美国记者那里获悉），引起他严重注意：

美国国务院现政策之中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新的联合政府，恢复与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份子。

毛将谈话材料批送全体中共要员（刘、朱、周、任、彭真、胡乔木）：

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在被周派到南京「侦察对方意向」的黄华报告发回，美帝「赤裸裸地打算在新中国政府里支持民主人士，以抵抗共产党之政治攻势」这样一个阴谋坐实之后，毛泽东的基本国策一锤定音：对外，「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自己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对内，则把试图钻进牛魔王肚皮的美帝代表（「民主个人主义者」），一个个收拾掉。

作为一个大国至高无上的统帅，他正面临一场新的战争。在这场如何「造福」他的子民的战争里，他的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新的、驾凌一切之上霸主地位的主要威胁，已经不再是王明、不再是张国焘、不再是蒋介石和他美式装备的百万大军，而是有帝国主义在后边撑腰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艾奇逊在《白皮书》中已经明白招认：「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成为改造社会的有效力量」；「中国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个人主义终于会再显身手，中国终于会摆脱外国的羁绊。对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这个目标的发展，我认为都应当得到我们的鼓励。」

对这些大小毛猴，伟大领袖自有他的一套。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么？管你西装革履；管你长袍马褂——他的战场，不见硝烟、不见升旗降旗、不见合同条款。他将直戳心灵。好名的，好利的，好面子的，好风雅的……你总有一好吧？我就斗你那一闪念，让你从此规规矩矩——什么自由、平等、人权、民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清除干净，从此绝了你美帝的望！

「一边倒」（即与美帝绝决）后，中共一手包办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数量可观的开明的民主人士给安放到直令革命老军头跳脚怒骂的高位。1949 年 10 月 1 日，新政权决定向世界公布刚刚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名单。感到由衷高兴的张澜，建议同时公布 56 名委员——「让全世界看看我们的阵容」！当时没有人想到，或者想到了也没有胆子指出，这阵容会持续多久。

「一边倒」在红旗与热泪中收场。开国大典只有四名外国记者到会：苏联一位，意大利一位，朝鲜两位。在紧闭的大门里，毛泽东完成了他的镇反、肃反、合作化、工商「改造」、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没有任何外国政府就此干涉，也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就「反文明」或「反人类」罪对他予以正告。

大门里边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呢？

此时距离将章伯钧拉到斗争台上、距离把你们诸位真诚、热烈、勇敢、诚实，并且一心为民族、为国家的发言者，诱进绞肉机，残忍地碾碎、榨干，还有七年。

早在以「民主个人主义者」为敌的外事决策战场，毛泽东已经牛刀初试，以力排众议的「一边倒」，「扭转了历史发展的趋向」（朱正对反「右」之结语）。——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变迁　　章立凡

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基于对民主宪政的诉求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共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主党派成为联合政府的成员。随着中共权力的稳固，民主党派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以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为分水岭，中共实现了一党专政的政治目标，民主党派从盟友沦为改造对象，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了活动。1980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改造后的民主党派仍作为政权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但被定位于「参政党」。本文即以「反右」前后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中国民主党派被改造的历史。

一　民主党派与中共的结盟

1.　中国知识分子的结社传统与近代中国政党的会党特征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可分为知识分子结社和民间结社两种。明末清初，这两种结社开始相互融合，形成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会党——洪门。

中国近世政党往往带有会党色彩，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现代政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如此。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因此也有部分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 90%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会助长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而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的生存环境，亦需要经常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中共党史上一些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事件，皆与会党政治的传统有关。会党政治加上乌托邦主义，使中共难于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

2. 「第三方面」及其与中共的「联合政府」共识

1949 年以前，除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小党派，如民主社会党、致公党、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派、乡建派、职教派等。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这些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主张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但不具备军事实力。

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党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开始形成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不断提出实施宪政的政见，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呼吁实现西方式民主。1939 年，由民社党、第三党、青年、乡建派、职教派、救国会派的国民参政员及其它第三方面人士，组成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提出了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 1942 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 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建立一个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受到第三方面的欢迎。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推行的「三三制」政治样板和毛泽东的联合政府主张，也吸引了「第三方面」党派。

抗战胜利后的组党热潮中，又出现了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在这些中间势力党派中，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分别代表自由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其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也是最系统和明确的，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政、人权、经济民主、军队国家化等理念，都有完备的体现。

1946 年国共两党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第三方面的重新组合，青年党、民社党及一部分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党政权召开的国民大会；另一部分党派则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并进一步受到国民党的压迫；而国民党中的反蒋人士，组成了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斯大林不赞成毛的意见，他在 1948 年 4 月 20 日

的复电中说， 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1

斯大林一锤定音，决定了 1949 年后中国大陆的政治格局；而此时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的心态，则成为十年后发动「反右」的一个注脚。有研究者质疑这两封电报的真实性，但从此后的历史进程来看，笔者认为存在可信度。

1948 年，随着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军事失利，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重新洗牌。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国内各中间党派的响应。这些与中共合作的党派，后来被称为民主党派。中共的军事胜利比预计提前了两年，但其作为一个以农民为群众基础的政党，文化教育的平均水平低于国民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人才储备，因此，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合作，也是时势使然。

3. 中共与民主党派合作的底牌

将人群贴上「左」、「中」、「右」标签加以划分，是中共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模式，在各革命阶段的中共文件及毛泽东著作中屡见不鲜。1949 年筹备新政协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对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单位的「左、中、右」有详尽的分析。

在总体表述上，报告透露的长期目标是扶植左派，逐步孤立和取代右派。至此，中共对政治盟友的亲疏好恶及政治盘算已经一览无余，而八年后「反右」的一些主要目标人物，皆已列位彀中。

此外，刘少奇在 1949 年 7 月访问苏联时，给苏共中央斯大林报告中也谈到：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 134 人，其中党员 43 人，肯定跟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 48 人，中间人士 43 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 12 人，在进步人士中有 15 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 21 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2

4. 《共同纲领》与联合政府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在北京召开，

在出席新政协的 662 位代表中，共产党员约占 44%，党外人士占 56%.其中工农和各界的无党派代表约占 26%，各民主党派的成员约占 30%，基本上实现了中共的「三三制」原则。中共以及「老大哥」苏共都承认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府。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新政协及其制订的大宪章式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一文件带有临时宪法的性质保留了联合政府的理念框架，并未从字面上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军队的掌控。

《共同纲领》颁布后，各民主党派随即宣布以《共同纲领》替代本党的政治纲领，但中共仍保留了自己党章中的总纲。

新政治协商会议被认为是中共统一战线策略的成功范例，它显示出新政权的精英政治色彩及共产党对其他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的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有张澜、李济深、宋庆龄三位非中共人士；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约占半数；政务院名单中，非中共人士黄炎培、郭沫若出任副总理，章伯钧等二十人担任了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联合政府的色彩浓厚。

联合政府的人事安排在中共党内也引起了不满，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安排民主人士「好处很多」，「第一，可以『赚』人，各方面的非党人物都有当副主席、部长、司令员的，『朝里有人』，国民党不打自垮。……第二，可以『赚』来四万万人民，赚来土地改革。第三，可以『赚』一个社会主义。这叫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3

5. 民主党派改造的开端

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首先体现在人事安排上。各民主党派在新政协的代表名额分配与新政权的职务安排，起决定作用的是中共。

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新政协闭会后，立即并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救国会也在新政协闭会后宣布解散，其成员多数溶入民盟并掌握了领导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救国会与中共关系密切，这两个偏左党派单位的「掺入」，事实上改变了民革、民盟中的内部成分，显然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最终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八个民主党派格局。

新政权成立后，民主党派「军队国家化」梦想首先被打破。中共的成功经验

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语），1950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利瓦伊汉宣布：「各民主党派已决定不在工人、农民和人民武装部队（包括军事学校和机关）中进行党派活动。」4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同年 7 月 19 日正式作出《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进一步明确，各民主党派在下列机关学校亦不进行组织的活动：（1）情报机关。（2）革命大学。（3）旧人员训练班。（4）使、领馆。5 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的指示，活动禁区还包括少数民族地区。6

对民主党派的人事改造，也在新政权成立后不久开始。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如胡愈之、赵朴初、沙千里、孙起孟、严希纯等。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如南汉辰等曾被公开安插进民主党派。中共将「以进步为骨干」内定为对民主党派改造方针。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提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合乎我党党员条件的入党，以便从民主党派内部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7 例如民盟北京市委主委吴晗在 1957 年 3 月加入了中共，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的中共党员身份早就存在，1958 年又以重新入党的方式予以公开。

中共中央统战部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分工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根据统战部 1953 年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民主党派在国内的党员总数为三万二千多人（加上民盟、民革和致公党在国外的党员约一万人，总计四万多人。较之一九五零年国内一万一千余人，发展了两倍。

虽然人数有所增长，但比起中共发展党员的速度和规模，民主党派难于望其项背。章乃器曾坚持主张民建应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而中共的因应之道，是成立全国工商联，分散了民建的实力。工商联因此成为与八个民主党派并列的人民团体。

各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变成由国库支出。

中共宣布在外交上实行亲苏的「一边倒」政策，遭到民主党派中崇尚西方民主理念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质疑，毛泽东为此曾在 1949 年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等雄文予以驳斥。民盟中主张与美国保持关系的重要人物张东荪遭到整肃，被扣上「出卖情报」的罪名而失去自由。

中共在 1950 年代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也对民主党派造成相当的冲击。例如民革主要是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治势力，但与旧军政及地方势力渊源较深，在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受到的触动较大。军警曾包围民革主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住宅，从他家中抓走访客。又如民建是以民族工商业家为主体的政党，「五反」运动中，中共统战部一度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很多会员遭到斗争甚至自杀。思想改造运动和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等，也触及了很多民主党派内的高级知识分子。

但民主党派对于中共出台的政策，仍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权。对于出兵朝鲜、粮食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民主党派中有相当多的反对意见。黄炎培曾主张「江南无封建」，对土改政策提出质疑，并批评国家在重要物资上的垄断是「与民争利」；梁漱溟因反映农民生活太苦而遭到毛泽东的责骂时，陈铭枢当场要求毛为梁的观点定性；统战部提出民建发展组织应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章乃器一再表示反对。

6. 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政治一体化

1953 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原来设想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1954 年起，以国家资本主义取代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进程就开始了。

1954 年 9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原先的《共同纲领》相比，「五四宪法」首次明确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前提，并增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务院副总理的党外人士，皆转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至此，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中共领导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联合政府的色彩渐趋淡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日形突出。而在 1949 年曾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一个咨询机构。

1956 年毛泽东对民主党派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国共产党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这一方针。但有不少民主党派成员私下表示「监督不了」、「监督不敢」。

1956 年年底，「对资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在党内会议上亮出底牌说：对于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需要「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方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给安排，给他们事做。这样，政治资本就不在他们手里，而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8

二　在「阳谋」中陷落

1.　「整风」之前民主党派的批评

1956 年是个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共产主义世界引发了地震，不久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更引起毛泽东的警惕。这警惕也分为两种：一是对党内接班人否定前任功绩的警惕，二是对党外政治力量问鼎权力的警惕。

自 1956 年 9 月以后的近半年中，全国各地约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民主党派的政治批评也在一些内部会议上出台。在 1956 年 7 月和 10 月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向中共「提出了尖锐、严厉的批评，广泛涉及党的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中共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章伯钧等提出：一、监督应有法律保障，民主党派向相当政府部门应有质询权；二、民主党派可在人大设「议会党团」，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三、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批评建议，应认真处理，不得敷衍。

关于民主党派的发展方针问题。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一九五二年提出「中小为基础」的建议，是团结中小、排斥打击大资本家，是制造阶级斗争。对于过去协议的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章伯钧一再表示不满，主张要打破「防区制」「包干制」。有些人对中共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认为是「对九三学社的威胁」。有些人从增强民主党派的实力出发，主张取消民盟、民进、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四个党派，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大党。

章乃器批评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指责部

分党员、进步分子怀疑和歪曲党的和平改造方针，执行得七折八扣，使工商业者受到无情打击，主张重新审理「三反」、「五反」案件，处分过重的予以平反。罗隆基、章乃器等提出，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觉得自己比党员低一等。座谈中普遍反映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对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十分不满，有人指出：「现在官气之重，比国民党还甚」。许多人对中共划定的民主党派发展方针表示不满，对政协的工作感到有名无实，章伯钧主张实行「两院制」，将政协变为上议院。9

对于党外人士的批评，中共中央统战部确实认真加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据说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亦有实行「两院制」的想法 10，中共中央于同年 12 月批准统战部《关于加强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的指示中，认为「政协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具有统一战线组织的作用，而且在实际上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

至此，1957 年「反右」的三个主要目标人物，已全部进入毛泽东的视野。毛的视角与刘少奇及做具体工作的中央统战部显然不同，他认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11 毛未尝没有「引蛇出洞」的意图，不过对党外讲得隐晦，在党内就比较放得开。1957 年 1 月，他在党内会议上谈到「对台戏」时说：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12

2.　毛泽东提出「整风」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批评

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的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与会的党内外人士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话。讲话的内容被迅速传达到全国，掀起了一股清议之风。

在 3 月间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再次重申「不能收，只能放」，鼓励批评，并宣布年内开展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再度发出指示，组织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展开批评。民主党派的批评，多集中在中共与非党人士的关系上，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批评了「以党代政」造成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这些发言都涉及中共的领导角色及党派关系，章乃器认为自己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斗争得来的」；章伯钧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政治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

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 6 月 1 日关于的「党天下」言论，提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并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喊话：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 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

中共一直将民主党派定位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毛历来关注的党外动态重点，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动向，二是民主党派的动向，此时这两个方面代表人物的言论，被认为是在向中共争取更多的权力。

储安平的发言，是在向毛泽东重申 1949 年建国时的联合政府共识，触及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底线。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都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储安平「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的言论，直接涉及到现政权格局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

3. 形势失控与中共转舵

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言论，影响迅速波及全国。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的批评，更广泛地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毛泽东本想利用「大民主」手段来冲击官僚体制，却产生新的两难境地：「大民主」危及到党的一元化领导，或许是他始料所未及。青年学生与民主党派人士合流的迹象，也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毛泽东惯用的权术，是利用中央号令地方，利用地方挟制中央；利用党外制衡党内，利用党内压制党外。当他的党内权力受到威胁时，会偏右一点，以借助党外力量压制党内；当党外力量上升时，会偏左一点，赢得党内支持一致对外。

在党内权力制衡关系中，毛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各中央局和省级干部，这些人忧心如焚，呼吁他将自己放出的「魔鬼」收回瓶中。在中央高层中，对「整风」

的看法虽未尽一致，但对于「反右」的看法却空前一致，因为这关系到政权。5月1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了「反右」决定。毛泽东的决策，得到从中央到基层的一致支持。他的个人权威也开始重新树立。

对毛泽东而言，「大民主」是一把两刃剑，既可用于党内，又可用于党外，剑柄则操之于己。「蛇」被引出「洞」后，是「放蛇咬人」还是「斩蛇七寸」，完全根据形势需要而定。重树党内个人权威和整肃民主党派，都是其战略目标。这两个目标后来都实现了。

4. 「反右」的策略

作为群众运动大师，毛泽东善于利用形势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利用民主党派内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据黄炎培1957年6月5日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向他们透风说：「章乃器是和我们走两条路的」，「章伯钧反动语」，「他和罗隆基勾结了」。

毛的旨意在民主人士的小圈子内迅速传播并得到呼应。次日，在民盟的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安排下，章伯钧与六位教授座谈，史良、闵刚侯在座。与会的教授大多认为形势严重，章伯钧提出：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要帮助党。13 当晚史良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并被毛泽东作为民主党派插手学潮、向中共夺权的证据。

毛泽东将打击重点放在成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同盟，并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罗织出「章罗同盟」这个名词，以影射民主同盟。

被毛泽东称为「右派的老祖宗」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情况有所不同而又有所相同：章伯钧注重党派工作，大部分时间在民盟、农工主事，很少到交通部上班。罗隆基对政治兴趣浓厚，但在民盟内是非主流派，盟务插不上手，对在森林工业部部长的工作一直很消极。章乃器属于专业人士，与章伯钧、罗隆基工作旨趣不同，嫌民建内部是非太多，多次表示要退出，几乎每天都在粮食部上班。

这三位「大右派」的共同特点，是年富力强有主见。章伯钧、罗隆基在民盟分属左、右两翼，关系紧张，但都属于少壮派，平时好发表政见，毛泽东便制造出 「章罗同盟」，一釜烹之。章乃器在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经常与中共「唱对台戏」，在民建、工商联内则与黄炎培、陈叔通长期不和。毛泽东便亲自深夜召见

两老面授机宜，利用矛盾将章乃器扳倒，并给所谓的「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

一些拒不认罪的「右派」，在运动后期被定为「极右分子」加重处理，如民建的章乃器和民盟的彭文应等。

5. 民主党派沦为改造对象

「反右」过后对民主党派的评价，与此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 1956 年 3 月起草的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决议，「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14，但在 1958 年 7 月 18 日该部提出的《改造民主党派五年工作纲要》（修正稿）中，却将民主党派定位于「半反对派」，并认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是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这场阶级斗争中同我们较量的主要对手」。

这个文件认为：「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它们在这一方面对我党的辅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加强了」。文件制定了具体的「组织整顿」步骤，以实现「壮大左派、团结中间，孤立右派」的目标。

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在「反右」后迅速跌落，只是作为「政治花瓶」继续存在，留任和新任的民主党派领导人表现得十分驯服。1959 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部长名单中，党外人士比例由上届的 37%降至 22.8%。《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在「反右」以后相继被收编，某些专题新闻的审批权由党中央专门机构行使。

6. 走向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

以 1957「反右」为分水岭，共和国的民主建国理想和联合政府共识被摒弃，走向一党专政和毛泽东的个人独裁。

「反右」整肃了民主党派，不仅令「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徒托空言，也使社会矛盾集中到中共自身，政治斗争的重点逐渐转移到了党内，资产阶级已成为改造、专政的对象，仅存政治宣传上的假想敌价值。1959 年的「庐山会议」重创党内民主后，历经「七千人大会」到「四清」，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名义进行的「阶级斗争」，毫无例外地以揪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为目标。自相残杀的党祸，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内乱。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8 月 23、24 日，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

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 72 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自 25 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陆续贴出「通告」，表示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随着红卫兵运动的狂潮从北京向全国各地席卷，民主党派人士横遭抄家、批斗、殴打、侮辱，民主党派濒临灭顶之灾。

三 民主党派的现状

1. 「右派」的「改正」

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反右」后严重下降，成为「政治花瓶」。「文革」中被迫停止活动长达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恢复活动。中共出于缓和国内矛盾的需要，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开始对「文革」、「反右」和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大量的冤、假、错案加以清理。

1978 年 9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五部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发［1978］55 号），提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予以改正。」 15

经过反复斟酌，198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又下发〈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发［1980］60 号）。在复查的二十七人中，确定二十二人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

根据「文化大革命」后官方公布的数字，「右派分子」总数为 55 万多人，约占当时中国大陆知识分子总数（500 万人）的 11%。但这个资料一直受到质疑，如将内定划为「中右」及补划的「右派」等计算在内，受到迫害的人数远远大于此数，而且还不包括他们的亲属。

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主要执行者，他坚称当时「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16

根据这个定调，60 号文件在承认「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的同时，坚持认定「反右」是完全必要的。报告推翻了毛泽东在 1957 年罗织的「章罗同盟」，但出于政治需要，对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五人，仍维持「右

派」原案（其中前四人已逝世）。

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上，对错划的「右派」都只讲「改正」，以区别于对其他冤假、错、案的「平反」，这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坚持「反右」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文革」中被扣发工资的干部，工资都是全额补发的，而根据 55 号文件的规定：「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的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但不补发工资。」这也是对「右派」实行区别对待的一种体现。

2. 重燃的政治热情与「六四」事件后的转向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诸如 1945-1946 年的国共和谈、1957 年的中共整风、1989 年「六·四事件」中，民主党派曾试图扮演调停缓冲的角色，但并不成功，甚至不受欢迎。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的治国方略从「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工作为中心」。1980 年代初，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民主党派的政治热情重新焕发。一些资深的民主党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经济问题上，例如在三峡大坝上马的问题和 1989 年「六·四」事件上，不仅提出过独立见解，甚至能够坚持己见。

在内部人事上，也出现了对中共干预的抵制。民主党派内部曾有动议，要求具有中共身份的「交叉党员」退出，或不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民盟的一批中委，曾试图在换届时通过选举由千家驹取代费孝通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经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出面弹压，费孝通才保住了主席职位。

「六·四」枪声响起之后，民主党派随之失声。不久迅速转向，纷纷发表声明支持「平暴」，并慰问戒严部队。个别持反对意见的人士（如千家驹）则远走海外，民主党派一度高涨的问政热情归于沉寂。

3. 由联合政府成员变为「参政党」

1989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将中国的政党制度定位在「多党合作」。从此以后，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彻底告别了「联合政府」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历史概念，进入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时代。

定位于「参政党」的民主党派，除了基本的组织活动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举办各种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提案、议案，体现「参政议政」的存在。虽然民主党派的工作沿袭了 1950 年代划定的「重点分工」范围，而各党派的调研、参政

及提案内容，却未因这种划分而显示出明显差别，显得笼统而杂乱。由于信息不公开，民主党派的调研信息明显不足，提交的议案也不专业，不易引起政府决策机构的重视，最终流于形式。

4. 民主党派的边缘化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增长引发的政权腐败，民主党派创建时的民主宪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机关化、边缘化的现象十分突出，政党特征模糊不清。民主党派在监督方面无所作为，甚至其自身也难以抵御腐败。民主党派的边缘化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无独立政治主张：按照国际流行的政党概念，政党应有独立的政治纲领、组织体系、经费来源、群众基础等，这些都不适用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下的民主党派。除了参政水平低下以外，民主党派的政党特征也逐渐消失，成为政权的一部分。目前的民主党派有的仍以《共同纲领》为政纲，有的虽有政纲却与《共同纲领》大同小异。在执政党宣布自己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民主党派习惯于宣称自己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二、入党动机功利化：随着老一代的领导人逐渐辞世，民主党派开始换代并迅速完成领导层的更替。新发展的党员对本党的历史传统和理念十分隔膜，更多的是功利上的企望与诉求。

三、组织发展受限：目前各民主党派总共仅有65万党员，相比与中共7000万党员的规模，显然少得可怜。民主党派发展党员，仍受1950年代中共划定的重点分工规范，一些重要的部门和领域，至今仍是民主党派的发展禁区。

四、副职晋升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被安排到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与1954年以来的状况并无区别，其它人物只能安排副省部级以下的实职，与建国时的阵营不可同日而语，甚至远不及「文革」以前的境况。民主党派人士的从政轨迹，会遵循「副职晋升」的规律，即从下一级副职晋升任上一级副职。

五、干部培训制：民主党派干部的提拔，需要通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培训。该校被称为民主党派的「中央党校」，仿照中共中央党校的模式培训党外干部。目前中共中央党校兼具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库的职能，而社会主义学院只是一个干部晋升的台阶。

六、「交叉党员」掌权：虽然中共宣称其党员不加入民主党派，但各民主党派

内部，仍存在一定数量不公开或半公开的中共党员（习惯上被称为「交叉党员」)。但目前掌握实权的领导人，基本上是这类人物。「交叉党员」的存在及其实权地位，从组织上确保了民主党派与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七、人事、经济机关化：如前所述，自 1950 年代起，民主党派机构从人事、经费上开始机关化。各民主党派的办公场地和日常办公经费，全部由国库支出而无需自筹。2005 年颁布的新《公务员法》将民主党派机关工作人员正式纳入公务员队伍。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参政党」与「执政党」利益上的一致性。

八、监督无力：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 1980 年代提倡：民主党派与中共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现状则是：因为利害一致，民主党派与中共在做到了「长期共存」和「荣辱与共」；因为地位不同，在「互相监督」和「肝胆相照」上难以到位。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决定了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无力对执政党实行有效的监督。

5. 民主党派有没有未来？

自「反右」历经「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间，公权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监督。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起飞，也造成中国大陆的贪腐横行，这正是消灭了民主监督的恶果。由于毛泽东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维持，「反右」这一摧毁民族精神、斫丧民族元气的历史罪案，至今未得到应有的清算。

中国大陆的社会转型和分化，使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民主宪政诉求，中共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同时，不得不继续独自承担改革的全部压力。新任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在接任之初，对民主党派元老的优礼有加，不断释放出提高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2005 年和 2006 年，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三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文件提出民主党派人士「符合条件的可以担任正职」，明确了把党派专项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研究解决党派机关人员编制等。

2006 年 11 月出台的《关于巩固和扩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还提出「要照顾同盟者利益」。2007 年 4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表决，任命原同济大学校长、致公党副主席万钢为科技部部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来自民主党派的部长。这一任命确实具有诠释「照顾同盟者利益」的象征意义，也

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参政党」与「执政党」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但在原有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起决定作用者仍是中共中央派驻的部党组。

中共高层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大前提下，试图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能否使国家走上宪政之路，历经长期改造的民主党派前途如何，至今仍属未定之数。

结　语

以 1957 年「反右运动」为分水岭，毛泽东重新树立了个人权威，走向个人独裁；中共推倒了联合政府共识，走向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则从联合政府的盟友，沦为被改造的对象。就中共而言，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时也是失败的。同盟者在被成功地驯化为仆从之后，当主人出现决策错误时，仆从是无力履行监督功能的。

民主党派创立时的理想是反对一党专政，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今日中国之民主党派，距离这个理想已十分遥远。当商品经济的复兴唤醒了国人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参与到公民维权行动中时，其中并无民主党派的身影。当社会热烈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时，人们几乎听不到民主党派的声音。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知识分子党派与农民会党的结盟，其结果是前者被后者改造。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有「党文化」而无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党」实际上趋同于「政权」。如果民主党派应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须反省自身执政历史的是中共。

西方民主理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外来政治文化，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却毫无例外地被同化为「中国特色」的「会党文化」（或曰「党文化」）。「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的积弊，连海峡对岸的台湾都无从幸免。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不仅需要反省百年来的政治文化，更须反省中国人的「国民性」。（ 2007 年 6 月 26 日完稿）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俄]安•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 年 1—2 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 年第 5 期。

2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 页。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4 页。

4 李维汉:《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的形势与任务》(李维汉同志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0 年 3 月 21 日。

5 中共中央《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2),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65 页。

6 《民主建国会关于不在军队等系统发展组织的通函》,《中国民主建国会历史文献选编》(2),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4 页。

7 《1956 年到 1962 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1956 年 3 月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决议)。

8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37 页。

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820、821 页。

10 阎秉华:《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炎黄春秋》2006 年第 11 期。

1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79 页。

12 毛泽东:《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355 页。

13 闵刚侯:《章伯钧召集的一次紧急会议》,《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4 日。

14 《1956 年到 1962 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1956 年 3 月 3 日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决议)。

15 《中共中央〈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 年 4 月 5 日。

16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

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7 页。

从北大一角看「反右」　陈斯骏

我所在的北大历史系五四级一班有成员三十余人，其中三分之二为调干生，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反右，派了四顶帽子，其中一人后来升级为「托派反革命」。此外尚有一名内部控制的中右份子。时至八十年代初，已知四右中两人死亡，一人痴呆，幸存者仅我一人。数十年来，苦熬之余，每多思索，果能寻得苦难症结，不枉我当年投太史公门下之初衷也。

一 、序战

1950 年 6 月，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在北大红楼对首都高校教师和高年级学生做了历时五个多小时的演讲，主题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讲话中，他提出了「砖与墙」的比方，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他说，一块砖砌到墙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到墙脚，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艾思奇形象地解释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换言之，消灭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 和自由思考，正是宗旨所在。艾思奇的讲话牵动了一个时代，牵动了一场历时数十年的知识分子浩劫。

1952 年高等院校调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调长北大历史系。原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系主任郑天挺教授另调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论及郑天挺，他在北大的渊源、资历以及在史学界的学识、威望，本无人可以企及。但中共视北大历史系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军，改造合并后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实为当务之急。郑天挺之调南开，据他自述：「在思想颇有波动。多年从事清史的研究和教学，北大及北京其它各单位的清史数据浩如烟海，绝非其它地方可及……」。郑师纵然悲叹，但也无可如何。翦伯赞当年在中国史学界资历不算深，他之取代郑天挺是形势的需要，也是他夲人与中共多年密切关系之所以然。当时，北京史学界尚有一位领军人物即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也被调

南开大学历史系。如今看来，调郑，遣雷，无非是为翦伯赞主政北大历史系腾出道来。风雨欲来！当时已有些敏感的教授联系到思想改造运动，知道历史系从此多事矣！

合并后的北大历史系教师队伍颇为纷杂：既有北大胡适多年培植的师资，又有蒋廷黻的清华历史系班底和燕京历史系洪业的旧部等。总算好，几年过去，翦伯赞以其相对宽容和平实的作风取信于方方面面，北大历史系确已稳坐国内史学的领先地位。

如今，经历了几十年风雨，我们看出一条规律：毛泽东的国家是经不起稳定的，有几天好日子，接着必然是扑扑腾腾，风吹雨打。1955 年反胡风告一段落，肃反接踵而至。北大和北大历史系的沉重灾难始于是时。

五五年胡风运动在北大见有大动作，只是在大饭堂一次集会上公开宣布逮捕东语系一名讲师而已。顺便一提， 这位讲师与胡风仅一信之缘， 不久被释， 但又难逃反右一劫。

肃反初期，我班曾有个别同学派出外调工作，此外也仅有几次小组讨论。其中一次是批判「胡风份子」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斗〉。

五五年夏，晴天霹雳，深受同学爱戴的青年教师王承照自尽身亡。王承照是张政烺教授的助教。张先生是知名的古史家，但为人木讷，不善言辞。王承照则擅表达。张的智慧深邃和王的能言善辩可谓珠联璧合。肃反开始不久，有材料说，王承照在解放前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分队长， 而他自己交待是普通团员。按规定的政策界线，三青团分队长以上是「反动党团骨干」。据说学校有关干部和王谈话后， 当天，他就自我了结。

王之死，在历史系引起阵阵不安的回响。老教授们在惋惜、悲痛之余，不免为政治运动之险恶而震栗。解放至今，历史系因政治运动而夺去人命的毕竟是第一遭。一位教授说，王承照「罪」不至死，夺去他生命的是不珍惜人命的官僚主义。学生中，悲愤之情难免演化为激愤的抗议。有人在党总支办公室门口贴上四个大字：「草菅人命!」总支夏自强书记为此寝食不安，有人说他这几天常唉声叹气，人明显地瘦了下来。夏自强出身燕大历史系，解放前是地下党员，有人说他是个书生型人物。也有人说，翦伯赞主任在得知此事后，潸然泪下， 说他身为系领导人责任重大。

学校党委毕竟不同凡响。他们认为，王承照之事也许是操之过急，今后工作宜细不宜粗。但目前暴露的右倾情绪十分严重，历史系总支书记在斗争中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就这样，肃反结束后不久，换了一位新的总支书记。没有这个人，北大历史系就没有「波澜壮阔」的十年历史了。

二、「小阳春」

反胡风和肃反甫停，1956 年出现了毛泽东统治期间难得一见的「小阳春」，在北大也有了几阵和风。历史系主办的学术讲座曾一时轰动。当时请来了哲学研究所的郑昕、贺麟和金岳霖等教授，讲了康德、黑格尔学说和逻辑学。在校内沉寂多时的西语系名教授朱光潜讲了西方美学史几个问题。外校有人来旁听，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也来了记者。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大受启发，我级许多同学选修了外系课程，我就选了西方哲学史和西方文学史。青年团号召团员准备考副博士……。学子们精神亢奋，人人立下宏愿，老教授们也个个春风满面。五六年春，马寅初校长开始举办全校性的不定期讲座，邀清中央首长和名人来校演讲。乔冠华（外交部部长助理）、李富春（副总理）、胡耀邦（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陈毅（外交部长）、廖鲁言（农业部长）和丁玲（名作家）、范长江（名记者）等人光临北大大饭堂讲台，很受同学欢迎。马老及时利用了当年宽松的政治气氛，打算为北大营造一个活泼、多元的良好学风。与此同时，校内出现了不少新的学生团体：国际时事学习社、音乐欣赏社和乐队等相继成立。

这一年的 5 月 13 日，我级同学到明十三陵游覧，意外地在长陵遇到了刘少奇委员长。在半个小时的席地谈以后，刘少奇向我们透露了党中央即将执行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方针。刘少奇谈话内容在北大校刊刊登后，同学们对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更是信心百倍。

如今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在回首这段历史时，大多为 1956 年那个被称为「兴旺的年代」的骤然中断而惋惜不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他们寄望于中共，但是换来的是毛泽东的出尔反尔和越来越收紧的桎梏。

三、「五·一九运动」

北大整风鸣放始自 1957 年 5 月 19 日。这一天大饭堂外墙出现了历史系五五

级几位学生署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就其内容而言，并无惊人之处。只是质问校团委:「出席全国团代会的北大代表是谁？谁选的？」如此而已！大字报署名者四五人皆团员，事后，其中一人虽划了右，但其罪名与该大字报无关。看来，当局并无追究这个大字报的意思。但应指出，没有这下子「春雷」，也就没有以后的鸣放大潮。传闻该大字报是历史系五四级许南亭所撰，有误。随后，校园内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小字报，5 月 23 日，人大女生林希翎在校园内发表了演说，引起了较强烈反响。这期间，校党委副书记崔雄昆曾在一次大会上婉转表示不同意校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但一两天后又听说党委书记、副校长江隆基说不该压制学生鸣放。如今看来，学校领导人已陷于无所适从，放也不是，禁也不是。此时，全党只有毛泽东一人是「清醒」的。崔雄昆之辈怎能理解领袖的「阳谋」大略呢？而江隆基此时的「似是」却在若干天以后转化为「而非」，成了无可原谅的右倾和做了右派的尾巴！

如今，许多人都说当年的右派言论是惊天动地的启蒙运动，对此，我不尽苟同，这个评价太高了，不切当时实际。须知，毛泽东在运动过程中，一直掌握主动。他诱使毫无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和学生跳下他布下的陷阱，大多数受难者浑然不觉。可以肯定，运动中没有出现可称之为先知型或领袖型的人物，一些难友是在多年后才意识到自已的历史责任，而更多的人在残酷折磨后已丧失了斗志。中国的青年运动在 1957 年遭受了重大打击，十年后，恶果毕现。毛泽东在文革中轻拨弹指，又让千百万青少年卷入毁灭性的红卫兵运动，造成华夏空前浩劫。当前，中国青年茫然失去方向，晃晃悠悠中，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寻得了什么？值得我们深思，再思。

四 、析案例若干

北大的鸣放材料荦荦大者，已广为人知，这里不提也罢。有几个小案例值得说说。

例一：校内有一个学生组成的百花社，笔者曾参加了他们一次小型座谈会。会上，历史系五四级一班的党员黄良元以新闻自由为题，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共产党人为什么要把自由民主大旗送给资产阶级呢？难道共产党人不主张新闻自由吗？请同学们听听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他在〈第六届莱因省

议会的辩论〉一文中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的意思当然也包括新闻自由。很遗憾，我们没有人引过这句话。新闻和出版不应成为谁的工具和喉舌，我们的先进制度应该体现在新闻和出版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上。」

在座有一位同学插话说:「据我所知,马克思这话是针对普鲁士反动当局说的，拿到今天，合适吗？」黄良元胸有成竹，他说:「有一句恩格斯的现成话，可以用来回答这位同学的疑问。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座中不少人鼓了掌。

为了这次发言（当然有别的罪名），黄良元派为极右 ，遣往京郊斋堂劳改。八十年代初，我与黄曾一晤。黄说:「我一个共产党人，引用了马恩的话，因此成了右派，我至死不解。」我说:「中共本质是专制主义，如果说有人不喜欢马克思的某些言论，那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黄良元，一位勇敢、明智的马克思信仰者。五十年前，他和我谈到，他理解的马克思思想是批判与宽容并重的，对专制、独裁的批判和政治文化的多元论是马克思思想的核心。黄说，他反对武断解释马克思，更难以容忍官方的任意曲解。为坚持马克思思想，黄良元付出了生命！

例二：哲学楼楼下走廊有一张题为「请用法制代替运动」的小字报，内容如下:「……共产党发起了整风运动，要求人民对党和政府提出监督意见，这样做，当然是好的。当今世界文明国家都建立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使民意能上达执政者，形成一种对权力的制约。我想，文明国家之所以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共产党喜欢搞运动。这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传统，无可厚非。但时至如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将法制建设置于工农业建设同等重要地位……我们批判官僚主义，不仅要揭其现象，更应究其本质。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正是无视法制的人治陋规。许多领导干部喜欢一句口头禅：「这事是我说了算」。这不对！我们应该有一个不是由谁说了算，而是法律说了算的制度……。」

小字报的作者已不可查，也不知他有没有因此成了右派。时至如今，中国的小百姓仍为人治所苦，这个小字报的作者如健在，他应为自己数十年未竟之志而痛哭。此类针砭政治现实的言论，在北大校园言论中不在少数，说大字报闪光点就在这里，我是赞成的。有人说当年北大大字报具有启蒙性，就有点夸大了。北

大人都知道，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原则，在北大是早已有之的。

例三 ：文史楼楼下走廊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解放者，还是镇压者」:「十八世纪最后几年，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接连打败了地中海沿岸撒丁岛、马耳他岛和爱奥尼亚群岛等地的封建统治者。这些地区人民箪食壶浆，迎接给他们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军队。不久，俄国沙皇的黑海舰队在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率领下，把法国占领的地区夺了回来，恢复了封建统治。在苏联的历史教科书和电影作品中，乌沙科夫和沙皇军队成了「解放者」!……该怎样评价拿破仑和乌沙科夫在这场斗争中的是非曲直呢？」

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我。

没有想到，在这张大字报周围出现了五六张「露骨反苏」的大小字报。

有的直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失土，批评苏联继承沙俄的侵华政策，质问苏共为何不执行列宁的平等对华政策。

有的质问中共为何承认外蒙的独立。

有的指摘 1945 年苏联红军进军东北后的胡作非为。

有的批评苏联专家的霸道作风。

……

一位校内苏联专家在翻译陪同下，看了这些大字报。他到学校质问，这是露骨反苏，你们管不管？

当然要管！连不同意考试五分制，主张多学英文少学俄文的人也扣上反苏右派帽子！当年我小心翼翼不去碰苏联，但没有想到沙俄也是碰不得的。

五、 灾难的持续

此时，1957，十年后，文革，一脉相承。

学生中的右派，浑然不觉大难已至。我级大部右派都被遣至京郊斋堂公社劳动改造，少数几人留校监督改造。右派大多思想不通，但都愿意服从改造，望有出头之日。五十年过去了，难友们经历了苦厄的大半生，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这就是当局对我们的要求：「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实质。

历史系教师也划了一批右派，为首是向达教授和王铁崖教授，青年教师中，有张广达和夏应元等先生。杨人楩、商鸿逵等教授虽未公开划右，但仍受到批判

警告。

说起向先生，历史系的学子都会有一肚悲愤要倾诉。北大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科学院学部委员、知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和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这些都是向达反右前的头衔。一夜之间都没了，成了一个在历史系厕所低头扫地的佝偻身影。

五七年整风前，向达曾以苏联极左派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言论为戒，说明割断历史文化传统之为害。向先生担心的是中国史学也会走上苏联的错辙。向先生为人鲠直，言谈不慎间难免得罪某些权贵。然而，这一切都无从得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但是灾难毕竟来了，而且在十年后文革中演成没顶之灾，向达教授逝于文革之始六六年，表面原因是死于尿毒症，实际上是死于残酷批斗。

杨人楩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法国史专家，专长法国革命史。解放前夕，他曾在储安平的〈观察〉杂志撰文〈自由主义往何处去？〉。杨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到任何国家，当然可以深入到中国。杨指出，自由主义之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共产主义根本反对自由主义。杨还强调自由主义者是不主张内战的。……有如杨人楩之类的教授是「应该清算」的，但他在整风期间，没有公开反党言论，似无从划右。当时历史系有传闻谓，杨受批判后，内部划为中右，这大概不是空穴来风。文革期间，杨人楩受到冲击，过早地逝世。

商鸿逵教授是原中法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院系调整后调入北大历史系，降职副教授。自此，不允他讲授明清史，只安排他讲次要的历史文选。在北大，他被蔑为「反动文人」（他曾加入国民党）和「黄色文人」（曾撰名妓〈赛金花本事〉）。他虽未划右，但难逃批判。商先生性格豁达，在多次运动中，能做到坦然对之。这是他能活到八十年代的原因。

谈及史学界的反右，雷海宗教授的遭遇当然不可忽略。雷先生 1927 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随即返国担任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教学之余，从事开拓性的研究。所著〈殷周年代考〉一文确定了典籍〈竹书纪年〉中所述殷周年代细节。三十年代以至抗战，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授和系主任、院长等职。此期间，他学着成就斐然，所撰论文曾成集：〈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兵〉。继后，雷先生又热衷于社会文化研究。他在「战国策」半月刊以及大公报撰文多篇，批判中国柔性主义文化传统和国民

劣根性，大力倡导英雄崇拜。他的学派当时被称「战国策派」。1949 年，国民党当局曾动员他前往台湾，他不为所动 。

解放后不久，如前所述，他从清华去了南开。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运动，学习了马列主义。雷先生前后思路、遭际和上述向达和杨人楩、商鸿逵先生相似，可以做为「原罪」派的榜例,他们即使不鸣不放,也难逃反右清算。雷先生在整风前后的确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其中有的可谓「反动透顶 」（比如他说，到 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已停止发展）。即使他言论「反动」程度稍逊，也难逃反右大棒。毛泽东和康生甚至直接过问对他的批判。雷先生逝于反右后四年，即 1962 年，可见大棒打击之直接，威力之可怖。

六、所知北大反右血与泪

王承照事件以后，来了个新任系党总支书记，此人是出身西南联大历史系的许寿谔(此时已改名许师谦)。前任书记夏自强显然已不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调到教育部了。许师谦上任之始即以改造北大历史系为己任。「风生水涌」，反右给他带来了机会，自此十年，直至文革，在他调任校党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之前，历史系的大小灾难都留下了此人的罪印。直至文革结束，他还公然阻挠翦伯赞夫妇冤案的的平反。

应一提，许师谦麾下有一些邪恶的左棍子。没有他们，历史系的反右是搞不起来的。试举二例：一是五四级的李原，此人反右期间「火线入党」，被许师谦赞为「阶级斗争英雄」。他学识极差，毕业后居然留系内当助教。但因不胜任教学，只好在系内专职整人，当政治辅导员。（顺便一提，文革告终，邓广铭教授主政历史系，拨乱反正，把反右留系的左棍子，一一拨走）文革期间北大武斗，李原充当校内一派头目，被对立一派俘获，活活打死。另一个孙伯揆，也是五四级，此人被称「理论权威」，为人阴阳怪气，以整人为业。反右之初被许师谦提拔为党支书，毕业后在哲学系任教。后调南京大学，数十年一帆风顺。一些同学说，想起他，就不免想到康生。此人已病逝。

反右期间，在学学生五三级至五五级中共有八个班，每班三十余人，按指标各摊三至四名右派。粗略统计，派入右册者至少有二十五六人。另有入册而不公开的中右份子若干。有文章说北大历史系所划右派要比中文系少得多，原因是系

主任翦伯赞宽洪大量，网开一面云云。此言不实。翦伯赞并不掌反右实权，况且他一向待人较宽厚。划右多或少，一决定于上面给的指标，二决定于总支掌握分寸的的松或紧。

北大全校划了多少右派?官方说是八百多人。当时全校师生员工万余人，这个比例当然不算低，但肯定不是实数。公布数字乘上一点五，我想，这才是切合实际的最低估计。

我手头材料并不全面，但下面所举事例已足令人震栗。

右派伤亡名单，（五三级缺）。

五四级：

许南亭：派右后升级为「托派反革命」，判长期徒刑，身陷痴呆后，出狱。 现存北京。

熊光祖 ：派右后，与许南亭同案，判长期徒刑。北大荒劳改，释放后在家乡劳改多年 ，现幸存香港。

黄良元：派右后，在京郊斋堂劳改 ，后遣放黑龙江，八十年代逝。

赵明海：情况不明，但知八十年代前已逝。

陈德钧：遣回原籍四川后，早逝。

张磊 ：遣河南原籍后，不知下落。

五五级：

沈元 ：遣至斋堂劳改，仍埋头学术，撰历史著作若干，为刘导生（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领导人）和黎澍（近代史所所长）等人所赏识。破格调至近代史所从事研究，所撰文曾在人民日报刊出。文革遭残酷批斗，逃至马里大使馆请求庇护，被捕。七零年以「叛国罪」处决。

雷光汉：遣至新疆，六十年代险遭镇压，被迫逃亡苏联。现居哈萨克斯坦。

陈鸿生：出身下中农，没有鸣放，但发现其日记中有农村饥馑记述。划极右，遣清河农场劳改，饿死。

孙敦新：死于徐州。

黄友钊：已早逝，情况不明。

杨秉功：整风期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判反革命罪，刑期七年。现存活。杨并非入册右派，而是反右后数年落网。

北大全校反右过程中伤亡事件，不尽我所知，但在我耳目所及有数起十分惊心动魄。我住在三十七斋四楼，楼上是经济系和法律系学舍。这里发生了两起悲剧。其中一起带有「喜剧」淡彩：一位右派难友从窗口一跃而下。地面是锅炉房的厚厚煤灰层。人们把他抬到校医室。值班医生检查了四肢，摸了鼻孔，听听心脏，说，没事。躺十几分钟，他自己可以走回去！这位难友是谁？忘了。他从死神门口回来后，免不了挨批斗。他写了检讨书，贴在大饭堂旁的布告牌上。检讨书上有句话：「死，是逃避罪孽，生，是接受改造，我选择后者。」

第二起是北大草菅人命之最。也是在五楼的一间宿舍里，右派难友黄宗羲正在挨斗。他受尽折磨，精神崩溃，爬上窗台，打算跳楼，一死了之。两三位同学把他抱住。黄丧失理智，拔出身上的削铅笔刀，刺伤了身旁一同学。结局是法院判他反革命杀人罪，处决。

校内风光绮秀的未名湖成了右派难友的生死抉择地。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丁则良从国外访问归来路经北大，突闻吉大划他右派，他一头跃入清泉，以明心志 。

反右是政治运动，怎么会造成骇人听闻的伤亡事件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位著名的学者说，沈元之死，是专制下的「集体共谋」。这是一个无奈的答案，也可说是终极的答案。「书呆子」们想要一个透明答案，只能是水中捞月！答案只能是一篇沉痛的史诗，它的时代上限是1957年，下限但愿永远止于一九七六年。

北大历史系怎么会出了一个以许南亭为首的「托派反革命」案件？1952年12月，国内「托派反革命」已彻底被消灭，五七年怎么又冒了出来？北京市公安局的知情诸公，你们可以出来说说吗？

北大和历史系学生中划了多少不公开的中右份子？不得而知，但从我班李铭清同学的遭遇可见中右份子的日后灾难。。五五年，他为王承照老师冤死一事，在总支门口贴了「草菅人命」四个大字。反右时，已是「秋后」，该给他「算账」了，但我班划右已超标，没有公开扣他帽子。毕业前一次会上，许师谦说李在肃反的表现本可划「反革命」，「姑念他年纪尚轻」网开一面，以示宽大。毕业后，李的数十年遭遇：农村劳改、苦役、文革以漏网右派身份挨斗和长期监管，与右派并无二致。

反右期间，在北大这样高层次的学校，也发生了一些难以想象和荒谬的低层

次事例。西语系某女同学的遭遇真令人哭笑不得。她没鸣没放。整风期间，一位同学叫她去清华听一个报告，她去了，到了会场，发现内容是控诉肃反，味道不对，于是马上退场。迟了！参加这个会的同学都派了右，她也未能幸免。

七、翦伯赞和吴晗

很多人看过一张五十年代初周恩来与翦吴的三人合影，由此可见，两位史学大师与中共领导人的关系十分密切。众所周知，翦吴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然两人命运皆由险恶的政治斗争所决定。

翦伯赞是留学美国的经济学者。1937 年加入中共，但为统战需要，其身份长期未公开。抗日期间，翦伯赞撰有《中国史纲》等著作，他的学术活动密切为政治斗争服务。此期间他曾奉周恩来之命，担任冯玉祥的历史和哲学教师。解放战争期间，他曾在香港达德学院 （由民主人士创办的中共干部学校）任教。解放初期，翦伯赞任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如前述院系调整后调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调任前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件：翦伯赞陪同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到北大历史系参加全系教师的一个座谈会，主持人是向达教授。不料在座中竟有一名青年教师对来客大发厥词达一小时之久。翦伯赞为此迁怒于向达。有人说反右期间翦对向达的批判源于此事。向达反右蒙难以至文革身死的过程，翦先生是知道的，我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态和反应，但宁愿从好处着想：不火上加油，不落井下石，就是好的。

身为大学教授和系主任，翦却享有周恩来特批的一座小楼和专车，另为他派来秘书和炊事员、保姆等服务人员，这显然是高级政治官员的待遇。

在历次运动中，翦伯赞的学者良心和他的政治身份（五十年代中期，他的党员身份公开并兼任副校长）显然是很难协调的。章诒和女士在所撰「心坎里别是一般疼痛—忆父亲与翦伯赞的交往」一文中，有刻划入微的第一手见析，令人信服，值得再读。我在北大五年，对翦为人处事略有所知。他宽于待人、从不厉言恶色。在一次全系反右大会上，我眼见他在发言中为五三级同学张伯伦、戴静华受批判而流下伤感的眼泪。

文革期间对翦的多次批斗污辱、收回专用轿车和两层住宅以及没收大批珍贵藏书等，虽令他身心大损，但未致信心彻底瓦解。即使项目组巫中之流的残酷迫

害，也未足使他走上绝路。毛泽东针对他的两次发言才是毁灭性的打击。六六年三月，毛就学术批判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是:「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是国民党。」六八年十月，毛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有个翦伯赞，北大教授、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历史权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将相也难。……这些人用处不多了。还有个吴晗，可能还有些用处。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问问他们。」和翦、吴一样，北大大哲学家冯友兰教授也被毛多次指名痛斥。冯老不会把领袖的话太当回事。他已视批斗污辱为等闲，他并不以为中共会把他当自家人，因而不会有翦伯赞那样的委屈感。人们视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他自己也以马列为生命真谛。他的生死悲剧的关键也许就在这里。吴晗的悲剧与翦老异曲同工。他同样是被中共扶上他并不情愿相就的学界首座，而且最终又被毫不吝惜地推下火坑！

吴晗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即以其左倾而著称。他在抗日和内战时期的高风亮节是应该肯定的，他的学者良心使他义无反顾走上民主和反独裁大道。解放后走上政界高层，他个人对领袖的膜拜和在历次运动中的「紧跟」，终于使他走入迷途，以至被导入绝境。反右期间，学界知情人皆不屑于吴晗在多次批判大会上的「张牙舞爪」和「落井下石」（杨人楩语）。杨人楩教授就曾为此丢下一句话：「吴先生怎么不想想为自己留下后路？」。北大西语系美籍教授罗伯特·温特（Robert Winter）曾对在西语系就读的陈学弟说：「吴晗是个小人（snob)!」温特是吴晗数十年好友且在吴晗受国民党追缉时曾给予援救。

如今，学界人士在谈及吴晗时，不免怀有一种既怜且厌的心情。人们不能不想起解放前夕他在西柏坡晤见毛泽东，且在毛「启发」下「低头四改〈(朱）元璋传〉」（廖沫沙诗〈哭吴晗〉中一句）的过程。学者可以没有财富和权势，但断不可没有脊梁骨。陈寅恪先生的一句朴素名言：「读书不肯为人忙」，吴晗一字也没有读通乎？吴晗因「海瑞罢官」案陷入绝境，是毛一手泡制的，也是吴自愿选择的，这是他一生政治道路的必然结局。有人以文人受「诱奸」不为耻反为荣解释之。此说虽刻薄，但不无道理。

八、也算题内话

民主党派中有一个农工民主党，它的党主席是著名的章伯钧，副主席是下面

要提到的黄琪翔。这个党和民盟在历史上和中共曾同舟共济，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共说过要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长期共存」这样的昭彰名言。至于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对斯大林说过胜利以后再来「收拾」这些党派，此语当时不可能为人所知。

笔者的父亲陈卓凡是这个党最早成员之一，数十来年一直与章伯钧共事。1956年，父亲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带我拜见了几位长辈，其中有黄琪翔先生。黄是著名的北伐将领，曾任第四军团长以至军长，抗日时期曾任集团军总司令。见面时，我带去了自撰的〈叶挺传〉初稿，请他指正。此稿是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所约。黄琪翔与叶挺私交甚笃，北伐时曾共同作战。我想，找他审阅，再好没有了。不料他才翻了五六页，面有愠色，把稿子丢在沙发上，说：「你们就这样写历史！北伐是叶挺一个人打的吗？」事后，父亲说：「他没说错！如今的历史也太不象话了，把北伐、抗日都说成是中共领导！这是歪曲历史!」

反右，是毛泽东「收拾」民主党派的大好时机。民盟和农工党成了势在必克的重点。农工党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悉数派右，连一些一向靠拢中共的左派也未能幸免。黄琪翔被迫在全国政协做了检讨，他想不出怎样认罪，只好说说 1927 年镇压广州公社起义的陈年旧帐。我父亲并未鸣放，只因是「章伯钧在广东的代理人」也派了右。人们数落他的「罪行」，只不过是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军政界服务的往事。

本来，毛泽东对农工党创始人邓演达有好感。邓在 1931 年被蒋所杀。毛在读〈新唐书〉中的「徐有功传」时，在眉批上写了「历史上『以身殉志，不亦伟乎』的古今志士数人中，就有邓演达的名字。中共建政后，邓演达的遗骨被安葬在中山陵左侧，与另一侧的廖仲恺墓相对。显然，中共视邓廖二人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和国民党左派的两名主要代表人物。1951 年，周恩来曾接见先父，谈及他与邓在黄埔军校的亲密交往。当时邓是黄埔教育长，周是政治部主任。周透露了二人在 1930 年（应是八月上旬）的一段无人知晓的往事：邓和周在大连驶往上海的轮船上偶遇。其时，邓刚结束欧洲之行，而周则秘密访苏归来，他化装为商人。邓为邂逅而欢欣鼓舞，他向周伸出了手，但对方反应冷淡，说，先生，你认错了人。周碍于党的纪律，他不能与邓接触。邓又请人递两次条子，要求与周晤谈，但终为所拒。当时中共把斯大林的指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奉为圭臬。周恩来

对先父说，他对不起邓演达，也为当年两党未能合作而深感遗憾。

毛泽东奉鲁迅为民族伟人，但对鲁迅继承者胡风和冯雪峰毫不容情。异曲同工，毛对邓演达的后继者也绝无怜悯之心。章伯钧、黄琪翔和农工民主党人无须有反毛之意 ，他们的命运在毛的战略中早已注定。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政治权术的行家里手，岂能有妇人之仁。既已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告结束，章伯钧、罗隆基能不收敛心性，安心高位厚爵乎？整风反右为的是「引蛇出洞」，政治上老练如章罗者，岂可浮躁如大学一年级学生乎？「肝胆相照……」一说乃文学语言，全无法律约束含意，岂可贸然信服乎？武汉有一位民主人士曾说：「肝胆相照，岂敢，岂敢！你的肝大我的胆小。」一针见血！

如今已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了，民主党派做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革命对象了，毛泽东在私下和公开都说了这样的话，能不在意吗？建政初期，刘少奇浑浑噩噩大谈什么「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触了大忌了。顺便一提，我和弟弟陈斯骢（出身清华，时在东北设计院）以及先父陈卓凡「一门三右」实在难脱农工民主党这个瓜葛。

下面说说一个普通民主人士命运的故事：农工党广东省委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名叫锺顺源。此人面容黝黑，左眼角有一个深深的伤疤。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在高炮部队服役时受过重伤。胜利后他参加反蒋民主活动。某次，为逃避军警追捕，他从二楼跳下，左脚受重伤，从此不良于行。锺顺源性格鲠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领导人面前，从不低三下四。反右开始，在揪出陈卓凡等「大右派」的同时，也把他揪了出来。

1958 年，锺顺源等广州市「极右份子」二百余人被遣至青海省劳动教养。多年后，锺顺源和「表现好」的难友若干人被释返广州。（顺便一提，到七十年代，这批遣青海难友，幸存者仅十人）。此时已是文革中期，民主党派已被「砸烂」，锺要找一个收容他吃饭的地方已不可得。自此，他沦为货真价实的乞丐。他住处是一间报废了的仓库，吃饭的地方是两三家允许他干些粗脏活换取一点剩饭的食店。锺自信他会求得公道，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他坚持锻炼身体，时而到珠江游泳。他写了十数封信给「敬爱的毛主席」诉说冤情。回报是有的：一个早上，来了一批红卫兵拉他去批斗，要他跪在碎玻璃上，向主席请罪！

笔者和锺顺源有不浅的交情，曾责他「想当奴隶而不可得！」事后，他有所悟！大哭了一场。七十年代末，锺的右派问题改正了，身体也垮了，癌细胞侵入了骨髓，确诊后，活了两个月。临终，他给我一纸袋文件，说：「你看看这些东西吧，我太相信别人了！我没有机会改正自己的执误了。」纸袋里大多是他写给毛主席信件的底稿和一些思想检查。

结语

从毛泽东的反右实践中，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或曰「整人术」）的谙熟。毛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什么本钱，也知道他的子民的弱点何在。 反右是一场刻意策划的政治谋杀，受害者不是个别人，也不只是一个群体。在毛的政治哲学里，始终存在两个敌人：实体的敌人和想象（或潜在）的敌人。1957 年，他要消灭的正是可能在十年八年后威胁他的独裁政权的「幽灵」。与其说，毛的死敌是现实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如「章罗联盟」），还不如说，毛已经看到了集合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才是他的掘墓人。当年波兰和捷克共产党领导人看不到工会领袖瓦文萨和剧作家哈维尔的危险，毛泽东倒是知道到哪里去发掘潜在的敌人。

中国能走上民主自由坦途吗？果真如此，1957 年的大学校园本应是一片似锦繁花的萌芽幼苗，我的悲惨难友们本应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二零零七年四月，旧金山）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关于摘掉全部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 年 4 月 5 日。

16 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97 页。

抵抗极权的民间杂志——《广场》 邵江

1. 杂志和民刊简述

虽然中国有悠久印刷文明，但是在19世纪以前，没有民间杂志存在的纪录。唐朝时，邸报开始印刷，便于皇帝和官员之间传送公文和新闻。宋朝时，一些被选择的学者能够有机会阅读一种特殊类型的邸报，这种邸报禁止刊登敏感新闻譬如灾害、军事信息、和政府秘密。

英文和法文杂志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是「储存货物的仓库」。杂志更进一步被引申作为思想仓库。在欧洲，杂志诞生于17世纪下半叶。他们通常汇集了各种文体，内容包含艺术、文学、哲学、科学等。

杂志形成比「杂志」这一名称出现更早。「杂志」的同义词有「刊物」、「学报」、「日刊」、「周刊」、「月报」、「季刊」、「年鉴」等。杂志的共同的特征如下:

1. 文体混杂，文本开放。
2. 影响公众舆论。
3. 固定出版。
4. 杂志侧重评论而不是单纯的新闻报导。
5. 一本杂志复制多份。

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杂志是一份中英文杂志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20年创刊于澳门，内容涉及基督教、新闻和科学。据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记载，1862年 John Macgowan 出版了 Shanghai Miscellany(1862-68).1，中文翻译第一次在近代报刊中使用「杂志」。杂志有两个字构成。根据说文解字：「杂」，五彩相会；「志」，纪录。

1896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有三份中国人办的杂志出现，其中《强国报》和《时务报》主张君主立宪制，要求政府改革，同年《苏报》创立，虽然这些刊物以报命名，但是从内容和形式而言，它们更接近现代杂志。1896以后到辛亥革命期间，中国非官方杂志呈现快速增长，许多杂志提供辩论平台（改革或革命）以及介绍新思想，同时杂志兼具倡导推动政治和社会变化，组织联络等功能。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加强审查报刊，一度限制了报刊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期间，报刊发展迅速，期间《新青年》和《新潮》是两本最有影响的杂志：传播科学、民主、人权，自由主义，和普世主义，这两本刊物同时为为「五·四」运动和随后运动提供了思想平台，并创造了联系网络。

因为杂志和报纸常常一起发行，简称报刊。许多非官方报刊批评掌权者，执政者常使用各种手段压制，贿赂、监禁、甚至刺杀作家编辑或关闭报馆。其后果往往是增加了这些报刊的影响，社会公开支持，抗议和压力常常迫使统治者妥协。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总体上政府控制社会能力下降，非官方的报刊成为影响大众最重要的媒体形式。1911 年到 1949 年，非官方的杂志不仅广泛影响政治和社会，而且它们在许多方面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如艺术、文学、娱乐、时尚。特别是杂志写作和发行促进了新文化深入传播和新文体形成。

中共执政的 1949 年到 80 年代，民间杂志（民刊）成为民间的主要传播媒体。民刊不接受中共党团组织的指导，是自发形成的，不需要依赖中共及外围组织承认和支持。民刊也是在没有结社自由的情况下的一种结社方式，有时形成跨局域网络公民抵抗。研究民刊意义在于：挖掘和部分恢复被极权摧毁的历史，重现历史和社会的多样和复杂，寻找结束历史的暴政和暴政的历史为一体的各种专制和极权可能性，探索建立公民社会的可行性。

中共在 1949 年夺取政权以后，全面建立了极权制度。汲取清朝覆灭和国民党失败的经验，中共严密地控制敏感新闻和思想传播，独占媒体。中共对涉入民刊的人经常以反党或反革命集团罪论处，民刊的许多编辑、参加者和支持者常常被监禁、劳改、劳教或处决，民刊被视为非法刊物予以取缔。在许多情况下民间杂志不能公开存在，不能像普通刊物一样定期出版，它也被称为地下杂志。

2. 中共独占媒体和消灭民刊

我将探讨中共四个巩固政权的方法。这四个方法是军事统治、政治运动，独占媒体和报刊控制。军事统治通过军事管制委员会（军管会）血腥立威，迫使社会恐惧和臣服新的统治者。政治运动规范人们的思想，强迫人们遵守中共的统治规则，其主要方法是改造、利用、分化、屏蔽和消灭等。

1921 年中共诞生以后，中共视杂志和所有其它媒体为革命思想武器，传播它的意识形态以影响公众。毛泽东视媒体为笔杆子，与枪杆子一起作为最有效夺取政权的工具。中共将杂志塑造成为反对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力争在宣传和传播上击溃国民党。杂志对中共而言是倡导暴力革命，协助武装夺取政权的工具。在中共夺取政权后，杂志是建立极权巩固极权和洗脑的工具。

（1）军事统治

在内战期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共消灭了或关押了大量被它视为危险份子的人，同时严格执行社会管制和媒体控制。1947年以后，中共在新占领的区域设立军管会，中共中央军委和地方党委直接控制军管会。在1947年和1953年之间，军管会作为这些地区的最高行政管理机构。虽然军管会有时包括少量中共承认的民主党派成员，这些人严格处于中共控制之下，或是中共的秘密党员，他们一般担任一些不重要的职务。在涉及军事安全财政通信媒体和外事等领域，全部由中共直接控制。中共执行下述步骤巩固政权，独占媒体。首先，接管国民党政府办公地、警察局、军事基地、财政部门包括银行和工厂和文化机构包括学校和出版社。其次，几乎所有非中共报刊被没收，军管会同时指示或严密监控所有报刊的编辑和发行，仅存的非中共报刊被改组。如果他们希望重新出版，必须重新得到军管会的执照。第三，禁止绝大多数外国媒体出版社和新闻记者活动。中共允许的个别外国通讯社报导，为中共政权在国际上进行公共宣传服务。同时这些外界报导根据中共对内宣传需要，选择进口，加强国内宣传。例如，有四位外国新闻工作者允许报导关于首次政协开幕的新闻。这四名记者，一位来自苏联塔斯社，一位来自意大利共产党团结日报，二名来自北朝鲜朝通社。在韩战期间，中共组织新闻代表团访问了北朝鲜，英国工人日报的A lan Winnington和苏联新闻工作者被允许跟随团报导。

中共将媒体传播作为国际关系的一部分，同时作为塑造意识形态和统治基础的一部分。中共加入苏联阵营，进口苏联极权意识形态并模仿其统治手法。同时中共也寻求与西方一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试图保留在西方的影响，但阻止这些国家的民主思想和实践进入中国，在中国建立集古今中外独裁政权为一体的极权制度。

在40年代，虽然由于投资和技术的限制，设立非官方电台比较困难，在国民党控制区域仍然存在一些非官方电台。而1949年以后，中共没收了所有非官方的电台。中共控制的媒体不仅接管了国民党党报刊同时占领了所有非属国共两党或中共承认的民主党派的报刊。比如中共上海机关报《解放日报》接管和占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最长的报纸《申报》。在解放军占领一个地区之前，中共的地下组织已记录这个地区所有媒体的政治倾向。在军管会达到这一区域后，对这些媒体采

用不同的措施。2

1949 年 11 月，中共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总署和新闻总署，监控不同的媒体，协助军管会控制媒体。1950 到 1952 年，中央政府颁布了至少四个有关管理书报刊的章程。1)《全国报纸杂志登记办法(草案)》，2)《管理书刊出版印刷业发行暂行条例》，3)《期刊登记暂行办法》，4)《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3 第 1 个规定取消了民间报刊的合法存在。第 2 个和第 3 个章程要求现存杂志（不包括中共机关刊物）得到地方当局的执照，接受中共宣传部和安全部门的直接监测。第 4 个章程是关于禁止和销毁「反动」书籍和杂志。另外，中共更有超出这些规定的人事监控和潜规则。在 1952 年以后，出版总署撤销，监督控制和销毁报刊书籍等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控制和负责。

(2) 政治运动

中共执政初即开始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主要针对中共外部敌人，土地改革先收买人心，然后迫使农民为奴。「抗美援朝」对外形成和巩固它的国际联盟，对内强化中共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和向心力。这一系列运动后果是人们被洗脑，增加人们的恐惧和绝对服从的意识。中共开始建立单位制度，监控个人思想和控制个人的经济来源。在出版、科技、教育、文化卫生领域强迫业者加入新组成的单位，剥夺其独立于政府控制的生存状态。单位变成控制个人的极权制度的基本单位。

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目的是强化它的意识形态。中共的思想改造运动(1951-2)是强迫出版、教育、文化和健康等领域的知识分子跟随党的基本路线的一部分。使他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必须参照中共的样本 4 自我改造。个人是否在改造中过关，必须经过中共单位党组织的首肯。

思想改造完成不意味中共信任了知识阶层，中共继续以批《武训传》，批胡适和俞平伯，清除非中共思想的影响，迫使知识界臣服，接受中共意识形态的准则和教条。知识界人士人人自危，忧虑被清除或「赶不上时代」，被当成追求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与此同时，中共向新培训的学生学者灌输他们将作为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以取代资产阶级学者。这样取而代之的宣传和操作模式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一种长久战略：在不同时期标识不同的人群，对特定的人群许诺和标识他们为优等阶层或「统一战线」，动员他们围攻、监视和镇压中共标识的主要敌人。

1955、1956年的肃反运动是消灭敌人长期战略的一部分。但是，这次寻找的敌人主要集中在中共内部和它的盟友之中。5「胡风反革命集团」是这次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胡风和这次运动的主要受害者的基本政治倾向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他们曾经被中共标识为文化盟友。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始，胡风写过《时间开始了》等赞颂毛泽东和中共的诗篇。1954年胡风三十万言上书中共，批判中共的文艺政策。中共在这次运动中将许多支持或同情胡风的人投入监狱或送到劳改营。

(3) 极权媒体

像苏联布尔什维克一样，中共将媒体彻底改造为极权媒体，充当宣传机器和灌输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中共而言，杂志与其它媒体譬如电台、书或报纸一样，是执行它的统治意志的工具。在1949年和1957之间，中共军事化管理媒体，同时控制流通领域，赎买或没收民间出版社，直接控制媒体，从而形成维护政权控制社会的一体两面：宣传和审查。

1911年到1949年之间，民间出版尚有公开存在和与权力博弈的可能。在1949年以后，民间出版和发行的外在条件最大限度被毁坏了，新的民间出版几乎完全不可能。在极权制度下，宣传和审查的结合，使人们难以形成独立意识，更困难的是形成集体抗争，保护公民权利。不间断媒体洗脑和中共运动强迫人调整他们的忘却和记忆。忘，是忘掉发生过的反抗，忘掉被抹煞的声音；记，是记忆被灌输的谎言，记忆不断被篡改的历史。忘和记的相辅相成，早已是中国历史叙述的一大特色，中共把这一特色发挥到淋漓尽致。

最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共批判国民党出版不自由，利用媒体的有限自由和空间，辅助武装夺取政权；1949年攀登上权力高峰后，便开始系统地消灭所有非官方的媒体。几家民主党派的杂志陆续被改造成党的宣传工具。同时中共使用了邸报模型，对不同级别的中共官员提供等级不同的消息。

中共控制了书籍和报刊的发行、邮政、铅印设备、纸张供应。图书和杂志的发行由中共组建的新华书店负责。少量私有出版者通过中共审核后，发行由中共改造后的三联书店控制。不久三联的这部分业务就划归给了新华书店。

中共夺取政权初期，个别中共信任的人申请办杂志尚被允许注册，但他们的发行依靠官方控制的渠道。而官方部门拒绝发行这些非官方的杂志，这些杂志均

无疾而终。胡风主编的《起点》曾被允许登记，但三个月后即停刊，因为所有的流通领域部门都拒绝发行。许多出版业者曾反对国民党的新闻和出版控制，但他们在中共执政后不仅自己服从了中共，而且要求他们的同业自我审查。6

在 1949 年和 1951 之间中共完成了对所有民间出版的控制，所有 1949 年以前建立的非中共出版和印刷机构都被接管、没收或整顿。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宣布「对于私营报刊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用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7 对私营工商业，若中共认为与国民党无关，可以允许其存在。但所有的民间出版和印刷机构全部由军管会接收，不管与国民党有无关系。在这些行业的私人投资即使没被没收，也必须退出。

（4）报刊控制

中共在 1949 年到 1951 之间完成了对所有民间杂志的接管或关闭，同时，控制所有的印刷工厂和流通领域。大量民间杂志记者编辑和发行人员被解雇，有的被捕或被杀害。1945 年，中国大陆有 1848 本杂志(146 国有)。在 1949 年和 1950 年之间，只剩下 295 本杂志。8「据新闻总署 1950 年在万名记者中的统计，新闻记者中共干部所占比例是 99.3%. 在 6708 名采编中，1949 年前在非中共新闻机构工作的比例只占 12%。」9

《广场》是 1949 年后非官方杂志再次诞生的标志。

3. 《广场》 无权者的力量

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发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后，中共高层传达这份秘密报告，但是严格限制在社会上流传。不过这份报告仍然通过不同渠道在一些大学师生中流传。北大数学系助教任大熊翻译了这份报告的一部分，分期刊登在北大图书馆布告栏。1956 年 10 月，匈牙利公民抗暴运动开始，引起整个极权制度潜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10 在抗暴运动初始阶段，中共封锁消息，否认这一事件。在敦促和支持苏联血腥镇压后，中共将这次事件定性为反共反革命。11 但是一些大学生同情和支持匈牙利公民运动，更进一步思考苏联阵营和中国大陆的制度问题。

1956 年，1957 年，社会不满和抗议增加 12，对中共执政压力加大。1954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从属条款有公民言论结社自由，苏联阵营也有类似的〈宪法〉。〈宪法〉中的公民权利是 1956 年匈牙利和波兰初期合法抗争的目标之一。苏联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曾搞过与中共五十年代初、中期的镇压和政治运动类似的运动，仍然没能阻止五十年代的非斯大林化，于是毛泽东采取百花齐放和引蛇出洞互为表里的巩固极权的战略：目的是消灭隐藏的敌人和取消任何合法抗争的可能。

1957 年，许多人对中共的整人政策记忆犹新，并不相信中共的鸣放和整风运动，于是中共基层组织积极执行引蛇出洞的鸣放政策，说服和鼓励人们在会上向中共提意见。然后选择一些，刊登在官方媒体上。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不满意官方控制的鸣放，一些人希望帮助中共改善统治或对其共具体制度不满，有一些更经历了残酷的肃反运动，也有的质疑政权的合法性，许多学生讨论时政，开始表达他们自己的想法。从 1957 年 5 月 19 日起，大字报成为辩论论坛，同时成为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流传的媒介，脱离中共媒体控制的民间传播形式。

5 月 19 日以后，北大党委开始组织力量分割围攻有异端思想的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组织官方学生会的刊物如《浪淘沙》、《红楼》、《啄木鸟》、《六六六》13 等围剿学生的异端活动。同时，中共封锁北大民主运动的消息，调动宣传机构宣布「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14

由于大字报传播范围有限，容易被覆盖，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和支持者希望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官方的围剿和压制，以及中共动员的大众的围攻，冲破其信息封锁。于是他们建立了社团《百花学社》，创立了杂志《广场》。这份杂志将油印大字报（也称油印小报）的分散个人和小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了超越中共控制的公共表达和传播方式。

「五・四」遗产

1919 年的「五・四」运动在北大留下两个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建筑，一个是红楼，中共第一个马列主义小组诞生于此；另一个就是民主广场，当时五・四游行集合和组织的地方。《广场》名称来源于北大民主广场。在 5 月 30 日成立会议上，张元勋被选为杂志编辑，他建议为这份杂志命名为《广场》。「现在北大团委和学生会办了一个刊物叫《红楼》，我们就办一个刊物叫《广场》，对着干。」15

与会者都同意。北大大字报出现的最初几天内，沈泽宜和张元勋在大字报民主墙中也曾经开辟一个区域，也称为广场。

《广场》的封面「主要是火，只露出一点火炬的把。象征传递五四的火种。」16《广场》封面题字，复印鲁迅手写体 17。

《广场》继续大量油印有异端思想的大字报，《广场》第 1 期也是惟一的一期油印了 500 本，也称〈北大民主墙选辑〉，这期文章包括政论文，诗歌和散文，政论文至少包括下面 7 篇 18：

发刊词

「五・一九」纪事

「是时候了」　　沈泽宜　　张元勋

论无阶级社会中人之等级　　谈谈

肃反论纲　　江文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王国乡

怎么办？　　燕遯符

我的控诉　　顾文选

《广场》准备以增刊的方式，向社会上散发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任大熊从图书馆借了英文版的英国《工人日报》，那上面刊有这份报告，因为文章比较长，由任大熊、陶懋颀和陈奉孝三人各取一部分翻译了出来。」19 陈奉孝将他们三人翻译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与林希翎和她同学手抄的中文《秘密报告》对照 20，准备印刷，因官方镇压，未出。

《广场》宣布，「绝不受官僚主义者的左右。」21 但它始终面临中共和它动员的大众的压力。另外，《广场》必须协调内部以保持力量反击官方和它动员大众的压制打击。这批年轻人对中共的统治手法缺乏经验：「我们都是穷光蛋，文艺修养也不够。」22 但是，这是第一批在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以自主生命践行自己的思考，勇敢探索的年轻人。他们集体和公开地抗争，警示大众不要变成「抬轿手」，吹鼓手，或无头脑的人。23

《广场》称「我们的〈广场〉是真正『广』的『场』，是一切不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讲坛。只要为了『真善美』，不论什么基调的歌都可以到广场上来对年青人放开嗓子唱!」把「促进法制的建设与改造，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作为总目标。

具体的步骤是「充分揭发三害（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事实」，「逐步把中心转移到探讨三害的根源，使大家明确认识问题不单是作风，而是牵涉到国家制度」。同时提出「舆论自由」、「取消出版的检查制度」、「确保言者无罪」等要求，使「自己的社团成为当前群众运动的核心」和「成为长久性的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扩大影响」，直到「校外去的设想，（以致）面向全国。」24

中共执政以来，将广场作为显示极权力量和动员人们表达忠诚的场所。《广场》杂志从名称、标志、目标而言，颠覆了这个场所：「《广场》为争鸣而开，我们的《广场》是百花齐放的地方！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广场》对其成员而言，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个性自由的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

抵抗语言暴力

中共控制所有媒介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向社会灌输它的意识形态和极权话语，以此使社会和个人彻底的臣服于极权的语言暴力，铸造人们的思维和语言习惯。5 月 19 日运动以来，挑战官方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大字报和《广场》经历了使用官方语言解释成不同的意思，转换官方语言，颠覆官方意识形态和创造话语的过程。《广场》和它的支持者称他们张贴大字报、组织辩论和社团、创办《广场》的事件为「北大民主运动」或「五·一九民主运动」25，取代官方定义的整风鸣放运动。许多《广场》和它的大字报同道「开始并没想帮助党的整风，只觉目前压制得厉害，要民主、自由这是正义的。」26《广场》定位自己作为独立的民间社会力量，而不是统治者操控和动员服务于统治者的群众团体。27

中共声称民主是有阶级属性的。其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广场》和它的同道们对民主阐述截然不同。首先，他们认为民主必须来自奋斗，而不是权力者的赠予。「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搅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28 另外，《广场》同仁指出权力的合法来源，「强调公选领袖就是民主生活的表现」。29 民主有超越阶级的属性。30 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既是民主的一部分，又是公民权利。实践这一权利是实现民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广场》认同「五・四」运动的宗旨，它对「五・四」运动的解释与官方不同。在我的采访中，张元勋说「五・四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的五・四。我们的五・四是叛逆，不是驯服。」31 谭天荣说「五・四」是「当发展受到阻碍时必然的革命」陈奉孝说，「五・四运动的精神是民主和科学，今天的问题就是缺乏民主（精神），北大的精神是兼容并包，主张各种思想和学术自由争论……（应该）恢复北大的这一精神。」32

在我采访的《广场》成员中，没有人提及傅斯年，罗家伦，胡适和《新潮》。我不能判断是否官方批胡适对《广场》成员有影响。或许他们是选择暂时不触及官方最敏感的禁忌？据当时编审《广场》第一期的沈泽宜说，编委会收到稿件中有严仲强的《自由主义者宣言》，但没有收入。33「其原因不是我们反对这篇文章，而是以大局为重，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压力。」34

在中共统治初期，社会主义是不容辩驳的。大部分《广场》成员对这一词汇没有疑问。张元勋说，「我没有怀疑过这些名词，因为当时没有被镇压，对于这些口号、名词没有怀疑过。当时不认为这些口号有本质上的问题，只是在执行得时候出了偏差。偏离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后来的生活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清了他们的本质。」《广场》文章和许多油印小报中强调社会主义应该包含了人道和平等，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是保障公民权利，开放，民主的社会主义。

张锡坤明确提出三害根源是国家制度问题。35 他进一步质疑「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宣传上的片面性」和「社会主义是天堂，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切无可取之处」。他在文章中说，（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严重程度不同的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和巩固依赖「思想懒汉，满足于作应声虫……人民盲目」。在这种体制中，压制人们的各种执行者从「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他进一步质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36

由于中共控制了所有媒介，许多异端在官方语言中生成，借用、转换、抵抗官方语言，扩展异端。《广场》和它的许多油印文章成功地突破思想封锁，转换和创造话语，复活被屏蔽的部分「五・四」传统，重新界定社会主义。

杂志潜力

《广场》试图恢复杂志的最初特点，并为杂志创造新的特点。在极权严酷环

境下，杂志大量复制较容易，是传播多元（最重要是与官方不同）的一种媒体形式。《广场》成立后油印了许多异端的大字报，大字报中包括分析官僚制度，批评残酷镇压的文章。这些内容不可能或绝少出现在官方媒体中。一些学生帮助通过自己的交往渠道和通信传播《广场》油印的小报。《广场》成员为支付设备和纸张大量变卖他们自己的财物，同时请求北大校长马寅初个人捐助五百元。马寅初开始同意捐赠，后来在压力下食言。6 月 6 日《广场》成员在大饭厅开始一小时的预订，并讲述《广场》筹备的艰难和马寅初毁约的经过。同情者和支持者捐助了两千元 37。当官方组织围攻时，募捐人群散去。《广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民间募捐。

6 月 5 日《广场》成员购买白纸三十令，直接送往北京印刷一厂，并将《广场》第一期稿件留下，印刷一厂承诺铅印《广场》第一期。6 月 10 日，《广场》成员去北京印刷一厂看样和取货，北京印刷一厂没收了《广场》稿件和纸张，并围攻批斗《广场》编委会成员。38

创刊号铅印被阻碍之后，在反右运动的高压下，从 6 月 11 日到 21 日，《广场》部分成员和支持者在 28 斋 426，以《广场》编辑部的名义油印《北大民主墙选辑》500 本。房间外，许多不明身份的人在监视他们。用《北大民主墙选辑》名义代替《广场》是为了保存力量，避免损失。39 同时《广场》编辑部讨论减少损失的其它方法，比如保持《广场》成员的秘密联系和更名《广场》，继续出版。40

6 月 21 日中午，《广场》成员和支持者在大餐厅空地，分发和售卖《广场》。五百本少量为《广场》成员和支持者保留，其余分发和售卖完毕，「同时宣布《广场》暂时停刊」。41

已经出售的许多本《广场》被党委组织的人买走。下午，校园有线广播号召烧毁《广场》，多本《广场》被烧毁。42 随后北大党委部署清查，多本《广场》被查抄，一些人被迫将他们的《广场》交出。43

反右结束不久，当局开始加强控制油印设备和纸张供应。

1957 年的大字报是公民抵抗的新媒体形式，又是中共动员大众大批判的工具。大字报只有张贴在人流量大的地方，才容易有影响。它的缺陷是容易被新大字报覆盖，同时不容易复制和保存。「5 月 19 日到 20 日在北大校园里，张贴 162 份大字报，在随后的几天中大字报的数量增加迅速。」44 油印小报和杂志克服了

大字报阅读区域固定的缺陷，更容易形成超出大字报的阅读网络。另外，杂志无须在大庭广众之下阅读。它的体积小，便于携带，保存和传送。《广场》从大量的大字报选稿和组稿，同时《广场》编辑部油印了大量重要的单篇大字报，从这个意义而言，《广场》变成了流动小字报。

北大民主运动中公开辩论、大字报、油印小报和《广场》交互影响，促成《广场》恢复杂志原有之意和丰富的内涵，建立交叉索引，相互争鸣和开放多元的平台。在同一个平台，广泛的题材，风格和多元观点反映在它的内容上：诗，短篇小说，评论，争鸣和调查报告。

杂志——底层公民抵抗行动

在五十年代，许多人熟悉中共对历史进程的论断，也熟悉列宁，普列汉诺夫和中共对杂志的叙述：杂志是组织武装暴力集团、推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思想和宣传武器。45《广场》与此不同，它从做具体的小事开始，「敢于行动，敢于创造」46，实现无权者的力量。

托马斯·加里格·马萨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提出了二十世纪早期反抗极权主义的哲学。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曾引述他的平民主义，说「除在革命时期内，有用他（强力，或暴力）以压服反对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时施用强力，适足为政治颓废的标识。」实际上，马萨里克思想并没有强力压服反对革命派（反革命）的思想，相反他始终强调人道精神 47 和公民责任，即从微不足道的小行动开始，从权力的边缘，自主地从底层抵抗权力的肆虐和暴政，维护人道和人的尊严。一个小的行动，比如办一本民间杂志，从权力的底层，不需要权力者认可，自主实现公民的权利和储备民间无权者之力，最终可能改变力量对比。这不是一种革命思想。马萨里克强调，挑战稳定的暴虐制度，应该立足民间，开始自下自主的公民行动，一系列公民行动可能产生巨大的变化。在极权制度下，超越官方媒体的限制，书写张贴大字报，创建民间社团和杂志正是实现无权者公民力量的一部分。

与驾驭和控制社会的经验日臻完善，防微杜渐地控制媒体，动员和威慑大众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共政权相比，虽然势单力孤、缺乏资金和抗争经验，《广场》成员书写张贴大字报创立民主墙，办社团，串联，公共辩论，最终油印出版《广场》，向大众传播，其影响渗入了中共媒体控制的薄弱环节。5 月 27 日《文汇报》报导

了北大民主墙，形容北大公共辩论「就像海德公园」。「这篇报导在许多学校引起强烈反响。」48

中共逐渐发现大字报和民间杂志挑战它的体制集腋成裘的力量，借助基层党组织不能有效控制运动和民间大字报和杂志，于是动用镇压机器全方位剿灭公民抵抗和民间大字报油印小报和杂志，强化宣传部门作为监控和镇压一体的「阎王店」，从引蛇出洞的镇压转化成防微杜渐的镇压，消灭民间大字报和刊物。但是，暴政很难消灭所有自主个体。一个个自主个体小的联合行动可能导致未来巨大的变化。虽然民间自主抵抗在庞大的权力面前弱小和卑微，但它们联合起来有潜力扭转力量对比。

4　反抗极权和新极权

面对残酷的镇压，参加「五・一九」民主运动和《广场》的勇敢和追求独立思考的人们，抵抗暴政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和自主地存在和创造，实践公民权利。参与《广场》的顾文选、贺永增、刘奇弟、任大熊和张锡坤等在劳改中被杀或折磨致死，其它人劳改或劳教 22 年左右，许多人历经磨难，九死一生。49 他们的努力将永久地被记住。

极权主义极权制度的组织原则和宣传方法毁坏人之人之间所有独立交往的空间 50，导致人们无法形成公民意识和公民联合抗争，保护公民权利。在 1957 年的极权中国，《广场》作为重要和主要纽带，连接大字报和学生运动。反右开始后，他们面对外部的高压和内部可能的分裂，在几乎没有得到社会和制度内部异议力量的支持的情况下作了一个月的抵抗。这是民间抵抗和组织网络抵抗的雏形。

《广场》和许多抵抗极权的民刊虽然在高压下没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是他们维护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抵抗权力的蚕食，维护公共话题，坚守公民集体抵抗的实践，为后代的公民抵抗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广场》为随后的民刊提供了网络思想交流和组织模式。随后的一些民刊成为在严禁结社自由的极权制度中一种潜在的跨区域社会联络网络，甚至进一步发展成有意识联合抵抗极权制度的社会力。正如林昭所言：「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广场》意义在于民间自主反极权主义，这是对极权主义的真正威胁，它同时反对当今大陆许多杂志的玩世不恭。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数十年的宣传口号，真实的意思是以人民的名义为权力服务。在当代中国，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兴趣在于服务于权力和党。对这个制度而言，从未有真正「为人民服务」，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这样《广场》有两方面的遗产：它提出公民自主独立思考非暴力抵抗，而不是中共的暴力、意识形态宣传和利益结盟；从长远看，《广场》提出公民自主独立思考非暴力联合抵抗极权主义，也将对新极权主义的「和谐社会」和它的专制变种提出挑战。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27 年， 27 页

2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 2， 3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2 至 1999 年

3 〈出版５０年大事记〉:
http://www.bigc.edu.cn/jigoushezhi/depts/pub/chubanweb/crs/hdjsh/50/main.htm;
http://209.85.165.104/search?q=cache:bmGfKpN_p_sJ:www.bigc.edu.cn/jigoushezhi/depts/pub/chubanweb/crs/hdjsh/50/49-58.htm；任不寐〈「新中国」出版管制五十年〉http://www.boxun.com/hero/renbm/13_1.shtml

4 谢泳: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5 丁抒:《阳谋》（香港：开放杂志社，2006）第 67－82 页。

6 陈伟军:〈被放逐的边缘话语——解读建国初期文坛有关同人刊物的言说〉。

7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2 卷 1197 页。

8 China Handbook， 1937-45，1954-55，Macmillan, 中国报刊投稿指南, 1954

9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3 卷 53 页

10 王康:〈他们的悲剧，我们的宿命〉
http://chinesepen.org/tjwz/ShowArticle.asp?ArticleID=8173

11 同上

12 钱理群:〈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中国的农村、工厂与学校〉

13 张元勋谈话

14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 《思忆文丛》,

http://www.oklink.net/99/1208/sywc/index.html

15 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１００页,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16 张元勋电话谈话

17 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

18 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１０３ 页 ,参看沈泽宜谈话

19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20 采访林希翎,也参见王友琴: 〈三名相关联的文革受难者——任大熊、莫兴龄、章汉夫〉,'林希翎的男朋友曹梦飞是胡耀邦的秘书,有这份报告的中文译本。胡耀邦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中央委员。陈奉孝请林希翎借来这份档,和他们从英译本作的中文翻译进行核对。……林希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曹梦飞秘书被判了七年徒刑,罪名是「泄露机密」。'

21 陈奉孝:〈声明〉,《 思忆文丛 》

22 同上

23 参见张锡坤,王国乡的大字报,《 思忆文丛 》

24 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记 1957 年的三个学生刊物〉

25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思忆文丛》

26 杨路:〈我的发言〉,《思忆文丛》,参看采访沈泽宜

27 参看思忆文丛中张锡锟、叶于胜、王书瑶、沈迪克(谈谈)、严仲强、赵清,杨路,陈奉孝,谭天荣的大字报,赵清言论见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和陈奉孝谈话

28 王国乡: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

29 叶于泩:〈我看民主〉,《思忆文丛》

30 杨路:〈我的发言〉,《思忆文丛》

31 张元勋谈话

32 陈奉孝谈话
33 张元勋：《北大１９５７》，１０３页
34 沈泽宜谈话
35 张锡坤：〈三害根源〉，《 思忆文丛 》
36 同上
37 陈奉孝谈话，沈泽宜谈话，参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１１４页
38 同上
39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参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
40 同上
41 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记 1957 年的三个学生刊物〉
42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参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
43 徐云龙采访
44 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５９页
45 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记 1957 年的三个学生刊物〉
46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思忆文丛》
47 参看 J ohn, Keane, Vaclav Havel: A Political Tragedy in Six Acts, Bloomsbury, 1999, p276, 参崔卫平译:「说出真实总是有意义」《哈维尔文集》
48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 3 卷，２０３
49 钱理群:〈发生在未名湖畔不应忘记的往事〉，参张元勋《北京大学１９５７》，陈奉孝《梦断未名湖》(劳改基金会， 2005)， 五柳村等。
50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vest Books; New edition, pp378-555, 1973

1956—1966 中国大陆民间思潮个案研究　　钱理群

（一）民间思潮的特点与研究意义

首先要作一点题解：我所说的「民间思潮」的含义，特点和研究民间思潮的

意义。在我看来，「民间思潮」大概有四个特点：一是思想的非主流性或异端性；二是其传播方式是民间的：或以大字报形式公开张贴，或以手抄稿秘密传递，或仅存于私人日记和文稿中，经后人整理才得以问世；三是其作者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更有为其献出生命者；四是其思想成果被强迫遗忘，以至我们今天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就是资料的匮缺，只能作个案讨论。

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不只是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困难。应该看到，「强迫遗忘」是中共当局的一个基本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国策。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对历史记载的「重修」。鲁迅揭露说，这其实就是对古书大肆删改，或毁或抽，目的是将历史的血腥全部抹掉 1。而现在的做法就更干脆，也更彻底：不让当事人回忆，不让后人讨论，不许学术界研究，从一开头就不予记载，不准进入历史的叙述，进而从根本上消灭历史的记忆。

这样就造成了对历史的两大遮蔽：一是如反右、文革这样的历史的错误与罪恶，历史的血腥气被遮蔽了，真的成了「一片光明」；一是历史上的血性人物（反右、文革都不缺少这样的硬汉子）被遮蔽了，只剩下「良民」和「顺民」。 这样的两个遮蔽就必然产生两个严重后果。

一方面，历史血污的被遮蔽，就意味着造成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错误与罪恶的观念，体制，以至思维方式、言说方式，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和清理，没有产生实质的变化，这样，反右、文革不仅有重演的可能，而且是一种现实性，对当今的中国，反右、文革，不仅是历史，更是现实：事实上，反右、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规模，不同的范围不断地上演。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的现实：我们并未从实质上走出反右、文革时代。

另一方面，思想先驱者被人为的遮蔽与抹杀，他们的思想成果不能为后人所知，这就导致了思想的不断中断，每一代人不能在前人的思考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推进，而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这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思想始终在一个低水平上重复的重要原因。而这种精神传统的硬性切断，如鲁迅所说，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损伤也许是更大的：「坚卓者」的「灭亡」，必然导致妥协、乡愿之风盛行，活命哲学猖獗，「游移者愈益堕落」，实际是民族精神的堕落：「倘中国而亡，操此策者为之也」。2

因此，我们今天强调「民间思潮的研究」，就是要向「操此策者」表明我们「拒

绝遗忘」的意志和决心：这是关乎中国的历史——现实——未来发展的思想、文化全局的大事。

民间思潮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关系着如何观察和看待当代中国这样一个大问题。这里，我要向诸位推荐鲁迅的一篇重要文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提醒我们：「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上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要看他的筋骨和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只不过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而这样的「筋骨与脊梁」也同样存在于当今中国社会，他们也同样「被摧残，被抹杀」，而且似乎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许多中国观察者的视野之中。因此，鲁迅的另一个提醒就非常重要：观察中国社会，不能只看「那些状元宰相的文章」，而要「自己去看地底下」，3 看底层、民间社会里的那些默默奋斗者，牺牲者。

这背后是有一个历史观的问题的：不能眼睛只盯着占主流、正统位置的「正史」，而忽略了非主流、非正统的民间「野史」。当代中国，不仅是一个极权统治的中国，而且还存在着一个反抗极权统治的民间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思想、文化史，不仅是一个极权意识形态的建构的历史，还是一个不断反抗、解构极权意识形态的历史：正是这两个中国，两个历史，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互动，才构成了真实的当代中国史。长期以来，对民间史的忽略和漠视，使得我们对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实际上是「跛脚」的，现在提出「民间思潮研究」的课题，正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为健全，也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当代中国史，特别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结构。

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1957 年的反右运动。我们考察 1957 年中国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只看上层斗争——其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底层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要着重报告的——

（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 1957 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

1957 年所发生的，实际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此同时，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大学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政治运动。正是这两个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党内

各种力量的巨大震荡，各种矛盾的交织，导致了最后的反右运动。

对于前一运动，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而对校园民主运动却多有忽略，这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样一个民间思想、政治运动是在响应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的号召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且许多学生是被卷入的，未必有那么大的自觉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运动的发动者和主要骨干，却是有相当的自觉性的，而且在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与要求，在后来成为北大右派大本营的《广场》发刊词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运动已远远超过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价和探索」，这将是一场「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4 在另一篇编辑部写的文章里，则明确地自我命名为「北大民主运动」，并指明这是一次「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5——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发动者对同样发源于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的自觉继承；我因此曾经提出了北大历史上的三次辉煌，即 1919 年的「五・四」，1957 年的「五・一九」，和 1989 年的「六・四」，都是影响全国的政治、思想、文化运动，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根据我的初步研究，以北大为中心的 1957 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它既是中国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是由苏共二十大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民主改革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诉求有四。

首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希翎，北京大学的龙英华，钱如平，沈迪克，北京航空学院的周大觉等。这是这一代中国大学生的特点，由于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大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当林希翎在著名的北大演讲中提出要反对「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6 时，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不是偶然的。在这一代人的理解中，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包含两个主要内涵。一是「社会主义民主」。龙英华因此提出：「我们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7 并且有这样的强调：「要形成和发展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生长的民主制度」。8 在 1957 年的大学生看来，当时的中国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制不健全，

民主权利没有严格的可靠的保证」，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这一代人理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内涵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因此，1957 年中国校园争论最为热烈的话题是：「特权阶级」是否已经或有可能从社会主义体制内产生，以及如何防止特权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周大觉、沈迪克、钱如平等人都指出：「随着旧的阶级的消灭，新的阶级又起来了」，「生产资料占有，主要掌握在军政要人手中」，「分配不合理」，社会地位「不平等」，「日常生活中各种待遇均论等级」，「已开始自觉地形成一个社会集团，他们互相支持、包庇，有共同的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特殊的利益」，9 在他们看来，这正是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威胁。

大学生们在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时，特别突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人权的尊严」的诉求，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学的刘奇弟，清华大学的罗兰，南京大学刘地生等。他们强烈要求「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并且从理论上说明党与国家的关系：「共产党是国家的领导党，但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就是国家」，提出「应该改变以往把党放在国家之上，以党的利益代替甚至超过国家利益的做法」，10 要求确认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走「依宪治国」的道路。

大学生们的第三个诉求，是要求「重新估定价值」的思想启蒙，精神的独立、自由与解放。北京大学的谭天荣、张元勋、沈泽宜等人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们因此而质疑「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党神话」；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终极化与宗教化，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以发扬其本来具有的批判性；同时呼唤「救救心灵」，要求从党文化的精神禁锢和所造成的精神病害（如思想的僵化，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的愚昧，表演人格，人与人关系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等）中解放出来，争取独立思考、言说的权利。11 因此，1957 年的校园里的思考，包含了一些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还出现了《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1957 年的大学生在政治上的主要诉求，集中体现在北大第一批大字报中陈奉孝、杨路、张景中等提出的五大主张：「取消党委负责制，取消政治必修课，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12

从 1957 年 5 月 19 日开辟北大「民主墙」，到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出反右运动的动员令，不到二十天的时间，中国的大学生却提出了如此广泛、重要而深刻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真正体现 1957 年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应该是这些校园里的民间思考和呐喊。但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都被扼杀了，所有的言者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但反右运动又同时培育了自己的审判者和掘墓人：这大概是运动的发动者所未曾料及的。

于是，在反右运动以后，又有了——

（三）林昭、顾准、张中晓对极权体制的三大批判

首先要提到的是林昭。我曾这样谈到林昭的意义：「当大多数人屈服于反右运动的淫威时，林昭反抗了！当我们低头接受改造的时候，林昭昂首拒绝了！当我们沉默时，林昭发出了生命的绝唱！当我们放弃了对自由、民主、人权的追求时，林昭在中国更高地举起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帜！当我们屈辱为奴时，林昭成了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更弥足珍贵的，是林昭的理性思考。13 她根据自己对反右运动，以及反右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独特观察与思考，独立提出了「极权社会」的概念，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她并且对中国式的极权社会的特点，作出了六个方面的概括：即「极权统治的警察国家」；「以血和仇恨来维持统治」；「极权寡头」；「唯我主义的世界观」；「愚民政策」；「对青年的欺骗和利用」。应该注意的是，林昭对极权体制的政治批判，同时引发了刻骨铭心的自我反省：自己的青春激情为什么会被利用？如林昭所说，「在严肃而沉重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别人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于是，作为一个清醒的觉悟了的自由战士，林昭在反右以后的「万马齐喑」中，发出了「还我自由与人权」的呼唤，这是足以惊天动地的。

而且林昭还付之行动，她和一批右派一起组织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一，国家应实行地方自治联邦制；二，国家应实行总统负责制；三，国家应实现军队国家化；四，国家政治生活实行民主化；五，国家实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六，国家允许私人开业，个体经营工商业；七，国家应对负

有民愤者实行惩治；八，应当争取和接受一切友好国家援助。」14——林昭和她的战友是在 1962 年提出这样的未来中国的蓝图的。这是和同时期毛泽东所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针锋相对的另一条治国理念与路线，尽管随后的中国历史走的是毛泽东的路线，但其超前意义却是不可否认和低估的。

而林昭对自由的理解更是超前的，她提出了「完整而不可分隔的整体自由观」：「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整的自由」，「被奴役者不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不得自由」，「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不能「把自己的斗争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林昭在身受空前的暴力迫害，并以自己的柔弱的身躯进行拼死反抗的情况下，提出要走出「以暴易暴」的历史怪圈，要根本改变「以一种奴役形式代替另一种奴役」的历史的思想与信念，这实在令人叹服和敬佩。

林昭的政治批判之外，还有顾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早在 1956 年，顾准就在苏共二十大的启示下，提出「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15，并对「如何看待当代资本主义」16，「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17，「第二国际和社会民主党的评价」18 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并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 19。1959 年他又以戴罪之身继续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与相互吸取」20，「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式的绝对主义的印记」21 等尖端的思想、理论问题，并宣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自然主义」22。

最值得注意的是，1959 年、1960 年间，顾准在河南农村劳动改造期间，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及其所造成的「大饥荒」的理论思考和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是「国家和农民的冲突」23。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史前期」的「羊吃人」现象：所实行的是「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拼命刮削农民」的「建设」路线，是「以马列主义的人口论，恐怖主义的反右斗争，驱饥饿的亿万农民从事过度的劳动，以同时达到高产、高商品率的农业与消灭过剩人口」的目的 24。

因此，顾准始终关注并努力揭示的，是「大饥荒」背后的体制问题：1，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组织形式，将农村劳动力从生产到流通、分配、消费、生活全面控制起来，以形成人身的依附；2，用「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禁止城乡交流，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结构；3，割断有可能成为「农民代言人」的知

识分子与农民的联系，并吸纳农村有文化而又忠实的人才，以形成自我控制机制，同时不断发动以遏制所谓「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为中心的阶级斗争，以消弭任何不稳定因素，达到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而稳定的控制，将农民大批死亡的后果严密控制在农村范围，不使其扩散为全民大恐慌 25。——这些分析，直到今天，仍不失其理论的锋芒与力量。

而另一位因胡风案件而被投入监狱的青年理论家张中晓，在因病保释就医期间所写的《无梦楼文史杂抄》、《拾荒集》、《狭路集》里，所关注与思考的，是极权体制下的精神问题。

他揭示了中国式的极权精神统治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绝对的光圈」的笼罩。所谓「绝对真理」、「历史必然性」、「国家至上」、「公共意志至上」等等，最后都落实到「假先知」头上，制造党神话和领袖神话：他们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共性和历史必然性的体现，国家至上利益的代表，公共意志的执行者；服膺于绝对光圈，就是服膺于党和领袖，落实为「行动独断主义」26。

张中晓指出，极权精神统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断突破道德底线的「流氓政治」，和不断制造假像和幻觉的「道德者政治」的结合 27。——这大概就是「流氓帝王」和「道德宰相」的结合，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霸道」与「王道」的交替使用。

其三，极权精神统治一方面「以坚强有力的（国家，党）意志，去奴役无数软弱的意志和无意志」，另一面，又在「无知」的愚民和年轻一代中煽动非理性的「激情」，这样的「无知和激情的交织」，就造成了中国特色的「群众专政」，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培育成非理性的狂热的暴虐的野兽与魔鬼 28。这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张中晓还讨论了极权精神统治「对待异端的办法」，这大概是最能显示中国特色的：基本上不采取肉体消灭的办法，而着重于精神迫害和控制，实行所谓「思想改造」，张中晓将其称之为「世俗权力在精神王国挥舞屠刀」29。

在张中晓看来，这样的中国式的极权精神统治极其严密，无所不在，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病害：他将其概括为「僵化与仇恨」30、「恐惧」31、「怯懦」32 和「虚无」33，其结果就是培育了「廉价信徒与廉价叛徒」34。——这样的病害大概是延续至今的。

张中晓还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深刻的命题：在极权精神统治下，不仅会产生「权力的腐蚀」，还有「压迫的腐蚀」35。当人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时，同时就处在走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天国」和「地狱」的分界线。专制主义的压迫，由此造成的人的孤独感，受压抑感，屈辱感，不仅会激发人的正当的愤怒和反抗，也会造成精神伤害，突出地表现为心灵的「阴毒」：对人和人性的绝望，不信任，对他人和社会的敌意，对爱和温暖的排除，造成人性的硬化，粗暴，乖戾，不近人情，形成受迫害者自身的精神黑暗 36。而另一方面，精神统治者、压迫者的思维，逻辑，以至语言也会渗透到被迫害者的心灵深处，甚至支配其行动，只要有条件，自身也会成为新的精神压迫者：这才是其真正令人恐怖并不可饶恕之处。

因此，张中晓指出，受迫害者，甚至反抗者，都不会自然成为「人」，而必要自觉地高扬自我人性中的神性，内心的光明，压抑兽性，鬼气，这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和升华。我们不难从前述林昭走出「以暴易暴」怪圈的自觉，张中晓对「压迫的腐蚀」的警觉，看出他们都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超越，既「信深守固」37，又具有「理性光明」38：这本身都是能给后来者以启示的。

（四）六十年代初校园里的地下新思潮

最后，我们还是回到校园里来。根据初步的研究，可以断定，大概在 1963 年到 1966 年间，中国校园里，继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之后，又涌动着一个「怀疑主义」的地下新思潮。但基本上没有留下具体的文本，仅能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中，略知其概貌。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初的反叛，是一群艺术家的子女所组织的「太阳纵队」，这是一群艺术上的反叛者，自称「诗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徒」，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现代艺术，因此，希望「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39。

而具有更大的思想自觉性的是这些年颇引人注目的 X 诗社。他们中有张东荪的孙子张鹤慈和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因而天然地和五·四传统存在着血肉的的联系：郭世英的问题就是：「（父亲年轻时代）他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为什么我不行？」40 而据张鹤慈的回忆，他是在中学期间看到北大学生 1957 年的大字报，而对既成观念产生了最初的怀疑的 41：这都显示了一种历史的承接。

而摆在反右运动以后的这些中国大学生面前的问题却是：如何从反右以后极

大地强化了的极权精神统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X 诗社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据张鹤慈解释，「X」就包含了「怀疑」、「否定」与「探索」之意 42。而据当时公安部门宣布的他们的罪名，也是「要求精神开放」，「要求自由」与「追求绝对真理」43。郭世英也明确地宣布，要通过独立思考「自己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44。他们不但对现行体制、政策（如所谓「三面红旗」，反对「修正主义」等）提出质疑，而且也要求探索 「人性问题」（「如果没有共同属性，人类怎么还成为一个类？」），「个性自由」（「应该倾听自己的内在声音，让个性得到自由的表达」）45 等问题：这都是 1957 年校园里的思考的延续。

X 诗社之所以引起高层的震动，是因为他的成员都是所谓「高干子弟」（有条件接触西方现代思潮，这是他们能够首先突破反右后的思想禁锢的原因）。毛泽东因此而作出批示：「干部子弟也闹得太不象话了，要整顿」。46X 诗社正是一个「干部子弟蜕化变质」的典型。据说后来所谓「革命接班人 」问题的提出，也与此有关。

于是，又有了 1963－1966 年对「反动学生」的批判和处理。著名学者王学泰，在 1964 年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时被打成「反动学生」而送去劳改，他在《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追忆——

「清理和处理大专院校的反动学生是从 1963 年开始的。1963 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分歧和冲突已经十分尖锐，面临着摊牌的边缘，这年 6 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做最后一次说服对方的努力，并同时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共 25 条，当时也简称『25 条』。此文在中央人民电台广播以后，地质学院有位应届毕业生马上给电台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不同意见。（也有人说，他的信中对『25 条』逐条地进行了『驳斥』）于是此事惊动了中央。那时每届大专毕业生在毕业前夕都要由中央首长接见一次。1963 年 7 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本届毕业生时就提到这个问题，并说，有的大学生反对我们党的『反修』政策，你有什么道理可以站起来讲吗？这个鲁莽的山东学生突然就要从座位上站起来『辩论』，旁边早有四条彪形大汉站了起来把他摁了下去。这件事影响很大，高教部和北京市委联合上报中央，毛主席对这个档做了批示。因为这个事件与他在 1962 年底提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相符合，他认为这类学生是大学生中的极右分子，是阶级斗争在学生中的表现，而且『所

在多有』，应该清理」。47

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形成了一个《处理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中反动学生的决定》，由中共中央批转执行。据说划分「反动学生」的主要标准有三：攻击「三面红旗」，反对「反修斗争」，同情「右派分子」、「右倾分子」。王学泰介绍，全国波及「反动学生案」的大约在一千人左右。当时本文的作者正在贵州的一个小城安顺任教，当地安顺二中就有一批学生也被打成反动学生，因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所谓「反动学生案」已经波及到边远地区的中学，可见影响之深。和所有的「运动」一样，所谓「反动学生」，大多数不过是有些牢骚和不满，但也确有敢于向当时的主流政治挑战，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他们出现在反右以后建立的极其严密的「舆论一律」的思想控制，以及校园里「争当革命接班人」的「革命氛围」之中，其大胆怀疑，独立思考，冲破精神控制，要求自由言说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1963－1966年间的这些「反动学生」，构成了1957年的「右派学生」和1966年以后文革期间的「异端学生」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形成了中国校园里源源不断的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抗运动的潮流。而这样的民间思潮、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从七十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1980年的校园民主选举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运动，以及九十年代至今的争取民主与人权的思潮与运动，其自身是形成了一个传统的。

在作了以上简要的勾勒，结束我的发言的时候，我想作出两点总结——

在观察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时，要「眼睛向着地底下」：民间的中国，底层的中国，那里发生着的缓慢的，却是深刻的真实变化，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

面对历史与现实，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痛苦的回忆，义愤的控诉，情感的发泄上，而应该进入科学的理性的思考与批判，中国特色的极权统治、后极权统治，必须有中国特色的批判理论。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现实社会的调查、研究中构建具有解释力的新的批判武器，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来参与「民间思潮」的研究，「1957年学」的研究，参与批判理论的构建。在这方面，身居海外的学者可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做很多工作，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2007年6月30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

讨会》上的发言，2007年7月16－19日整理，补充。

注 释

1 参看鲁迅：《买〈小学大全〉记》，《病后杂谈之余》，均收《鲁迅全集》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 鲁迅：《书信。330618 致曹聚仁》，《鲁迅全集》12卷，405——4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 鲁迅：《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6 卷，122页。

4 《〈广场〉发刊词》，《原上草》，1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5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原上草》，27页。

6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

7 龙英华：《「世界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原上草》，132页。

8 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上草》，101页。

9 参看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沈迪克：《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钱如平：《论阶级的发展》，均收《原上草》。

10 刘地生：《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原上草》〉，284页。

11 参看谭天荣：《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救救心灵》，均收〈原上草〉。

12 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没有情节的故事》，49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13 以下引述林昭的观点，均引自《致〈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手抄稿）。

14 黄政：《林昭被捕前后的一段往事》，《走近林昭》，122页，明报出版社，2006年出版。

15 《顾准日记》，5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16 《顾准日记》，61页，62页，64——65页，73页，75页。

17 《顾准日记》，50页，73页，71——72页，28页。

18 《顾准日记》，62页，51——52页，61页，75页。

19 《顾准自述》，231页，330页，32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

20 《顾准日记》，101页，122页。

21 《顾准日记》，100——101页，102页，118页，119页，120页，103页。

22 《顾准日记》，119 页，120 页。

23 《顾准日记》，227 页。

24 《顾准日记》，164 页，251 页，232 页。

25 《顾准日记》，184 页，149 页，196 页，187 页，216 页。

26 张中晓：《无梦楼全集》，143 页，103 页，128 页，135 页，134 页 185 页，117——118 页，195 页。

27 《无梦楼全集》，106 页，118——119 页，133 页，107 页，178 页，124 页。

28 《无梦楼全集》，113 页，224 页，216 页，194 页，132——133 页，225 页。

29 《无梦楼全集》，121 页，127——128 页，227 页。

30 《无梦楼全集》，196 页，118 页。

31 《无梦楼全集》，115 页。

32 《无梦楼全集》，132 页。

33 《无梦楼全集》，126 页。

34 《无梦楼全集》，131 页。

35 《无梦楼全集》，202 页。

36 《无梦楼全集》，188——189 页，155 页，176 页。

37 《无梦楼全集》，155 页。

38 《无梦楼全集》，218 页。

39 参看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它》，收《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出版。

40 牟敦白：《X 社与郭世英之死》，《沉沦的圣殿》，28 页。

41 参看宋永毅：《访 X 诗社张鹤慈》（网上下载文件）。

42 宋永毅：《访 X 诗社张鹤慈》，

43 《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1963 年 9　月公安部文件）（网上下载）

44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69 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年出版。

45 周国平：《岁月与性情》，78 页，84 页。

46 宋永毅：《访 X 诗社张鹤慈》，

47 王学泰：《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多梦楼随笔》，386——389 页，学苑出版社，1999 年出版。

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　　　　徐贲

在 1949 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以说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会创伤的两次灾难。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在《文化创伤和集体身份认同》一书中，把「创伤」定义为人们所经历的「可怕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的难以磨灭的痕迹。」 对于那些受害者和同情受害者的人们来说，「可怕的事件」就是灾难。可怕事件的历史痕迹构成了对人有持续伤害作用和后果的记忆。1

对历史灾难存在着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客观发生」，另一种是「文化构建」。2 「客观发生」模式认为，灾难对个人所造成的伤害是一种客观发生的事情，它本身具有清晰可辨的反道德性质，这个本质的意义不允许作任何的道德粉饰。「构建模式」认为，历史事件是一种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过去发生，灾难的「邪恶」是一种由阐释者共同体所构建的意义。不同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可能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不同的阐释，构建出不同的事件意义。

本文将从社会、文化构建的角度，参照现有的文革记忆，讨论反右发生五十年后对这一事件的创伤记忆特征。这一讨论将涉及创伤记忆构建的三个主要方面：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关系，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以及创伤叙述的多种话语。反右的「灾难」和「创伤」意识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化构建的结果。在这一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可以通过反思政治灾难得到自我教育。籍由构建历史创伤，社会不仅会在认知上辨认出人间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为此担起应负的道德责任。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可能更多地分担他人的苦难，更积极地参与重新界定群体的团结关系，使社会变得更加正义，也更加正派。

一. 「客观发生」和「文化构建」:历史事件的两种认知模式

在中国，对反右和文革持批判和谴责态度的认知中，「客观发生」观一直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以这一认知方式来看，反右客观上是一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

残害运动，彻底摧残了中国社会中的独立思想和言论元气，这种残害和摧残具有客观的、不容粉饰的反道德意义。这种看法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反右这个客观发生的「恶事」认知为性质独一无二的「特殊」恶事。反右不是中国历史上屡有发生的残害读书人事件(「焚书坑儒」或「文字狱」)的再演，而是自成一类的「思想整肃」。反右之所以特别邪恶，乃是因为它结合了现代专制国家的政治欺骗(「阴谋」) 和制度暴力(流放、劳改、戴帽等等的惩罚)，以恐怖和残害的手段公然剥夺本国人民的宪法权利（自由言论)。

无论我们多么同情那些在 1957 年被诱骗进「鸣放」圈套乃至蒙受灾难，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我们必须看到，反右并不具有一种所有的「好人」都能一眼看明白的「邪恶」本质。无论「邪恶」还是「灾难」都是一种经过价值和道德构建所产生的「意义」，一种被社会中广大公众所接受或拒绝的「共识」。

仅就对「右派分子」的一般社会看法而言，从 1957 年的「坏人」到今天的「受冤者」，这里面已经包含了公众对反右共识的改变。1957 年以后，右派分子被戴上帽子，许多被送去流放式的劳改，社会上大部分人认为他们「罪有应得」，对他们的遭遇并不予以同情。文革中，「右派分子」在社会的冷漠旁观下，再一次遭受迫害。直到文革后，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社会上对右派才有了更多的同情。反右从「伟大胜利」变成了几百万件「冤假错案」，这种转变本身就是对反右运动对错、正邪判断的重新构建。寻找历史事件的真相，建立有关共识， 是一个意义构建和再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

「客观发生」和「社会文化构建」虽然是对历史灾难的不同认知模式，但并不相互排斥，也不是非此即彼的。「构建」需要以实际发生过的「事实」为基本材料。在历史事件当事人和旁观者都还活着的时候，脱离普通人经验事实的构建无法令人信服。如果没有人因为反右而被迫害，一生坎坷，乃至家破人亡，那么谁也无法令人信服地把反右构建为一场「灾难」。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利益，可以选择不同的事实来构建符合他们需要的历史事件意义。即使是历史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也可能把客观发生的伤害构建成完全不同的意义。例如，反右或文革中发生在个人身上的灾难(死亡、牢狱之灾、劳改之苦)可以被当事人构建为「迫害」、「摧残」和「冤屈」(林昭之所以抗拒「改造」的原因)。但也可能当事人构建为「罪有应得」或者「改造新生」。

就象二战中犹太人有的精心制作和销售标志犹太人屈辱身份的「黄星」臂章一样，右派受害者接受加害者加给他们的罪名，平反时感激涕零，这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受害形式。

构建正面的反右回忆，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当然不是那些拥抱污名的右派可怜虫，而是享有公共权威的人物，如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他们的言论有明确的公共目的和公共作用。与五十年前相比，今天专家学者的影响已经大大上升，因为他们常被视为拥有中立客观的立场。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群体回忆的形成，所起的仍然是构建而非客观揭示的作用。当然，他们自己并不总是愿意放弃「客观发生」的神话，著名政治学学者王绍光最近在《南风窗》上为反右所作的辩护式回顾就是一个例子。

王绍光提出，谴责反右起于「阴谋」或预先有计划的「引蛇出洞」，都只是以毛泽东自己说的「阳谋」为根据，不足采信。反右的「客观真实」起因是，「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 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王绍光认为，反右确有必要，因为右派确实乘「鸣放」之机向党发起了进攻，「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二十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 1949-1966 年的各类报刊，看到 57 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3

王绍光为自己的看法提出的客观证据是，若不是右派真的威胁到了新政权的存在，「打击知识分子（其实）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 1956 年，整个中国只有 42000 位大学教师、31000 位工程师以及 63600 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4 按照王绍光的这个逻辑，莫非我们应该从屠杀犹太人不符合纳粹的「人力经济」利益而推导出它的不可能发

生？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中就有这样一个场景，犹太女工们在工棚里议论纳粹用毒气屠杀犹太人的传闻，她们以为犹太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不相信纳粹会无端浪费能干活的人力。然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证明，它所针对的是全体犹太人，并不是没有劳动力价值的老弱病残。

为了证明反右的「不得已反击」确实是历史客观事实，王绍光不仅强调自己「很长时间」的资料研究(阅读「1949-1966 年的各类报刊」)， 而且还强调普通劳动人民 1957 年对右派「愤怒」的客观证据，「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它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 王绍光例举了李敦白的岳母，「（这个普通劳动妇女）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5

王绍光在提供「真实发生」证据时，所不幸忽略的是，「真实」报刊材料和市民反应后面其实已经有统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在起作用。当时中国报刊的任务不就是把右派言论报导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吗？这样的材料不证明右派反党，还能证明什么呢？能用纳粹时代的报刊和「人民义愤」来证明犹太人就是该消灭的劣等民族吗？1957 年群众憎恨右派，这只能证明，构建历史事件意义不一定只是在事后才发生。就在反右事件正在发生时，它的意义已经在被构建，并因此对它的后续构建产生影响。但是，原先的意义构建也完全可能在许多年以后被改变，被其它的意义构建所质疑甚至取代。否则也就不会有右派的平反。1957 年右派分子对「官僚主义」和专权腐败的批评，在今天的意义构建环境中还有多少人会说是「放屁」呢？

在王绍光对反右的「事实发生」论中，我们恰恰可以触摸到历史事件构建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什么是构建可以运用的事实资源？是那些本来就已经受到权力严格控制的「各类报刊」吗？是那些本来就经过持续而系统意识形态教育的「劳动人民」吗？在意义构建中谁有发言权？受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制度条件影响？等等。

在对待右派的问题上，谴责和辩护的区别其实就是「灾难」和「非灾难」记忆的区别。这两种记忆都是构建而成的。在对历史经验事实的运用上，构建反右的「灾难」记忆，一般着眼于具体个人所受到的肉体或精神伤害和折磨，「死亡」是这种伤害和折磨的极限标志。以任何政治理由，仅仅由于一个人的言论就剥夺他的生命，这样做是「邪恶」的。即使没有达到这一极限的其它形式折磨和残害也具有同样的邪恶意义。这是一种以人道价值为基本尺度的意义构建，并可以进一步政治化为公民对民主、权利、法制的要求。

与「灾难」说的人道意义构建不同的是，对反右「非灾难」记忆的构建往往走的是一条「去人化」的路子。它总是从「大局」或「总体」方向着眼。这种大方向可能是「历史」，也可能是「阶级利益冲突」。在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作用下，个人的遭遇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去人化构建即使不直言反右的「积极」意义，也会有意无意地取消它的「灾难」意义。「右派向党进攻，后果咎由自取」，这样的说法是一种权力理性的意义构建。在这个构建中完全看不到苦难个人的面孔，只有「国家」、「阶级」、「集团」和勇于制度创新的最高领袖。

把反右和文革这样的历史事件或发生看成是「灾难」或「创伤」，乃是基于它们对具体个人和人群造成的伤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可以如何去理解这种创伤记忆的构建特征和因素呢？亚历山大对「文化创伤的社会化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把他的分析模式简化为这样三个方面:一，灾难诉说的叙述和接受关系，二，对创伤性灾难的认知因素，三，叙述灾难的话语样式。在分别讨论这三个方面的时候，我会把反右记忆和文革记忆作一些比较，目的不在于面面俱到，而在于揭示灾难记忆构建的复杂因素，并期待有更深入系统的讨论。

二. 创伤记忆的叙述者和受众关系

对人造成具体伤害的事件，并不必然对受影响的集体成员是创伤性的，更不要说是对整个社会是如此了，「事件是一回事，对事件的再现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当事件被「再现」或「叙述」为一种创伤时，只有当它被构建为一种「灾难」时，它才会获得这样的意义。在构建历史灾难时，要有人不仅说出那个事情，而且说出那是「坏事」，是「灾难」，「集体不会做(这样)的决定，能动者(agents)

才会这么做。」这些把事情说出来的人们就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承载群体」，他们往往是直接受害者，受害后的幸存者和同情并认同他们灾难的人们。6

在灾难的叙述中，承载群体起着能动的作用，他们不只是讲述事情的经过，陈述事情的成因，而且还对事情做出对错判断。这种对错判断中必然包含基本的道德原则和不容违背的道德戒律。这和单纯理解式的「成因分析」是不同的。由于缺乏起码的对错判断，后一种分析很难避免从「解释」自动转变为「辩护」。

在反右灾难叙述中，起能动作用的「承载者」，即直接受害者和同情者，并不是超然的道德主义者，「承载群体兼有理想和物质利益；他们位居于社会结构里的特殊地点：而且他们拥有在公共领域里诉说其宣称（或许可以称为『制造意义』）的特殊论述天赋。承载群体可能是精英，但是他们也可能是遭贬抑和边缘化的阶级。」7

语言(论说、陈述和说故事)和公共言说是灾难叙述的关键。因此，具有这种能力者自然就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相对自由的公共言论环境也特别重要。尽管反右运动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自然成为反右灾难叙述的公共承载者。公共承载者不仅要有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运用这种能力，辩明是非公道的强烈冲动，那就是「义愤」。苦难可以激起受害者的义愤，也可以将它侵蚀殆尽。

在构建反右灾难回忆的过程中，起作用的承载者可以是直接受害者，但也可以并不是直接受害者。在灾难记忆构建中，能动者不需要一定有直接经验。随着直接当事人和受害者的年老逝去，能动者必然会越来越多倚重后代的关心者。在今天的反右灾难记忆构建中，已经有了后代记忆者的加入。一些极为感人的反右灾难叙述都是产生在他们的笔下，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告知夹边沟》，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赵旭的《风雪夹边沟》，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等等。

具有公共性质的创伤诉说是一种言说行为(speech act)，它包含三个因素：言说者、接受者(受众)和言说情境，「言说者的目标是以有说服力的方式，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也就是公众。这么做的时候，承载群体利用了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手边能用的象征资源，以及制度性结构提供的限制和机会。」8 与文革灾难记忆构建相比，反右灾难记忆的构建有明显可见的局限。首先是言说者，也就是承

载群体比较小，背景和经历也比较特殊。由于反右的言说者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这也就增加了他们争取广大公众同情和移情认同的困难。反右灾难构建的另一个困难就是言说情境，即「言说行为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 9 文革在结束以后曾有过一段否定文革的政治宽松时期，为文革灾难记忆构建提供了很有帮助的情境条件。但从反右到文革结束的 20 年间，反右记忆却没有及时得到过宽松的构建情境。反右创伤记忆的构建不是「后反右」现象，而是「后文革」现象。一直到今天，许多「右派分子」对彻底否定反右仍心有余悸。虽然 55 万的右派除了 98 个全部平反，但反右仍被官方定调为正确和有必要的运动。

三. 主导创伤记忆叙述的因素

有四种关键因素主导着创伤性灾难的能动者叙述，它们分别是苦难的性质、谁是受害者、直接受害者和一般公众的关系，以及伤害的责任归属。第一，苦难的性质。「苦难」和「创伤」一样，它的意义总是处在正反构建的争夺之中，正反构建会对是否存在创伤形成截然不同的论断。例如，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是像某些修正派史家所宣称的，奴隶制只是一种强制性且具有高额利润的经济生产方式？如果是后者，那么奴隶制不会造成创伤痛苦。如果是前者，它就牵涉了残暴且创伤性的身体支配。又例如，1938 年的中国南京，死于日本军人手上的人数不是一百，还是有超过三十万的受害者呢？这些死难是日军单方面的「屠杀」，还是中日两军交战的「猛烈对抗」呢？10 对于反右记忆来说，「苦难的性质」也具有类似的暧昧性。反右对知识分子而言是个创伤吗？或者象王绍光所说的是一种老的和新的「精英集团」的夺权斗争？如果是后者，那么反右就与对冤屈者造成的伤害无关。如果是前者，那么它就涉及了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的暴力伤害。

第二，谁是受害者？反右和文革记忆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性质的回答。文革灾难记忆一般把整个中国社会都看成是受害程度不等的受害集体，官方和民间至少在「一场浩劫」的表述上还能保持一致。但是反右的情况就不同了。对反右受害者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般的看法是，反右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甚关联(除了有家属遭牵连的)。而且，平反冤假错案以后，55 万右派平了反，只剩下几十个「真右派」。被平反者是平反以前的受害者呢(以

前错受惩罚，现已平反)，抑或平反后仍然还是受害者呢(吃过的苦头再也无法改变)？那么，剩下的几十个「真右派」呢？他们是不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此不能算是受害者呢？还有的看法是，间接受害者包括了整个中国社会，正是由于反右对不同意见、对公民言论权利的残酷压制，扫除了党内、外民主派，整个社会噤若寒蝉。随即而至的大跃进中只听到一片叫好之声，无可避免地引致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灾难。反右消灭了 1949 年前与共产党合作和加入共产党的「民主力量」，从此为毛泽东的个人专制铺平了道路，反右实际上就是文革的序曲。

第三，受害者与一般公众的关系。苦难的性质需要有公众的认可。例如，林昭从一打成右派，就确认了自己的苦难性质，但她周遭的人群却认定她是「反党分子」。过了将近半个世纪，林昭和其它右派分子的遭遇才引起人们的公开同情。从来没有经历过反右的青年人中，许多对林昭充满了真挚的钦佩。受难者与一般公众之间也因此形成了一种认同关系。正如亚历山大所说，「典型的情况是，在创伤过程的开端，大部分受众不太能够察觉自己和受害群体之间的关系。唯有受害者的再现角度是从广大集体认同的价值出发，受众才能够在象征上加入原初创伤的经验。」11 反右灾难和文革灾难的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一直到今天，广大公众还是对反右受害者比对文革受害者容易采取「与我无关」的旁观者态度。这种差别其实就是一般公众与受害者认同的差别。

第四，责任归属。要构建能够为一般公众接受并认同的灾难创伤记忆，必须确认谁是「加害人」。正如亚历山大所说，「谁实际上伤害了受害者？谁导致创伤？这个议题总是涉及了象征和社会的构建。」12 确认加害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一直到今天，纳粹灾难的归属仍然是一个思想界和道德舆论争议的问题。是「德国人」还是纳粹政权造成了大屠杀？罪行要局限于特殊的盖世太保武力，或是整个纳粹军队也深涉其中？罪行要扩及一般军人、一般平民，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德国人？只有老一辈的德国人要负责，或者后来的世代也要负责？反右灾难记忆和文革灾难记忆也都面临着类似性质的问题。现有的回答(当然还远远不是深入、充分的回答)已经显示这两场灾难记忆方式的差异。官方对文革的罪魁祸首毕竟还有一个说法(「四人帮」及其爪牙)，但对反右则完全没有。是谁造成了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的「冤假错」案？谁该为此负责任？是各个单位的「领导」，是「运动积极分子」，还是另有其人？是「失误」，还是侵犯公民权和人权？是办事人的

「个人水平不够，」还是整个统治制度本身就被设计成为一部暴力和恐怖的机器？对反右起因现在有两种不同解释，一是毛泽东早就计划的「阳谋」;二是「先无此意，后不得不为之」。13 这两种说法一个包含着对最高层加害人的确认(准确不准确是另一回事)，而另一个则是完全否定这种确认的必要。后一种说法是官方对反右的说法，它与现有的文革记忆毕竟还有某种最高层加害人确认形成了特别明显的差别。

四. 灾难叙述的不同话语

灾难记忆是用语言来构建的，它的根本形式就是叙述，在不同的社会知识和交际领域中，叙述有不同的话语形式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叙述样式。它们相互联系，有时甚至相互交叉重迭。重要的叙述话语种类包括历史、文学和艺术、大众文化和传媒、政治和法律，甚至与人文话语甚为遥远的科学。现有的关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灾难记忆构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叙述话语共存和互动的实例。从二战刚结束到今天，大屠杀灾难记忆的构建，从一件只与「他们」犹太人命运有关的事情，变成了一件与公众大家(「我们」)的道德生存都有关的事情。大屠杀的构建提升了公众社会的普遍道德共识，对谴责类似的邪恶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它的灾难性已经被普遍确认。无论是左、中、右的政治人物、公共人物或学界人物，都再不能公开否认这是一场灾难，而不受到公众的侧目或谴责。在中国，公众在反右和文革历史记忆上还没有形成象大屠杀记忆这样的共识，而在程度上，反右则又更比文革次之。因此才会出现公然为反右辩护这样的事情。

不承认反右为一场灾难，或者甚至为之辩护，这种叙述经常出现在国家官僚话语领域中，也会时不时出现在主流媒体和各种国家官僚化了的「学术专业」的领域(如「政治学」、「历史学」、「公共行政学」等等)。这些领域话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在乎活生生的个人。这原本就是专制型国家政治的特点，只要「路线正确」，「符合历史规律」，一切活人付出的代价都算不了什么。当然，这种话语的使用者自己不能是受害人。许多国家官僚话语的推行者，甚至连反右运动的推动者和干将，都因为后来在文革中的个人遭遇和苦难，改变了原先的想法，向受害人表示道歉和忏悔，如周扬。

在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之外，有一种另类的历史话语领域，可以称作为

「真实内情」的历史。另类反右史有的是由57年曾被打成右派的人士所撰写，如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有的则是出自非直接经历者之手，如丁抒的《阳谋:反右运动始末》。他们都是反右灾难的承载人。他们的历史言说有一个重要动机，那就是还历史真实和完整的原来面目。在尽量揭示历史原始材料这一点上，另类历史对正统历史在重要历史细节上的语焉不详和闪烁其辞形成了挑战，因此给读者一种真实和值得信任的感觉。例如，对朱正的《反右派斗争始末》有这样的响应，「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是亲历者。对于那场运动的专横无理，对于运动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运动挤压下人性的扭曲，我是领教颇深的。不过，也有些情况我一直不甚了解。比如最高当局如何从诚意可掬地恳请各界「帮助整风」、「消除顾虑大胆鸣放」，骤然变脸，转为声色俱厉地「反击右派」，把上百万人的政治生命甚至自然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过程一直不甚了了。又比如，当时各界头面人物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只从报上看到显然经过加工处理的片言只语，从未看到完整的发言稿。对于北京高校学生们的言论，尤其是北大学生热烈讨论国家时政（他们自称为「五·一九」运动）的种种见解，也未闻其详，因为当时的报刊对此全无报导。这几年看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先生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才有了较多的了解。不过，只要历史档案没有解密，人们对于许多内情总还是难以真正清楚的。」14 真实内情历史的受众比较有限，他们是对反右运动和官方反右史实本身有疑惑的思考者。

还有另外一种与「真实内情」历史不尽相同的另类历史，包括各种各样「回忆录」、「回忆纪念」和「口述史」。这是一种「个人叙述」的边缘话语领域。这种个人叙述的形式是由特定社会文化中的偶然因素形成的。例如在美国的犹太人大屠杀灾难记忆中，就有象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女孩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1952）和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夜》(Night， 1958)这样的「幸存者叙述」(尽管弗兰克小姐最后并没有逃过纳粹的魔掌，不能算是幸存者)。和「幸存者文学」一样，中国文革以后的「个人回忆叙述」是一种杂合性的话语形式，它既有一些历史的真实记载，又不必受制于正规历史学的严谨方法要求。它的许多细节之所以被视为「真实可信」，全在于它是一种个人的写作，不象国家官僚话语的「正史」那样被严格定调。它不需要为政治正确而牺牲真实回忆。这种回忆的真实可信几乎完全出于「无须说谎」的推导。

个人回忆的不少作品可以归入灾难「见证叙述」的类别，文革记忆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见证叙述(如巫宁坤的《一滴泪》和郑念的《上海的生与死》)。个人见证叙述中有历史，有故事，能取信于读者，又能打动他们的感情，是最能帮助构建反右和文革灾难的叙述形式之一。15 尽管不同的回忆中，「历史」和「故事」的成分搭配不同。许多这样的回忆录涉及的是高层民主党派人士或高层知识分子，如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和韦君宜的《思痛录--露沙的路》(其中有专门回忆反右的一章，题目是《从反丁、陈运动到反右风涛》)。有的则是反右时并不出名者的自述，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这些作品往往以文字优美、思想真诚打动读者，比单纯的真实内情历史更能打动人心、引发创伤记忆。

最能引发普通受众反右创伤记忆并帮助构建这种记忆的也许是文学和大众传媒(电视、电影)，可惜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当然，一有影响，就又会遭禁。它的特点是写普通的右派或他们的家属，而不是民主派或知识分子头面人物。文学和大众文化传媒虽然有所区别，但就灾难记忆构建而言，它们所起的共同作用都是「讲故事」。不同的讲故事形式会有受众人群大小的区别，受众越大的说故事形式对于公众性的灾难记忆构建作用越大。大众传媒的作用因此特别重要。小说、电影、电视，无论什么形式的故事，都必然展现具体的人物，日常活动和心理感受，故事把「灾难」在活生生的个人身上体现为人的灾难。故事的情感和审美感染力帮助受众认同受害者并思考他们的受害原因。受众在故事中看到的不只是「右派分子」，而且是普通中国人。

在文学和电影中，这样讲述的故事，它的灾难性是普通受众都能认同的，因此有可能引起的政治联想，触犯现有的意识形态禁忌。田壮壮的电影《蓝风筝》就是一个例子。故事的主角并不是右派分子林少龙，也不是走资派老吴，而是陈树娟这个普通妇女。故事讲述的是树娟的三次婚事。树娟初嫁林少龙，57 年林少龙因为在开会时上厕所，人不在时被落实在了单位的右派指针之内，后来被送去劳改，干活时被倒下的大树压着，「死了」。树娟二嫁的是李国栋。李国栋是林少龙生前的好友，无意中出卖了林少龙。李国栋在「大跃进」后的「自然灾害」年月中营养不良，得了肝病，「也死了」。树娟三嫁的是出入有专车的大干部老吴。好景不长，老吴在文革时成了走资派，被斗了又斗，「又死了」。影片中表现反右创伤的手法是象征的，林少龙在他工作的图书馆里，在一条写着「大鸣大放帮党

整风」的红色条幅下走过，这时候红色横幅落下来，蒙住了他的头。故事叙述的感染力不在于它追究了反右运动究竟是源自「阳谋」还是「不得已反击」，而在于它展示了，一旦反右运动来了，它给许多无辜者的生活带来的是怎样的灾难后果。这就象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角一觉醒来，变成了甲虫，故事并不探究他为什么变成了甲虫，而在于叙述变成了甲虫的人会有一种怎样的非人遭遇。

受众对苦难故事的认同往往是一种艺术感染和人性感染的结合。人在感动和情感投入中会作出朴素的对错、正邪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共识是社会自我道德教育的根本条件之一，也是创伤记忆的社会意义所在。尽管目前的公众语言仍在使用「反右」和「文革」这些沿用官方语言的词汇，但它们已经不再是中立的或褒义的词汇，而是不能不载负沉重的道德包袱。由于反右和文革的道德缺失，企图洗清「反右」和「文革」的灾难恶名，便成为一种类似于 1970 年代德国「希特勒热」那样的历史翻案行为。

「说故事」是人性化的领域，越是人性化，就越少有反右不是灾难的说法。反右灾难的故事叙述常常会和文革灾难故事联为一体，象文革结束初期的电影《牧马人》、《芙容镇》和九十年代的《蓝风筝》都是这样的讲述方式。这样的故事讲述往往把反右叙述为文革的前史和预演，让高潮落在文革灾难上，在两个分别事件之间延续成一个漫长的制度性人性灾难。关于反右灾难本身的故事出现得较迟，最有特色的就是从本世纪初到目前已经自成一类的「夹边沟故事」。

五. 夹边沟：反右创伤记忆的「极端处境」

反右创伤记忆形成了一种与纳粹「犹太人大屠杀」和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相类似的中国式「极端处境」叙述，那就是「夹边沟」故事。这是反右创伤回忆独立于文革回忆的部分。迄今为止，在文革创伤回忆中还找不到在震撼力和密集叙述上可以与「夹边沟」故事相比的「极端处境」叙述。文革叙述中最常见，最有象征意义的「极端处境」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夹边沟」故事再现的是一种与红卫兵暴行不同的极端处境。红卫兵暴行是自发、阵发和非理性的，但「夹边沟」再现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直接组织和执行的，有制度理性的，漫长而有序的折磨：饥饿、劳累、寒冷、绝望，直至死亡。

前苏联「古拉格」创伤叙述者基本上都是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如索尔仁

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金斯伯格(Evgenia Ginzburg)，色拉莫夫(Varlam Shalamov)和马青柯(Anatoly Marchenko)。他们的文学再现使得苏联的集中营成为共产极权的公认象征。有了古拉格，苏联的斯大林主义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 同样，有了夹边沟，中国的毛泽东式统治便有了可以辨认的特征。和「古拉格」创伤叙述者不同的是,「夹边沟」创伤叙述者中有的并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而是同情者。「夹边沟」创伤叙述因此也成为一种「后记忆」叙述。16

夹边沟农场成立于 1954 年 3 月，它的行政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原本就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农场。这个位于甘肃酒泉境内巴丹吉林沙漠边沿的昔日劳改农场，1957 年 10 月至 1960 年底，关押了甘肃省近三千名右派。除了风大沙多，夹边沟有限的农田多为盐碱荒滩，这个小型农场自开办时起就只能接收四五百名劳改人员，因为它只能养活这么多人。甘肃省将近三千名右派源源不断地押送至此。夹边沟农场贫瘠而严重盐碱化的土地的收获物，根本无法使这么多的右派劳教分子果腹。夹边沟成为右派分子在改造和惩罚中挣扎求生的炼狱。

「夹边沟」创伤叙述者有的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和凤鸣在《经历——我的 1957 年》叙述了她和丈夫王景超的劳改遭遇，他们夫妇俩反右前同为《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被打成极右分子，和凤鸣则是一般右派。1957 年 4 月，夫妇俩同一辆火车被押送劳改，和凤鸣去的是十工农场。王景超则到了夹边沟。三年后，王景超在夹边沟饿死，和凤鸣侥幸躲过一劫。「夹边沟」创伤叙述者有的并不是夹边沟的幸存者，其中的代表性作家有杨显惠、邢同义和赵旭。

饥饿和人命不如蝼蚁，这是夹边沟故事最震撼读者心灵的主题。饥饿同样也是不少大屠杀文学和古拉格文学的一个共同主题，如威塞尔的《夜》和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ch)。饥饿还是一个连接 1960 年全国大饥荒的主题。在夹边沟农场，1960 年春天，有一半人已经虚弱得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从卫生所的病房里被抬出去。在死神面前，人们开始了求生本能的挣扎。在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后，他们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尽可能地减少热量散失，等待下一顿糊糊汤。如果有了一点力气，就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体质稍好的，到草滩上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看到蜥蜴，抓来烧了吃或者煮了吃，有人因此

中毒而亡。到了寒冬腊月，野菜无迹可寻，他们只能煮干树叶和草籽果腹。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

1960 年 4 月兰州中医院的右派高吉义被场部派往酒泉拉洋芋，装完货的最后一天，饿极了的右派们知道这个机会千载难逢，便煮熟了一麻袋洋芋，9 个人一口气将 160 斤洋芋统通吃光，「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眼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返回途中，一名吴姓右派在颠簸下，活活胀死。高吉义也上吐下泻，和他住在一起的来自甘肃省建工局的右派工程师牛天德整个晚上都在照顾着他。第二天，高吉义醒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年近六旬的牛天德竟然将他的呕吐物和排泄物收集起来，在其中仔细地挑拣洋芋疙瘩吃！

夹边沟故事外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大众传媒的报导也帮助扩大了夹边沟故事的影响。罗四鸰在《文学报》上对夹边沟和夹边沟文学的长篇综述报导，就是一个例子。17 报导让人们更体会到，在阅读夹边沟故事时，无动于衷和麻木不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反右」及其造成的人间苦难，文学描写的真挚同情与政治学分析的冷漠隔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公众影响极大。2000 年 7 月，杨显惠的小说《上海女人》在《上海文学》杂志发表，此后，每月 1 篇，连续 12 篇「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一位死难者的儿子，偶然读到了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的小说，他哭倒在地，把报刊供在桌上，长跪着，一页一页地读，一次一次地哭。他对朋友说，父亲去世时他还小，只知道父亲死在夹边沟，但不知父亲死得这样惨。

在甘肃的临洮县，从夹边沟死里逃生的 82 岁高龄的裴天宇老人说，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四篇小说。他说：每一次拿起来读不上十分钟，就泪流满面……读不下去！许多当年的幸存下来的右派主动打电话找杨显惠，讲述自己的真实经历。夹边沟幸存者高吉义在看到当地报社转载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后，通过报社联系上杨显惠，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尽管杨显惠已经非常熟悉了夹边沟的故事，但高吉义的讲述让他感动落泪。半个月后，《饱食一顿》和《逃亡》问世，

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原型就是高吉义。

2004 年 1 月，《当代》刊登了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编后」中写道：每个编辑阅读之后，不是叫好，而是沉默。那种震撼已经难以用言语表达。……无论怎么称赞，不管多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都难以表达我们对作者的敬意，因为作者之痛，不是个人之痛，不是家族之痛，不是人群之痛，而是整个中华民族之痛。不仅切肤，而且彻骨，而且剜心。邢同义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选择了完全纪实的手法。为了保证材料的真实可信，书中记述的每个人物和每件事，他都尽可能地找到当事人或其亲朋好友，详细询问，反复核实。2002 年 8 月，在甘肃安西县，邢同义见到了马述麒的遗孀李春兰，这或许是目前唯一能找到的右派分子的亲属。他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了马述麒在夹边沟所经历的一切，老人一边擦眼泪，一边表示感谢，因为她终于知道了自己丈夫的经历。邢同义在天水举行的《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的签名售书会上，有三个人一直默默站在一边，直到快结束的时候，他们才找到邢同义，原来他们是夹边沟的一位死难者的亲属，他们掏出一张 50 年代的工作证和一些旧照片，让他辨认，是否认识当年死在夹边沟的亲人。

2006 年 5 月，由中国小说学会主办的中国小说学会第二届学会把短篇小说奖颁发给了杨显惠的《上海女人》。小说故事讲的是一个善良柔弱的普通女性，除了对丈夫的一腔忠贞，完全不明白反右这场横祸是怎么来的。她千里迢迢来到夹边沟，想不到丈夫早已饿死，死后抛尸荒野。她把带来的食物分给其它难友，争抢场面令人震悚。女人默默地到坟地捡起丈夫的遗骨，用一条难友给的毯子包起来，背着白骨，离开了夹边沟。小说奖的评语是这样说的，「在包括《上海女人》的《夹边沟纪事》系列小说中，杨显惠以含蓄节制的风格，通过一些幸存者对三四十年前历史事件的重述，表现了人在面对饥饿与死亡时的惨烈、坚韧乃至从容，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历史穿透力和精神冲击力。」18 小说奖本身就是一种对反右的无声的道德评判。

「夹边沟故事」讲述的是一种人生灾难的极端处境。政治权力以把罪人改造成新人的名义，把人变成只受动物本能驱使的非人。极端处境展现的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懂得和设身处地体会的生存绝境和求生欲望。当死亡慢慢地逼近这些政治犯的时候，政治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剩下的只是生命的极度脆弱和轻贱。惩

罚和死亡已经不需要理由，只是偶然的，荒谬的事实，但却仍然一刻也不放松地奴役着这些贱如蝼蚁的中国人。与这些令人刻骨铭心的身心折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灾难」最根本的含义， 灾难的邪恶和灾难的非正义。以人的生命为反右灾难付出的苦难代价是不允许用空洞政治概念来漂白和淡化的。

六. 全球化时代的灾难和创伤记忆：反右为什么错了？

灾难叙述是在具体而特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环境中发生的。统治权力的利益和结构会对创伤构建过程维持明显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其中的因素包括，谁控制了政府？谁控制了社会秩序？公众是否可能发挥独立的影响？谁拥有报纸？媒体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政治权力？法院是独立的吗？独立的律师行动范围有多大？教育政策的独立性如何？是否必须服从统治官僚的意志？由于灾难叙述必然引起人们对共产党长期统治的人权纪录和道德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不得不受到延续这一统治的政府严格限制。这是不奇怪的。但是，在国家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环境。

在全球化的今天，对反右灾难和创伤记忆的构建有了远比先前宽广的历史比照和世界联想空间。历史比照和世界联想使我们对灾难和创伤构建的基本方面看得更加清楚，也使我们可以用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尺度去衡量象反右这样的灾难事件。在灾难记忆构建中，对灾难的公共叙述起着关键的作用。对整体社会有道德教育作用的灾难记忆，不可能，也不应当在重要的公共领域中，尤其是法律领域中被消除和缺席。厘清灾难责任必须从法律责任开始。二战后对纳粹首恶判罪的纽伦堡审判就是一个先例。

历史比照让我们看到了法律在反右创伤记忆构建中完全缺席了。文革之后，至少还有一场对「四人帮」的审判来确定这场灾难的刑责罪行。法律不只是给具体的个人定刑责罪行，而是代表整个社会对事件本身作出有权威的总体对错判决。只要审判「四人帮」的结论还得到维持，就很少有人会公开挑战公众舆论，明目张胆地为文革辩护。但是反右的情况却不同，虽然官方承认了反右的「扩大化」，造成了几十万右派的冤假错案，虽然有成千上万人遭受折磨、摧残甚至死亡，但却没有任何人必须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作为社会最重要的制度性道德权威的法律在反右事件上至今没有做出对错裁决，使得有些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反

右「没错」。

历史比照还提醒我们，人们对灾难邪恶的认识是一步步加深，一步步获得普遍道德意义的。国际道德普遍化的过程是从 1945 年纽伦堡审判开始的。对纳粹首恶的审判扩展成为这样一种普遍的道德准则，那就是，某些十分罪恶的行为是，也必须被确定为「对人类犯罪。」19 公开审判本身就应该以公众的正邪共识为基础，「(纽伦堡)法庭惩罚罪犯的权威直接来自战争的胜利，间接来自一个虽无形但真实的理由，那就是世界良心的觉醒。」20 纽伦堡审判在世界各国广泛报导，「对人类犯罪」、「世界良心」和「人类良知」这类说法也因此成为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道德概念。纽伦堡审判后的第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95 号决议，强调联合国将遵循由纽伦堡审判所确立的国际法原则。两年以后，联合国发布了「人权普遍宣言」，宣言在前言中提到了对纳粹暴行的记忆，称这一暴行为「人类良知所不能容忍。」1950 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解释「宣言」的原则时明确指出，提倡和坚持人权，为的是要防范国家对公民的侵害。21

现有的国际道德共识让我们可以把「灾难」和「创伤」从道义意义的「邪恶」转化为法律和政治的「违反人权。」 造成「迫害」和「苦难」的原因，是因为公民的人权被政府剥夺了，并完全没有反抗的条件。对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的意义就是经历了这样一种转化。「大屠杀」这个词汇现在已经特指一种新的国际行为的标准。就在它的道德和人权标准国际普遍化的同时，它的「教训」也变得更清晰，更有束缚力了。由于「大屠杀」的教训，人们对哪些是政府不应当做的事情，知道得更具体了，也更坚持了。违反人权不是普通的人侵害他人，而是由政府组织和策划的人侵害他人。人权不只是保护个人不受侵害，而是保护个人不受国家政府的侵害。

今天的全球人权共识使我们能够重新提出反右为什么错了的问题。反右是「错了」，还是「没错」直接关系到反右灾难记忆的合理性。但是，即使那些认为反右错了的人们，他们对「反右为什么是错的」，仍然存在着实际的分歧。一般的说法是，那些所谓的右派，其实是对党和政府提出善意的批评(当然，有许多右派连这样的批评也根本没有提过)，他们本没有反党言论，所以不该把他们打成右派。右派被「错划」和「冤枉」，是因为他们原本很「忠顺」。这种说法其实把受害者看成是理应效忠于权力统治的臣民。它的逻辑是，如果臣民不忠顺(「不怀好意地批

评」)，那么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严厉惩罚他们。

但是如果比照由纽伦堡审判发展而成的普遍人权和公民权观念，那么上面这种说法则并不符合当今世界的普遍道德共识。一国的人民，他们对政府和执政党提出批评，只要是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范围之内，就不应该因言获罪。批评是他们的公民权利，与出于什么动机没有关系。一个政府动用国家机器对行使正当权利的公民进行迫害，无论被迫害者是否忠顺于这个政府，错都在这个政府。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普遍价值观能帮助反右创伤记忆把反右受害的性质从「好人受冤枉」转变为「公民权利受到国家政府侵犯」。从违反人权和公民权来看，反右就不再是一个平反的问题。历史比照和同类联想至少可以让我们提出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如果「反右」错了，那么犯错政权的继承者应该怎样对公众有一个交待？第二，在这种罪行发生时，其它公民做了些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负有怎样的集体责任？

从国际人权共识来看，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恶。这种制度之恶是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E. Barkan)称之为「国家之罪」。不同的「国家之罪」受害范围和伤害方式有不同，但都是「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这种暴力针对某个打上污名的集体的成员，而污名集体则是用原初特征的方式或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划定的。」22「右派」这个「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的一类，就是这样一种打上了污名的集体。国家曾经对「右派」这个污名集体施加了蓄谋的、系统的、有组织的暴力，进行了迫害和摧残。污名曾经有效地把右派同中国社会的其它部分分割开来，使他们在受迫害时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社会的其它部分对他们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

既然反右是非正义的行为，那就必须有人应该承担罪责。不承认有罪责行为者，也就是不承认伤害行为的非正义性质。承担历史中国家罪责的方式不一定是追溯非正义行为组织发动者的法律罪责，但必须承认这是非正义的行为。它的目的不一定是要惩罚非正义的行为者，而是要通过认识罪责，达到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建立一种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在当今世界的不少国家中，承担历史中国家罪责是用「道歉」的方式来表现的。

不少国家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歉过。道歉必须是公开而郑重的。道歉是一种「仪式化的清洗--洗涤」。公开的道歉是表明「人必须做正义之事，当正直

之人。这种演示性的洗涤只能经由回到过去才能实现。」这就是反思历史，「反思是通往洗涤的有效之途，那是因为反思可能使人净化，当然并非一定使人净化。有没有得到净化的标志就在于是否承认错误。如果既不认错，又不道歉，那么法律意义上的惩罚虽然避免了，但象征和道德意义上的污垢就会永远存在下去。」23

道歉不仅对罪责承担者，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洗涤作用，因为被国家之罪玷污的不仅是那些干脏活的行为者，而且还有那些在国家之罪发生时，袖手旁观的无行为者。道德的公共生活要求我们在非正义行为发生时，即使看上去与我无关，也要有所行动。吉森(Bernhard Giesen)说，「尽管没有积极参与罪行，却并没有防止那些以群体的名义犯下的罪行，」24 指的就是这样一种集体政治罪过。集体政治罪过的关键不在于「定罪」，而在于「忏悔」。承认集体政治罪过的忏悔，需要借助某种公开承担的仪式，成为一种公开宣誓，而不只是一种私人性质的良心负担。

构建反右创伤的意义在于，它可以让中国社会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有一个自我洗涤的机会。它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公众建立道德责任感。构建文化创伤，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它教育公众如何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如何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如何重新界定他们正义公正的群体关系。回顾过去是为了重新开始，正如大屠杀幸存者，1986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所说，「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告诉人类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不是如何开始，而是如何重新开始。」25 反右的灾难发生在 50 年前，今天构建反右创伤记忆，不是为了沉溺在往日的痛苦回忆中，而是为了重新开始。回顾反右和文革，都是要借由让广泛的公众得以参与他人的痛苦，扩大社会认同和同情的范围，开创一个能实现新的社会团结的未来。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2007 年第 3 期。

注 释

1 Jeffer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 1. 在引用亚历山大时，我

援引的基本是王志弘的译文。见王志弘译：《迈向文化创伤理论》

www.cc.shu.edu.tw/~gioc/download/jeffrey_Chinese.doc

2 对历史灾难的两种认知模式，其它论者有相似的表述，例如，敏兹(Alan Mintz)在对美国社会如何记忆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研究中，归结出两种不同认知大屠杀的模式，一种是「特殊模式」，另一种是「构建模式」。特殊模式所认知的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纳粹要杀害所有的犹太人，将这些受害者投入屈辱的深渊，造成的大屠杀悲剧与其它灾难既不可比，也不类似。」大屠杀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黑暗真实性」，对这种真实的伤害可以有不同的表现，但决不能不承认。构建模式所认知的大屠杀则是一种本身没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发生，大屠杀的「邪恶」是一种有「阐释(者)共同体所构建的意义。不同的阐释(者)群体出于不同的动机和需要可能作出不同的阐释。」敏兹所说的「特殊模式」其实也是一种对灾难的「客观发生」认知。Alan Mintz，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p. 36-42.

又例如，J. C. 亚历山大把两种认知模式的区别称作为「常民创伤理论」和「文化建构理论的」区别。根据常民理论，「创伤是自然发生的事件，损害了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幸福感受。换句话说，损害的力量 —‘创伤’— 被认定来自事件本身。对于这种损害事件的反应—‘蒙受创伤’— 在感觉和想法上，被认为是立即而不假思索的响应。根据常民观点，创伤经验发生于造成创伤的事件与人性互动之际。人类需要安全、秩序、爱和连结。如果有事情剧烈破坏了这些需求，那么根据常民理论，人们无疑就会因此蒙受创伤.」 亚历山大本人持「文化建构理论」的立场，他主张，「事件本身不会创造集体创伤。事件并非本然具有创伤性质。创伤是社会中介的属性。这种属性可能会随着事件展开，而同步造成；它也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造成，成为一种预示，或是在事件完结之后，成为事后的重构。」 Jeffer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pp. 2-3，8.

3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 王绍光博士专访》

(http://www.tecn.cn) 2007-01-24.

4 同上。

5　同上。王绍光引述的是李敦白的回忆录:《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丁薇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39-141页。

6　Jeffery C. Alexander，「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p. 11.

7　Ibid.

8　Ibid.， p. 12.

9　Ibid.

10　这两个例子都是Jeffery C. Alexander在他讨论「痛苦的性质」时所举的。Ibid.，p. 13.

11　Ibid.， p. 14.

12　Ibid.， p. 15.

13　对反右起因的两种不同解释可以用李慎之和朱正的分歧为例子。朱正在他的《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对此有所论述。
http://details.blogbus.com/logs/2006/07/29

14　张允若:《读林希翎在北大的演说词》 传播学论坛，
http://www.chuanboxue.net/list.asp? unid=1869 2007-2-26

15　关于反右的个人回忆叙述，例见，杜高的《我不再是我—一个右派分子的精神死亡档案》、张元勋的《北大一九五七》，都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虽九死其犹未悔》：叶笃义着，同上。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章立凡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反右派始末》：叶永烈着，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枝蔓丛丛的回忆》：季羡林主编，牛汉、邓九平执行主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没有情节的故事》，同上。《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同上。《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牛汉、邓九平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同上。《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同上。《亲历一九五七》：徐铸成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戴煌着，学林出版社，2000， 等等。

16　「后记忆」是Karein Goertz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一种「间接见证者」(secondhand witnesses)的叙述方式。间接见证者以后记忆来表达与特定历史过去的关系。后记忆是一种继承而来的，并非亲身经历的过去。但这个过去却成为

间接见证者是谁的一个有机部分。「后记忆」与「记忆」的不同在于它没有直接见证者那种亲身的经历。「后记忆」与客观「历史」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深沉的个人感情投入。后记忆揉合了记忆和历史。法国小说家 Henry Raczymov 和德国女小说家 Esther Dischereit 的大屠杀题材小说《无声的叫唤》(Un cri sans vois，1985) 和《裘米的桌子》(Joemi’s Tisch， 1988)都是大屠杀后记忆的代表作。Karein Goertz，「Transgeneration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Holocaust: from the memory to ‘post-memory.’」 World Literature Today， 72：1（Winter 1998)：33-39， p. 33.

17 我在本节中对夹边沟和夹边沟文学的介绍，主要就是转引这篇报导。 罗四鸰:《翻开一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文学报》专稿)，
wenxue.news365.com.cn/tgzg/200504/t20050428_486143.htm， 2005-04-28.

18 《走近中国小说学会》半岛网-半岛都市报，
http://www.bandao.cn/news_html， 2006-05-26.

19 R. F. Drinan,」Review of Ann Tusa 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3 : 2 (1987): 333-334， p. 334.

20 Quo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The Holocaust from War Crime to Trauma Drama.」 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p. 250.

21 R. F. Drinan,」Review of Ann Tusa and John Tusa， The Nuremberg Trial,」p. 334.

22 Elazar Barkan， Guilt of Nation : Restitution and Negotiating Historical Injustic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3.

23 Jeffrey C. Alexander， 「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ral Universals,」 p. 244.

24 Bernhard Giesen， 「The Trauma Perpetrators: The `Holocaust’ as the Traumatic Reference of German National Identity.」In Jeffer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p. 130.

25 Elie Wiesel，「Why I Write？」In E. Wiesel，From the Kingdom of Memor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p. 21.

为什么很多右派会低头认罪？　　胡平

当年的右派份子、作家舒芜写道:「二十一年后重新审查当时各单位的『反右』运动，几乎都是百分之百地『扩大化』了。我被『扩大』，开始是想不通的，但经过大会压、小会追，终于想通了我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道理；我们那里别的『右派』中，完全自觉冤枉的不知有没有，至于清醒坚定地始终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谁。国外有人说这是一种’政治催眠术’，倒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

舒芜这段话告诉我们：在反右斗争的初期，大部分右派对被强加的罪名都是不承认的，而后在持续的压力下才终于「低头认罪」；然而这种认罪又并不仅仅是迫于外部压力的违心之论，而是程度不等的真心悔过。这就和古今中外屡见不鲜的苦打成招有所不同，因为在苦打成招的事例中，当事人内心是自觉冤枉的；而反右斗争以及毛时代的其它许多政治运动的结果却是，它最终使得受害者自己也认为自己果真犯下了他实际上不曾犯下的罪过。

那么，这种奇特的思想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不错，「政治催眠术」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但它也只是一个比喻而不是解释。以下，我将试图对此一现象给出我的解释。

1、政治判断的特殊性质

刘宾雁讲过，他自己后来之所以低头认罪，「全国工农愤怒声讨右派震耳欲聋的吼声就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情况大概是很普遍的。可以说，大多数右派后来低头认罪，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遭受到广大群众一致的强烈批判，因此对自己原先的观点或主张产生了动摇、怀疑，直至最后的自我否定。因为一般来说，政治观点的是非对错是根据它是否能够赢得别人的赞同为标准的，当你发现你的观点遭到众人的一致反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

这里不妨再谈谈实践标准的问题。我们知道，在 1978 年，中国展开过一场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在政治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在理论上却是站不住脚的。把实践标准应用于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实在是大错特错。譬如说，你如何去反驳「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呢？如果这个杀人的政权果然又坐稳了二十年江山，难道就证明了杀人的主张是正确的，反对杀人的主张倒是错误的吗？深入思考便可发现，当我们反对「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这句话时，其实我们并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价值。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杀二十万人不可能换二十年稳定。我们的意思是说用杀人的办法换取稳定以及刺刀下的稳定严重地违反我们的道德信念。我们不是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不可能，我们是说杀二十万人换二十年稳定不应该。在这里，我们争论的不是「是不是」的事实问题，而是「该不该」的价值问题。

所谓价值，主要是涉及人们对善恶美丑的感觉，通常我们称之为道德感和美感。不过这裏的「感」是心灵之感而非感官之感。我们觉得杀人是恶的，花是美的，那和我们觉得糖是甜的，冰是冷的显然不是一回事。后者只涉及我们动物性的生理结构，前者还涉及我们人性的心理结构。在《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二书中，康德分别对道德判断与审美判断进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条道德的绝对命令：「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得我能够立定意志去要我行为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这条绝对命令的意思和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十分相似。它对政治思想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按照汉纳。阿伦特的分析，康德对审美判断的见解更有启发性。和一般人把审美判断仅仅视为趣味问题，仅仅视为纯个人性的问题这一观点不同，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在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的功能。首先，凡是你认为是美的，你一定也相信别人同样会认为是美的。其次，衹有在和他人交流沟通的情况下，你才能确有把握地获得关于某物是美的这一判断；换言之，你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状态下获得明确的审美判断。美感是主观的，但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纯个人的，而是与他人共有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审美中的价值判断和政治思想中的价值判断极为相似。

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会使我们心中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觉得这件事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我们认为别人也应该和我们具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即使可以独立地发生，但倘若不和他人交流而获得他人的共鸣，它就衹能是模糊的、朦

胧的，如果我发现我和别人的感觉不一致，我不可能像对待纯口味问题那样，对这种不一致置之不理，我必然会寻求一致，但是我又不能像确定自由落体定律那样找到一种客观的测度验证手段，我只有诉诸交流和辩论。这种交流和辩论可能包含着大量的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但是并不能完全归结为逻辑问题和事实问题。我不可能找出一种逻辑或一件事实迫使认错；我只能通过一系列分析说明，最后诉诸于对方的内心，期待对方心中也产生和我一样的感受。除非得到别人的认可，否则我很难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信心。当伽里略迫于教会压力而放弃日心说时，他还讲了一句话：「可是，它（地球）毕竟是在转动的啊!」这就是说，在举世皆表反对的情况下，一个人仍可以对自己所持的某一知识判断深怀信心。在价值判断上就不同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对你的观点，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码是自我怀疑。

2、四面楚歌导致自我怀疑

我们知道，反右斗争的第一步就是点名批判。它把被批评者从人群之中划分出来，并且动员其它人共同参与批判，形成所谓群众运动，造成铺天盖地的声势，从而使得被批判者感到极大的压力。面对着党和群众的批判，被批判者处境之尴尬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你若是反驳党和群众的批评，岂不是大有和党对抗，和群众对抗的可怕嫌疑？我们知道，在每一次批判运动中，都少不了会有一番「帮助」被批判者「端正态度」的插曲。所谓「端正态度」，就是要求被批判者从一开始就承认对方的善意，对方的正确，也就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任何可以抵制批判的理由或立场，否则便被视为「对抗运动」——那本身就是一个可怕的罪名。在批判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认为自己正处于受命批判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们总希望看到被批判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状，因为那便表明他们的优越得到了承认。如果被批判者竟然争辩反驳起来，他们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说你是对的，那岂不是等于说党错了，群众错了吗？那岂不是等于说你比党，比群众还高明吗？于是，这些人果真会对你产生愤慨。这样一来，你的处境也就更危险了。你不得不发现还是放弃争辩为好。

在共产党那里，批判是阶级斗争，它从来不是平等的辩论，而是单向的口诛

笔伐。其特点是：粗暴，武断，强词夺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更要命的是，这种批判是不由分说不容争辩的。你本来或许还胸有成竹，以为你可以舌战群儒，澄清问题，说服对方，但事到临头你却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不但不能还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说，这种大批判很难让你心服口服，但是它足以使你强烈地感到别人都是反对你的，你的观点是被众人唾弃的。你也许感到很冤枉，但同时也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机，开始产生了自我怀疑。

3、孤立于集体之中

在进行了群众性的大批判之后，共产党的下一步手段是将被批判者尽量地孤立起来。孤立对人心造成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人天生是群居动物、社会动物。即使对于少数秉性孤独者，被孤立也是一种难熬的刑罚。孤独和孤立都是指离群索居的状态，但一为主动，一为被动。孤独是主动的孤立，孤立是被动的孤独。孤立本身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将你和众人互相隔离，一种是让你继续生活在人群之中，但别人都不理你。后者我称之为「孤立于集体之中」。

试比较两种孤立产生的不同效果。假如当局仅仅用强力将你与众人隔离分开，从外表上看，你的孤立是彻底的，但在内心裹，你反而可能会觉得自己并不那么孤立，你依然可以在想象中继续与他人保持交往。你可以认为别人不来接近你仅仅是由于不能或不敢而非不屑不愿，你可以认为自己仍然受到众人的支持或同情。你甚至还可以认为自己深得人心，广受拥戴。在这种孤立状态中，你比较容易把自己的境遇更多地归咎于少数掌权者的错误，你还可以相信群众，相信你的亲人和友人，因此你就会认为自己其实并不孤立。毕竟，强制隔离状态是非正常状态，因此你总是可以怀抱一种一旦回归正常状态事情就会改观的或真实或虚假的幻想。这种状态诚然令人痛苦，但却未必能轻易地摧毁你的希望。「孤立于集体之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样了。正因为这种状态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所以它能更无情地剥夺掉你的一切幻想。你仍然像过去一样成天和原来熟悉的人们共同生活，但你处处感受到别人的异样目光。众人都对你视而不见，或者是向你表示轻蔑。连旧日的友人也待你像麻疯病人一样地避之唯恐不远。有的人回到家里都见不到好脸色，妻子儿女也要和你划清界限。你可以劝慰自己说那祇是出于恐惧，可是你对这一点却不能有多少把握，因为别人的表现看起来好像不是出于不敢而是出于不

愿。你可以认为这中间发生了不幸的误解，但是既然没有几个人愿意倾听你的诉说，那又不能不给你一种印象，似乎在众人心目中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并没有甚么误会和冤枉。在这时，你不大容易明确地意识到掌权者的暴力，你更强烈体会到的衹是群众对你的排斥，拒绝和嫌弃。于是，你从内心深处感到彻底的孤立。

孤立状态会深刻地影响到一个人的理智和认知。首先，正如我先前讲过的那样，人对政治问题的是非善恶的价值判断衹有在与他人交流而获得共鸣的情况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确认。与众隔离的孤立使你失去参照系而陷于自我怀疑；孤立于集体之中则使你面对颠倒的参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两者都会使你对价值的感觉变得模糊、暧昧，从而更容易屈从于别人强加于你的那套观点。共产党常常要人「隔离反省」，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它的观点的影响力。也许有人会提醒道，平时我们不也认为一个人在离群独处，静坐沉思时最能获得清明无蔽的认识吗？古人说「闭门思过」，那不是和「隔离反省」的意思差不多吗？不然。因为独处静思是一种主动状态。在独处静思中，一个人排除了别人的直接影响，但同时却没有排除掉他和别人自由交往的经验。他无非是独自地把先前与别人自由交流的经验细心地安排整理而已。所谓隔离反省，是指你在周围舆论的一片否定声中被迫进入孤独的思考。你好比带了一本号称权威但实则谬误的字典去独自阅读你内心的那本书，结果衹会越读越胡涂。

据说在当年纳粹集中营中，大部份人都陷入精神崩溃状态，能够较好地抵制压迫和坚持原有信念者，就群体而言是两种人：一种是共产党人，一种是宗教信徒。这是因为这两种人都属于那种坚强紧密的团体，在精神上他们不是孤立无依的。他们有着自己的另外一套精神资源或曰参照系，他们可以由此而保持自信。霍弗尔（Eric Hoffer）指出，当个人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时，如果他衹是孤零零的个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在于，他不衹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种强大的、光荣的、不可战胜的东西的一部份。」霍弗尔讲得对：「在这裏，信念问题首先是个认同（identification）的问题。」我们知道，不少党员右派份子，也包括不少共产党老干部，在昔日遭受国民党的压制时尚能表现得相当顽强，但一轮到在共产党自己的政治运动中挨批斗就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有人解释说那是因为共产党整起人来更凶狠，这话不全对。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仅仅是挨几场批判（如果不伴以肉体折磨的话）总要比坐监狱好受些。关键是在前后两种不同

的情况下，当事者的认同变得很不一样。过去，国民党指责你是共产党而打击你，你正以身为共产党员而无比骄傲，你的精神当然不会垮。如今，偏偏是共产党自己反过来指责你不是共产党，指责你是反党份子，试问你如何去抵御？你自命为爱国主义者，可是你却遭到来自「国家」的严厉批判。你相信自己在为民请命，可是却遭到「人民」的无情唾弃。如果你在打击面前深信自己与主同在，与党同在，与人民同在，与历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会有力量感。反过来要是你无法相信这种种「同在」，你就会发现自己极其软弱无力。因为在这时，你感到你已经「从那构成生命本质的每一样事物中孤立了出来」（布哈林语）。

4、缺少单独的精神支柱

索尔仁尼琴指出，共产党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对大多数人威力无敌，原因之一是大多数人「没有单独的立场而缺乏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这无疑也是广大右派低头认罪的一个重要原因。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大陆便不存在任何真正独立于共产党的团体。我们每个人都属于那个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state）。一旦我们被党和国家抛弃，我们就会变得彻底的无依无靠。在精神上，我们从来就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我们追求的各种价值，归结起来大致总脱不开为国为民这些世俗的目标（至少是不能反对这些目标）。因此，当共产党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以国家的名义和人民的名义，指责右派份子犯了「不爱国」和「反人民」的错误时，我们衹有拚命地辩白，却没有另外的一种立场可以据之从事理直气壮的反对。从传统中汲取力量吗？很不幸，传统早就受到冲击而失去了它的权威，历史已被割断。譬如说，我们很难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再说我们的传统本身也往往是立足于种种世俗的价值之上。海瑞敢于骂皇帝，是因为他知道他的行为被清议所认可并为百姓所称颂。共产党为甚么要不遣余力地制造「舆论一律」并一再动员群众参加批判，目的就在于剥夺掉海瑞式人物的精神后盾，剥夺掉他们藉以傲对权势的那种道义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依靠内在的良知。因为所谓良知，无非是指人心固有的对善恶是非价值的感觉，它是内在的，却必须通过与他人的交往才能确立。当周围的人们都发出相反的声音时，良知也会沉默，因为它自己就陷入困惑。

索尔仁尼琴讲得不错：斯大林在布哈林们成为反对派之前就宣布他们是反对

派，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威力。那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先就打定了主意「反党」，党再来指控我们「反党」，我们就不大在乎了。怪不得那些真正的反对共产党的右派份子，在反右斗争的风暴面前反倒比较镇定。不过细想下去这中间仍有破绽。因为「反对」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立场，「反对」只是基于一种立场对某一特定事物的态度。换言之，我们总还需要有另一种东西为凭借才能理直气壮地去反对，我们总是因为赞成什么东西所以才反对另外的什么东西。通常，这就又回到「为国为民」一类目标上去了。我们是为了人民而反党，所以我们不害怕党指责我们「反党」，但是党却坚称反党就是反人民。如果「人民」都表示和党一条心，「人民」咬定反党就是反人民，我们就又没有立足之地了。除非我们假定人民正在受欺骗，人民终有一天会恍然大悟。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假定历史会在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又如何确信历史会在我们一边呢？须知那时候共产主义革命看上去来势汹汹，方兴未艾。除非我们相信天国，相信末日审判，从而也就是相信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仰，我们和上帝直接相通。有些天主教徒后来告诉我，在过去那段时期，许多天主教徒都表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倒很可能是真的。祇是话说回来，像这样坚定的教徒（不论是甚么教的教徒）终究少而又少。这就是为甚么在反右运动中，大多数右派都无法抵御那种精神压力，因为我们是如此普遍地不具有另外的精神资源。我们是真正的无家可归。

5、从迷乱到顺从

在压力下，被压迫者一般都会产生向压迫者认同的愿望。对于反右运动中的大多数人而言，问题还要更简单一些，因为在这裏，大多数人本来就是认同共产党的，起码是不曾明确地自觉地反对共产党，所以他们在压力下常常会进一步地顺从共产党。普通人总以为压迫会导致反叛，他们不知道压迫也会强化忠诚。共产党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运用压力去强化人民的忠诚。这种忠诚可以被强化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于一个人可以极为痛苦而又相当真诚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自己实际上从未犯过的「反党」罪行。

这一奇特的过程的确是相当复杂的。首先常常是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发挥作用。你本来不反党，不反人民，党却咬定你反了，「人民」也异口同声地说你反了。你百般申辩而对方却不为所动。于是你不得不意识到，你虽然没有反党反人民的主

观动机，但不幸却造成了反党反人民的客观效果。毕竟，客观效果这个东西，顾名思义，那就不是依你的感觉为准，而是依对方的感觉为准。毛泽东打比方道：一个医生祇顾开药方，治死了多少病人他是不管的，行吗？当然不行。其实，毛泽东这个治死病人的比喻并不恰当。因为治疗效果的好坏是客观的。所谓客观，不但是说它必须以病人的状态为标准而不能以医生的状态为标准，它还是说这里所指的病人的状态也是客观的，即可以进行客观量度的。一种病到底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单靠医生说固然不算数，单靠病人说也同样不算数。在这裏存在着一种中性的，为大家公认的物理和化学的检测手段。它看来像是一个价值问题，其实是一个事实问题，起码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为事实问题。纯粹的思想意识的是非对错则与此不同，因为其间往往并不存在甚么客观的物理和化学的检测手段，它往往祇能是主观的心理的感觉。我出于爱护你的动机讲出一句话，你却以为这句话伤害了你。这就不是一般而言的客观效果的问题了。你的感觉固然于我是客观的，但本身仍然是主观的。你可以说你觉得那句话伤害了你，但你不能据此断定那句话客观上就造成了伤害的效果，否则天下就没有误解这回事了。假如对方听不进你的解释澄清，而你又不愿意对方有被伤害的感觉，你可能会同意收回那句话，但这不意味着你已经承认那句话本身就产生了坏的客观效果。

以上这番道理，共产党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甚至于故意装作不明白。说话者自己恐怕未必都十分清楚。因此，当共产党一口咬定你的某种思想观点意生了恶劣的客观效果时，你自己也可能以为确是如此。于是，你祇好承认你的观点错了，虽然你并不知道它究竟有甚么错，但你还是决定去改正它。面对这个明显的矛盾，"立场"概念便显得颇有说服力。你纳闷：为甚么你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党和人民却认为是错的呢？那大约是你没有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想问题的缘故吧。可是你分明又意识到你本来是一心一意替党和人民去着想的。那是不是因为你主观上想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但客观上还是站到错误的立场上去了呢？这是否证明你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顽强地表现自己呢？可惜的是，立场并非一个地理位置，它好像在和你搞恶作剧，永远处于你的对立面。列宁讲过，历史喜欢跟人开玩笑。你本来想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进了另一个房间。你百思不得其解。在这时，从众性便发挥作用了。不论是出于「党和人民总不会错，千万不要站在党和人民的对立面」的角度，还是出

于「随大流更安全」的角度抑或是出于二者的混合，最后你决定要「承认错误」。

有时候，事情就到此为止。你认错了，党也就原谅你了。但更多的时候则不然。在很多时候，党还要进一步追问你：既然你承认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可见你本来就怀有恶劣的动机。这就更让你百口难辩了。你好像落进了「既说了一就要说二」的境地，不承认自己曾怀有恶劣的动机似乎倒不合情理了——别人显然是这么看你的。于是，你努力挖掘内心深处，看是不是有甚么不可告人的恶劣念头。通常你总会成功的。且不说以人心的复杂微妙，谁不曾产生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有些念头根本是随机的，并不受意志的支配。也不必说反省的暧昧，这点休谟早就讲过了。单单是外界舆论的不断指控，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你越是害怕找到甚么。你倒越有可能情急意乱地自以为果然找到了甚么。好的动机可以解释为坏的动机。譬如说，为国为民的愿望可以解释为出风头、个人主义。原先没有过的动机也可以被认为曾经有过。你会变得胡涂起来，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可以相信现在的你是好人——这点是当下自明的，但你对过去的你就没有多大把握了。你可以相信自己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你可能弄不清楚你过去是不是一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是否有过不拥护或者反对的时候。你也许还不至于自我否定，但你很可能已经陷入自我怀疑难以自拔。而对于党要你认罪即否定过去的自我这一点而言，那差不多就够了。

刘宾雁这样写道：「是被迫认罪吗？不全是，是心甘情愿吗？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结论上签上自己的姓名时，心情是淡然的，近于麻木。我似乎真正认为自己确是那几条罪状的罪犯，但在内心深处，又没有一条我不是半信半疑的。」事实上，到了这一步，签字不签字已经无所谓了。大多数人是会签字的。人在自信心倍受摧残的时候总是比较容易受人摆布的。

6、与压迫者认同的情感需要

大概在所有低头认罪的右派当中，上述这种「从迷乱到顺从」的类型最为普遍。许多人都是经由类似的心理活动。最终承认自己有错或有罪。完成这样一种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开始，几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气，到后来才渐渐地表示通了服了。在这里，共产党的另一手策略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所谓「给出路」。党宣称犯了错误的人祇要认了错，党和人民就会欢迎你，

让你重新回到人民队伍中来，否则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死路一条。

我们知道，被孤立、被排斥和被抛弃的滋味是十分难受的——这里还且不说被处分被下放被劳改。它不但会造成理智上的混乱，更会导致情感上的焦虑。为了免除这种可怕的焦虑，许多人宁愿不惜一切代价。因此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许多人还在想通服气之前，就已经急不可待地决定放弃自己原有的观点，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怀抱」了。有这种强烈的情感需要为前提，还有甚么认识上的弯子转不过来的呢？在这时，你的认罪很可能是诚心诚意的，但是严格说来，那与其说是你诚心诚意地想认罪，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你诚心诚意地想「回到人民的怀抱」。

综上所述，大多数右派之所以低头认罪，首先是由于巨大的外界压力而导致巨大的恐惧，其次是极度的孤立与四面楚歌的困境，由于大多数右派缺少独立的精神资源 无力从事单枪匹马的抵抗，故而很容易陷入迷乱、惶惑并失去自信，以为自己真的错了，再加上急于「回到人民怀抱"的焦虑，所以纷纷表示悔过。这一过程兼有自 觉与不自觉、被动与主动的二重性。这就是中共宣扬的「思想改造」。在不同的程度上，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尤其是毛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类似的「思想改造」，右派分子不过更典型而已。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所知道的「反右斗争」和「右派份子」　朱学渊

一、「反右」是毛泽东的流氓术

1957 年我才十五岁，但已经蒙胧地感到自己不适应那个社会，开始想知道阴暗面和外国的事情，诱因是厌倦学校的集体活动。前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秘密报告」后，社会主义阵营的阵脚大乱。那时《文汇报》连载安娜 •刘易斯 •斯特朗的回忆录《斯大林时代》，我每天放学走到两里路外的阅报栏去读它，虽然一知半解，但也知道了一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恩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覆灭的启端，也可以认识毛泽东阴谋一生的一个侧面。

1949年，毛泽东发誓「一边倒」的时候，他对斯大林和苏共就早已怀恨在心了。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流传到西方后，1956年4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此文尽管说了一些溢美死人的好话，但表白了毛泽东与追随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者的长期斗争，它的基调是赞同批判「个人迷信」的，毛泽东是准备要在这场风波中捞点油水的，他以为接替斯大林的地位时机已经到来。

1956年，事态一直朝着不利苏共的方向发展。六、七月间，波兰发生波兹南铁路工人闹事1，毛泽东则幸灾乐祸。当时的新华社驻华沙记者谢文清2，在几十年后告诉我，他曾经写了一份「内参」，报告波共执政错误和工人闹事有理的根据。毛泽东看了这份内参后，如获至宝，亲自批示，并在党内通报表扬谢文清。毛泽东借波兹南事件打压苏共，造成赫鲁晓夫在波兰问题上手软，最后接受哥穆尔卡的复出。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十月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迅速地把毛泽东的「幸灾乐祸」转化为「忧心忡忡」。他一反当初认为波兰工人「造反有理」，翻转脸来逼赫鲁晓夫镇压布达佩斯的「反革命暴乱」。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十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

1956年，赫鲁晓夫的处境很困难，只能由得毛泽东任意指鹿为马。而毛泽东就开始发明什么「两类矛盾」及其「转化」的「理论」，即：「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这不仅圆了他对波、匈事件截然相反的荒唐立场，同时也为1957年的「帮助党整风」转化为「引蛇出洞」，预设了陷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花言巧语号召「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帮助党整风」，中国的民主主义政治家们未能认识这个专制主义陷阱，还以为是「政治的春天」的到来。5月15日他就向党内发布〈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密示，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6月8日他在《人民日报》发出「反右」信号弹〈这是为什么〉，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说是毛泽东二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其实内容却全部篡改，

春天已经转化成为寒冬。

毛泽东与生俱有恶劣的天性，后天又耳濡目染湖南农村的流氓习气。1957 年「反右」只是他的系列阴谋中的一次，「文革」则又是「反右」的后续，其间他年年都有花样，而且所向披靡。既然「阴谋」可以无往不利地实施，当然他也可以无耻地声称它是「阳谋」了，这与「我是流氓，我怕谁？」没有任何区别。

众所周知，1957 年夏天，毛泽东的湖南同乡罗稷南问他，要是鲁迅活着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说：「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其实，毛泽东造就一个「无言论环境」的企图在三十年代就发作了，江西苏区的「富田事件」杀人如麻，杀的都是不拥护他的红军官兵。「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他则是逐次、按比例地将一部分人民、一部党内同志「转化」为「敌人」，使整个民族分批发生恐惧，其中又以「文革」最残酷，「反右」最卑鄙。

1965 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为「四清」问题发生争论，他当着一群「党和国家领导人」恶狠狠地对「少奇同志」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今天中共统治集团成员的父辈，大多见识过毛泽东流氓术，但他们的特权又是基于毛泽东流氓术造就的中华民族的恐惧，去年我们纪念「文革四十周年」，今年纪念「反右五十周年」，都旨在消除这种恐惧；而中共统治集团反对我们旧事重提，则是因为毛泽东的流氓小指头，还有为后人牟利的价值。

二、什么人会是「右派分子」？

「反右」剿灭了中国民主主义者，使他们的「多党制」诉求成为「罪恶」，胆小的中国人至今听了「多党」还害怕。然而，「反右」又大大超越了镇压制度诉求的政治层面，大批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数以十万计的中小学教师，因为对党委、对党支部、乃至对个别共产党员提意见，或者对中苏关系、民族政策等提出见解，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整个中国知识阶层受到了无端的清洗，和史无前例的恫吓，甚至一些党内、军内的干部，也没有逃脱当「右派分子」的厄运。

毛泽东和共产党以为阶级斗争和计划经济可以解决世间一切问题，一进城就打击「反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学」。1952 年「院系调整」，各高校社会学系全部被肢解，大批接受西方训练的经济学者被降级改行，人类学者潘光旦、吴文藻、费孝

通被编入民族学院，人口学者吴景超被编入财经学院，「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学科被根除。「整风」初期，有人呼吁恢复社会学系，共产党出重拳予以打击，「反右」期间全国的社会学学者被一网打尽。今天中国人口、民族问题之积重难返，是与 1957 年共产党着重摧残人口学、民族学等社会学学科是有密切的关系。

以民族学为例。民族学家吴文藻（冰心的丈夫）在关于土家族的问题上与汪锋（当时的「中央民族委员会」主任）的意见相左；妻子是藏族的藏学家任乃强，对西藏问题有太多的见解（如川甘边境「白马人」不应划入藏族，白马人的祖先是「白马氐」、「白马羌」；又如昌都、丁青「三十九族」亲汉、亲中央政府，清代受驻藏大臣直接管辖等）。真知灼见与政令不一致，共产党就把这些真知者打成「右派」。

危害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罪人究竟又是谁呢？五十年代，共产党左倾盲动，在康区鲁莽推行「民主改革」，远在 1959 年 3 月「西藏叛乱」前，康区就发生大规模的暴乱，今天海外藏独骨干中竟有许多是原本是亲汉、亲中央政府的康巴藏族。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西藏政教合一统治，长期局限在卫藏地区，今天达赖集团提出的「大西藏」的版图，很多是共产党「废西康省」的慷慨赠与。

1957 年，我由初中进入高中，我就读的上海铁路中学的老师中打了三个「右派分子」（汪洁、顾能超、李家婉）。容貌美丽的李家婉老师出身富商家庭，解放初还只是一个大学生，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她迷上了一位口若悬河的工农干部。结婚以后，这位老干部屡教不改地沾花拈草，她在「鸣放」中发了「工农干部道德败坏」的牢骚，于是美女就「化成毒蛇」了。

1965 年，我被分配到四川荣昌县教书，次年文革开始，我结识了一批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解了他们「向党进攻的罪行」。其中，以张建平的「罪行」最荒诞离奇。张建平是安徽六安人，父兄曾参加红军。他于 1950 年随西南服务团入川，其人虽仅有初中程度，但精明能干，能言善文，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前，任荣昌县人民法院副院长。

五十年代前期，荣昌县峰高铺发生一起强奸幼女案，经某女性办案人侦定，系当地一已婚育的农民所为。嫌犯被判长刑后，送某农场劳改。服刑期间，该犯从不洗澡洁身，便溺必无旁人。经农场当局查验，该犯竟无男器，于是宣布无罪释放。原来嫌犯是独子，年幼蹲便时，被饿犬咬去阴茎。家人长期隐瞒此事，乃

至成年成婚，其妻与他人育子，亦未为人知。嫌犯为「无后为大」和「名正言顺」，宁受冤屈，甘愿劳改，亦不露身。而共产党办「强奸犯」，竟也不验身。此事遂成一大笑话。张建平于「鸣放」期间，以此例批评法院的工作，引起县「公检法」负责人陶家宾（老干部，江苏东海人）不快，而将他定为「右派」。

另一名「军内右派」孟庆臣，山东金乡人，出身贫农，1944 年就随父兄参加了八路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孟庆臣所在冀鲁豫部队就是后来进军西藏的十八军。1950 年昌都战役俘虏阿沛·阿旺晋美，孟庆臣还参与了处置工作。五十年代初，他去张家口高级通讯学校受训，结业后回西藏军区，任昌都警备区通讯兵主任，兼地区邮电局局长和党组书记。1955 年授大尉军衔时，年仅二十五岁。

昌都地区军政总负责人是中共干员，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王在「文革」中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被摧残致死）。1957 年，王其梅去北京经年未归，西藏军区传言他有历史问题。1958 年西藏军区开展「整风反右」，昌都警备区找不出「右派」。于是就无中生有，将与王其梅工作关系密切的孟庆臣隔离，组织群众揭发他的「反党罪行」；在王其梅返回西藏工作之前，又将孟庆臣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军籍，送交地方处理。于是孟庆臣以「军内右派」的罪身，辗转来到荣昌。孟庆臣一生悲苦，在「文革」中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的五个子女无一人受过良好教育。

三、「反右」的报应和后果

中华民族从「反右」得到的教训是：「祸从口出」，从此「党天下」就更加发扬光大，不仅「党委即党」、「支部即党」，乃至「党员即党」，群众见到党员就噤若寒蝉，看到党支部点灯，就以为共产党要整人，而「政治审查」愈见严格，「阶级路线」愈见张扬，「出身不好」的人晋升进学，就愈见困难了。

有了鸦雀无声的恐怖局面，毛泽东行事就更方便了，1958 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就是他的为所欲为。1959 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则继续所向披靡；后续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四千万人，1962 年的「七千人会议」，刘少奇主会，毛泽东暂时吃瘪；1966 年他反攻倒算，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57 年，吴晗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号左派」，《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第二天，即 6 月 9 日，吴晗就奉命点了三个「大右派」的名，把火烧到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的身上。而翦伯赞是北京大学左派，老舍是文学艺术界的左派。这些左派帮助共产党强化了「党天下」，也就为自己挖好了陷阱和坟墓。九年以后，上述三人统统自杀身亡。

我 1960 年入华东师范大学，这也是一所以「出右派」著名的大学，除了出了许杰、施蛰存、徐中玉等「大右派」外，还打了无数的学生「小右派」，那时有一部电影《大风浪里的小故事》就是以华东师大「反右」为背景拍成的。不少「右派」在「文革」中尚能死里逃生；而主持华东师大「反右」的党委书记常溪萍，却撞在「文革左派」聂元梓的枪口上，非死不可。

常溪萍，山东平度县人，地主家庭出身，中等师范程度，抗日时期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曾任中共胶东局秘书长，青岛市军管会主任，后调上海担任「全国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其人「党性」坚定，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若寇仇。1963 年，低我一届的利瓦伊路等被揭发「聚众听裴多芬交响乐」，常溪萍亲自组织批判，一口一个「裴多菲俱乐部」，简直吓死人。好在后来发现「裴多芬」不是「裴多菲」，才销了这个案。

1965 年，与学术无缘的农村小知识分子常溪萍，已荣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的大部长，据说还将高升中央工作，有些人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来恭维他。原因是他在担任北大「四清工作团副团长」时，袒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1964 年底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反修战士」彭真的接见。然而，陆平和北大党委办公室主任彭佩云，中年气盛，见好不收，在北大实行反攻倒算，与聂元梓结下了冤仇。

1966 年彭真的「性质」发生转化，他先于刘、邓入了毛泽东的「彭罗陆杨」陷阱。聂元梓贴出「第一张马克思主义的大字报」后不久，就急下上海专揪「北大四清运动的叛徒常溪萍」。常溪萍得了飞来的「大叛徒」帽子，「马克思主义者」的「舍得一身剐」精神，竟彻底崩溃，隔离期间跳楼身亡。

1976 年，毛泽东的阴谋陷阱挖得已经太多，而且太大了，竟至连共产党也被他坑了。毛泽东一死，他的「神」的面具就脱掉了，共产党的神话也破灭了，「反右」制造的所谓「党委即党」、「支部即党」、「党员即党」等「次级神话」，更是人

间不齿的笑话了。由于它们太神乎、太荒唐，乃至后人几乎要把历史上这凶恶而愚昧的一页遗忘了。

四、结论：流氓畏惧历史

在五十年前的「党天下」，大部分中国人是把毛泽东当做「神」的。今天「党天下」似乎未变，但「道」已变，因为人们不仅知道毛泽东不是「神」，而且还知道他是一个「流氓」。如果中华民族还有什么畏惧的话，也不过是畏惧流氓，或者畏惧「带枪的流氓」罢了，因此「畏惧」的性质已经转化。

1957 年，流氓毛泽东说的「阴谋阳谋」、「美女毒蛇」、「香花毒草」、「引蛇出洞」、「聚而歼之」，都是世世代代难以忘怀的恐怖，「反右」是永远抹不去的历史。死了的流氓畏惧历史，活者的流氓更畏惧历史。虽然，我们手中没有枪杆子，但我们有追求真实和推崇理性的笔杆子，把流氓的恶行纪录下来，就是使中华民族免受流氓侵害的功德。（2007 年 5 月 17 日）

——2007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波兹南事件：一九五六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传出后，六月上旬波兹南机车车辆制造厂工人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派出三十名代表赴华沙与政府谈判。二十八日一万六千名工人举着「要面包和自由」的标语，来到市中心广场请愿，呼喊「打倒秘密警察」、「释放政治犯」、「俄国佬滚回去」等口号，大量市民沿途加入。市政当局拒见群众代表，其间又有赴华沙请愿代表遭逮捕的传言，于是群众冲击政府，打开监狱，夺取民兵武器，并与警察和保安部队交火。冲突中至少有五十多人死亡，二百多人受伤。当晚波兰政府指称「流氓分子「和「挑衅分子「制造流血事件，次日波共机关报称帝国主义间谍和暗藏的反革命挑动群众反对人民政权。七月初政府改口，强调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七月十八至二十八日召开的波党二届七中全会承认党和政府要对事件负大部分责任。同年十月召开的二届八中全会则完全肯定，事件是人民对歪曲社会主义的抗议，其原因应该到党的领导和政府中去找。

2　谢文清：河南省武陟人，出身贫苦而敏学，幼年参加八路军，在延安接受新闻工作训练后，长期担任军事记者，五十年代初任新华社驻外记者，文革后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改革开放高潮中出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主持该部的业务和党务。因报导波兹南事件，谢文清受到毛泽东的特别表扬，成为新华社的重要干部，但谢文清不忘公义，晚年与李锐等结为「言必诛毛」的挚友。一九八二年夏天，美国国务院邀请在香港任上的谢文清访美，他在去黄石公园游览途中与我等结识，畅谈通宵，针砭党弊，结下友谊。一九八九年五月，谢文清率广播电视部部员上街游行，轰动京城。「六四」后被开除出党，后来中共收回成命。一九九三年，广播电视部假西京宾馆庆祝中央电视台成立三十五周年，谢文清与吴冷西、艾知生等老旧官僚入座主席台，主会人唱名与会的「老部长」、「老首长」，会场静如死灰；惟宣布「还有我们的老部长——谢文清同志」时，突然全场起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沙文汉的政治民主诉求及对中国社会特点之探讨　沙尚之

沙文汉的一生，反映了二十世纪初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初期，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解放和建设人民民主的社会，走上革命道路所遇到的挫折与遭遇。他们曾以天下为己任，历尽无数劫难，在沉积了几千年的皇权的泥潭和暴政的漩涡中艰难地挣扎、呼喊、苦苦地探索真理。以自己的人生为代价，为后人铺垫了前进的道路。他们的探索、反思、乃至失败都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财富。百年来先人们的许多理想至今还没有完全能够实现，回头看历史仿佛是走了一个大圈子，表面繁荣的经济增长并没能自发换来社会制度与国家的现代化。当今社会对民生，民主，公平，正义的呼唤正在日益高涨中。今天让我们理性地重新审视历史，静心地倾听一下在繁华的喧嚣声中早被淹没与遗忘了的先人们微弱而坚定的声音，对于真正关心着中国人民命运的人也许不是无益的。

一　从理想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家

沙文汉（1908-1964）浙江宁波鄞县塘溪人氏，出身于农村一个儒医之家，父亲早亡，留下五个年幼的儿子，沙文汉排行第三。五个兄弟由一位吃苦耐劳、深明大义的母亲在家乡沙村艰难地养大。她变卖家产，支持儿子们去求学，期盼他们走出贫乡求得出路。

兄弟们从小受到父兄的影响，熟读古文历史与诗词，尚勇好义。通过自身和家庭受到的压迫与痛苦经历，沙文汉从小痛恨农村中欺侮穷人的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他对于历代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古典文学中为民除害的侠义人物非常崇敬，立志长大做一个保护贫穷百姓的英雄汉。1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烈火在中国大地燃起后，极大地激发了这些在社会边缘挣扎着，努力寻求人生真理的知识青年的热情。沙文汉在宁波甲等商业学校求学期间，立即成为《中国青年》、《向导》等革命刊物的忠实热情读者，他感到铲除社会不平的出路在于为了民族而奉献自己，他决心向旧世界宣战。1925 年 4 月他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处国共合作的时期，他也因此参加了国民党。 1926 年从商校毕业后，他放弃了长兄沙孟海为他找到的一份银行工作的美差，毅然回到家乡，接过二兄文求在沙村建立的农会领导工作，组织起农民运动，抗拒苛捐杂税反对横征暴敛。1927 年「四·一二」事变发生，他震惊地看到本来合作的友党竟背信弃义在一夜间无情屠杀、追捕大批革命青年。但这一切并没有吓倒他，只能激起他极大的愤怒。于是,他跟着党组织，投入更大的暴动来反抗，这也是当时他能想到的唯一选择。这年底，他参与组织的鄞、奉暴动遭失败，有更多人被杀害，沙文汉也遭到通缉，老家被抄。以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深感自己的莽撞与不成熟，他说自己「当时根本就不怕死，甚至从未想到过失败。」

1928 年 1 月沙文汉逃到上海。同年，年仅二十四岁的二哥文求，却因为参加广州起义被国民党政府杀害,牺牲于黄花岗。二哥是他投入革命的引路人，是他的崇敬的人。文求的勇气和思想对沙文汉有很大影响，这一联串的痛苦与打击对他是刻骨铭心的。

但是，如果说这段经历并没有吓倒他，反而激励了他更加坚定地去投入革命的话，那么，以后几年的党内斗争却使这个年青人感到迷茫。

到上海以后的沙文汉在大哥帮助下进了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就读。同时还担任了法南区共青团书记，一边做党的工作。当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的中共，完全以斯大林的马首是瞻，无不以苏共的意见来决定党的方针。盲动主义路线就是在所谓「革命高潮到来」的判断下出现的。党要求每逢革命节日组织「飞行集会」，搞罢工，罢课，上街游行，企图通过武装暴动，像苏联那样举行城市起义夺取政权。沙文汉经过鄞奉暴动的失败与思索以后，已开始意识到这种「左」倾路线不对头。作为青工部长的他，曾几次婉转提出不要先冲工厂搞罢工，应深入下层组织做好群众工作，但都被领导人所否定。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在苏共支持下上台，沙文汉被怀疑为「右倾」、「右派」不给工作。由于当时的职业革命家是没有其它社会职业的，所有的生活来源均由党的上级根据工作分配发给，沙文汉因此也就没有了生活来源，常因一个星期只能吃上几顿饭，在外出时因饥馑和疾病昏倒在马路上。这对他的健康有很大的摧残。但是沙文汉并没有因此被击倒。1932 年在一首自勉诗中他写道：

「吾道无人识，频年独苦行。贫遭街犬吠，病妒塞鸡鸣。

楚国虽三户，秦皇徒万兵。勿云时不至，有志事竟成!」2

这年秋沙文汉因遭到党内叛徒的告密和政府的追捕，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在亲友帮助下，1933 年 2 月他与妻子陈修良一同流亡到日本。通过他在同文书院的好友汪孝达关系，由陆久之介绍进了东京铁道学院就学，又与东京的中共支部重新接上党的关系，并被安排在红军远东情报局工作。这一时期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日文版「资本论」和其它马克思经典著作，写了许多笔记和文章，这些学习为他打下系统的马克思理论知识基础。

1935 年 10 月，沙文汉夫妇从日本回到上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上海的党组织已经全部破坏。沙文汉根据他在日本的理论学习和对日本经济，政治，社会和军事的研究，用不同笔名以文化人姿态，写下大量针砭时弊、有客观资料，具体分析和很有说服力的论文，表现出这一个时期他的政治视野与思想已经走向理性与成熟。3

1937 年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正式恢复。建立了以刘晓为书记的江苏省委。沙文汉担任宣传部长，主管学生和文化工作，领导学委和文委，在上海培养了大批学生干部，开展「孤岛文化」。在文委领导下，组织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

全集》，开展一系列的话剧、电影、音乐、曲艺等创作活动扩大抗日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他还同时兼管过武装斗争，接替江苏省军委书记张爱萍的工作，领导抗战初期上海外围地区抗日武装活动。1940 年以前，沙文汉担任过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的书记，开辟与建立苏（州）常（熟）太（仓）游击区、澄（江阴）锡虞（常熟）游击区、「江北特委」、「青浦工委」等地区的武装游击活动。太平洋战争（珍珠港事件）爆发以后，1942 年江苏省委奉命撤退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他担任过淮南和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宣传部长，兼任统战和策反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 1946 至 49 年的国内战争期间，沙文汉领导下的宣传文化工作，在上海创办和组织了大量报刊的发表，如《时代日报》、《联合日报》、《文汇报》、《联合晚报》、《文萃》、《经济周报》、《民主周刊》、《消息》、《新文化半月刊》等 4；他在领导统战工作中与各界工商人士，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建立起密切的联系。

1947 年配合抗战后全国高涨的民主运动，中共上海局发动过影响全国城市的「五．二〇」学生运动，1948 年沙文汉与张执一领导了上海局的策反工作。主要针对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策反：发生了上海刘农峻伞兵部队和林遵第二舰队的起义、国民党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嘉兴起义，军长刘昌义在上海起义、有「御林军」之称的国民党 97 师王晏清师长在南京起义，他还直接联系了上海爱国将领张权将军的起义、指导南京地下党策动「重庆号」巡洋舰、空军、江阴要塞起义等等。1949 年 5 月 25 日，在沙文汉领导下上海局地下警委接管了上海警察局。

建国后，沙文汉认为自己多年来的理想：国家繁荣富强，消灭剥削和压迫民族自强的民主社会最终能够实现。他拥护共同纲领，因为这个纲领在建国之初是经过社会各界大量精英的酝酿与讨论，获得各派力量的拥护与公认，它是中共党与其它民主力量共同推翻蒋家王朝的政治基础。共同纲领开宗明义提出：我国是「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沙文汉从自己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符合中国的国情，作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华东代表团副团长（陈毅为团长），他参加了对这个相当于宪法的纲领之批准，在建国初期历次政治运动中，沙文汉身体力

行，从自己主管过的工作出发，以不同角度多次宣传共同纲领的精神，以此精神指导统战，经济，文化，教育与知识分子工作，沙文汉在有关协商建国和共同纲领的传达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严格遵守共同纲领，党的干部要端正对待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资本家的态度。」5 他没有想到，正是因为他坚持信守共同纲领的政治承诺，决定了他日后政治生涯的悲剧性命运，更何况随着「革命的深入」，依然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原则的他，还将遇到更多、更致命性的打击。

二　　沙文汉的政治民主思想

1957 年 12 月，沙文汉在浙江省省长，省委常委的任上被打成右派。他的夫人陈修良是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被打成「极右派」，夫妻双双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级别连降六级。沙文汉是全国党内地位最高的右派，浙江省省委同时打出一个 「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有九名省委委员被清除出党，成为全国轰动一时的新闻。

今天，当剥去一切夸大其词的批判，撇开所有造谣诬蔑之词，重新分析认识沙文汉的「罪状」时，我们发现对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民主主义思想上。这就是他的：政权观念、主张党政分工、实行党内外民主、团结依靠知识分子，信任民主人士、反对以思想意识问题作为是非和敌我界线的划分依据、贯彻双百方针、拥护「八大」发展经济和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政治路线。

2.1 关于政权的实现形式、内容及党政分工

1954 年 9 月颁布了建国后第一部由毛泽东为首起草的宪法。6 根据宪法，浙江省第一届一次人代会选举沙文汉为省长，1954 年 12 月沙文汉正式从上海华东局宣传部调至杭州到任。从共同纲领到 1954 年宪法的公布，一般的理解此举应当是为了加强政府的作用和实行国家法治，但`以后的事实说明这两者似乎都不是这个宪法发布的动因。

首先，浙江省在 1954 年下半年宣布成立省人委和各厅局的政府行政机构时，曾一度准备在政府机关建立独立领导的总党组。几个月后的 1955 年春，浙江省委

很快便取消了政府系统设立总党组的决定，另行筹建省委书记处。它按照与政府同样的条块分口，但要求政府各部门必须服从于相应的主管书记，那怕后者行政上地位更低，能力更差。1955 年 8 月中央批复浙江省委的书记处正式成立，一律为外来的干部组成，但沙文汉不能参加书记处（理由是莫须有的：他有地下党历史，因此与潘汉年有关，需要审查）。中央对书记处的部署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赋予其高于政府的地位：「什么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们（书记处）做，发文用中央名义」，书记处「要管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面很宽」，代表政府的国务院周恩来就不能主持中央书记处的会议。7 这足以说明这个宪法的出台决非为了加强政府的作用。其次，新宪法公布后除出了一部婚姻法以外，直到八十年代，全国也没有其它法律再出台，长期以政策代替法律。据此，很难以加强政府的作用与实行法治来理解它的出台目的。

据现已了解的材料证明，1954 年宪法推出是受到苏共斯大林本人的直接催促与指导的。此后，建国之初根据共同纲领精神，政府从副总理开始各部有大量民主人士与社会贤达直接参与执政的形势不复存在。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多党执政原则实际上被否定，政协作为客体而不再是执政的主体存在。此举从根本上加强了共产党的全面统一领导地位，使一切权力（包括政府所有的职能）集中于党。

但是，沙文汉对此中的意图显然并没有理解，因为 1954 年底他在全省一次行政会议中依然提出 「四个阶级联合专政」，主张多党联合民主执政。（1957 年反右批判揭发材料）他认为：政权就其对社会的作用与影响而言，是一种极其强大的 「驾乎社会之上」的权力。政权属于公众，应当超越党派。他说「政权不是属于一部分集团的,政权机构应体现出它是属于公众的（社会的）公共权力机关。」为此,「政权机构应当具有完整的形式与内容,政府机关要有宪法所规定的独立的形式和自已平衡的统一组织。」他以为宪法既然规定人民委员会是政府的组织形式，就应当有法律所赋予的行政执政的权力，而不是「空架子」。1956 年，他在浙江省二届一次党代表大会发言中说：新建立的「各级人民委员会多数都很不健康，很形式的，甚至怎样在党委领导下工作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就省人民委员会情形来说：差不多每次开会都只勉强凑足半数的法定人数，讨论问题几乎完全是做做样子,….既没有象样的讨论,也无不是机械地通过。」8 沙文汉还提出：无产阶级政权若是要比资产阶级政权更强大有力，只能是「因为真正能够代表人

民利益，能给广大人民以真实的政治权利，即要实行最广大的民主，发挥他们的政治积极性」。这些就是他所认定的我国人民政权的民主性基础。9

沙文汉的民主执政主张与毛泽东 1945 年 4 月 19 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对外讲话公开宣称的「我们并不需要、亦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相信着，并且实行着民主政治」是不矛盾的。刘少奇也讲过类似的话：「(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0 这与沙文汉关于民主执政的思想也是一致的。只是在政权建立以后，以上这些正确的、符合国情的民主政治目标被抛弃，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权」观念了。

沙文汉一贯反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他看来政府不可以依附在党的下面，必须是独立运行的， 有关党政关系问题，沙文汉在 1954 年担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高等学校党委书记时，在「关于华东高等学校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写道：「学校党委的性质和任务，按党章的规定，学校中党的组织应该是党的基础组织，应保证学校行政任务的完成(没有如在工厂党基础组织那样的监督权)。现在华东高等学校中党组织性质与任务有二重性，一方面既是基础党的组织，而另一方面又是学校的领导机关，这样不但使学校中党组织的权力与其所担负的责任过大，并且很容易党政混淆」。他批评目前「学校重要问题，纵令是上级政府的指示也非经党组织决议，校长就无权处理，今天我们党委一般说没有这么高的水平。」

1956 年沙文汉在浙江省二届一次党代会上针对普遍存在的党政不分现象时说：「人民委员会所属的各厅、局，工作是不少的，但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非请示党委有关部门不行，稍大一些的事情还得由常委或书记来决定，工作中很少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政府机关应办的工作，多半都是党委的部门与分工的常委办的。」「党委该做什么，政府该做什么的责任界线分不清楚，更加严重的是，党委行政事务过多，在日常行政事务的压迫下，不能不放松政治思想领导；使行政机关对党委不能不存在等待、依赖心理，而人民委员会也只能成了空架子。」11 他说；「党既领导着政权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政权机构作用发挥越大，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与领导力量越强，有些事情由党来做和由政府来做有什么原则区别？」他提出「党的活动不应束缚政权机关的活动，而使自己陷于日常事务，削弱了对大政方针和重要工作的领导，这是得不偿失的」。他认为出现党政不分，「二位一体」

的状况，是根源于执政者在国家政权机关的根本观念上有问题。党的元老董必武也曾说过：「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12 这其实是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常识，在当时却成为异端邪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观点」并成为他的右派主要罪状。

2.2 依靠知识分子，真诚地团结、信任社会民主人士

当沙文汉在华东工作时，多次对知识分子问题和政治与业务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的思想。1954 年 11 月，他在上海大专院校贯彻四中全会决议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发言中，关于「依靠谁来办好学校」的问题，他提出：要「团结全体教师办好学校」。特别指出「对老教师有歧视、怀疑、利用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不应「把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或者与资产阶级有社会关系的，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对他们政治上进步看的少，而对历史复杂看的多」，特别严厉批评有些南下干部认为：「老子打下来的天下叫他们享福」的错误思想，他要求「对教师要尊重与信任，要发扬民主作风，建立同志感情；照顾知识分子自尊心，关心生活」，特别提出学校中「党政要具体明确分工，不要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党的工作不能脱离教学中心。」13

1957 年 5 月 24 日沙文汉曾给浙江昆虫学家蔡邦华，传染病学家王季午亲笔写信，对自己在 1952 年「三反运动」中的错误作了诚恳道歉。沙文汉的原信为：「邦华先生，来信收到。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曾误信片面材料怀疑你是贪污分子并行隔离审查，事后虽未认为贪污分子，但既未当即做出结论予以公布，更未向你道歉，使你精神上，名誉上受到了重大损失，这是很对不起的。这个处理失当的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责。记得前年在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和省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一次联合会议上，我曾说明了你和王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受了冤屈，这是我们的过错，然而这是远不足补偿你和季午先生等在三反运动时所受的损失的。这里特向你作书面道歉，如你认为必要，此信可向你的朋友和同事们传阅。」

最近出版的《束星北档案》记载了沙文汉保护知识分子的一件事情：浙江大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教授（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吴健雄的老师），在解放初「镇

反」运动中，因从前的学生徐名冠被浙大错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全家遭殃。束教授不顾自己会被牵连，到处请命救助，最后找到了浙江省教育厅时任厅长的沙文汉，才使徐名冠无罪获释。14

沙文汉推荐过不少浙江的老学者到文物管理委员会，图书馆，博物馆或文史馆工作，使大量历史文物和图书得以整理和保存，他指令保护过普陀山一千罗汉和天台国清寺佛经等文物。他的长兄沙孟海，解放前曾在陈布雷手下任国民党的国府秘书时为蒋氏编纂家谱。1949 年，他不愿随蒋介石到台湾去，沙文汉就推荐安排他在杭州从事文物工作，成为我国著名书法大师和金石考古专家。

沙文汉有长期统一战线工作的经历，他与党外民主人士之间真诚的关系建立在几十年来共同奋斗的民主革命目标上。建国后共同纲领明确提出联合四大阶级的统一战线线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忠实执行这一方针的沙文汉非常反对有些党员干部掌权后排斥、打击党外民主人士的行为。1956 年 1 月 8 日在浙江省的厅，局党组委员以上党的干部会议上，沙文汉明确规定了三条要求：

1，要相信民主人士的能力和政治上可靠；

2，要使他们有职有权，如果党外人士是正职，就是领导，我们硬是要服从他；

3，要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他还要求党员干部将此三条作党性保证。

沙文汉尊敬民主人士的小事，在四十多年后依然被一位当时的记者记得很清楚 15：一次在省人民大会堂开会，到开会时间后沙文汉问：民革主任委员何燮侯 16 老人为什么没到？当了解到原来机关事务管理局没有派车去接他，原因是侯老家巷子小进不去车，沙省长责问：「你自己家巷子也小，为什么可以坐公交车（小汽车）来呢？」开会了，沙先宣布：「何老这么大年纪走路来开会，我们都坐车来，想想也脸红。今后凡邀请（民主）党派负责同志来开会，都要派车接送，车不够先保证他们，党员同志可以骑自行车或步行。」沙省长语毕，在座各党派负责人莫不动容。浙江民盟著名的民主人士宋云彬说：「沙文汉的文化和理论水平都是相当高的，自己对他有一种知己之感，容易接近，谈起话来总是很融洽的。」17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后，许多党外人士被点名批斗，但沙文汉仍坚持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多是中间阶层而不是敌对的资产阶级」，「他们历史上是进步的，跟党走的。」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力地保护他们。

1957 年 6 月第一届四次全国人大在京召开，这次会议成为浙江省全面开展反

右运动的起点。以沙文汉省长和杨思一副省长为正副团长的浙江省代表团刚到北京，在事先沙文汉并不知情的情况下，杭州一下子发起对浙江省民盟宋云彬，农工民主党李士豪的公开登报批判。此时浙江省委书记处来电话要求浙江全国人大代表团立即在北京就地批斗宋，李。沙文汉觉得手头没有材料，不好这样做。浙江日报公布对宋的批判材料是 23 日寄到北京的，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位团长看后都认为材料散乱，没有说服力，宋云彬只能作为思想问题帮助而不能定右派。李士豪在杭州的见报材料是 6 月 26 日才寄到北京的。当省委书记处来电话催促要代表团在北京开展批斗时，沙文汉也对李士豪的材料不充分提出了疑问。

宋云彬的情绪很激动，他表示要求在会上讲清自己的问题，并说有些揭发的事情与实际有出入。26 日晚上，浙江代表团针对宋云彬开了首次小型座谈会，沙文汉安慰宋说：「你的历史我们是清楚的， 大家对你提了一点意见，可能有的意见不一定完全得当，有的帽子大了一点，也不要太紧张，不是右派.也不能硬要成右派，是右派也辩不掉。」宋云彬在后来的检查中谈到：「在北京，沙文汉不止一次对我说：『你的历史我是知道的，你在民主革命时期追求民主和自由是进步的，没有人会否认你。』『你的问题要回浙江去才得解决，你要撑得住』。」18 虽然浙江省委多次来电话催促在京批斗宋、李并要求快见报。但浙江代表团在沙文汉的主持下一再推迟批斗，火力又弱，这令浙江小组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们大为不满。更使他们不满的是：沙文汉在整个会议期间对待宋、李的态度竟然始终与往常一样保持友好。因为沙文汉后来在检讨中说，在他看来「他们只是犯了错误的朋友」，「是人民代表，省人委委员，在没有撤销资格以前，我仍应一样地对待他们。」

回到杭州后，宋云彬在 7 月两次发现家中来了陌生人，要见他提意见，感到奇怪，拒绝接见。8 月 6 日又接到一封从香港的来信自称王天池，说过去给他写过信，表示对当前国内问题的关心云云。宋云彬看出这封信是用报纸作信封，似是国内出品，香港是不会用这样信封的。信封上把宋云彬写成宋雪彬，而且有用另外颜色墨水涂改过。宋立即写信给沙文汉，呼吁：「您几次对我说，叫我要撑得住，我总算撑住了。在民盟六天大会中，大家已经不把宋云彬当作一个『人』了……今天接到那奇怪的信，不能不害怕，我觉得的确有人在用种种方法来陷害我，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不翻身……沙省长，我再次请您救救我，把那信交给有关部门，加以调查和研究……」19 沙文汉立即将信转省委书记处备案并要求统战部

出面处理。但是省公安厅一个副厅长认定，这是「香港美蒋特务机关向宋云彬表示支持拉拢的一种试探」，为打倒宋云彬，这位副厅长甚至在报上公开称：「有反革命分子洪国正给宋云彬写信联络。」可是宋此前从未收到过洪的信，妙在公安局长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宋真的收到一封自称为洪国正的人来信！沙文汉对党外右派的这种态度立即转变为党内反右的目标。

1957 年 7 月毛泽东主席在青岛召开省委书记会议，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于 8 月 2 日向省委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时说：「所有人员都要过社会主义关，尤其是某些老干部特别重要，其中有些是过不去的。实际这次整风在党内就是清党，但对下不说」，「在反右问题中，尤其对宋云彬问题上，有些人是温情主义，实际是右倾」，特别提醒：「整风中要有什么就揭什么，不管他头发有多白，资格怎样老。」20 就这样实际上点出了沙文汉与宋云彬的联系，宣告浙江省的反右运动将从党外转向党内。沙文汉的前述种种事实，构成了他「和党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支持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向党猖狂进攻」的主要右派罪证。

2.3 发扬党内民主与贯彻文艺双百方针

1955 年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政策发生过反复性的变化。浙江从高速的合作化到 1955 年春的「坚决收缩」，解散了一万五千多个合作社。但到夏季以后 「坚决收缩」方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重新走回超快速的合作化之路。过快的合作化与反复，引起干部与农民关系的紧张，1956 年下半年农村山区出现过上千次事件。土改后刚得到土地的农民，在合作化中重新再次以集体化形式失去了土地。

沙文汉虽不主管农村合作化问题，但他看到了各地干部对省委在这些问题上大起大落的反复与粗暴的工作作风不满，在全省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主要领导却又没有认真检查这些问题。1956 年 7 月在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沙文汉针对以上情况又提出加强党内民主问题。他说：「我们党内的民主太少了，由于缺乏这个宝贵的要素，就使党内上下存在隔阂，压抑党员的积极性，严重损害群众路线原则，使集体智慧不能很好发挥……」 「我们过去犯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健全党的生活」，代表们的「各种批评和对省委的要求都归结到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反对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他批评省委「存

在严重的骄傲自满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脱离群众」的问题，主张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来避免错误，提高领导水平。21 而这些意见后来都成为沙文汉「攻击省委领导」，与党「离心离德」的右派罪名。

沙文汉曾长期从事文化方面领导工作，担任省长以后文化仍是他分管的工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黄源在回忆录中称：「浙江解放以后，文教系统基本上都是在林乎加的领导下。从地位上说沙文汉当过部长，林是副部长，但是林乎加是省委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林的妻子又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党组书记」。这种地位决定了对五十年代浙江的文艺路线实施有重大的影响。林乎加副书记一贯要求文艺作品必须密切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必须多登工农作品。22

黄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发扬民间艺术与政治性的关系。1955 年春他提出建立省歌舞团，在舞蹈队搞起群众喜闻乐见的「狮子龙灯舞」后，立即遭到林氏夫妇的反对，认为是脱离春耕生产，要批判。林乎加「一看民间歌舞团和春耕生产没有关系，认为是脱离春耕。这个东西要批判」必须演他们提出的配合农业发展四十条纲要宣传的节目，1956 年歌舞团差点被解散。23 另一件事是昆曲「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黄源积极帮助了这个濒临灭亡的小剧团和剧种，但主管书记认为这个剧的创作在思想上与政治上都脱离当今实际，不予支持，因而在浙江不能推出，省委主要领导人也决定不去观看此戏。后来此剧辗转到上海和北京演出后大获成功，又到全国巡回演出，人民日报称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虽然沙文汉从开始就一直十分支持黄源对昆曲「十五贯」的发掘工作，但他在杭州看演出后，竟不能上台与演员握手庆祝，因为他顾忌省委领导对此举不快。这件事以后又成为沙文汉支持黄源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主要问题，在 1957 年反右中重新算帐。

类似的事还有：为进行著名艺术家盖叫天的纪念活动，浙江省长也不能出面，因为沙文汉知道省委是不去人的。他「只好要我（黄源）以文化局出面，在盖叫天家里摆酒设宴，省长自己前来祝贺，也不见报。」「省长到昆剧团去也是秘密活动。」因为省委认为这都是属于「非政治性的活动」。24 当时文汇报记者采访浙江省文联后，报导浙江省对作家的待遇时称：「在杭州民主妇联可以有极好的一所大房子，但作为浙江全省的文艺领导机构之一的文联房子到现在没有完全解决。」沙文汉曾在自己有限的权力中为浙江文联拨了房子，却被一些处长占去做了宿舍。

25

沙文汉在努力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中所遇到的许多尴尬处境的原因，在黄源回忆录中有一定反映，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当时的境遇是共同的。黄源说：「双百方针在党内传达了，省委没有表态，也不要求我们出具体执行的方案。」「我没有主动向省委请示汇报，而只是在实际工作中执行中央的方针了，这样，就同省委的思想对立了。」26 但这一点却证实了毛泽东主席的估计：「许多干部实际上不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级干部十个有九个不赞成 ，或者半数不赞成。」27 不久后，像黄源，沙文汉一样认真在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的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其实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非此即彼，并没有中间道路的，又何来百家？

2.4 贯彻「八大」发展经济文化，不执行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路线

1956 年 9 月「八大」在京召开，「八大」通过的刘少奇的政治报告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要求与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建设指导方针上是反对冒进，提出「综合平衡，稳步均衡，按比例」的发展；在汲取苏共教训中，「八大」报告提出要「扩大国家民主生活」，「贯彻双百方针」；在党的建设上更是提出：「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要借鉴苏共问题「反对个人崇拜，避免专断」等等正确的意见。

沙文汉拥护「八大「的方针和路线，他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建设国家，广泛团结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以迅速转变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

从浙江的情况看：到了 1957 年浙江全省粮食产量为 158 亿斤，全省人民收入人均 88 元，农村生活贫困；工业极不发达，工业总产值（还包括手工业在内）为 22.7 亿，只占工农业总产值三分之一左右；社会文化教育水平低：干部队伍已经替换为以南下干部为主体，文化水平普遍很低。以较发达的嘉兴，海宁为例，县以下干部初中以下文化的达到 80%，包括一部分半文盲。全省文盲有 800-900 万

之多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人口。社会文化教育水平低：主要是初中，小学生，1957 年全省的高中生只有 3.7 万人。由此可知，建国七年来，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基本仍处在相当落后的农业社会阶段，「八大」关于以综合平衡发展工农业，建设经济文化，扩大民主等基本方针是正确的。

但在实践中完全不能按照沙文汉所理解的那样去执行。「八大」前一年，在 1955 年秋的浙江省城市工作会议中，省工业部严厉批判省统战部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执行方针是「严重右倾」。沙文汉是分工主管统战部的，但他事先不知道开会的事，省委也不让他参加这个会议。他在听说后，不同意这种批判。在沙文汉看来，工商业资本家经过多次运动改造，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与以后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基本估计相符）。他向省委书记江华提议：常委可否对此不同看法先讨论一次统一认识，却被书记所拒绝，10 月 28 日在总结会上，省委书记在做结论时指出：「城工会议一个多月的争论中心是对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如何认识的问题，谁战胜谁没有看清」，他还说：「民主革命时代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反对三大敌人；在社会主义时代联合资产阶级是为着消灭资产阶级自己」。沙文汉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当然是「右倾」的，因此也不需要他参加这个会议。

沙文汉不同意把思想意识问题混同于政治问题，他反对用整人办法进行阶级斗争。1954 年他在华东宣传部有关高等学校思想改造报告中谈到：「斗争批评解决不了思想问题，而且脱离中间群众。」他常对在肃反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过火的斗争深感不安。1955 年，在全党宣传批判唯心主义思想时，沙文汉根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教训提出：「应该说理，讲事实，切避空洞、扣帽子与谩骂」、「要注意有不正派的或怀有不正当目的的人，藉学术讨论为名挑拨离间，进行宗派斗争，陷害他人和骗取别人信任等行为。」沙文汉认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多是中间阶层而不是敌对的资产阶级」，「目前意识形态思想战线上不会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解决也主要依靠正面引导、和风细雨的说理讨论与怀柔的方式逐步解决。」他认为资产阶级连生产数据都收归国有了，怎可能阶级斗争形势反而越来越尖锐呢？但这恰好与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论断是对立的，据此，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

尽管「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分析和经济建设的方针被提出来后墨迹未干，还正在逐级学习贯彻，受到广大干部与群众的欢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党内和社会民主气氛的提升和思想的活跃。但是，「八大」刚结束就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也出现罢工，学生闹事，农村闹退社。毛泽东对此十分警惕，他开始反复强调肃反与阶级斗争的必要。最高领导「高瞻远瞩」下决心否定「八大」方针，代之以两条道路和两个阶级的斗争作为国内主要矛盾；经济建设上则是要反「反冒进」，反对「平衡发展」，为下一步的大跃进做好准备。

最高领导的这一动向，起先只有极少数人得风并紧跟。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频繁到南方，尤其是到上海，杭州。在 1957 年青岛会议和八届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加快了修改对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意图。但是他发现许多中央和地方干部还深深沉浸于「八大」的政治与经济方针中，不能很快响应他的号召。甚至在 9 月的三中全会上还发生过很多争议，许多干部对毛泽东提出的：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主要矛盾，「感到不理解」，在全国诸多省市党委书记中，「好学生」柯庆施与江华也许是最早、最能善解其意并立即行动的。毛泽东主席感到在北京空气不好，自己的一套想法得不到支持，但他从「诸候」中找到了「知音」。他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28

柯庆施亲临浙江，力图解释毛泽东对当前矛盾的提法与「八大」不「矛盾」。他特别阐述了毛的关于「思想意识」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矛盾」提高到作为目前阶级斗争的重大特点。这样就为下一步在「思想和政治战线」上发动对右派的阶级斗争建立了理论依据。29 从 1957 年秋起，浙江省连续召开各级会议，以开展党内整风为由，相继打出以黄源为首的「反革命文艺」集团，揪出以陈修良为代表的省委宣传系统一大批部，厅级党员干部为右派分子。这一系列会议的最高峰是在 12 月 9 日浙江省第二届二次党代会上，省委书记江华做工作报告，并宣布浙江省委对以沙文汉为首的「沙、杨、彭、孙」反党右派集团的决议。30 江华的长篇工作报告重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同日，毛泽东主席从北京到杭州，准备召开有各地区省市书记参加的「杭州会议」。看了这个报告后十分高兴。12 月 17 日凌晨，毛主席给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秘书叶子龙通知其它华东省市的书记推迟其它工作，要求紧急看完江华的

报告，并连续两天召集他们讨论此报告。23 日毛还要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讨论对报告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部分进行修订。3128 日在人民日报向全国公布此文时，编者按称：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就这样，最高领导从浙江的大案得到了他早就反复告诫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只是这种矛盾主要地不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而表现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最有力的证明。

为了将浙江案例在全国推广，毛泽东主席多次举一反三，遂使此案成为党内大规模反右、清党运动的起点和在全国树立的典型样板。1958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对柯庆施大加赞赏要「大家学习柯老」。在 15 日的会议上，他对于两条道路，两个阶级是主要矛盾问题的讲法肯定了：「上海有发展，浙江有创造。」32 在 1958 年 3 月 9 日至 26 日的成都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又提出我们应该采取列宁的办法 ：「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特别举出浙江为例，向到会的书记提出问题：「是江华独裁，还是沙文汉独裁？」33 在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当谈到所谓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毛主席再次点出浙江沙文汉，安徽李世农和广东，广西等省负责人的名字，他们刚被打成右派，或认为犯了极其严重的右倾错误。毛泽东要求各省都要「献宝」。称沙文汉等人：「有的是十个黑指头，有的是九个黑指头，只有一个指头干净」。1958 年在成都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反右是一次「新式肃反」,「这实际是一次清党，一千二百万党员中，清除二十万，百把万，不算多。」34

三　　沙文汉对中国社会发展特点的思考

反右以后，沙文汉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工资级别从原来六级降为十二级，经省公安局的抄家后，被赶出北山路葛岭的原住所。他的夫人陈修良被送往嘉兴农村劳动，全家离散。沙文汉的身体很坏，只得由他的二嫂（沙文求的遗孀）照顾。他被罢官后谪居杭州保俶路宝石新村四幢，在对面楼下，当局另安排住了一户人家，全天侯监视沙家出入人员。他虽然挂了一个省政协委员名称，但被长期搁置起来，终日在家不分配任何工作。

沙文汉发现自己能够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需要不断反复写检讨。他趁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希望能从中找到对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时也可以整理与思考自己对政权的建设，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的观点；第二，他最想研究的是中国的政治和党史，他要搞清许多为什么。但又因自己的身份，已不可能被允许做党史或政治问题的研究，因而沙文汉决定从被他称为「死人的政治」——古代历史的研究着手。

理论学习中他并没有找到可对他的「右派言论」批判的更多依据。相反，通过检讨，他委婉地以解释或甚至以批判「错误」的形式来表达、解释与证明自己的观点。今天，重读他的大量检讨原稿，可以发现许多这种痕迹和意图。他要把自己对这些有重大争议问题的认识通过检讨书写下来，留给后人做评判，可谓用心良苦。

另一方面，在研究与探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过程中，他却有了深刻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沙文汉从小在中国农村成长，熟读古代文学与历史，非常熟悉我国的社会经济特点和朝代的历史变革。早年除了学习过商业经济，日文以外，1929 年 6 月至 1930 年 5 月他还被派往苏联少共国际学习马列理论，1933 年至 35 年在日本自学「资本论」和在东京铁道学院时接受了更多的西方经济与文化知识，他又有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亲身社会实践经验，这一切使他能以更宽的视野，从与其它社会比较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社会特点。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爱思考和养成了理性分析习惯的人，虽然身处斗室，失去了活动和与人交流的一切自由，但是他的思想并没有一刻停止过思索，反而思潮汹涌，更加不知疲惫地为追求真理而自由地驰骋。

沙文汉早年养成的毅力，帮助了他在反右后克服被冤案折磨的巨大痛苦、坚强地经受着气喘、心脏病、困难时期极度的营养不良、缺少必须常吸的氧气和医疗条件等种种考验。1958 年 3 月，他鼓励即要下乡劳动改造的陈修良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决不自杀」。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春蚕到死丝方尽」。1962 年，在生平的最后一首诗中，他写道：「孤灯夜永油将尽，老马途遥力不支」、「人生得失毋须计，毕竟事成总可期」！

沙文汉研究中国的奴隶制度目的是为了搞清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发展的原因。早在 1935 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就提出：「经济是社会问

题的根源，明白了中国经济构造，就能明白中国的社会，也就能明白中国社会的变革，应采取的方针和策略。」这正是他用来观察研究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一条基本准则。例如，他用大量的资料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状况，指出：「研究中国必须把研究土地关系作为中心；中国农业封建性高度优势，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条件；中国革命主要内容是反封建而不是所谓「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35

在其它论文中也显著地表现了他的这一分析思路，如在以叔温为笔名的「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36 一文中，他将江浙一带农民的税负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与国外情况相比较，指出我国农民「比诸 1866 年普鲁士农民要多 60 倍，1923 年的美国农民多 18 倍，1931 年的日本农民 8 倍。如果说中国农村比任何一国都来得穷，那末他的税赋担负则是比任何一国要高好几倍!」由此指出这种税赋制度正是破坏国家生产力的根源，中国的财政问题不可能通过「开源节流」等肤浅的措施来解决的。

〈中国景气论〉是沙文汉（叔温）1937 年另一篇重要论文，他搜集大量资料证明中国现阶段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特质：资本主义发展薄弱，同时，中国的经济地位又受到世界资本主义的支配，失去了独立性。37 正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有相当深刻的了解，决定了沙文汉在政治观点上一贯坚定追求实现民主革命的目标，反对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强行向共产主义各阶段过渡的乌托邦主张。

1963 年 6 月末，沙文汉怀着热情、带着病痛完成八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38 通过对大量古代文物考古发掘资料（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左传，诗经，尚书，汉书，论语，孟子、墨子，国语，公羊传等）的研究，同时又仔细阅读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社会各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集》等经典著作，重点研究与探讨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

他的研究证明：人类原始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以后会分化为阶级社会，这一点是共同的。中国在商代与西周存在过奴隶社会，但是我们不能用西方的奴隶制度标准硬套用到中国来衡量，以为所有的奴隶社会形式也全是一样的：有一个个奴隶主，管着一批做工的奴隶，并进行着奴隶的交易买卖。他认为在不同生产方式与文化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可以出现不同的实现形式，中国的奴隶社会与西方的实现形式就很不相同。他发现由于中国的初民早已是农业民族，生产方式强烈依

赖土地。由农耕生产方式发展出来以血缘，氏族为纽带形成的稳定耕作群体，奴隶的形式上似乎与西方完全不同，但从考古的大量证据来看，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奴隶无疑。他把这种奴隶制度称之为「氏族」或「国族」奴隶制度，以区别于西方的奴隶制度。

通过史料考证，沙文汉提出中国的奴隶制最大特点竟然是;「土地和奴隶都是属于国家所有的」。人们从商周起就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道理。这个情况也是西方社会所没有的。他论证：土地私有制在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没有（人民的）私有制，连人也是世代属于国王或诸侯的（实际上，人都是奴隶）。

他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由于长期缺乏私有制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只形成为两个阶级：「一头是人数极少的主子，一头是人数极多的奴隶，中间缺乏第三种阶级自由民」，这种社会结构反映到国家形态上，就是实行「政治经济完全合一，权力极端集中的君主独裁」。反观西方从奴隶社会起就产生了私有制，并且能够培育出人数众多、有势力的中间阶层集团（如希腊和罗马的平民阶层），这对于日后民主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国奴隶制的探讨〉从历史角度揭示了国有化和集权制并不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必要前提。他看到古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一向是由极少数统治者以国家名义，对绝大多数人实施压迫与掠夺形成两极结构。统治者为了剥夺更多，就一定要杜绝大多数人发展私有财富，结果是造成私有制度的缺乏和民众普遍的赤贫化。极少数统治者需要维持这种经济结构，又必须在政治上保持权力高度的集中。因此，经济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高度集权两者是孪生兄弟，相互依赖、互为前提。其结果是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对皇权制度的崇拜与恐惧，许多人深信权力只能集中，党政军合一，党国合一是唯一的统治方式，而世代的民众只能生活在既无财产、又无权力的可怜的奴才状态。

对奴隶制度的探讨使沙文汉从深层次上认识与理解了：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上一直实行专制与皇权统治？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偏向保守，表现出对上的盲目服从的奴性,非常缺乏独立与自治的精神？为什么历史上统治者总可以用「集中」「统一 」为理由压制民主，排斥异见？为什么中国社会中的等级差别制度如此森严，难于破除？为什么在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由同乡，同宗结成帮派的争斗与党同伐异

的现象?。产生这一切特点不是偶然的，也包括他自己为什么仅因为追求实现民主革命目标而被深深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历史根源。

四　　结语

沙文汉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探索者，他与成千上万的那一代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国家动乱、民族存亡之际，无怨无悔地以天下为已任，无私奉献自己。他们期望中国能够摆脱千年的贫困与落后，建设起一个繁荣富强，公平、自由与民主的现代国家。他的一生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家命运的缩影。沙文汉的遭遇又说明在一个有着深厚皇权传统的封闭性的小农国家中，实现民主革命目标绝非易事，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还远未具备接受国家现代化的条件。

1949 年建国后经过长期武装斗争，中国的政权的主体和名称发生了极大改变，但没有改变的是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氏族性地方宗派的生活方式，落后的小农意识形态与行为模式。

毛泽东建国前夕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转化为工作队」.他强调「军队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全国胜利以后，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还是一个战斗队」。事实上，庞大的战争机器在突然停止下来后，需要有巨大能量的释放。这些基本面决定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执政的政权，是我国在该阶段中的历史无奈的选择。在这个阶段不可能实施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文官政治制度。很快，共同纲领被实际被废止，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被宣告终结，匆匆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目标不但要消灭私有经济，还要消灭各种思想意识，这恐怕是马克思生前也没有想到的吧。

建国后沙文汉依然表现出对民主政治的强烈诉求，这是因为他从国情与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出发，他从根本上感到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与文化如此落后，没有进行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他所主张的政权观念、党政分工、党内民主、团结依靠知识分子、信任民主人士、反对把思想意识问题作为阶级斗争、拥护双百方针、贯彻「八大」路线，发展经济文化等等都说明了这点。尽管他所主张的这些问题，也是中央以前一再声明过的、有过正式文件的、甚至是经

过庄严的程序一致通过的。而这种重大政治纲领，路线与方针政策的变幻无常，对沙文汉是致命的。作为一个有理性思维的诚实的知识分子，他既不理解，更不会轻易跟风转向，这就注定了他悲剧性的政治命运。

所幸历史并不顾及什么人的意志，它将顽强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过早终止民主革命任务的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大跃进、文化革命宣告失败，二十年多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提出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与改革开放。1981 年 6 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宣布:「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这却正是二十五年前「八大」路线的未竟之业。

当时我国民主革命的重大任务本应是发展生产力和建立有社会公平与民主的政治制度。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对此我们已无法回避，今天无论是用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其它什么名称去称呼它，都是一个含义。社会发展阶段不可能超越生产力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制约与局限。从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出发，拼命反对发展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本身就是社会的大倒退，更何况要想跳跃过去，用阶级斗争，人为地改变上层建筑来实现共产主义呢。乌托邦是「极左」思想的温床，在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后，今天我们终于承认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这个漫长的过程只证明了一个道理:历史的根本规律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坚持永远向「左」转弯的结果，是在付出沉重代价，走了一个圈子之后再回到原点。

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原理，任何一种社会革命的任务都有经济与政治两个基本面组成，其背后则是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决不可能依靠单一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同步适应，协同发展。如果强行违背这些基本规律，社会还将再次受到历史的惩罚。要消灭两极分化的经济结构、消除城乡和各种社会不公正，必须通过建设民主，公平的社会政治制度来实现，而不能单纯用经济方法去解决。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就像社会生产力的现代化一样，也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它需要通过中国人民以更高的智慧来解决。

沙文汉的民主政治思想、出自于他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关系的研究结果，以及他坚持从经济，文化角度来认识政治制度的分析思路。今天这些思想与

方法，对我们依然有很大启发和借鉴意义。后人应当吸取历史的经验，不能因为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眼前的需要，不惜让全社会再付出巨大的代价，仅仅换来一个前人早已得出的常识性结果。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农民运动可以反对皇帝，但决不会反对皇权制度本身。现代化和民主完全不是农民革命的诉求，相反，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要终结农业社会。百年痛苦的历程告诉了我们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因此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这部历史需要认真总结与研究，而不是去掩饰与篡改。这样做是徒劳的，因为「你可能在一些时候能骗过所有的人，也可能在所有的时候骗过一些人，但决不可能在所有时候欺骗所有的人。」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那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经过百年的苦难和历史变迁的风雨，今天的情况与五十多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再天真，也不再激进，我们认识到任何社会的变革都不能一蹴而就，更何况对一个有几千年封闭文化的古老国家！而只有改朝换代，不改变社会制度已被证明也是徒劳的。

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变革非常需要理性的智慧与实践的勇气、非常需要虔诚的态度与宽容开放的胸襟、非常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任重而道远。因而，静心地听一听前人真诚的声音、反思我们民族的历史是很有必要的。前人已用极其沉重的代价，为我们总结出中国社会停滞落后的根源，为什么后人不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做出更大、更有效的努力呢！　(2007 年 3 月)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注 释

1　沙文汉的长兄沙孟海（文若），擅长古文书法，教书为生，二十年代后期起在国民党政府长期任文职官员，是朱家骅、陈布雷等人的秘书，沙文汉的其余兄弟都参加了共产党。二兄沙文求是烈士，1928 年牺牲于广州，小弟沙文度（季同）是画家，参加抗日到延安，1943 年死于整风运动。四弟沙文威（史永）从事地下党情报工作，建国后从事统战部和政协工作。黄仁柯《沙孟海兄弟风雨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2　姜沛南、沙尚之编《沙文汉诗文选集》（上海社会科学院，1999）第 4 页。
3　沙文汉抗战时期发表在《东方杂志》，《世界知识》，《中国农村》，《中山教育会馆季刊》等进步刊物上的有「日本战斗力的估计」、「外蒙问题的告急」「阿（比西尼亚）军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日苏问题的总检讨」、「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中国景气论」、「日本在对外侵略中所加深的内部矛盾」、「怎样组织抗日游击运动」、「苏联在远东的国防」等，大部分收于《沙文汉诗文选集》。
4　姜沛南《沙文汉对上海革命文化的贡献》，原载《新文化史料》1992 年 6 期。
5　沙文汉传达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报告（未刊）。
6　1953 年底毛泽东带一个班子到杭州，1954 年 1 月 9 日开始起草，主要起草人是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1 月 31 日完成了初稿。3-6 月分级讨论，9 月 15 日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通过此宪法。此后，政协被降级为咨议性质机构。民主人士占多数的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副总理不再有民主人士，原有许多社会贤达参加的中央政府委员会也改为最高国务会议,完成了将多党联合的执政体制转变为一党专政体制的转换。
7　李雪峰《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中共党史研究」1996 年 4 期。
8　1956 年 7 月 23 日沙文汉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9　沙文汉：检讨材料,1958 年（未刊）。
10　《刘少奇选集》 第 172-177 页。
11　同注 8。
12　《董必武选集》54-55 页。
13　1956 年 7 月沙文汉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党代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14　刘海军《東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5　曹连生《浙江省新四军历史人物传(上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445 页。
16　何燮候（1878-1961）浙江诸暨人，爱国学者。早年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抗日同情革命，是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主任委员，性格刚强，心口如一。反右后对沙文汉，杨思一的错误处理表示不赞成。

17 乌鹏延《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同志关心民主人士的一件小事》，浙江省委统战部网站，2005 年

18 宋云彬：（1898-1979）浙江海宁人，著名文史学家，作家，教授，进步出版界人士，全国政协委员，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等职。在他逝世后发表的《宋云彬日记：冷眼红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中没有找到 1957 年的有关问题。此处所引为当年批判大会材料。

19 1957 年 8 月 12 日沙文汉关于宋云彬来信给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的信（未刊）。

20 中共浙江省委会议笔记记录(未刊)。

21 同注 8。

22 《黄源回忆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 266 页。

23 同上，第 247 页;及文汇报 1957 年 5 月 25 日《狮子龙灯舞在浙江的苦难历程》。

24 同注 22，第 262 页。

25 〈房子的纠纷〉，文艺报（上海），1957 年 11 期。

26 同注 22，第 268-269 页。

27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录音记录文件）。

28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 56 页。

29 同上，第 48-50 页。

30 〈浙江省第二届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文件，1957 年 12 月 13 日。与沙文汉同时被划为右派开除出党的还有副省长省委常委杨思一，省委常委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财贸部长孙章录。当时被称为「沙，杨，彭，孙」反党集团。沙文汉 1964 年 1 月 2 日逝世。在陈修良、史永和许多人的努力下，经过极其困难的平反历程，直至 1983 年 11 月 25 日，在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浙江省委正式撤销了 1957 年省二届二次党代会开除沙，杨，彭，孙党籍的决议和同日开除黄源党籍的决定。

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 629-631 页。

32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 73 页。

33 同上，第 174 页。

34 同上，第 182 页。

35 沙文汉〈驳任曙关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论点〉，1935 年写于日本，同注 2，第 29 页。
36 陈叔温（沙文汉）〈中国财政的根本问题〉，1936 年 8 月东方杂志，同注 2，第 85 页。
37 陈叔温（沙文汉）〈中国景气论〉，1937 年中山教育会馆季刊 4 卷第二期 ，同注 2，第 106 页。
38 沙文汉〈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同注 2，第 215 页。

一部个人档案和一个历史时代　　　　　杜高

各位朋友：

走进这个会场，和朋友们在这里相聚，我的心情是很不平静的。

尽管有些人强制我们忘却，甚至禁止我们回忆，我们还是在这里相聚了，这表现出了一种历史精神和一种历史态度。我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怀着一种对后代的责任感，来出席这个研讨会的，虽然回忆五十年前的那场灾难，对我是一件痛苦的事。但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悲悼我那被毁灭了的青春年华，而是为了我们的后代人的青春年华不再被毁灭。

我想起了悲惨死去的难友们，想起他们，我会止不住流泪。不仅为不幸的死者，也为我们不幸的民族。

就我个人的政治遭遇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反右运动、以及长达十二个年头的劳动教养，直到 1979 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经历了整整二十四年的坎坷岁月，经历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磨难。而在上世纪末，奇迹般出现的一部《杜高档案》，也就成为我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了。

在中国，一部这样完整的个人政治档案流落到了民间，在文物市场上出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中国的档案制度是极其严密的，「文革」结束后，右派改正，所有运动中的材料都已全部销毁。没有想到独独留下了我的这部档案，不

但没有烧掉，十八年后，居然出现在北京的一个著名的文物市场当作商品出卖。它被年轻学者李辉发现并购得了。这当然是令人震惊的奇迹。这部档案跟随了我二十四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它对于我，既是神秘的，也是可怕的。当我第一次面对这部带着厚厚的历史尘埃的档案时，我的灵魂的确颤抖了。

它使我看到了政治运动后面的「机密」。项目组向上级的秘密报告，领导人的批示，反右运动中项目组预先设定的批判发言的提示等等，我这才真正懂得了这些运动是怎样有预谋地、残酷地毁灭着一个人，一个无辜的青年人，怎样地制造着冤案。

2004 年，李辉先生把档案的原始文本以《一纸苍凉》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我又写了《又见昨天》一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入《百年人生》丛书出版。这两本书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

我要坦诚地说，为了这部个人档案的公之于众，我尽了最大的意志力，重又承受了一次精神的煎熬。我不想遮掩自己，我愿意坦露我所有的难堪，连同我有过的屈辱、过错和丑恶，把五十年前那个历史环境中的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展露在世人面前，还原历史的真相。

感谢人们，并没有因这两本不堪一读的书嘲笑我和蔑视我，人们理解了我，甚至怜悯我，因为他们从我而认识了一个历史时代。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感动着我。

但我没有想到，已经出版的档案文本还不是我的档案的全部，还遗落了一册，这一册被另一位定居澳洲的语言学者丽江先生在上世纪末也是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发现并收藏，带到澳洲去了。他是在看到国内出版的那两本书以后，在 2007 年春节回国时找到我，给我看了那册档案的目录和部份复印件的。

这册档案里收有九十七份劳教时期的各种材料，二百五十多页，十余万字。内容包括 1958 年 4 月 18 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从文联机关带走后，在一张囚犯登记表上印下的手掌纹和手指纹，以及公安局当时拍下的标号「0115」的我的一个头像。还收存了检举揭发我的材料 21 份，批判会和改造评比会的记录 18 份，其它材料 10 多份。最后一份材料是 1969 年 11 月 4 日我被劳改农场遣送回原籍后，写给当地派出所请求劳动的报告。

这册档案记录了我的整个劳教过程，是已出版的《杜高档案》遗落下来的重

要一册，其中有几份告密材料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我没有想到五十年后还能看到它们的原件。

比如 1961 年 4 月，我已满劳动教养三年，公安局又宣布给我继续劳教三年的惩罚，管教干部声色俱厉地呵斥我，说有人揭发我骂他们是「沙皇时代的狱卒」。我无权申辩，只得低头认罪，接受惩罚。现在我看到了这份可怕的检举材料的原件。

又比如 1966 年 8 月，「文革」爆发后，右派劳教队检查物品，这次检查的重点是有人检举右派队里正在传阅着一本手抄的小说，作者张志华是北大中文系的右派学生，劳教后从农场逃跑，流浪到了新疆，又偷偷跑去上海，看望他的女同学林昭（林昭后来在「文革」中被秘密处决）。那时林昭正患重病，从监狱保外就医。张志华和她有过最后的一次长谈。不久张志华被公安局抓回农场。他关在禁闭室里，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这一段惊心动魄的逃亡经历。张志华是一个很有文学才能的青年，他的这篇作品在秘密地传阅着。管教人员搜查物品的这天，全队人员已出工劳动，只剩下几个病号留在队里。我那时正在生病，没有出工，队部便交给我任务，要我写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剧本。我趴在炕头写着，稿纸散乱地摊在炕上，稿纸下面就藏着张志华的那个笔记本。检查躲过去了。我把笔记本悄悄还给了张志华。但没有想到这天病号组里还有一个病号，这件事没有躲过他的眼睛，于是他写了一个秘密报告交到队部揭发我。这个报告我在这册档案里看见了。看到这个报告，我的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深深的伤感，在那个残酷的环境里，改造者利用人性的弱点，发动右派囚徒们互相揭发和互相厮咬，今天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管制方法。

现在可以说，一部约有五十万字的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存了下来。它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惟一的一部未经任何改动的右派分子的原始个人档案。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的本质只能从人的命运中去认识。正因此，这部个人档案也就成了人们认识一个历史时代的最为可靠的文本根据。

《一纸苍凉》和《又见昨天》出版后，我读到了许多篇谈论它们的文章。人们认为这部档案为研究和了解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管治机制和方式，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证词」。比如人事档案制度，一本档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命运，而他本人却毫无知情的权利，只能随「组织」评说裁决。又比如

劳动教养制度，实质上与对罪犯实施劳动改造并无区别，但非国家司法机关的任何一个单位，大至党政机关，小至所谓群众团体、学校、商店——都可以任意施行专政的权力，可以不经任何司法手续，就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人们从档案中看到，1955 年胡风事件爆发，凡是读过胡风的书的读者，无不被迫交代和检查思想，有的就要受审查。仅仅因为我和胡风集团的作家路翎是同事，关系友好，就要把我关起来「隔离审查」，失去自由一年零七个月。搜查审看我所有的私人书信和日记，白天黑夜连番「追查批斗」，项目组围攻审讯，以「逼、供、信」强迫坦白认罪。任意把暴力专政手段引入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对付敌人的方式打击普通人民。

人们看到「肃反」运动中厚厚的一堆机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友谊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个小集团，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来是青年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内容，在那个极权时代恰恰是不被允许的。除了党团组织，特别忌讳人们相聚一起。肃反中全国追查各种小集团，我和几个朋友被指控为「小家族」集团，从追查我们的一言一行，追查我们写作的作品，再扩大到追查我们的历史，然后把它们都附会成反革命性质。档案里收存的那一册反右运动中项目组编写的在内部传阅的《有关「小家族」的材料汇编》和《「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就是强迫人们按照预定的意图，把小集团归入吴祖光的「二流堂」，而进行大批判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在那个专制时代，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思想言论获罪，连青年人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个性遭到压抑，友谊、亲情、爱情、聚会——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模子里，汇聚到一个组织中，只允许爱领袖一个人，只允许把思想统一到一个头脑里。这就是档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个时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点。

最为人们悲叹的，是档案中辑录的大量所谓「坦白材料」、「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汇报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压力下无奈地写的揭发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事为表现政治积极，对我的攻击和陷害；有的是在劳教队里，囚徒们之间的互相攻击和厮咬。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实质上都是在组织的驱使胁迫下进行的，

普遍地运用在政治生活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样沦为被整者。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经是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到后来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结局。人们会问：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间搞得这样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档案中记录的 1959 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所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 1960 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把它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他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我揭发批判，再责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大饥饿的 1960 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批判记录和我的这篇检查，都作为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我的这篇检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四页，前三页收在《一纸苍凉》里，最后一页现在也在遗落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象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或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作为。」1

这就是我在前面说过的使我深受感动的当代人的理性和良善的心。

经过了长期的囚禁、摧残和折磨，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有尊严的人，终于被扭曲、虐杀，被可怕的政治车轮碾成碎片。在我的档案中，人们读到最多的文字，是长篇累牍地「向毛主席请罪」、「求毛主席宽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这一类的自我批判，也就是人们说的「匍匐在改造者的脚下，辱骂自己，表

示悔改，颂谀天王圣明，感激领袖隆恩」的奴隶式的表白。这些文字是个人迷信时代的产物，只有当我发誓做一个奴隶，才赐给了我那张解除劳教的批示表。

我说过，经过了十二年高墙电网下的强制改造，我已经不再是「我」。我从一个生气蓬勃的青年变成了「一个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2

在当权者看来，这也许就是思想改造的「胜利」；而对于一个人，则是自我的彻底毁灭。

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就是这样决定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我不是五十五万个右派中遭遇最惨的人，比我悲惨的人何止千万？他们的档案都被烧光了吗？我们应该寻找更多的「历史的证词」，把它们留给后代。

五十年后的今天，历史的天空仍在回响着五十年前有识之士呼喊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声音，只是今天的民主理念和诉求更具有现代形态。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理应站在新世纪的高度深刻反思历史，推动中国向民主化的方向更快地进步。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缺乏忏悔理性，中国的政治家们向来把忏悔看成耻辱，缺乏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的勇气，他们决不肯向受害者道歉。由此更显示出今天这个研讨会的意义，我希望它对中国的历史反思和政治文明的进步产生积极影响。

《又见昨天》出版后，一位很有见地的女作家张抗抗写了一篇文章，她在文末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尤其让我们警觉：一个不善于在『今天』拷问『昨天』的民族，是没有『明天』的。」

她说得多么好啊，请允许我借用她的这段话结束我的发言。

谢谢各位。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2 杜高《又见昨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第 193 页。

一个归国华侨的右派经历　　　　　叶国荣

一，我出生在越南小镇

我出生在一个越南小镇里一个华侨的家庭，那里离越南首都河内三十公里。父亲去国离乡数十年，当他还没有在海外安家的时候，每年年底他都回乡过年和陆续置产，在海外省吃俭用的积蓄他都换成了关金、国币以便有朝一日回乡养老。他为在海外生的五个男孩所起的名字叫：国光、国荣、国瑞、国安和国新，从此都可看出他热恋祖国的心情。作为儿子的我们怎能不继承他的愿望并为自己的祖国去努力呢！

我从小受到中文教育。小学毕业后父亲带我和哥哥到河内的中华中学去考入学试。两个人都被录取了，但因家境贫穷，家里负担不起，只好失学呆在家里。1946年我得知在广西的龙州有一所国立华侨学校，有公费可以免费读书，就到那里考试并考上了，在那里开始上中学。读了一年半初中，我就跳上高中。再读一年半，到1949年底，国民党溃退，共产党要来了，学校解散，我也就回到越南家里。总之，在三年的时间里，我已读了中学里五年的课程，无论如何，我都得想办法再读一年高三，以便告一段落。

我插班进入在河内的中华中学读高三，结束时居然考得第一名。学校通知我去参加毕业典礼，我本来想去，但参加典礼要求穿白长裤，我没有白长裤，也买不起，就没有去。但后来同班同学转给我一本精美的英法-法英字典，那是河内市市长送给第一名毕业生的礼物。

二，越过中越边界封锁线回国

高中毕业以后到那里去呢？到外国留学当然是最理想。同班的曾广敏要去英国，彭立生准备去法国，李德光准备去美国，这些对我都不现实。后来得知回到了大陆的同班同学梁尧勋考上了北大生物系，这明确给我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

由于我出生于贫困的家庭，使我对「等贵贱、均贫富」的共产主义理论有天然接受的倾向，但要我离开家里远走，我舍不得丢下已经年过七十的老父亲，我下面还有几个年幼嗷嗷待哺的弟妹，我有帮助他们的责任。但是我又想，我这样留下，又能帮得了他们什么？能帮得多少呢？与其共同沉沦，不如拼命杀出一条出路，改变了整个社会后所有的家庭都可能获救。不过从法国殖民军统治下的越南到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会有许多风险，不冒险是不行的。

最初我找到了一个跑车的工作，这辆汽车每天早上从河内出发，送货到法军统治边境。我希望接近边境后能认识一些人，可以带领我穿过封锁线。花了半年时间，我只结识几个偷运茶叶的女贩子。那时只有人从共产党统治区跑出来，没听说有人跑进去。只得另想办法。我请我的未来妹夫郑国强帮我办一张船员证，凭这张船员证可以合法到达中越边境的硭街，它与广西省的东兴只隔一条不很宽的北仑河。

船到了硭街，我上了岸，正漫无目的又无可奈何地在街上闲逛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一个熟人，经他牵线，知道公路局正在找汽车司机，待遇也不错，就介绍我去，帮我找到了工作。载重卡车司机是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但我的目标不是发财致富，重要的是要在边境找个立足点，等我把路线和方向看清楚，就可以过河，游到另一个新世界去了。

南方中午很热，街上行人很少，我拿着一个很小的手提包，朝北方漫步走去。只要方向不错，我一定会走到河边的。那是硭街市的郊外，来到河边，四顾无人，我急急忙忙脱掉外衣裤，托着手提袋，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驾照、金戒指、瑞士手表，连同身穿的那套衣服，慌慌张张地向对岸游去。百多米宽的小河，没几分钟，就靠近了。当我还没有到岸的时候，正在河边玩水的小孩，看到有人从对岸过来，马上跑去向驻扎在附近的解放军报告。转眼间，提着枪的解放军就赶来了，我心里有数，并不害怕。他们了解情况后，就把我送到华侨招待所。

东兴市这时几乎是一座空城。它原来是靠边界贸易维持的，断绝了四年，商店都关了门，居民都搬到别处去了。街上一两个行人听到的只是自己脚步声的回响。

华侨招待所安排我到南宁参加统一的高考，我顺利的以第一志愿考上了武汉

大学的政游治经济学系。

三，武汉大学的学生生活

为什么我选了这个专业？我高中毕业后从海防华侨中学图书馆里借来了一些论著，如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概论之类，加以钻研；但它们对我都没有吸引力。倒是苏联的列昂捷夫写的那本「政治经济学」，能自成体系并可以自圆其说。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并不排斥西方的学说，相反，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

我到了武汉大学美丽的珞珈山，学习和追求我相信的真理，实现了我的梦想，天从人愿，我万分高兴，分秒必争。我的衣食住行和跟学习有关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负责，我一点不必操心。

高考后在等待发榜这段期间，我常到新华书店站在那里看书。我很喜欢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也很敬佩他的为人。他那篇「清贫」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何况共产党不是一直宣扬「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吗？我一直鼓励自己能献身于共产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方志敏和许多仁人志士不正是为了这一伟大的目标而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吗？我在学校里能够安心学习，不正因为有广大的劳苦人民在供养着我吗？我为他们献身不正是天公地道的吗？

我满怀信心地努力学习，从一个闭塞落后的地方进入崇高的学术殿堂，使我大开眼界。图书馆里不但有看不完的书报，每个周末的舞会上高年级同学教我们初出茅庐的新生跳交谊舞。1-234，1-234，或者 1-2-3，1-2-3，搂着女同学的腰板，像推板车那样从舞场的这一端堆到另一端，也是挺有趣的。遇上有什么文艺演出，作为华侨学生会受到优待，能拿到票。我第一次看到京剧，看不懂。有票就给了别人。后来接触多了，像对「苏三起解」有点熟识，就觉得很有趣，也喜欢。知名人物也常到武大做报告，包括胡耀邦在内。

1954 年长江发大水，全市都卷入了增高堤坝的防汛斗争。每天清早喇叭响起动员的歌曲。学校分配我们到附近的山坡上挖土，烈日底下我们虽然挥汗如雨，无意中也挖出了不少古墓，但感觉很有意义，一点都不觉苦。武汉市终于保住了，但

市外却一片汪洋。

四，运动一个接一个

1955 年的运动是肃反，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无所知，除了在报纸上登载的材料外，我还到图书馆找他们的著作看，可惜一无所得。我觉得只让起诉的一方发言，不许被告辩护是不公平的，所以对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就恨不起来，反而同情他们。校内的斗争仍然是很激烈，在我对面房间住的一个生物系四年级同学蒋春轩，就跳楼自杀，当场身亡。另一个物理系学生也跳了楼，因落在斜坡上，还是救活了。

1956 年的运动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学大进军的活动。我太高兴了，参加了到农村去调查的科研小组，研究农业合作化问题。回来还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寄到出版社去。我被评选为「三好学生」 。

除了读书以外，其它方面的活动我也很出色。在全校的乒乓球比赛中，我击败了教工冠军的任映国而夺得全校冠军，所以常常代表校队外出比赛。毛泽东这一年横渡了长江，接着武汉市也组织了横渡长江的活动。当我从长江的南岸游到北岸登陆时，副市长在我胸前挂了个奖章，粉红色的丝带遇水把胸前都染上红色。

入党入团对我是无所谓的，但在团员同学们一再动员下，我还是参加了共青团。

我的论文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发表在《新建设》1957 年的第一期上。拿到 370 多元的稿费（当时每月的伙食费只要 10 元），鼓舞我向更大的领域进军：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热潮的鼓舞下，我要以批判斯大林错误的经济理论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内容，真是雁初学飞嫌天低。

当时大学生每学年的课程里都得上一门政治课，一年级是中国革命史，第二年是联共党史，第三年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生，系里还派我，也是培养我，让我给哲学系三年级同学讲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章节，大学生给大学生讲课。我不是通过念讲义而是通过我的理解来讲述，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大鸣大放开始了，我被选为学生代表参加了湖北书记王任重来校组织的座谈会。会上我听到同学们向当局提了不少意见。我没有说什么，不是我不敢说，不

是我有什么顾虑，而是我不懂。我的生活面很狭窄，我的知识很肤浅，实在提不出什么意见。但对校内外对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的批评我都赞成和有同感。记得上课时每节课之间有十分钟休息，我们都抢着到数据室去看参考消息，看上面登载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文章，主要内容是揭发斯大林的暴政等等。

校园内召开了几次大的辩论会，武汉大学在华中地区是首屈一指的学校，名声远播。除了本校成千上万的师生员工外，许多校外人都来旁听，真是摩肩擦背，人山人海。中文系的吴开斌和莫绍裘是主讲人。他们对胡风问题和共运等许多问题进行阐述和争辩；真是高论滔滔不绝，风度翩翩。我以班长的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参与了中文系同学到人事处进行的「质询」。他们在人事处的门栏上贴上「黑暗小王国」的横幅，我们只起了推波助澜、吼叫助威的作用，无论如何，我是算不上什么人物的。

反右开始了，我在全校范围内是排不上号的，但在经济系的学生里却首当其冲。并非我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贴在宿舍门口对面墙壁上有关我的反动言行的大字报，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斤两。在我的毕业论文的草稿里确实骂了斯大林，骂他「恶人先告状」。他在学术争论中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力压人。事实上同学们并不知道我在论文的草稿上写了些什么，这是指导我写毕业论文的老师揭发的。当他和我一起讨论我的论文的内容时，他很同意我的观点，毫无非议。后来他却作为反动言行来揭发我，但我并不恨他。他不揭发，别人知道，他就无以自保。

五，我成了「极右分子」

我们班里共有二十一个学生，划了五个右派。我算情节最严重，是个极右分子，处理是不予分配工作，留校监督劳动。没有工资，只发生活费。最初在图书馆劳动，后来跟下放干部到蕲春县农场劳动。十五个留校监督劳动的应届毕业生里，中文系的莫绍裘和曾君儒是在这时升级被判刑的。他俩被从县监狱押回农场开宣判大会时，除了手上戴铐，还被带枪的民兵用绳子牵着，像人们牵狗一样。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何文白也曾在斗争大会上被围着拳打脚踢。

大跃进不但没有丰硕的成果，相反，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学校本身也要自

办农场来解决自己的匮乏问题。我们这批在外地农场劳动的下放干部和右派分子，就调回自己的农场，于是我就回到珞珈山武大的农场来劳动。1959 年国庆十周年宣布摘掉第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我的份。1961 年算是摘掉我的帽子，并从农场调回本系资料室搞世界经济的资料工作。

表面上我是被孤立了，没有人跟我讲话和打交道。但当厕所和洗澡房里没有旁人的时候，就有人愿意跟我谈话和问候我。系里有些领导也表示过，把我划成右派分子是一种损失。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力不从心，甚至自身难保。1961 年把我安排在数据室里搞数据，实在也是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但是，当我稍微熟悉这方面的数据的时候，学校却把我冒充应届毕业生分配到云南，赶出了武汉大学。

以我一个摘帽右派的身份，没有和武大人事处商讨的余地。而云南人事厅不卖武大的账，以我不是应届毕业生为理由，拒不给我安排工作。

我记得有这么一首三句半：「充军到云南，见舅如见娘；两人齐下泪，三行！」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边远的专门作为发放贼配军的荒蛮之地。当然，现在交通方便了，就天然环境看应该说云南还是个好地方。我被发配到云南也可以说因祸得福。有一位同校一起分到云南的生物系姓林的同学，和我过去并不熟悉，当知道我的右派背景后不但没有歧视，相反，他还邀我到他工作的林科所作客，还送一幅他父亲手书的墨宝给我，上有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四十多年了，至今我仍挂在卧室的墙上。

有一位同系的一起分配去云南的毕业生，可能对我有监督之责，逢人就介绍我的右派背景。有些人从此就不敢接近我，但想不到却有一位也是从外地分配到云南的姑娘，竟因此而主动找过我。我们在等候分配的空闲时间里，一起游山玩水，交谈学习心得和对时局的看法。五百里滇池，陈圆圆的金殿，都曾留下我们共同的足迹。我们越谈越亲切，几乎难舍难分，不过最后还是分手了。即使她愿以身相许，但我觉得不能不为对方考虑。以我戴罪之身，谁靠近我谁都会受到连累和倒霉。我祝福她有美满的生活，并一辈子对她都心怀感激，难得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的钟情。

我终于被云南人事局退回湖北省。回到湖北，武大仍不要我，我又等了几个月。我催得多了，人事局的干部烦不过，向我诉苦，她说：「我求爹爹，告奶奶，

没有人肯要你。」可想而知，在我的档案里，武大人事处把我写得多么坏，是个多么可怕的妖魔鬼怪！谁愿意接纳收容一个有特务嫌疑的反革命呢？

后来，我终于被塞到武汉柴油机厂，从此当一名只做简单计算工作的统计员。

1968 年，中共当局以「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罪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送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刑满后我又被强制留场「就业」，后回武汉柴油机厂劳动。

六，民主与自由对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要求无非就是民主与自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反对一党专政和主张多党化，这些要求到底合理不合理？现在实现了没有？因提出这些要求而受到打击，被贴上资产阶级右派的标签，属于人民公敌的五类分子。千夫所指，降职、降薪，开除、劳教或劳改，弄得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要不要后悔？人类的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问题是由谁来付出？

反右斗争是一场历史意义极其深远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之后整个神州真正变成了万马齐喑，不允许有半点不同的声音，这才为所谓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创造了条件，结果造成了数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古往今来，有哪一次灾难会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这场灾难百分之百是由人祸引起的。通常却把它称为「三年自然灾害」，这完全是胡扯，是说谎。刘少奇只因为为这场灾难掩饰得不够，他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引来了灭顶之灾。刘少奇这个案件现在是平反了，但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到现在一直没有受到清算。

这个造成几千万人民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罪恶滔天。但他的画像至今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照片依然印在每一张钞票上，中共领导人没有像赫鲁晓夫那样去揭发和批判独裁者的各种错误和罪行。他们不敢去鞭尸，而是仍旧想方设法维护那虚伪的形象，三十年来依旧恭恭敬敬地在顶礼膜拜。为什么？毛泽东占有的是无边无际的独一无二的统治权，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他手下的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则分享着大大小小不等的专制权力。他们对毛的形象的维护实际也是对自己专制权力的维护。

毛泽东创立的制度是一种封建独裁制度，在这种制度内，统治者剥夺了人民

应有的选举政府各级工作人员的权利，剥夺了他们应有的言论自由和出版的权利，剥夺了他们集会结社组党的权利。正如储安平说过那样：民主与自由，对国民党是多少的问题，对共产党是有无的问题。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仍然是不允许讨论的。它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义应该是代表最广大、最无私的普通平民，而共产党打着它的名义，实际上是一小撮封建独裁者对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进行欺骗、剥削和压榨，剥夺了他们许多应有的权利。

现在，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复存在，苏联也已经瓦解。过去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的总统已经通过选举产生。越南共党的总书记也要通过两人的竞争产生，这也是进步的表现。惟独中国共产党还是铁板一块，对舆论的控制，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箝制，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变本加厉。不过我深信，或迟或早毛泽东定会要受到清算，毛泽东创立的封建独裁制度总有一天要被人民抛弃。（2007 年 5 月 5 日于洛杉矶）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九死一生」话反右　　巫宁坤

一

今年六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共一贯用「反右扩大化」之类的说法掩盖事实真相，企图让人们忘记这段血腥的历史。但是，已经觉醒的人们是决不会忘记的。近年来，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陆续出现，有宏观的，有微观的，颇值得关心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状的人们注意。在这些近着中，最动人心魄的一部要数戴煌的回忆录《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戴煌，1928 年出生于江苏阜宁县沟墩镇，父亲是中医。少小时担任过学校抗

日儿童团团长。十六岁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共，随军转战苏北，参加过白刃战。1947 年，开始任新华社随军记者。进城以后，他不过二十来岁，先后作为战地记者被派往朝鲜和越南采访，工作一再受到表彰。年青有为，「又红又专」，戴煌在红色中国前程似锦。

可是，满怀革命豪情壮志，戴煌念念不忘的并不是个人前途，而是党和国家的命运。1956 年三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传达不仅粉碎了他心目中斯大林这尊偶像，而且使他痛感到中国也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现象「已对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的外事活动中，他亲眼目睹了中共的「首长」们如何飞扬跋扈，享尽种种特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又如何心安理得地乘机「海吃海喝」。而在苏北故土，他却看到这个饱经苦难的小镇比当年更加荒凉破落，镇内外乡亲们还有不少人贫苦不堪，受一群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新恶霸欺凌压榨，有冤无处伸。

面对现实，戴煌忧心忡忡。回到北京不久，他大声疾呼，无人理睬。一次，在家吃晚饭时，多喝了两口酒，谈起家乡土皇帝、新恶霸，越说越愤慨，他就向妻子说：「如果我们党内有个类似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就好了，专门来革党内弊端的『命』就好了。」妻子随即把他呲了一顿，说他想入非非。

同年十月，苏军镇压波兰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他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本国的许多问题感到的不安和愤慨。他担心，如果再不积极变革，中国也难免发生类似的悲剧。他「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重点提出「神化与特权」的问题。于是，他着手给「毛主席并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写一封长信。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报告，他觉得「这封信没有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振兴党风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但是，这希望很快就完全破灭了。

1957 年五月一日，「整风运动」大张旗鼓开场后，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热烈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谁料到，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执笔的社论，公然背信弃义，吹响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号角。正当戴煌感到惶惑时，中共领导人彭真给北京市党员干部做报告，说甚么「『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他并代表党中央保证，党绝对不会把提意见的党员和「资产阶级右派分

子」混为一谈。

戴煌深受鼓舞，于是在一次又一次鸣放会上「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尽托。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话与特权』。」当时他不可能知道，彭真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动员报告和保证，不过是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他自投罗网，当上了新华社仅次于李慎之的「大右派」。「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责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批判。」戴煌不服，主动拿出了那封还没写完的给毛泽东的长信，「以昭心迹」。他再次自投罗网，这份「万言书恰恰成了他「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他受到「二类处分」，撤销原有职务，实行监督劳动；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自 1958 年四月起，每月 155.75 元的工资改为 28 元生活费。

这时，戴煌已是两个小女儿的爸爸，大的才三岁半，小的刚满十个月。妻子是十四岁就参军入党的战友，现在提出离婚，小女儿归她，大的归爸爸。突然面临妻离子散，戴煌也不得不同意，只待上级批准。小女儿随外婆到大连去投亲靠友，大的暂时跟妈妈。

四月中旬，戴煌和新华社另五位编辑难友到达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在农垦部王震将军属下的八五零农场云山畜牧场第三生产队，和先头到达的一些中央部门的「右派」会合。这些「新相知」中，不乏知识界的精英和出生入死的革命军人。其中有原东北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画家杨角夫妇，《人民画报》副总编辑、漫画家丁聪，美术评论家和书法家黄苗子，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王卓如，老《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电影演员李景波、张莹等。

戴煌用全书近一半的篇幅记叙了北大荒流放的全过程，字字血泪。「监督劳动」从一开始就是十分艰苦的。住的草坯房子四面透风，树枝编就的草炕拥挤不堪。吃的是窝头、玉米渣子、黑面馍，没甚么菜，甚至连盐都缺少。最初的劳动，是在完达山脚下的田野上，十人一组，像牛马一般拉拽二十四行播种小麦。随后就修筑名叫「五一水库」的土坝。刨土、抬土、打夯，劳动强度很大，每天十几个小时。负责监督的指导员朱大麻子蔑视和践踏人的尊严，开口闭口漫骂大家是「土匪」、「俘虏」，任意强迫大家饿着肚子延长劳动时间。耿直不改的戴煌建议停止强

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朱麻子根本不理会，反而打击报复。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一排猛打「排字镐」，冻土也纹丝不动。眼看当天的土方任务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匆匆派一人去给炸药包安雷管，结果这个「右派」被炸得粉身碎骨。

正当其时，北大荒的太上皇王震发出号召：「进军完达山，拿下二十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向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各大农场立即组织起三千多名复员专业官兵，挺进完达山林区。云山畜牧场也派出一支由一百多名「右派」组成的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行伐木大战。「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大锯劈大斧了。」「党的领导」根本不顾「右派」的死活，仓促上马，一味蛮干，几天之内就砸死了四个人，其中包括中国粮油进出口公司经理刘琛，他是 1936 年东征中参加革命的。死者一律草草掩埋了事。

在朱麻子之类「党的领导」下，戴煌和「右派」难友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奴隶。口粮越来越少，劳动时间越来越长。耳边听到的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这里！」奴隶们被迫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戴煌常常仗义执言，顶撞「领导」，又对「三面红旗」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方针政策有所非议。他「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也同样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他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多次受工伤，照样强迫劳动。他们还一再组织批判会对他进行围剿，威胁要送他去劳改，永远不给摘「右派」帽子，等等。

1959 年 11 月 23 日，云山畜牧场集中全场三四百名「右派」，开第一次摘帽大会。被摘帽的约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戴煌得到的却是对他最彻底的否定：「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

这时每月的口粮已降到三十斤，人人不是苦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他本人也得了浮肿病。有一次大便后，他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

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但他还得照样参加烧炭「抢窑」的危险劳动，一次次被熏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木炭旁。若不是同窑的难友急救，他「也许在昏厥中就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了。」

1960 年 5 月，他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又挑着沉重的行李和劳动工具转移，途中由于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佟蔼成，原一机部子弟学校校长。妻子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根本养活不了他们。他极为愧咎与哀伤，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杀未遂。这次，他是用自己的裤腰带，在一棵小树上吊死的。第二位叫赵琪，也是四十来岁，原交通部干部、共产党员，也是被妻子所抛弃的人。他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领导」拒绝救援，他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奴隶们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排水沟，每天定额二十立方米。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为「泡将」，剥夺吃饭权，甚至捆罚打骂。戴煌不顾一切在会议上公开反对，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这时他本人没有拐杖就不能挪步，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他悲观绝望，疼得实在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大笑三声……」

1960 年 6 月上旬，他应妻子的要求，办了离婚手续，反倒感到平静一些。七月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魁伟壮实的大汉成了一根细长杆儿，体重由一百九十六斤锐减到九十二斤」。医生着急要他立即住院治病，奴隶主们就是不批，他也不能歇。这时，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晚上一下了工，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

国庆过后，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在大雪封地之前，发起一场突击收割大豆的「大会战」，这种玩命的任务照例落在一百多名「老右」身上。饥饿浮肿的奴隶们挑着行李，踉踉跄跄地赶向小云山，深夜才到达。十月三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一天下来，「突击队」根本无力完成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直到天黑才收工，在风雪中东倒西歪地往回挪，一路上倒毙了七个人。其中有当年负责保卫天安门的高射炮营代理营长兼营参谋长孔祥忠上尉，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的马竞亮。七个「老右」的遗体捆在一辆平板马车上，就拉到小

平山的后坡去了，连张裹一裹尸体的草席都不给。

美丽的北大荒，一夜之间，成了惨无人道的死亡场。奴隶主们非但没有从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训，反而搬出老祖宗的家训告诫奴隶们：「要斗争，就得有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会经常发生的！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煽动！」他们继续人性灭绝地作践奴隶。与戴煌同属一个班的共青团员罗相成已「三度浮肿」，医生给开了病假条，排长却逼迫他出工。小罗手里拄根棍，在鹅毛大雪中慢慢向前挪。等他到达工地，已是开午饭的时间，排长破口大骂，不许他打饭。戴煌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他一半，小罗还是奄奄一息，两天以后「就长离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怀着他时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小罗死后不久，云山畜牧场许多「老右」相继成为饿殍。有的倒毙在路上，有的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其中有解放军军官，有归国华侨。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死亡场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一个队的统计员、「摘帽右派」杨崇道中尉说，光是在他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1960 年十二月底，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共决定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距乌苏里江太近的农场。其中回北京原机关的人，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戴煌属于后者，但是他毕竟死里逃生，离开了这死亡之海。他的一些难友，本来已全身「三度浮肿」，有的在回北京途中就死在火车上，有的「摘帽」以后也一个接一个死去了。

二

戴煌回到北京之后，1961 年夏秋之间，被派到新华社国际部搞数据工作。1962 年一月，在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破天荒做检讨，承认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还说甚么「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对党内部份「右派」进行甄别平反。新华社党组织动员戴煌写材料，争取甄别平反，作为对新华社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

戴煌深受鼓舞，怀着「不管如何也要革命到底」的决心，写出了《回顾我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材料，洋洋十万言，重申了反对「神化与特权」的观点，汇报了北大荒的遭遇与思考，并大胆阐述了对当前国内外主要问题的观点。他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从善如流」，从此「改弦易辙」。党组织对他慰勉有加，不久就通知他党已决定对他进行甄别。国庆在天安门广场上，他高举红旗，走在新华社队伍的最前列，使他感到「无比兴奋，无比温暖」。谁料到，事隔仅仅一个月，毛泽东就再次背信弃义，彻底推翻了半年多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声嘶力竭地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鬥争」，「打退翻案风」！戴煌再次自投罗网，他的「十万言书」成了「翻案风」的典型罪证。经过六个月的准备之后，新华社从 1963 年「五一」到「七一」，举行了一系列的大会小会，对戴煌进行了「再批判」。

在甄别平反有望的时刻，戴煌选中了一个出身贫寒、比他小十二岁的女工潘雪媛，准备重建小家庭。这个小有文化的姑娘当年曾从大字报上读到过他关于「神化与特权」的论述，认为他并没有错，因此对他目前的境况并不计较，「只要人好，就是一切」。「再批判」之后，他俩都感到大难即将临头，在前妻拒绝重婚后，她决定与他立即成家，以备在必要时能够正式以继母的身份抚养这时已读小学二年级的他的大女儿。一个街道工厂的卑微小女工，竟敢冒党天下之大不韪，以自己的青春与前途去和一个政治「贱民」同命运，共患难，不计得失，不顾后果，这是怎样的道德勇气，怎样的爱心！新华社的某些人却认为小潘「思想反动，硬要嫁给一个『老右派』」，便唆使二龙路喷漆厂解除了她的出纳兼会计职务，强迫她到那个素来不让孕妇沾边的喷漆车间去「劳改」。

1964 年 4 月 23 日，这是戴煌参加新四军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再过一个来月，潘雪媛就要生孩子了。就在这一天上午十时半，戴煌接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年」的处分，并立即被押送德胜门外土城子监狱。妻子得到通知后，冲破新华社官方的阻挠刁难，带着他的大女儿去探监，给他送行李，叮嘱他「不要想不开。我和孩子等着你！」

两年劳教期间，劳教所一再迁移。六五年五月，戴煌患急性胰腺炎，经抢救再次死里逃生。六六年五月，在团河劳改农场解除教养，听候处理。一个月后，「文革」爆发，新华社领导瘫痪，他的问题无人过问，于是他便成了一个「二劳改」的「留场就业人员」。六六年冬，又调到北京市管辖的清河农场，先在五八一

分场劳动两年。每天面对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三呼「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戴煌感到痛心疾首：「我们这个号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政党，迷信堕落到如此地步!」

1969年十月，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北京的大批干部被驱赶到「五七干校」，戴煌随同其它「政治犯」，则被上面架着机关枪的一列列火车，送进了漫长而更加黑暗的隧道。

这隧道在山西。不是在监狱里推土烧砖，就是在劳改工程队当小工。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又被调到太原城内同一个工程队的二队，仍然做木工，又两次负伤，在进入漫长的隧道之后，第一次正式得到工伤假条。「实际上，我们远未能获得人世间最起码的自由权利，而只能在黑越越的似无尽头的隧道中磕磕踫踫地向前摸。」他通过劳改系统上转的申诉材料均石沉大海。1978年在快速推土烧砖时，他的左肋又一次被打断。

这十几年中，在共和国的首都，在另一条暗无天日的隧道中，新婚的妻子潘雪媛带着孩子经受了人间罕见的磨难。1964年4月28日，戴煌被关进监狱的第五天，她为了省住院费，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去产科医院。「她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病床上，既不喊，也不叫，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她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候孩子已经出世了，是一个早产一个半月、极度瘦弱的女婴。子宫颈的血管在挤压衣胞时断裂，产床对面两米多远的白墙上已被喷射了一片鲜红的血。她刚出院，新华社房管组就强迫她搬家，她和新生儿「为伟」就搬到一间九平方米的西晒的小屋，用砖头支撑起几块长木板当床。

有一个月，孩子生病，雪媛陆续请了十几天假，所以只领到十天的工资。她还去向同事们的借款，再缴新华社的一元零八分钱的房租和水电费，只剩下一块六角二分钱了。靠这点钱，母女俩苦度了半个月。为了让为伟每天还能喝饱棒子面糊糊，雪媛每天中午或晚上在工厂食堂光喝那不要钱的米汤或面汤，饿得卧床不起。这个小女工很要强，「我和孩子都要活得像个人样，决不让贫穷压垮，决不给戴煌丢脸。」幸亏戴煌从劳教所休假回家，带回了三个月积攒的工资，才度过危机。尽管这笔钱为数不多，这位富有爱心的妻子还从中拿出十元，汇给戴煌在家乡的老母，帮老人家度过中秋节和自己的生日。

「文革」浩劫来临，「大右派」家属潘雪媛在工厂受到围攻，「监督劳动」，她

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她已二次怀孕，「照样还得每天在露天下，清除医用大洗衣机腿上的锈，肚子大得蹲不下去而只得双膝跪着。」一位老师傅实在看不下去，让组长把她调进车间摇臂钻上干活，偏偏又给一个小伙子冒失鬼拿着调动火车的大手闸耍弄时打在肚子上，第二个女孩子就早产了，又一次危险地大出血。这时，戴煌还在太原劳改，便给孩子取名「晋京」。

小晋京一天天地大了，在这恐怖又贫病交迫的岁月，雪媛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她在摇臂钻上打眼时，经常晕倒。1978 年春节临近，戴煌得知妻子病重，便请准了假赶回北京。回到家中，他发现妻子已有些神志不清，而两个孩子在学校学习都名列前茅，却因为父亲是「大右派」受到歧视。同时，又得知家乡的亲人也受株连，惨遭荼毒。母亲不胜悲愤而死，二哥也被人活活整死。戴煌不得不「一边照料病重的妻子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一边到处上访，力求尽快结束在漫长隧道的岁月以回到妻儿的身边」，却到处踫壁。

1978 年九月，感谢胡耀邦讨回历史的公正，中共中央发布了「右派」改正的文件，十二月，新华社才做了戴煌「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他从二十九岁到五十岁的长达二十一年的黄金岁月烟飞灰灭。

戴煌不是甚么「阶级敌人」，而是「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贞不二的共产党员。「九死一生」也决不是文学语言的夸张，而是这一苦难历程的真实写照。出版者不是甚么「离经叛道」的小出版社，而是堂堂的中央编译出版社。这部纪实文学的可信性是官方的宣传部门也不可能质疑的。

《九死一生》不仅是戴煌个人和难友们锥心泣血的苦难史，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间地狱的全景。戴煌所熟悉的但丁的地狱固然触目惊心，　但毕竟是诗人想象的幻景。戴煌在其中长年受难的死亡场和漫长的、暗无天日的隧道，却是现世不折不扣的赤色人间地狱。这也不是唯一的一座地狱，而是遍布中华大地的连锁地狱的一环。回顾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他感到「最富有想象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象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当年佐拉的《我控诉》勇敢地仗义执言，谴责一个制造德莱弗斯冤案的法国军事当局，从而赢得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崇敬。《九死一生》控诉的是一个刻意制造了千百万件冤假错案、置千千万万人于死地的专横暴虐的极权体制。作者为当代

中国历史所作的血与泪的见证，其意义远胜于《我控诉》，而足与司马迁的巨著《史记》媲美，永为世世代代鉴戒！戴煌和潘雪媛，这对患难夫妻，是一个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扼杀人性的年代稀有的顶天立地的异物，不愧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光辉典范。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我们这些小右派　　　巫一毛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这个月初，我重访了我出生的北京海淀医院，在「娘家」过了四十九岁生日。今天，我们从世界各地聚集一堂，在自由民主的土地上，在美丽如画的洛杉矶，纪念反思研讨这个对在座的每个人都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

1957 年，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权术，指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打翻在地，由此带来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性「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

文革结束后，中共官方为他们公开承认的五十五万右派进行了平反。而全国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各类「右派」分子的实际上在一百十万以上。（参见《阳谋》（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7）第 318 页。）这一百余万人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分子。由于反右运动前台打手邓小平成为最高决策者，当局仍然坚持反右运动是正确的，错误仅仅是严重的扩大化。为此官方还特意保留了五名右派没有平反。这是多么荒谬的独裁逻辑，又是多么冷酷的现实：五十五万人与五人，当年居然就能达到既平反又坚持定论的效果，赢得了某些被平反者的感激涕零，甚至许多当年的大右派变成邓小平的统战花瓶！

反右已经五十年了，改革开放将近三十年了，中共现政权仍然坚持早已作古的邓小平遗产，至今还是不承认反右运动是一场人权大灾难，继续掩盖历史和压制人们对反右运动的反思。

好在今日中国不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值此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一批老右派站出来，发表了《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运动是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当年的受害者给予必要的物质赔偿。这封已经有数百人签名支持的公开信，其发起人都是当年的右派，是和我父亲同时落难的人——戴煌、林希翎……。

他们那迟到了五十年的呐喊，让我想起父母亲和我自己。1957 年，虽然还未出生，我仍然成为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可以说，我是在妈妈肚子里当上小右派的。

我的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详细讲述了我在反右、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政治运动中侥幸生存成长的惨痛经历，「真实而生动地重现毛时代史无前例的荒诞与残暴，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余英时）」。这本书的英文、中文、德文版已经出版，法文和丹麦文版即将问世，现已得到主流媒体多方好评并荣获加州图书馆协会 2006 年最佳作品奖。

五十年前，反右运动在全国上下闹得轰轰烈烈。父母亲当时在曾为中共政权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开办培训班，周恩来亲自批准建校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最重点的培养外交人员的高等学府工作。这样一所政治挂帅的学校，当然无法逍遥在反右运动之外。

1951 年,父亲巫宁坤放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的博士学位，应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西语系副教授。当时，爷爷奶奶都过世了，伯父在台湾，姑妈在香港，他在国内并没有什么个人牵挂。他回国完全是为了爱国，可是等着他的，是多年无妄的牢狱之灾，监外的无期徒刑，并且始终累及妻儿。

当年他的同学和朋友李政道劝他不要回国，他不听，结果 1957 年，父亲戴上「极右分子」的帽子。

我在母亲腹中就开始参加一场又一场批斗会。父亲的主要右派言论和定罪依据包括：

1．肃反运动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2．防民之口胜于防川，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

分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

3．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4. 罗斯福总统四大自由（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受恐惧的自由）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不自由，毋宁死！

重读父亲被定为极右分子的「反动言论」，作为女儿，仍然为他骄傲自豪。父亲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强调，使他即便在当时上百万的右派中，也可以归入极少数先知先觉的行列。

中国具有古老的株连九族传统，在以政治身份划线的毛泽东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或母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如果离婚，对方就可以免去变成右派的「臭老婆」、「臭丈夫」，而右派的孩子们则无法逃脱变成右派「狗崽子」的厄运。

1958 年 6 月 3 号我哭着出世时，父亲已经在七个星期前被开除公职，发送北大荒劳改。等在海淀医院产床边的，不是父亲的双臂，而是那顶紧箍咒般一生也摘不掉的小右派帽子。母亲因为拒绝和父亲划清界限，几乎失去工作、行乞街头。几个月后，母亲在漫天大雪中抱着襁褓中的我，牵着三岁的哥哥，踏上长达 21 年流放安徽的坎坷路。

一百馀万右派中，除了在校学生，大多数是为人父母的人。这一百万人中，即使按平均每人只有一个孩子计算，全国也有一百多万个和我同命运的小右派。

我们的父母亲受迫害，我们跟着倒倒霉。他们是冤枉的，是专制制度、政治运动的受害者，替罪羊。但他们或多或少说了点什么，做了点什么，可能某些话冒犯了官方定调，也可能是得罪了某位领导同事，甚至仅仅是某个亲朋好友邻居告密揭发，就被定为政治贱民。换言之，他们的遭遇或多或少和他们自己的选择有关。而我们这些根本不懂事的孩子，什么也没说、没做，什么人也没得罪，却受到和他们类似的身心灵迫害，种种凌辱和磨难给我留下终身难愈的创伤。我们在上学、就业、提职、分房、找对象等各方面，都受到不可思议的歧视，被贬低

为社会渣滓。

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身心是脆弱的，即便在祥和清明的境域也需要倍加呵护。而我们这些小右派，刚刚出生就要承受成人世界的残忍，远未成熟就必须面对连大人们都难以承受的血雨腥风。如果说，一个不尊重人权的社会是野蛮的，一个不保护孩子的社会就是加倍地野蛮，那么，一个非但不保护孩子、反而还迫害孩子的社会，只能用人间地狱来形容。

毕竟父亲当右派是他选择爱国的结果。可我对我的小右派身份做了什么选择，有什么选择呢？没有！一百万小右派，有一个有任何选择，做了任何选择吗？没有！我们别无选择地出生，又别无选择地变成小右派，仅仅因为作出选择的父母。我们看着父母受难，和他们一起承担苦难，忍受非人的折磨。我们用清纯无暇、惶恐不解的眼光看纷乱的世界，靠生存的本能在社会底层含曲忍辱咬牙活着。

幼儿园阿姨是成年人，她们的职责是照顾好孩子们。文革初期，这些阿姨却歧视和虐待带有政治贱民标记的孩子。她们每天把三岁的弟弟往墙角的小马桶一放了事，不许别的孩子和小右派玩。从此，弟弟变得沉默寡言。

几年后，一位经常来家里做客的医生问，「巫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希望你不在意。我也不是爱管闲事。因为我是医生，或许我能帮上忙。」

「没关系，有什么问题就问。周医生，怎么突然这么客气？」父亲说。

「我想知道，」周医生还是吞吞吐吐地问，「你的小儿子，嗯，是先天还是后天的哑巴？先天的很难治，后天的我可能有办法。」

在政治歧视的环境下，我们从小就学会了沉默盲从和说谎，不再用自己的大脑思考问题，不再用自己的嘴巴说真话。因为我们看到，如果不当一个专制政府的驯服工具，如果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们的下场将与我们的父母一样。反右运动不仅让一代知识分子成为后天的哑巴，也让他们的下一代成了先天的哑巴。

九岁时，目睹父亲在台上挂大牌子挨斗，我在台下簌簌发抖。一个多年经常来我们家，父母亲的同事朋友张定鑫看见了。他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毛毛，这里不好玩，跟我来。」　他把我带到他的住处，给我糖吃，跟我玩「争上游」扑克牌游戏，然后强奸了我。被强奸的，不仅是我娇弱的身体，更是我稚嫩的心灵。失去的，不光是我的童贞，更是我的童年。而那一百余万小右派，又何尝不曾被

强大的专制制度凌辱，在心灵上留下永远的伤痕。

在学校里，我背诵革命诗句，「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的洞子里爬出！ 」

每天上学放学，我不能和别的小学同学一样，从学校大门进出。如果红小兵发现我，他们轻则辱骂嘲讽啐吐沫，重则拳打脚踢揪头发。我只能从学校围墙上挖一个狗洞进出，还给它取了一个美丽浪漫的名字：月亮门。

一个小女孩、小右派，做人的尊严被剥夺，只剩下做狗的求生本能。与此同时，父母亲都被关进了牛棚，成了比狗还不如的牛鬼蛇神。

我十岁时，爸爸还关在牛棚，妈妈带着哥哥弟弟下放到农村。我在百里之外的一个房间里自己过活。不知道多少天，我躺在草席上，高烧昏迷。等到我被偶然发现，已经病危。因为父母不在，别人冒充我的父母才能送进医院。 医生说，「没救，通知家属办后事。」

我独自面对死亡，平静安详地告诉自己，「你要死了，你已经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咸，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死就死吧。」

这种本应是饱经沧桑后才能说出的话，该是出自十岁孩子的口吗？

今年国内外还有许多不同组织群体个人要求共产党和政府还原历史真相，对这场人为的灾难表示反省道歉赔偿。当年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因为对共产党、对毛泽东有清醒的认识而被枪决。如今要求执政党对其当年专制与扼制言论的作为认罪，无异于要求刽子手将他自己的脖子套进绳套，这些要求，现在来说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中共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独占话语权来伪造历史，通过强制灌输来制造遗忘，制造为我所用的历史和民族记忆的空白，使那些死于暴政的生命永远消失在黑洞中，也使中国人无法积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其结果就是历史呈现出原地踏步的恶性循环。再过五十年，别说当年的右派，就是小右派们也都将作古。如果幸存的右派、小右派再不出来为历史存证，历史的悲剧就完全可能重演。

退一万步说，即使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真的反省道歉赔偿了，对那些风烛残年的不足百分之一的幸存者，对那几十万、上百万逝去的冤魂，有什么意义，对那

些失去的岁月破碎的家庭有何补？

和其它右派家庭相比，我们家还算幸运的，我和家人都活到了今天，都在享有四大自由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回顾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像当初我写自传，不是为了要活在过去，而是为了汲取教训、反省现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未来，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都喜欢把祖国比作父亲或母亲。祖国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像父母一样是每个人没有选择余地的家人、亲人。和同事朋友配偶的关系可以选择，可以终止，和祖国，和父母亲的关系，永远不能断掉。脐带虽然在出生时就剪断，但人们的身上流动的，永远是父母的血。什么样的祖国，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党，能够允许一百余万亲生儿女无辜的灵魂长期受难，而且五十年过去了，依然不敢面对历史，毫无认罪忏悔之意？

我们这些小右派，向谁去讨公道、要赔偿？谁来为我们平反，向我们道歉？我们失去的童年、青少年、乃至生命，谁能够偿还，用什么偿还？谁能抚平我们心灵上永远滴血的创伤？　　　(2007-6-13 加州家中)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曾经沧海身犹在 —— 流沙河口述「草木篇诗案」

一、 到底意难平

我的父亲不是这个政权的人，我 1950 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是划清了「界限」的。我是真心信任这个党的，不是到共产党这儿来投机的，不是想来捞个什么的，想都没这样想。认为中国共产主义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要来，来就努力地工作。当时我才十九岁，我在党报。工作是如何之卖力，如何之认真，而且还如何之愉快。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我们正在改变中国。我怎么可能去仇恨这个党？我怎么可能去仇恨这个党嘛！

我的父亲和许多旧政权的人员一样，死于 1951 年，被这个政权杀了的。我丝毫没有为这个事情去仇视这个政权。但是呢，确有某种看法，这个有时是有的，总觉得当初用不着杀那么多人。实际上我的父亲，在旧社会不过就是普通的职员。他从来没有对抗过共产党，也没有作过恶，很多人都晓得他们是干干净净的。但是，又回头认为，好像革命就是这样，一定要经过血的洗礼，不然怎么产生新世界呢！觉得这个革命理论也站得住。但只是心中有所怀疑，绝无对这个政权有任何仇恨。而且当初我的工作的激情，表现的积极，是有目共睹，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觉得我极其信任这个党。

但是后来为啥子又产生了怀疑呢——确实产生了怀疑，但是这个怀疑跟我的家庭无关。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罪恶。在赫鲁晓夫的报告前一年，1955 年，肃反。先是把胡风拿来批。批胡风我还是积极分子，写了两篇文章，文学理论的。后来，批胡风后来转为肃反，所有的机关内部都设了变相的关押所。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都叫反革命了。四川省文联集中拢来十多个，把人家弄来关起。我是积极分子，还主动要跟这些人划清界限，认为这些人党都说要把他们揪出来，把他们叫老虎，一定是他们自身有严重问题——才进去了的。但是后来觉得，咋个这个运动，机关搞肃反越搞就越凶，机关里设立了变相的法庭，把很多人弄去审，哎，我就有所怀疑。

因此在肃反的会上，我和另一个叫邱原的好友，我们都是热爱党的，心里就不安逸，就跟他递了个条子。写起打油诗，填起词，讥讽。李累（文联领导）看见了，走来一把就条子抓过去，李累大怒。条子是将就《红楼梦》中间薛宝钗那个「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我填的是，「纵然是加薪添钱，到底意难平」。李累拍桌吼问，「啥子意难平？」

多亏这个事情，我就没有进入积极分子行列。本来是积极分子，后来我就被刮出来了，刮出来就只有资格去守老虎——去看守关起的那些人。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一个班两个小时，坐到那里守，守完了还要做记录，观察他们的各种动态——这个就比较「低级一些」了。有一次我做记录：「墙外有人投一小石，屋瓦有声。众虎一齐抬头仰面，观望久之。」以戏谑的文字写受屈的同志，心肝之黑，至今犹愧。

就这个时候，心中就有所怀疑。觉得咋能这样子整呢。而且这些人整了，十

个月以后，全部都没得事了，又把工资补发，当初把人家弄得那样惨。就觉得简直胡乱整。觉得党的这种做法——那个时候我们不晓得老同志们早在延安就这样做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还以为是第一次这样，虽然没有整到我，你这样整人总觉得不公道嘛。虽然心中不服，但是形不成理论。

第二年，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遍全世界，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文汇报连载了安娜·露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第八章《大疯狂》，整党咋个杀人，看了毛骨悚然。有问题！觉得。而且这个问题一定是在理论上面出了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理论就有这个问题，一旦形成专政必然会导致这个。但是，都没有拿去跟我们家庭的各种遭遇联系起来。是出于热爱党，觉得这样弄不好。

然后毛主席提出要百花齐放，要百家争鸣，1956年夏天提出的。我心中很受鼓舞，觉得对了，我们中国一定不会像斯大林那样子搞了，我们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提出这个口号是如何之伟大，觉得对这个党的未来如何之有信心，觉得中国如何有了前途，如何的好呢。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觉得要听党的话，党喊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我们要讲。像我这样的人，诗歌艺术修养不高，但是宣传热情是很强烈的，理论热情是很强烈的，就觉得那么我们今后写诗歌，就不能光是歌功颂德了。那时《人民文学》还发表了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使我大受鼓舞。

1956年秋天，中共开了八大，宣布阶级斗争运动已经结束，从此之后是建设。我觉得党好英明啊。觉得这下中国终于好了，不再走阶级斗争的路了，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弄得像苏联那样黑暗，不再弄得血翻翻的了。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面临的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真才实学顶用了，中国面临的是美好的前景。这个时候，我就考虑写诗是不是也要干预生活。刘宾雁已经有过一些报告文学，提出要干预生活。而苏联作家把干预生活四个字早就提出了，说作家应该有这样的义务。在生活中有不好的东西，作家要表态，要与它斗争。

我就是在这个状况下，在1956年10月，写了个〈草木篇〉。1956年2月到8月，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员。在回成都的火车上，写了〈草木篇〉。

这一组小诗内，我就考虑到，革命者的人格问题，革命者不能够光是一个螺

丝钉，光是听话，革命者只要是正确的东西还要坚持。毛主席就那样说的嘛，你不要怕一切嘛，是真理就要坚持下去嘛。我又看到一些人阿谀逢迎就爬上去了，觉得这个党不应该去溺爱这样的人嘛。小人攀附到党，把这个党像藤缠树一样要把你缠死，你不能容许他们这样嘛。因此在诗中间就牵扯到了这些。

回头看自己，这样的一些思想，实际上这都不是诗，我的这些思想远离了诗的形象思维，都是一些宣传热情，宣传热情干预了我的诗。就这样写了〈草木篇〉。

那个时候就想，既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就不必创作了，不当这个专业。我就主动提出，我们来办一个诗刊，而且把名字都取好了，邱原取的，叫「星星」。领导人李累他们也支持。就办起来了。1957 年 1 月 1 日就出创刊号了，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北京《诗刊》比这个晚了二十五天。

《星星》创刊号上面就发了〈草木篇〉。

二、 因诗贾祸

闹了半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报告中国从未公开发表，但我们都知道。1956 年 10 月还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首都布达佩斯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暴政，波兰也发生了工人农民起来抗议暴政。在党内特别是在高干内，把赫鲁晓夫批斯大林的这个报告当作大敌一般的防备，我们年轻人不晓得这个，他们内部就传达了。1956 年底，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因此这些领导们特别敏感，到处闻，看底下有没得什么气味，回应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气味。闻到了马上就要报告上去。

我不晓得，这样严重，如果晓得，〈草木篇〉我就不要发出来。但是不晓得，我仍然欢欣鼓舞，相信双百方针一定会给中国带来新面貌。

后来闻到了，是当时省委那边闻到的。

元旦过了十三天以后，川报上就出现了批评。就说这些东西有严重问题。指到《星星》上有一首诗是色情（〈吻〉）。还有一首诗是有思想问题（〈草木篇〉）。

省委宣传部有领导同志说，你这个〈草木篇〉就是《野百合花》嘛。（王实味就是在延安为这个事情被杀了的。）

然后，〈草木篇〉的事情汇报上去，毛主席就知道了。本省几十篇文章，到外

省，到北京上海都在批。但是，那是 1957 年春天，你批得那么早，毛泽东都还没有开始反右，毛泽东就不以为然。

毛主席在二月份跟三月就两次讲话。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还有一次是讲人民内部矛盾。两次讲话都提到，一个提到王蒙，一个提到〈草木篇〉。毛泽东讲的是，王蒙是思想问题，王蒙的小说叫《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草木篇〉是「政治思想问题」。中间用了什么样的句子呢？「我们在民主革命的运动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些有杀父之仇，杀母之仇，杀兄之仇，杀弟之仇，杀子之仇的人，时候一到就会来一个草木篇。」——如何的严重！我的家底毛主席都知道了。

但是，毛主席又说了，你们现在这种批判，太粗暴了，你们没有好生给人家讲理。你们这种简单粗暴的批判方式是要不得的。然后，毛主席说，我们今后是要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括号，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人。最后说，我们要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包括那个写〈草木篇〉的，都要团结起来。

他这样一讲，所有批〈草木篇〉的突然就停了下来。1957 年 3 月的时候，毛泽东这个讲话，通过各级机关传达下来，传达下来，而且传达很详细，是用讲话稿子念的，要念整整半天。

现在还没有开始反右。

不但没有反右，连「阳谋」，喊大家出来大鸣大放都还没有开始。后来好多人不了解，说是在反右中间批〈草木篇〉。哪里是，在反右的之前半年批的。

我经过这一场批呢吓倒了。我的妈呀，他们批我的文章最初还说小资产阶级思想，以后说反动思想，以后说反革命思想，最后说，这些诗都是反革命的叫嚣，都是阶级敌人的信号。我咋晓得我惹这么大的祸呢。一句腔都开不起，我都吓慑了。

批判停了以后，又过了一个多月后，党中央就号召整风：我党现在有三种不好的风气，一是教条主义，二是主观主义，三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就是死守马列主义教条不晓得发展，主观主义就是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就是排斥人家党外人士，这种错误的。这是不好的，我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来帮助我们党整顿，整顿这坏的三风。开门整风，通过什么方式呢，通过全体人民，首先是知识界，来大鸣

大放，要出来争鸣，要百花，要来放，还不能小鸣小放，要大鸣大放。

但是我是吓倒了，还是一句话不敢说。不晓得前段时间为什么批判得这么凶，我还是个共青团员的嘛，而且我自认为我还热爱共产党。

我就不开腔，一句话不说。然后就有许多人来帮我说话了。说你们这么弄要不得，不要一棍子打死。川大有一个教授张默生，山东人，江青的老师，说，从诗经起就有「诗无达诂」嘛，一首诗可以有多种解释，你们怎么能说〈草木篇〉就是反革命诗呢。李劼人，成都市副市长，老作家，川报记者去采访他。他说〈草木篇〉算啥？中国文人都要写这类托物言志的诗嘛。把花花草草拿来写嘛。他说，但是，〈草木篇〉你写是可以写，但是你不要拿来发表嘛！你把它锁到箱子里嘛，你拿来发表就惹起麻烦！你们这么多人在批，硬把一个小青年当成一回事情在那里围剿。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你们把流沙河找来，我只要两个小时，就把他教育转来，让他去检讨，然后就过了。川大教授林如稷，在文联来开会说，你们整人关起门整，整出问题了才把我们这些委员找来，当初为什么先不来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现在主席说了你们的批判粗暴，喊你们停了，弄出问题了，才想起来找我们贡献意见。这是发牢骚。

天天开会大鸣大放，叫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有的忙，硬拿车去把人家拖来发表意见。张默生教授就是用车接来发言，后来当了大右派的。

这时候，全国各种意见全部都出来了。说得很闹热啊，报纸上都在给共产党提意见。有些意见越来越尖锐，围绕着官僚主义咋个腐朽，哪里整得要不得，哪里整人家农民，整得农民……全国的各种作品都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的伤痕文学，指责这个政权不对的最早的伤痕文学。好多人都在写。连艾青自己都写了〈养花人的梦〉，后来批判他的时候，就说那是「艾青的草木篇」。

这个时候喊我发言，我都还不敢去。

然后省文联的一个领导，常苏民，是个老好人，他也不整人的。常苏民看到我始终都不发言，就把我喊到他那儿去谈，他就把毛泽东的讲话全文，打印的，中文打字机打印的，他说你就在这儿读。毛主席怎样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内容。他说你看嘛，最后的结论，连主席都是说这样子批判是粗暴了要不得。因此你要出来发言，四川这个地方要反对教条主义，你应该出来开第一炮。最初我认为他说的是真心话。多年以后我才悟到那是他的违心之言。作为一个领导人，

在本单位揪不出右派来，他就犯险了，弄不好他自己就会被其上级指为包庇右派。他是来诓我鸣放啊。但是我原谅他，他无意整人，他也是不得已啊。

我又很信任他。终于我就出来发言了。呵，一发言各家报纸的记者详细地记，记下来整整一版。成都日报四川日报全部登流沙河的发言。上海的文汇报也派记者来采访我。我说你们前几个月批我很凶，这样子弄是不对的，你们这样弄得我情绪也很难受。我说我个人固然是有很多缺点，思想改造不够好，有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想，但是我没有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这样子弄我是很不服的。

这时就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到了 1957 年 6 月，突然一变脸说有阶级敌人在破坏我们整风……

全国很多人受到〈草木篇〉的牵连。说我有三个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然后项目组去追查，凡有关系的，一网打尽。项目组来人说，流沙河，有一封信，人家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一封同情你的信，现在你要把这封信交出来。我每天收那么多信，装一箩筐，我说我记不得，你们去查，最后我说算了嘛，你们干脆抬走。这一次他们就警告我，任何证据你不能毁，毁了将来你的罪名大得很。所有人家给我写来的同情的信，一封我都不敢毁。何况我还记得有日记，日记我也不敢毁。

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全是我认识的，文学界的非文学界的，连常到我这里来的中学生，全部都有严重政治问题，不准升大学，他们一辈子的人生道路都注定了。魏明伦，当时十四岁，化名给文汇报写一封信，声援流沙河，后来清查笔迹，查到他头上，由于太小没有资格戴右派帽子，但是给他杵了一个污点。周克勤遭学校开除也是与〈草木篇〉有关，被弄回老家，幸好他老家把档案材料搁在乡政府再没有打开过。好多人就为这个事情把一生的命运改变了。

整了那么多右派分子，所用手法都有类似，但是，受我株连的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全国类似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后来八十年代，我出差外省，全国到处有，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人来找我。到乡下都有人来找我。说五七年你那个〈草木篇〉也牵涉到我，我当右派有一条罪状就是支持右派分子流沙河向党疯狂进攻。还有被整死了，被杀了。

所以这个事情实质是怎么回事，你就晓得了。

三、「沉到海底」

这个诗，是再普通没有了。值不得拿来说。而是因为要搞运动，有意要去到处找，由于他们带有有色眼镜，出于革命的警惕性，时刻严防阶级敌人，一看就看到这儿来了一个信号，就是来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看到了，看到了！

但是最奇怪的是，到了 1999 年，突然改变了说法。中国作协书记处的书记张光年，老革命，在 1999 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中央电视台讲建国五十年来的历史，中间专门的一章，就是张光年谈到草木篇事件。我就很注意地看。变了。张光年说，当初我和另外三个中国作协的负责同志，去跟毛主席汇报，毛主席说，〈草木篇〉哪首不好就批哪首嘛，怎么能一锅煮呢，其中有两首就好嘛。毛主席背了中间一首，又背了中间另一首，毛主席说，这两首就可以嘛。

当初正式传达的毛主席不是这样说的，那时说是阶级仇恨。那你说我该相信其中哪一种说法？老同志在这点上是很谨慎的，我不认为人家张光年说错了。不过当初风气如此，今日红花明日紫草，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纯粹的实用主义。要搞运动，就说这是反映了阶级斗争，对我党有各种仇恨的人，才得写〈草木篇〉这样的作品。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又是另一面，很讲道理的呀。如果是按照张光年讲这个，那哪里还有后来的运动呢，那就搞不起来了嘛。毛主席纵然这样讲过，但是从未传达下来过，等于没有讲过。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

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 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 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 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 1978 年 5 月，胡耀邦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 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

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深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 1957 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若敢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也是我个人的小不幸。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 1957 年以前历次运动，从一九五一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四、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七十七块。反右后，人家那些右派都只领十五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三十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被弄起走，猜想是领导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它的人送去判刑或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进了枉死城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监督劳动。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

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数据室去协助管理图书数据。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使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文革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成都青白江区城厢镇。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老家去的，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老好人常苏民，当初对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九年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现场就开始脱衣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文革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我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钱可以挣到四十元。而且要松活些了。两个六年，十二年，文革都完了都还在做。

一直到 1978 年，全国摘帽子，我才有幸摘了，但是文联这边不要我回来，因为你是个摘帽右派，你还有三个反革命集团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在那个悬起的。那么就留在县文化馆工作了一年。

到 1979 年底，赵紫阳亲自批示：必须把人家调回来，第二，必须给星星诗刊平反，复刊。两件事情，形成中共四川省委的第 75 号文件。我就回来了。不然这里掌权的人不得要我回来，因为这里已经不是好人李彬掌权了，李彬已经死了。

我就说完了。（2006.9 于四川成都）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我的右派生涯　　　　　　龚定国

大学毕业到东海舰队

我 1930 年出生在长沙西乡的书香世家，九岁丧母，十岁丧父。由姑奶奶龚慕兰养大。

龚慕兰是个教育家，曾任苏州女师校长，抗战时期，是国立十六中、国立女中校长。她虽然是国民党员，但非常正派。从不因政治问题为难员工和学生，例如学生吴咏琴将被国民党传讯，她事先通知叫吴逃走；又如王一之（化名杨代诚，后来是中共干部子弟学校北京 101 中学的校长）在重庆风紧时，她聘请杨到女中任教，躲过风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龚饮冰是她族兄，中国妇联副主席、中共中纪委副书记章蕴是她表妹。总之，她绝对不是坚硬的反共人士，倒可能是共产党的友人。

1946 年，我考入刚从四川乐山迁回武昌的武汉大学。1951 年被海军招到东海舰队，算是提前毕业。先在工程部干了一年，后调军械处，始建防化学科，五四年当了防化学科化验室主任。

平时我对许多不合理的事，喜欢公开发表意见，得罪过一些人。例如：炎夏有半休，要青年搞各种活动，组织了歌唱、球队、游泳、棋类等小组，组长都由各科长担任，并大肆宣传，其实那些科长根本不内行也从未参加，我说是搞“形式主义”；政委廖云台作报告时，把陈绍禹和王明说成两个人，我在讨论时指出，

令他很恼火；又如，宣教干事戴昶，为了追求民立女中学生会主席，叫我们团支部多次与该校联欢，我那时是团支部宣传委员，公开表示反对，说他把我们当工具；计划科员孙文昭，有一次被评为“技术能手”，因他会开汽车，我说是「文不对题」，这类事例很多，成为我后来挨整的伏线。

肃反时成「阶级异己分子」

肃反时，因去了台湾的姑奶奶龚慕兰与我通信，她还通过香港的朋友给我「拨」过两次钱。我被挂上「阶级异己分子」牌子挨斗。因她当国立女中校长时，正值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就硬说她是CC份子，而我是她教养出来的，岂能清白？整天批斗、审问，不能回家，不准外出，足足搞了半年多。不可理解的是：她的亲生儿子龚晓岚，当时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却平安无事！在等待结论期间，我的儿子出生，妻子阮正芳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政治课助教，在上海妇产医院产后大出血，只准我去探病一次，还派人押解监视。从那时起我感到，很多共产党人不仅愚昧、霸道，还缺乏人性。

我原有写日记的习惯，好几年的日记都被抄去检查，其中有四八年写的共产党是「在野党」的话，硬说我骂共产党是野党！还有写思想改造运动中，武大许多教授被罚跪太过份，还写过「部队只准结婚不准恋爱」，共产党用人标准「无才便是德」等等，都是罪状。肃反时派人对我「外调」多次，调查出不少无中生有的诬陷之事，更加辩不清楚。想必是被询问者在压力下胡说八道。幸好最后相信了武大地下党负责人的证词，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派」组织的活动，这才作出结论「予以下降」，但从「阶级异己份子」下降到甚么份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明白的是军衔中尉、级别副连，比正常都压低了一级。

肃反以后，我把多年的日记付之一炬，而且下决心永不再写。

五七年五月，我被调到北京海军军械部，筹备全军防化研究所。因暂时无任务，家还在上海，算是照顾，叫我回上海「帮助工作」。整风开始，我只参加过两次鸣放会，第一次是东海舰队知识分子座谈会，我被选做所在小组的发言人，记录大家发言，整理后向大会报告，其实我自己的意见并不多，但给领导层的印象肯定很坏，海军政委苏振华正好在上海蹲点，他总结座谈会时，把某些批评意见

痛斥一顿。第二次是在本单位全体座谈，我提出，背后向领导打小报告，是「地下工作习气的残余」。

其它还有：我和化验室技术员崔以军（他肃反也冤枉挨整，后来也成了右派）谈过，「肃反搞错了的，一定会平反」，明明是对党的信任，却被篡改成「肃反搞糟了，一定要平反」，变成了「猖狂进攻」；我和化验员陈昭玉谈论过储安平的党天下论，他说和尚是骂人的话，我说不是，因玄奘、法显都是有名的历史人物，当然我也认为，十二个副总理全部是党员，那是事实。于是我被认定为「支持储安平」。我说苏振华听不进知识分子的意见，是宗派主义，那就更严重，因为苏是中央委员，批评他绝对是反党行为。这些右派言论，因都是平时谈话被人揭发出来的，遭到夸大、篡改、歪曲就毫不奇怪了。

九月，我回到北京。十一月，由上海派出三人到北京，把我揪出来批判，上边所举那些篡改、断章取义、强加于人的罪名，根本不容许辩白。当然，有些平时谈论的观点，如外行领导内行、教授治校、干部无才便是德等等，确实都是真情，但跟反党完全不沾边。今天回顾历史，右派与共产党思想观念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右派把共产党人当正常人看待，才会发议论、提建议，正义完全在右派这边。毛泽东的阳谋，手段卑劣、理由荒谬，完全违法。共产党那时已开始堕落成危害国家人民的、封建专制的利益集团，就他们的立场看，反右确实是必要的，不然，它将被逐步否定。

海军大院右派班

肃反受冤枉的人，因表示不满而成了右派，共产党却说「很多右派，肃反中就有问题，说明肃反整得不冤」。共产党的逻辑跟常人完全不同。因果颠倒。

五八年四月，右派定案后，我受开除军籍，留队监督劳动处分，每月只发 28 元生活费。海军大院共留下十一名右派，组成一个班，他们是：黄源洛、裘纯坚、张丰、江平、胡甲年、余荣富、朱位诚、吕恩谊、沈苏斐、沈力成，还有我。这十一个人中，黄源洛是大型歌剧「秋子」的作者，是中国新音乐开拓者之一；吕恩谊是十大元帅油画像的作者，从小参加革命，由部队培养出来的画家；裘纯坚是海军修造部的金字招牌工程师，1946 年交大毕业；沈苏斐是部队培养的女高音

歌手；张丰是医师，从伪满时期东北医科大学毕业；江平是老革命的版画家；其它几个，是 1949 年到 1953 年期间毕业的大学生。这些人因为成了右派而聚合，实在奇特，打成右派似乎跟出身、经历无关。

右派班成立后，先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了两个半月，属于海空支队一大队，别人半月换班，我们则常驻不换，直到完工庆祝会后，又修环湖公路，七月中旬才回大院。两个多月中，每天收工后，要作小结，余荣富老是批判别人，他认为右派之间不能团结，只能斗争。后来海军统战部长谢普生到帐篷来看我们，说：「你们现在是由此岸到彼岸，在过渡当中还要团结互助。」这才改变了老余的做法。如今看来，老余大概算错划的右派，他其实是真左派。

回大院后，花了十几天作总结，十一个人还评定了好、中、差三等，我的评定是劳动好，情绪有抵触，属于「差」等，同等的还有黄和张，我和黄不大在意而张耿耿于怀。后来证明，这次评定毫无意义，摘帽早晚与评定结果并无关系。1958 年夏到 1959 年夏，我们为建大操场筛分了 600 多立方米炉渣，制造了三十辆独轮推车，参加了挖团结湖，制造了小高炉、小转炉等搞了非土法的炼钢，筹备布置技术文化革命展览会，制造油画画框，为文艺会演制道具布景，为大院苹果园挖树坑、施底肥，日常负责打扫大院的公共环境等等，总之，我们是一小撮非常好使的、粗细活都能干的驯服工具！我们直接归海政机关协理员刘士品管，最大好处是政治学习不多，每天早上听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每周四下午学毛选或文件，由班长组织活动，比较简单轻松。周末，有家的人可以回家。刘士品看准了我们几个人都老实正派，不会出问题，他乐得少管。

1959 年五月，我被军械部 602 仓库政委李子琴要去，离开了右派班，在我之前已有几个人回原单位，我走后，到九、十月份，右派班就解散了。当初海军党委留我们，大概想留下几个有用之才，后来未能实现，说明即使位高权重如萧劲光（海军司令）、苏振华等人，也难看清毛泽东操纵的形势。

我到井陉 602 仓库时，阮正芳从上海请病假带着儿子来跟我在一起，准备共同承受煎熬岁月。李政委很照顾，安排了一间八平方米的房间，允许我们住下来。（两年后，住房跟其它随队家属一样。）在 602 仓库共呆了七年，开头是教干部们学文化，那时，彭德怀管军队，要求军队干部都要达到高中毕业程度，文化教育成了重大任务，高中教师，并非各部门都轻易找得到，所以恰好用得着我，生活

上适当宽待，他们觉得还是合算的。

随后叫我培训三十三名化验员。用一年半时间，由初中程度到分析化学中专毕业，课程从数学、物理，到无机、有机、分析化学，加上火药炸药检验。除无机化学由技术员徐汉标担任外，其余课程我全包。这批人，后来大多成了海军驻军工厂的军方代表。因一开始就没有公开宣布我的身份，因此，1961 年摘帽时也未公开，仅通知本人了事。我被留下当「技术员」，定为随军职工行政二十二级，1962 年又调整成二十级。这年我添了个女儿。

那几年，我还作为「主力」参与许多科技群众运动:大搞超声波，大办小球藻，大挖腐植酸，群众找矿，挖空心思大搞技术革新，等等劳民伤财，违背科学的事。在我主观上是以带罪之身服从命令，客观上，却做了毛泽东狂妄胡闹的帮凶和共犯。我越来越感到，毛泽东这个千古罪人，他造的孽，连我这类右派敌人都推不掉责任!

「摘帽右派」还是贱民

1963 年决定我转业，但因「摘帽右派」身份，没有地方接受，只得留原单位待命，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有时打打杂、照常参加政治学习。从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开始，我全家又受岐视挨欺负。我的儿子才八岁，被有些当兵的抓住头往墙上撞，骂他小右派!原来与我家关系很好的战士们，都不敢再来往。当官的更没有好脸色，大约看我反正要走，利用价值已不大，可以任意作践而不会影响他们的乌纱。

1966 年底，离开部队，到甘肃省嘉峪关，农建十一师氮肥厂筹建处。文革之风刚刚吹到甘肃，已开始有点乱。我本行是化学，原该在技术组的工艺组，但土建组缺人，乃叫我当土建组长，手下几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都不愿好好干活，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干，除了出图纸，还当甲方工地代表，天天跑工地。

1968 年，十一师开始军管，随后清理阶级队伍，老右派自然逃不过。被「群众专政」关牛棚九个月，每天在带枪的「专政」打手押解下，从事超强度的劳动，吃不饱，睡眠不足，挨过打，每晚写认罪书。家人也受尽虐待：阮正芳被停止工作。冬季零下三十多度，不给烤火煤，她只好带着十二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

在戈壁滩上挖骆驼刺，或到小酒钢废高炉边扫焦炭渣来烧。我因吃不饱，家人节省下饭票，儿子偷着送给我。家里有事须商量，只能偷偷传纸条，有一次小女儿给我送信被发现，一群打手跑进我家，打骂他们。

1969 年解除「专政」后，我被下放到工厂的副业队（以种菜为主），地处嘉峪关市城边，我专职积肥，每天上午要打扫嘉峪关市的十一个公共厕所。冬天起粪要用钢钎捣，下午再驾牛车把粪运到地里。虽然又脏又累，但独自干活，不见那些党棍虎伥，倒很自在。有一次，邻近的十一师水泥厂要改建机修厂房，到本厂求援，厂长派我去，我干了三天，提交了全套施工图纸。厂长卖了人情，我却受苦，因为他没有安排人替工，三天后厕所粪已堆积很厚，我付出好几天的加倍努力才清除完。

1970 年，据说是怕苏修侵犯，牛鬼蛇神「后撤」，我们一家人到了山丹农场。

山丹农场在著名的山丹军马场山下，全年无霜期只九十天，干旱寒冷，以种春小麦为主，只能种很少几种蔬菜。那儿曾经是劳改农场，牛鬼蛇神较多，相对而言右派不算稀奇，我家起初被放在地名余定的七连，不通车、没有电，吃用「涝池水」，牛马也在池边饮水，同时往池里撒尿。全年无菜吃，只能白水煮面条。我在蔬菜班劳动，种下的菜籽，几乎没有出过苗，天天做无效劳动。

1971 年我被调到场部，平田整地我管测量放线；盖房子我管设计和施工，而且当砖工；管过工副业，当过「皮匠」；还在农场自己的小煤矿当过出纳。总之还是任人摆布的贱民。妻子经过几年的写信告状，七三年恢复了工作，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儿子高中毕业，安排在农场就业，先当农工，后开拖拉机。女儿就在农场子弟学校上学。

那几年，经历了一打三反、批陈整风、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接二连三的运动，人心乱了，人心死了，道德败坏了，我也更加清醒了。

「57 右派分子」是光荣称号

1978 年，我和阮正芳一起调到张掖师专教书。1979 年，「改正」右派。给我的通知书说：龚某人当年的言论，虽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言论，属于错划，现予

以改正。我觉得很难过，明明我当年说的没有错，错的是毛泽东、共产党，右派言论其实代表真理，现在却说「不是右派言论」，一笔抹杀了爱国爱民的灼见真知，我又被冤枉了一回！

五十年过去了，共产党离人民越来越远，离真理越来越远。现在有人要求它「平反」右派，而我认为对于右派，不是甚么错划、改正的问题，而是重新评价的问题。人们应该迫使它承认右派正确，「57右派分子」是光荣称号。很多右派言论，今天仍然切中时弊。反右是根本错误。当年积极反右的人，应该接受历史的审判。如果共产党顽固不化，不能纠正历史错误，它的合法性将彻底丧失，毕竟人间还有天理在。

附，海军总部大院「右派班」成员：

黄源洛，音乐家、大型歌剧《秋子》的作者

吕恩谊，画家，十大元帅油画像的作者

江　平，大尉，版画家

沈苏斐，女高音歌手

裘纯坚，舰船修造部文职高级工程师

朱位诚，舰船修造部中尉技术员

沈力成，舰船修造部中尉技术员

龚定国，军械部中尉技术员

胡甲年，工程部上尉技术员

张　丰，卫生部大尉医生

余荣富，学校管理部上尉，海军第三军事学校教员

——为2007年6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1957年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与评价　　　　谢泳

反右运动史料范围概述

1957年发生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它涉及中共上层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同时也涉及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一般认识，特别是对中国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历史地位以及民主党派上层人物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要求等相关问题。

反右派运动对中国当代历史产生了极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及后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影响深远，特别是右派离开原有生活环境外，他们的命运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反右运动使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士」阶层特有的精神气质受到极大伤害，此后中国发生的许多变化，都与此次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打击有密切关系。

目前学术界对于此次运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关于此次运动发生的源文件还没有解密，特别是中共上层关于此次运动决策的源文件，在所有关于反右运动研究的文献中还看不到。当下反右派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

1、 关于反右派运动的始末。

2、 关于反右派运动中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和评价。

3、 右派个人的回忆。

4、 中共相关历史人物回忆中透露出的有关反右运动的历史信息。

5、 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中的变化。

6、 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作用。

7、 反右运动的历史影响及右派子女的命运等。

中国的反右运动是一个历史事件，但同时也是一个现实事件，因为关于此次运动的影响及相关事实认定还在进行中，特别是在此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历史当事人，今天还在用自己的行动丰富这一历史事件的相关信息。本文所指的反右派运动史料，包括一切与此历史事件相关的信息，主要是较为集中的与此运动相关的文献，特别是原始及较为稀见的文献，取原料第一，次料第二的原则，在原料中包括文字以外的文物性史料。

本文对于成形的一般文献，叙述较略，比如当时出版的《新华月报》、《人民手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以及各地方性日报中关于反右运动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文献较为常见和研究者容易使用。另外各种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性著作中有关反右运动的论述，因为多数为一般性叙述，较少独立见解和新材料来源，本文也较少涉及，本文注意较多的反右运动史料，以中国大陆各类非正式出版物为主。港台及西文反右运动史料，因为受收集条件限制，暂不涉及。

反右运动始末及相关史料

中国有档案法，但对源文件的届时解密，在事实上很少发生，特别是对与现实政治和相关历史人物有关的历史档案，基本是在封锁状态下，这种现象直接影响了历史研究的深度。目前对于中国反右运动的发生及完整运动始末的研究著作有多部，这些著作的研究方法及著者对反右派运动的事实判断虽不尽相同，但使用历史文献的方法及文献来源大体一致。这些文献的特征一是已公开的中共档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文稿，二是处在反右运动决策中心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三是当时公开出版的报刊，四是少量知识分子的日记。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研究著作中还不可能使用源文件，所以关于反右运动的起源及后来的变化发展，较少存在分歧，下面这些史料基本构成了当前关于反右运动的基本文献线索。

文件类有《毛泽东选集》第 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等。

回忆类文献有：《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香港：当代出版社，1957），《鸣放——革命实录史》（香港：当代出版社，1958），《鸣放回忆》（香港：自联出版社，1966），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以及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叶笃义《我和民

主同盟》（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以及萧克、李锐、龚育之等人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等。

研究著作有：纳拉纳拉扬·达斯《中国的反右运动》（欣文、唐明译，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戴晴《储安平·王实味·梁漱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姚杉尔《中国百名大右派》（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朱地《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香港：明镜出版社，1996），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胡平《禅机：1957》（ 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朱正《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香港：国际学术文化信息出版公司，2005），宋霖《论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应予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与鲁迅谈起》（合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200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等等。

在关于反右运动的起源问题上，因为研究者看不到源文件，所以对于从「鸣放」突然转向「反右」的变化，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阳谋」，起因是「鸣放」中知识分子的过激言论。但这个看法缺少内在的逻辑，因为对一个政治决策者来说，在决定「鸣放」以前，不可能对这一决策的后果没有预期。

一般支持毛泽东「阳谋」说的研究者的主要根据是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起草的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但这是一篇在二十年后才公开的文章。当时文章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毛泽东改为此题时特别注明「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原来的署名是「本报评论员」，毛泽东修改后为：「中央政治研究室」。6 月 12 日印发党内时，毛泽东才将署名改为「毛泽东」。除了特别说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外，毛泽东还加写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直到 1977 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 5 卷时才公开了此文。

联想到 1957 年 5 月 1 日，当时陈叔通、黄炎培给刘少奇、周恩来的信中提到过毛泽东自己建议下届人大不再提他为主席人选时，信中特别提到：「昨毛主席于会上最后提到下届选举主席不提毛主席的名，并嘱我们透露消息。」

毛泽东在陈、黄信上有几处批示，其中一处是：「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毛泽东还在信上特别说明：「请看末页我写的一段话及文中四处注解，都要印上。」这四处注解透露了毛泽东的一些心声，其中一处说：「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1

几乎同一时间，在陆定一报送中央的一份《高等学校整风的情况简报》上，针对当时北京大学一个学生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特别批示：「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这个北大学生的文章即注意到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分裂。2

综合当时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文革后毛泽东与刘、彭的冲突，应该说，由「鸣放」到「整风」的突然变化，确实与中共高层的分歧有关。朱正即根据批判钱伟长时有人说过：「钱说，鸣放搞不好，因为刘少奇到彭真这一条线是不主张鸣放的。」朱正推测「毛泽东决定放弃新方针而转为反右，实际上是向刘、彭真『靠拢』」3 这个判断现在看来是有事实依据的。朱正由此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流产的文化大革命」4，这个判断大体也能成立。

「右派言论集」的史料价值

反右运动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和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团体中（如大学、各文化团体），因为反右运动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可以自由研究的学术领域，所以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较低，高层历史档案由于涉及政治斗争，普通研究者基本没有接触机会。一般文化团体中，关于右派的档案，也很难查阅，因为这些普通人物的档案较多涉及个人隐私和具体个人恩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直接接触源文件的机会很少。所以近年来，完全依靠源文件进行的学术研究，还很少见到，而且越是有价值的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源文件，接触的可能性就越低。在这种源文件基本封闭状态下，要想深入研究反右运动，一个较为便利的史料来源是尽可能收集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常见的就是各种「右派言论集」。

反右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基本工业水平还不高，所以此类「右派言论集」，通常包括手写、油印、铅印三种类型。作为反右运动的基本史料，在源文

件不容易接触的情况下，此类文献形式大体可以判定为是反右运动史料中的「原料」。

在反右运动中，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原始「大字报」保留下来的可能不是很大，只有通过笔记或者印刷方式才得以保留。因为从「鸣放」到「反右」的时间很短，而且当时是中共号召并提倡的表达方式，所以就文献形式而言，反右运动的文献相对其他中国政治运动中的文献算是较为丰富的。大约有这样几种类型：

1、从组织形式上说，当时各级机关都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基本是一个工作机关，它属下的各机关团体的「鸣放」和「反右」情况，通常都会以档形式上报相应机构，而作为领导机关，这样的机构通过创办「整风简讯、整风快报、学习材料」等内部形式的报刊来指导工作。这种类型的文献，从理论上说，在相关机构中应当有完整的保留，但从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研究者所接触的史料判断，这种文献的使用还有较大难度。

2、从「鸣放」到「反右」期间，国家机关和各文化团体的机关报刊，通常较为集中出过各类形式的「专号、专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专业性较强的团体中，也印刷过相当数量的此类文献，比如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当时出版物，也保留了许多史料。

3、学生杂志和校刊的出现，也是反右时较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来源。特别是当时全国较为有名的高等院校中，许多系一级单位都办有临时性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红楼》特刊，哲学系的《思想战线》、《浪淘沙》、《论坛》，历史系的《整风快报》等。

4、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

5、反右运动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印刷过大量各种形式的「右派言论集」，供批判使用，在此类文献中，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数

据选辑》一类较为成形的文献外，大量零散的各类「右派言论集」时有出现，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此类文献的完整目录及索引，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没有完整收集此类文献。

以上提到的各类文献中，内部印刷品较为稀见，特别是如《宣传动态》、《内部参考》一类当时就有发行限制的内部材料，对研究者来说更为宝贵。

1949 年后，中国是一个通过意识形态来管理的国家，所以在各级机关中，多数都习惯通过档和内部设定发行级别的报刊来进行信息传达和管理，这种基本行政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大量供内部参考或者批判使用的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保存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大体运作模式，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形式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很高的，但研究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应当对此类史料有一些基本判断和辨别能力。

从目前对反右运动的研究来分析，大体可以认为，越往上的右派言论，越具备理论性和完整性，省级机关以下的右派，特别是不在专业领域以下的右派言论，主要是一些表达个人意见的简单看法，是对自己生活环境中不合理现实及对领导的批评意见。而且中国反右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已积累大量矛盾的工作环境下，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矛盾，借反右运动的「政治正确性」得到合理清洗，在相当的范围内，所谓「右派」，多数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借口，在最终的清洗过程中，以往的矛盾是关键因素，所谓不同政见，一般只是事后罗织的一些借口。

中国省级以上的各级机关中，特别是高校和文化团体中，因为时代的突然变革，加之历史的原因，通常有较为明显的派系，较为严重的已形成宗派，这个特点在中国各民主党派文化团体的反右运动中表现特别突出，无论左右，凡居于强势者通常自然代表正确一方，借合法的政治运动清理正常工作环境下积累的冲突和矛盾，成为反右运动的真实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许多研究者发现「右派」其实多是「左派」，比如文艺界著名的右派丁玲、陈涌、江丰等等

大量「右派言论集」的形成，主要是当时处于强势一面的力量编辑完成的，它所收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真实性都会有一些问题，断章取义、张冠李戴，道听途说，无限上纲是基本特点。另外「右派言论集」的编纂方式除了「右派言论」外，通常还会有一些批判文章和「右派」过去的历史。因为「右派言论集」

的编纂不会征求「右派」的同意，所以作为史料使用时，对于书中涉及的事实，需要细加辨别和与真实的历史事实相印证。

「右派言论集」作为文献的最高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和部分矛盾的真实来源，虽然很多时候那些揭发和批判中提到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有相当距离，但这些文章中所涉及的事件及对人物个性甚至人格，特别是个人私生活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历史真实和判断历史关系还是有帮助。另外此类文献中，对于所涉人物的基本经历特别是当时作为反面材料涉及的历史问题，多数对完整了解历史事实，具有启发作用。

就出版形式而言，1957 年前后出版的此类文献分为内部印刷和公开出版两种，公开出版的多数是知名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通常较为容易见到，一般图书馆也多有收藏。比较少见和一般图书馆难以完整收藏的是大量无名右派的「言论集」，就史料稀缺性判断，越是无名右派的材料，越有收藏和保存价值，因为就中国右派的总人数而言，知名右派毕竟是少数。在国家无意统计右派真实数目的情况下，这些「右派言论集」是将来统计右派人数的一个重要史料来源。撰写过批判和揭发右派文章的那些作者，后来的人生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通过对此类历史文献的收集和研究，对于深刻认识那些知识分子的行为也有帮助。

「右派言论集」很多，仅我收集到的就有百余种。例如中共中央党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发言稿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右派分子储安平的言行》、《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章乃器反共三十年》、《兰州大学右派言论汇集》、中共山西省委整风办公室编《「鸣」、「放」选集》以及 1987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的《刘宾雁言论摘编》、《方励之言论摘编》、《王若望言论摘编》等。

公开出版的批判右派言论的材料就更多了。例如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向右派开火》、《批判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群众出版社刊印的《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声讨恶毒攻击肃反的右派分子》、天津人民出版社的《雷海宗批判》、北京出版社的《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的巨大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右派百丑图》、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批驳工商界右派分子的谬论》、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印的《右派言论选集》、中国政治法律学会资料室编印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等等。

反右运动的影像史料

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时，因为技术手段的局限，这方面的影像史料较为稀见。主要有几个方面：

1、当时新闻记者拍摄的黑白新闻照片，在一般报纸上偶有所见，但主要存在于当时中国有限的几本画报中，如《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及地方出版的画报中。

2、美术作品（主要是漫画），出现在当时的一些文艺性报刊，如《中国青年》、《新观察》、《文艺月报》、《诗刊》、《美术》以及北京大学的学生杂志《红楼》、《浪淘沙》、《论坛》、《思想战线》等杂志上。

3、1958年后，为了总结反右运动的成绩，有些城市举办过有相当规模的「汇报展览」，展览后印制过一些画册，这些画册通常由照片、漫画、实物、统计表格等几种类型组成。

4、新闻电影记录片。

5、戏剧等文艺形式的图像记录。

部分反右运动影像史料有:

《自我改造汇报评比展览会汇编—1957——1958》（画册），厦门市民革、民盟、农工、民建、工商界、宗教界、归国华侨联合举办，1958年，厦门。

《上海市工商界整风运动展览会汇编—1957——1958》（画册），上海市工商界整风工作委员会，1958年，上海。

《天津市反右派斗争展览会》，1958年，天津。

中国美术家协会广州分会?《反击右派漫画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广州。?

《向右派斗争》，纪录片。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出品。

话剧《百丑图》，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演出，孙维世导演。上海滑稽剧团移植演出。

《寻找林昭的灵魂》，纪录片，胡杰摄影、解说，2003年制作。

许善斌《证照中国——1949—1966》（本书收有「批判右派分子储安平大会」、

「民盟北京市委会反右派批判大会」的入场券)，华文出版社，2007 年，北京。

近二十年完成的右派回忆录

1979 年后，中国对 1957 年的反右运动进行了重新评价，右派得到了改正，他们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一般流行的说法是当时中国共划了 55 万右派分子。这个统计来源于利瓦伊汉的回忆录，这只是个大概的说法，具体的右派人数，只有将来在档案开放的情况下，才能完全落实清楚，希望将来能有一本较为全面的「中国右派名录」，这是建立「右派博物馆」的基本内容。5

右派改正后，恰逢中国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所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多数右派重回工作岗位，加上对历史认识的局限，所以写作回忆录的人很少，当时有条件从事这一工作的主要是一些作家，比如丁玲、刘宾雁、王蒙等，再加上一些学者及民主党派的重要成员，如叶笃义、千家驹、费孝通等。

本人收集的右派回忆录，一般不包括近二十年来被多次研究和有多种著作行世的知名右派，以及出版有全集的右派作家和学者，而主要偏重于长期在社会低层生活的小右派的回忆录。

在本文作者的回忆录概念中，包括一般出版的日记、自编年谱和纪念文集、较完整的个人简历等。但本文所列出的右派回忆录，主要以完整的长篇回忆录为主，包括右派本人去世后由家属编纂的纪念文集。除特别重要者外，一般不列单篇的个人回忆或者相关研究文献。也就是说，右派回忆录，以作者本人的回忆为主（包括家属编纂的纪念文集)，研究者写作的右派传记只少量收入。

这些右派回忆录分为公开和自费印刷两类，自费印刷也包括虽有出版单位，但是以买书号方式完成的出版物（包括使用香港书号的出版品)，中国近年来对于反右派运动的研究多有限制，这些出版物一般很难正常出版，所以许多作者选择自费印刷的方式让回忆录问世。因为是自费印刷，这些低层右派的回忆录反而更加真实反映了历史，对于后人了解反右运动的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伤害有很大帮助。而公开出版的右派回忆录因为出版审查的原因，对于真实的历史多有回避，而且在对历史的认识的判断方面也缺乏深度，比如王蒙的回忆录历史价值就不高。一般而言，凡自费印刷的右派回忆录，历史价值高于公开出版的右派回忆录。

右派回忆录有《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葛佩琦回忆录》、蓝翎《龙卷风》、邵燕祥《沉船》、《陈铭枢回忆录》、从维熙《走向混沌》、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徐铸成回忆录》、高兆忠《狰狞岁月愁——1957—1979》、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风雨平生——萧干口述自传》、何济翔《沪上法治梦》、徐光耀《昨夜西风凋碧树》、和凤鸣《经历——我的 1957 年》、刘皓宇《人·鬼·人》、吴永良《雨雪霏霏——北大荒生活纪实》、张僖《只言词组——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李蕴晖《追寻》、茆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邵燕祥《找灵魂》、倪艮山《沉思集》、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巫宁坤《一滴泪》等。

长篇小说中的右派史料

作文艺作品的表现内容，「右派文学」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经历过两个阶段。先是在反右运动开始后，「右派」完全以反面形象出现，当时无论是诗歌、话剧、戏曲还是美术作品，右派都是丑角。在 1976 年以前的文学作品中，除了反右运动前后出现较多应景的「右派文学」外（主要是一些学生作品，如北京大学张锺以鲁迟名义发表的《阿 0 外传》，常宏《林希翎右史演义》、魏可《右派现形记》，吴天惠《梦幻曲》）。6 作为文学作品的题材，右派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

「右派」作为文学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是伴随「右派」在政治上获得改正后出现的现象。余易木的中篇小说《初恋的回声》，较早表达了「右派」的真实生活，到了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电影《巴山夜雨》（叶楠）、《苦恋》（白桦）出现后，「右派」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已发生了完全改变，接着张贤亮的《灵与肉》《绿化树》等一系列作品，在表现「右派」真实生活处境方面又向前跨进一步。

整个八十年代，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右派」生活的基本都是「右派」作家，他们在思考反右运动和「右派」人生经历中，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对于导致「右派」命运的真实历史还缺乏拷问历史的勇气，所以这个阶段的「右派文学」所达到的水平并不高，这可能与当时「右派作家」重新回到体制内并获得主流认可有关，特别是丁玲、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唐达成、李国文等「右派作家」，基本构成了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主体。在这一代「右派作家」中，刘宾雁和邵燕

祥的选择比较独特，他们保持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他们主动自觉和体制保持了分离姿态。

进入二十世纪后，作为文学题材的「右派」主题，一度获得作家的重视，但这次承担「右派」题材回归文学的作家，主要不是原来的「右派」，虽然王蒙在九十年代初期创作了《失态的季节》，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几部以「反右运动」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中，王蒙这部作品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在深刻表现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伤害程度，并同时表达对现实政治深刻绝望方面，杨显惠关于「夹边沟」的系列作品，尤凤伟、方方的长篇小说，都比王蒙的小说更引人关注，因为这些虽然没有经历过「反右运动」的作家，在对「反右运动」的认识和思考方面超越了现实政治的制约。

长篇小说中的右派生活，并不能作为一种真实的史料来看待，但因为虚构文学的来源有史料基础，同时作家在叙述反右运动的生活时，也涉及对反右运动史料的选择和评价，所以也构成了反右运动史料的一个方面，特别是对后人了解这一段历史，反映右派生活的文学作品，有可能也成为另外一种史料，也就是史学研究中常提到的间接材料，或者不经意的材料。

以右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有王蒙《失态的季节》、方方《乌泥湖年谱》、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赵旭《大饥饿》等。

方志中的右派史料

在近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新修方志是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基本内容，至少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多数都完成了这一工作。本文的方志概念中包括了高等院校、文化团体、科研单位编纂的各种类型的机构史。

方志是中国保存历史的一个传统，真实、完整和系统是它的基本要求，但因为当代中国还不可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对专业和学术的制约，所以新修方志的总体水平并不高，特别是对反右运动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通常会采取轻描淡写、避重就轻的方法，不可能完全承担保存史料的历史责任。但作为方志，总还在相关方面有一些线索，特别是右派的履历及右派的人数统计等方面，毕竟还是一个史料来源，在这方面，一些高等院校的校史及科研、文化单位的机构史相对严肃一

些，在名人履历中把右派经历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记录。丁抒《阳谋》一书中，较为重视使用方志中的反右运动史料，特别是对于基层社会反右运动的真实情况，通过对方志中相关文献的梳理，经常会有新史料的发现，在反右档案不能公开使用的情况下，这个获取史料的方法应当重视。

中国政府对反右运动的态度，非常耐人寻味。一方面对这个运动基本做了否定评价，但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这种态度导致许多右派改正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的人，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采取有意回避态度，比如朱镕基、费孝通、王蒙以及一些高校校长，在正式履历中，一般不提自己的右派经历。这种现象说明，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虽然右派获得了改正，但右派的社会地位并不高。我认为这与两个事实有关，一是反右运动的具体当事人邓小平本人，对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深刻的忏悔，虽然在主观上承认了这一运动的完全错误，但在事实上并没有彻底改变对原来右派的认识和评价。二是 1976 年后， 中国政治生活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基本意识形态并没有转换，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在中共几任总书记中，真正对反右运动有深刻认识的只有胡耀邦一人。

具体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基本情况是，早年负责反右运动的领导人，并没有因为主流意识形态部分改变了对反右运动的评价而成为这一历史的责任承担者，他们依然占居中国社会的主要领导地位。这种「我打你右派，我给你改正」的事实，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对反右运动的基本判断，除了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右派基本获得了正面评价外，越往社会下层，右派的真实社会形象，并没有发生完全的改变。

从全国范围内观察，右派改正后，他们的政治地位并没有显著变化，除了朱镕基、费孝通、王蒙、锺沛璋等少数右派能回到主流政治中心外，右派基本还是一个边缘群体。由反右运动造成的「精英淘汰」事实，大体还发生作用。

???? 精英淘汰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人才流动的主要机制，它的发生与时代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建立时，它的主要领导层，以造反起家的人为多，凡造反成功以后，必然论功行赏。在这个机制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以造反为自己主要才能的，但在一个没有反可造的时代里，这些人的才能就发挥不出来，这是其一。其二是在和平时代里，造反的才能已退到第二位，所以观察中国历次政治运动，总是没有才能的人在整有才能的人，而没有才能的人通常都居于高位，比如

1957 年，当时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被打成右派的人，基本都是大学生。名单如下：7

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人员简况

姓　名	当时年龄	成　份	当时职务
陈　模	35	学生	中青报副总编
锺佩璋	33	学生	中青报副总编
陈绪宗	39	学生	中青报总编
李 庚	41	学生	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
彭子冈	44	学生	旅行家杂志主编
刘宾雁	32	学生	中青报工商部主任
吴一铿	39	学生	中青报文艺部主任
谭西山	38	学生	上海团市委副书记
董学隆	32	学生	云南团市委副书记
贺惠君	29	学生	四川团市委副书记
郭永泽	32	学生	哈尔滨团市委书记
项　南	39	学生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　正	34	学生	江苏团市委副书记
仇作华	34	学生	广东团市委副书记

右派的上书文献

上书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表达政见的一种方式。在传统社会，上书的主要对象是皇帝。上书的直接动机来源于法律、新闻的缺位。上书形式有两种，一是单独的个人行为，二是联名上书。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依靠上书解决问题的事实非常多。就是在毛泽东时代，依靠上书解决问题的现象也很常见，比如李庆霖关于知识青年生活处境的上书，张天民关于电影《创业》的上书，都是明显的例子。在现代传媒出现（以电子传媒为标志）前，上书是真正的上书，而到了现代传媒出现后，上书其实只是一种表达方式，它的核心意义并不是一定要让上书的真实对象看到自己的意见，虽然

这个愿望始终存在。传统上书的预期建立在偶然性上，所以上书的方式除了正常渠道外，主要依靠私人关系，因为私人渠道在一个非常态的社会中反而会保证信息的对称，所以一般能发生作用的上书行为，通常都有私人背景。

本文提到的右派上书，专指近年来为了呼吁对反右运动历史的重新认识和研究，一些具有右派身份（包括右派子女）的人，以上书形式表达政见的行动。这种行动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新闻媒体和大众。

采取上书的方式，只说明对高层解决问题有一种期待，并不完全相信高层对会此作出明确响应，事实上高层在看待右派上书问题方面，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没有把上书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看待，所以右派上书，目前它的意义还只在表达政见的层面上。右派上书起源于1987年2月由许良英、刘宾雁和方励之发起的「反右运动历史学术术讨论会通知」，其它以个人名义向本单位上级领导寻求人个问题解决的表达方式，并不在本文所谓右派上书的意思中。

右派上书统计:

《许良英、刘宾雁、方励之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通知》，1987年，北京。

《重庆「改正右派」呼吁书》，2003年，重庆。

史若平：《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2005年，济南。

蒋文扬：《重庆116名右派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2005年，重庆。

彭志一：《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申诉信——要求国家对右派分子正式道歉并给予经济补偿》，反右运动受害者及家属子女　2007年，

任众：《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2007年，北京。

《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2007年，杭州。

周国兴：《新疆右派上书中央》，2007年，乌鲁木齐。

任众等《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2007年，北京。

结语

反右运动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深远，但关于反右运动的史料来源又非常有限，在研究者获得源文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意识到收集反右运动史料的意义是学术研究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学者已在这方面作了很多准备，比如冉云飞编辑的《右派资料知见录》，已有了较为开阔的思路和基本收藏，随着网上「反右博物馆」的建立和影响，可以期待反右运动研究的学术性将会得到提高 8

一个时代学术研究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反右运动，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具备相当的丰富性，在相关档案不开放的历史现状下，依靠社会各界力量，有计划有系统完成反右运动史料的收集，并编纂成形的研究文献是迫切的学术基础工作。

目前反右运动研究的史学地位还不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右运动研究中，原始文献的使用率较低，多数研究依赖零散的第二手文献，所以史料先行，应当成为反右运动学术研究未来前途的必备条件。成熟的学术研究，应当建立在较为完备的史料基础上，不然很难提升反右运动研究的学术水平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所以建立反右运动史料学，应当成为当下重要的学术工作。

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学术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1957 年的反右运动研究，随着史料的不断发现，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新潮流。（2007 年 4 月 23 日于太原）

——为 2007 年 6 月洛杉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书面发言。

注释

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57、459 页。

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6 册，第 493 页。

3 朱正《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华民国九十年

版，第618页。

4 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版，第120页。

5 利瓦伊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840页。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6 《战斗的声音——首都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文艺文艺作品选辑》，第80、102页，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第80、102页。学生的反右派文艺作品，原发刊物以学生杂志为主，张锺、吴天惠等人的作品最初都有发表在《红楼》和《浪淘沙》等杂志上。

7 《共青团省委副书记以上干部受开除党籍、留党察看处分的决定汇编》，共青团中央组织部编，1959年内部印刷。

8 反右博物 http://www.observechina.net/Data/Editors/fanyou/0000.html。

关于建立「1957年学」的思考　　钱理群

建立「1957年学」：历史的责任，学术的追求

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中国与世界因此有了一个机会，来集中审视1957年中国发生的事情。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历史的失误与苦难面前知识分子的责任。我们不能只限于表示义愤与谴责，而应该通过严肃的思考，科学的研究，达到思想的飞跃与升华，追究历史失误的原因，总结教训，超越经验事实，达到更为普遍性的认识，使「苦难真正转化为一种精神资源」。1

对于我个人，还有一个幸存者的责任。1957年我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二年级的学生，由于年龄太小，没有什么言论，就有幸逃脱了那场劫难。我很清楚，1957年的受难者中有许多人，其才能是远远超过我的，是历史的错误剥夺了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且他们中许多人至今也还属于「沉默的大多数」，没有任何发言权。而我却阴差阳错成了一个学者、教授，拥有了一定的言说权利，而

这样的权利又是这些先驱者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我如果不出来说话，是无法面对这些历史祭坛上的牺牲者，也无法面对自己的良知的。

提出建立「1957 年学」，就是期待进行更自觉、也更具规模的系统研究，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中开辟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以至学科，不仅集中研究 1957 年反右运动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且研究反右运动所造成的社会组织结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社会伦理，人际关系，思想观念，以至国民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的深刻变化，深远影响，简言之，即中国社会和人的变化。这对理解以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今天的中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这必然是多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哲学，文学，语言学……）的综合研究。

提出建立「1957 年学」，自然是出于对 1957 年这段历史的重要性与复杂性的学术判断。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

校园里的民主运动：1957 年的思想史意义（略）

（参看钱理群：《1956——1966 中国大陆民间思潮个案研究》）

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关键环节

（一）高饶事件—反胡风—肃反运动—1957 年整风、反右—1958 年反右倾

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在新政权基本稳定以后，从 1953 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的时期，即所谓「治国」时期，这就面临着一个治国路线的选择问题。1954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的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宪治国的道路。

但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首先是党内出现了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将高、饶事件

看作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因此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告。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面临被颠覆危险，复辟的威胁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包围我们」的「帝国主义势力」，二是「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三是党内的官僚集团和反对派势力。2 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性判断，可以看出，在此之后，始终笼罩着毛泽东的，就是这样的统治合法性遭质疑，政权被颠覆的危机感；而「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与「党内反对派」就成为始终如一的三大打击对象。

由此而产生的，是所谓「阶级斗争逻辑」，其核心是要在公民中（也要在党内）「划分敌我」，而「敌人」的确定，不是依照宪法与法律，而是出于阶级斗争发动者的主观意志与需要，甚至连「敌人」的数目也是可以预先规定的，而一旦被宣布为「敌人」，就要对之实行不受宪法、法律制约的群众专政。这样的「阶级斗争逻辑」，显然是与「宪法（民主、法制）逻辑」相对立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国逻辑与路线。

应该说，1955 年 5 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随即开展的「肃反运动」即是自觉地用阶级斗争逻辑治国的最初尝试。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中宣布，对被群众揪出来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且实行「舆论一律」，让他们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3 在这样的群众专政下，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成社会恐怖气氛，知识分子更是谨小慎微，人人自危。

因此，1957 年的鸣放，集中在对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的质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有不少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尊重人权」的阶级斗争逻辑，自觉地要求重建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回到「依宪治国」的道路。

但掌握最高权力的毛泽东，无论是开始发动整风运动，还是后来发展为反右运动，他都始终坚持他的阶级斗争逻辑，他的眼睛始终盯着他的三大「敌人」：外国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与党内官僚集团、反对派，他始终坚持着他的维护专政体制的「底线」，时刻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对付反革命复辟」。他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所提出的所谓「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

正是将前述以在公民中「区分敌我」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逻辑理论化，也是他发动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前后一贯的指导思想。区别仅在于斗争重心与策略的不同，由此而构成了三个阶段，也可以叫做三部曲：在发动整风运动时，他试图利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打击党内官僚集团与他心目中的反对派；而当他主观上认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有可能联合起来威胁他的专政体制时，就反转过来，与党内官僚集团联合，将一百十万公民（据丁抒先生的研究），打成「右派」或「中右分子」，宣布他们是「反革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反右运动大获全胜以后，他又趁其余威，反转过来，警告党内那些曾经提出「反冒进」的当权者，威胁说他们已经离「右派」不远，从而使其彻底臣服。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将他的阶级斗争哲学与逻辑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是「横扫一切敌人」，而建立起了他所向往的「君临一切之上」的「圣人加帝王」（他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绝对统治地位。而在反右运动中在全体公民中划分「左，中，右」，提出的「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及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就是反党」的右派标准，以血统论、出身论为核心的所谓「阶级路线」，以及所制订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等等，都在实际上建立了新的等级制度，极度强化了高度集权（各单位与地方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全党与全国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的体制。

（二）反右运动以后所建立或强化的社会体制，结构和秩序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

一是「组织」：一切归于党组织，一切交给党组织，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所谓「一切」并非夸大之词，而且确乎如此，并且有实质性的内容与制度性的保证。

二是「领袖」。「组织」是需要实体来体现的。首先是「领袖」。他是组织的代表，化身，他集中了组织的意志和权力，这既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又是象征性的。他的操作性的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上层；对于底层的普通民众，他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此，就更具有象征的意味，可以说是组织的「神体」。

三是「领导」。各级组织的「领导」，即是组织的「肉身」。这正是反右运动所要反复强调的：组织不是虚的，必须落实到每一个单位的具体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因此，听从组织也要落实到听从单位领导；而每一个等级上的领导，又

要听从上一层领导，即所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这又是和等级授权制相一致的：各级组织的权力来自上级领导的任命，自然有服从的责任。这样，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最后就落实为个人和某个具体领导的关系，并且极其容易形成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各单位在领导之下，还在群众中划分左、中、右，形成「第一把手——领导班子其它成员——左派（积极分子）——中间派（一般群众）——右派」的等级结构。

由此而形成「单位体制」。单位组织实际上是代表党和国家对其成员实行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控制。反右以后制订的一些法律、法规就是为了强化这样的单位控制。如《劳动教养条例》，除了为惩罚右派提供合法性外，还规定如不服从单位的分配、安置和调动，或被单位开除，就要送去劳教，以至劳改，对之实行专政。这样，全体中国人，就只有一个选择：安心于单位的控制，无条件地听从基层党组织的命令，就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否则不但本人，连同自己的家人的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反右以后更强化了单位档案管理，制订了《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工作的几项原则规定》，对每个毕业生进行政治鉴定，并将审查结论装入档案。同时规定，人的一切行动，外出乘车购票，在旅馆投宿，以至在报刊发表文章，都要「单位证明」，说明政治身份和可靠程度。

四是「群众专政」。毛泽东宣布，要将右派「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这就是「群众专政」。它以空前的思想控制力和社会政治动员力，煽动起全民的仇恨和斗争狂热，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参加者以千人、万人、数十万人、数百万人计的群众斗争大会遍布中国每一个角落，把全民训练成祇会撕咬同类的嗜血的政治动物，在近乎疯狂的政治警惕性的背后，隐藏着普遍的恐惧心理和不安全感。同时号召「划清界限，大义灭亲」，把「专政」深入、落实到被专政者的家庭、亲属、朋友内部，将其置于孤立无援，走投无路的绝境。

这就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以后布下的「天罗地网」：全中国，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全在控制之下，无一漏网：它极其严密，甚至达到了精致的地步，用高度集中的权力，动员了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法规、政策、道德、观念、舆论……的力量，将社会每一个成员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至最隐蔽的私生活，都控制得严丝密缝，少有疏漏。而且有严厉的监控、惩治

体制，不仅有监狱、劳教所、收容所这样的专政、准专政的国家机器，还有群众专政的系统，将「钻网」的一切努力消灭于萌芽状态之中，如有试图「破网」者，更是严惩不贷，一切挣扎、抗争都显得无用和无效，所需要的只是「绝对服从」。——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极权统治。

反右以后：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

在毛泽东通过反右运动构建了严密的统治网，获得了人世间不受监督、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以后，他转而开始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动了「大跃进」。所谓「大跃进」，就是「向地球开战」。单从用语就可以看出这实际上仍然沿用了战争的思维与逻辑，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思维与逻辑，不过这回的对象是大自然。但如果说在刚刚结束的反右运动中他在征服人方面暂时获得了全胜，现在他要来征服自然，在取得短暂的虚假的「胜利」以后，大自然很快就予以报复：不到一年，1959—1961 年就出现了三年大饥荒。但承担灾难的却是普通百姓：中国民政局官员在 2005 年 9 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但许多专家却提供了一系列虽无法确认、却也令人惊心动魄的数字：从 1000 万到 4000 万，总在千万以上。4

应该说，这也是反右运动结出的恶果，不仅因为此时已被流放的右派本身就是这三年大饥荒的直接受害者，近年来为人们所瞩目的夹边沟事件不过是一个典型事例；更重要的是，反右运动所强化的权力集中一党、一人之手的体制，使得执政党与其领袖一旦出现了决断、决策上的失误，由于没有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就不可能及时得到纠正，即使全国与全党多数人发现了错误也无能为力，只能任其发展到极端，由执政党或领袖自身提出，才有改正的可能。大饥荒之愈演愈烈，其原因即在于饥荒发生之初，引起了人们（包括彭德怀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对「大跃进」的怀疑，毛泽东却按照他的阶级斗争逻辑于 1959 年发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毛泽东自己也说这是反右斗争的继续），仍然坚持「大跃进」，大饥荒终于不可收拾。

但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阶级斗争逻辑，在大跃进事实上的失败被迫稍作退步以后，又于 1962 年再度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逐渐将

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对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和平演变」的高度警惕，毛泽东做出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的严重判断 5，这是继发动反右运动之后又一次错误分析形势，过分夸大「敌情」。——毛泽东几乎每到关键时刻都要夸大「敌情」，并因而错下决心，造成严重后果，这其中的缘由，是很值得琢磨、研究的。

而在获得了反右运动全面胜利的毛泽东看来，六十年代的中国，能够构成对他的统治威胁的，已经不是右派，而是掌握着实权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官僚集团与他所认定的反对派，他称之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依然保持着强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构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两大革命对象，也是他发动的四清运动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以及最终发动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如前所说，反右运动后构建了一个有着多层等级关系的单位体制，每一个基层组织都代表党和国家对其成员实行从思想到行动的全面控制；作为这样的控制的必然反弹，同时就形成了基层受压制的群众和各级党组织关系的极度紧张。再加上反右以后强化的或以家庭出身（革命家庭，反动家庭，一般家庭）划分，或按出生地（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划分的等级身份制，从而形成两大制度性歧视，这也同样造成了社会关系的极度紧张。因此，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矛头指向各级党组织，一些受压制的群众起而响应，纷纷「造反」，正是这样的社会矛盾的反映。

而刘少奇等从一开始就试图将文化大革命变成新一轮的反右运动，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文革初期，在全国各单位都抓了一批「右派」。但这回毛泽东不再与党内官僚集团合作，而是同样借助群众（主要是红卫兵与所谓「造反派」）的力量，发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造反运动与夺权运动，将他们统统「拉下马」。但到运动的后期，又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重新请回，而将不听使唤，还想继续造反的红卫兵与造反派镇压下去。这其间的策略变化，与当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几乎同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也可以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反右运动的延续。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新的执政者却采取了两种态度：文化大革命被全盘否定，反右运动则只承认「扩大化」，而依然坚持其「正

确性」与「必要性」；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仅彻底平反，而且进行了经济补偿，对「右派」则只「改正」不「平反」，而且不予经济赔偿。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执政者仍然坚持反右运动的两大逻辑：「打天下者坐天下」的「一党专政」的逻辑，和时刻警惕「复辟」，在公民中划分「敌我」的阶级斗争的内在逻辑，尽管已经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为中心」改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转变自然是有意义的，但又是不彻底的。这样，在 1989 年的「六·四」事件的处理中，人们再一次发现反右运动的阴影，就几乎是必然的：同样是将青年学生与群众「反腐败，反特权」（这也是 1957 年大学生们的口号）的呼声，看作是企图颠覆红色政权的「反革命叛乱」，再一次夸大和主观制造了「敌情」，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同样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体制，不惜对行使宪法赋予的民主权利的公民行使不受宪法和法律制约的「镇压之权」；同样是由于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缺乏监督、制约的机制，使得全体公民与全体党员在关键时刻都无力制止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判断与决策，以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至今不得改正。而由此引发的后果，也与反右运动的后果，惊人的相似，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同样是强化了一党专政的体制，政治民主改革与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与发展，腐败之风与两级分化更是远远超过了五十年代后期；而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也同样对大自然施行空前的掠夺性开发，导致严重的污染与生态失衡：这同样是大自然的「报复」。其结果依然是对人性的内在恶的诱发，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恶化与紧张。

1957 年是一个「纲」，「纲举而目张」

从以上简要而不免粗疏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反右运动在 20　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它向上承续反胡风、肃反运动，往下与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以至「六·四」，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既深远又广泛的，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或许正因为如此，反右运动和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风波，一起成了要强制遗忘的四大禁区，成了历史的死结。——巴金先生曾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其实如果真要吸取历史教训，打开历史

死结，是应该建立「四大博物馆」的，也就是要以敢于正视历史的科学态度来进行四大历史研究。在我看来，反右运动正是一个解结、解扣的关节点，因为历史正是由那里开始的。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57 年是一个纲，中国有句话，叫「纲举而目张」，抓住 1957 年这个纲，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就「拎」起来了。

可以期待，对 1957 年历史的研究，必将带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而对 1957 年历史的考察，也必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也会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1957 年学」这个概念的原因与理由。

——2007 年 7 月 7 日在纽约区图书馆的演讲（摘要），7 月 19 日整理、补充。

注 释

1 钱理群：《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压在心上的坟》，5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年出版。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5 卷，140 页，153 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出版。

3 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5 卷，158 页，159 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出版。

4 参看王珍：《三年大饥荒的数字之谜》，载 2005 年 11 月 18 日《文汇读书周报》。

5 毛泽东 1964 年 6 月 8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出版。

「一九五七年学」方法谈　　　　魏紫丹

现在离开 1957 年已经五十年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认为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对推动下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为此，我想就着写作拙著《还原 1957》谈一些心得体会。我先提出三个主要的方法，一方面向朋友们请教；另一方面想以我的「砖」引出朋友之「玉」。

第一「总分法」要求，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总分法就是在从对「现象」到「本质」，从「部分」到「总体」的认识基础上，再利用对「本质」与「总体」的把握来理解「现象」与「部分」。

前时台湾举行了毛泽东的影展，据说他「微笑」的魅力倾倒了观众，甚至于有的认为，他还是有人性的，不应该把他妖魔化。这使我认为，蒋中正先生实在对不起这些台湾人，使他们没能亲身领受毛主席的「微笑」。但我希望人们都来分享右派的感受。著名右派作家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说：「张沪（作者的也划了右派、自杀未遂的妻子）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正深藏在你那嘴边慈爱的笑纹之中呢！」1 用总分法就会看出那「微笑」滴沥着亿万人的血泪！台湾这部分观众就是一叶遮目，缺乏对毛的总体认识。

言归本题。经过五十年的研究，我们得出一个对反右运动的总体认识。郭罗基教授指出：

「1956 年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也是不合法的。这种社会主义叫做主观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1957 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就是以民主反对党主，反对党主操纵的主观社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一个正确的命题。」2 反右派和后来邓小平的「反右必要论」，不仅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方面，而且是倒行逆施，开历史倒车。

至于说发动反右的手段是阴谋，是阳谋，或是没有预谋，那只是临门一脚的问题。方励之教授已从总体上对此问题作了论断：「现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和方法并非仅仅与中共一两个政策相矛盾，而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君临一切之上是难于共存的。所以，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之间的离异，或迟或早是注定要发生的，反右运动只是加快了离异的进程。」3 这个「难于共存」，就是共产党所说的「与右派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1957 年学」就是要研究右派前瞻性的大鸣大放是如何推动历史前进，和共产党发动反右派是如何开历史倒车的。这是一个总的大前提。古人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4

当然，也不能忽略对某一部分，甚或某一微小细节的研究。这里，可以与《论

语·子张》中子夏的话比照读解：「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

比如，胡平先生说：「作为毛的医生，李志绥能够观察到毛的情绪的起落。这往往比毛那些意思含糊、前后矛盾的讲话更能说明问题。李志绥观察到在 57 年的 5 月中旬，毛的情绪很坏，『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5 胡平是擅长于讲道理的，包括这次，都很令人信服。但是，这倒引发我深思：如果「阴谋论」成立，这时候毛何以会情绪如此呢？

经过研究，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是李志绥的观察，而是「林克的看法，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6 林克说：「当时毛的确因为患感冒而身体不适，并不是李志绥捏造的我所说的『毛这次是受到重大打击，而形体衰弱，精神忧郁』。」7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谁说得对，但也不能确定谁说的不对。

总分法是正确认识毛泽东和中共的科学方法。俗话说：「问路问来人。」司马璐就是过来人。他说：「研究中共党史的一个最大困难是，中共原始文件本身，经过权力斗争，或路线改变的影响，时时被否定或篡改。甚至毛泽东本人的著作，经过一再删改，不同年月的版本，说法就大不相同。所以，要鉴定一份中央文件的真伪，足够的原始资料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有关中共的全面知识，以及阅读的判断能力尤为重要。」8 这充分说明运用「总分法」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你认清了毛泽东从来就是质量恶劣，性格暴戾，作风专横跋扈，从大杀 AB 团、延安整风、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破口大骂梁漱溟、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从肉体上消灭意见相异者李文林、袁文才、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周恩来（从《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得知，毛用癌细胞害死周）、直到小人物田家英，可知，他是决不许可「哪个虫儿敢出声」的。难道他会许可他早已认定是美帝国主义第五纵队、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帮助共产党整风吗？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真的是一场阴谋。

实际上，除掉毛 1957 年春季为了「引蛇出洞」而抛出「双百方针」，对知识分子好到反常的程度外，你把他的骨头砸碎也是砸不出真正的「雅量」呀，「宽容」呀，「开明」呀，以及「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因素来的。

邓小平说：「1957 年反右派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9 如果国人把握住邓小平的双手沾满右派的鲜血这一基本事实，和李

锐说的邓和毛一样左这一总体评价，以及国学大师牟宗三说的邓和毛「是一丘之貉」，那么对邓的胡言乱语就自然会认识透彻了。

毛泽东冲着邓小平左得过人，才说那个小个子：「很有发展前途。」10

所谓「还原历史」，就是一是一，二是二地还它以原貌。就着总分法来说，就是有总有分：有分无总，只见树木；有总无分，只见森林。

以柯庆施作为例子。许多写关于反右的文章，涉及到上海，都写那一位「毛主席的好学生」如何如何紧跟，好象他表现得最恶劣。但我认为，对坏人也不能冤枉。柯在反右中还没实行他的名言「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他在反右中比不上邓小平、彭真坏。

柯否定了不少下面送来报批的内定右派。譬如《劳动报》总编辑马达，文汇报党组书记钦本立、唐海，解放日报副总编冯岗。柯庆施说：「这几个同志是缺少经验的问题。他们是有错误，不能做现在的工作了，给他们一点处分也是应该的，但不要划右派。右派划多了不好。」

在柯庆施「右派划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外事系统没有划一名右派。上海市第二商业局整个局里没有划一名右派。当时的商业二局局长裴先白说：「我们是搞食品供销的，有的同志讲些怪话我们就没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没有问过我。」

当时的上海科委主任舒文回忆说：「市委召开一次常委会议，柯老主持。会上发了两个科学家的材料。从当时看来，他们的言论超过划右派的标准。……柯老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把这些人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还是不划成右派对国家有利？二、这些人都是从国外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他们绝不会反党。……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是，科委系统的研究人员一个右派都没划。」

还有，关于在大学生中抓右派的问题，柯庆施告诉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应该实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柯庆施还说过：「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派斗争。」在当时能喊出这么一句，是有千钧之力的。上海虽然划了 15,419 名右派，但是，相对数还是比别处明显「落后」。11 比如说，河南省，官方数字是 70,869 人。

同理，陈伯达在反右中就没有胡乔木表现恶劣，起码他没为《人民日报》写

过一篇反右的社论，而胡乔木却是反右社论写得最多，最恶毒的一个！

我们既然认为，对坏人也不应该冤枉，那么，对毛泽东也当然不应该妖魔化。实际上，毛泽东之凶恶，之邪恶，之丑恶，之罪恶滔天，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直到现在，有关资料仍大量密封于黑箱里，只存在估计不足的问题，尚不存在妖魔化的情况。相反是对他的妖魔性缺乏认识；尤其是面对着官方的美化与神化缺乏抵制。总分法要求从总的倾向与个别表现相结合地看问题，而不要抓住芝麻丢掉西瓜。「妖魔化」论者就是对总体缺乏明确的认识。为什么德国和俄国就没有人出来说「妖魔化」斯大林、希特勒呢？中国人呀中国人！刘宾雁生前曾气愤地说：「活该受统治！」12

第二，「内外法」要求，研究问题时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所以需要「入乎其内」，是因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例如，作家黄秋耘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家得知一个政治信息——邵放下电话，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由此，他便对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阴谋得出判断：

「这个『急刹车』的措施可能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直到5月中旬才决定下来。周扬那一级的高级干部(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至早也到5月中旬稍晚一些时候才确知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后，一天也没有耽搁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当天(5月18日)晚上就暗示给我。」「先见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于敏锐的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于准确的、及时的情报。比方那一个『转』字，哪怕我是个『小诸葛』，5月18日晚之前，也是无法想得出来的。只不过由于偶然听到的一个电话，才『顿悟』起来。」13

这为「入乎其内」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

但是，如果仅仅入乎其内而没能出乎其外，就会「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李志绥之所以认为毛发动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是想借知识分子的刀，杀向那班「反冒进」的「党内的敌手」，而不是预谋反右。结果毛感到上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当。原由就是他当时根本不了解外情。

我和许多右派对于反右派斗争，也可以说是「入乎其内」的，但我们「入」

的「内」太小。我们只知道挨斗争的过程和感受，对全国的总形势也只限于读到的报纸和听到的报告；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后，和劳教、劳改的右派互通信息，扩大了我的「内」的范围。到海外之后，才接触到一些右派朋友的，和当年是反右积极分子现在良心发现了的朋友的回忆录；也读到一些这方面的国内外学者的论述和论著，其中《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鸿》、《晚年周恩来》、《阳谋》和徐平华的文章《九死一生二十年》等给了我较深的印象。我们右派所需要的「出乎其外」是，要通晓中外学者对「1957 年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是不能「出乎其外」的「入乎其内」，则必然会「陷乎其内」而不能自拔。李志绥就是「陷乎其内」而难见庐山真面目。

所谓「内外」，以国分，有中国与外国；以党分有中共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以派分有左中右。如果没能入乎其内，那就会「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比如，斯诺这个洋大人是个中国通，先别说他对共产党的隐情通晓得怎样，仅凭他把毛泽东说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翻译成打着伞旅行的「孤独的和尚」，就可知这个「中国通」是多么可怜了。天知道他在世界上散布了多少诸如此类的以讹传讹、扭曲事实的故事？作为郑重的学者，一个局外人，一个外国人，既要认清自己具有出乎其外，「旁观者清」的优势，又要认清自己具有「洋鬼子看戏」的劣势。仍以「和尚打伞」为例，就算洋大人知道了这个歇后语的意思是「无法无天」，但因你自幼就浸泡在法制教育和法制环境中，这就使你很难能领略到浸泡在帝王术中的毛泽东说的「无法无天」的语意方面的皇权无边、老子天下第一和语感方面的「我是政治流氓，我在乎什么？」的原汁原味。这和毛泽东不解地问基辛格「为什么你们国内对『水门事件』这个屁事那么在乎？」有点儿异曲同工。无独有偶，英国记者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说什么毛实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自由化政策」；说什么吴晗揭发批判「章罗同盟」的发言是反毛的；以及对毛和刘、周等之间关系的描写，简直纯属一派「海外奇谈」。在这一点上，许良英先生是最权威的见证人。他说：

1973 年出版的英国记者（后任哈佛大学教授，曾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八十年代已出了两个中译本。由于作者被认为是英美中国问题研究权威，他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又曾作为哈佛大学的基础课，我不

得不认真去读这本书。可是读后，不仅十分失望，而且有被愚弄的感觉。请听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毛的政治局同斯大林的不同，那里有辩论，主席也可能被击败，或者被人置之不理。」刘少奇「对机遇和个人使得党的领导权落入毛的手中的情况有些忿忿不平。」他把「双百」方针和鸣放说成是「自由化政策」，在《结束语》中说：「毛的自由化政策试验的失败，是对他领袖威信和权威的沉重打击。」「毛不现实地设想通过整风的形式就可实现党员品行上面的任何长期性的转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起源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于 1957 年的「不和」，其主要证据竟出于我的口。他引用了 1957 年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上我的右派言论：「中央分裂了，刘少奇、彭真压制毛主席。」事实上，这句话并非我说的，而是清华大学一位朋友对我说的，我并不相信，只是向哲学所党支部汇报过，想不到他们把它捅给《人民日报》，变成是我最严重的右派言论，「美联社」也当作新闻报导了。这纯属误会，麦克法夸尔却把它当真，作为「毛刘不和」的主要根据。这种效法所谓「克里姆林宫学」写出来的中国历史，能有多少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九十年代初，我曾给他本人去信，指出他不了解中国内情，对报上宣传的都信以为真，难免上当。我告诉他，毛泽东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足以说明「鸣放」绝非自由化，不过是一种「引蛇出洞」的计谋，他无法理解。中国帝王的权术谋略太「深奥」了，头脑简单的西洋人确实难以理解，我自己也是被蒙蔽了十七年之后才恍然大悟的。14

这个内外法的道理，余英时教授在写给《当代中国研究》的出版祝词中，说得清楚明白：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中英文刊物之所以在西方能别树一格，主要的原因是它们的作者群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大陆，但同时又在西方受到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较长期的训练。他们是在中国大陆成长的，因此有来自生活经验中的内在知识；他们已熟悉西方学术界的操作方式，因此又能超越主观的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最近演变做客观的了解和深入的分析。这种主客交融、能所两忘的境界正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所追求的。而他们竟能自然的结合了起来，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1989 年以后，许多过去亲自参加过中国大陆开放改革的知识分子也大批地来到了西方。他们和八十年代起先后进入西方学术主流的中国留学生汇合在一起，

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队伍。他们将对于当代中国的研究作出特殊重要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我个人尤其高兴看到他们今后能通过《当代中国研究》，将研究成果直接传布给海内外的中国读者。」

「本刊的作者并不是「隔岸观火」式的所谓「中国观察家」(China Watchers)，他们都有为中国大陆的继续开放和改革贡献一份力量的意愿。历史已一再证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暂时寄居海外，往往能发挥意想不到的学术和思想上的效用，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今天已不是传统的时代，世界已缩小为一个「地球村」了，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会再兴「远托异国，昔人所悲」的慨叹。相反的，他们大可以把」异国」当作为中国储才之地，潜心研究，一起在更长远的意义上报效中国。」

余教授反复强调这个内外法的运用，他为阮铭《邓小平帝国》一书作序，写道：「从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文献而言，《邓小平帝国》显然和一般置身事外者的客观研究并无不同，但是我们通读全文，便会发现作者本人最初也曾参与了这个帝国的创建。作为一个参与者，他是身在庐山之中的，然而作为这部帝国兴衰史的撰写人，他却能跳出庐山之外，因而看清了庐山的真面目。这样主客统一的著作确是不多见的。这是此书最能吸引读者的所在。」

许良英说：「不少人，包括利瓦伊汉和陆定一，以及邓小平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鸣放、反右历史时，都重复毛泽东 1957 年 5 月以后那种自欺欺人的论调。出人意料的是，被官方斥为『自由化分子』的阮铭，直至八十年代还持这种观点。甚至 1994 年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竟也附和这种颠倒是非的说法，说什么毛泽东「感觉上了民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李医生显然不了解外界实情，轻信了毛泽东自编的由头。」15

其实，何止阮铭！王若水说是「急转弯」16；赵紫阳说「阳谋」是「托词」17；胡耀邦说「引蛇出洞只是短时间。」18 在识破这一阴谋上，有先见之明的，刘宾雁说，只有邓拓一人 19，我认为吴宓教授也该算一个；有后见之明的，有李慎之，许良英，刘宾雁，王若望……就多了。

总分法和内外法，是相互为用的。要想做到从总体上、本质上把握人和事物，就必须用内外法；而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在一个人身上，在某一方面往往不能双

全其美，就会产生偏差，而纠偏就要借助于总分法。当然，还需运用下面要讲的「前后法」。

第三，「前后法」是探明事物发生因果和主观动机的不二法门。

右派老祖宗章乃器先生说：「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20

1979 年，胡耀邦要发动一场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遭到胡乔木的阴谋反对。胡找到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已领教过真理标准讨论的滋味，当然不喜欢这个「生产目的」的讨论。胡乔木又到邓小平那里，说华国锋不赞成「生产目的」的讨论。邓小平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胡乔木又把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端给胡耀邦。这样一来，讨论中途夭折。《中国思想运动史》的作者李洪林事后想，如果那时经过讨论摸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规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步子，大约会提前十几年。李洪林说：「有些事情，当时未必清楚，过些时候回头再看，就清楚了。」21 当然，这些话属于经验之谈。正是经验之谈，使它具有了哲理性。

「前后法」既顺藤摸瓜，寻求来龙去脉；又顺瓜摸藤，顺藤寻根，由果推因，由终返始。站在今天看昨天，我们就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例如有人说，毛发动整风是真心要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可是右派的进攻破坏了整风。这是当年中共昭告国人的。当年怀疑者甚少；而至今相信者仍大有人在。

要使历史真相大白，只能在反右之后看反右。反右之后看到了什么呢？大跃进。大跃进不是整掉了「三害」，而是「三害」发了疯！有人说毛是真心想通过整风克服政治弊端，若不是右派进攻，文革会提前十年。好吧，文革过了，我们总算从文革的「革命委员会」中看到毛克服了什么样「政治弊端」。这中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饿死数千万人，受迫害的人，以亿为单位。从文革看反右，从大跃进看反右，我们看清反右不仅是卑鄙的阴谋，而且是毒谋。

从反右往前推，毛笑容可掬，信誓旦旦，号召「知无不言」；再之前，在党内对匈牙利事件定性为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对中国出洞的蚂蚁，要采取后发制人，要左派做好准备。再往前推，坚决催促 1956 年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民众，而且「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了的时候再动手。」22 再往

前推，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原稿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与「党内的自我批评」和「劳动人民的监督」等同看待，而毛泽东改写为：后两者的批评监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评「常常是从右的方面出发的」。23

既然「劳动人民的监督」是主要的，毛泽东为什么不主要号召工农鸣放，帮助党整风？甚至于连次要也没有呢？难道他居心衹想听「从右的方面」提的意见？难道居心衹想让「右派」帮中共整风？

「阴谋论」是确凿无疑的。

要弄清毛为什么要反右，毛个人的「动机」、「目的」、「居心」，这是不能光凭猜测的。

——2007年6月30日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注 释

1 从维熙《走向混沌》（第一部）作家出版社1989年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87页。

2 郭罗基（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论），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

3 见「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言纲要和作者简历》。

4 《孟子。告子上》

5 胡平《毛泽东为何发动反右》「中国人权论坛」网。

6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87页。

7 林克《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第58页。

8 司马璐《中共历史的见证》，第418页。

9 《邓小平文选》二卷第345页

10 林伟《毛泽东评邓小平：精明能干，有才华》「军政在线」网

11 邓伟志《如何评价柯庆施》，《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

12 王康《刘宾雁的遗产》：「刘宾雁厉声谴责中国人遭受专制是‘活该!’中国人

先在毛泽东统治下沦为狂热、极端愚昧的政治性物种，后在邓小平、江泽民权钱联盟里，集体堕落，乃是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大倒退。」(《刘宾雁纪念文集》第520页）

13　黄秋耘《风雨年华》

14　许良英《关于反右运动的片段回忆和思考》《北京之春》1997年2月号》

15　同上。

16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第275页。

17　参见「议报论坛」网站：柳萌《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特大刽子手!》

18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212页。

19　刘宾雁为华民《中国大逆转——反右运动史》一书作序:《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20　章立凡《章乃器的三次「摘帽」》(摘自《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

21　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第280、306页。

22　转引自李丹慧、沈志华《1956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散见136—212等页。

本书作者简介（以论文顺序排列）

林培瑞 / Perry Link

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董事长。教授有关中国的课程二十余年，着有《倔强的野草：文革后流行的和引起争鸣的文学》、《北京夜话》、《天安门文件》等中英文专著十多种。

许良英

浙江临海人，1920年出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曾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和杭州工委委员，中共杭州市青委学生部长。1952年调中国科学院，负责《科学通报》编辑工作。1956年调哲学研究所，研究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1957年被打成「极右分子」，回老家当了二十年农民。1962年开始编译《爱因斯坦文集》。1978 年回科学院，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近、现代科学史，以及民

主的历史和理论。曾主编《爱因斯坦文集》、《20 世纪科学技术简史》、《爱因斯坦研究》等专著。

邵燕祥

1933 年出生于北京。诗人、散文家。1946 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1957 年被打成右派，1979 年恢复政治名誉。有多种诗集、文集出版，近作有《别了，毛泽东》。

杜　光

原名林道茂，浙江温岭人，生于 1928 年。1948 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传讯、通缉，遂改名换姓，以迄于今。1958 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 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科研办公室主任，1988 年参与筹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任研究会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双月刊主编。1989 年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参与撰写《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和《杨献珍传》，另有时评一百余篇。

郭罗基

1932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8 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 年后历任科长、团委书记、党委书记等职。1955 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 年起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82 年，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冒尖人物」，被邓小平发配至南京大学。1989 年「六・四」以后被清除出党。九十年代流亡美国，先后为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近着有《历史的漩涡》。

陈奉孝

山东潍坊人，1936 年出生。1954 年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7 年因组织「百花学社」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团」罪首，判刑十五年幷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前后经历了北京监狱、兴凯湖劳改农场、大兴安岭采伐大队等五六个劳改单位。受过各种酷刑折磨。1972 年刑满后被强迫留劳改单位继续「改造」。1979 年「反革命」罪平反，1984 年右派「改正」。着有个人回忆录《梦断未名湖》。

刘宾雁

祖籍山东，1925 年出生于吉林长春，作家。1944 年加入中共。1957 年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兼记者时被打成右派。1979 年「改正」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7 年被中共指「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再次开除党籍。1989 年因公开反对中共当局的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被禁止返国，开始海外流亡生活。2005 年在美国新泽西州病逝。着有特写《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等。

吴国光

1957 年出生于山东临沂，1982 年获北京大学文学学士，1984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新闻学）硕士，1995 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国研究与亚太关系讲座教授，专研当代中国政治变迁及中国对外关系，着有英文著作两种、中文著作十四种，中、英文论文约百篇。

齐　戈

国内自由撰稿人，《新世纪》网站特约评论员。

李慎之

1923 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8 年加入中共。1957 年在新华通讯社国际部副部长任上被毛泽东点名，定为「极右分子」。1973 年回京任新华社参编部翻译、校对。1979 年右派被「改正」，恢复党籍。1985 年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1990 年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和党组成员职务。1999 年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2003 年在北京病逝。

丁　抒

祖籍江苏东台，1944 年出生于四川小城合川。抗战胜利后随家人迁居上海。1962 年入清华大学。1968 年赴安徽丹阳湖农场劳动。1970 年任职辽宁某研究所。1979 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翌年赴美，入纽约市立大学。1986 年获博士学位后以

授课为业，现为诺曼岱小区学院物理教授。余暇研究中国当代史，着有《阳谋》、《人祸》。

张成觉

1939 年出生于香港。1956 年毕业于广州市六中，入交通大学(上海、西安)，反右时被划为右派。1960 年至 1982 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做农工、任文化教员、英语教师。1982 年回广东，先后任中学、广播电视大学教师。1988 年至 1994 年任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中文秘书。在两岸三地及海外报刊共发表《在那遥远的地方——新疆回忆录》、《笔底风云——二战名记者朱启平传》等各类文字二百余万。

叶永烈

1940 年出生于浙江温州，著名作家。主要从事政治性长篇纪实文学创作。1957 年入北京大学。1960 年出版第一本着作，现已出版近二百部著作。关于「反右派运动」的著作有《沉重的 1957》、《历史悲歌——「反右派」内幕》、《拨开历史的迷雾》、《反右派始末》、《离人泪》等。

姚监复

1932 年生于江苏南京，籍贯为安徽省宿松县。1957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到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工程师。文化革命中曾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在湖南西洞庭湖农场「隔离审查」。1982 年调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先后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协作研究员。

方励之

祖籍浙江杭州。1936 年生于北京。1948 年在北京四中加入中共地下外围组织。195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6-1957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实习研究员。反右运动后被中共开除党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后任助教、讲师、教授及第一副校长。1986 年学生运动后被撤职，第二次开除党籍。1987-1989，任北京天文台研究员。1989 天安门学生运动后移居美国。1992 年起任亚利桑那大学物理系及

天文系教授。现为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的指导委员会主席。

程映虹

1959 年出生于江苏苏州。1982 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历史系，1988 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硕士， 2001 年获美国东北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国际影响。在中外学术刊物上有文章多篇发表，出版专著有《卡斯特罗传》和《西窗东眺》、《塑造新人——从启蒙运动观念到社会主义现实》。

张轶东

1931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195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59 年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文化革命期间曾因言获罪入狱九年。1981-1991 年间为黑龙江省绥化师专(现绥化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师，讲师和副教授。1991 年退休。有中、英、俄三种文字着译多种。2007 年出版新着《毛泽东的最后二十年》和回忆录《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陈　彦

1955 年出生于湖北随州，1981 年武汉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生毕业。1982 年任教武汉大学。1987 年获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巴黎东方语言文明学院、巴黎第七大学。现任职于法国国际电台，法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中心。近着有《中国的觉醒－改革以来中国思想演变进程》、《穿越中国当代思想世界的旅程》（法文）等。译着有汪德迈《新汉文化圈》。

朱　正

1931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作家、历史学家。1949 年任《新湖南报》编辑。1955 年肃反运动中被「斗争审查」一年。1956 年出版《鲁迅传略》。1957 年被划为右派，送「劳动教养」。1962 年解除「劳动教养」后以体力劳动维持生计，劳动之余写有《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手稿管窥》。1970 年因「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劳改」三年。1979 年平反后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着有《1957 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周氏三兄弟》、《朱正书话》等。

高　瑜

1944 年出生于重庆。1962 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年代在中国新闻社专稿部任记者，1988 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兼香港和海外中文报刊专栏作家。因报道 1989 年北京民主运动，撰写时政评论，两次入狱，失去自由长达七年。后以自由记者身份继续从事中国新闻报道，曾获多次世界新闻奖。

陈奎德

1946 年出生于江苏南京。 1985 年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历任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文化研究所所长，上海《思想家》杂志主编。1989 年应邀访美，历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民主中国》杂志主笔，《观察》 网站主编等。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有哲学史、科学哲学、政治哲学、文化研究以及政论等多种著述，如《中国大陆当代文化变迁（1978-1989）》、《海耶克》、《煮酒论思潮》等。

戴　晴

1941 出生于重庆，1966 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66-1978 在航天部和公安部从事技术工作。1979 开始写作。1982-1989 任光明日报记者。1989 年后言论被封杀，为自由职业者。作品有小说集，杂文集，社会纪实《当代中国女性系列》、《长江长江》，以及历史纪实《储安平与党天下》、《王实味 储安平 梁漱溟》等。

章立凡

1950 年出生，中国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着有《风雨沉舟记》、《都门谪居录》、《长夜孤灯录》等文史作品，结集作品有《君子之交如水》；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等。

陈斯骏

1930 年出生于上海，1936 至 1943 年先后在香港九龙、广西桂林求学。1943 至 1948 年在四川灌县空军幼年学校受训。1950 年参加工作，1954 年入北大历史系，1958 年被划为右派，1959 年被派往内蒙古师范学院任教。1964 年被迫退职，在广州任代课教师和街道工人十余年。文革期间三次偷渡香港未遂。1979 年右派「改正」后，在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退休前为该系教授。

邵　江

1985-1989 在北京大学数学系就读。曾参与组织 1986，1988 和 1989 年学运。六四后被捕入狱 17 个月。后数次被捕和被监视居住，1997 年辗转流亡海外。曾就学于威斯敏斯特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现为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生。研究领域包括政治和媒体，比较政体和国际关系，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

钱理群

1939 年出生于重庆。1960 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1978 年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1981 年获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留中文系任教。退休前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当代思想史研究。着有《周作人传》、《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等。近作有《拒绝遗忘》、《「1957 年学」研究笔记》。

徐　贲

1950 年出生于江苏苏州，美国麻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现任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从事思想史和文革研究。着有《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 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等。

胡　平

1947 年出生于北京，七岁入川，1966 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下乡插队五年，返

成都后当临时工五年。1978 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获哲学硕士学位。1980 年参加自由竞选，被选为北京大学海淀区人民代表。1987 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1988 至 1991 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主席。现居纽约，任《北京之春》主编。着有《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哲思手札》、《给我一个支点》、《中国民运反思》等十余种。

朱学渊

原籍江苏赣榆，1942 年生于广西桂林， 1965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在四川、南京两地任中学教员多年，1978 年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80 年移学美国，1983 年获博士学位，专长理论固体物理，1985 年起从商，并从事历史语言研究，已出版《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等学术专著。

沙尚之

1939 年出生，196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八十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到澳大利亚 CSIRO 和新南威尔士大学作化学研究。1986 年起任上海轻工业研究所所长，现退休。从事技术创新管理与改革工作，业余学习与研究中共党史，近年编纂出版的书籍有《沙文汉诗文选集》、《陈修良文集》、《记孙冶方》等。

杜　高

1930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戏剧影视评论家。十二岁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后进报社工作，开始写作。1949 年出版第一本文艺评论集。1955 年牵涉于「胡风反革命」案，1957 年被划为右派，被送「劳动教养」十二年。1979 年恢复工作。先后担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等职。近年因《杜高档案》的出现，出版了回忆录《又见昨天》。

叶国荣

1931 年出生于越南的一个华侨家庭，1946-1949 年就读于广西，1951 年毕业于越南河内中华中学。1953 年泅渡中越边境的北仑河，到达广西。同年入武汉大学。1957 年被划为「极右分子」，在学校和农场「监督劳动」。后到武汉柴油机厂当统

计员。1968 年因「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罪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在湖北沙洋农场劳改。1979 年到法国探亲，1988 年定居美国。

巫宁坤

1921 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41 年西南联大外文系肄业。1948 年毕业于美国曼彻斯特学院，1949 年获芝加哥大学文硕士，1949-1951 年为芝加哥大学博士生。1951 年应燕京大学聘请回国任教。1957 年被划为「极右分子」， 送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劳动教养」。1962 至 1966 年在安徽大学当临时教师。1970 年下放农村。1974 年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1980 至北京国际关系学院，1991 年退休。其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校任访问学者、客座教授。着有英文回忆录 A Single Tear ，诗文小集 Always Remembering, Chimes of Solitude ，中文版《一滴泪》，散文集《孤琴》。

巫一毛

1958 年出生于北京。美国圣母大学英美文学学士，金门大学企业管理硕士。曾任美国硅谷数家计算机公司高级主管。中英文作品发表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并被选入多本诗歌、散文、小说集中。着有自传《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参与演出纪录片《上山下乡》。现居美国加州。

流沙河

原名余勋坦。1931 年出生于四川成都。汉族，蒙古裔。十七岁发表习作。1949 年秋入四川大学，1950 年到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1952 年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群众》杂志及《星星》诗刊编辑。1958 年被划为右派，留成都做多种苦役。1966 年被押回老家，锯木六年，钉箱六年。监管劳役共二十年。1978 年摘右派帽子，任金堂县文化馆馆员。1979 年被「改正」，不算右派，复任《星星》诗刊编辑。作品出版有《流沙河诗集》、《锯齿啮痕录》等二十六种。

龚定国

1930 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46 年入武汉大学。1951 年毕业到东海舰队，任军械

处化验室主任。1958 年定为右派，受开除军籍留队监督劳动处分。后发配甘肃生产建设兵团。1966 年底到甘肃省嘉峪关农建十一师氮肥厂筹建处。1968 年被「群众专政」关牛棚九个月。1969 年解除「专政」，专职打扫公共厕所。1970 年到山丹农场。1978 年调张掖师专教书。1979 年接获通知，说右派属于「错划」，予以「改正」。

谢　泳

1961 年出生于山西榆次（现晋中市）。1983 年晋中师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做学报编辑。1985 年任职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后任《黄河》杂志副主编。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着有《禁锢下的呐喊——1976 至 1989 年中国的报告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十余种。

魏紫丹

1933 年出生于河南北蒙县农村。1956 年毕业于平原师院，1957 年于北蒙中学划「极右派」，劳动教养 5 年，农村监督劳动 16 年。1978 年恢复工作。1993 年退休于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岗位。着有教育理论书文若干。

出版印行：田园书屋

地址：九龙旺角西洋菜街 56 号 2 楼

电话：852-2385 8031

传真：852-2770 2484

电邮：gfbook@netvigator.net

初版一刷：2007 年 11 月

国际书号：/ISBN962-339-069-6
